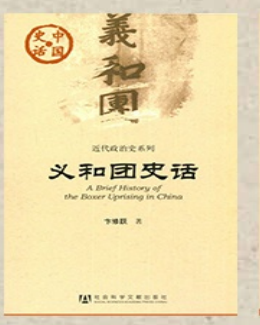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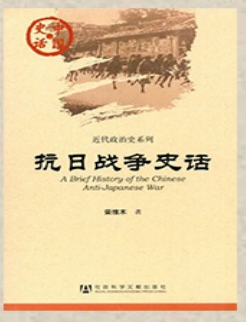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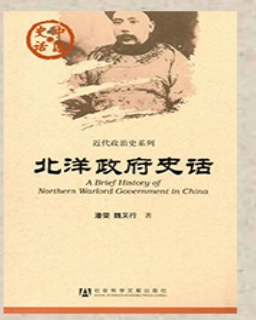
近代政治史系列
(十二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西安事变史话》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安事变史话/李义彬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

（中国史话）

ISBN 978-7-5097-1948-0

Ⅰ.①西… Ⅱ.①李… Ⅲ.①西安事变-史料 Ⅳ.①K264.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5976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话·近代政治史系列

西安事变史话

著者/李义彬

出版人/谢寿光

总编辑/邹东涛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010）59367215

电子信箱/renwen@ssap.cn

责任编辑/黄丹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责任校对/杨春花

责任印制/郭妍 岳阳

总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5.75

版次/2011年5月第1版 字数/106千字

印次/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1948-0

定价/1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下载资料请关注我的博客https://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

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2011年4月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目录

一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 岌岌可危的华北河山

2 汹涌澎湃的抗日潮流

3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定

4 南京政府对日政策趋向强硬

二 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

1 张、杨在西北“剿共”接连失利

2 中共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

3 中共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

4 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

三 西安事变的爆发

1 张、杨与蒋矛盾的激化

2 蒋介石逼张、杨继续“剿共”

3 事变前夜

4 临潼捉蒋

5 捉蒋后西安的军政措施

四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 南京讨伐派掀起的“讨逆”恶浪

2 张、杨的和平诚意

3 南京主和派的营救活动

4 地方实力派的态度

5 民众团体和知识界的反应

6 国际上对西安事变的反应

7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8 西安谈判与释蒋

9 “审张”、“赦张”、“管束张”

1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参考书目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一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 岌岌可危的华北河山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继“九一八”侵占东三省后，1933年初日军又占领了山海关和热河。此后它的侵略魔爪进一步伸向华北。

日本帝国主义一向把东北看成是它的“生命线”，把华北视为其侵吞全中国、称霸世界的“圣战基地”。控制华北，对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华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控制华北，不仅可以解除东北的侧翼威胁，巩固其卵翼下的伪满洲国，还可以掌握深入中国内地的咽喉要道和北侵苏、蒙的桥头堡。

华北丰富的自然资源更使日本侵略者垂涎欲滴，把华北作为它“以战养战”的重要基地。日本资源贫乏，国内有限的资源难以满足其日益扩大的战争需要，它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依靠掠夺殖民地的资源，来支撑侵略战争。华北的煤、铁储量丰富，渤海湾的盐是日本军需化学工业必需的优质原料。农业方面，华北耕地占全国1/4，棉花产量占全国产量的近半数，粮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1/3强。这些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日本在鲸吞东北并拼凑起傀儡政权后，迫不及待地要占领华北；由于它武装侵略中国的行为已遭到英美等国的谴责，它又刚刚宣布退出国联，为免遭进一步孤立，暂不敢贸然发动第二个“九一八事变”，用武力侵占华北；而决定从经济和政治方面染指和控制华北，把国民党政府的势力从华北驱逐出去，使华北当局绝对服从日本，在政治、外交、财政上脱离南京，进而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

日本侵略者实施这一策略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在1935年5月发动的华北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以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和遵化县长帮助孙永勤部为借口，5月29日向国民党华北当局提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出种种无理要求，包括撤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及日本指定的其他官吏；取消河北省各地的国民党党部；调走驻在河北省的中央军部队和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等。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交涉后，南京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接受了日方条件。上述河北事件还未结束，日本侵略者又发动了张北事件。日本4名特务潜入察哈尔境内绘制地图，6月5日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闻讯后，立即下令释放。但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却以此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无理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胁。南京当局再次妥协，同意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官员；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撤离该地；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通过华北事变，日本窃取了冀察两省的部分主权，国民党中央势力在华北大受削弱。但是，贪婪的日本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又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妄图使冀、察、绥、鲁、晋5省从中国版图中分割出来。密谋策划并卖力推行这一侵略活动的，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关于主持“自治”的人选，日本先后物色了吴佩孚、孙传芳、张敬尧等失意军阀和晋绥绥靖主任阎锡山，但都没有成功。土肥原无奈，便把目标集中到宋哲元身上。11月11日，他向宋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案”，限宋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本将用武力进攻河北、山东。宋哲元态度暧昧。他虽想借助日本的势力保持华北的半独立状态，但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出卖国土的千古罪人。土肥原又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挂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宣布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冀东傀儡政权的出笼，是“华北自治”的先声。在此形势下，南京当局再次妥协，批准成立了有很大自主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就在日本军人策动“华北自治”的同时，日本外交当局炮制并竭力向中国兜售“广田三原则”。由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并经日本内阁于1935年10月4日通过的“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中、日亲善，中国不得藉欧美势力牵制日本；中、日、“满”亲善，中国最好是承认，或至少要默认伪满洲国；中日共同防共。这实际上是让中国一切都听从日本摆布，并成为它的附属国。

1936年初日本发生“二二六”政变后，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大量

增兵华北。此前，日本根据《辛丑条约》，在从北平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驻有军队1700人。1936年4月18日，日本军部根据内阁决定，将华北驻屯军增加2倍以上，增至5700人。与此同时，日本浪人在中国各地不断挑衅滋事，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为此，中日两国从9月到12月进行了“调整国交”谈判。

总之，华北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华北河山行将变色，亡国惨祸迫在眉睫。身处华北前线、富有政治敏感的北平学生深深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旨在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西安事变，就是在这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发生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定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号召武装民众，抗日救国。这与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当时统治全党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执行“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错误政策，只提“下层统一战线”，拒绝一切“上层统一战线”。这些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政策，给群众的反日斗争带来不利影响。

中国共产党克服自身的“左”倾机会主义，调整政策，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经历了一个过程。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提出：“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个宣言的发表，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有所变化，统一战线思想有所前进。宣言在社会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爱国将领冯玉祥联合中国共产党积极筹建抗日武装，同年5月在张家口举起“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旗帜。但此时中共斗争策略的改变极为有限，“左”倾路线领导者把在三个条件下团结抗日的宣言只是“当作宣传工具，当作反对各派的武器”，并断言国民党各派绝不会接受这个条件。

“左”倾路线领导者的关门主义政策，还反映在同年11月对待福建人民政府的态度上。

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入闽“剿共”失利，决定改“剿共反蒋抗日”为“联共反蒋抗日”。1933年9月，蔡廷锴等派陈公培到闽西红军驻地会见彭德怀。彭向陈解释了共产党1月17日发表的在三个条件下团结抗日的宣言，肯定了十九路军的反蒋抗日行动，同时也批评了他们“剿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共”的错误。陈表明了十九路军联共反蒋抗日的愿望。10月，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由陈公培陪同前往江西瑞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接见了徐、陈。经过谈判，双方签订了“抗日作战协定”。协定签订第四天，中共中央给福州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写信，要求他们利用有利时机，发展统一战线，扩大革命力量；并批评了把十九路军及酝酿中的福建人民政府，与南京反动政府相提并论的错误。可是，当共产国际提出要揭露蒋光鼐、蔡廷锴的反动本质，揭穿其他反蒋派别的真实作用，号召十九路军士兵哗变到红军方面来后，中共中央又回到关门主义的道路上来。他们下达文件，发表社论，攻击福建事变及其发动者，把福建人民政府看成同南京政府一样，都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闽变是“反革命”，“比蒋介石还坏”，是“一切在野的反革命改良主义派别的总和”。这使中共失去了一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自身影响的有利时机。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并经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1700多著名人士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虽仍有“左”倾色彩，但在统一战线思想上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它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提出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是“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联合国内外一切反日力量；纲领号召“立刻停止一切内战”，全国“一切陆海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主张全国工农兵学商大联合，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

红军长征前夕，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围剿”，周恩来和朱德派代表与陈济棠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上层统一战线”活动。陈当时是国民党广州绥靖主任、第八路总指挥、进攻中央苏区的南路总指挥。他与蒋介石历来矛盾很深，担心蒋“围剿”红军得手后会危及他的广东地盘。所以他对红军实行“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方针。他先派代表到瑞金谈判共同反蒋问题，周恩来、朱德又派潘汉年、何长工到陈军驻地继续会谈。经过三昼夜谈判，双方达成就地停火、互通情报、互相通商、支援红军军火、必要时互相借道的协议。这次“上层统一战线”的成功，对后来中央红军比较顺利地突破长征中的第一、二道封锁线起了积极作用。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后来确定党的政治路线、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定，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七大 ”在莫斯科举行。鉴于当时德、日等国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大会制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会议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政策，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并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八一宣言》完全抛弃了只要“下层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建立包括上、下层都在内的统一战线；它抛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响亮地提出了“抗日救国”口号；它还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及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等等。《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方针开始了新的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已基本形成。

同年10月的《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比《八一宣言》又前进了一大步。这个文件对华北事变后国内的政治形势、阶级关系的变化、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党的策略方针以及统一战线的具体对象、工作方法和领导权等，都做了正确的分析和论述。《指示信》为两个月后形成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提出了基本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形成中的一个里程碑。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在这里的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国革命进入新时期。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奉命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侵入华北，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惟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决议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议对统一战线的参加者、组织形式、领导权等问题作了阐述。决议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同时告诫全党要警惕右倾机会主义复活。会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特别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其历史表现，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分裂的客观必然性，作了深刻分析，有力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瓦窑堡会议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但这个决议仍把蒋介石排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此时中共的口号是“反蒋抗日”；直到1936年8、9月间，由“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即“联蒋抗日”，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获得进一步完善。

中国共产党抛弃“左”倾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这对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发动西安事变，特别是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二 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

1 张、杨在西北“剿共”接连失利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都是被蒋介石派往西北前线指挥“剿共”的国民党将领。作为蒋的部下，他们之所以对蒋发动“兵谏”，是因为深重的国难和“剿共”的失利促使他们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他们毅然抛弃“随蒋剿共”道路，决心走“联共抗日”道路。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子。1928年张作霖由北京退往沈阳途中，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子承父业，成为30万奉军的统帅。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奉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张学良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东北军不仅人数多，而且武器精良，是当时国民党新军阀中实力最强的非嫡系部队。1930年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与汪精卫联合反蒋，蒋的统治岌岌可危。在此关键时刻，张学良站到蒋介石一边，率东北军入关“调停”，帮助蒋介石击败反蒋派，南京政权转危为安。由于张学良助蒋有功，受到蒋的器重，被任命为陆海军副总司令，其势力由东北扩展到华北。

“九一八”时，张学良遵循南京以往的对日政策，实行了不抵抗政策，幻想依靠“国联”干涉，逼日本退兵。几十万东北军几乎没放一枪一炮就撤退到关内，使日本侵略者一夜之间占领沈阳，不到3个月侵吞东三省。因失土有责，张学良受到国人谴责，被讥为“不抵抗将军”。1932年8月，张学良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负责华北防务。1933年初，日军侵犯热河。受张节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城逃跑，日军兵不血刃地进占承德，并长驱直入进抵长城线上。热河失守，全国大哗，张学良成为众矢之的，再次受到国人抨击。蒋介石则推卸罪责，乘机逼张学良下野。3月9日他在保定召见张时说：现在我们好像坐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只小船上，我们二人坐着就要沉下去，应该有一人先跳下去。张说他先跳下去。于是，张辞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职务，4月10日乘船赴欧洲考察。

张学良游历欧洲8个月，1934年1月回到国内，2月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一年后改为武昌行营主任），代理总司令蒋介石驻节武汉，指挥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张学良在鄂豫皖所统辖的部队，除南下的东北军外，还有部分杂牌军和中央军，共约20万人。由于在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已转移川陕，此时他“围剿”的主要对象是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应该说，这时的张学良对“剿共”积极卖力，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

蒋介石为集中兵力“围剿”经过长征刚刚到达陕甘的红军，1935年秋派张学良率东北军前往西北“剿共”。9月中旬，张学良指挥国民党军队分三路进攻陕北红军，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在保安、安塞地区，彻底摧毁陕甘根据地。其部署是：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为中路，由洛川一带向北进攻肤施（延安）；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为右路，由韩城、澄城向北进攻；位于陇东庆阳、西峰镇一带的东北军董英斌、何柱国部为左路，由西向东进击。9月15日，王以哲率军部及两个师进驻延安，红军一部包围甘泉，主力则隐蔽集结在甘泉以下的劳山地区。10月1日，东北军第一一〇师由延安南援甘泉，在劳山地区遭红军伏击，经6小时激战，被歼灭两个团（缺5个连）及师部，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洲等被击毙。

劳山战役结束后，张学良奉命结束武昌行营主任职务，10月2日被正式任命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第二天，张在西安就职。西北“剿总”统辖的军队，有张学良的东北军约16万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约3万人，宁夏马鸿逵部约2万人，青海马步芳部约1万余人。驻甘肃的中央军胡宗南部归蒋介石直接指挥。东北军是西北“剿总”所辖部队的主力，也是张学良能够真正指挥的部队。此时，东北军除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和1个骑兵师仍驻保定，炮六、八旅分驻洛阳、海州和武昌外，其他均已调到陕甘。

张学良率部进驻陕甘初期，无视红军力量。他认为陕北红军为数不过几千人，又经过万里跋涉已是疲惫之师，用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剿灭”干净。他指挥东北军会同陕、甘、宁、晋、绥5省地方军阀武装对陕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10月25日，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在鄜县榆林桥与红十军团作战，经5小时战斗，东北军死伤300余人，被俘1800余名，团长高福源也成了红军的俘虏。

如果说东北军第一一〇师在劳山遭伏击被歼灭是个偶然事件，没引起张学良足够注意的话，那么，第一〇七师在榆林桥的惨败则深深触动了他。这时，他要去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行前，他特意飞到庆阳当面嘱咐董英斌：因形势有变，部队何时行动，要听他的命令。

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师。西北“剿总”利用红军立足未稳之机，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采取从陕北和陇东东西对进的办法夹击红军，妄图将红军“围歼”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红军决定集中兵力，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由葫芦河东进之敌一两个师。11月20日，东北军先头部队第一〇九师进到直罗镇。红军当晚将其包围，次日拂晓发起猛攻，歼其大部。红军一部围困第一〇九师残部，主力则迎击由黑水寺前来之援敌，在张家港地区歼其一个团。第一〇九师残部待援无望，23日晚向西突围，被红军全歼。此役，东北军被歼一个师又一个团，3000人当了红军的俘虏。

东北军到西北“剿共”接连失利，在短短两三个月时间，被消灭近三个师。特别是被全歼的第一〇九师和第一一〇师，是张学良的精锐部队。如此惨重的损兵折将，在东北军历史上是空前的。还应指出，东北军成团成师建制部队损失后，非但得不到及时补充，反而被南京取消番号，扣发军饷。这些严酷的事实使张学良感到，再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十几万东北军有被彻底吃掉的危险。对张学良来说，东北军不啻是他的命根子。失掉东北军，他将失掉一切。为其自身和东北军前途着想，他不得不考虑改弦更张，另谋出路。

张学良是一位爱国将军。他与日本侵略者既有杀父之仇，又有毁乡之恨，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广大官兵背井离乡，流落关内，根本不愿打内战，一心想打回老家去。这种强烈的爱国思乡情绪，不能不感染张学良。

上述一切，就是张学良放弃“随蒋剿共”道路的主观原因。

杨虎城摆脱“随蒋剿共”道路也有其历史原因。

杨虎城1893年出生在陕西蒲城一个农民家庭，依靠务农的父亲维持全家生活。杨15岁时，其父亲被清政府杀害，他愤而当了刀客，在本村组织一个带有劫富济贫性质的组织中秋会。辛亥革命时，杨率部参加陕西起义军，1913年退伍还乡，继续参加并主持中秋会活动。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杨在陕西革命党人策动下，在陕东朝邑、华县、华阴一带袭击袁军。1916年，杨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七混成团第一营，杨任营长，驻大荔县。1917年，杨率部加入于右任发起的靖国军，参加护法战争。靖国军1922年失败，杨率部退往陕北，依附于井岳秀。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组织国民军。杨虎城率部响应，以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名义挥师南下，在渭北地区与北洋势力作战，接连获胜。杨部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任师长。1926年，杨率5000人坚守西安，在弹尽粮绝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与10倍以上的敌军苦战8个月，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率部南下，始解其围。1927年初，杨虎城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5月，杨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作战。在陇海路东段归德、徐州间与直鲁联军作战，因力量悬殊，部队伤亡过半，遂退往皖北休整。

1928年4月，杨虎城为避开蒋冯矛盾，以考察为名离开部队，东渡日本。此后，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杨成为蒋冯争夺的对象。1928年11月，杨虎城回国，不久叛冯附蒋，他的部队被蒋改编为新编第十四师，南京每月拨军费约10万元。杨部由胶东移驻河南南阳，杨兼任南阳守备司令。

1929年12月，国民党新军阀唐生智联合阎锡山、冯玉祥起兵反蒋。杨虎城率部进攻唐军驻地驻马店，唐军溃败。为此，杨受到蒋的嘉奖，他的第十四师被改编为第十七师。不久，杨升任第七军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1930年5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反蒋，中原大战爆发。杨虎城站在蒋一边，率部挺进豫西，追击冯军，同年11月攻占西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安。由于杨在两次新军阀混战中助蒋有功，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为控制西北陕、甘、宁、青等省军务，1931年春设立潼关行营，先以顾祝同为主任，同年秋顾被调往河北平定石友三叛乱，蒋把潼关行营主任职务交杨虎城代理，并允将行营迁往西安。1932年2月，潼关行营改为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任主任。杨成了西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首领，又乘机收编了甘、青等省内一些杂牌军队，其势力进一步扩大。

本来，杨虎城由豫入陕并在西北扩张势力，是蒋介石批准的；可是，作为非蒋嫡系杨虎城势力的扩张，又是蒋所不愿见到的。蒋便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杨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杨、蒋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杨入陕时，所部有三个正规师和一些直属部队。不久，蒋撤销其第五十八师（师长马青苑）番号，将该师改为地方部队——陕西警备师，驻防甘肃天水。1932年9月，蒋派人策动马青苑叛杨，马遂投入蒋的怀抱。1934年9月，蒋又把杨部第十七师的第四十九旅改编为新编第五师，移防河南，脱离杨的系统，划归刘峙节制。1931年11月，盘踞甘肃、青海的雷中田拥戴失意军阀吴佩孚举行叛变，策动川晋地方势力进攻陕西。经蒋介石批准，杨虎城派孙蔚如率师入甘，打败雷中田，1931年12月占领兰州。杨囊括了陕甘两省地盘。杨几次请求南京任命孙蔚如为甘肃省主席，均未获准，蒋仅委任孙为甘肃宣慰使。1932年4月，蒋派邵力子出任甘肃省主席。不久，迫使孙蔚如率兵退出甘肃，前往陕南。1933年蒋又免去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由邵力子接任。蒋还派其嫡系胡宗南率中央军进驻陇东天水一带，从侧翼监视杨的活动。

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地区长征到达陕南后，杨虎城在蒋介石命令下，曾两次对红二十五军进行“围剿”，都遭到失败。在这两次“围剿”中，杨多年苦心经营的直属部队，几乎全被红军消灭，这对杨不能不是一个沉重打击，迫使他思考今后的出路。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中共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

张学良背弃“随蒋剿共”政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除其自身条件外，还与中共对他的争取帮助分不开。

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瓦窑堡会议前，把张学良与蒋介石相提并论，把他们都看成是卖国贼头子而加以反对，《八一宣言》就是如此；瓦窑堡会议改变了这种看法，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会议决议在讲到“卖国贼头子”时只列了蒋介石的名字。在会后的一年时间里，中共中央事实上把争取东北军摆在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首要位置。

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从争取高福源取得突破。在榆林桥战斗中被俘的高福源，是东北军第一一〇师六一九团团长。他曾在北京的大学读书，毕业于东北讲武堂，一度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归国后当过张学良的卫队长，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深得张学良的信任。他由于受蒋介石谎言欺骗，被俘后不相信红军会优待俘虏。经过学习和实际考察，他改变了看法，相信红军不但不杀害、虐待俘虏，而且是一支真心要抗日的军队。

1935年12月，红一军团围攻甘泉，久攻不下。守军是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彭德怀把被扣押在瓦窑堡的高福源接到前线司令部，多次找他谈话，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对高提出的疑问，给以圆满解答。经过帮助，高福源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对红军心悦诚服，表示愿去甘泉说服东北军守军总指挥、第一〇七师参谋长刘翰东改变敌视红军的态度。彭德怀慨然允诺。到甘泉后，高福源向刘翰东介绍了自己在红军中的见闻，说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向刘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强调东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出路。高此行了解到甘泉城内东北军缺吃少烧，生活很苦。彭德怀得知这些情况后，派人携带猪牛羊肉和柴米送给驻守甘泉的东北军，并进一步向刘翰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解答了刘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使红军与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的关系前进了一步。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936年1月，高向彭德怀表示愿为红军与东北军谈判联合抗日而奔走。他说，东北军不仅下层官兵，就是张学良、王以哲也有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如果张、王能了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可以和红军合作抗日的。彭德怀答复说：“我们相信你！”高接着问：“你们真的相信我，敢放我回去吗？”彭肯定地回答：“军中无戏言，一言为定。”高坚定地表示：“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一定不虚此行。”彭则表示：“我们希望你能完成任务。”

高福源与彭德怀谈话后的第二天清晨就启程赴洛川。彭德怀派骑兵护送他到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防线边，并赠送路费200元。

高在洛川先见到王以哲，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和自己在苏区的见闻。王以哲此时正奉张学良命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于是急电张学良。张学良原以为高福源被俘后早已被杀，收到王以哲电报后立即赶到洛川。为了考验高的胆识，看他是否靠得住，见面时张给他一个下马威，声严色厉地对高说：“你好大胆，你当了俘虏还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高说你处死我很容易，可是你别忘了日本强占了东三省，炸死了先大元帅。高接着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将自己在红军中的感受和盘托出，恳求张放弃反共，与红军联合抗日。思想已开始发生变化、正在多方寻找共产党关系的张学良，听完高的肺腑之言，向高明确表示：你谈得很好，我同意你的意见。你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和他们正式进行商谈。

1月16日，高福源从洛川乘坐运送给养的飞机到甘泉，骑马回到红一军团政治部，政治部主任周桓热情接待了他。高对周说：“我这次是奉命而来，张学良要面见你们的代表，共商抗日大计。他在洛川等候。”

彭德怀接到周桓电话，立刻将高报告的情况电告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请示可否派人去洛川与张学良会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刚刚闭幕不久，正准备红军东征，不论从团结抗日的大局还是从主力红军东征后陕甘根据地的安全考虑，中共中央都极愿同东北军谈判，实现停战，结成统一战线。收到彭

德怀电报后，毛泽东当即电复，同意派代表去与东北军会谈，并提出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条件：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目前各守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协商停战办法；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征求张、王意见；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的抗日讨蒋的最低限度步骤；立即交换密码等。关于去洛川同张、王谈判的代表人选，彭德怀与毛泽东往来电报酝酿，周桓建议彭德怀派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为代表去洛川。此建议获得中央批准。

李克农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即刻启程赶赴洛川，17日晚与王以哲初次会谈。18日，李克农将这次会谈情况电告毛泽东、彭德怀：“昨晚和王谈颇洽，内容不多但意较诚，张副司令已电复明后日亲到洛川晤谈。”

毛泽东1月20日18时急电彭德怀转李克农，再次指示与张学良谈判方针：（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红军愿与东北军联合的诚意，务使进行的交涉克抵于成；（乙）向彼方提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是很危险的；（丙）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领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丁）克农继续担任中共代表，常驻洛川，并征求彼方同意，准备三天内回甘泉一行，再返洛川；（戊）要求彼方代表来瓦窑堡。

就在这天晚间，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举行了历时3个小时的会谈。张学良说，国民党方面同情国防政府的不乏其人，如红军真有诚意，他本人回西安后去甘肃、南京，会晤于学忠、蒋介石，劝蒋放弃一党专政。如有成绩，两周后在延安或洛川与彭德怀见面。他还表示，由于东北军所处环境，为秘密起见，目前采取消极态度。东北军与红军双方就原境划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

中共中央在得知张学良的政治态度后，1月25日发表《红军愿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针对张学良反日不反蒋的态度，着力揭露了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对东北军歧视压迫等罪行，明确指出：打红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军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绝路；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毛泽东等还郑重表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先锋。”并建议东北军派代表到苏区考察，商谈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

经过第一次洛川会谈，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都有意进一步接触。2月中旬，高福源致电彭德怀，说张学良希望李克农再来洛川面商大计。2月1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学良、王以哲，表示同意派李克农再去洛川谈判。

2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与张学良举行第二次洛川会谈向李克农发出“训令”，指示李克农在会谈中实行下述策略：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反对蒋介石召集任何违反民意、欺骗民众、丧权辱国的会议；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训令”同时指出：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的订立。“训令”还提出在谈判中应向张提出停止内战、不阻拦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的要求。总之，在谈判中要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第二次洛川之行，除李克农外，还有钱之光、戴镜元等。他们在高福源陪同下，2月21日由瓦窑堡出发，途经甘泉等地，25日到达洛川，受到王以哲和第六十七军参谋长赵镇藩的热情欢迎与款待。王以哲对李克农等采取严密保护措施，并用密电告知在西安的张学良。张由于26日要去南京，电嘱王以哲要妥为招待，并可先商谈些具体问题，重要问题留待他回来后再说。在张滞留南京期间，从2月26日至28日，李克农同王以哲、赵镇藩就红军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之间合作抗日的有关问题进行磋商，达成四条口头协议：红军与第六十七军为共同抗日，实行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原则；红军同意恢复第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通商；驻延安、甘泉的第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草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可通知

当地苏区政府发动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恢复红、白通商，红军采购货物经过洛川、鄜县等地，第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第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为暂时掩人耳目计，红军去白区办货者可着便衣。

2月28日上午8时，李克农将他与王以哲等会谈情况及达成的口头协议电报中共中央，当晚收到中央来电，表示同意会谈结果与协定。双方商定，协定从3月5日起生效。协定生效后，中共中央又同意王以哲派兵去甘泉县城换防，通知红军各部队“不得对王部攻击”。王以哲也派人掩护红军采购人员两次去西安办货，并搜集北平、上海、天津、南京、西安等大城市出版报刊送给红军，还向红军赠送了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省军用地图。

洛川会谈期间，红军渡河东征。3月3日，毛泽东、彭德怀在晋西前线将红军入晋后取得的胜利电告在洛川的李克农，嘱其转告张学良和王以哲。东征的节节胜利，使红军声名大振，这有助于李克农与张学良的会谈。

张学良3月3日从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便亲自驾机到洛川。王以哲、赵镇藩向他汇报前几天同李克农会谈的情况和达成的口头协定，张表示完全同意，并风趣地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李克农握住张的手说：“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气氛融洽，风趣盎然。正式会谈从下午3时开始，围绕张学良提出的几个问题展开。

第一，对待蒋介石的态度问题。双方对这个问题争论激烈。李克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中央2月20日“训令”，强调指出：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专打内战，不抗日。“九一八”以来，他不仅把东三省拱手送给日本，华北也危在旦夕。蒋还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包括他。张学良不同意中共的看法。他认为，要抗日，不争取蒋介石参加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蒋掌握着国家政权、军权、财权，实力雄厚。蒋本人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只是主张先“安内”而后再“攘外”。李与张就这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谁也没有说服谁。李后来向张表示：你的意见，我可以向党中央反映。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第二，对抗日战争的看法问题。李克农着重说明，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战胜的。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持久的，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抗敌，最后胜利肯定属于我们。张学良同意李的这些看法。

第三，关于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张学良提出，红军东征为抗日就不应走山西，而应该走宁夏、绥远。他认为，宁夏靠近绥远前线，又接近苏联，阻力小，进展会比较容易；去山西，一定会遇到阎锡山、蒋介石的阻遏，恐难顺利进行。李克农说红军东征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出山西去河北政治上影响大，有利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张学良提出的红军去宁夏问题，李没作更多表示。

此外，双方还商谈了派代表去苏联的问题。

李克农与张学良这次洛川会谈，达成三项口头协议：为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请中共方面派一名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与他会谈，地点定在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确定；中共派一名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以灰色保护，以利开展工作；红军派代表去苏联，可经过新疆，由张学良负责与盛世才联系。

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有了一些了解，促使他在联共抗日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通过会谈，中共和张学良彼此增进了了解，为不久举行的周恩来、张学良延安会谈铺平了道路。

张学良由洛川返回西安后，收到李杜从上海来的电报。原来张1935年11月去上海时曾委托他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李杜来电说“寻找的朋友找到了”。张学良便派专人去上海，接来的客人是刘鼎。刘鼎，原名阙尊民，四川南溪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留学德国期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转为共产党员。回国后曾在赣浙皖苏区任政治部组织部长。1935年5月被俘，10月从九江俘虏营逃往上海，住在英籍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家中养病，曾到宋庆龄家里躲避过3天。被宋庆龄派往陕

北苏区送信的董健吾，回到上海向宋复命，宋对董说，张学良想与共产党联系，艾黎家中就住着一位共产党员。董找到刘，其实他俩早就认识，曾一起在中共中央军委保卫局工作过。董向刘介绍了张学良想放弃内战、联共抗日的情况，希望刘去西安做张学良的工作，并说到西安后可以去陕北，不久前他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人护送的。急欲寻找党组织的刘鼎，经认真考虑后决定去西安。

刘鼎到西安第二天，在张公馆见到张学良。他感谢张派人接他来西安，并表示他将去陕北，张有什么意见他将如实向中共中央报告。张板着面孔，严肃地对刘鼎说："刘先生，你是共产党的代表，我有几件事想请教。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乡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可是你们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东北军遭受了严重损失。"刘鼎经过准备，第二天与张再次见面，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刘说："第一，张将军身为东北边防军司令，率领几十万东北军坐镇东北，守土有责。九一八事变猝起，张将军执行不抵抗政策，一夜之间，沈阳失陷，不到四个月，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东三省。这当然遭到全国人民唾骂。中国共产党同全国人民态度一样，不能不表示态度。第二，东北当局受蒋、日调唆，首先挑衅，撕毁中东路共管协定，侵入苏联领土，苏联被迫还击，这是正当的自卫。东北当局允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扩张势力，而对有条约的中东路的管理采取片面行动，事实上是亲日反苏，苏联对张将军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第三，东北军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已是蒋介石的'剿共'大军，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受了很大损失。在陕北，红军为了自卫，实行反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这与苏区及红军的损失相比，算得了厉害？！"他接着说："红军是有人民支持的不可战胜的新式军队，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对红军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计，同时，借此消灭东北军。共产党、红军和蒋介石打了十来年交道，深知他剪除异己的一套阴谋手段。究竟是红军对东北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对东北军'厉害'，值得考虑。"刘鼎又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形势，将军当有深切的体会。当今之计，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你和东北军最大最适合的愿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以摆脱蒋介石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消灭异己的阴谋，也可以一洗‘不抵抗’的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垂史册，并占首页。”

刘鼎讲完后，以为张会发脾气。结果，他的一席话，折服了张学良。张沉思片刻后安详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你就是我的朋友，住在我这里，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刘说：“既然张将军赞同我的看法，可否日内送我去陕北？”张微笑着说：过两天一道去，先在洛川住几天。当天，张偕刘一起飞往洛川。

张学良这次到洛川，名为督师“剿共”，实际是等待与周恩来会谈，同时与刘鼎深谈。他和刘在洛川住了十来天，每天从早谈到晚。张学良把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并邀请周恩来到延安会见的事告诉了刘鼎，并说准备同刘一起去见周恩来。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会谈4月9日在延安举行。3月初，李克农与张学良第二次洛川会谈后，径赴晋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汇报会谈情况及张学良邀请毛、周举行延安会谈等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接受张的邀请，派周恩来与其会面。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告知中共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到达延安的时间，请其保证安全，并对双方会谈内容提出如下建议：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军侵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其政纲；联合苏联及派代表去莫斯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

周、张会谈4月9日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内进行，从晚9时开始至翌日晨4时结束。参加者共五人：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周恩来、李克农。

这次会谈内容，根据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和刘鼎事后的回忆，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张表示，他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中共《八一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研究后

愿提出意见。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路”。张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但是他说，他在未公开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的命令，进驻苏区。对中共提出的“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他完全同意”。但他认为，阎锡山的防卫力量很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他的意见是红军“最好出绥远，解决德王”，再东向察哈尔，那里背靠外蒙，便于接受苏联援助。这个问题，他在洛川向李克农讲过，后来也向刘鼎谈过，这次又向周恩来提出，并详细阐述了理由：绥宁一带人口多，粮食多，可作为红军后方；接近外蒙，便于接受外援；红军让出陕北一些县城，他好向蒋介石交账；红军和日军接火，他即可公开打出抗日旗帜，否则只能悄悄地与红军联合。

周恩来认真听取张的意见，郑重向他表示：你讲的有道理，但是要和毛主席商量，这个问题正在研究中。

当时红军东征进展顺利，所以周恩来对张说：“红军在山西站得住脚，要兵出华北，不仅我们抗日，还要带动群众一起抗日，才有力量。”他还说：“红军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就会推动全国友军和群众。华北大规模的抗日战争一起，红军愿担任左路。”张接着说：“如果红军坚决出山西向东，我可以通知驻河北的万福麟部的四个师和红军联络。”他还说阎锡山太保守，不要逼之太甚。两三星期后，他拟去太原和阎联络。

周恩来说红二、四方面军要北上抗日。张学良说：欢迎在川西一带红军北上入陕，来多少都欢迎。红四方面军北上，驻陕甘的东北军可以让路；红二方面军要经过中央军防地，他可以去斡旋。

第二，抗日救国的道路问题。张学良认为国民党已完了，目下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另一条是法西斯的道路。对此，周恩来回答说：“法西斯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把资产阶级的一点形式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抗日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要发动群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抗日联共。”

张向周表示，他担心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会封锁中国的海岸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线，使中国无法接受外援；也担心日本会在沿海地区建立许多伪政权；他还问，中日战争爆发后，是否会引起日本内部的变化？

针对张的这些疑虑，周恩来说：不抗日则伪政权会愈来愈多。中国地域辽阔，从日本的兵力和国际关系看，日本不可能将中国完全封锁起来；而且中国需要的军事物资，不仅可取之于英美，也可得之于苏联。只要抗日战争能持久，日本国内革命危机就会增长，可能发生哗变。

第三，联蒋抗日问题。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的力量越大越好；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蒋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张说，在国民党要人中，他只佩服蒋介石，蒋有民族情绪，在国民党中领导力最强。据他回国后两年来与蒋的接触与观察，蒋可能抗日。张也承认，蒋的周围有不少亲日派，如汪精卫、政学系、安福系等，因此蒋下不了抗日决心。他还向周恩来介绍了南京方面一些人的政治态度。张认为蒋介石现在是站在歧路上，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个错误政策扭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说，共产党从外面逼，他从里边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张学良表示，蒋介石如投降日本，他将辞职另干，否则他不能反蒋。

对张学良提出的联蒋问题，周恩来说，中共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敌，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镇压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现在我们愿听你的意见。当张讲完上述意见后，周恩来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回去报告中央，待认真考虑后再作答复。

第四，联苏问题。张希望在抗日战争中得到苏联帮助，他判断苏联也会援助中国。他问周恩来：“苏联是否真心援助中国？”周恩来回答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国是真心诚意。它这么做，既利己又利中国。帝国主义只求利己。”双方商定，共同派代表去莫斯科，谋求援助。

第五，停战、通商、合作等问题。张学良表示“不愿打红军”，但蒋介石“有电斥责他”，说他对红军东征是“隔岸观火”，命令东北军“由延安打通清涧、绥德，杨虎城由宜川出延长”，建筑碉垒线。周、张商量

后决定：红军在关中积极活动，在韩城、澄县牵制杨部，并派人赴陕南（由杨设法送去），令陈先瑞率红军在蓝田、鄠县一带活动，威胁西安，以便东北军借口不北进。“如此推延一月后，看情势变化，再定以后行动”。

关于经济通商，双方商定：红军购买普通货物，可在东北军防地设店自购；红军所需无线电通讯器材、医疗器械、药品，由东北军代购；东北军向红军赠送一些弹药。至于交通，双方互派得力便衣侦察人员，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交通畅通。

张学良要求红军派出“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作为代表，常驻西安，以便联络。

张学良对会谈结果很满意。会谈结束时，他向周恩来赠送了一本《申报》60周年纪念印制的“中国大地图”，说：“共同保卫中国！”另赠私款2万银元，后又送法币20万元，作为红军的抗日经费。

刘鼎在延安会谈后随周恩来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汇报东北军及他与张学良谈话情况，后被中央任命为中共正式代表，常驻西安，继续与张谈判，并帮助张做抗日准备。

中共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除由中共中央直接出面做张学良、王以哲的“上层”工作外，还大力从事“下层”工作，争取广大的东北军官兵。

为加强对东北军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兼任书记，委员有叶剑英、边章伍、朱理治（兼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曾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委员会的工作。6月20日，发表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鉴于“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军队”，文件规定，中共对东北军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为此确定：“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纲领，而是要使东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既然“是在争取整个东北军”，那么“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并“互相配合”，这样“一定能使东北军在政治上坚强起来，加速争取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的过程”。

在中共中央上述方针指引下，对东北军的下层统一战线工作获得进一步开展。与东北军接近的前沿苏区各县都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争取附近的东北军部队。刚刚结束东征返回陕北不久的叶剑英，7月从中央军委总部调到安塞，负责领导东线（陕北）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他到任不久，就主持召集安塞、延安两县有关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落实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帮助这两个县设立机构，明确任务。在西线的陇东曲子镇，有张浩、张策等负责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在豫旺堡、固原，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等人，主持对东北军开展工作。

叶剑英、朱理治对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师长刘翰东做了大量争取工作。第一〇七师由于丢失枪支无法交代和补充，8月19日刘翰东由青化砭到延安，找当时在该师做统战工作的红军代表吕继才，请求第二天叶剑英与他见面。20日，叶剑英、边章伍与刘会面，给他带去4支步枪。刘十分感激。22日，刘派副官给红军送去15000发子弹，叶剑英带人到离延安20里的何家坪接收，并回赠几挺轻机枪。刘翰东很感激红军，允许红军代表刘仲明常驻该师六一二团做统战工作。

为争取东北军官兵抗日，红军人民剧社到安塞与东北军六八四团阵地接近的防地演出20多天，吸引了许多东北军官兵前来观看。该团团副亦来观看演出。人民剧社除演出文艺节目外，还向东北军官兵散发《打回老家去》等宣传品，在东北军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1936年夏秋之际，在西线的固原、豫旺堡的清水河一线，红一方面军与东北军第一〇五师、骑兵第六师对峙。红军在阵地上发起政治攻势，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是东北军的朋友”、“红军与东北军联合起来，打回老家去”等口号，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的心。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曾与骑六师参谋长兼十七团团长汪瑢会谈，就停战事宜协商后，双方友好相处。

在争取、团结东北军共同抗日的工作中，东北军中的地下党组织——以刘澜波为书记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刘澜波，1932年就被派到东北军工作。1935年末到1936年初，苗勃然、宋黎、孙达生等一批共产党员陆续从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来到东北军。他们又先后发展了解方、贾陶、王再天、栗又文等人入党。1936年4月，经中共北方局批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刘澜波任书记，苗勃然任组织部长，宋黎任宣传部长。东工委建立初期，由中共北方局领导；到1936年7、8月间，东工委改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共中央特派员朱理治来到西安，直接领导东工委工作。

东工委建立后，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收到显著效果。除黄显声、刘多荃等人外，他们还和爱国将领王以哲、董英斌、赵国屏，团长吕正操、万毅、陈大章、康博缨、高福源以及爱国民主人士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杜斌丞、杨明轩、韩卓如、卢廼庚（广绩）等建立密切关系，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主张，在东北军内部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少东北军军官在东工委的教育和帮助下提高了联共抗日的觉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6年夏，师长黄显声，团长陈大章、吕正操、万毅等接受中共党组织的建议和帮助，从北平招收了一批经过“一二·九运动”锻炼的进步学生，充实他们的部队，一些共产党员此时进入东北军，先后建立了地下党组织，这对争取、团结东北军共同抗日起了重要作用。

7月初，张学良一度思想波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东北军内一些人对联共抗日顾虑重重，使张对联蒋抗日方针产生动摇，他想脱离南京，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一起干。张学良在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前向刘鼎讲了上述想法和考虑，请刘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并将中共方面的意见及时告诉他。刘鼎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在安塞见面。中共中央收到刘鼎电报，以为张学良有什么大的举动，于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和李克农等到安塞等候。刘鼎到后，向中央汇报了张学良的上述想法和东北军的近况。会议进行了一夜，最后毛泽东讲话。他勉励刘鼎放手大胆地工作，争取张学良。毛泽东认为，东北军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和中共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的大力争取，完全有可能从“剿共”的工具变成抗日的军队。他说，党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因此，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把队伍拉出来和红军一起干。因为拉出一部分，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力量。毛泽东嘱咐刘鼎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要扎实工作，多团结一些人，把全部东北军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刘鼎返回西安后，向张学良介绍了安塞会议情况，说：“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到了，研究了一夜，高度评价你抗日的决心和热情，但是目前你的想法时机还不成熟，要你团结全体东北军，耐心争取蒋介石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张学良表示接受中共的建议，并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张还说：“你们党中央既然要我这么办，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

8月以后，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去西安与张学良会谈多次，商谈双方准备共同抗日的有关事宜。10月初，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被派往西安，与张学良会谈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抗日事宜，并代表中共中央与各方面秘密接触，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

“三位一体”当时是指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面联合抗日的政治局面。

1936年上半年，红军分别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结束了敌对状态，开始成为共同抗日的友军。这种状况，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张学良率部进驻陕甘初期，与杨虎城关系并不融洽，相互间有些误解和隔阂。张来西北前，杨作为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是西北地方实力派的首领，而且他还有染指整个西北当“西北王”的思想。张来西安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杨在军事上要受张节制，已不可能再扩大地盘，当“西北王”的思想遂成泡影。张到西北，本是奉命“剿共”，可有人担心他是乘机抢夺地盘，当时西安有东北军“失之东北，收之西北”的传言，长期控制陕西的杨虎城对此不能不存有戒心。在西安的蒋系特务有意在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制造矛盾，不断散布谣言，今天说东北军要解决十七路军，明天又说十七路军要驱逐东北军。事实上当时东北军的人数是十七路军的几倍，武器也精良，十七路军中有人确实担心东北军将对十七路军采取不利行动，并常向杨虎城报告这类情况。两军间也存在一些问题。东北军入陕，大批家属随来，为争住房与十七路军时起冲突；两军少数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为看戏占座位而在街上争路，经常打架，甚至互相开枪。至于张、杨各自暗中联络共产党，与红军秘密签订停战协议，更是守口如瓶，害怕泄密。

在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已分别达成默契的情况下，消除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误会和隔阂，增进这两支部队间的了解和团结，已成为形成西北地区“三位一体”、联合抗日局面的关键。

由于张、杨都有抗日要求，且已分别与红军达成停战协议，因此都希望改善两军关系，并都为此做出了积极努力。杨虎城于1936年2月在西安绥靖公署内设立交际处，任命申伯纯为处长，规定其主要任务是联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络东北军中上级军官。张学良为缓解两军矛盾，先后派黎天才等向杨虎城说明：东北军西调是奉命“剿共”，绝无争权夺利之意。但两军关系的根本改善，张、杨之间关系的融洽，是高崇民到西安之后促成的。

东北籍爱国民主人士高崇民，1935年夏在上海探望因“新生事件”被关押的杜重远，杜重远和胡愈之（中共党员）都极力促他去西安做张、杨的工作，推动张、杨联共抗日，因高与张学良关系很深。同年11月，高崇民到西安，适值张学良去南京开会，高乃通过杜斌丞转交了杜重远给杨虎城的亲笔信，高和杨由此相识。待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后，高向他陈述了红军不可“剿”亦绝对“剿”不了的道理，并指出蒋介石令东北军“剿共”，是企图使东北军与红军在内战中两败俱伤，蒋好坐收渔人之利。张坦率地把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告诉了高，望他从中调解，以使两军精诚团结，共图大业。高代表张再次见杨，说明张绝无失掉东北而来西北苟安的意图。高披肝沥胆，言谈爽直，使杨大为感动。当天，杨留高午餐，请夫人谢葆贞作陪，边吃边谈，尽欢而散。此后，高崇民留在西安，做促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工作。

经高崇民等人的工作，张学良更注意增进两军团结。他批评主张以陕甘为东北军抗日根据地的人说：咱们东北人流亡也要有骨气，不抢人家饭碗，不占人家地盘，我们要抗日，随时可走，拍拍屁股尘土不沾，怎么能以陕甘为根据地呢？张让在他身边工作的应德田、栗又文、孙达生、孙铭九等多与十七路军人员来往，增进团结。杨虎城也指定其亲信申伯纯、金闽生（十七路军宪兵营长）、王菊人、蒲子政（杨的秘书）负责联络东北军。

经过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双方有关人士的共同努力，两军间的一些误解逐步消除，团结日益增进。到1936年秋，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的“三位一体”局面开始形成，这就为张、杨共同发动西安事变提供了可能。

在“三位一体”局面形成过程中和形成后，张、杨在中共支持和协助下，着手做抗日准备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三位一体”的局面。

张、杨为培养干部，以适应联共抗日需要，在西安南郊王曲镇，联

合创办军官训练团，训练连长以上、团长以下干部。张学良任训练团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王以哲任教育长（后由黄显声接任）。王曲军官训练团1936年6月15日正式开学，同年10月底被蒋介石勒令停办，中间办了4期，每期一个月。张学良接受刘鼎建议，训练团实行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训练方针。政治方面，学习什么是帝国主义，外国和中国的革命经验，其中包括辛亥革命、黄埔军校和红军各方面的经验；军事方面，着重学习部队管理，官兵平等，严格纪律以及游击战术。

张学良很重视这个训练团。开学不久，他就搬到离王曲镇不远的太师洞住，和学员们一起生活，有时一起讨论问题，听取汇报。6月22日，他给第一期学员作了题为《中国的出路惟有抗日》的讲演，深刻剖析了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不指名地批判了蒋介石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和委曲求全的方针；明确表示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面前，“除了抗日之外，实在没有其他路子可走”。讲到这里，他检讨说：“九一八”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求事态不扩大。现在明白了，对日没有委曲求全之道。张学良坚定地表示：“今后我们对日惟有抗战，决不再蹈前此覆辙！”“我们宁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张语重心长地对学员说：“抗日是东北军的最大使命”，因为“东北是日本从我们手里用武力夺去的”，现在“要用我们的力量夺取回来！”他号召“东北军要站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誓死收复失地。他满怀深情地对其部属们说：“你们认为我走的路对，请你们坚决地随我来！你们发觉我的决心动摇，请你们把我打死！假如我中途被敌人致死，请你们还要坚决地继续我的遗志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给这个训练团以积极支持。除对办团方针提供意见外，东工委还派刘澜波、贾陶、栗又文、解方等参加训练团，通过讲课、交朋友和座谈讨论等方式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解释联共抗日的道理。

王曲军官训练团达到了预期目的。学员通过学习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加深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了解了张、杨的抗日立场和决心，从而思想更加活跃，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的要求更加强烈。

1936年9月初，张学良在东北军建立了抗日同志会。其宗旨是团结抗日力量，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作。这个组织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于7月筹建时，人员很少，除张学良本人外，还有他联共抗日的得力助手、东北军少壮派著名人物应德田、孙铭九。9月参与创建者有15人，除上述三人外，还有刘澜波、刘鼎、苗渤然、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何镜华、贾陶等。从创建到西安事变爆发，共有70多人参加。

抗日同志会在筹建时决定由张学良任主席，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九任行动部长。9月正式成立时，增选苗剑秋为理论宣传部长。抗日同志会在酝酿筹建时，应德田、孙铭九曾找刘澜波、苗渤然商量。东工委和中共中央特派员朱理治经过研究，决定支持这个组织，规定共产党员加入这个组织要经过东工委批准，先后有11名共产党员成为抗日同志会会员。

1936年9月，张学良接受宋黎、刘澜波建议，创建东北军学兵队，以培养适应联共抗日需要的干部。宋黎建议从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中挑选学员；张学良说最好选家乡子弟，学兵队最好都是东北人。张决定以他的卫队二营名义，在西安东城门楼上筹建学兵队，责成宋黎、应德田、孙铭九负责筹办。

中共北方局对此给予大力支持，派孔祥桢、魏文伯、徐仲航等前来担任教官。苗渤然从西安二中调来共产党员李梦令、张寒辉任学兵队政治教官。北平地方党组织秘密介绍三批抗日积极分子、民先队员和少数共产党员来西安学兵队。其中有共产党员20多名，如赵天野、高翔（郭峰）、任志远、侯晓岚、李震（谢克东）、刘景希（谷牧）、王克奎（乔晓光）、吴山、张勉等。刚成立时，学兵队长康鸿泰、队副于维哲，都是共产党员。

学兵队训练时间是3个月。学习内容以政治教育为主，军事训练为辅。政治教育，除讲授时事形势外，还请人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军事训练，在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基础上，学习游击战术和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学兵队一面学习，一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爆发后，它改名为“东北军政治大队”，学员们被分配到部队中做宣传工作。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三 西安事变的爆发

1 张、杨与蒋矛盾的激化

张、杨趋向联共抗日，与蒋介石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形成尖锐对立，他们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由此引发一系列事件。

《活路》事件　1936年初，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的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如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刘澜波、栗又文、孙达生、申伯纯等时常在一起讨论形势。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议论抗日以及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联合问题，而不谈联共问题；只有在少数可靠朋友间，才谈论只有联共才能有效地发动群众起来抗日，争取苏联实力援助。为向广大东北军官兵进行抗日宣传，他们决定将座谈的一些内容写成文章，并作了如下分工：高崇民写《抗日问答》，约五六千字，回答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栗又文写如何解决抗日经费的文章；孙达生写两篇提纲，一篇讲西北地区的有利形势，另篇谈东北军整顿问题。文稿写成后，他们决定编印成刊物，取名为《活路》，意思是说只有抗日，才是东北军的活路。高崇民曾请张学良看过文稿。张问明了撰稿人，说这些文章不能署名公开发表，可秘密印发，并说印发后他将公开查禁，以应付南京。

在联系印刷时，申伯纯说西安绥靖公署印刷厂，可尽义务，并安全保密。高请申代印2000份。十几天后，申派人送来两大麻袋64开小册子《活路》，大部分发给东北军各部队的熟人，有些则利用张学良的飞机带给前线部队。《活路》散发不久，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张学良在公开会议上大发脾气，严令查禁追究。国民党特务开始认为是西安绥靖公署的郭增恺所写，将郭逮捕送南京审讯了半年，后查清不是郭写的，又释放了他。后发觉撰稿人是高崇民，南京对高发出通缉令，张学良则通知高秘密逃往天津法租界。

“艳晚”事件　1936年8月29日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派特务绑架宋黎，由此引起张学良派兵查抄省党部，这是张、杨与蒋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事件。

宋黎是东北大学学生，北平“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中共地下党员。“一二·九运动”后他应召来西安向张学良报告东大“一二·九运动”情况，之后被留在西安，以东大学生代表身份从事公开的或秘密的抗日活动。他以全国学联代表身份推动西安各校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张学良掩护下，推动东北军走联共抗日道路；在十七路军中也活动频繁。

当时西安的国民党特务很多。宋黎、刘澜波等人的活动早已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监视，怀疑他们是替张学良从事联共抗日活动的共产党人。特务向南京写报告，建议将宋、刘等人逮捕并解往南京审讯。

7、8月间，宋黎发现他已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中。他和另一名东大学生代表马绍周所住的西北饭店，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窗前房后转来转去，有时甚至偷翻他们房间的东西。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张学良有意把宋等送兰州躲避，或通过李杜送他们去东北抗日，宋都婉言谢绝。宋想回北平，说那里有学联组织，同学间可互相保护，比较安全。张学良最后说：“你们哪儿也不用去，就住在西北饭店，反正我还带兵，可以保证你们安全。”为防止意外，宋立即处理掉机密文件，并通知与其有联系的抗日人员暂停来往。

8月29日，申伯纯打电话给宋黎，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要对他们采取行动，请加倍小心谨慎。宋听完电话，马上派马绍周去“西北总部”政训处找熟人弄清情况，以便采取对策。马绍周走出西北饭店即被特务逮捕，解往陕西省国民党党部关押。

正当宋黎和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在屋内谈话时，两名特务闯进屋内，喊：“宋黎！”宋黎机智回答：“不在家，出去了！”特务恶狠狠地盯着宋黎说：“你就是！”说完猛扑过去，把宋黎和东北中学学生代表一起逮捕，架起胳膊拽出房外。特务头目对其部下宣布：“抓到了共产党要犯！谁也不许打电话，不许走漏风声，来一个捕一个！”

宋黎意识到事态严重，为使别人知道他已被捕，避免再进他的房间陷入罗网，便一边挣脱一边高喊：“你们这是干什么？”

此时，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进入西北饭店院内。一个特务说：“这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个老头来了，逮捕他！”抓宋黎的三个特务抽出一人去抓车向忱，剩下的两名特务拖不动宋黎，宋极力反抗，三个特务又一齐抓宋，车向忱趁机脱身。特务将宋拖出西北饭店后门，直奔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一路上，只要遇到树木或电线杆，宋黎便抱着不放。当天是星期六，晚间路上行人较多，宋黎不断高喊：“土匪绑架！”快到省党部时，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迎面而来，宋黎接连大喊“土匪绑架！”五六名巡逻队员下马缴了特务的枪，然后问：“怎么回事，为什么抓人？”特务抢先回答：“我们是省党部的，他是刚捉到的共产党要犯！”宋黎赶紧分辩说：“我不是共产党要犯，他们是土匪绑架。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书。”有些巡逻队员认识宋黎，便机智地向特务要逮捕证，特务说没有逮捕证。巡逻队员质问特务没有逮捕证为什么抓人？特务趾高气扬地说他们是“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产党要犯”，执意要把宋黎送交省党部。宋黎则强调他是张副司令的秘书，要送就送交张副司令或杨主任。最后，巡逻队长接受一名巡逻队员建议，把宋黎和特务都带走，送交十七路军宪兵营。在路经西北饭店时，宋黎要进去给张学良打个电话，巡逻队同意，特务不放心，紧跟在宋身边监视。当时张学良正在开会，接电话的是张的秘书。宋黎对他说：“我被省党部逮捕，现已被十七路军宪兵巡逻队截夺下来，正送往营部途中。”宋请他转告张学良，迅速派人到西北饭店维持秩序，以避免学生驻地发生惊慌。

到宪兵营后，宪兵营一位排长指着宋黎对特务说：“我证明这个人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住在西北饭店，是张副司令请来的。”特务坚持说这个人是共产党要犯，并要动手搜查宋的衣袋。宋黎喊道：“你们是土匪，无权搜查我。你把手伸进我兜里，说是搜查，趁机塞东西栽赃怎么办？”在旁的宪兵营长对特务厉声说：“这是我们宪兵营的地方，你们不能随便搜查！要搜查也得我们搜。”宪兵营的人把宋黎从上到下搜了一遍，翻出来的东西主要是名片，其中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也有一些军长、师长的。然后，把宋黎和特务分别关在两个房间，等候处理。

宪兵营营副谢晋生以特务捕人既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又不与宪兵营联系共同办理为由，严词拒绝交人。特务要求允许他们回省党部取公文再回来提人。为拖延时间设法营救，谢晋生同意特务回去取公文。

待特务刚出门，谢就到宋黎房间，对宋说：“这件事闹得很大，各方正在设法营救。刚才搜出来的东西全放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碍事的就处理掉，特务回来还得要这些东西。”他又说：“你放心，没有我盖章，谁也提不走人，不过还得审讯一下，留个口供。”不一会儿，十七路军军法处处长李木庵（中共党员，西北特支领导成员）来了，他与宋黎很熟，两人一起研究了口供，主要讲宋黎是张学良请来的，一贯奉公守法，不是共产党，宋主张抗日，但抗日无罪……李木庵嘱咐宋黎要记住口供，让宋按了手印，便匆匆走了。过了一会儿，申伯纯给宋黎打来电话说：“你的事张副司令、杨主任都知道了。你在宪兵营很安全，不要急，稍稍委屈一下。”

宋黎被带到宪兵营后，谢晋生为营救宋及时打电话向杨虎城报告，当时杨已入睡，侍从副官不敢惊动；谢便向申伯纯请示，申立刻报告给杨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王立即向杨虎城报告。杨当即给张学良打电话，通报宋黎被特务绑架和被十七路军宪兵巡逻队截夺的情况，请张派人接回宋黎。

张学良得知宋黎被捕，气愤地说：“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一方面派随从参谋孙铭九驱车前往十七路军宪兵营部，接回宋黎；同时派参谋秘书室的关时润去西北饭店宋黎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资料，以免落入特务手中。关一到西北饭店即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送到省党部，与马绍周关押在一起。张学良得知这些情况后，果断采取军事行动。他命令驻守王曲的东北军一个团急行军入城；宣布全城戒严；令晏道刚（蒋介石的亲信、“西北总部”参谋长）到张公馆，防止他采取行动。

张宣布戒严不久，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匆匆来到张公馆。邵刚一迈进客厅，张一反谈笑风生的常态，勃然大怒地质问邵：“省党部逮捕我的学生、秘书和职员，为什么不通过我？我是‘剿匪总部’的副司令代行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即使是抓共产党也应该让我知道！省党部竟如此藐视我，胆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严办！”邵力子从未见张学良发这么大的脾气，对他如此不恭，连声道歉似地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查后马上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报告，事情由我负责。”张说：“那就请你查明，把抓去的人尽快送回来！”

邵力子刚离开张公馆，张学良即命令副官兼第一〇五师副师长谭海率卫队营前去查抄省党部。谭海率队冲入省党部，救出了正在受刑讯的马绍周、关时润，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密码和档案，其中有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300多人名单。

查抄完省党部，邵力子再次来到张公馆向张学良复命。他对张说：“我已向省党部几位常委查明，捕人确有其事，是南京统调室派来的人直接指挥捕的，省党部常委也不清楚。他们捕人是奉总裁的电令，点名逮捕的还有刘澜波、孙万发（孙达生）、栗又文。省党部事先没有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严重错误，现在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如何处理。”张学良让邵力子赶快把原电送来。当他看过邵送来的电报后，和颜悦色地对邵说：“深夜惊动，很对不起，请回休息吧！”

本来，蒋介石批准逮捕宋黎、刘澜波、孙达生、栗又文，并准备把他们解往南京审讯，飞机已停在西安机场。由于宋黎拒捕和张学良派兵查抄省党部，使蒋的计划破产。

这是发生在1936年8月29日晚间的事件，按韵目计算，29日是“艳”字，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艳晚事件”。

蒋介石下令逮捕宋黎等人，其矛头是指向张学良的。对此，张学良是明白的，所以他来了个“先斩后奏”。“艳晚事件”第二天，张学良给蒋介石发去急电，大意是：省党部逮捕马绍周等系“西北总部”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奋，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并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蒋介石的心腹、“西北总部”政训处处长曾扩情30日清晨急忙从西安飞往广州，向蒋报告张派兵查抄省党部事件。蒋介石看了张学良的报告，又听了曾扩情的口头报告，仍觉得心中无数，便从广州给邵力子发

报，询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邵力子回电说：“事情已经结束，张学良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命令。”蒋介石虽然对张学良的这一“不轨行为”恨得咬牙切齿，对张联共抗日活动也早有所闻，但此时他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无暇顾及西北，只得暂时缓和矛盾，把张稳住。他给张回电说：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对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处理。

张学良既已看到蒋介石签发的逮捕令，又收到蒋的上述电报，为应付南京，避免新的麻烦，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将宋黎秘密安置在张公馆东楼，对外宣布宋黎“失踪”；二是主动按蒋介石签发的逮捕令，先后逮捕了刘澜波和孙达生。

刘澜波、孙达生的被逮和获释颇带戏剧性。他俩同住西安新城坊15号。当宋黎在西北饭店被捕及被十七路军巡逻宪兵截夺事件发生后，十七路军方面的金闽生及时告诉了孙达生，并说他们的住处也已引起特务注意，请多加小心。当晚9时，张学良派孙铭九到刘、孙住地，请他们把不方便的东西收拾一下，在住处等候被捕和打官司。他俩在清理和烧毁秘密文件后，商量的结果是：由刘澜波一人去吃官司，因他是正式军人，到最后还有本家兄弟刘多荃、老上司黄显声出面担保；而孙达生没军籍，且刚从上海来，审讯起来嫌疑颇多，对整个案件不利。于是孙连夜到东北军第一〇五师留守处躲避起来。孙走后不久，警察、宪兵、特务及卫队营一起来到新城坊15号，对刘澜波说：副司令让你去受审，并问孙万发（达生）哪里去了？刘澜波说孙整天未归，不知去处。警察没再追问，也没搜查，把刘澜波带到军警宪联合督察处关押起来。

天亮后，孙达生与申伯纯通电话，申告诉他刘澜波昨晚已被捕。不一会，申又给孙打来电话，说杨虎城找孙有事，派车将孙接到新城。杨对孙说：副司令昨晚和他们摊牌了，局势如何发展很难预料；又说孙的处境很危险，希望他搬到新城来，至少半个月内不要露面。孙达生在电话里将自己的新住址告诉了孙铭九。很快，孙铭九带着两部小汽车来到新城，对杨虎城说，副司令请孙达生去。杨征求孙的意见，孙当然得去。车一到金家巷张公馆，孙铭九便把孙达生交给谭海看管起来。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当天下午3时，张学良在卧室会见孙达生，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不是共产党昨晚为什么躲起来？孙答他不是共产党，因为没有军籍，怕审讯起来不好解释，所以才躲避。张说：“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办，没有军籍我给你一个军籍就有了嘛，咱们东北人抗日打回老家去，是天经地义、正大光明的事，不要躲，越躲越有鬼。”张接着问孙：“你敢出去和他们对质吗？”孙答：“我敢！”张让孙达生在法庭慷慨陈词，痛骂他们也可以。孙说：“校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吧！”张学良让谭海把孙达生送到军警宪联合督察处去。

孙达生被送进军警宪联合督察处候审室，刘澜波生气地说：“让你躲起来，躲到这里来了。又白搭了一个。”孙把张、杨的话告诉了刘澜波。十天多后开庭审判，主审官江雄风是复兴社特务处派来的，在西安任“西北总部”办公厅情报科长兼西安公安局督察，刘澜波、孙达生、马绍周先后出庭受审。按张学良嘱咐，刘澜波和孙达生在法庭上大骂国民党不抗日，弄得“中国人抗日救国就是犯罪”。张学良看过他们的供词，称赞他们讲得很得体。江雄风拿不出任何“罪证”，只得将他们交给由东北军掌握的军法处看管所。不久，由黄显声、卢广绩、车向忱等联名具保，刘澜波、孙达生和马绍周先后获释。“艳晚事件”这场政治风波遂告结束。

通过“艳晚事件”，张、杨的关系更加亲密。张对杨的宪兵队主动从国民党特务手中截夺下来他的部属，并通知他派人领回，十分感激，当天亲自登门向杨致谢。与此同时，张、杨同蒋介石的矛盾则进一步加深。张学良对国民党特务藐视他，并悍然逮捕他的部属十分恼火，无比愤慨；蒋介石对张学良查抄省党部，特别是对张、杨“剿共”不力非常不满，耿耿于怀，只是他一时无力顾及西北，蒋同张、杨之间的矛盾尚未发展成公开冲突。

王曲训话　10月27日，是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开学的日子。几天前刚刚来到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在张、杨陪同下，驱车来到王曲。这天上午10点以前，军官训练团学员、“西北总部”和驻军团长以上军官共五六百人聚集在王曲一个大庙里，准备听蒋介石训话。

蒋介石上午11时到达王曲后，操着浓重的宁波口音，喋喋不休地训

起话来。他说：“我们革命军人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他还说：“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是不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是一个革命者。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显然，这是讲给张、杨听的，是对东北军、十七路军中所有主张联共抗日的积极分子进行恫吓。蒋的讲话，使到会者感到反感和愤慨。第二天，军官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鼓动苗剑秋（东北军少壮派骨干分子之一）来训练团讲话。苗对学员们说：“昨天有人说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要我们不去打日本而要打共产党，这简直是放屁！我们东北让日本侵占了，我们东北军人变成了亡省亡家的人。这时候居然有人说这样混账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

潜伏在军官训练团中的国民党特务将苗剑秋的激烈言论报告给他们上级，晏道刚要求张学良严惩苗剑秋。张让苗秘密离开西安前往北平，后又去日本住了三个月。张对晏道刚说苗已畏罪潜逃，此事即不了了之。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事变前夜

张、杨决定采取扣蒋行动的第二天——12月9日，西安发生了蒋介石下令开枪镇压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活动的事件，酿成了流血事件。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大力领导和张、杨的保护支持下，西安地区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12月9日，西安近万名大、中、小学生举行游行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援绥救国。张学良、杨虎城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蒋介石却令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参加游行的东北竞存小学一名学生被打死。广大同学怒不可遏，决意徒步去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学生冲出城门，冒着凛冽的寒风，向临潼方向挺进。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惊慌失措，急忙打电话给张学良，令其设法制止，并残忍地叫道：“如学生不听，可用武力制止。”张学良深知学生如到临潼，定会发生更严重的流血惨剧。他立刻驱车追赶，在灞桥追上了学生队伍。张尽力劝说，学生不听。同学们表示不到临潼不罢休，并高呼：“拥护东北军抗日！”、“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情愿为救国而死！”目睹学生的爱国激情，张学良深受感动，他满怀深情地对同学们说：“我张学良是国家军人，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一星期之内我以事实做答复。”

当晚，张到华清池向蒋反映学生要求，蒋责怪张不用武力镇压学生，批评张不该代表学生反映要求，并承认当天是他命令军警向学生队伍开的枪。这件事对张学良触动极大，成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一条重要导火线。事变第二天，张学良向其部属解释“兵谏”原因时说：“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事先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出各种方法来制止……学生们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用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说明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绝不能轻易改变了”，于是“便断然决定”对蒋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他改弦更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张。

12月9日，张、杨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做了一些必要准备。

首先，张、杨对“兵谏”行动做了分工：东北军负责在临潼扣蒋；十七路军负责解除西安城内蒋系人员武装。

蒋来西安前，对张、杨同中共的接触早有所闻。不过，蒋自信他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张不会出问题；对杨虎城，则不无戒心。他到西安后，不下榻由十七路军负责防卫的城内；而下榻在东北军防区内的华清池。蒋当时只带了18名卫士，连侍卫官在内持有武器者不超过25人。这些人住在华清池内院。住在外院禹王庙的是中央宪兵一个排。蒋住在内院五间厅，同他住在一起的有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侍从室组长蒋孝先以及十多名秘书和参谋人员。临潼一带的驻军是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张学良的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也被调到这里，加强对华清池的警卫。

张学良挑选最忠实于他的人去执行捉蒋任务。被指派为捉蒋负责人的是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他的部队就驻在临潼县城及其附近；直接指挥捉蒋行动的是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及其所辖团长刘桂五，此二人绿林出身，机智勇敢，经验丰富，对张忠诚。具体执行捉蒋任务的是负责守护张公馆的卫队二营，该营营长孙铭九是张学良的亲信。王玉瓒率卫队一营，奉命协同卫队二营参加捉蒋行动。上述人选确定后，张学良曾带白凤翔、刘桂五去华清池，名义上是他俩将去热河打游击行前聆听蒋的指示，实际上是让他俩熟悉华清池的地形和蒋所住五间厅的位置。

西安城防司令、陕西警备二旅旅长孔从洲根据杨虎城命令，事前详细调查了西安城内外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兵力及其部署。当时国民党在西安的武装人员共约7000人。孔从洲指挥的十七路军部队有8000余人，驻在南、西、北城和西关。东城由东北军驻防。杨虎城还指示孔从洲在晚间11时后进行一次军事演习，目标是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他并指出在演习中对东北军不得误会；严禁走火；部队行动中，如遇中央军宪兵询问，就说进行夜间演习。

张、杨的准备工作是在极端秘密情况下进行的，只向他们信赖的极个别高级将领透露了“兵谏”计划，表面上仍不动声色，一切如常。12月9日，张、杨在城内易俗社举行戏曲晚会，招待在西安的南京文武大员。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5 捉蒋后西安的军政措施

蒋介石被扣押后，张、杨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解释发动事变的原委，提出救国主张。通电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突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之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爱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之爱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开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国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待命之至！”

张、杨提出救国主张的核心与宗旨“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这就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根本目的。

张、杨扣蒋后，为贯彻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在军事、政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主要的有：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由张、杨分任正副主任；组建参谋团，承张、杨旨意研讨一切军事问题，成员包括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何柱国为召集人；成立设计委员会，为事变的政治设计机构，召集人是高崇民；组织抗日援绥军团，表示要“克日誓师北上，剪灭仇雠，收复失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土”。军团长为孙蔚如，副军团长是王以哲；集中军队，准备迎击何应钦发动的军事进攻；改组陕西省政府，原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民政厅厅长彭绍贤被免职，任命王一山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财政厅、警察局、教育厅也进行了改组。杜斌丞担任省政府秘书长；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陕西省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由王炳南任主任；释放政治犯；清除内部坏分子；封存西安各大银行储备的银元1500余万元，暂不准挪用；派代表去广西、山西、绥远、山东、北平、四川等地，争取各地方实力派支持。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四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 南京讨伐派掀起的“讨逆”恶浪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国内的方方面面。

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在西安被扣，南京群龙无首，顿时乱成一团。南京最早知道蒋在西安被扣留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12日上午，何收到洛阳军分校主任兼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的电报：“西安发生事变，真相不明。”他立即电告在上海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并派飞机到西安、临潼上空侦察。中午过后，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通电传到南京，蒋被扣消息得到证实。虽然张、杨在通电中声明要保蒋安全，但一时有关蒋介石生死的谣传仍五花八门，不胫而走。

蒋被张、杨扣押后，南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和对策，当时在国民党要员中出现分歧，主张不一。当晚10时，一些国民党要人在何应钦家中议论此事，冯玉祥、李烈钧等主张采取对策首先要考虑保证蒋的安全；而何应钦、戴季陶等则主张采取军事行动，攻打西安。当日午夜到次日凌晨3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这两种意见的分歧更为明显，争论更为激烈。以何应钦为代表的讨伐派攻击张、杨“背叛党国”，“劫持统帅”，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主张“中央对策宜持以坚定”，“示张杨以力”，发动“讨逆”进攻。会议在讨伐派压力下，决定褫夺张学良的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其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军事委员会是南京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委员长是蒋介石，副委员长是冯玉祥。蒋在西安被扣，理应由冯代蒋执行职务；可是由于冯不是蒋的嫡系，且长期与蒋有矛盾，甚至爆发过公开战争，所以联席会议明确规定：“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作为国民党中枢核心人物之一的陈立夫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承认，“蒋先生被关在西安，应该指定冯玉祥接任。但是，怕他利用这一位置制造麻烦”，因此“何应钦被委任全权负责，计划军事行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在南京，支持何应钦掌握军权，主张武力讨伐西安的，还有以力行社、复兴社为核心的黄埔系。这些毕业于黄埔军校、以蒋介石为靠山的少壮军人，听到西安事变消息后，如丧考妣。复兴社书记长邓文仪12日下午得知蒋被扣西安，十分担心蒋被张、杨用飞机送往新疆或苏联。他心急如焚，主张立即动员军队，不仅派陆军包围西安，同时要派空军去监视封锁。未经军事领导机关同意，邓文仪擅自发急电给驻汉中的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望他率部即刻开往咸阳，与万耀煌配合，攻打西安；同时致电驻洛阳与潼关之间的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要他的部队迅速进占潼关，应付变乱，准备进攻西安。

12日晚8时，邓文仪在南京主持召开力行社、复兴社全体干部紧急会议。到会30余人。会上，戴笠、郑介民报告“事变的经过及前因后果”；桂永清、潘佑强提出“军事应变部署”意见；邓文仪强调“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为即刻协调陆空军包围西安，用实力和行动监视张、杨”。会议决定：“建议政府请军政部长何应钦统一指挥应变军事行动”。

事变爆发后，以何应钦为代表的讨伐派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妄图从东西两翼夹击西安。驻扎在洛阳的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奉命率部西进，当夜抢占潼关，后又进至华阴、华县。南京当局调动大量军队集结于陇海路、平汉路沿线，准备入陕作战。桂永清率中央军校教导总队12000余人13日从南京驰赴陕西“救蒋”，17日到达华县，18日进占渭南，企图沿陇海路正面进攻西安。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带领部队从河南信阳西开，同李铁军师和刘戡师一起集结于潼关、卢氏及其以南地区待命。在大批蒋军西调，从东翼给张、杨施加压力的同时，原驻甘宁地区“剿共”的蒋军部队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征部，奉命星夜南下，到咸阳、宝鸡之间集结，靠近刚刚到达咸阳的万耀煌部第十三师（万本人此时在西安被扣），从西翼加紧威胁西安。国民党的飞机不断飞临西安上空侦察，撒传单。16日，几十架飞机对三原、渭南等地狂轰滥炸，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在讨伐派掀起的“讨逆”恶浪滚滚而动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12月16日正式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着其“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同一天，南京政府发布“讨伐张学良令”，重弹张、杨“背叛党

国，劫持统帅”老调，攻击西安方面“将所部军队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他们“为整饬纪纲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何应钦17日在南京宣布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职，并任命刘峙（开封行营主任）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重庆行营主任）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指挥西安以东和以西的国民党军队围攻西安。

西安上空内战阴云笼罩，一场大厮杀一触即发。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南京主和派的营救活动

西安事变爆发后，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与何应钦等的态度不同，主张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这固然因为他们是蒋介石的妻子和亲属，把保证蒋的安全作为采取对策的出发点；还因为讨伐派的主张必导致中国内战的扩大，为日本侵略者鲸吞中国提供良机，显然这不符合他们这些亲英美派的利益。

蒋在西安被扣时，孔祥熙和宋美龄都在上海。孔除收到何应钦从南京来的电报、电话外，南京有关方面还向他转达了张学良于事变当天给他个人的“震电”。张的“震电”除阐述发动事变的苦衷外，还郑重表示“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公害私，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孔认为张给他此电，表明事变“尚有转圜余地”。他考虑到蒋的安危掌握在张、杨手里，因此万万“不能遽闭谈判之门”。孔立刻复电张学良，说张的“震电”他“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孔对张、杨扣蒋未加严厉谴责，但委婉地予以批评，说“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孔愿充当调人：“遵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

宋美龄在上海得知西安爆发事变的消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当时西安电讯中断，蒋介石生死不明，宋美龄如坐针毡，打算亲自去西安弄清蒋介石死活真相。她在上海找到一位十分合适的随行者——端纳。端纳原是澳大利亚记者，辛亥革命前来到中国，后任张学良秘书，1933年陪张游历欧洲返回中国后，又受聘担任蒋介石的秘书。西安事变爆发时，他在上海。12日下午，端纳从宋美龄口中得知蒋在西安被张、杨扣留后，决定亲赴西安，探明事实真相。当日夜间，他随孔祥熙、宋美龄乘火车前往南京。奉命同行者还有与蒋、宋关系密切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宋美龄请他陪同端纳去西安，并担任翻译。

13日清晨，孔祥熙、宋美龄一行到达南京，得知刚刚结束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联席紧急会议决定褫夺张学良的本兼各职，武力讨伐西安，并已派兵抢占潼关等地。宋美龄当即明确表示不赞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成这种“非健全之行动”，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施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宋美龄立下决心，愿竭尽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

在南京“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的宋美龄，为营救蒋介石，反复恳求何应钦等“约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论军事之前，先尽力救委员长之出险”。她强调指出，不如此，战争开始后，蒋介石“不为其亲自统率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也将被张、杨杀害。为尽快弄清蒋介石死活真相，她不顾何应钦的反对和阻挠，在尚未接到张学良复电同意的情况下，毅然于13日中午派端纳乘机离京赴陕。临动身前，孔祥熙对随行的黄仁霖交代说：“你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亲自看到委员长，亲眼看见。看见他之后，马上回来向夫人和我报告你所亲眼看到的确实情形。就是这一点，不多亦不少。”孔祥熙接着表示：“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敞开着的。”

12月14日上午，在宋美龄要求下，作为行政院代理院长的孔祥熙主持召开高级会议。出席者有南京政府五院院长，中央党部的陈果夫、陈立夫和叶楚伧以及何应钦、黄绍竑、张群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在讨伐之前，如何采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据黄绍竑回忆，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数人都赞成和平营救，何应钦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对。在这次会上主和派占了上风。

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一时集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于一身。他反对用武力讨伐西安，主张采用“智取之法”营救蒋介石。具体说来，就是从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对张、杨施加压力，以“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争取“兵不血刃”地解决西安事变。

为孤立张、杨，南京极力拉拢各地方实力派。当时的中国，形式上统一，实际上许多省份（特别是边远地区）仍由地方实力派控制，处于半独立状态。西安事变前后，南京和西安都极力争夺地方实力派，以壮大自己，削弱对方。13日晨孔祥熙回到南京，深感“蒋公情况不明，各省疆吏多感彷徨，尤以鲁、冀、桂三省态度，更可注意”。为稳住各地

方实力派，孤立张、杨，他当即通电各省市，针对张、杨通电中揭露和批评蒋介石对外屈辱妥协的政策，竭力为蒋辩解说：“中央同人，对于抗敌御侮，素具决心”，蒋“赤忱报国，主政中枢，秉此主张，艰苦奋斗，努力迈进，成效显然”。对与蒋矛盾较大，同张、杨关系密切的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青岛的沈鸿烈等，孔都一一单发电报，有的还派专人前往笼络。

分化张、杨内部，收买冯钦哉。冯是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第四十二师师长，驻防陕西大荔、朝邑一带，是杨部主力之一。他反对张、杨的联共抗日主张，拥护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张、杨在西安扣蒋后，杨令冯派兵控制潼关，阻击中央军西进。冯接电后表示“拒受乱命”，“固守原防”。14日，冯与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樊崧甫、董钊、桂永清等联名发表通电，恶毒攻击张学良是“中华民族千古罪人”，呼吁南京政府“明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大统六军，明令挞伐”。冯钦哉叛杨投蒋后，南京立刻任命他为“渭北剿匪司令”，派人送去巨款，并答应冯部军饷以后由南京解决。

敦促阎锡山斡旋，争取张、杨把蒋送到太原。事变爆发后，孔祥熙认为阎“老成重望，与张为世交”，便把调解斡旋的希望寄托在阎身上。14日，他给阎的电报中说：“请公致电汉卿，促其反省，即日陪同介公南来，一切弟当保其安全，倘渠因南来或恐不为各方所谅，则请公电劝其暂移晋省。”15日，孔祥熙再次致电阎锡山，敦促他劝说张学良，把蒋送到太原。为敦促阎从中斡旋，南京特派黄绍竑赶赴太原。黄带去了有居正（司法院院长）、孙科（立法院院长）、孔祥熙（代行政院院长）、叶楚伧（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冯玉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烈钧（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朱培德（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戴季陶（考试院院长）、张继、王宠惠、何应钦（军政部部长）、程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唐生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联合署名给阎锡山的信，信中说：“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之两宜者，莫如先生”，敦促阎“即向汉卿恺切劝导，即日送介公到太原”。从这封信署名者的人数之多，地位之显赫，足见南京对阎锡山斡旋救蒋寄予多么大的希望。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对苏日两国进行外交交涉。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即刻向中国驻外使馆通报了蒋被张、杨扣留的消息，要求他们注意探询各国政府及舆论界对此事的反应。与此同时，着重对苏联、日本进行交涉。南京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都怀疑西安事变是张、杨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发动的，甚至怀疑事变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有关。当时有的日本报刊也散布这种论调。孔祥熙13日下午召见苏联驻华代办，恫吓说：“西安之事，外传与共产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反苏。”孔祥熙深知，苏联最担心南京接受日本兜售的“广田三原则”，联合日本共同反苏，故以此相威胁，迫使莫斯科对西安施加影响，释放蒋介石。为此，南京政府还授权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与苏联外交当局多次进行交涉。孔祥熙还加紧同日本进行交涉，要求日本当局约束在华浪人的滋扰行为，勿乘机寻衅滋事，以免激起中国人民更大的反日情绪。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5 民众团体和知识界的反应

各民众团体和知识界因其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不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也不一致。

左翼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大都赞扬张、杨的爱国壮举，支持他们的救国主张。12月14日，在西安的全国救国联合会代表团等18团体联合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五年来“昧于国势民意，空谈武器准备”，致使爱国军民此起彼伏的抗敌斗争“终至局部抗战，无裨全局，一时胜利，未竟全功”。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绥远时，蒋一面企图结束绥远战局，一面仍增兵陕甘，加紧“剿共”。通电赞扬张、杨的爱国行动，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同一天，设在北平的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代表东北三千万同胞提出反对内战，要求南京接受张、杨的救国主张，速开救国大会，实行抗日。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14日致电张、杨，称赞他们的爱国壮举，呼吁“早日召开救国会议，贯彻八项主张，克日誓师北上，收复已失山河”。北方人民救亡大同盟17日散发题为《对于西安政变的基本认识》的传单，客观地分析了酿成西安事变的远因和近因，批驳了南京方面对张、杨的种种攻击和诬蔑，提出从速停止内战，召开救国会议讨论西安提出的救国主张，开放民众运动，将从事内战的军队调去对日作战，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

有的爱国团体和知识分子，平时与张、杨关系密切，但当听到西安事变消息后感到震惊和愕然。他们对张、杨的八项主张表示同情和支持，但对扣蒋行动持有异议。总部设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爱国团体。张学良1936年夏在上海曾秘密会见该会领袖，表示赞赏全救会宗旨，并愿从经济上给予支持。“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张极为愤慨，专程赴洛阳要求蒋释放沈钧儒等。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其中第三项就是要求“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可是，全救会12月15日发表“紧急宣言”，认为在当时条件下，西安事变“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不幸”。它对张、杨的救国主张给予肯定，但认为扣蒋是“不合常规的办法”，不表赞同。它要求南京尊重全国民意，和平解决陕

事；呼吁张、杨立刻释蒋。南京颁发“讨伐令”当天，该会致电南京当局，要求南京“对陕事郑重处理，务期避免内战”，使“各方实力，得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是张学良走“西北大联合”道路的指路人，他也不赞成扣留蒋介石。杜担心蒋如“发生不测，则中国纷乱局势无人可以收拾”。他呼吁“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挽危舟”。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他主张恢复蒋介石自由。

社会上右翼的团体、知识分子和舆论工具，西安事变后群起鼓噪，掀起一股拥蒋，攻击张、杨的浪潮。胡适20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张学良的叛国》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大洋彼岸回国刚刚12天的胡适，听到蒋介石被张、杨扣留的消息感到震惊，精神上受到巨大打击，特别是见到“今日还有一部分青年人表示同情于张学良”而深感奇怪。胡在文章中指责张、杨的行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灭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碍国家民族的进步”。他竭诚拥护南京当局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支持对西安进行武力讨伐，鼓动讨伐派“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介石）陈（诚）诸先生的目的”。胡适攻击中共提出的“抗日作战”口号是“无耻的欺骗”，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竭力为蒋的“先安内后攘外”政策辩解，说蒋“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齐整的步伐，充实的力量”。以青年导师自居的胡适，呼吁青年们对蒋介石“错误的感觉到现在应该可以清除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7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张、杨策划“兵谏”行动是在极端秘密条件下进行的。直到12月12日凌晨2时许，才告知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刘鼎，嘱刘转告中共中央。当日清晨捉蒋后，张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他为中华民族利益和抗日前途计，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组织联合政府。刘鼎也于当天早6时电告毛泽东：张、杨已将蒋扣留。

中共中央对这一突发事件事先毫无所知，接到西安来电，开始还不大敢相信。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发去“万万火急”电，请他证实“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情况如属实，建议张把蒋扣押在自己卫队营里，严防其收买部属，尤不可把他交给其他部队看管。

在国难深重、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应该怎样对待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是包括蒋介石在内？这个问题本来在几个月前已获解决，1936年8、9月间中共已放弃“反蒋抗日”口号，确定了“逼蒋抗日”方针。可是，在蒋介石被张、杨扣留后，中共中央一些决策人在这个问题上又一度出现反复和动摇。

事变当天，中共中央给在平津工作的刘少奇发去电报，提出：中共“拥护张、杨之革命行动”；具体任务是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分开，争取南京及各地政权中的抗日派，稳定CC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及元老派，对蒋介石则要揭发其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的罪状，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向南京提出明令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

12月12日午夜，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提出应变设想，主要内容是：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组成委员会主持大计，半个月内在西安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南京方面由林森、孔祥熙、冯玉祥等主持，等待国防政府成立，并防御亲日派勾结日军进攻京沪一带；争取蒋军全部抗日；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晋绥军为主组成抗日联军，并争取在晋绥地区的中央军参加，防御日军进攻华北。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凯丰、张国焘等。毛泽东首先作报告，热情称赞张、杨的义举，说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其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对这一行动，不是反对和中立，而应是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与会者在讨论时，对上述两点都表示同意，但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和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看法不尽一致。

关于如何处置蒋介石，有人在会上公开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还说“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在讨论中，多数人对此没提异议，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至于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即要不要在西安建立一个与南京对立的政府，则意见分歧，争论较多。毛泽东主张在西安建立一个名义上不是全国政府而实质上是政府的机构，可叫抗日援绥委员会。周恩来提出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在西安可建立一个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群众团体，称为抗日救国会，但可发挥领导作用。张国焘则认为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主张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

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头脑冷静，遇变不慌。张在发言中没用一个“审蒋”“除蒋”字眼，而且明确表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他还主张中共此时应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从张的发言看，他不同意“审蒋”“除蒋”口号，也不同意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分开。

当时的事实是蒋被扣留在西安，但他的军队没受到任何损失，南京政府中的主战派在“救蒋”口号下派兵进入潼关，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事关革命前途和民族安危的关头，张闻天告诫大家“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他提醒全党在“新的困难，新的矛盾”面前，要头脑冷静，“慎重考虑”，强调只有“党的策略正确”，才能把革命引向“顺利的方向”。他的结论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会议总结时，部分吸收了与会者的正确意见，强调要尽量团结更多

的人，把抗日援绥旗帜举得更高，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方针；但对张闻天等人提出的一些正确意见并未采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处于矛盾状态，提出一些调和主张，如对蒋的处置，提出要反蒋又不正面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对政权问题，提出要建立政府，又不要政府名义，实际是政权性质；但“审蒋”“除蒋”的基调没有变。

中共中央一些决策人在对蒋策略上的动摇和反复是短暂的，只有7天时间，到12月19日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事变后没有出现有人预料的那种局面。事变刚爆发，中共中央一些决策人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以为张、杨在西安义旗一举，全国便会群起响应，不仅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张、杨的爱国壮举，各地方实力派特别是阎锡山、刘湘和李宗仁等也会加入抗日阵线，晋阎与川刘将成为西安的两翼，对南京直接控制的东南七省形成半月形包围圈；南京内部会出现分化，国民党内的元老派、欧美派及其他一些派系会赞助西安事变。可是事变爆发后，南京内部，不仅蒋的嫡系，就是那些非蒋派别也没倒向西安；地方实力派中除少数对西安表示同情外，绝大多数持中立观望态度，张、杨寄予厚望的阎锡山、冯玉祥不但没支持西安，反而催张早日释蒋，阎甚至对张提出许多责难；在国内最有影响的救亡团体全救会发表宣言，不赞成扣蒋，希望西安方面早日释放蒋介石；国内舆论对西安也不利，全国二百余家报社和通讯社15日发表宣言，要求张、杨即刻释放蒋介石，安全护送其出境。总之，“拥蒋潮流”一时弥漫全国。上述情况表明，如何处置蒋介石，是全国各阶层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保蒋安全，和平解决事变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可以赢得群众，有利于结束内战，实现抗战；反之，则脱离群众，使内战扩大和延长，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第二，周恩来的西安之行，有助于中共中央做出正确决策。周恩来一行17日到达西安，了解到许多在陕北不知道的重要情况：张学良发动“兵谏”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蒋，只是逼蒋抗日，蒋只要答应抗日，张仍拥护他做领袖；蒋被扣初期态度恶劣，拒绝与张谈任何问题，现在态度有变化，可以谈抗日问题了；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给何应钦的手令（对西安停止军事行动三天）已于17日上午离开西安，飞往南京；以宋氏兄妹为代表的南京主和派，极力主张用和平办法营救蒋介石，已派端纳来陕见蒋，现又决定派宋子文来西安谈判；南京政府16日颁布对张、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的“讨伐令”，刘峙指挥的东路“讨逆军”已有5个师进入潼关，威逼西安。种种事实说明，蒋虽在西安成了“阶下囚”，但他仍能支配南京政府，指挥国民党军队。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了“和”与“战”的关键。周恩来通过与张学良面谈，进一步明确了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他与张晤谈后，当晚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除报告所了解到的情况外，还提出“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攻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他的这一建议实际上被中共中央认可，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以第三者调解人的立场，呼吁南京迅速顺应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把进攻张、杨的部队调往绥远抗日，承认红军，共同抗战，等等。电报最后指出：南京如能实现上述条件，“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个人的安全自由亦当不成问题”。实际上，中共中央在对蒋策略上已由要求“审蒋”“除蒋”，改为有条件释蒋了。第三，担心亲日派完全控制南京政府。蒋被扣后，被视为亲日派的何应钦掌握了南京的军事大权，派兵威逼西安。他的举动自然引起中共中央的警觉和注意；而更令人注意的是，事变当天南京即致电当时在欧洲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催他立刻回国。汪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得意忘形，与其在国内的同伙电报频传，密谋策划。他当即由德国赶往意大利，12月22日在热那亚登上了回国的轮船。一旦南京政府完全被亲日派控制，其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的命运将更令人担忧。周恩来12月18日从西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就提到，“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汪将回国”。中共中央对亲日派的动向极为关注，认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战，奴化中国”，决定党的策略是“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并具体指出“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第四，苏联的态度及其报刊言论的影响。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扣蒋电报后，接连致电共产国际，报告事变的有关情况和中共的应变计划，以期获得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的强有力支持。在西安事变问题上，共产国际与苏联的立场一致。12月16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向中共中央发出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认为西安事变“在客观上只能对中国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建议中共中央“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冲突”。这些条件是：改组南京政府；保证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联合红军共同抗日；与同情中国人民抗日的国家合作。此电发到陕

北保安，因电码错乱，未能译出。中共中央18日请求共产国际重新发报，当20日电报重新发到保安时，中共中央已于19日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19日的决策虽没直接受到共产国际电报的影响，但苏联报刊的言论起了作用。《真理报》14日社论发表后，莫斯科接连用英语向全世界广播。位于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从广播中得知苏联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并猛烈谴责张学良。中共中央没有接受《真理报》的观点，独立自主地评价西安事变，充分肯定它的革命性质，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但考虑到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不得不考虑协调自己的对蒋策略。应当说，这也是中共中央迅速改变对蒋策略的一个原因。

中共中央放弃“审蒋”“除蒋”主张，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是12月19日举行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决策。这次会议是在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决策人经过一个星期对形势的观察，认识获得统一的基础上召开的。毛泽东首先在会上发言。他说，事变后形势的发展有光明的方面，也有黑暗的方面，中共坚定地站在抗日立场，使光明的方面发扬光大，对黑暗的方面予以打击；事变后内战的发生与延长，对我们不利，只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方针是消弭内战，不使内战延长；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一是胜利的前途，二是失败的前途。为争取胜利前途，就要使光明的形势发扬光大，抗日的力量更加壮大，努力争取东北军，帮助反讨伐战争取得胜利。他说，我们不要远离张、杨，而要与之接近，同情并帮助他们。

博古分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变动及其政治态度的变化。他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表示小资产阶级转到抗日方面来，两广事变，特别是西安事变，标志资产阶级已转到抗日方面来。他指出，在当前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各个阶级都企图利用西安事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西安事变把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公开举起作为自己的旗帜，在此情势下，只要党的策略得以正确运用，就可以使它成为发动全国抗日的起点。

张闻天对事变的发展前途、党对事变的根本立场、进行和平调解的方针等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关于事变的前途，他也认为有两个：一是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动，二是内战的扩大。他接着指出，全国舆论不希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望内战扩大。然而日本、德国则企图使中国内战扩大，因为这是两个阵营。他强调中共的方针是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针对几天来对蒋策略的动摇和反复，他明确而又郑重地说：我们不站在反蒋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使蒋的部下与我们对立，是不好的。他公开批评13日会议上提出的“审蒋”主张，说我们应把抗日作为中心，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张闻天头脑清醒，指出西安事变胜利和失败的可能性都有，提醒全党要做好准备。他指出，要争取胜利，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正确方针，即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积极援助张、杨，主要是使他们的部队巩固，并大力发动群众；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靠近张、杨，对东北军尽量与之配合。

毛泽东在作总结时，集思广益，对与事变有关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更加深刻和明确的阐述。在统一认识基础上，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和《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通电”当天向全国公开发表，它向南京和西安双方提出四项建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由南京立即召集全国和平会议；会前各界先提抗日救亡草案，讨论对蒋的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会议地点暂定在南京。从上述条件看，自然是承认南京的正统地位，主张有条件地释蒋。“指示”是发给中共各级党组织的，不公开发表，所以它除了阐述事变前的形势、事变的意义、事变的两种前途及其拥护者和中共为结束内战、实现和平应持的基本方针等问题外，还坦率地指出，西安事变多少带有军事阴谋的方法，说张、杨用这种方式扣蒋，把南京置于西安的对立地位，造成了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因此，这一行动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大团结。“指示”提出中共应坚持的方针是：坚持和平方针，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走向抗日，揭露亲日派打着拥蒋旗号发动内战的阴谋；同情西安事变，给张、杨以实际援助；切实准备，用防御战给“讨逆军”以沉重打击。这样做，不是扩大内战，而是促成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周恩来到西安后，立即开展调解工作。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他高瞻远瞩，忘我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杰出贡献。事隔几十年

后，张学良仍念念不忘周恩来的历史功绩，称赞周当时实际上是西安的“谋主”。张说，捉蒋，是他作出的决策；而放蒋，和平解决事变，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17日傍晚到西安，即刻会见张学良。二人促膝交谈，直到深夜。张介绍蒋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向以及各方面的反应。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张认为，现在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最大，主张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周恩来在17日晚和后来的交谈中，充分肯定张、杨的爱国热忱，赞同他的上述看法，并向他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阐述了中共对西安事变性质、前途的看法以及处理方针。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但它跟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采取的是武装要求形式。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后的沙皇尼古拉，又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尼古拉是被群众暴动推翻的；拿破仑是经过战争全军覆没后被流放的。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蒋的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从各方面考虑，对蒋的处置极需慎重。周指出，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会使中国免于被日本侵略者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大规模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前途。这样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放他回去。张对中国共产党不计历史恩怨，一切从民族利益出发的伟大胸怀和周恩来精辟、透彻的分析甚为钦佩，受到鼓舞，更增强了他逼蒋抗日的信心。

17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还研究了统一部下思想和对付南京讨伐派军事进攻问题。鉴于宋子文即将来陕，他们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条件：立即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下令全国援绥抗敌；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成立抗日联军，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8日下午，周恩来会见杨虎城。周代表中共中央向杨问候，对最近一年来红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关系表示满意。杨也讲了些过去同中共的关系和他对中共一贯保持友好态度，并问中共中央各同志好。周恩来向杨通报了17日晚与张学良谈话的主要内容，并阐述了中共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及和平解决的方针。杨听后感到惊异，因为他原来估计共产党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现在蒋既被捉，中共一定会借机报复。周恩来现在讲的这番话，特别是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内心产生惊疑和顾虑。他向周说，他追随张发动西安事变，完全以张的意旨为意旨，现在更愿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只要张和中共方面意见一致，他是无不乐从的。杨向周表示，他担心蒋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进行报复。周对杨的这种顾虑表示理解和同情，向他解释说：现在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蒋抗日，英美和苏联也在争取他抗日，蒋除了走抗日这条大路外，其他的路都走不通。如今，蒋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他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至于蒋将来是否报复，这并不完全决定于他，只要我们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和实力派，就有强大的力量，蒋想报复也报复不成。再则，这次如果没有把握，也不会轻易放他走。杨表示同意周的上述看法。

周和杨还交谈了对付南京讨伐派军事进攻、调南汉宸来西安帮助工作的问题，并取得共识。在会见中，周恩来还对杨的警三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被红军俘虏后遭误杀以及孙蔚如部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草签协议后遭袭击事，代表中共中央作自我批评。这样做，消除了杨内心存在的一个疙瘩。

周恩来还注意向东北军、十七路军其他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勉励持不同意见的人在民族危亡关头，应以民族利益为重。

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缺乏思想准备，周恩来19日在西京招待所找中共东北军工委代理书记宋黎、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谢华、徐彬如等谈话，向他们分析形势，解释党的方针。周恩来还勉励当时担任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主任的王炳南，要他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周还亲自做杜斌丞、杨明轩等知名人士

的工作。

周恩来与张、杨协商了三方面军事上共同行动问题，决定集中三方面军队主力，在西安以东地区与刘峙指挥的中央军决战，并以部分兵力钳制西线之敌胡宗南部。为支援西安方面的反讨逆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各两个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突击部队，在彭德怀、任弼时统率下，由定边、环县地区南下，10月25日、26日到达庆阳附近。蒋介石25日获释离陕，进入潼关的中央军也开始东辙，红军主力部队便在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地区休整待命。

周恩来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促成西安与南京谈判并最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9 “审张”、“赦张”、“管束张”

12月25日傍晚，蒋和宋氏兄妹在张学良陪同下到达洛阳，蒋令张给杨虎城去电，将还扣押在西安的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等释放。杨25日夜收到张学良电报，翌日晨经与王以哲、周恩来商量，决定将所有被扣人员一律释放。接着，又应南京方面要求，将扣留在西安的50架飞机也全部放走。

蒋介石26日下午回到南京，便命陈布雷替他写了一篇《对张杨的训词》，登在报纸上，把他的被释放说成是由于他“伟大的人格”的“感召”，掩饰他对张、杨做出的承诺；同时对张学良进行报复，导演了一出“审张”、“赦张”、“管束张”的闹剧。张在南京一下飞机，就受到特务、宪兵的严密监视。他被软禁在宋子文公馆，蒋通过宋示意张应有到京待罪表示，于是张当天给蒋写了一封信，后被称为“请罪书”。在蒋的安排下，南京决定将张交军事法庭处理。

张学良到南京后，就被软禁在宋子文公馆里，他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如此快地背信弃义、自食其言。到南京第二天，张就当面要求蒋兑现在西安的承诺，改组南京政府。遭到蒋的严词拒绝。蒋在12月27日的日记里写道：“晚见汉卿。彼犹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蒋明确地告诉张，他将被“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要求张“戴罪图功”。12月28日，蒋召集南京各部长开谈话会，讨论对张学良的处罚问题。“多主张不能令汉卿再回西北，惟子文则不肯失信其友人，必想任其回去”。蒋认为宋子文“只知私人感情，而不顾国家”。蒋执意扣押张学良，也激怒了宋美龄，她在军法会审前以“治病”为名，抛下腰伤未愈的蒋介石，只身于30日离开南京去了上海。

蒋介石回南京后，执意扣押张学良，“决心不准其再回西北而保全其生命”，并“缓撤西北”的南京军队以背叛军抗命”。他在12月29日的“日记”里简要地解释了“理由”。他说：“若复放其回任，不惟后患无穷，而政府之地位立即动摇，以彼回西北，不仅为所为想为，且可藉口前所要求者如有一件不行，彼即可叛变也。彼所要求者为中央在西北部

队一律撤退。”“如果放弃西北”，就是“任其赤化”。总之，蒋扣张就是要拆散西北的“三位一体”，将西北直接掌控在南京手里。

12月31日上午，军法会审开庭。审判长李烈钧问张：“你知道犯什么罪吗？”

张回答：“我不知道。”

李翻开“陆军刑法”给张看，并说：“陆军刑法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胆敢出此？”

张态度从容，答话直率，对法庭提问的问题逐一做了回答。关于发动“兵谏”的目的，张说：“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报告过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地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的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要求领袖容纳我们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与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方法达到我们的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关于他送蒋回京的感想及他到京后给蒋写的那封被称为“请罪书”的信，张回答说：“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领受。我写给委员长的那封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张学良接着说：“现在的要求是极端的抗日，贯彻始终。至于我个人的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我对于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意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李问张：“你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张回答：“我自己的主意”，“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说到这里，张向李说：“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李答：“当然可以！”

张说：“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李答：“是的。”

张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帝制与专制，对吗？”

李答：“是的。”

张理直气壮地接着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不容张把话说完，李便斥责说：“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

审判不过两小时，就宣布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15年。这天匆匆对张进行“军法会审”，并解除其警卫的武装，也是担心他逃跑。蒋在这天日记里说：“闻其卫队陆续到宋寓，已十有一人，如不审判，卸其武装，则彼逃也。”1月4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一纸命令，使张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失去自由。

西安方面对蒋回京后违背诺言、迫害张学良的行径极为愤慨，针锋相对地做出反应。当蒋杜撰的《对张杨的训词》12月27日发表后，杨12月29日致函陕西各县长，披露事变经过、八项主张和蒋答应的六项条件。1937年元旦，西安举行阅兵式，杨在演说中谴责南京扣张及纵兵西进的行为。1月4日南京宣布对张特赦并“严加管束”命令，西安知张已不能返陕，气愤至极。第二天，由杨虎城领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共同署名向全国发出通电，严重抗议南京扣张和企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

中共中央在释蒋后就指出：蒋接受抗日条件，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新阶段的开始；要彻底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12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声明，谴责蒋的《对张杨的训词》，指出蒋是在接受了张、杨的抗日条件后获释的，并披露了蒋答应的六项条件内容；要求蒋要言必信、行必果，不折不扣地实践自己的诺言。元旦过后，南京的五路大军威逼西安，中共中央认为蒋仍在动摇中，党的方针是争取他，使他与亲日派分离，主要火力应对准亲日派。西北三方面应加强团结，使中央军不敢猛进，非不得已不开火。

蒋回到南京，对西安方面实行的策略是：拆散西北的“三位一体”，迫使张、杨离开自己的部队，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不容许西北存在半独立状态，将其完全置于南京控制之下。解决西北问题，蒋采取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方针；但在具体行动上，则采取军事压迫手段来迫使西安方面就范。蒋作出上述决策后，立刻部署5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态势。其具体部署是：西安以东，有顾祝同的第一集团军、陈诚的第四集团军和卫立煌的第五集团军，共22个师的兵力；西安以西，有蒋鼎文的第二集团军和朱绍良的第三集团军，共15个师的兵力。顾祝同作为西安行营主任，奉命代蒋指挥上述部队。蒋本人在奉化溪口遥控对陕甘善后问题的处理。他一再电示顾祝同等：“战事应充分准备，但不轻易发动”，“望以军事威胁为手段，而达到政治解决的目的”，“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以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并明文规定：总攻击令，必须由蒋本人下达。

在几十万中央军部署于豫陕和甘宁地区，对西安形成包围的态势下，蒋介石一再强调采取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方针解决陕甘善后事宜，这和下述情况有关：第一，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不容大规模内战再次发生。何况蒋在离陕返京前对张、杨做的“今后再有内战，我负责”的承诺言犹在耳。第二，广大人民群众和地方实力派强烈反对南京用武力进攻西安。1月7日，陕西各界代表20余人到潼关面见樊崧甫，要求南京“对陕事以政治解决，俾得培养国力，一致对外”。同一天，广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通电，指出：“旬日以来，中央对于西安抗战之主张，未能见诸实行，竟复派大兵入陕，重相煎迫，万一激成变乱，人将谓中央勇于对内，怯于对外。”要求南京迅速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制止入陕部队，采取政治解决办法。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纷纷发表通电，呼吁南京急令入陕部队停止前进，采取政治解决办法。第三，南京担心红军渡河攻晋，抄中央军后路。当时积极奔走和平的甘肃省财政厅厅长陈端，1月13日向孔祥熙尖锐指出：“关于陕省问题，如中央决以军事解决，势必全部赤化。”他解释说，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总数近20万，“一经接触，势必向晋豫流窜。星火燎原，深为国家前途隐忧”。他建议南京在军事上取缓和态度，求得和平解决。同一天，蒋介石给何应钦、顾祝同、刘峙的电报也指出：“此时我军如向西安进攻，赤匪必有一部向晋边渡河攻晋，以牵制我军。此着非常危险。”蒋在电报中明确提出，在“河东防务未固以前，我军暂勿向西安进攻”。

为政治解决陕甘问题，蒋介石1月5日抛出一个处理陕甘善后方案，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人事任免，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王树常为驻甘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免去邵力子的陕西省主席职务，由孙蔚如接任陕西省主席。二是军队驻地划分，由潼关至宝鸡的陇海路，再沿渭河至天水之线，归中央军驻防；东北军一律恢复到12月1日前的位置；十七路军在陕北地区。第二天，蒋又决定东北军全部调往甘肃，归王树常节制；十七路军留一部分在西安。

面对南京的军事威胁，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三方面负责人商量决定，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团结一致，组成抗日联军，做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对付南京的军事压迫，但应力争和平，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

南京和西安都摆出打的架势，但谁也没有真正动武的决心，都不过是拿军事威胁作手段，来达到自己的要求和目的。因此，在军事对峙中，双方又开展了和平谈判活动。

1月9日，蒋派与南京有关系的东北人士王化一、吴瀚东去西安，劝说西安方面服从南京命令，以免引起战端。王、吴1月11日飞返南京后，蒋13日又派米春霖携带甲、乙两案飞往西安，供西安方面择一而行。蒋提出的两案是：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路上；十七路军仍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12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乙案：东北军（包括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西安方面认为，目下最主要的问题是争取张学良返回西安。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无从谈起。为要求释张，杨虎城和东北军方面先后两次派李志刚、鲍文樾去南京、奉化交涉，均无结果。1月22日，蒋介石致电杨虎城，说他已把陕事交给顾祝同在前方全权处理。于是，西安与南京双方代表从1月24日起开始在潼关谈判。西安方面代表提出接受甲案的一些条件，如东北军移动时南京要发表张学良的名义，东北军留部分兵力驻西兰公路咸阳至邠州一带，十七路军驻一个旅在西安以及东北军、红军在移动时南京须提供经费等。双方围绕这些问题讨价还价。到1月底双方就西安方面接受甲案达成协议，共12条。东北军根据这个协议已开始从前线撤兵。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东北军内部在和战问题上的分歧达到白热化，以至演成内部互相残杀的流血事件。

东北军内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为首的老派和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为首的少壮派，西安事变后，在如何营救张学良问题上出现分歧，而且愈演愈烈。张在南京被扣后，少壮派情绪激昂，表示蒋不放张返陕就与南京决一死战；王以哲等则主张通过谈判营救张学良，反对打仗。十七路军内部也有类似情况，只是程度上没有那么严重。

在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的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周恩来坚毅沉着，坚持党的和平方针。他积极支持和协助杨虎城，坚定杨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心。对东北军两派分别谈心，希望他们认清形势和前途，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团结合作。

可是少壮派一意孤行，主战声浪日益高涨。1月20日前后，应德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田、孙铭九等人发起请战签名运动，鼓吹为营救张不惜与中央军决战；并扬言谁不签名，谁就是不拥护、不想营救张副司令，只顾个人升官发财。在这种舆论压力下，本来主和的军官也跟着签了名。

恰在此时，红军将领彭德怀、徐海东来到西安。他们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中主战、主和两派座谈，给他们分析当时的形势、中日关系、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以及打内战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等问题，企图帮助解决东北军两派的分歧与矛盾。当彭德怀讲完话征询大家意见时，竟无一人发言。

1月27日晚，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与中共代表团会谈。应德田说，要保持东北军的团结和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实现联合抗日，必须争取张学良回来。周恩来向他们说：我们知道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张学良在东北军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把张营救回来；但现在双方都坚持，容易引起战争。一旦引起内战，不仅不符合张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而且容易引起更加混乱的局面，这对国家对东北军都不利，也更不利于营救张学良。周说，现在撤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保持强大力量，继续要求，迟早会把张学良争取回来的。周恩来这些苦口婆心的话，少壮派根本听不进去。苗剑秋大哭大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甚至威胁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一面哭泣，一面跪在周恩来面前不起。就这样一直闹到下半夜。最后，周恩来对他们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1月30日，周恩来、叶剑英去三原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同在那里的张闻天、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研究西安的和战形势。大家认为，从全局看，应该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我们这个主张不为东北军、十七路军接受。现在我们有两种选择：如友军打，我们不参加，将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或者同友军一道打，打的过程仍同南京继续谈判和平，打得好和平仍有望，打败了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实现和平。但不论打与不打，我们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不变。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朋友完全团结一致，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原来的和平主张而支持他们的主

张，跟他们一起同中央军打仗。周恩来、张闻天等30日22时将上述决定电告延安请示，两小时后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周恩来、叶剑英返回西安后，将中共中央的决定告知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以及少壮派，叶剑英还同两军的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1月29日，东北军召开渭南会议。何柱国在会上主张东北军只有听命撤兵，才对营救张学良有利，对东北军前途有利。应德田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坚决反对和平解决，主张张学良不回来，决不撤兵，如中央军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在他的煽动下，群情激奋，一致赞同应德田的主张，反对何柱国的意见。到会的40余名军官在会议的上述决定上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等不愿执行渭南会议决定，可他们又说服不了少壮派，便于31日用飞机把于学忠从兰州请来，因为于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的指挥东北军的代理人。

于学忠一到西安，东北军两派都要求他支持自己的主张。当晚，在王以哲住宅召开“三位一体”最高会议，由杨虎城主持，与会者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于学忠首先发言，他说现在坚持张副司令回来，可能引起战争，这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三方面都不好。应该按照王、何的意见，先撤兵，以后再慢慢营救副司令回来。王以哲、何柱国同意于的意见。杨虎城表示十七路军在捉蒋、放蒋、送蒋以至放走南京军政人员和飞机问题上，都和东北军采取一致行动，现在仍愿与东北军一致行动。周恩来说，我们原来认为先撤兵而后再来营救张副司令的办法是对的。不过你们两方面有不少人主张不撤兵，要张副司令回来。为了三方面的团结，只要你们一致主张，一致坚持，我们也可改变原来的意见。现在你们双方既然一致主张先撤兵，以后再设法营救副司令，我们当然同意。

“三位一体”最高会议作出决定后，大多数原来主战的军官服从了这个决定；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人仍坚持主战立场，他们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不忠于副司令，出卖副司令，决定杀掉王、何二人，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会议决定。2月2日上午，他们派卫队团连长于文俊带兵到王宅，将患病卧床的王以哲击毙。他们还派人去杀何柱国，何因不在家，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住在新城大楼杨虎城处，才幸免于难。

“二二事件”立刻引起东北军分裂和内讧。驻守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刘多荃、缪澂流部，2月3日晨自动退出渭南前线，移师渭河以北的高陵。刘多荃的一部兵力枪口倒转，开到临潼，声言要为王以哲报仇。此时，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周恩来严厉批评少壮派的错误行为，同时为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派人将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送往三原红军总部，杨虎城用武力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出西安。这样，才使东北军内一场大规模互相残杀得以避免。

应德田等出走后，刘多荃将奉命带兵杀害王以哲的于文俊杀害，祭奠王以哲。刚刚被提升为旅长、对东北军联共抗日作出重大贡献的高福源（根本未参与“二二事件”），也被刘多荃下令杀害。

此时古城西安被恐怖气氛所笼罩。周恩来沉着应付这种险恶局面。他听到王以哲遇难消息后，同叶剑英一起立刻赶到王宅吊唁，当时灵堂尚未设好，使王的家属和东北军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2月4日，毛泽东、朱德电唁王以哲家属，对王的遇难表示悼惜。

少壮派的错误行动，分裂了东北军，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使形势急速逆转。由于东北军前线部队自动撤出渭南前线，使西安门户洞开，中央军顺利进入渭南。刘多荃、缪澂流在高陵召开东北军军事会议，决定放弃甲案，接受乙案，全军东开。周恩来力劝东北军接受甲案，仍留在西北，与红军、十七路军靠拢，以便日后共同东出抗日，东北军高级将领没有接受。

这时，各路中央军向西安进逼。2月8日，中央军开始进入西安。此前，十七路军驻西安部队已撤往三原，杨虎城也回到三原东里堡别墅。顾祝同2月19日进入西安后，派人去三原请杨虎城，杨于2月14日回西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2月中旬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为重，勿以他个人为

念。何柱国去奉化看望他时，他请何转告东北军将领保持与红军的关系，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1937年3月，东北军各部队东开，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不仅驻地分散，而且互不统属。不久，蒋介石派陈诚改编东北军为四个军，分别由于学忠、缪澂流、刘多荃、吴克仁担任军长，番号大为缩减，由原来的20个师减为10个师。

十七路军也被蒋改编，除投蒋的冯钦哉部和另两个团外，其余部队改编为第三十八军，孙蔚如任军长。杨虎城被迫于1937年4月辞职，6月出国“考察”，抗战爆发后返国被捕，长期被关押。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前夕，将杨杀死于重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参考书目

1.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9。

2.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

3.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西安事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

5.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8.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9.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

10.吴长翼：《千古功臣杨虎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11.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湾。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史话》主要编辑出版发行人

总策划 谢寿光 王正

执行策划 杨群 徐思彦 宋月华

梁艳玲 刘晖春 张国春

统筹 黄丹 宋淑洁

设计总监 孙元明

市场推广 蔡继辉 刘德顺 李丽丽

责任印制 郭妍 岳阳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辛亥革命史话》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史话/张海鹏，邓红洲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

（中国史话）

ISBN 978-7-5097-1946-6

Ⅰ.①辛… Ⅱ.①张… ②邓… Ⅲ.①辛亥革命-史料 Ⅳ.①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5989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话·近代政治史系列

辛亥革命史话

著者/张海鹏 邓红洲

出版人/谢寿光

总编辑/邹东涛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010）59367215

电子信箱/renwen@ssap.cn

责任编辑/赵薇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责任校对/黄芬

责任印制/郭妍 岳阳

总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5.75

版次/2011年5月第1版 字数/107千字

印次/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1946-6

定价/1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

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2011年4月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目录

一 辛亥革命要革什么人的命

二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形势

1 帝国主义的“保全中国”政策

2 清政府以“新政”谋求自存

3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4 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

三 辛亥革命的推动力

1 兴中会的成立与保皇派的活动

2 同盟会举起推翻清王朝的旗帜

3 反清宣传运动

4 从反美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到国会请愿运动

四 有组织的反清武装起义的发动

1 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

2 光复会领导的武装起义

3 广州新军起义与黄花岗起义

4 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

五 保路运动和武昌首义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 清政府铁路政策的转变

2 保路运动的勃发

3 武昌首义的成功

4 各省独立的实现

六 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临时政府

1 中华民国宣告诞生

2 南京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

3 南北和议与清廷解体

4 《临时约法》的制定

5 政府北迁与政权性质的改变

七 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八 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纪念与评价

参考书目

再版后记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二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形势

1 帝国主义的“保全中国”政策

帝国主义列强在与清政府订立《辛丑条约》后，调整了它们的对华政策，不再叫嚣“瓜分中国”，而是抛出了一套“保全中国”的论调。1900年10月签订的《英德协定》中规定：“不得利用现时之纷扰在中国获得任何领土利益，其政策应以维持中国领土不使变更为指归。”在1902年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中，也有与此相似的内容。这种“保全中国”的原则，逐渐得到了其他列强的认同。

从“瓜分”到“保全”，并不表明帝国主义列强突发慈悲，相反，它们是想花更小的代价来更大限度地奴役和掠夺中国。汹涌澎湃的义和团运动，让它们清楚地看到了蕴藏在中国人民群众中的爱国热忱和反抗精神。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中国领土之内……共有人口四万万，均系属于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巨大力量，使列强感到，它们瓜分中国的计划，只是不切实际的痴梦。瓦德西说得很明白：“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与人民群众相反，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清朝统治者则心甘情愿地做了列强的奴才。列强表示不把慈禧列为应受惩办的祸首，不割占土地，使慈禧感激涕零，毫无保留地批准了《议和大纲》，并表示：“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辛丑条约》是清朝统治者卖国媚敌的“巅峰之作”，清廷从此沦为“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列强既然有清政府这样一个驯顺的工具来执行他们的命令，乐得坐收实利，也不必去忙于瓜分中国了。

实际上，帝国主义列强抛弃瓜分中国的政策，还有来自它们内部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原因。经过19世纪末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各列强在华或大或小地谋得了一席地盘，它们之间暂时达成了默契。若要继续瓜分，势必打破各列强间的利益平衡，从而导致它们之间的争夺，甚至要爆发战争，这种情况是它们不愿意看到的。即便如此，还是发生了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俄战争（1904～1905），以及英国为了抗衡俄国对西藏的控制，于1903年、1904年发动了侵略西藏的军事行动，想在西藏地区分一杯羹。这两次战争结束后，至1907年，日法、日俄、英俄等协定陆续订立，所谓“保全中国”的政策也就稳固下来。

在“保全中国”的幌子下，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有增无已。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里，清王朝的朝政时常受到列强的摆布，而最严重的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几乎完全操纵于列强之手。

大规模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铁路修筑权，是列强输出“过剩”资本与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1901～1908年，列强在华掀起了重新分割路权的斗争，如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从俄国人手里转到日本人手里，京汉铁路的投资原来由比利时牵头，现在则改由英、法操办。同时根据已订的诸条约，列强继续修筑未完工或未开工的铁路，截至1911年，在中国完工的9600公里铁路中，列强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其中的93%强。铁路本是一个国家推进近代化的主要手段之一，但中国在这一时期修筑的铁路，却成了列强手中最方便的工具，铁路延伸到哪里，它们的势力就扩张到哪里。

矿权的丧失，在这一时期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列强以各种形式攫夺中国的矿权。一是援引德国在胶东谋取铁路附近矿权的先例，日本夺占了抚顺、烟台煤矿，俄国夺占了东清铁路沿线的几个煤矿等。二是通过所谓合办的名义，来取得实际的支配权。由于清王朝财政匮乏，根本拿不出钱，合办也就成了列强独办，安徽、直隶和山西的部分矿权就是这样丧失的。三是直截了当地强迫清王朝出让矿权，如英国的福公司取得晋东南几个州县的采矿权，英法合资的隆兴公司取得滇东地区有色金属开采权，都是用的这种手段。

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业几乎也被列强完全控制。1902年，英国同清王朝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美、日也在次年与清王朝订

立了类似的条约，这样就扩大了各列强航运公司的特权。英、日、美、德、法等国都在华经营航运，其中尤以日本的日清轮船公司、英国的太古和怡和轮船公司实力最为雄厚，几乎控制了整个的长江航运，清政府自办的轮船招商局越来越无法与它们竞争，到1911年，招商局的船舶吨位大约仅占前述三家公司船舶吨位的1/6。就全国范围而言，1907年各通商口岸轮船总吨位中，外国轮船占有84%强的份额。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工业投资逐渐扩大；1900年以后，增长速度也相当快，在纺织业、造船业、烟草业、机器采煤业等领域逐渐具备了垄断的实力。以造船业为例，1900年英国资本的耶松船厂吞并了祥生、和丰两厂，垄断了当时上海的造船业。据经济史专家统计，外资厂矿在华谋取了平均高达14%强的利润，其中最高值竟接近40%。

在投资工矿、运输业的同时，列强还以贷款形式，来谋取权益。高额的战争赔款，使本来已经很紧张的清王朝财政更加举步维艰，只能靠借外债度过危机。这些外债的特点是多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而且利息极高。通过这些借款，列强不仅控制了清王朝的财政，而且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1902年以后，仅支付借款本息一项，每年就高达4000万两白银。

帝国主义列强一方面“保全”清朝统治者作为它们唯命是从的傀儡；一方面用“温和”的经济掠夺方式，来谋取在华的最大权益。它们以为靠这一套把戏能瞒过中国人民的耳目，从而避免遭受激烈的反抗。事实上，这只是它们的梦想，一股全新的革命力量已经逐渐积聚起来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清政府以“新政”谋求自存

在帝国主义列强调整对华政策的时候，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清朝统治者也酝酿起变法事宜来。1901年1月，流亡在西安的朝廷颁发了一纸上谕，表明了慈禧的变法决心。上谕中说：“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把变法提到了系乎存亡的高度。上谕还要求朝中百官、地方督抚及驻外使节就变法一事各抒己见，限期在两个月内提出意见，以便朝廷采择。4月21日，又成立了督办政务处，由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和荣禄等负责，全盘筹划新政事宜。慈禧离开西安返回北京的前夕，又一次发布文告，强调变法自强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命脉，重申朝廷变法立意坚定，志在必行。

朝廷唱起的变法调子，得到了几位重要督抚的回应。直隶总督袁世凯揣摩准了慈禧的心思，于1901年5月率先上了个奏折，陈述了10条有关变法的意见，涉及改革军备、财政、开通民智、派遣留学生等方面。同年7、8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了三个奏折，系统地阐述他们对变法的见解，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张、刘二人认为变法的第一步要从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做起，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广设新式文武学堂、奖励留学。他们列举了需要整顿的中法十二项，需要采用的西法十一项，主要包括裁汰旧军、编练新军、鼓励工商业、改革币制、派员出国考察、改造旧律等方面。他们的主张，很符合慈禧的心意，她表示要按照这几位督抚的条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

清王朝上上下下如此热心举办新政，多少有些异乎寻常。仅在两年前，慈禧太后扼杀了维新运动，如今却重弹变法的老调，是什么力量促使她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一方面也冲击了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了某种松动。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都有一部分人逐渐明白了学习西方、改革旧制度的重要性，这部分人的力量从小到大，其政治影响也愈来愈大。在清廷内部，从19世纪60年代起，就有洋务派和顽固派之分。慈禧太后在两派力量之间搞平衡，对于洋务派的活动，只要不超出“中体西用”的范围，她还是允许的。中日甲午战后

的严重民族危机，唤醒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参政意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兴起了维新运动。对于维新本身，慈禧太后并无多少恶感，只是光绪想借运动来谋取实权，于是维新成了帝党和后党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慈禧为了维护她的最高统治权，不惜把维新与帝党一同打倒了。

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本来已经千疮百孔的清王朝更加虚弱了，来自下层的反抗一天胜过一天，社会的中层对清廷也逐渐显得失去了信心。清朝统治者感受到了严重的危机，动不动就提到所谓“伏莽遍地”，意指各地潜伏着起义的危机。显然，按照旧的方式已无法统治下去了，于是慈禧太后带头画起了变法的救命符。

变法的目的之一，是要博取列强的欢心和信任。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列强点名杀了一批著名的顽固派官员，而对义和团运动期间组织东南互保的洋务派督抚表示了赏识与信任。自此，顽固派的势力一蹶不振，慈禧太后也不再在两派间搞平衡了，而是单独倚重洋务派官僚，于是洋务派的那一套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她的施政方针，与列强的关系也就更近了一些。帝国主义列强感到清朝的统治并不稳固，为了不让这个得心应手的工具垮台，它们也鼓动清廷着手改革。控制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的英国人赫德向清廷提交了一份《更新节略》，为清王朝的变法设计了一套方案。

变法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消弭国内普遍的不满情绪，找到支持与信任，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支持与信任。同时，通过变法增强实力，借以对付日益蓬勃的革命风潮。

从1901年至1905年，清廷颁布了不少关于推行“新政”的上谕，涉及面很广，但最核心的内容不外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改革军制，裁汰旧军，编练新军。从1901年起，清廷屡次严令地方督抚裁撤旧式绿营、防勇，组建新式陆军。1903年12月，清廷成立了练兵处，由奕劻、袁世凯、铁良三人负责，主持全国的新军编练；在各省也设立了督练公所，负责该省的新军编练。清朝新军开始编练，是在甲午战后天津附近的小站进行的，后来由袁世凯主持小站练兵，北洋新建陆军由此发端。同一年，张之洞在暂署两江总督期间，聘德人为教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官编练自强军，在回湖广总督任上时，他带了部分自强军回鄂，成为湖北新军的基础。新军的新，有三点：一是装备西式武器，按西法编制，按西法操练；二是新军的兵员要求高，规定年龄从16岁至22岁不等，身高四尺八寸以上，南方人酌减二寸，体质弱、有目疾暗疾的不收，有不良嗜好的、有犯罪记录的不收，而且对兵员的识字程度也有规定；三是新军的军官由毕业于军事学校的人担任。清廷在编练新军的同时，设立了不少武备、陆军学堂，并分批派遣青年出国学习军事。

1906年11月，清廷将兵部改为陆军部，并把练兵处并入，由铁良任尚书。次年8月，制定了全国编练陆军36镇（相当于师）的计划，而实际上由于财政匮乏、人才不足，至清朝灭亡前夕，仅编练成14个镇、18个协（相当于旅）、4个标（相当于团），外加一支禁卫军，共约16万人，其中以北洋六镇实力最强。

清廷编练新军的目的，是想靠新军来支撑其统治，但新军却朝统治者所希望的相反方向演变，很大一部分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后来成为革命的力量。

二是鼓励私人资本兴办工商业。1903年9月，清廷设立商部，由曾赴欧美和日本考察过的载振（奕劻之子）任尚书。这个部的权力很大，工矿业和铁路都由它管辖（1906年改称农工商部）。商部成立后，陆续制定了一些商律和奖励实业的办法，允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实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清廷鼓励私人资本开办工商业，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但这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让步已经太迟了，此时外国资本已然在华形成垄断之势，民族资本无法与之竞争。而且清廷并没有交给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实权，只不过按照投资者投资实业份额的大小，赏与不同的官衔罢了，并没有切实保护民族资本的措施。

三是改革教育，逐步废除科举制度，着手培养新式人才。清朝沿袭前朝的科举制，把知识分子囿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时值近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举制是造成中国落后的祸源之一，要求废科举，兴新学。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设立了一批专门性质的学校，以培养洋务人才。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创办西学学堂，1897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这是新式普通学校的发端。戊戌维

新时，康有为建议采用日本的办法，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但经过戊戌政变后，仅保留下来一个京师大学堂。到19世纪末，清朝还没有系统的新式学制。

1901年6月，张之洞和刘坤一联名上折，建议略改科举旧章，与学校教育并行，等到学校培养的人才多了，逐渐递减科举取士的名额，增加学校取士的名额。以后，张之洞、荣庆与张百熙又联名上了类似的奏折。1902年，清廷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同时扩建京师大学堂。张百熙草拟了大学、中学、小学及蒙学章程，由清廷以《钦定学堂章程》的名义颁发全国，但实际上并没有执行。1904年1月，清廷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把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段，与普通教育配套的还有师范、实业等方面的专门教育，这个学制基本上自成体系，被称为“癸卯学制”，是清末民初学校教育的蓝本。1905年9月，张之洞、袁世凯联名上奏，建议废止科举。清廷诏准自1906年始废除，至此，延绵千余年的科举制寿终正寝了。在创办新学校、废除科举的同时，清廷还派遣青年和官员出洋留学或考察。1901年以后，留学生人数急增，到1906年，仅留日学生就超过万人。

清王朝举办“新政”，其目的在于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企求自强自存。但“新政”的宗旨，并没有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框，早在1901年颁布的变法诏中就定下了这种基调：“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洋务运动的失败，昭示了封建主义的“体”和资本主义的“用”是根本不相容的，但清王朝的统治者仍然不肯放弃这一原则，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新政”耗资亿万，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引起人民的反抗，“新政”客观上助长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正是这两种因素合起来，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清王朝原来打算靠“新政”加固封建专制这所破屋子，却不料“新政”的重量超出了破屋子的支撑能力，让它更是摇摇欲坠。

说到“新政”，还应当注意在举办“新政”过程中迅速崛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袁世凯（1859～1916），字慰廷，河南项城人，故又被人称作袁项城。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是太平天国时期镇压捻军的清军统帅之一，曾官至漕运总督，袁氏一家也因此显赫起来。袁世凯年轻时乡试两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次不中，就绝了靠读书取仕的念头，前往登州（烟台）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吴系他嗣父的把兄弟，给了他一个营务处会办的差使。袁世凯后随吴入朝鲜，因处变有方，受到李鸿章的赏识，谋到了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务一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设法让李鸿章把自己招回国内，避开了杀身之祸。回国后，他一面巴结权门，一面请人写了一部兵书，用自己的名字刊行，博得了“知兵”的虚名。同时由于他在朝鲜呆过一段时间，被一些人视为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不久直隶总督王文韶派他接替小站练兵事务，袁世凯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起了听命于他的北洋新军。戊戌政变时，他帮助慈禧扼杀了维新，讨得这位最高统治者的欢心。义和团运动时，他不但参加了东南互保，还是屠杀义和团的元凶之一，博得了列强的信任。有此两项，加上纵横捭阖的官场权术，他得以平步青云。1901年11月，李鸿章病死，袁世凯接替他做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后刘坤一、张之洞先后死去，袁世凯遂成为汉人中首屈一指的权臣。袁世凯把北洋六镇新军视为他的政治命根子，又先后吞并了原由盛宣怀控制的几家大公司，通过梁士诒把交通金融业控制起来。此外，由其长子袁克定控制开滦矿务总局，派周学熙等人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等企业。因此，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经济实力也坐大了。

袁世凯北洋集团成为清末统治阶级内部最有实力的军事政治集团，后来实际上充当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对手。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

20世纪最初十余年里，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如星星之火遍布各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为辛亥革命做了强有力的铺垫。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把本息9.8亿两银子的赔款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仅此一项，清政府平均每年就需支付赔款2000万两，占它岁入的1/4。除此之外，各地还需支付地方赔款。羊毛出在羊身上，清政府把负担转嫁到人民群众头上，旧税新捐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清政府举办“新政”所需经费也毫不例外地摊在了老百姓身上。再加上各级官吏从中贪诈，中饱私囊，几乎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不能生存下去的人民群众自发地走上了反抗斗争的道路。

尽管帝国主义想借助一纸条约要求清廷禁止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但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日益加剧，因此来自下层群众的反抗已不是它们能够左右的了。各地群众把反教会和抗捐税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不但把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而且也指向清王朝。1902年，直隶广宗起义竖起了“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那一年，广宗县知县与传教士相勾结，强迫村民按亩缴纳“赔款捐”，激起民愤。颇有号召力的小绅士景廷宾登高一呼，立即得到周围地区群众的响应。起义持续了约三个月，袁世凯派心腹大将段祺瑞、倪嗣冲率北洋军一部，扑灭了这次起义。从义和团运动的“扶清灭洋”到广宗起义的“扫清灭洋”，反映出人民群众对清朝统治者的本来面目已经看得很真切了。从1902年到1905年，直隶朝阳、河南泌阳、四川、湖南邵阳、浙江桐庐、江西新昌等地都掀起了反教会的斗争。

清末“新政”不但没有使清王朝改头换面，反而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抗，因为“新政”只是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而没有带给他们什么好处。各地抗捐抗税斗争风起云涌，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店员、小商贩等都卷入了斗争的洪流。从1901年到1905年，这种类型的斗争全国不下七八十次，其中尤以下列几次较为突出，即：1903年河南农民反抗浮收钱粮的斗争，1904年山东运河沿岸农民反对屯田升科的斗争，1904年河南农民反对丈量土地的斗争，1904年江西乐平靛农反对抽收“靛捐”的斗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城镇手工业者和商贩也掀起了抗捐罢市的斗争，如1903年广州酒商罢市，1904年镇江商贩罢市并捣毁巡警局，1904年重庆商号歇业，1905年上海租界货栈业罢市等。

1906年南昌教案以后，各地反教会的斗争虽时有发生，但已经相对减少了，影响也不如以前显著。与此相反，抗捐抗税和罢商罢市的斗争却如火如荼一般发展起来，到1910年达到了高潮，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超过了260次，其中尤以山东莱阳民变和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影响最大。自筹办“新政”以来，山东莱阳地区农民负担骤增至数十倍，1910年春又发生了饥荒，农民要用历年积谷救急，但积谷被劣绅贪污盗卖，损耗甚大。在绅士曲士文的率领下，莱阳农民要求清查积谷，并有包围县署的举动。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兵去镇压，血洗了农民聚集的几个村庄，屠杀千余人。莱阳民变引起了很大震动，当时的报纸敏锐地评论说：“窃恐踵莱阳而起者，祸变相寻而未有已也。”

1906年以后，南方各地苦于天灾人祸，农民背井离乡，城镇居民隔夜无粮，于是抢米骚动频频发生。1910年湖南水、旱灾害严重，巡抚岑春蓂依然支持他的亲信和洋行合伙搜购米谷，运出湘境以牟暴利；巡抚如此，奸商劣绅们纷起效尤，弄得长沙及周围地区米价一日数涨。4月中旬，贫民聚会要求平抑米价，岑春蓂将他们诬为滋事的市井无赖，并逮捕了其中一人。群众闻讯而起，长沙城内秩序混乱。岑春蓂一面欺骗群众，一面调常备军镇压。统治者的暴行立即招致更激烈的反抗，群众捣毁了米店、教堂、洋行、洋货店，并放火焚烧巡抚衙门。岑春蓂无法控制局势，自请免职。他的继任者一面严厉镇压暴动群众，一面对群众作出了让步，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这次暴动平息下来。

说到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还当提到清末民间秘密会党的一些活动，尤其是南方天地会的活动。在孙中山早期发动的几次起义中，天地会一直是他特别重视的反清力量。天地会创始于康熙年间，分为两大流派：东南沿海一带的称三合会或三点会；长江流域的称哥老会或哥地会。天地会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但时值清末，“复明”的含义已经失去了号召力，“反清”的斗争却继续存在。天地会的主要成员是游民，包括被裁汰的游勇散兵、破产后流落江湖的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水陆交

通线上的贩夫走卒。他们社会地位卑贱，历来被统治者视为土匪，因而具有较强的反抗精神。如1902年至1904年广西会党起义就给予清政府沉重打击，清政府用兵10余万、耗饷近400万两，才将它镇压下去。但同时，由于游民散漫不羁，政治上盲目无知，因此会党也有很大缺点，以致同盟会的领导人有“会党发难易，成功难”的感叹。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三 辛亥革命的推动力

1 兴中会的成立与保皇派的活动

毛泽东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后来人们就称呼他为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农家。1878年，13岁的孙中山赴檀香山投靠哥哥孙眉。孙眉1871年到檀香山谋生，当时已发家成为资本家。孙中山在檀香山生活了6年，先后在当地英、美教会学校读书。1883年，孙眉担心弟弟加入基督教，让孙中山返回故乡。檀香山之行，在这位少年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1896年孙中山简述生平时说：“13岁随母往夏威仁岛（即檀香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回乡不久的孙中山到香港去求学，1886年夏毕业于香港中央书院，旋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校学医，在那里与同学郑士良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郑士良是三合会的一个首领，后来在领导会党参加革命活动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1887年，孙中山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189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在这所学校里，他与英籍教师康德黎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这一时期，孙中山与杨鹤龄、陈少白、尤列三人经常高谈革命反满，被亲友们称为“四大寇”。毕业后，孙中山在澳门、广州行医，与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程璧光、程奎光等朋友畅论国事，意气风发。1893年，他们打算成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团体，但并未组织起来。

这一阶段的孙中山虽然高谈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还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徘徊。1894年1月，他回到翠亨村，拟就了《上李鸿章》书，具体阐述了他的改良设想。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的四大长处，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1894年2月，孙中山偕陆皓东北上投书，他们在上海得到郑观应、王韬、盛宣怀的帮助，找到了进见李鸿章的门路。然而当他们抵达天津时，李鸿章借口中日战事吃紧，拒绝接见，书呈上后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冰冷

的事实粉碎了年轻人的改良梦，孙中山慨然长叹，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决心。投书没有结果，他们又跑到北京游历了一番，目睹了清王朝腐败不堪的内囊。

1894年10月，孙中山以考察农桑为由，从上海赴檀香山，酝酿在当地华侨中组织革命团体。11月24日，孙中山联合20多名华侨，在檀香山卑涉银行经理何宽家中成立了兴中会，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诞生了。孙中山亲自拟定了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国积弱的原因，提出中国面临“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严重形势，成立兴中会就是要“振兴中华，挽救危局”。兴中会的入会誓词中明确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纲领。

这时候清朝统治者正被中日战争中的接连失败弄得焦头烂额，孙中山认为时机有利，遂率邓荫南等20余人回国准备武装起义。1895年1月孙中山抵达香港，即与辅仁文社的领导人杨衢云、谢缵泰接洽，筹建兴中会总会。辅仁文社成立于1890年，原来的宗旨不过是鼓励读书、增长知识、提倡爱国而已。2月21日，兴中会总会成立。香港总会重新发表了兴中会章程，这个革命组织的反清革命的目标更鲜明了。

兴中会总会一成立，立即着手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杨衢云坐镇香港，负责筹款、购械、募兵；孙中山则前往广州成立革命机关，兴中会广州分会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各项准备工作表面上进展顺利，广州部分水师官兵及广州周围的绿林、会党都答应届时响应。而且在香港颇有地位的华绅何启与两名英国记者表示，可以运动英国政府承认起义后建立的新政府。兴中会把起义时间定在重阳节，但起义前夕，孙中山突然收到杨衢云的暗语电报说“货不能来”。孙中山果断决定撤离，但风声已经走漏出去了，两广总督谭钟麟派兵搜查，捕去陆皓东等五人，后来又逮捕了从香港运械来的朱贵全、丘四等人。不久陆、朱、丘三人被杀害。这次未成功的起义成为以后革命派一系列武装斗争的开端。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等人遭到清朝官方通缉，香港殖民政府也宣布五年内不准孙中山入境。1895年11月，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一起东渡日本，在横滨设立兴中会分会。12月，孙中山断发易服，经檀香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山赴美、英游历，志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不料清政府早已密切注意孙中山的行踪，随时准备将他捕回国内。1896年10月11日，清朝驻英使馆将孙中山秘密绑架，公使龚照瑗租定轮船，打算偷偷地把孙中山押解回国。孙中山费尽周折，终于说服使馆英国仆人柯尔，让他带信给康德黎求救。经过康德黎等友人的营救，孙中山脱险。孙中山用英文写成《伦敦被难记》，详细叙述了这次遇险的始末。从此，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家而驰名于世界。1897年，孙中山重返日本，就近筹划革命事宜。这时候，孙中山结识了宫崎寅藏、萱野长知两位日本朋友，他们后来一直真诚地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康有为、梁启超几乎与孙中山同时登上政治舞台。甲午战争后，康、梁领导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蓬勃发展，并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1898年改良的美好前景似乎已在他们眼前展开，但清朝的最高主宰者慈禧不答应，她用暴力扼杀了这场刚开了个头的变法维新。康、梁亡命日本。在1898年以前，革命和维新两派曾接触过，但当康有为觉得维新有望时就中断了这种接触。这次“同是天涯沦落人”，孙中山想说服康、梁，争取两派间的合作。但康有为拒绝会见孙中山，表示不能放弃改良的立场。次年，康有为赴欧美游历。7月，他在加拿大与华侨李福基、冯秀石等人创立保皇会，康有为自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

与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一度想改弦易辙，加入到革命的阵营里来。康有为离日后，梁启超和孙中山交往频繁，经过反复协商，两派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合并方案，打算由孙中山任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启超写了一份《上南海先生书》，说只有革命才能挽救危局，劝他的老师康有为去“息影林泉，自娱晚景”。梁启超流质易变，康有为把他训斥了一顿，又将他拉回了保皇的框框里。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约1898～1903）的梁启超仍不失为传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杰出宣传家。1898年11月，他创办《清议报》，历时三年。1902年，他又创办了《新民丛报》。梁启超文章写得流畅激昂，有人称赞说：“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他一方面猛烈攻击慈禧为首的后党，揭露他们的腐败统治；一方面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提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学说，批判专制与奴隶根性，鼓吹改造国民。梁启超尽管不属于革命派，但他的激越宣传对于革命思

潮的来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戊戌政变，谭嗣同慷慨殉难，他的好友唐才常悲愤异常，决心以武力开辟维新道路。1898年，唐流亡日本，一面在康、梁那里接受了起兵勤王的任务，一面又取得了孙中山的支持。1899年，唐才常回到上海，次年创立正气会，以排满、忠君为宗旨，这个自相矛盾的宗旨表现了他试图调和革命与保皇两派关系的愿望。不久，唐才常改正气会为自立会。6月，北方义和团运动风雷激荡，八国联军悍然入侵，清廷对外宣战。唐才常认为时机成熟，把自立会改为国会，由容闳任会长、严复为副会长。

8月初，唐才常赴汉口，准备在那里指挥自立军起事。自立军的主要成员包括会党、清军下级军官和士兵。自立军分七路，分布在安徽、湖南、湖北。当时张之洞正在搞“东南互保”，唐才常打算拥护张之洞割据两湖，宣布独立。自立军的款项主要由康、梁筹备，但康、梁的汇款迟迟不至，起义被迫延期，安徽自立军单独起义，遭到镇压。8月下旬，张之洞捕杀唐才常等100多人，自立军失败。这是维新派唯一的一次军事尝试，它的失败，使一部分维新人士转化为革命分子。此后，维新作为一种政治运动逐渐冷落，而革命运动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

唐才常在长江流域策划自立军起义的时候，兴中会在广东也发动了一次起义。这两次起义实际上有互相呼应之势。

1900年1月，陈少白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杨衢云也从日本回港筹备起义。这时候，郑士良已经与潮惠地区的会党、绿林联络成熟，只待起义。义和团运动兴起后的复杂形势，使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想借机渔利。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主张革命派和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拥护李鸿章在广东搞独立，何启的主意得到了香港总督卜力的支持。孙中山一方面不反对这个计划，一方面积极准备起义。李鸿章对此事十分谨慎，主要由他的幕僚刘学询和革命派接洽。7月，清廷调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他北上与列强谈判。李鸿章路过香港时，卜力劝他留下来搞两广独立，并打算安排孙中山和他会谈，被李鸿章拒绝。英国想通过两广独立来谋求它在华南地区的利益，革命派也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来扩充革命实力，但由于时局的迅速发展，这个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计划落空了。当时，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也想借赞助中国革命之机，谋取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利益。9月下旬，孙中山赴台湾与儿玉源太郎接洽。孙中山轻信了儿玉的许诺，将购买到的军火运储台湾，并把召募到的日本退役军官（因起义队伍缺乏军事人才）也集中到台湾，只待起义爆发，好就近内运。

10月6日，起义首先在惠州三洲田爆发。由于寡不敌众、弹药枪械缺乏，郑士良率起义军边打边向福建厦门进军，希望得到来自台湾方面的援助。但此时日本国内已由伊藤博文组阁，实行保全清王朝的政策，禁止帮助革命派。这样一来，儿玉源太郎就取消了先前的承诺，孙中山的接应计划也随之落空。郑士良只得率军返回，不久起义失败。

惠州起义爆发后，广州方面因军械未能及时运到而不能响应，负责筹划起义的史坚如铤而走险，决定谋刺两广总督德寿。他原想用炸药炸死德寿，结果只毁坏了督署的一段围墙。由于史坚如的叔父告密，史坚如被捕遇害。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派得到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许多人把革命派视为洪水猛兽，而这次情况就不一样了。孙中山在1919年说：“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这种状况表明清廷的威信已经荡然无存了。民困国危，更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反清宣传运动

革命往往是在宣传革命的号角声中涨潮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逐步建立起了宣传阵地。1900年，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郑贯一和冯自由等人在东京创办《开智录》，成为革命书报大量涌现的先声。东京留学生先后创办的革命报刊有《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直说》、《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等。国内（主要在上海）革命报刊也为数不少，如《苏报》、《国民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童子世界》、《女子世界》、《中国白话报》、《二十世纪大舞台》等。在美洲和南洋的华侨中，一些报刊或由宣传保皇转为宣传革命，如《檀山新报》、《大同日报》等；或者新办了一些革命报刊。除报刊外，宣传革命的书籍也有很大影响，如《新湖南》、《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黄帝魂》、《孙逸仙》、《扼书》、《猛回头》、《警世钟》、《中国问题之真解决》等。尽管清政府严行查禁，但这些革命书报仍然不胫而走，在国内外广为流传。比如《革命军》一书，先后以《图存篇》、《革命先锋》、《救世真言》等名目在新加坡、香港、上海等地翻印，在辛亥革命时期，这本书发行了百万余册。

1901～1905年，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一批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健将，章炳麟、邹容、陈天华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

章炳麟是有名望的学者，又是从维新、保皇的阵营转入革命阵营的；他的宣传活动，对知识分子、对与他经历类似的人们影响很大。这一时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他宣传革命的经典之作。1902年6月，康有为撰写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宪不可行革命书》，攻击革命，宣扬保皇。次年6月，章炳麟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系统批驳了康有为的主张。他针对保皇派一味吹捧光绪的言论，直斥光绪不过是“未辨菽麦”的“小丑”，根本无能担当立宪的大任；他论证中国的出路在于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实现立宪民主。他写道：“……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邹容（1885～1905），字威丹，出生在四川巴县的一个富商家庭，自幼熟读经史，却蔑视科举。1902年9月赴日，就学于东京同文书院。1903年回到上海，积极参与拒法、拒俄运动，并与章炳麟、张继、章士钊等人结为兄弟。1903年5月，邹容发表了《革命军》，全书分七章，约两万字。邹容在绪论部分以恢弘的气势讴歌革命，他说革命是世界公理，是挽救危亡的要义，是文明进化的动力，是涤荡奴隶劣根性的良方。为什么要推翻清朝的统治？邹容回答说，因为它是集封建专制、民族歧视、卖国投敌于一体的祸首。革命的目的何在？邹容勾画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蓝图，明确提出了“中华共和国”的名称。邹容的《革命军》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理论基础，同时也汲取了同时代中国革命思想家的精华，加上文字浅显流畅，笔锋犀利，因此深受欢迎，在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方面的功绩超群拔萃。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出生在湖南新化县一个清贫的塾师家庭，幼时做过沿街叫卖的小贩，后得人资助，奋发求学。1903年留学日本，加入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后回国运动，参与创立华兴会，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再度赴日。1905年参加同盟会，是年12月，为抗议日本颁布留学生取缔规则，于东京大森湾投海自杀。1903年夏至1904年初，陈天华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在书中，他淋漓尽致地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悲怆地呼喊：“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他指出，要反帝救国就必须革命排满，因为清廷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了“洋人的朝廷”。同时他认识到要反帝救国就必须学习西方，他说：“越恨它，越要学它；越学它，越能报它，不学断不能报。”陈天华文笔通俗而又饱含激情，几乎“一字一泪，一语一血”，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勇气。

“革命排满”、“建立共和”，已成为这一时期革命宣传的中心内容。尽管宣传家的思想还不够成熟，甚至还包含一些错误的认识，但是小瑕难掩大瑜，毕竟是他们的呐喊声震醒了沉睡中的一个民族。

同盟会成立后在思想战线上面临一个严峻的任务，即廓清康、梁等人保皇、立宪思想的影响，把人们吸引到革命的大旗下来。其实，革命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派和保皇派早在1903年左右就拉开了论战的序幕。1903、1904年间，孙中山先后撰写了《警告同乡书》、《驳保皇报》等文章，断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也就在1903年，梁启超赴美国游历了一趟，返日后收起了所谓同情革命的言论，起劲地鼓吹保皇，并声称要与异己者宣战。

1906～1907年期间，两派之间的论战达到高潮。这时候清廷玩起了“预备立宪”的把戏，康、梁在海外也积极响应，以“立宪”来标榜他们的团体。革命派以《民报》为主阵地，立宪派以《新民丛报》为堡垒，双方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此外，两派在美洲、南洋的报刊也先后投入到论战中来。

论战的主要问题有三个。

第一，是否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立宪派指责“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不过是狭隘的排满主义，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满汉之间的矛盾，而是满汉和其他国内民族一致对外的问题。表面上看，梁启超的见识要比革命者高明得多，但他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清政府已完全充当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因此他的这个论调在革命派的反击下显得苍白无力。梁启超又抛出新的法宝，他认为革命不仅会造成内乱，还会引起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革命派则宣称唯有暴力革命才是救国救民的途径，陈天华在《中国革命史论》一文中说：“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峙，无革命则亦无平和。”革命派认为革命不会招致列强的干涉，因为列强之所以瓜分中国，是因为清政府太腐败了；通过革命除去这个腐败的政权，也就杜绝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妄想。

第二，是否要建立共和国。梁启超认为当前在中国万万不能实行共和制度，因为国人还不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他甚至认为中国人民连君主立宪的资格都不够，只配由皇帝来搞“开明专制”。革命派则反驳说，中国人民决不比欧美人低劣，虽然长期受封建压制，但仍有无限蓬勃的生气；相反，真正腐朽的是统治阶级：皇帝“不辨菽麦”，大臣“蝇营狗苟”。革命派认为民主共和才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第三，是否要平均地权的问题。梁启超对革命派鼓吹平均地权反对尤力。他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说：“虽以匕首

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曰：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平均地权），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革命派则放眼将来，他们认为要避免贫富悬殊，避免社会动乱，就必须走平均地权这条路。

这场大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立宪派的失败而告终。革命派能够取胜，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多么完美无缺；相反，梁启超在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上，往往显得比他们高明一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派是在为一种新生的力量、一种历史的趋势辩护，而梁启超等立宪派则是为一种没落的势力、一所行将倒塌的破屋子涂脂抹彩。谁正确地适应了历史潮流，历史潮流就会选择谁。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四 有组织的反清武装起义的发动

1 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始终把武装起义作为它工作的重心，不断发动、组织会党和新军向清王朝进攻。萍浏醴起义，就是它领导武装起义的开端。

1906年春，长江流域洪水泛滥，人心惶惶，社会底层的潜流已经涌动起来。同盟会东京本部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国联络会党、军队，准备伺机起义。他们到达长沙后与当地同志秘密聚议，决定首先在萍乡、安源一带发动会党、矿工起义。刘道一坐镇长沙，负责与同盟会本部联系，蔡绍南则潜往萍乡一带联络会党。

在明德学堂学生魏宗铨的帮助下，蔡绍南与萍乡、浏阳、醴陵地区的哥老会头领龚春台等人取得了联系，用会党开山堂的方式成立了洪江会，龚春台被推为大哥。这一带是湘赣两省交界的地区，官府统治力量薄弱，会党势力很大，加上许多会党曾是马福益（因参加华兴会起义，1905年被清政府杀害）旧部，因此，洪江会的组织发展迅猛。此外，洪江会还与安源煤矿的工人联系上了，矿工首领萧克昌也是哥老会的首领之一，他允诺届时率矿工响应。洪江会决定趁年底清吏封印的时候起义。

但洪江会的组织工作不甚严密，起义的风声不知不觉地流传出去，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洪江会的一个头目李金奇遭清军追捕，情急之下投水身亡，接着又有不少会员遭到捕杀。形势紧迫，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等人在12月3日晚议定提前起义，又因军械不足还要稍等一段时间。但洪江会的中下级头目和会众已经坐不住了，一个码头官廖淑保在第二天率先举起义旗，龚春台、蔡绍南被迫下令各路人马起义。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春台为都督，蔡绍南、魏宗铨分任左、右卫统领。起义军发布檄文，宣布清朝统治的十大罪状，表示要建立共和民国。这个檄文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色彩。紧

随洪江会之后，浏阳洪福会姜守旦也宣布起义，但完全没有改变旧式会党的宗旨。

起义震惊了清政府，江西巡抚吴重熹、湖南巡抚岑春煊、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派兵镇压。起义军并没有得力的领导核心，往往各自为战，在清政府优势兵力的围剿下，1907年1月，起义失败。刘道一、蔡绍南、魏宗铨、龚春台等先后被捕牺牲。

起义消息传到日本，同盟会员纷纷请归，打算“身临前敌，与虏拼命”。宁调元、胡瑛、梁钟汉、孙毓筠等回国，分赴长江流域各省以图策应。起义失败后，这些会员中有很多人被捕，他们大多数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气节。但孙毓筠这个同盟会的重要成员，却向两江总督端方摇尾乞怜，做了叛徒。

起义的失败，同志的死难，激起了孙中山、黄兴的悲愤，两人各赋诗一首寄托了对刘道一的哀思。孙中山诗曰：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黄兴诗云：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

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

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

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孙中山素来视武装起义为推翻清朝统治的最主要手段，在起义地点的选择上，他侧重于西南边境一带。1907年3月，日本西园寺内阁应清政府之请，要求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于是偕胡汉民、汪精卫赴安南（今越南），在河内组织革命机关，联络会党。1907、1908两年间，在孙中山的策划和领导下，同盟会在两广和云南连续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爆发。这次起义的主力是当地的三合会，许雪秋是他们的领导者。许雪秋（1875～1912），潮州海阳人，是侨居新加坡的富商，喜好结交江湖人士。1904年，他跑回潮汕地区酝酿起义，未果，重返南洋。1906年，孙中山在新加坡组建同盟会分会，许雪秋入会，孙中山想通过他来发动会党，就授给了他“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的头衔。1907年初，许雪秋再赴潮州发动起义，又遭失败。孙中山于是指示他不要孟浪行事，应与惠、钦、廉地区同时起义。然而实际情形却不像设想的那样完美。潮州黄冈会党准备起义的消息已经走漏，清军开始捕人。余丑、陈涌波等会党首领认为不能坐以待毙，在5月22日晚宣布起义。起义军攻克了黄冈，旋即与清军展开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起义军只得于27日解散。事后许雪秋向孙中山报告起义的有关事宜，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起义军装备陈旧，如果能购得新式军械，他有把握在海陆丰一举成功。孙中山同意了他的计划，派船运送枪械到达汕尾海面。但由于许雪秋接应不周，被清军侦知，运械船被迫返回，海陆丰起义也就告吹了。此后，许雪秋受到部分同盟会员的诘难，逐渐游离于同盟会之外。

为了减轻潮州起义军的压力，6月初，邓子瑜领导惠州会党在七女湖起义。起义军来去飘忽，打了一些小胜仗。后来潮州起义军失败，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腾出手来，率优势兵力扑向七女湖一带。这支势单力孤的起义军，只得解散了。

1907年4月，广西钦州民众掀起了抗捐斗争，成立了一个叫“万人会”的组织，公推刘思裕做首领。两广总督周馥派巡防营统领郭人漳、新军标统赵声率军前往镇压。郭、赵二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孙中山认为机不可失，一面派人与郭、赵联系，一面派人与刘思裕接洽，准备联合两方面的力量搞一个大动作。不料郭人漳派军剿灭了刘思裕领导的抗捐民团，孙中山只好暂时作罢，旋派黄兴、王和顺潜入钦、廉地区，准备再次起义。王和顺（1869～1934），广西邕宁人，曾是1903～1904年广西会党起义的首领之一。1907年在河内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他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

黄兴赴钦州郭人漳营中，劝说他响应起义，郭人漳应允。9月1日，

王和顺率200余人在钦州王光山起义，4日，攻占防城，旋即率500人直逼钦州。但钦州城内尽管有黄兴多方努力，郭人漳还是不敢率部响应。王和顺只得率起义军转战他处，至9月中旬，弹尽援绝，王和顺潜回安南，部属暂时隐蔽在十万大山中。

在广东的几次失败丝毫没有改变孙中山的计划，他只是将活动的重心逐渐转向了与安南相邻的滇、桂两省，因为清政府在这两省的力量要相对薄弱一些。

孙中山派黄明堂、关仁甫到广西边境的镇南关（今友谊关）活动，黄、关二人通过会党的关系，秘密买通了镇南关的部分清军官兵。12月初，黄明堂率80余人袭击镇南关，守兵装模作样地抵抗一阵后投降，起义军占领了三个炮台。孙中山与黄兴、胡汉民等人亲赴镇南关，孙中山亲自发炮轰击清军阵地。清将陆荣廷等率优势兵力赶到，孙中山、黄兴等下山回河内组织援助工作。几天后，清军四面围住猛攻，黄明堂等人只得弃关而去。

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当局对同盟会在安南的活动原是默许的，因为它想和革命党人拉拉关系，以便将来谋取在华南的利益。但1908年2月，由于安南境内发生大规模的抗税斗争，法殖民当局怀疑安南人民受到了中国革命党的鼓动，这个殖民政府索性送清政府一个人情，于3月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虽走，但他已做好了安排：由胡汉民负责河内的机关，由黄兴负责在钦、廉地区再次举事，由黄明堂负责在云南河口组织起义。

3月底，黄兴率安南华侨200余人直逼钦州，一路披靡。4月初在马笃山击溃了清军的一个精锐营，取得了一个令革命党人十分振奋的胜利。起义军在钦、廉、上思一带转战40余天，打得清军统领郭人漳手忙脚乱，由于后援无继，弹药耗尽，黄兴最后只得将队伍解散。

4月底，黄明堂、关仁甫还是用老办法收买了部分清军，攻占了云南边境线上的河口镇。5月初，关仁甫率一军朝蒙自方向进攻，王和顺率一军沿铁路向昆明方向进攻。但这次起义的主力是反水的清军，黄明堂等人无力控制，黄兴赶到河口也无济于事。月末，起义失败。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同盟会发动的这六次起义，带有单纯的军事冒险性质，总想临时依靠会党或反水清军的力量来取得胜利，结果却是屡战屡败。革命党人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开始把注意力转到运动新军方面。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光复会领导的武装起义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虽然大部分光复会成员加入了同盟会，但他们在一些场合依旧打着光复会的旗号，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1907～1908年间，当孙中山在西南边陲发动起义的时候，光复会的秋瑾、徐锡麟、熊成基等也先后在长江下游地区举事。

秋瑾（1875～1907），字璿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这位出身于官僚家庭的女革命家，年青时就与一般的官家小姐迥异，喜欢读书吟诗，骑马舞剑，英豪之气不让须眉。后来迫于父命，嫁给了一个浑浑噩噩的官僚子弟，不久随丈夫迁居京城。1904年，她与丈夫决裂，赴日留学，投身于革命运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浙江分会的主盟人。秋瑾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觉先导者，1906年，她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鼓吹女权；她沉痛地说，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中国妇女是“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她热切地呼喊：“难道我诸姊妹，真个安于牛马奴隶的生活，不思自拔么？”

1906年春天，秋瑾回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她回到家乡绍兴，3月担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绍兴知府贵福为树立他“开明”的形象，对秋瑾等人比较客气，这样就为秋瑾暗中联络会党、运动军队的活动提供了条件。王金发、竺绍康、张恭等会党首领答应参加起义，唯秋瑾马首是瞻。秋瑾于是将会党分为八军，由远在安徽的徐锡麟任统领，她自任协领，各会党头头充任分统。他们计划首先在金华起义，吸引杭州清军，而后由绍兴方面的会党奔袭杭州；若拿不下杭州，则合军取道江西直逼安庆，和徐锡麟相呼应。起义的时间定在7月中旬，但发动起来的会党按捺不住，有一股人在台州先期行动起来。一时风声大紧，秋瑾一面决定提前起义，一面通知安庆方面的徐锡麟。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商人家庭，曾任绍兴府学堂副监督，1903年赴日游历，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04年冬在上海加入了光复会。不过徐锡麟没有参加同盟会，因为他觉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太合他的口味，他只热衷于民族主义。徐锡麟曾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和陶成章等人商议，靠花钱捐官混入官场，谋取军权，然后在清政府内部闹革命。徐锡麟于是捐了个道员衔；又靠他的姻亲，原湖南巡抚俞廉三的推荐，骗得了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在安庆负责主办巡警学堂，不久又担任了安徽警察会办一职。徐锡麟虽然在安庆扎下了根，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建立革命组织。1907年7月，徐锡麟得知浙江方面的起义计划败露，决定冒险一击。7月6日这天，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恩铭和其他省府要员前来检阅，徐锡麟双枪齐发，击倒恩铭，随后在陈伯平、马宗汉二人的协助下，率30多名学生冲出学堂，占领了军械局，几个小时之后失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与马宗汉被捕。当晚，徐锡麟遇害。临刑前，他谈笑自如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

秋瑾很快得知安庆事败的消息，她一面指挥遣散学生，一面与王金发商议，将起义时间改为7月18日。7月13日，大队清兵从杭州来到绍兴，有人劝秋瑾暂且避祸，秋瑾却决意一死。不久，贵福率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贵福等人三次提审秋瑾，结果都碰了一鼻子灰。秋瑾留下了“秋雨秋风愁煞人”的绝笔，在7月15日凌晨慨然赴死。

徐锡麟、秋瑾虽死，但他们的精神激励着后来者，就在第二年，熊成基又在安庆领导了一次新军起义。熊成基（1887～1910），字味根，江苏扬州人，光复会会员。1904年考入安徽武备学堂练军班，结识倪映典、柏文蔚、范传甲，加入了岳王会。1905年又到南京的江南炮兵速成学堂学习，毕业后在南京新军中任排长。1907年调回安庆，不久任炮营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由于倪映典等人策划起义不慎泄密，只得南逃，熊成基因此成为岳王会的负责人。

1908年，清廷调集沿江各省新军在安徽太湖县举行秋操，革命党人决定乘机发动起义。这年11月，光绪和慈禧相继死去，安徽、江浙一带的革命党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议定各地同期举事。

11月19日，熊成基、范传甲等人密商，决定当晚10时起义，先占安庆，然后奔袭太湖，控制会操新军，夺占南京，以此为根据地发军北伐。熊成基被推为总司令。是夜，安庆城外的炮队和马营按期发动，在熊成基的率领下猛力攻城。但城内清军防守很严，原来议定负责打开城

门的薛哲胆小，他率百余人冲到北门，一看有清军巡防营把守，就慌忙后撤。范传甲又被监视，无法行动。得不到城内的接应，城外起义军围攻一昼夜没有进展，清援兵将到，熊成基只好率队伍向集贤关方向退却。城内的范传甲闻讯悲愤难当，谋刺清军的一个协统，不幸被捕遇害。

熊成基率军直逼庐州，打算在那里立足，联络皖北会党，然后北伐。一路清军尾追而来，起义军损失很大，到达庐州时仅剩下百余人，而且有人准备通敌，甚至有人要谋害熊成基。21岁的熊成基毕竟太年轻了，他控制不了这支部队，不得不悄然离去。起义军群龙无首，很快逃散。

1909年初，熊成基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同年9月潜回东北。1910年1月底因人出卖被捕，2月末遇害。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在狱中写了一段令后继者血热的话：“我今日早死一日，我们自由之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

在发动一连串武装起义的同时，一些革命党人也进行过频繁的暗杀活动。中国自古以来，刺客常常被视为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英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不知成为多少人效法的榜样。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通过留日学生传入中国，俄国虚无党人暗杀沙皇的活动在一些革命党人中产生了影响。1900年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暗杀活动的开端。同盟会成立前，无论是在日本的留学生，还是国内的革命者，都建立了一些暗杀团体进行暗杀活动，仅在1904年就发生了三起影响很大的暗杀事件：易本羲在南京谋刺清户部侍郎铁良，王汉在河南彰德火车站谋刺铁良，万福华在上海枪击前广西巡抚王之春。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一直把武装斗争作为推翻清朝统治最主要的武器，但革命党人依旧没有放弃暗杀活动。1905年9月，吴樾谋炸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由于炸弹受到震动爆炸过早，只炸伤了五大臣中的两人，而吴樾却当场牺牲。吴樾的这次行动和同盟会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此后五六年时间里，暗杀事件接连发生。

同盟会为顺利发动武装起义，有组织地进行过一些暗杀活动，目的在于除去一两个清朝大吏，减少起义的阻力。1907年6月，为配合潮惠起义，胡汉民等决定刺杀李准，刘思复奉命前往广州行动，不料在装配炸弹时发生爆炸，刘思复重伤被捕，两年后被营救出狱，从此易名刘复生。

但很大一部分暗杀活动，则是革命者在武装起义屡屡失败后，或者是为报仇雪恨进行的，或者是因为悲观失望，铤而走险。孙中山在西南发动的六次起义失败后，部分同盟会员渐渐失去了革命的锐气，同盟会内部也矛盾重重。汪精卫十分灰心，在1910年初抱着拼命的决心入京谋刺摄政王载沣，4月被捕入狱。汪精卫在狱中赋诗明志，只求一死。但清政府出于收买人心的考虑，并没有让他做断头英雄，后来这位革命健将也逐渐软化下来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黄兴本来对暗杀活动抱有兴趣，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蛰居香港，觉得愧对死难同志，愧对海外热心捐款的侨胞，决心以死一拼张鸣岐、李准，后来接受孙中山等人的劝告，放弃了个人暗杀计划，转而组织了一个东方暗杀团。1911年10月25日，在黄兴的策划下，炸毙新任广州将军凤山。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者是一个名叫李沛基的少年。革命党人将一颗大炸弹系在一家商店的窗户上，仅留李沛基一人守候，商店前面那条街是凤山的必经之路，当凤山被卫队簇拥着经过店前时，李沛基割断绳子，炸弹滚落下去，一声巨响，凤山当即毙命。李沛基也被震倒在地，他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土，在混乱中扬长而去。

尽管暗杀活动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来没有把它作为斗争的主要手段，当时革命的主流还是屡败屡起的武装起义。革命领袖孙中山对于暗杀行动是持否定态度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五 保路运动和武昌首义

1 清政府铁路政策的转变

在清朝统治的最后10年里，铁路问题一直是各种矛盾集中的焦点之一。1903年11月，清廷颁布了一个《铁路简明章程》，准允商办铁路。一时间全国各地冒出了许多商办铁路公司，兴起了收回路权的热潮。但这并不意味着清政府真心诚意地让利于民，它的这步棋走得很有深意。第一，为了稳固统治基础，清政府想笼络住正在成长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把商办铁路作为一个绣球抛向他们。如果商办铁路卓有成效，它可以从中分利；如果商办铁路起色不大，它可以重新收回权利，而且还堵住了民族资产阶级那张吵闹的嘴。第二，清政府可以由此打出一张民众牌，在铁路问题上与帝国主义稍稍讲点价钱，从老虎嘴中抠出一点残渣。但它还没有胆量和能力对列强说“不”，在允许商办铁路的同时，依旧借款筑路。

但是商办铁路的政策并没有让清政府立即尝到实际的甜头，反而是引火烧身。一方面，各地争路运动迭起，民众纷纷汇入斗争的洪流。这种局面使清朝统治者深感恐惧，他们担心革命派会乘机发起大规模的群众暴动。一个退休在家的老官僚王文韶上奏说：“东南伏莽未靖，奸党勾结，时思窃发。自闻借款之信，众情胥愤，力谋抵制……设有不逞之徒，从中煽惑，隐患何堪设想！”这个王文韶道出了当时统治者的心态。另一方面，列强频频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商办铁路和争路运动限制、打击了列强在华利益，这使它们非常忌恨。一些国际财团的巨头，一边指责清政府的铁路政策，一边大造中国铁路非借款不能办的舆论。

另外，巨额的赔款和筹办新政使清政府的财政年年亏空，几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一味地加捐增税，势必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抗。它急需寻找新的财源。清政府此时对铁路已经重视起来了，外国资本在华经营铁路所取得的优厚利润，让清朝统治者惊羡不已。譬如德国人经营的胶济铁路在1910年收入是370万元，相当于清政府当年财政收入的1/80。所以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当政者把借款修路视为开辟财源的一大门径；商办铁路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大障碍，免不了要被他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们想尽办法除去。

1908年，清政府迈出了官夺商路的第一步。清廷谕令邮传部查验各省商办铁路工程，要求各路限期完工，若资金不足、管理混乱，则撤销原商办方案。这年夏天，清廷谕令前一年调任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兼充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几个月后，又令他兼督鄂境内的川汉铁路。张之洞做了将近20年的湖广总督，在清末政坛上声望很高，他素来鼓吹官办铁路。清廷的此项举措，显然是要拿粤汉、川汉两路开刀了。张之洞鼓吹官办铁路，并非真的要官办，依然是借款筑路的老路子。1909年6月，他与英国的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签订了湖广铁路（两湖境内粤汉路、鄂境内川汉路）借款草约。美国经过多方钻营，也在次年5月参加了这项借款协议，三国银行团变成了四国银行团，600万英镑的借款由四国平均分摊。

1910年下半年，部分地方督抚展开了一场“借款筑路问题”的大讨论。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

联名上奏，认为借款筑路是“我国第一救亡政策”。锡良、瑞

二人在满洲贵族中素以“开明”著称，深得朝廷倚重，他们的话很合清廷的胃口。1911年1月，清廷补授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着手准备改变铁路政策。5月5日，盛宣怀指使给事中石长信上折，攻击商办铁路，提出“明定干路为国有”的办法。邮传部也紧跟着上奏，恳请将“干路收归国有”。5月9日，清廷传下谕旨，宣布“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粤汉、川汉两路是清廷要打的出头鸟，5月中旬，端方被任命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负责两路的接收事宜。5月20日，盛宣怀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这个合同揭示了清政府的“干路国有”政策实质上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对中国铁路的控制。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武昌首义的成功

湖北的革命团体一贯进行着扎实而深入的群众工作，尤其注重运动新军。科学补习所因受华兴会起义失败的牵连，被迫中止活动，但革命工作并未因此停顿。张难先、胡瑛、刘静庵等革命者纷纷入新军当兵，一面宣传革命思想，一面发展组织。1905年，刘静庵离开军队，做了一个教会阅览室日知会的主持人，渐渐地在他周围集结了一批革命同志，成立了一个以日知会为名的秘密团体。1906年湘赣边境起义失败后，日知会也败露了，刘静庵被捕，这位坚贞的革命者在武昌起义前夕病死狱中。日知会虽被查封，但它撒下的革命种子在顽强地生根发芽。1908年7月，一批倾向革命的士兵组织起湖北军队同盟会，这个团体虽然只存在了五个月，但再度引发了新军士兵的革命热情。这年12月，杨王鹏、钟琦等人发起成立群治学社。1910年，湖南发生抢米风潮，传言长沙已被革命党控制，群治学社谋划起义响应，风声外泄，这个团体难以开展活动。杨王鹏等人毫不气馁，又在9月组织起了振武学社，不久振武学社的活动被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察觉。黎元洪不愿扩大事态，将杨王鹏等人开除了事，振武学社转由蒋翊武主持。

为避免清吏的注意，蒋翊武决定以研究文学为名成立一个文学社。1911年初，文学社正式成立，蒋翊武任社长，詹大悲、刘复基等人分任各部负责人。文学社继续在新军中积极活动，并以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为宣传的号角，传播革命思想。到7月止，文学社在新军中已经发展了3000名社员。

湖北共进会是当时的又一重要革命团体。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致力于在南方边境地区发动起义，而不太重视在长江流域搞武装斗争，这就使得部分长江流域省份的同盟会员心怀怨气。1907年8月，张伯祥、居正、刘公、焦达峰、陈作新、邓文辉等在日本成立了共进会。共进会的宗旨和三民主义有些不同，它并不注重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仅仅突出民族主义，而且还把同盟会誓词里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共进会之所以做如此变动，是想以排满为号召，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因为在他们看来，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暂时还只是一种美好的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想。1909年初，共进会的骨干孙武、焦达峰回到武汉，着手联络会党，很快组织了五支以刘公为大都督的会党军队，准备发动起义。但这几支小规模的会党军队并不能互为声援，相继失败，孙武不得不暂时作罢，离鄂赴粤。1910年夏，孙武返回武汉，适逢刘公从日本归来，于是第二年初，他们在武昌胭脂巷24号设立秘密机关，把工作的重心从联络会党转到运动新军上，由会员邓玉麟出面开了一家同兴酒楼，专事联络新军士兵。共进会很快就在新军中发展了2000名会员。

尽管文学社和共进会有着相同的革命目标，但开始的时候两个团体之间并不互通声息。文学社的负责人主要是出身贫寒的士兵，共进会的首领多是富家子弟和留日学生，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分歧和隔膜。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两团体都想在长江流域策动起义，打开一个新局面，双方渐渐感到需要联合行动。1911年5月11日，两团体的代表举行了第一次磋商，迈出了合作的第一步。由于双方在联合后领导人选问题上各不相让，联合的协议还不能最后达成。

当时，在革命的方略问题上，同盟会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孙中山执著于在南方边境地区发动起义，而且起义总是旋起旋败，引起了相当一部分干部的不满。1910年，宋教仁在日本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他认为在京城和北方举事是上策，在长江流域举事是中策，而在边地举事是下策。他的中策得到了许多同志的赞同。这一时期东京同盟会总部实际上形同涣散。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南方支部也元气大损，几个主要领导人一时还不能走出失败的阴影。长江流域革命形势的发展，使部分同盟会员迫切感到需要建立一个领导机关。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他们发表宣言，认为以往历次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宣言中称“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总部设在上海，并先后在湖北、湖南、安徽、四川设立了分会。中部总会的主要领导人宋教仁很重视武汉三镇的革命工作，武汉三镇是九省通衢之所，在这里起义可以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而且这里的革命力量也相对雄厚。中部总会成立后，谭人凤溯江而上至武昌，与居正一起做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工作，促进它们的联合。

四川保路运动的迅猛发展，迫使清廷命令端方率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及第三十二标所属一个营入川，不久，又将第四十一标调赴宜昌、沙市、襄阳一带。新军的陆续外调使武汉三镇的革命党人心忧如焚，他们深知起义的绝好时机就在眼前，而新军一部分一部分地调走，会严重削弱革命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社和共进会迅速联合，1911年9月中旬，它们共同派居正和杨玉如为代表泛舟东下，请宋教仁、谭人凤赴鄂主持大计，并设法邀请在香港的黄兴。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在胭脂巷11号召开联合大会，共商起义计划，最后议定10月6日为起义日期，蒋翊武被推选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任参谋长，并确定了军政府的组成人选。战斗计划也详细拟定。起义之箭已经搭在弓上，蓄势待发了。

就在文学社、共进会召开联合会议的这天下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驻南湖的新军第八标炮队三营有两名士兵请假离营，一些士兵为他们设宴饯别，酒兴正酣时，忽遭一名排长的粗暴干涉，士兵们勃然奋起，在霍殿臣、赵楚屏的率领下，涌出军营，意欲拉炮攻城，因无炮弹，只好悻悻地弃炮而去。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要顾自己的脸面，不愿扩大事态，革命的力量暂时没有受到损失，但起义的风声终究泄露出去了，引起了清吏的警觉。湖广总督瑞

慌忙于10月3日召开县和管带以上文武官员参加的防务会议，决定调比较可靠的巡防营入城，令停泊在江面上的各舰升火待命，同时下令收缴一般新军士兵的子弹。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觉得如期起义成功的把握不大，加之湖南的焦达峰来电说准备不足，请求展期，起义总指挥部于是决定推迟至10月11日起义。

但是另一件意外的事情迫使革命党人在仓促中提前发动起义。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制造炸弹，不慎起火。孙武等人匆忙逃离现场，没来得及转移的文件被闻声而来的俄国巡捕搜去。与该机关毗邻的刘公的住所也遭到搜查，刘公逃脱，他的几名亲友则被捕去。俄租界捕房将搜查所获文件和被捕诸人转交清吏。瑞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立即下令紧闭城门，搜捕革命党人。刚刚返回武昌的蒋翊武这天正与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等人聚会，商量起义日期问题，突然得知宝善里机关出事，举座皆惊。刘复基提议马上发动起义，蒋翊武沉思良久，也觉得除此之外别无他策应急。于是在这天下午5时，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起义命令，规定在当晚12时由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新军同时行动。

但是负责向南湖炮队送信的邓玉麟没有及时将信送到。南湖炮队的炮声不响，其他各部不知情势有何变故，也不敢贸然发动。革命党人还在焦急的等待之中，瑞

却动手了。当天晚上，武昌各革命机关遭到军警查抄，蒋翊武侥幸地从军警的鼻子底下脱逃，而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被捕。瑞

命属吏连夜会审，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皆湖北革命党的中坚分子，他们坦然自认是革命党，次日早晨慷慨就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烈士的鲜血激励着他们的同志继起奋斗。

瑞

、张彪等磨刀霍霍，准备紧闭军营，按名册捉拿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形势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不仅革命士兵忧心如焚，就连未参加革命团体的士兵也人人自危，深恐受到牵连。而起义的指挥中心已不复存在，一时间士兵们找不到主心骨，他们就自行联络，相约于10月10日晚12时，由第三十一标举火为号，各营同时响应。当时士兵们的迫切情绪，可以从工程营总代表熊秉坤的一段话中得到反映。他说：“若我不先发制人，终必为人所制，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死耳，不如速发难！”“今日反亦死，不反亦死，大丈夫能惊天动地，虽死犹烈！”

当晚7时许，驻扎在城外塘角的混成协炮、工、辎各队提前行动。

辎重队首先举火为号，炮队和工程队随即响应，他们拖着大炮向城内进发，路上与第八镇马、炮各队汇合，一起直逼中和门。在城内，驻中和门内、紫阳湖畔的第八镇工程第八营首先发动。士兵金兆龙、程定国等与前来查巡的一名排长发生冲突，程定国开枪击伤该排长。恰逢熊秉坤赶到，他见全营轰动，决定马上行动。几名军官闻变而来，堵在门口不让士兵们出去，士兵们将其击毙，其他军官不敢再拦阻了。由于营房中的弹药已被收缴殆尽，士兵们首先想到的是补充弹药，于是他们向邻近的楚望台军械库涌去。守卫这个军械库的恰好是工程营士兵，因而起义士兵很顺利地占领了该军械库。陆续汇集到楚望台的士兵约400人。部队的秩序一时十分混乱，熊秉坤感到难以控制局面，就把指挥权交给了队官吴兆麟。吴兆麟一面部署警戒，一面派人与其他部队的革命力量联络。

正在焦急等待中的其他各标各营听见枪声，纷起响应。第二十九、三十一、四十一标中的革命士兵行动起来了，测绘学堂的80名学生在李翊东的率领下赶往楚望台参加了起义。驻南湖炮队第八标参加起义的超过800人，这支最整齐的起义队伍拖着13门炮进了城，与混成协的炮队一起，在蛇山、凤凰山和中和门城楼等制高点建起炮兵阵地。

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共有官兵18000人，其中一部分由端方带领入川，一部分分驻外地，留守武昌的约7000人，参加起义的官兵约占1/3，其余的多采取中立观望的态度。瑞

和张彪控制着1500人的部队，他们龟缩在总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内，准备负隅顽抗，伺机反扑。当晚10时半以后，起义军开始向总督署发动进攻，但由于缺乏有效的领导和组织，起义军遇到了挫折，部分队伍仍旧退回了楚望台。但是进攻并没有停顿下来。午夜以后，起义军将督署附近的一座房舍点燃，黑暗之中火光冲天，蛇山上的炮兵因此看清了督署的位置，一炮比一炮打得准。瑞

吓得方寸大乱，在督署的围墙上钻了一个洞，在卫队的护送下仓皇出文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昌门，乘江清火轮遁往汉口，次日凌晨移居楚豫兵舰。瑞

一逃，张彪也就丧失了顽抗到底的信心，匆忙率辎重营逃往汉口刘家庙。拂晓时分，武昌城已在起义军的掌握之中了。江对岸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1日夜和12日控制了汉阳和汉口的大部分城区。武昌首义成功了！

起义军在一夜间取得了胜利，建立一个新政权，树立一个领导核心，成为摆在他们面前最迫切的问题。首义是由革命党发动的，政权也应顺理成章地由革命党人来掌握，但事实并非如此。革命的公认领袖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和宋教仁虽同意在武汉三镇起事，但他们希望长江各省同时发动，而且对武汉的革命力量并不抱十分乐观的态度，所以尽管湖北方面一催再催，二人均迟迟不愿前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主要领导人孙武、刘公、蒋翊武等人在起义前夕被迫藏的藏，逃的逃。这样，革命的领导力量暂时出现了一个空白。

10月11日上午，革命党人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陈宏诰、吴醒汉等在谘议局聚会，商议成立军政机构的事宜。大家都觉得需要一个地位显赫、声望卓著的人来充任都督，至于这个人是否属于革命党并不重要。有人提议让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来做都督，汤化龙虽然表示赞成革命，但以不懂军事为由拒绝任都督职。恰好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这时已被找出来了，正待在楚望台，于是派人将他拥至谘议局，决意让他来做这个都督。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中日甲午战争后，他投到张之洞门下，参与训练新军，并三次赴日考察军事。黎元洪给人一副忠厚长者的印象，治军也算有方，较得一般士兵的尊敬。但是黎元洪并不赞成革命，10日夜，他手刃了一名报信的革命士兵，力图弹压部众，后来见大势已去，就跑到一位朋友家躲藏起来。现在革命党人要拥戴他做都督，黎元洪觉得凶多吉少，坚决不答允，连声嚷嚷：“莫害我！”革命党人李翊东不管他是否答应，代他在安民告示上签了一个“黎”字。不久，署名“中华民国军政府都督黎”的告

示就贴遍了武昌城。

随后，军政府的架子渐次搭起来了。参谋部、交通部、军需部、书记部、民政部、测量部、稽查部、外交部纷然成立。但是开头几天，这个军政府还没有正常运转起来。都督黎元洪终日枯坐，不发一言，形同木偶一般。各级官长，各种职员，或由人推举，或毛遂自荐；军政府的机构和人员日益增多，显得乱糟糟的，好像人人都可以做主，又人人都做不了主。这期间参谋部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部创立最早，正、副部长由旧军官杨开甲、张景良充任，二人惊魂未定，根本不管事；真正负责的是一批充当参谋的革命党人，如蔡济民、邓玉麟、张振武、胡瑛等。他们实际上是军政府的灵魂，民政、军政、外交方面的策划都出自他们之手。

沉默了两天的黎元洪见革命的声势很盛，也开口说话了，他甚至剪掉了辫子，以示参与革命的决心。立宪派的汤化龙、胡瑞霖早就表示要“咸与革命”，10月14日夜，汤化龙等人起草了一份《军政府暂行条例》，规定军政府设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各部须听命于都督；政事部下设内务、外务、财政、交通、司法、文书、编制七局。这个旨在加强都督权力的方案当然得到了黎元洪的首肯，新到武昌的重要革命党人居正急欲建立一个有序的政府，也出面劝说革命党人接受了这个方案。军政府按该方案重新改组，在各部、局长官中，除军务部部长为革命党人孙武外，其余的位置都由立宪派和旧军官占据了。另外一个重要革命党人刘公做了有名无实的总监察。10月17日，黎元洪在阅马场登坛誓师，由谭人凤给他授旗授剑。这套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仪式进一步巩固了黎元洪的地位。

革命党毕竟不满意大权旁落，他们在10月25日促使军政府再次开会，修改《军政府暂行条例》，重新安排人事。此次改组，将政事部取消，所属各局升格为部，这样军政府就有军令、军务、参谋、内务、外交、理财、交通、司法、编制九部。革命党人充任了其中的多数部长。此次改组，革命党从立宪派和旧军官的手中夺回了部分失去的权力，但仍旧没有削弱黎元洪总揽全局的大权。

在湖北军政府建立的同时，汉口成立了以詹大悲为主任的军政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府，汉阳也建立了以李亚东任知府的革命政权。汉口、汉阳的这两个政权完全在革命党的掌握之中。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做了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作，如通电全国，宣告武昌光复；派员与各国驻汉口领事交涉，要求各国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清除内奸，消弭隐患；稳定金融秩序，保护工商业。但工作的重点放在整军备战上。当时军政府控制的军队仅3000人，于是从10月13日起加紧募兵，将军队扩编为四协，由宋锡全、何锡藩、邓玉麟、张廷辅任协统；后来又扩充了四个协。在扩军的同时，又加紧赶造武器弹药，汉阳兵工厂工人夜以继日地工作，以确保革命军的军火供给。清军的反扑迫在眉睫，武汉又是四战之地，极难防守，所以军政府在军事上也事先做了一定部署。

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的消息传至北京，清廷在一片慌乱之中作出了本能的反应。10月12日，清廷谕令瑞

、张彪革职留任，戴罪图功。由于南方新军大都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清廷只得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北洋六镇身上。10月12日，清廷下令陆军大臣荫昌统帅第一军（包括第四镇、第三混成协、第十一混成协）火速南下，军谘使冯国璋率第二军（包括第五旗、第五混成协、第三十九混成协）听候调用。清廷又命令萨镇冰率领海军舰队溯江而上，准备水陆夹击武汉的革命军。

北洋军是在袁世凯的苦心经营下创立起来的，尽管两年多以前摄政王载沣将袁世凯一脚踢出了朝廷，但是袁世凯的影响并未消除，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文武亲信仍然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袁世凯本人在河南彰德做出一副“垂钓洹水”的逍遥模样，其实内心时刻盼望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这次机会终于来了。南下的北洋军队在袁世凯的暗中指使下，行动起来故意慢吞吞的，目的在于向清廷表明：除了袁世凯，谁也甭想指挥我！与袁世凯串通一气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主张起用袁世凯，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深感清廷无能，也发出了一串非袁世凯不能收拾局面的论调。摄政王载沣无奈，只得于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

总督。但载沣并不愿意放虎归山，在指挥北洋军的问题上，只给袁世凯“会同调遣”的权力，明摆着让他做荫昌的副手。

袁世凯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他嫌清廷给他的权力太小，于是以足疾未痊、痰喘病忽又发作为借口，拖延着不肯走马上任。袁世凯不出山，北洋军各将领也就不卖力打仗，明显占优势的北洋军在前线居然时有败退的迹象。奕劻派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微服出京潜往彰德劝说，袁世凯就通过奕劻和徐世昌之口，向清廷提出了六项条件：①明年即开国会；②组织责任内阁；③宽容参与此次事变诸人；④解除党禁；⑤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编制军队的全权；⑥须供给充足的军费。六项条件的实质，是要清廷赋予他政治和军事全权，同时也表明袁世凯想用战争以外的方式来对付革命军。此时，湘、陕、赣诸省相继宣告独立，革命阵营的力量迅猛壮大，载沣在四面楚歌中被迫吞下了袁世凯给他的这颗苦果。10月27日这天，清廷接连发布了四道重要的谕令：调荫昌回京；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海陆各军；拨内帑银100万两为湖北军费；第一军改由冯国璋统率，第二军改由段祺瑞统率。

10月29日，山西太原爆发革命。同一天，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与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联名通电，要求召开国会，改组皇族内阁，实行宪政。驻石家庄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秘密与山西革命军接洽，拟出兵北京，并断南下北洋军的归路。一时间京城人心惶恐，清廷度日如年。袁世凯出面了，他一面命姜桂题、赵秉钧加强北京的防务，一面派人刺杀了吴禄贞，同时收买张绍曾的下属，逼走张绍曾，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帮助清廷渡过了难关。

10月30日，清廷颁布“罪己诏”，11月1日又宣布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假惺惺地推辞了一番，于11月13日北上组阁，三天后公布了新内阁人选。毫无疑问，充任各部大臣的不是他的亲信，就是他的党羽。他还想把张謇和梁启超拉进内阁来，一则为了装点门面，二则为了和立宪派套近乎，但张、梁二人婉辞了他的一番“美意”。组阁后，袁世凯逐渐挤走了一帮握有军权的亲贵，并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配合下，迫使载沣交出摄政王的印信，退归藩邸。袁世凯调用冯国璋统率禁卫军，不久又借故把禁卫军调出北京，用新编的拱卫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军取代之。如此一来，袁世凯捞到了左右清廷的权力，具备了玩弄新的政治阴谋的资本。

至10月16日那天，大批北洋军已经集结在河南信阳，随时都可以发动进攻。保卫武汉三镇已成为革命军面临的最大最艰巨的任务。第二天，汉口领事团照会军政府，称他们将保持中立，加上海军提督萨镇冰向黎元洪作了“彼此心照，各尽其职”的暗示，革命军不必再担心来自江面上军舰的猛烈炮轰。10月18日拂晓，革命军第二协一部向盘踞在汉口刘家庙的张彪残部和河南军发起进攻。铁道工人拆毁了一段铁路，清军的一列满载援军的兵车飞驶而来，轰然脱轨翻倒，革命军乘机出击，清军大乱，纷然向滠口方向退却。第二天，革命军夺占了刘家庙江岸车站，并乘胜追至三道桥。此后四五天，革命军和清军在三道桥至刘家庙一带对峙，互有攻守。10月24日，黎元洪改派张景良任汉口方面的临时总指挥。张景良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原来是湖北新军中的一名标统，对革命素抱恶感。这时候他跳出来要求去前线领兵杀敌，显然别有用心。黎元洪轻信了他的话，委以重任。张景良渡江后在刘家庙装模作样地设了一个总司令部，但迟迟拿不出或战或守的作战计划。10月27日晨，清军三个协的优势兵力自滠口方面猛扑过来，革命军节节抵御，战斗正酣时，张景良却溜得连人影也找不见了。后来有人发现他正在一家旅馆与清军的一个参谋密谈，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立即将其逮捕，砍掉了这个通敌者的脑袋。打到第二天，形势对革命越来越不利，由于战士大多是新兵，缺乏训练，因而阵亡者数以千计，指挥官也很匮乏，尤其缺乏一个能总揽全局的高级指挥员，使得各部往往不能协同配合，打得没有章法。

恰好此时，黄兴赶到了武昌。早在10月2日，居留香港的黄兴就与湖北革命党代表吕志伊见了面，吕志伊是受委托前来邀黄兴赴武汉主持起义事宜的。黄兴虽然赞成在武汉起义，但不同意马上发动，一方面他按照老习惯还想先筹一笔经费，另一方面想策动长江各省同时举事。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还在香港滞留了几天，直到10月17日才启程经海道北上。他于10月23日抵上海，次日偕宋教仁等混在一支红十字救护队中乘船前往武昌。10月28日，黄兴一行人抵达武昌。革命的领袖人物虽然姗姗来迟，但立即起到了鼓舞士气的巨大作用。黎元洪下令做一面大旗，

上书“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这面旗子，骑马绕武昌及汉口未被清军占领的地方跑了一圈，军民欢声雷动，情绪立即高涨起来。

当天晚上，黄兴偕杨玺章、查光佛、蔡济民、徐达明等渡江，在汉口满春茶园设立司令部，布署防务。两天后，袁世凯自彰德南下，亲驻湖北孝感督师，冯国璋率北洋军1万多人猛攻汉口。此时坚守汉口的革命军仅是6000余疲惫之师，双方力量对比悬殊。黄兴电请军政府，杀了一位不听指挥的标统，又亲率敢死队上前线督阵，革命军渐渐稳住阵脚，死战不退。冯国璋于是在10月30日下令纵火烧城，清军乘着火势进攻，革命军与之展开激烈巷战。第二天，汉口军政分府撤退，詹大悲因和军政府的黎元洪、孙武有矛盾，不便回武昌，于是顺江东下到安徽去了。也就在这一天，汉口陷落，黄兴渡江返回武昌。清军放起的大火一直烧到11月4日，昔日繁华的汉口，竟有1/5的市区被焚为灰烬。

革命党人中间很大一部分对军政府的权力分配早就不满意，黄兴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完全由革命党控制政权的希望。于是由居正出面提议举黄兴为湖北湖南大都督。但以吴兆麟为代表的一批旧军官和立宪派竭力反对，他们认为把黄兴置于黎元洪之上会引起天下人的不平，会给敌人可乘之机。宋教仁见革命党难以对付这些已经立稳脚跟的实力派，为大局计，劝阻革命党人作罢。最后大家议定推举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节制各省军队。11月3日，黄兴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这天在阅马场上演了“登坛拜将”的一幕，由黎元洪授予黄兴印信、委任状和令箭。这套效法刘邦拜韩信为将的做法，表面上是要提高黄兴的威信，实际上在无形之中又抬高了黎元洪。在这场纷争之中，软弱的革命党又退让了一步。

汉口陷落，使保卫汉阳成为革命军的当务之急。黄兴不辞劳苦，当晚赴汉阳设立总司令部，拟定作战计划，布置军队。汉阳在武汉三镇中地势最高，如得汉阳，则汉口和武昌极易控制。此时各省纷然独立，从全国范围来说对清政府十分不利，袁世凯就想在武汉方面给革命军施加一些压力，迫使革命党与他和谈，因此要求冯国璋务必拿下汉阳。从革命军这方面来说，汉阳不但是武昌的屏障，而且还是军火的主要生产地，所以汉阳也是关键所在。黄兴名义上是总司令，实际上受到军务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部、参谋部的牵制，且革命军多新招之兵，训练、装备都跟不上，只有从湖南开来的两协援军有些战斗力。在作战计划上，革命军内部也不统一，孙武等人主张死守，黄兴主张以攻为守。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有利于革命军的事情，停泊在武汉江面的清海军舰队秘密下驶，途中宣布起义。至九江后，这支舰队一分为二：汤芗铭率第二舰队援鄂，第一舰队继续下驶，准备助攻南京。

从11月16日开始，双方交火。革命军一度向汉口方面出击，旋即失利。第二天清军展开攻势。在此后的10天里，革命军艰苦抵抗，但屡屡失利。由于王隆中所率湘军第一协在23日退出战场，革命军顿时失去主力部队，形势急转直下。到27日下午，汉阳陷落，黄兴返回武昌。当晚，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黄兴提议放弃武昌，顺江而下攻取南京，尔后北伐。多数革命党人强烈反对这种主张，表示要与武昌城同存亡！黄兴见再留武昌已无多大意义，于是立即乘船东去，希望在长江下游打开一个新局面。

袁世凯并不打算依靠武力来扑灭革命，他深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况且革命力量的存在，有利于突出他在清廷中的地位，若真把革命剿灭了，他自己也未必不会落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于是袁世凯打定主意，要利用清廷和革命党各自的力量威胁对方，他自己从中猎取最大权益。早在10月下旬，袁世凯就命他的幕僚刘承恩以同乡的名义两次致书黎元洪，表示他愿意“早息兵争，以安百姓”。11月1日，袁世凯让刘承恩再次致书黎元洪，提出尽早和平了结，实行君主立宪。袁世凯的几番试探，立即引起了武昌方面的反应。黎元洪表示不反对和谈，但不赞成实行君主立宪，而是希望袁世凯支持共和。在写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中，他替袁世凯描绘了一幅诱人的前景：“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刚到武昌的黄兴也致函袁世凯，希望他能对清廷反戈一击，还说只要袁世凯这样干，那么“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袁世凯拿准了黎元洪等人的脉，志满意得地北上做他的内阁总理大臣去了。冯国璋攻下汉阳后，袁世凯一面令清军隔江炮击武昌，威吓革

命军；一面与帝国主义驻京使团联络，想打通和谈的门路。英国公使朱尔典与袁世凯的关系素来很深，他很快指示英国驻汉口领事戈飞出面调停。戈飞与冯国璋商议妥当，派人于12月1日过江传达他们拟定的停战条件。此时黎元洪已逃往离武昌90里远的葛店，坚守在武昌的孙武、蒋翊武、刘公诸人就以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在停战书上盖了章，接受了停战条件。按该停战书规定，双方停战3天。期满之后，双方商定又继续停战3天，随后又停战15天。实际上，从此武汉方面再无战事。黎元洪见局势稳定下来，又跑回了武昌城。此后，他逐渐赶走湖北军政府中的革命党人，俨然以民国元勋自居。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六 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临时政府

1 中华民国宣告诞生

武昌为首义之区，上海向来是革命活动的中心，筹建临时中央政府的倡导，几乎同时从两地发出。11月7日，湖北方面的黎元洪致电各省，征询建立中央政府的意见，两天后他正式通电各省，请派代表赴武昌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上海方面也早在酝酿组建中央机关，因一时没有合适的人来登高一呼，所以直到11月11日，才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和上海都督陈其美的名义，通电各省速派代表赴沪，仿照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的先例，设立一个临时会议机构，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方法：由各省旧谘议局选派代表一人，各省都督府派代表一人，两人均常驻上海；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议。第二天，又以苏、浙两省代表的名义，向各省发出了内容相似的电文，除了催促各地代表早日来沪外，还请各省公认伍廷芳、温宗尧为临时外交代表。

两方面通电的结果是：苏、浙、闽、湘、鲁、豫等省的代表汇集上海，而粤、桂、赣、鄂少数几省的代表则聚首武昌。11月15日，到达上海的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议，将会议的名称定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随后的几天里，他们又达成一致意见，承认湖北军政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由鄂军都督府执行中央政务；但决定仍以上海为会址，要求湖北方面速派代表赴沪。武昌方面对认定鄂军政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一条深感满意，但在代表会议地点的选择上依然不肯让步，派居正和陶凤集赴沪，邀请代表前往武昌。代表们商议之后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各省留代表一人驻上海，以便互相联络，其余代表则赴武昌。

当各省代表联袂赶到武昌时，汉阳已经失陷；整个武昌城，受到清军炮火的威胁，代表们只好转往汉口英租界，在一家名为顺昌的洋行里开会。会议从11月底开始，至12月3日，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个《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共3章21条，第一章规定临时大总统的职权，第二章规定参议院的组织程序及权力，第三章规定行政各部的

组织及权限。这个《大纲》初步勾勒出了临时中央政府的概貌，其目的在于促成临时中央政府尽早成立，因此它还不能面面俱到，有待进一步完善。

会议尚在进行之中，南京光复的消息传来了。南京是清政府两江总督的驻地，为清廷镇守东南的中枢所在，屯有重兵。驻南京的江南提督张勋对清廷特别忠心，他掌握着20个营的江防部队。由于有张勋在背后撑腰，两江总督张人骏拒绝了立宪派绅士要他宣布独立的请求。周围地区都相继宣告独立，南京成了一颗楔入革命势力范围内的钉子。驻南京地区的新军第九镇是一支精锐之师，统制徐绍桢是一位半途弃文从武的旧军人，本来和革命没有丝毫的关系，但张人骏、张勋等人对新军疑心重重，再三刁难，徐绍桢起初隐忍不发，但看到革命形势大盛，加之他本人差点遇刺，所以决定起义。11月8日，新军第九镇誓师秣陵关，兵分三路攻击南京。失利后，徐绍桢率部退往镇江一带。就在南京新军起义的头一天，驻镇江的第九镇第三十五标发动起义，建立了以营长林述庆为都督的军政府。

11月中旬，沪督陈其美、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发起组建江浙联军，徐绍桢被推举为联军总司令。联军分四路进攻南京，张勋顽抗了十来天，见抵挡不住，于12月1日晚率部渡江北逃，张人骏也溜走了。12月2日，南京城遂告克复。

南京方面的胜利对于革命阵营而言是个大喜讯，聚集在武汉的各省代表正发愁如果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武昌，势必受到清军的直接威胁。闻讯后，他们立即议决以南京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相约各代表于一星期内齐集南京，只须10省以上代表到达，即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

上海方面的宋教仁、陈其美等人本来就担心，以武昌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可能导致同盟会无法控制中央政权，南京的克复给他们带来了机会。宋、陈等暗中鼓励滞留上海的代表，在12月4日召开了一个共和联合大会，议定从速在南京组建临时中央政府，并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这个选举结果虽然有利于同盟会，却引起了许多立宪派要人和旧官僚的不满，他们鼓噪起来替黎元洪鸣不平，反对把刚刚在武汉吃了败仗的黄兴置于“劳苦功高”的黎元洪之上。在这种情况下，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兴再三推辞，不肯就任大元帅之职，表示愿意领兵北伐，完成多年来的夙愿。经过陈其美等人的力劝，黄兴才答应暂时勉任大元帅。

在武昌的黎元洪得悉上海方面的选举结果，再也沉不住气了，恰好尚未离开武汉的代表也不满意上海方面的行动，请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发电谴责。黎元洪就顺水推舟电告上海方面，要求取消选举结果。

12月12日，14省代表齐集南京，两天后议定在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这时候从武昌传来了一个消息：清廷的议和代表唐绍仪抵达武昌，私下里向黎元洪转达了袁世凯赞同共和的表示。既然袁世凯露出了这样的口风，代表们马上议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转而承认前些天上海方面选举产生的大元帅和副元帅，并决定由大元帅暂行大总统职权。这实际上是向袁世凯表示：只要你反正，大总统的宝座就非你莫属。但是黄兴坚决不答允就任大元帅，一方面因为黎元洪一派的势力反对，另一方面因为他得知孙中山已在归国途中，有意将最高领导人的地位留给孙中山。于是代表聚议，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由于黎元洪不能从武昌脱身，就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

临时中央政府的组建，之所以一波三折，迟迟没有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一方面是在等待南北和议的进展，如果过早地抬出一个国家元首，可能会惹恼袁世凯，那么袁世凯就会缩回和谈之手；另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革命营垒已变得相当复杂，除了同盟会外，还有立宪派和旧官僚混迹其中，而且部分革命党人也被非革命势力同化了。几股力量在争夺最高领导权的问题上很难求得共识，哪一方也提不出令各方均满意的国家元首人选。这时候，公认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回国，立即使这一矛盾烟消云散。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城镇里。他从当地的报纸上阅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立即敏感地意识到国内革命形势高涨起来了。孙中山冷静地认为他目前的首要任务不是回国驰骋疆场，而在于给未来的共和国打开一条外交上的生路。孙中山默察美、德、法、俄、英、日各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认为争取英国政府的支持是关键所在。于是孙中山横渡大西洋赴英，与四国银行团主任会

谈，磋商停止给清廷借款事宜，随后又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三项要求：停止清廷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援助清廷；取消各英属殖民地对他的放逐令，以便他取道回国。英国政府在口头上全部应允了这三项要求。孙中山还想同四国银行团协商，为革命政府借款，但未能成功。

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当时南北和议已进行了七八天，无论是同盟会内部，还是普通群众，革命意识和热情好像都在无声无息地减退。孙中山的到来立即鼓舞了人心，针对有关他携巨款回国资助革命军的谣传，孙中山当众表示：“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第二天，孙中山在他的寓所里召集同盟会的干部商讨组织临时政府的方案。素来倾慕西方政党内阁制的宋教仁极力主张临时中央政府采用内阁制，总统只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孙中山认为内阁制不适合于眼下非常时期，应当由实权在握的总统来执行革命大计。在座的黄兴、陈其美、张静江、汪精卫、马君武、居正等人一致赞同孙中山的主张，最后决定临时中央政府采用总统负责制。会毕，众人分头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

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集会，正式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候选人有孙中山、黄兴、黎元洪3人。每省1票，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赴南京就任。当晚11时，在总统府举行了简朴的就职典礼。孙中山宣读誓词说：“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孙中山下令定国名为“中华民国”，同时改用公元纪年。

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法律依据，就是一个月前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拟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只不过在选举大总统的前一天和孙中山就职后的第二天，代表会议又对《大纲》做了几点修改。修改的核心内容是增设副总统，将原定的行政五部扩大到九部。这次修改的目的，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于增加可供分配的位置，使各派势力相协调，以免造成本已不太稳固的联合阵营过早破裂。

1月3日，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同一天，孙中山提出了各部总长人选，代表会议讨论时，否决了内务总长宋教仁和教育总长章炳麟。宋教仁才华出众，在同盟会中锋头最健，这样的人物当然为立宪派和旧官僚势力所不容，代表们又揣测他一贯坚持内阁制的目的是要谋取总理的位子，于是更加忌恨他，所以宋教仁也就无法被代表会议通过了。孙中山对人选做了适当调整，最终确定了各部总长和次长名单（见表1）。

表1 临时中央政府各部总长、次长名单

与此同时，孙中山还任命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

1月28日，作为立法机构的参议院也宣告成立。至此，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算是有模有样了。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中央政权？在孙中山任命的各部总长中，立宪名流和清朝故吏达6人之多，而只有黄兴、王宠惠和蔡元培3人是同盟会成员。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旧势力占优势的政权，充其量是个革命党与立宪派、旧官僚的联合政权。但是孙中山在组织临时政府时，始终把握着一个尺度，即“部长取名，次长取实”。各部次长除汤芗铭已退出同盟会外，其余都是同盟会中的骨干人物。实际上，立宪派和旧官僚出身的总长都采取不合作态度，支撑起临时政府的是孙中山、黄兴和他们身边的革命党人。再看看参议院，在43名议员中，同盟会会员达33人之多，占有绝对优势。因此，这个政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南京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

在就职典礼上，孙中山还发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阐述了他的施政方针。孙中山表示：“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在内政方面，孙中山强调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和财政统一；在外交方面，孙中山强调：“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革命党人一朝政权在握，恨不得在一个早晨就把他们救国救民的理想落到实处，让千疮百孔的中国焕然一新。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只存在了三个月，却颁布了众多的法令、法规。

涤荡专制余毒、保障人权是临时政府采取的重要除旧措施，包括限期剪辫（因为辫子是清朝专制的象征）、劝禁妇女缠足、禁止刑讯、禁止买卖人口、禁止贩卖“猪仔”（被卖到海外的劳工）、严禁鸦片、禁止赌博，以及废除跪拜礼，改行鞠躬礼，废除“大人”和“老爷”之类的称呼，官员改称其职份，民间普通人之间则称“先生”或“君”等。

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是一个国家富强的根本，临时政府在这方面倾注了不少心血。在中央设实业部，在各省要求成立实业公司，准允民间设立实业团体，鼓励工商界开办厂矿，鼓励华侨回国投资，拟定开办各类农业银行的计划。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改革教育，也是临时政府施政的重点之一。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各级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课程的设置，依学校的等级和种类不同而变化，但一律废止教授《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等有碍民国精神的科目。女性的教育也受到重视，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同时，鼓励设立各种女校。教育总长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

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意在以这五个方面来代替封建教育。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教育思想在教育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个政府制定了许多比较好的政策和法令，还只能说明这个政府富有美好的理想；至于这些政策和法令能否得到扎实的推行，最终取决于该政府是不是坚强有力。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许多资产阶级性质的政策和法令虽然对后来的中国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但这个政府不是坚强有力的政府，因而这些政策和法令在当时还仅仅是纸上谈兵。

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就面临着重重困难。外交和财政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使得它步履维艰。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近代中国灾难深重的祸根。可是不仅行将覆灭的清廷把列强的干涉视为救命稻草，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把列强当作他的后台老板，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的南京临时政府，也把能否得到各国的承认看做决定中华民国生死存亡的关键。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一直是同盟会的致命弱点之一，尽管从列强那里得不到半分援助，得到的只是屈辱，但同盟会就是不敢正大光明地举起反帝的旗帜。南京临时政府继承了同盟会的这一弱点，在它发表的《宣告友邦书》中，承认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所有条约，清政府所借外债、所欠赔款和各国在华特权一概有效，仅仅申明不平等条约期满为止。南京临时政府之所以主动承认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目的在于争取早日得到各国承认，甚至幻想列强帮革命派撑撑腰，以便尽早实现共和。尽管南京临时政府表现得再“友好”不过，但是帝国主义列强还是拒绝承认它。列强选择了袁世凯作为扶持对象，一心一意要把袁世凯推上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为奴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目的，去扶持这个国家和民族中腐朽和反动的势力，这是列强的一贯伎俩。

外交上频频碰壁，财政方面更是一筹莫展。南京一带军队云集，不管是抱着真正的革命目的前来的，还是来投机的，天天围着陆军部索要粮饷，急得陆军部总长黄兴“寝食俱废，至于吐血”。政府方面，每添一职、每设一机构都涉及钱的问题。各项开支加起来，南京临时政府每日所需费用近百万元。财政支出如此巨大，财政收入又来自何方呢？地丁等常税已宣布减免；各省不仅不从财政上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反而纷纷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向它伸手要款；海关税收被列强把持着，它们拒绝缴付；两淮盐税控制在张謇手中，他堂而皇之地以避免外交困难为借口，坚决不答应挪用；发行公债，效果也很不理想，而且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财源何在？南京临时政府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举借外债上。借款度日是清廷沦为列强奴仆、出卖主权的一大原因，现在南京临时政府被迫走上借外债这根钢丝绳，实在是冒着极大风险。孙中山曾经谈过举借外债三原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但是这种外债在当时是无法借到的，列强之所以借款给中国，看上的就是种种附加利益。南京临时政府无奈，只得抵押苏浙路，从日本借款300万元；不久又与日本签订密约，以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为条件，从日本借款500万元，实际上已收到200万元。消息传出，舆论大哗，立宪派和旧官僚群起攻击，甚至革命党中也有不少人相诘难，闹得南京临时政府被动万分。

然而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革命营垒内部。一个革命的中央政权刚刚诞生，急需一个强大的革命组织来做它的后盾，但此时的同盟会，几乎陷于瓦解状态，已经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了。同盟会的涣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本来就是许多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的。成分的复杂，必然带来思想的驳杂，必然带来利益的冲突，因此在它成立之初，就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1907年以后，光复会首先从同盟会中分裂出去；随后长江流域的部分同盟会员又组织起共进会，虽然没有明说脱离同盟会，但它的独立性是十分明显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的涣散更加日胜一日。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不仅组织上四分五裂，而且革命精神也消磨殆尽，甚至部分会员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旧势力同化了。

1912年1月，章炳麟正式脱离同盟会，他拉上程德全、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3月份，他又将这个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名为统一党。章炳麟俨然以在野党领袖的身份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项举措品头论足，攻击起来不遗余力。也正是章炳麟，首先发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怪论，得到张謇等人的附和。昔日革命的大将，今天居然要拆革命的台，的确令亲者痛，仇者快。

革命还远未取得胜利，革命营垒内部就上演了争权夺利的一幕。孙武是湖北著名的革命党人，由于未能在南京临时政府中谋得部长的职务，一气之下宣布脱离同盟会，拉了一帮子人拥戴黎元洪成立了民社，无形之中削弱了同盟会的力量，给黎元洪壮了声势。黎元洪此时羽翼已经丰满，这位被迫卷入革命阵营的旧势力代表虽然显得比较安分，而且还在1912年3月被推选为同盟会协理，但他和革命始终是有隔膜的。他非常赞同章炳麟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而且进一步倡言：“共和国立，革命军消。”在南北和谈中，黎元洪是帮袁世凯说话的。

此时，同盟会中还流行一种“功成身退”的说法。天真的革命者深怕背上革命是为了功名富贵的骂名，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白一旦达成共和，他们将悄然引退，散居山野。革命的目的远未达到，革命者却在谈论归隐的事，一方面或许真实地体现了他们人格的高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的革命勇气不足和政治经验贫乏。

种种情形，正如孙中山后来所总结的那样：“维时官僚之势力渐张，而党人之朝气渐馁；只图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骤减冒险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将顺，而渐被同化矣！以是对于开国之进行，多附官僚之主张，而不顾入党之信誓。”

旧势力尚在虎视眈眈，革命派却自己先软了腿。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临时约法》的制定

清帝的退位诏书，出自袁世凯的老朋友张謇之手，诏书说：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方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显而易见，袁世凯打算通过一纸诏书给天下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他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权力得自清廷，而与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没有半点关系。诏书颁布的当天，袁世凯俨然以临时共和政府首脑的身份，将诏书副本照知各国驻北京使节，并下令将原内阁中的各部大臣，改称为各部首脑，照旧供职。袁世凯的瞒天过海之计引起了孙中山的警惕，他电告袁世凯：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袁世凯却回答说，清帝的委任与否已经不重要了，他已承北方各省军队和全蒙代表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了。袁世凯的心思再明白不过：我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并不需要你们革命党人的抬举。

但是袁世凯并不糊涂，他知道要做临时大总统，还非得骗取南京临时政府的信任不可。就在清帝宣布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就急不可待地表白自己的心迹。他电告南京临时政府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袁世凯是要让孙中山等人放心，他是绝对赞成民主共和的。

对于袁世凯的政治品格，孙中山心里是有底的：他昨天可以出卖康、梁，难保他明天不出卖共和！因此孙中山并不放心让袁世凯这类人物来做新生的共和国的掌舵人。但是历史的抉择并不能由个人说了算，而且孙中山终究也必须服从他所属的阶级和营垒，而站在他背后的阶级和营垒恰恰是软弱的、不成熟的。这正是悲剧的根！正如孙中山后来所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说：“我所信赖的一些朋友们，在当时比我对中国内部关系更有确切的知识，他们以袁世凯得外国列强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我。”早在议和时，孙中山的助手之一汪精卫，就攻击孙中山反对和议是舍不得总统的位置。在一片妥协的氛围之中，孙中山也不得不接受把临时大总统默许给袁世凯的既成事实。也就在清帝宣布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向参议院提交了辞呈。他说：“当缔造民国之始，本总统被选为公仆，宣言誓书，实以倾覆专制，巩固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为任。誓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本总统即行辞职。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民国为各国承认，旦夕可期。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为了实践对袁世凯的承诺，孙中山还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他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其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成共和。举为总统，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

孙中山在提交辞呈的同时，附加了三个条件：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这三个条件都是针对袁世凯而设的防线，但是这三道防线是脆弱的，它们并不能缚住袁世凯的手脚。

在孙中山提出以上三项条件的时候，《临时约法》尚在紧张的制定之中。1911年11月底12月初，各省代表在汉口制定了一个《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个粗糙的文件不能让人感到满意，许多人就酝酿重新制定一个宪法性质的文件来取代它。及至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南京参议院不得不加快制定《临时约法》的进程。从2月7日首次讨论至3月8日草成，前后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颁布。整个约法由7章共56条构成，第一章总纲、第二章人民、第三章参议院、第四章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第五章国务员、第六章法院、第七章附则。这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约法，基本上贯穿着西方资产阶级的那套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的

精神。

为什么要在短促的时间里制定出这个《临时约法》？这其中包含着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一番苦心。这个约法的特点，除了突出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之外，重点在于它扩大了参议院和内阁的权力，削弱了临时大总统的权力。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参议院对临时大总统有弹劾的权力；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同意；临时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也要经过参议院同意；国务员（即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临时大总统颁布法律及行政命令时，须由国务员副署……显然，这部《临时约法》是要把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的总统制变为责任内阁制。实行责任内阁制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宋教仁就狂热地鼓吹过，但那时不仅被一般人士反对，就是在同盟会内部也是响应者寥寥。孙中山当时明确赞成总统制，他在同盟会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大计。”时隔三个月，孙中山却坚持用法律的形式把内阁制确立下来，前后变化这样大，目的在于保住革命的果实。因为三个月前，南京临时政府在革命党人的掌握之中，总统制有利于迅速而果敢地推进革命；三个月后，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对于这样一位野心很大的人物就必须用内阁制来牵制他的行动。这是非常现实的政治权衡。

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及他们周围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熏陶的人们，对法律都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和迷信，以为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可以规范千变万化的人，即使这是一个完全丧失信义的人。他们想用一纸约法，让袁世凯服服帖帖地呆在共和的旗帜之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当时一些幼稚的外国报刊也发表评论，认为《临时约法》“务在制裁大总统，俾其不得专肆”，纷纷替袁世凯鸣不平，说“袁大总统也渐入于荆棘丛中，殊不易于排解矣”。只有袁世凯心里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因此他不动声色地接受了《临时约法》，准备用他谙熟的套路来一步步踢开这个绊脚石。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临时约法》虽不能缚住袁世凯膨胀的权力欲，但正如毛泽东所言，它“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它的革命性和民主性都是鲜明的。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根子扎得很深的国度，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试图把民主共和的精神用法律确定下来，去斩绝帝统，推翻专制，这是一个良好的尝试。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七 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产生了中华民国。如果只是把一个年幼的皇帝从宝座上轰走，那么辛亥革命就毫无意义了。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斩断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伟业。从秦至清，换了一朝又一朝，但帝统延绵不绝，不管谁做皇帝，中国都是一家一姓的私产。辛亥革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取代封建君主专制，从此“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段时期里，复辟的幽灵还在神州的上空徘徊，尽管还有像袁世凯这样的皇权迷，但是封建君主专制已成落叶，一去不复返了。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不仅是政治革命，也是思想革命。救亡图存、改造中国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旋律，几乎每个阶级都有杰出人物站出来，寻找着新的思想武器，试图改造或重造中国。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新派试图把部分西方政治之花嫁接在中国封建君主制的枯木上，洪秀全则想利用西方的宗教来装点传统的农民起义……种种努力，都是试图推动历史前进，但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思想上，它们或者完全失败，或者收效不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革命思想来武装自身，还努力把这种思想宣传到社会上去，掀起了冲决封建罗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任何一场政治革命，都以思想革命为先导，辛亥革命也不例外。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由此可以说，辛亥革命在思想上所引起的震动也波及中国社会的深层，从而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近代化。这是辛亥革命的又一贡献。

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又是不完全的，在胜利之中蕴含着失败。皇帝虽然被赶下了台，共和的牌子也亮了出来，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理想远远没有达到，盘踞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仍旧是封建余孽和大大小小的新、旧军阀，中国陷入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华民国虽然宣告诞生，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但是中华民族并没有从此站立起来，而是依旧受到帝国主义的奴役。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虽然受到冲击，但这种冲击是浅层的、非致命的，所以才有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打起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既是资产阶级新民主运动的先声，也是给辛亥革命补课。

辛亥革命没有能解决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矛盾，即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专制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是一次没有达到目的、失败了的革命。

一次成功的革命，往往需要一个强大的阶级，或几个阶级的联合来做后盾。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是孱弱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儿先天不足。她不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产物，她不但不能从母体内吸收充足的养料，反而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欺凌。从理论上讲，这个阶级自身还没有积聚起发动一场革命的强大推动力量，革命缺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力量的后援。但是，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机，把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让她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任。中国资产阶级的先知者，就是接受过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文化洗礼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救亡而摇旗呐喊，造成刻不容缓的声势。他们的思想走到了整个阶级的前面，他们点燃的火苗因为缺乏足够的燃料和氧气而不能熊熊燃烧。

问题还在于，中国资产阶级并不是作为一个阶级整体投入到辛亥革命中去的。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取向上分裂为两大阵营：改良派和革命派。从19世纪90年代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后一段时期内，革命派和改良派并立于中国政治舞台上。1900年前后，两派（主要是革命派）试图走联合的道路，但终因主张不同、立场有别而分道扬镳，继而发展到互相排斥和攻击。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就孱弱，两派之间势同水火的内斗又严重削弱了这个阶级的整体力量。清廷的皇族内阁出台以后，尤其武昌起义爆发后，改良派似乎逐渐靠拢革命乃至汇入革命的潮流之中，这虽然壮大了反清的力量，但改良派并不是向革命派输诚，他们是带着整套改良主张进入革命阵营的，这样一来，革命也就被打上了改良和妥协的烙印。

单就革命派本身而言，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1905年出现了同盟会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尽管同盟会有公认的领袖、共同的纲领、完整的结构，但其内部的分裂倾向愈演愈烈。本来同盟会就是全国各革命团体联合组成的，地域的不同、思想的分歧和革命方法的不尽一致，这几大因素膨胀起来必然导致分裂。三民主义是同盟会的纲领，但不是三民主义的每一个方面都为其全体成员所接受，很多人参加同盟会，或者是抱着一民主义，或者是抱着二民主义来的。民族主义即反满，为全体革命者接受，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却并非如此。在革命的方法问题上，有人主张边地革命，有人主张中部革命，也有人主张中央革命，还有人主张个人暗杀活动。同盟会虽然拥有像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领袖人物，但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屡屡受到冲击，实际上从1908年至武昌起义爆发，他很少过问同盟会本部的事情，也不愿意以同盟会的名义进行活动。

从1907年第一次倒孙高潮起，同盟会逐渐陷入一种分裂、涣散和瓦解的状态。显然，这样一个虚弱的政党是无法领导革命取得彻底成功的。

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先进代表的革命派，自然也无法摆脱这个阶级的缺陷。包括孙中山在内，大多数的革命党人都对帝国主义列强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天真地以为能从列强那里得到援助。孙中山在海外奔走16年，辗转于列强门下，得到的不是援助，只是冷漠和屈辱，倒是各国人民，给予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帮助。革命派不仅幻想得到列强的援助，更害怕革命真地会如改良派所说招致列强的干涉，这是他们内心最恐惧的事情。尽管革命派能够认识到帝国主义是带给中国灾难的元凶，却不敢站出来喊一声“打倒帝国主义”，反而要承认列强取得的在华种种特权。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尽管历史步入近代，农民已不是最先进的阶级，但在他们中间仍然蕴藏着扭转乾坤的力量。在中国，谁发动了农民，谁取得了农民的支持，谁就掌握了革命的主动权和制胜的力量。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恰恰没有发动农民阶级。革命派心目中的理想革命是一种有秩序的、文明的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发动起来，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因此，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局限于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中等阶层，包括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阶层以及少数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广大乡村依然笼罩在封建礼教的黑暗之中，农民和革命派始终是隔膜的。土地问题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但无论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还是章炳麟的均田思想，都带有空想的因素，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再看看革命派的对手清政府。中国封建社会以其稳定性而著称，这种稳定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内部调整。康、乾盛世以降，清朝虽然显露出末世的衰败景象，但以皇室为核心的统治阶级仍然在顽强调整他们的统治秩序。1840年以后，清朝统治阶级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一直在不停地调整他们的统治方法乃至统治思想。太平天国运动后兴起的洋务运动、20世纪初开始的新政、1906年以后的筹备宪政，都是这种调整的表现。调整的结果，虽然不能改变其垂亡的趋势，虽然跟不上历史前进的步伐，但毕竟加强了他们的力量，从而也就增大了革命的阻力。清末北洋集团的崛起，就是这一系列调整的产物，它是革命派最强悍的对手。革命派通过辛亥革命组织起来的南京临时政府，终于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一步步篡夺过去。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集团的黑暗统治及其后的军阀混战掩盖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在此，其悲剧性也在此。

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

辛亥革命有它伟大成功的地方，也有它失败悲剧之所在。但是，回顾、总结这一页历史，我们还是要说，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进程中绚丽的一页，是中国人民追求解放的壮丽的一幕。这次革命彪炳青史！这次革命中的英雄们舍生取义，勇往直前，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后人仰慕。辛亥革命英雄们的业绩永垂不朽！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参考书目

1.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3册，人民出版社，1980。

2.刘大年著《赤门谈史录——论辛亥革命的性质》，人民出版社，1981。

3.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下册，中华书局，1981。

4.金冲及、胡绳武著《辛亥革命史稿》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5、1991。

5.吴玉章著《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3。

6.尚明轩著《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81。

7.薛君度著《黄兴与辛亥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8.黎澍著《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9.张海鹏著《黄兴与武昌起义》，《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中国史话》总目录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中国史话》编辑委员会

主任 陈奎元

副主任 武寅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巍 刘庆柱

步平 张顺洪 张海鹏

陈祖武 陈高华 林甘泉

耿云志 廖学盛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作者小传

卞修跃

卞修跃，安徽寿县人，1966年10月出生。历史学博士、副编审。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要从事抗日战争史、侵华日军暴行史、中日战争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暨近代史资料搜集、编辑工作。著有《天理·人伦·世道》、《周震鳞传》（合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二卷，合著）等多部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编辑《抗日战争》（资料集，合编）等专题资料数百万字。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一 豆剖瓜分 话缘起细说大势

1 上帝与天尊的对垒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延绵不绝的优秀文化和传统，以及辉煌灿烂的历史，在人类发展史上，曾创造了无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光荣与骄傲，同时也使民族生生不息地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虽然早在盛唐时代，西方宗教即传入中国。但是，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都是以传统的儒、道、释三家精义作为自己信仰的依归。而每一个中国人也从来都是严谨地遵循着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而生活着、奋斗着、创造着。当一些心怀治平天下大志的人们希望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有一番积极进取时，源远流长而又博大精深的儒家精神就会在他们的心灵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从而引导他们自强不息地为社会工作，为天下生民谋福利；当一些人厌倦了尘世的喧嚣，想求得自身的解脱或心灵的宁静时，他们则又会皈依中国传统的道教或早已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佛教，栖息山林，逍遥江湖，修真参禅。

即便中国广大的基层民众更关心自己的实在生活，但这实在的生活却也是需要得到诸神的庇佑的。于是，他们对自己民族的传统宗教——道教——更有着最直接而浓厚的兴趣。这也是必然的，道教以先秦原始道家学派的主张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教义指归，从其创立伊始，就与下层民众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修道之士固然以得道成仙为自己宗教实践的最终目的，对道教的教规谨遵不渝，对三清道祖、玉皇天尊及天地间诸神顶礼膜拜；普通民众虽然对道教教义不甚了解，甚至也弄不清天庭之中三清道祖与玉皇大帝孰尊孰卑、先天诸神与圣哲之仙之间存在着何样的差别，更不去寻求自己的得道成仙，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高居天上的玉皇大帝就是宇宙间的最高尊神，他和他领导的三界诸神，洞察着人间的是非善恶，掌管着天下的吉凶祸福。因此，不管怎么说，他们相信，玉皇天尊与他们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最神秘而又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们要对其顶礼膜拜。

中国人有着自己的生活，有着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这种文化和宗教又正是与现实的生活协调一致的。所以，数千年间，中华民族的文明稳步地向前绵延传承，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断绝。

但是，这种情况在19世纪尤其是这一世纪之末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原因就是西方的“上帝”这时再也不甘心中国人千百年来对它的排斥，它逞起了自己一贯的独断和蛮横，凭借着自己西方子民的坚船利炮，踏海来到东方的中国，要把天尊的影响从中国人的信念之中驱逐出去，要把东方人从天尊的统辖下夺走，纳入自己子民之列。于是，这时的西方传教士们，一反往昔的卑躬，开始叫嚷“要为上帝征服中国”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大刀会偏不信邪

基督教的东传，由来已久。但是，基督教之三大教派——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是不尽相同的。基督教在其尚未分裂之前，曾经两度传入中国：最早的一次是在唐朝，当时基督教中的一支由波斯传入中国，称作景教；第二次是在元朝。虽然当时中国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优容了它的存在，但由于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人的传统信念格格不入，极少有人会对其加以理睬和信仰。于是，它的这两次传入也都自生自灭，如同一缕轻烟，在中国的天空中飘荡了一番后，消散净尽了。

明朝至清朝中期，基督教三大教派卷土重来，再一次传入中国。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耶稣会的方济格·沙勿略教士最早把天主教带入中国；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马·列昂节夫教士把东正教传入中国，并在北京建立教堂；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马礼逊教士又把基督新教传到了中国。这一时期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大多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怀着对上帝的无限忠贞和拯救“东方罪民”的慈悲之心，不远万里，跨越重洋，来到中国，要把“福音”传遍这一片拒绝上帝的土地，以说服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人民认识到自身的罪孽，自新获救，从而把中国的民众从他们自己所尊崇的神的掌握下争夺过来，使其皈依于万能的天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些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华语儒服，适应中国民族的心理和习俗，采取中国民众所能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教。与此同时，他们还带来了西方先进的近代科技知识，并兴办学校、医院和其他慈善机构。他们的这些作为，在客观上倒是推动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最早在中国的传播，而他们自己的事业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到明崇祯末年，天主教已遍布中国的各个重要地域；至1667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已有26万多人，教堂183座，教士住院53所；到1700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增至30余万人。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伴随着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的到来，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又一次大批涌入中国。从此，西方基督徒在中国的宗教活动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与英、法、俄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于条约中明文规定准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并给予他们许多特权。从此，洋教士们一反他们在此之前的传教方式，一变而为有着宗教文化的传播者和受到不平等条约保护的侵略者的双重身份：一方面，西方传教士以殖民主义者的坚船利炮作为自己传播福音的有力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作为自己的护符，在神州国土上，南北穿梭，无孔不入，强行推行“中华归主”；另一方面，西方殖民侵略者在凭借坚船利炮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武装侵略的同时，也相中了有着特殊身份的传教士们，有意识地对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加以利用，把西方教徒们所虔诚向往的“中华归主”现实化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和殖民地化。于是，到19世纪后半叶，在侵略中国的行列中，又增加了一支特别行动队，这就是身披教士服、手持福音书的洋教士们。大炮与《圣经》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两种最为重要的工具。

由于有不平等条约作护符，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洋教士们不需要再如以前那样迁就中国的习俗和文化，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肆无忌惮地横行开来。他们所到之处，霸占土地，强买强卖，网罗入教，聚敛财富，包揽词讼，欺凌官长，犯下了累累恶迹。教堂所在，也多成为凌驾于中国地方政权之上的权力中心，成为散布于中国各地的“国中之国”，对中国人民实行无厌的压迫和剥削。

不远千里踏海而来的传教士们，此时似乎忘记了自己的本分是要为天主在中国传播福音。他们有的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有的潜入中国内地或边陲，为全副武装的侵略者充当间谍刺探情报；有的深居幕后，为侵略者出谋划策，充当谋士；有的霸占田产，放高利贷，盘剥乡里；有的延揽劣绅无赖入教，欺凌百姓，甚至无端杀人。此外，各国传教士还与中国各地各级官吏分庭抗礼，逾越权柄，插手中国官场，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如此情形，不一而足。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洋教士们在中国更是无法无天，横行无忌。据不完全统计，到19世纪末，在中国的欧美天主教、耶稣教、俄国东正教等外籍传教士共3200多人，他们在中国的国土上建立教区40多个，教会60多个，延揽入教者达80余万人。这样一支庞大的教会势力，在当时中国民众的心目中，就是罪恶的渊薮，苦难的根源。而那些背叛了自己的祖先和天尊加入洋教的教民们，则被视作为虎作伥的仇敌。于是，中国

的广大民众，在饱受了侵略者的压迫和欺凌之后，慢慢开始觉悟，并起而抗争。而天主与天尊之争在现实中也从一般的民教冲突，走上了中国民众对西方入侵者更激烈的武装反抗之路。

甲午战争之后，第一次规模较大并直接推动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反洋教斗争，是山东曹县的大刀会起义。

1894年，当中日战争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山东、江苏、安徽交界地区，以山东曹县、单县为中心，兴起了一种名为“大刀会”的民间结社，其首领有曹县烧饼刘庄的监生刘士瑞和单县曹楼的曹得礼等。大刀会原是一支民间的武术团体，日常练习一种名为“金钟罩”或“铁布衫”的硬气功，据说功夫练成之后，能不怕刀砍斧剁、枪击炮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刀枪不入。这种硬气功发源很早，在中国武术史上早见记载，但由于它在清朝前期一直在八卦教的一些支派中传习，所以始终带有一些秘密宗教的气息。

列强对中国日益深刻的侵略和洋教士的横行无忌，加之地方土匪盛行，使下层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可是曹县刘士瑞等人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们在创立大刀会之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保卫家身”、“兴华灭洋”的宗旨。刘士瑞等带领着大刀会的会员们，凭着自己手中的大刀，与手持洋枪的土匪们展开过多次交锋，先后打败段瞎子、岳二米子等著名匪股，成为维护一方民众生活的有力保障。

1896年2月4日，以行医为生的大刀会成员郝和升到吕登士家讨还药费。吕登士一家尽入洋教，他倚仗有洋教庇护，赖账不给，双方当下发生口角。吕登士的族人吕莱指着郝和升的鼻子骂他是白莲教妖人，惹得郝和升勃然大怒，回口骂他为羊羔子教庇护下的匪人，双方愤愤而散。这本是一场小小的口角之争，两下相安也即无事。但是吕莱等入教之后，恃有靠山，动辄张口骂人，抬手打人，几时受得如此回敬，此番与郝和升的口角，令他十分光火，乃找到教堂的教师张连珠，添油加醋地把此事说了一番。张连珠亦非善类，当下带着一些无赖教徒，到赦和升门上寻衅，搅得郝家鸡犬不宁。郝和升无奈，只得找到大刀会首领曹得礼，告以此事。曹得礼因觉此事又涉民教利害，就去找刘士瑞商量。刘士瑞平日最恨洋教徒仗势欺人，一听此事，不禁心下冒火，当即率一批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大刀会员来到教堂，与张连珠理论。不料张连珠口出不逊，当场激怒了刘士瑞和其他大刀会会员。刘士瑞一声喝令，大刀会员们一拥而上，攀椽登房，立时拆毁了教堂。可这股怒气并没有散尽，于是，刘士瑞等沿途又把其他15座教堂概行拆毁。一时之间，洋教士们东躲西藏，无赖教民们也人心惶惶。

山东教区属德国天主教范围。德国驻华公使绅珂闻知此事后，即于4月14日致函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责令山东巡抚李秉衡查明此事，并对被毁教堂予以赔偿。此事尚未交涉完毕，刘士瑞又率领大刀会在山东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

在山东和江苏两省的交界处，有一片湖地，当地人称作湍地。按以往成例，这些湍地，谁开垦出来耕种，收获就归谁所有，不必向官府完粮纳税。砀山大刀会首领庞三杰在这里拥有不少湍地，年年耕种，颇有收成。地主刘苳臣一直对庞三杰的湍地心怀觊觎，但因庞三杰徒众势大，始终不得下手。刘苳臣加入洋教后，觉得有洋教撑腰，胆子便大了起来。1896年初夏时分，刘苳臣带人抢割庞三杰湍地里成熟的麦子。庞三杰找其说理，不得结果。庞三杰忍无可忍，乃致书刘士瑞，请其出面相助。刘士瑞得信后，即于6月15日派其子刘孔章和徒弟牛金声、彭智林、智效忠等人率领曹、单大刀会众一千余人前往砀山，自己则留在曹县组织大刀会各支同时起事，借机驱灭洋教。大刀会在砀山打垮了以刘苳臣为首的教会势力，并乘势拆毁了东湍子教堂。同一天，曹县、单县、砀山、丰县、亳州、虞城等州县的大刀会同时起义。他们首先赶到单县贾庄，拆毁教堂；16日，转至后河滩，17日开到赵庄，19日到达葛楼。沿途上大刀会拆毁洋教堂，抄没教民财产；21日各路大刀会队伍分路出击，拆毁数十处教堂，抢掠教民家产。至25日，大刀会开至江苏丰县的戴套楼，拆除当地教堂。所经之处，洋教堂尽化乌有，传教士和教民仓皇逃窜。与此同时，庞三杰、牛金声等大刀会首领，纠集会众500多人，于6月28日包围了单、砀两县交界的马良集，并于次日攻入集内，拆毁教堂，抢砸店铺，同时还砸毁了江南裁缺外委衙门。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动荡时期，下层民众就会自发地组织起来以保家卫乡，基而为谋求生路而与统治者展开武装斗争。当其初兴之

时，也许只在极小的地域范围内进行。一旦朝廷无力将其弹压下去的时候，它就必将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集团，对下层民众的哪怕是一点极小的骚动，也都不敢轻易放过；而那些参与起事的下层民众，在斗争过程中，也会由于其自身素质的固有局限，往往不大讲究斗争的策略和方式，从而使自身蒙受损失。

清政府虽然在屡经战败后，再也无力与列强抗衡，但是对于本国民众的越轨行为却还是要严加镇压的；只是不管这些民众缘何而起——毕竟在饱受了外患侵袭之后，孱弱不堪的清王朝再也经不起内部的动荡了。所以，只要还有些许的力量，它就得把一切意图动摇大清皇朝根基，或者是会令朝廷在中外交涉中处于被动难堪境地的民众闹事行为，严行镇压下去。6月24日，清廷得知大刀会反教起义后，立即电谕山东巡抚李秉衡，责令他速与江苏、安徽两省当局协商会剿。7月3日，清廷再度电令李秉衡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火速派出军队，对大刀会严加弹压。如果大刀会胆敢抗拒，则予就地剿灭。

但刘士瑞等人却就是胆敢抗拒，与前来弹压的清军刀兵相见。清廷得讯后，再次严令李秉衡和毓贤等实力会剿，不得留有后患。李秉衡奉有朝廷严令，自不敢稍事怠慢，当即严饬毓贤，会同兖沂道锡良驰往当地查办，并飞调候选道马开玉所部三营，分往曹县、单县和鱼台等处，会同原有清军相机弹压；同时，李秉衡还委派候补知府杨传书等人分往各处，随同前往开导弹压；兖州镇总兵田恩来带兵开往鱼台，与毓贤等人会商策应。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奉命派兵会剿。

大刀会只是一个有着松散组织的民间武术团体，激于一时义愤而抗教反洋。但它的势力尚不足与清廷的正规军相对抗。在李秉衡等人的大兵镇压下，大刀会成员死伤数百人，刘士瑞、曹得礼也分别于7月7日和11日被毓贤设法诱捕，遭到杀害。此后，大刀会起义转入低潮。

大刀会起义把清政府又一次推到外交上的难堪境地。列强每每会借民教冲突向清廷狮子大张口，勒索巨额赔款，使它难以应付。这一次，德国人也同样没有例外。经过一番交涉争执，最终还是由清政府责令地方当局送银抚恤各村受扰教民，建堂赔偿，具结此案。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虽然刘士瑞等人遭到杀害，由他们组织发起的大刀会反教起义也最终遭到了失败，但是，这次起义对山东乃至全国的反洋教斗争的开展和其后不久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很多大刀会成员在起义失败后转移到其他地区，并在各地点燃了反洋教斗争的熊熊烈火，成为各地反抗斗争的骨干力量。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威廉成了始作俑者

武装占领胶州湾之后，德国政府又从外交上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企图使自己对胶州湾的占领合法化。清政府本希望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从中进行调解。但是，威廉和尼古拉之间早有协议，清政府的这一想法只是痴人梦呓。英国、法国、日本等国虽然对德国的行为有所不满，但是它们也正可借此事端，寻得在中国劫夺新的利权的理由，自是任随清政府的乞求而不加理睬。清政府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已，只得接受了德国提出的处理巨野教案的方案和租借胶州湾的要求。1898年3月6日，李鸿章等人代表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通过这一条约，德国强行租借了胶州湾，并攫取了在山东境内修路、开矿、投资、驻兵等特权，山东省变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人强租胶州湾，拉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虽然中国经列强数十年武装侵略的打击而衰弱不堪，但是在侵略者眼中，中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矿产、巨大的市场、低廉的劳力，都是难得的财富。现在这个国家的政府已然容许了列强对她的瓜分，这个国家也露出了自己布满伤痕的胸膛，再也无力逃避强盗们的屠刀了。真是千载难得的机会！列强自是不甘放弃。它们磨牙吮血，要对中国苦痛的机体进行肆无忌惮的宰割了。

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俄国永远比其他国家都要迅捷而有力得多。在德国占领胶州湾后不久，1897年12月14日，俄舰以“助华”为名驶入旅顺口。但是，俄国在胶州问题上，并没有作出调解帮助的实际行动，使清政府觉察到俄、德两国是一个鼻孔出气：德国只不过是俄国的前驱，俄国正是紧步德国后尘而来的又一个强盗而已。没有错！当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向沙皇询问俄舰驶入旅顺口的意图时，尼古拉只是含糊其辞，左推右挡。次年3月3日，俄国驻华公使巴布罗福照会总理衙门，正式提出了租借旅顺、大连和修建中东铁路南满支线的要求。他以最后通牒式的口吻向清政府宣称：“限五日照复。”清政府眼见被自己一向认作“盟友”的俄国翻脸相逼，只得向英国和日本求援，均遭到拒绝。清政府再一次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等与巴布罗福分别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代表中、俄两国在北京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此后，许景澄等在俄国彼得堡与俄国外交部继续谈判，并于5月7日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通过这两个条约，俄国以租借的名义强占了中国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湾、旅顺口及其附近水域，同时获得了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的侵略特权；为了防止其他列强国家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插足，条约还把租借地以北的广大地区划归为“中立区”，这一地区的土地及东西两侧的通商口岸、路矿权利等，中国不复让于他国。这样，俄国把中国的整个东北地区攫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899年，俄国政府又擅自把租借地改称为“关东省”，设立总督，在这里实行殖民统治，企图永久地把中国的神圣国土分割出去。

法国也紧随俄国之后，急起直追，谋求在华南建立其势力范围。1898年3月13日，法国驻华代办吕班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就云南、广东、广西诸省作出不割让给他国的保证，同时允许法国由越南境内修建一条铁路支线直通中国的云南省，并由法国人管理中国的邮政。不久，吕班又向总理衙门提出了租借广州湾的要求。4月10日，清政府照会吕班，同意不向他国割让云南和两广，并租广州湾给法国。这样，广大的华南地区就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甲午战后，日本跻身于列强之列。从中国勒索的巨额赔偿，为其经济和军事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但是1895年的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使它在屈从中意识到自身的实力还远远不能与西欧列强对抗。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大规模扩建海军。到1898年，其陆军由战前的7万人增至17万人，海军舰艇的总吨位也增加了近40倍。这一切，都为其日后进一步对中国侵略，同欧洲列强在中国大陆进行角逐提供了条件。当此西方列强对中国肆无忌惮地进行瓜分之际，日本政府一见有机可乘，乃决定进一步扩大它在中国的侵略权益。1898年4月22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照会清政府总理衙门，正式要求清政府不把福建省割让或租给其他国家。他还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加以拒绝的话，则日本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应该采取的手段，中国则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清政府是被日本打怕了的，对于它的这一无理要求同样是不敢相拒，当天即照复日使，福建省不让于别国，承认福建省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同时，日本还取得了在福建省修建铁路的优先

权。次年，日本政府又逼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煤铁互售合同》，向湖北汉阳铁局和大冶铁矿渗透其势力，并通过修筑跨越福建、浙江、江西和湖北四省铁路的计划，扩大它对华中、华南的影响。与此同时，它还始终把侵略的目光盯向中国东北的广大地区。

俄、德、法、日等国在中国强占租借地、瓜分势力范围的活动，愈演愈烈，无可遏止，英国的在华优势受到极大的削弱。尽管如此，英国作为第一个敲开中华帝国大门的入侵者，在这列强瓜分中国的盛宴上，又岂甘向隅独坐？1898年初，英国强迫清政府同意不把长江流域诸省抵押、租借或割让给他国，开始着手建立它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同时，英国还分别于1898年6月9日和7月1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订租威海卫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分别作为它在南方与法国对抗和在北方与俄国对抗，维护其侵华霸权的基地。英国还向清政府提出，当英国还居于列强对华贸易之首位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则必须由英国人担任，欲图借此达到操纵中国财政大权的目的。

意大利也不甘寂寞。1899年3月初，意大利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三门湾、承认浙江省为其势力范围的要求。但是由于日本的强烈反对，其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接着，它又企图获得修建从三门湾到杭州的铁路权，也同样没有得逞。

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时，因相互间的利害冲突使它们的竞争异常激烈，矛盾也非常尖锐。但是由于当时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实力在中国建立独占的霸权，其他国家同样也不允许某一个国家在中国谋求建立起这种霸权，它们只能从中寻求一种相互的妥协。1898年9月，英国承认了德国在山东和黄河流域的权利；德国也立即承认了英国在长江流域和山西的权益。1899年4月，英、俄两国也就在中国投资及铁路建设的地区划分问题上达成妥协：英国不在长江以北地区谋取铁路的“租借权”，且不阻止俄国在这一地区的租借权；俄国对英国在长江流域也相应地作出同样的承诺。这样，在瓜分的盛宴快要完毕时，众强盗酒足饭饱，开始弹冠相庆了。

在瓜分中国的盛宴中，美国来晚了一步。但它别出心裁，采取了和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其他国家不同的侵略政策。

1880年以后，美国的工业生产超越了英国，位居世界首位。从此，美国的垄断资本家便野心勃勃地开始了海外殖民地的开拓。1898年，美国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夺取了关岛和菲律宾，并进一步把侵略目光转向了中国。最初，美国政府也企图在中国建立起势力范围和租借地，但它毕竟来晚了一步，肥田沃土已然分尽，自己再无可捞之地。于是它审时度势，最终决定凭借其在经济上的实力，在“机会均等”的竞争中建立起自己在华的霸权地位。从1898年9月到12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训令其驻英、俄、德、法、日等国大使，向各所驻国政府递交了同样内容的“门户开放”照会，它以承认列强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为前提，要求在列强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实行同等的关税、港口税和铁路运费，借此谋求美国在列强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享有与各国平等的待遇。

列强在中国角逐，每每会引起纷争，虽欲妥协而不获成功。此番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便给列强提供了一个共同妥协的方案。经过利害斟酌，英、俄、德、法、日、意等国都作出反应，对美国的这一主张表示赞同。从表面上看，美国在中国没有捞到一块“势力范围”。但在实际上，它的侵略触角却伸进了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每个国家在华势力范围都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虽然美国一再宣称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行是为了避免列强瓜分中国，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但是，正是这一门户开放政策，使中国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独立更加沦丧，中华民族愈加向灾难的深渊滑进！

这样，在19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中国的大部分领土沦陷为列强的势力范围：英国霸占着长江流域的平原地带和两广的一部分地区，强行租借了威海卫和九龙半岛；俄国占有着东北三省的大片土地，租借旅顺和大连湾；德国霸占着山东，强借胶州湾；日本则占据着福建省；法国获得了云南和两广的另外一部分，租借着广州湾；美国则通过其与列强达成的妥协，把其侵略目光盯向整个中国。此外，列强还通过逼迫清政府与之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展开了路权的争夺。角逐的结果：英国得到2800英里的筑路权，俄国得1500多英里，德国得720

英里，比利时得650英里，法国得420英里，美国则得300多英里。随着铁路的延伸，列强把其侵略的触角伸向中国领土的每一个角落。而这一切，都是德皇威廉二世这个始作俑者引起和促成的。

豆剖瓜分的惨象，终成事实，完整神圣的中华国土，被列强分解的支离破碎，中华民族遭受着千百年来最大的耻辱。忍看壮美山河，惨遭厄运；何堪华夏儿女，备受蹂躏。古老而文明的民族，又怎能不昂首向天，厉然长啸，呼唤骤风暴雨的来临，冲刷这无尽的耻辱，涤荡这太多的罪恶。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二 设厂聚义 朱红灯森罗扬威

1 冠县十八魁

山东省冠县梨园屯一带（今属威县），是外国洋教势力入侵较早的地区之一。梨园屯又叫李阎屯，为冠县在直隶境内的一块“飞地”。此地旧称“冠县十八村”，是指当年该屯共有18处村庄；后来又增加了6个村，因此，实际上共有24个村。全屯共有居民一万余户，素称殷实，孤悬山东境外，距冠县城130余里，与直隶的曲周、威县毗连。

梨园屯原有义学一处，占地38亩。乾隆年间，乡绅李成龙捐出闲宅1处，约3亩多地，由村民集资在此建起了一座玉皇庙，作为本村和四乡民众敬神赛会的场所。梨园屯本有神庙多处，观音庙、土地庙、二郎神庙、奶奶庙等无所不有，然论其规模之大，皆无法与此玉皇庙相比。这里的村民信神之风颇盛，对道教诸神皆顶礼膜拜，对玉皇大帝更是最为崇拜，认为他是天地三界、六合八极之最高尊神。据当地传说，昆仑山上有三道龙脉，一道向北注入黄河，乃出了中国儒家至圣先师孔圣人；一道向东注入长江，便出了道家鼻祖太上老君；另外一道则向南注入印度河，于是又出了释家之祖如来佛。所以，梨园屯的玉皇庙又分前后两殿，前殿供奉着玉皇大帝；后殿供奉着太上老君、孔圣人和如来佛祖。一庙之中，三教至尊皆受供奉。所以，在村内各庙中，玉皇庙的香火最盛。每月初一、十五，善男信女即从四乡八里赶到这里参拜，神庙之内，香烟缭绕，经日不绝。每年的正月初九，为一年一度的玉皇神会，更是热闹非凡。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传教士纷纷窜入中国山东境内建立教堂，许多教堂进而成为列强的侵华据点。到光绪年间，仅在山东和直隶交界的威县、冠县一带方圆百里的地面上，就建立了大规模的教堂二十多处。外国传教士视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视中国地方官民为臣民，践踏中国法律，勾结地方上的封建势力，横行霸道，鱼肉乡民。他们以传教为幌子，拉拢、引诱一批土霸恶绅、流氓无赖加入洋教，充当其爪牙。这些教民更是狐假虎威，借洋教为靠山，在地方上霸占田产，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因此，这里村民们的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民教纠纷

日甚一日。

梨园屯信奉洋教之人既多，他们也想在这里建立一座教堂，乃看中了玉皇庙地。到咸丰末年，由于连年受到兵火之灾，梨园屯义学废弃，庙也坍塌，村民们无力兴建，也只得任其荒废。屯中教民们乘此机会，提出分庙之议。他们向庄首表示，自己只希望得到玉皇庙地，至于义学及学地田产则全归村民。村民们认为，教民们分庙不分地，一不能打粮，二不敢拆庙，分开也罢，同意了教民们所提出的分庙不分地的办法。

1869年3月，经庄首左令臣、刘长安等人与村民、教民代表商议后，将义学庙地分作四股，各归村民和教民所有。但是，教民在分得了玉皇庙地基后，却献给了法国天主教会，拆庙盖堂。这一举动立即激起了全体村民的公愤和反对。他们认为，玉皇大帝乃天地三界间最高尊神，理应受到人们的尊崇。虽然现在由于久罹兵火之灾，暂时无力修葺，但是对这位天地至尊的敬拜之心却不能有丝毫的减弱。分庙分地本为不得已之举，但是终有一天，还得在这地基上重新建起玉皇神庙，岂能容得教民们把它拱手让于洋人，兴建什么洋教堂。于是全体村民自发组织起来，不等洋教堂建好，即将其拆毁，并在原来的地基上重新修建玉皇庙。教民们原本不把村民们放在眼里，更仗自己有洋教会为靠山，乃坚持庙地为自己所有之地产，在上面建立洋教堂是自己的事，任由何人也管不着。于是双方相互争执，各不相让。自此以后，梨园屯的民教之争便围绕着庙堂之争而展开：教民们拆庙建堂，村民们拆堂盖庙，双方迭相拆修，相持不下，一争就是十好几年。

1886年，法国神甫梁宗明来到梨园屯传教，他又一次看中了玉皇庙这块地方。梁宗明唆使一无赖教民，佯装给他银子买地盖堂。该教民按照梁宗明的意思，一口咬定玉皇庙是自己买下的庙地。于是，在梁宗明的指使下，由神甫王老尊、阎振东等纠集了三四十人，再一次强占庙地，拆庙造堂。

洋教会的强行霸占，恰如火上浇油，在村民的心中激起了更大的愤怒。他们公推文生王世昌、监生左树勋、武生阎得胜、贡生高东生以及蒋老亮和刘老太等6人，前往冠县城向知县大人申诉。知县何世箴虽然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明知是洋教会恃势欺民，但却屈服于外国人的压力，不敢秉公办理。公堂之上，何对梨园屯的6位村民代表严加斥责，并当堂革除了王世昌“文生”的功名，以为惩戒。王世昌等6人自是不服，义愤填膺地告到东昌府。但是知府洪用舟与何世箴是同一货色，对教会势力不敢开罪。面对王世昌等人的申诉，洪用舟竟在公堂之上直言不讳地对王世昌等说：“洋教会手眼通天，教民们勾通上司。你们所说的事情即便有理，我也管不了，就算是我想管，也不敢管。”

堂堂知府大人竟然在公堂之上说出这番泄气的话来，着实令王世昌等人大吃一惊。王世昌当堂向洪用舟反驳道：“知府大人，您身为一方官长，不能好民之好，恶民之恶，为民做主，翦暴除恶，又岂能为民父母？”

洪用舟被王世昌等的一席话驳得哑口无言，竟至老羞成怒，无理判处王世昌等3人各监禁半年。王世昌等人不服，向省府上诉，但是省府反把案子推回到冠县衙门。就这样，他们六人代表村民同洋教会打了两年多的官司，有的卖了地，有的变卖了家产，而庙产迄未收回。全屯村民为之愤愤不平，称之为“六大冤”。教会气焰却愈发嚣张，急欲动工兴建教堂。

梨园屯村民们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伸，人人心中怀着一腔怒火。村中贫民阎书勤等人感到从县到省各级官吏都是畏洋如虎，再找他们打官司，终究于事无补，于是乃毅然决定号召村民武力护庙。他对村民们说：“乡亲们，连当今的皇上都怕洋人，地方官府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不能再指望官府为我们做主。洋人洋教欺侮我们，拆我神庙，霸我田产，而官府却一味偏袒，不讲理，不论法，我们告到哪里也没有希望。就让我们自己来与洋人洋教讲理论法吧，我们的理和法就是拳头，就是武力，我们自己直接用武力把庙地给夺回来。如果洋人敢于出面干涉，就让我们把他们杀死！”阎书勤的这一主张很快获得了许多村民的支持。

阎书勤，生于1860年，为梨园屯本地人，出身贫农，幼时习练红拳，武艺精娴，在当地素有“大刀阎书勤”之称。他平日里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在村民之中很有威信。当他向村民们号召以武力护庙时，立

刻有高元祥、阎书太、阎书嘉、阎仕和、高启山、刘福如、刘保玉、蒋忠山、蒋建青、李老兆、阎明鉴等17位村民响应参加，加上阎书勤本人共18人，当时被村民称为“冠县十八魁”。虽然后来参加武力护庙的村民越来越多，但“十八魁”的称呼沿用了下来。白天，洋教民们拆庙建堂，到了晚上，十八魁以拉鞭炮为号，听到响声之后，就动手拆堂盖庙。就这样，双方你拆我建，我盖你拆，又相持了十年之久。

“冠县十八魁”的武力护庙，迫使教会只得暂停修堂。但是民教构怨，愈积愈深。冠县知县何世箴生怕事态扩大，自己落得个“弹抚不力”的罪名，乃于1892年亲至梨园屯，邀集四乡及邻县曲周、清河、威县的士绅40余人为民教双方调解。教会方面寸步不让，坚持要在玉皇庙基上修盖教堂。何世箴屈于洋教势力，答应了教会的要求。同时，他为了缓和民愤，答应给王世昌等6人白银300两，制钱1000串，让村民在村南另外购买地基重修玉皇庙，建立义学。王世昌等6人经过多年的奔波，觉得如此解决未尝不是一种结果，也只得答应了下来。但是阎书勤等十八魁却不为所动，他们质问何世箴：“庙是本村的庙，地是本村的地。洋教会有什么理由，硬是要拆我们的庙，霸占我们的田地呢？我们非在原地基上盖庙不可！”这样，知县大人的亲自出马，也没有能把梨园屯的反教会斗争压制下去。

1893年春天，洋教会又在原庙基上修建教堂。十八魁便同往常一样，率众拆毁教堂，夺回庙基，重建玉皇庙，并派专人轮流守卫。洋教会借机要挟，诬陷十八魁图谋造反，告到东昌府，并开枪向前往辩论的群众射击。十八魁怒不可遏，也还以颜色，开鸟枪回敬对方，并把武器集中到玉皇庙，准备与教会拼斗。双方你凶我狠又相持了两年，到1895年，东昌知府洪用舟怕民教相争酿成巨患，亲率清军开往梨园屯，强行拆毁玉皇庙，把庙基交给了洋教会。之后，洪用舟还留下一支清军驻扎在梨园屯，为洋教会撑腰，镇压十八魁的反抗斗争。

阎书勤等十八魁眼见官府居然派军驻扎，强为洋人出头，甘心沦为洋教会的走狗，不禁勃然大怒，但又觉得自己力单势孤，不足与荷枪实弹的清军和穷凶极恶的洋教相抗衡。于是，他们决定前往直隶威县的沙柳寨，与那里的另一位反洋教英雄赵三多联络，希望与他联合起来，给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洋教和官府以有力的回击。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张汝梅要改拳勇为民团

义和拳势力的壮大，不仅给洋教会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斗争，各省教案此起彼伏。洋教士们心惊胆战，纷纷致函各自保护国的驻华公使，请求他们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清廷实力剿灭各地义和拳和大刀会起义；清政府也因山东、直隶等地义和拳的壮大和各地教案的纷纷发生而惊慌失措，不断发出谕令，责各省督抚实力弹压，同时一再饬令山东巡抚李秉衡，速把山东省境内的义和拳弹压下去，好使朝廷在洋人面前有个交待。李秉衡任地方官多年，曾经支持过毓贤对曹县大刀会的镇压，但在长期处理民教纠纷的案件中，他对于洋教会横行不法、仗势欺民的内情深有了解，他对洋教也极为反感，对下层民众的反教斗争怀有一定程度的同情。所以，他在山东巡抚任上，即曾多次上书朝廷，主张对地方上为非作歹的教民，不可屈从于列强势力而一意偏袒；对于洋教士们包揽词讼、干预民教纠纷的现象，也应严加禁止；对于那些不堪洋教欺压而起来反抗的义和拳民，也不应“一概剿捕”，主张但能悔过，则准其自新。但是，他的这些想法注定不能为朝廷接受，各国驻华公使更是对他群起攻击，逼迫清政府将其革职。不久，清政府迫于列强的压力，革除了李秉衡山东巡抚一职。

1897年底，清政府改任张汝梅署山东巡抚，并严令他对鲁省的义和拳严加弹压。然而，张汝梅上任不久，在自己办理民教纠纷过程中，对于教民恃洋教会为护符凌压乡党、欺侮平民的行为深有体会，也同其前任李秉衡一样，对于洋人在中国的国土上横行不法、欺人太甚十分不满。在处理民教纠纷案件时，他主张持平办理，遇事极宜设法维持，不可徒恃兵力。因此，张汝梅对义和拳采取先抚后剿的策略，一面陈兵冠县四周，佯作包围之势，一面派新任冠县知县曹倜前往梨园屯，招抚拳民。

1898年3月，赵三多、阎书勤再次传帖邀集邱县、威县和广平等县的拳众数千人，至梨园屯集会亮拳，并焚毁了附近的教堂。张汝梅闻讯后，即命东临道道员陶锡祺、东昌府知府洪用舟、临清州知州王寿朋、冠县知县曹倜和邱县知县李瑞琪五人，亲往冠县的干集村，召集四乡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村及邻近各县的士绅五十多人，商议处理梨园屯的民教庙堂之争。赵三多等人也被邀前往参加。五位官员因慑于义和拳的强大声势，只得将梨园屯原玉皇庙地基判还村民，并答应给教士们在村边另修一座教堂。同时，冠县知县曹倜还软硬兼施，一方面赠给赵三多一块“直良可风”的匾额，另加上廪生的功名，劝谕他解散徒众；一方面调集马队，向坚持斗争的姚洛奇部义和拳队伍发动进攻。曹倜还声称：如果赵三多不再聚众闹事，官府将为他置地造房，当场遭到赵三多的严词拒绝：“我赵三多并非是聚众滋事，实由于洋教民恃势欺人，你们朝廷官府不能为民做主，反而一意袒护洋教，敢问居心何安！我识不得几个大字，当不得廪生的功名，我家的穷屋之下，也挂不开你们送我的这块牌匾！”言毕，把匾额撂在干集，愤然离开冠县，返回自己的家乡沙柳寨。

就在赵三多离开冠县的同时，清军马队开始向聚集在沙柳寨和梨园屯的义和拳发起进攻。当时广平的义和拳首领姚洛奇正在沙柳寨，他率领义和拳民奋起迎击清军，不幸被山东临清统领林元喜部逮捕，解往冠县后遭到杀害，梨园屯这块义和拳的斗争基地也遭到破坏。赵三多回到沙柳寨，闻得消息后，不禁悲痛欲绝。

由于清军的残酷镇压，义和拳的斗争遭到极大的打击。但是，义和拳民们没有屈服，他们都自发地转移到其他各县，同洋教会和清军进行着不屈的斗争，其中不少拳民在冠县和威县的交界地方，忽聚忽散，拆毁教堂，抗击清军。也有不少拳民仍然留在冠县，分散各处，坚持斗争。

张汝梅身任清政府地方大吏，对于自己辖内的民众斗争自是不能纵容。但是，在对义和拳进行武力弹压时，他也注意考察民众反抗斗争的原因。因此，他在派兵进剿的同时，也了解到义和拳的来历、起事的缘由和斗争的宗旨。这一年的6月30日，张汝梅上奏清廷，把自己半年多来处理山东省境内民教纠纷案件的经过以及自己所了解到的有关义和拳的情况向清政府报告。他在奏折中写道：直隶和山东交界的各个州县，民众大多喜爱习拳练武，各创乡团，原来名为义和，后来改称梅花拳，最近又改称义和拳。这些民间习武团体，早在咸丰和同治年间中国还没有教堂之前就已出现，原意是为了保卫身家性命，防御盗贼，并不是有

意要与洋教为难。梨园屯一带的民教纠纷事件，实起于教民恃教欺民，构怨日深，而官府一意偏袒教民，遂致义和拳在此集会亮拳。现在冠县境内民教已然相安无事，梨园屯的教民们也都各自回家安居，再无冲突发生。只是眼下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区，拳民年多一年，他们往往乘逢场赶墟之时，比武较勇，亮拳集会。教民们心中惧怕，时传讹言，声称义和拳又将滋事云云。所以，官府也不能任由拳民自立私会，放纵不理，致为外人有所借口，时间一久也会酿成事端。所以，张汝梅在奏折中向清政府建议，由清廷责成各地方官吏，谕饬各地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将义和拳民列入乡团之内，听任他们守家卫身，不准挟私滋事。如此办理，既能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也可以使得民教双方各有裨益。

张汝梅虽无意偏袒义和拳民，但是他的改拳勇为民团的主张，在客观上却为义和拳重新集结斗争力量提供了便利。这时，广平的朱九斌、刘化龙，山东的任寡妇和张老仙等各路义和拳首领也都纷纷来到沙柳寨，与赵三多联络，策划起事。密谋中，朱九斌和刘化龙二人又一次提出了“灭满兴汉、反清复明”的口号。赵三多则认为：“现在主要的不是要灭满兴汉，要紧的是灭洋！洋人如虎似狼，在我们的国家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官兵也帮他们打咱们，他们的互相勾结才是我们平民百姓走投无路的根子。所以，要想反清，首先必须灭洋。”张老仙也说：“朝廷与洋人勾结在一起，势力太大，如果就凭我们这些人去灭清灭洋，势如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所以我们不如提出个‘助清灭洋’，先不与朝廷正面为敌，这样，官兵也许会帮咱们的忙。等把洋人赶跑了，满人朝廷也就不攻自破了。”赵三多和朱、刘二人都觉得张老仙说得有理，也都同意了他的意见。

阎书勤等冠县十八魁这时又来到沙柳寨，邀请赵三多重返冠县，领导义和拳起义。赵三多毅然前往，与那里的高元祥、姚文起等人率领的义和拳众再次会合到一起。

1898年10月25日，赵三多和阎书勤等人，召集拳众二三百人，在梨园屯西北十余里处的冠县蒋家庄马场，树起了“扶清灭洋”的大旗，誓师起义。接着他们前往攻打冠县、临清交界处的刘村教堂和红桃园教堂，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首战获胜。接着在此招兵买马，扩大队伍，然后迅即北上，经临清、曲周到达邱县。

山东巡抚张汝梅听到赵三多再次聚众起义的消息后，一面飞奏朝廷，一面调兵遣将，星夜出动，前往镇压。双方在威县的侯魏村遭遇，展开激战。义和拳民们凭借手中的大刀长矛，面对着手持洋枪的官兵们，毫不畏缩，奋勇杀敌。但是终因武器装备太差，抵挡不住官兵的凶猛攻势，伤亡惨重。赵三多率领部分拳民冲出包围，经曲周南下临清。一路之上，又有上千名义和拳民加入到起义队伍中来。张汝梅和直隶总督裕禄等人见到义和拳有不可遏止之势，不敢大意，一面派队追剿，一面饬令各地方官跟踪兜拿。赵三多在前遇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在留善固村村南大场院内召集了义和拳众大会，向拳民们说明队伍眼下所处的境遇，决定暂避凶锋，蓄势待机。他将队伍分作两路，一路由他本人和姚文起率领，向直隶中部和南部地区活动；一路由阎书勤和高元祥等人率领，在直、鲁交界地区继续斗争。这样，赵三多等领导的这次义和拳起义，规模虽然不算太大，但直接震动了山东和直隶两省。从此，直、鲁等省的大刀会和神拳会等反洋教的民众武装组织，都自称为义和团。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由赵三多在蒋家庄发动的起义正式揭开了战斗序幕。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5 毓贤主张持平办理

山东义和团的蓬勃兴起，使蕴藏在民众中间的力量得以充分地展现出来，也使得清政府的一些地方官吏认识到了这种力量的强大。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处理中外交涉事件和民教纠纷时，对列强在中国横行肆虐多所不满，对洋教会仗势欺民更是深有体会。因此，他们眼见着义和团队伍的迅速壮大，逐渐引发起一种念头，就是试图利用这样的一支民间武装力量，给欺人太甚的洋人一点颜色看看。这些人以先后就任山东省巡抚的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为代表。

本来，义和团在山东省境内兴起，为清政府引为心腹之患。朝廷所任命的每一任巡抚，都肩负着镇压义和团的重大使命。但是，当这些巡抚大人们莅任之后，在实际处理民教纠纷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洋人和恃洋人为靠山的不法教民的横行霸道，从而产生反感，对义和团的反抗斗争表示同情，进而采取宽容态度。李秉衡因对义和拳的宽容遭到革职，张汝梅也因在处理民教纠纷时主张持平办理，给清朝廷带来不小的麻烦，遭到解职。1899年3月，毓贤被朝廷任为山东巡抚。

毓贤，清末汉军正黄旗人，字佐臣，监生出身。1890年任山东曹州知府。1895年改任兖沂曹济道，次年升任山东按察使。刘士瑞等人发动曹单大刀会起义时，就曾遭到他的残酷镇压。然而，当义和团在整个山东省境内兴起的时候，他对拳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在毓贤就任山东巡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省内就发生了多起列强挑衅事件，使他面临着许多中外交涉事件。先是强占胶州的德国兵开赴兰山，焚毁村庄，侵入日照县城，图奸妇女，枪杀平民；继而德国天主教主教安治泰从旁推波助澜，扩大民教矛盾，更加激起全省人民的反抗斗争。洋人在山东省的暴虐行径，日益激起了毓贤对列强的不满情绪，同时他也意识到列强势力的不断入侵和膨胀，是对清王朝最为严重的威胁，而全省正在蓬勃高涨的义和拳反洋教斗争，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此，毓贤在就任山东巡抚后，在处理中外交涉和民教纠纷案件时，不愿过分地对列强屈膝谄媚，降心相从，而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是极力主张持平办理。对于他的这种态度，各国的传教士和公使们都十分不满。安治泰即向清政府控告他不接见主教，法国公使也指责他不理教士、不保护教堂，德国公使更是诬称他仇恨德国之心十分明显，逼迫总理衙门革除他山东巡抚一职。

对于列强这一番指手画脚的指责，毓贤也不甘屈服，他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指陈德国人居心叵测，安治泰任情翻异，皆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在为自己办理民教纠纷案件的主张进行辩解时说，山东省的民教积仇，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所以自己在处理教案时，不能不格外小心慎重，并非自己有意袒护一方。清政府内部此时对义和拳也是剿抚不定，无所适从。所以，在毓贤就任山东巡抚后，即谕令他要一律持平办理，不得稍有偏袒，以期消患无形。时过不久，清政府再次谕令毓贤，一定要督饬地方官吏随时开导，务令民教相安无事。

清廷对义和拳表现出的这种圆滑性态度，给毓贤持平办理的主张以很大的支持。因此，毓贤在山东巡抚任上，对于迅速发展的义和团运动虽然没有最终放弃剿抚并主的方针，但他却更倾向于以抚为主的策略。到1899年初夏时分，毓贤又承认义和团为民间团练，并上奏朝廷，请求朝廷以办理团练为名，将各地的民间团体改办为官团，称义和拳为义和团，任其自由发展，听其保家卫身。至此，山东省内的义和拳组织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广泛地改称义和团。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省以更大的规模展开。

朱红灯率领义和团在森罗殿大败官兵，使毓贤大为震惊。经过与义和团的几番较量，他清醒地认识到在拳民队伍中蕴含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也更进一步坚定了他招抚团民的想法。平原事件后，他具折奏禀朝廷，平原一役，致令百名无辜民众遇害，其原因在于平原县令蒋楷在处理民教纠纷案件时，一意偏袒教民，不能持平办理，在下乡弹压时，又良莠不分，纵役诈财，妄捕无辜，因而激成巨患。所以他建议朝廷对蒋楷处以革职，永不叙用，以为后来者戒。

森罗殿之役和平原事件，在清朝廷中也引起极大的震动。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等向光绪皇帝上书，指出义和团的兴起缘由，是由于洋人在中国气焰嚣张，激怒百姓造成的，其中尤以山东省最为严重。大刀

会、义和拳、神拳等名目，起初也只是私相传习，徒众不多。最近才因为教堂肆虐，官府不能持平处理，乡民身家性命无所保障，他们才借仇教为名，广为纠结。一般平民也出于保护性命和财产的目的，往往加入拳会以求庇护。在谈到对义和团的策略时，他们又说：虽然义和拳徒众多，但从未听说发生过扰乱平民、劫掠官府的事情。虽然偶尔有打教毁堂之事，只要朝廷择其一二祸首，严责地方官吏缉拿惩办，即可了事，至像平原县令那样动用重兵前往进剿，实属大可不必。近日平原之役，官兵杀拳会中人不过二三人而已，却于事后屠戮无辜平民百余人之多，其中还有妇女幼童三十多人，其冤惨之状，不堪目睹。所以他们也都主张，对义和团以抚为主，对于滥杀无辜的蒋楷和袁世敦等人，应予以严惩。朝廷采纳了毓贤等人的意见，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了由严剿到招抚的变化。

朱红灯率领义和团在森罗殿大败官兵后，率队回到了茌平，继续进行反洋教斗争。11月，他和本明和尚率队在马家窝会师，焚毁张庄教堂。附近各州县的义和团运动也日渐活跃。他们攻烧教堂，惩罚教民，聚散无常，行踪飘忽。各地方官对他们又惧又恨，却也无可奈何。

义和团的斗争，引起了西方传教士的惊恐和不安。他们觉得自己的项上悬着一柄利剑，随时都有可能落将下来，砍断自己的脖子。因此，他们向各地方官吏施加压力，逼迫他们严行镇压义和团，同时写信给各自国家的驻华公使和领事，请求援助。对于山东巡抚毓贤，他们更是十分不满，声称鲁省境内情势的发展，皆毓贤一人之罪。在恩县庞庄教堂传教达二十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多次向美国驻华公使康格控告毓贤，声称毓贤明知义和团在本省存在，而且规模浩大，气势汹汹，却还把力主镇压义和团的平原县令蒋楷等人革职，这种做法实际就是明目张胆的对义和团的纵容，有意和列强各国过不去。所以他请求康格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将毓贤革职，永不叙用。根据明恩溥的报告，康格与法国公使毕盛，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强硬要求清政府电谕毓贤和其他地方官吏，必须采取有效办法，迅速消灭义和团，保护教堂，保障教士、教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对于美、法两国公使的压力，正为列强干涉废立皇帝而伤透脑筋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慈禧太后，虽然很不满意，却又不敢十分违逆。几天后，总理衙门把康格的照会电告毓贤，要求他切实负责保护山东省各州县的教堂和教士。毓贤接到朝廷的严令后，除采取严查保甲、整顿团练和继续开导劝散等手段外，又派济东道道台率领清军开往鲁西北地区，实力保护洋人教堂，镇压义和团。

在攻毁了张庄教堂后，朱红灯和本明和尚率领的两支义和团队伍于11月17日开至博平县华岩寺会合休整。不料两支队伍在分配战利品时，发生冲突，引起械斗，混乱中朱红灯被他部拳民砍伤头部。官兵利用义和团组织内部的矛盾，先后将朱红灯和本明和尚抓获。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三 涞水大战 清朝廷剿抚两难

1 袁世凯的严剿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等地的高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权益。清政府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吏对义和团的镇压不力，尤其是山东巡抚毓贤对义和团的宽容态度，不仅没有能够扑灭义和团的烈火，反而使之愈燃愈旺。这一切，激起了列强公使的强烈不满。

1899年11月25日，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认为毓贤的态度是近于鼓励盗匪，因而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同时，他还在照会中警告清政府要认清大局的重心，迫其电谕巡抚及其他官吏，强制他们采取有效的办法，消灭义和团，保护洋人传教士和教民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第二天和第三天，康格又以同样内容的照会向清政府施加压力。

总理衙门接到康格的照会后，即刻致电毓贤，要求他严禁山东大刀会和义和团的活动，并申斥他固执己见，对义和团存意偏袒。12月1日，毓贤奏复朝廷，申辩自己在办理教案时，并无意于偏袒任何一方，只是持平办理而已。对于列强对自己的指责，他也十分恼火。

毓贤的桀骜不驯和不愿意对义和团采取斩尽杀绝的做法，使列强对他完全丧失了信心。12月2日，康格再一次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要求立即再给山东巡抚毓贤一道上谕，迫使他立刻实行保护洋人的方案，并指出这是条约所规定的。过了三天，即12月5日，康格又一次提出照会说：“假如这位巡抚不能控制暴徒，并且对传教士们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那么，他就应该被朝廷撤职，另外向山东派去一位能干的人代替他。假若这位新任的巡抚手中没有充分的武力来做的话，则我强烈地要求，从天津把那些操练得很好的军队一同调往山东协助他。”在这个照会里，康格十分蛮横地逼迫清政府将毓贤革职，并暗示可由袁世凯前往接任。康格还威胁清政府说：“除非中国立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镇压这些暴徒，不然，外国将要证实这样一个信念，即中国意欲玩弄一个大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问题，不必要地引起杀害外国人，而这些人是中国所同意保护的。这对中国来讲，将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

清政府又一次屈服了。12月6日，清廷传谕，革除毓贤山东巡抚的职务，代之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毓贤接到谕令，自料此番离职进京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为了给自己留有一条退路，同时也不给新任巡抚袁世凯留下邀功请赏的资本，12月24日，在他去职进京前，下令将在押的朱红灯、本明和尚及其他一些义和团重要首领全部杀害，然后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进京陛见去了。

在毓贤离开山东的第二天，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到达济南，开始了他“护洋人而剿拳匪”的行动。

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列强欢呼雀跃。他们有的说：“从袁世凯的一般名望来看，外国人是可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的。”还有人说：“山东巡抚袁世凯，乃是一位有魄力的人选，他不仅精于兵学，同时其部下有精兵一万，所以我们可恃之无恐了。”康格也在清廷发布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之谕旨的第二天，就满怀欣悦地向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报告说：“我很高兴地向您报告，昨天，御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前往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位能干而且勇敢的人，和外国人之间的交游甚繁。相信在中国皇帝给予他适当的谕旨后，在山东和中国其他地方的骚乱就可被制止，秩序很快就会重新恢复——我们希望如此。”从这些言谈中，我们可以看出，列强对袁世凯寄望甚殷，期待颇重。

但是清政府并没有像康格希望的那样，立即向袁世凯发出“适当的谕旨”，反倒是在袁世凯抵达济南后的第二天至1900年的1月3日，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连续三次发出电令，要求他在遇到民教纠纷案件时，不可徒恃兵力，一意剿灭，而应该持平办理，最好能够化大为小，化小为无。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清政府虽然迫于列强的外交压力，革除了毓贤的职务，但对于义和团的态度，却远非像列强国家所希望的那样，倒是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毓贤所一向主张的持平办理。1900年1月11日，清政府又向全国各省督抚发布了一道谕旨，命令他们对拳会和盗匪区别开来，不同对待，不能把加入拳会的人一概视为匪徒；在此后办理案件时，也应该只究问其是否盗匪，是否故意闹事启衅，对于当事人是不是

拳会中人，是不是教会中人，则应不加论究。这样，清廷在一定程度上主动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

对于清朝廷的这道上谕，各列强极为不满。法国代办认为这道谕旨语气含糊，模棱两可。美国公使指责它措辞奇怪，令人担忧。英国公使则据以怀疑清政府是在有意鼓励义和团和大刀会的活动。于是他们再一次行动起来，携手对清政府施加压力。

不过，袁世凯受列强各国如此的器重，倒真的没有让他们失望。他到达济南两天之后，并没有理睬朝廷于头一天给他的“持平办理”的电令，而是发布了《查禁义和拳匪告示》，对义和团采取剿抚兼施的八条做法：一方面，他以奖励义和团“献首”、“自新”和立即解散为诱饵，对山东境内的义和团组织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他又以军队不足调用为词，把自己所携新军扩充到两万多人，甚至还请来了驻扎在青岛的德国军队和各地教堂的武装，向义和团展开疯狂的屠杀。他向自己的手下将领们发布命令说：“你们不论何时遇到拳匪，就立即开炮轰击。有违我令者，统领以下一律就地正法，绝不宽贷。”于是，这些将领们挥舞着屠刀，在袁世凯的督战下，向山东义和团大开杀戒。

在袁世凯的分化瓦解和疯狂镇压下，山东省内的义和团受到了极大的挫折。一座座村庄被炸成了瓦砾，一处处坛口变成了焦土，一批批义和团斗士们遭到屠杀。王立言、王玉振、朱士和、李九芝等数十名义和团的重要首领被捕获杀害，许多支义和团队伍被打散。义和团民们的鲜血，顺着袁世凯的屠刀，洒遍了山东全省。而且，在山东一省的疯狂屠杀，似乎还不能满足袁世凯的嗜血之性，他一方面与直隶总督裕禄联系，对义和团进行兜剿，一方面还亲率军队越出省界一直追杀到直隶省境内。

袁世凯的大屠杀，使山东人民对他恨之入骨，称之为“鬼子巡抚”。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诅咒他的歌谣说：“杀了袁黿蛋，我们好吃饭。”更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在袁世凯抚衙大门外的照壁上，画了一个头戴红顶翎的大乌龟，趴在洋人的屁股后面，乌龟的头脸画得与袁世凯的长相一模一样，形象地刻画出了袁世凯屈膝媚外的丑恶嘴脸，痛快淋漓地表达了山东人民对这个刽子手的刻骨仇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究竟是严剿还是安抚

本来，在义和团运动的浩大声势面前，侵华列强起初无意于太深地卷入这场大漩涡中，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已被它们打怕了的清政府身上，逼迫它去取缔义和团，从而保护自己在华的特殊权益。但是，中国人的顽强不屈和英勇斗争使它们惊异惶恐，转而变得恼怒和仇恨了。于是，频繁的交涉在列强与清政府之间展开，军事威胁也时有发生。清政府也在新的形势下，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了。

其实，清政府内部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意见不一。有的人主张严行剿灭，不仅遏止内乱，亦可借以免却外人托词；有的人则主张招抚，并且希望通过对义和团的控制，进而把它训练成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借以与洋人抗衡。为此，主剿派和主抚派之间的争执十分激烈。当时，慈禧太后正在准备废光绪皇帝而改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但事情因受到列强的干预进展很不顺利。她认为列强有意与她过不去，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怨恨在心。此番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两省兴起，且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洋人，慈禧太后的态度一直是十分暧昧。清廷中的一些守旧官僚，也从他们一贯的对西方事物和文化的憎恨以及对传统封建道统的愚忠出发，发表自己的看法。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刚毅、赵舒翘、启秀等人，都认为义和团是“义民”，朝廷正可借义和团的神力，平灭外夷，尽戮各国公使，然后再度关闭国门，谢绝外交，重新成就封建的大一统之局。在地方上，一些官僚们也对义和团采取纵容的政策。顺天府府尹何乃莹就曾明说：义和团只是仇视洋教，却从不扰民，大有燕赵之地古烈士之遗风。朝廷尽可抚安归顺，编成劲旅，用以扶保大清皇朝。

另外的一部分官僚，因其本身与列强之间多有联系，同时也深恐义和团反洋闹教最终会引起列强的武装干涉，所以极力主张以武力对义和团进行严剿。他们认为，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不仅不是对朝廷忠义的表现，反而可以说是居心叵测，存心蒙骗朝廷。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就认为，义和团所谓的“扶清灭洋”，正是各省会匪的故套和托词，朝廷千万不可受其蒙蔽；陕西巡抚端方也说：我大清朝廷自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有威权，不须会党拳匪相助；洋人在华原本安分守己，也不须拳众去灭。义和团只恐助清不成，反而会为朝廷添忧；灭洋不成，反会招致洋人向我开衅。另外还有人上奏朝廷说：义和团扶清灭洋，居心不善。设若义和团可以辅佐朝廷，则也可以倾覆朝廷，说“扶清灭洋”这种话的人意存不良，其心可诛，其罪该死。在这些人看来，不论义和团是扶清还是灭洋，其实都是借名作乱，故意与朝廷作难，有百害而无一益；朝廷对之绝不可姑息纵容，而应竭尽全力严行剿灭。

但是，随着溥儁皇储地位的日趋确定，清政府内部主张招抚义和团的一派逐渐占据了上风，影响也越来越大，并取得了慈祥太后的支持。于是，清政府对义和团开始采取“经晓谕解散为主，毋轻用兵”的方针。

当袁世凯于是年初在山东大肆屠杀义和团民时，御史熙麟便上奏弹劾袁氏，称袁世凯到山东后，对义和团民一意主剿，以致讹言四起，人心惶惶，民怨日甚。清廷也曾多次电谕袁世凯，每每强调：山东省民教不和，由来日久，总应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不得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然而袁世凯并没有按照朝廷的意思去办理。列强对清政府的这种态度也深感不满。而被革职的前任山东巡抚毓贤抵达北京时，不仅没有像列强希望的那样受到惩处，反而很快被朝廷召见，慈禧太后对他大加宽勉了一番，并且还赐给他一块“福”字匾额。在列强看来，清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在有意与自己过不去，让自己的脸下不来。为此，美国公使康格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说：清政府对毓贤的褒扬，似在向人们证明朝廷有意要利用义和团驱逐洋人。总理衙门则向康格表示，这是朝廷例行的召见，意在勖勉吏治，绝无他意。

1月24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体弱多病未生皇子为词，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天下舆论一时哗然，更有两千多人联名上书，认为不可。端王载漪深恐其子丢掉皇位的继承权，乃费尽心机，派人邀请各国公使入朝祝贺。慈禧太后在朝中设宴款待各国公使，酒宴颇为欢洽，她乃乘机向各国公使提及立溥儁之事，意欲得到各国公使的赞同。不料各国公使各怀鬼胎，不待慈禧太后言毕，即有人站出来坚言阻挠。慈禧太后对列强的态度十分恼火，更加深信列强是在有意与自己过不去，遂与载漪日夜图谋，想对列强进行报复。他们看到义和团的勃勃声势，即

便是洋人也为之气馁，乃决定借义和团之力，与各国公使较量一下，出一出自己累年受辱的恶气。

1月25日，英、法、美、德四国公使在法国公使毕盛的提议下召开公使团会议，27日，他们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联合照会，认为义和团目前还没有发展到采取有力行动不能扑灭的阶段，清政府如果不立时进行有效的镇压，则“暴徒”们将会得到鼓励，并会认为他们已经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继续犯下更为严重的罪行，从而将对中外关系产生严重的威胁。在这个照会中，四国公使还蛮横地要求清政府再向各地方官颁布一道上谕，对义和团和大刀会进行全面的镇压和取缔。它还要求清廷在谕中明白地写出，凡加入任何一个结社或窝存任何一个结社成员者，均为触犯中国法律的刑事犯罪。与此同时，意大利公使也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份旨趣相同的照会。

列强公使的这份联合照会，与慈禧太后的意愿相抵触，总理衙门十分为难。总理衙门拖延了二十多天，没有向列强公使作出答复。2月21日，英、美、法、德、意五国公使又写信敦促清政府给予回答。四天之后，总理衙门才给各国公使一个复照。然而列强公使对这份复照十分不满意，他们认为清政府依然没有改变此前对义和团的纵容态度，同时也没有作出对义和团或者大刀会进行镇压的承诺。为此，他们要求与总理衙门王大臣进行会晤，直接就此事进行商谈，并指名要求由庆亲王奕劻接见。

奕劻这些年与洋人打了不少交道，深知这些公使们难缠而且无理，在接到公使们的信后，他心中发憷，暗想，天知道这些洋毛子们又会出什么鬼花样，提出什么样的苛刻条件来。但是，总理衙门还是答应了列强公使的要求，把会晤安排在3月2日。为了向各国公使讨好，使会晤不至于出现过分难堪的局面，在头一天晚上，总理衙门送达各国公使一份照会和一个附件。在这个附件中，清廷用明确的字句要求各省取缔义和拳。然而，列强在华的侵略惯伎一直是，你退让一步，它就进逼一尺。所以对于清政府的这一份照会及附件，它们仍然表示不满，并进而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

3月2日，英国公使窦纳乐、美国公使康格、德国公使克林德、意大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利公使萨尔瓦格和法国代办唐瑞等人来到了总理衙门。窦纳乐首先代表公使团作了发言，他在表述了对义和团在华北地区急剧发展的疑虑和对清政府在处理该项事宜所表现出来的迟缓的不满后，向奕劻提出要求说，朝廷必须在官方公报《京报》上发表取缔义和团和大刀会这两个排外团体的上谕。克林德紧接着说道：“昨天贵署所送达的那份照会和上谕，只说要取缔义和团，却只字未提到大刀会，而我们所要求的是必须把这两者都予以彻底取缔，使外国人在中国得到保护。”其实，自从义和团运动高涨之后，在广大的华北地区，不论是以前的大刀会还是神拳会等民间武装团体，都一律改叫了义和团，而列强公使至此还死认大刀会和义和团是两个排外结社。奕劻等人心中暗骂洋人无知，却也不得不赔着笑脸向各国公使作出解释说：“上谕中之所以没有提到大刀会，是因为现在大刀会同义和团完全是同一码事。朝廷对于制止这些结社所犯暴行的决定是严肃而且认真的。”他还对公使们说明，把上谕直接送达有关督抚，责令他们秉旨办理，要比在官方公报上发表迅速有效得多。但是各国公使们对于这样的解释却依然不满意，在会晤结束后，还是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事先拟好的同文照会，执意坚持他们的要求。

3月7日，总理衙门复照各国公使，以“与先例不合”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列强对此十分恼火。各国公使再次举行会议，窦纳乐在会上提议，有必要对清政府采取严厉的措施，逼迫它屈从列强的要求。为此，五国公使再一次照会清政府，要求其在《京报》上发表上谕，同时发表声明说：如果中国政府仍然不同意这一要求，那么为了保护他们各自在华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建议各自本国政府，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他们还在使团会议上议定：一旦中国政府拒绝公开发表排外结社的上谕，他们就应该立即向各自本国政府提出建议，对中国进行联合海军示威。会后，各国公使将这次会议所商定的结果电告了各自本国政府。

对于五国公使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声明，清政府没有作出反应。各国公使虽然对清政府冷淡的态度十分恼火，但是由于此时各列强政府仍然把剿灭义和团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所以也只得暂时隐忍，静观清政府的举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击毙杨福同，进占涿州城

义和团在山东省的声势暂时受了袁世凯的抑压。但是，广大的义和团民并未屈服于袁世凯的屠刀之下，许多义和团队伍从山东省境转移到了直隶省境内，与当地的义和团队伍联合在一起，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战斗。

直隶为京畿重地，是清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重点地区之一。到19世纪末，全省境内教堂林立，洋教势力十分嚣张，广大民众深受地方封建势力和外来洋教侵略势力的双重压迫，不断地掀起反抗斗争。到1900年初，在直隶境内的城市乡镇，已遍设神坛，坛旁刀剑环列，气势如虹。直隶发展成继山东之后的又一个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带即成为义和团的战斗基地。各个州县的团民，打教毁堂，势若狂风骤雨，无可阻挡，当地的官吏也不敢轻易过问。

但是，在义和团攻教焚堂的战斗中，也遭到了各地洋教堂武装力量的拼死抵抗，很多团民战死沙场。义和团在攻打河间府范家圪塔村的教堂时，教堂的武装从土墙里往外开枪，杀害团民五十多人。团民们又用大车装满柴草作为护垒，掩护队伍向前冲锋，教堂便用洋炮轰击，使拳民们的伤亡更加惨重，只得被迫撤离战斗。在威县，教民也曾用七尊火炮猛轰义和团，并乘着硝烟凶恶地追杀，使义和团队伍死伤数百人之多。

在敌人精良的武器和残毒的抵抗面前，在惨烈无比的战斗中，义和团众们虽然手中只有大刀、长矛、木棍、石块，有的甚至赤手空拳，但是他们绝不屈服和退缩，而是勇猛地冲向杀敌前线，向侵略势力发动猛烈的攻击。义和团在转移行进时，还在沿途各村镇张贴告示，宣传自己的斗争宗旨，号召民众参加义和团队伍，反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有一份告示这样写道：“中原各省集市村庄人等知悉，兹因天主教堂并耶稣教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愤，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习义和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千百万具有血性

和民族气节的中华儿女，在家仇国恨面前，积极地响应义和团的号召，踊跃地加入义和团，勇敢而坚决地承担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义和团运动在直隶省境内以空前的规模高涨起来。

正当众列强国家兴高采烈地欣赏着袁世凯猛挥屠刀对山东省的义和团进行残酷屠杀时，却没有料到直隶省的义和团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他们惊慌失措，乃急急地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强迫它以最为严厉的手段取缔义和团和各种反抗组织。总理衙门只得秉承列强的意愿，电令直隶总督裕禄，严饬他采取切实办法，剿灭直隶省内的义和团。于是，义和团在与洋教侵略势力作殊死搏斗的同时，也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了战斗。其中，在保定附近涞水县境内的战斗最为激烈。

涞水向北距北京仅五六十里，当义和团在京、津、保地区猛烈高涨之时，县内各村庄也都纷纷设立了拳厂神坛，到1900年上半年，形成了以高洛村阎洛福等为首的义和团队伍，与当地的洋教势力展开了尖锐的斗争。5月，阎洛福等团民，与同村的教民们相持，民教之间发生争端。涞水知县祝芾应洋教士之请，急忙派人星夜前往高洛村，进行劝导弹压。阎洛福见官府出面为洋人撑腰，更是义愤填膺，乃广散揭帖，邀约四乡及邻县的义和拳民至高洛村会合。至5月12日，汇聚在高洛村的义和团民达数千人之多。祝芾一见事情又将闹大，赶紧亲往高洛村，企图以父母官的身份将拳民的情绪压制下去，不料反被拳民围困于村中。当天晚上，义和团和教堂武装力量发生冲突，义和团烧毁教堂7间，并砍杀教民3人。但义和团队伍也有二三十人在战斗中负伤。次日，汇集在高洛村的义和团又转往定兴县的仓巨村，在那里烧毁了教民住房十多家。

直隶总督裕禄在天津得知涞水境内义和团闹教的情形后，当即派遣张莲芬前往查办。14日傍晚，张到达涞水。他见当地义和团声势浩大，不禁有些发憷，连夜致电裕禄称，高洛村集聚拳民逾千，人人携刀带棒，情绪激昂，且附近州县境内的义和团也都有所举动，恐非动用官兵，不能制止。他请求裕禄添派练军分统杨福同率队前往镇剿。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俄、法等国公使也纷纷来到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迅速查办涞水的义和团。总理衙门无奈，只得电令裕禄，责其认真办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裕禄接张莲芬报告和总署电令，不敢怠慢，派杨福同带领马队80多人，由天津出发，乘坐火车，于16日到达涞水。17日，张莲芬与杨福同率队赶至高洛村，捕走团民20多人。傍晚，义和团民们趁张、杨二人回城之机，集中拳民二三百人，在回城的路上分二处设下埋伏，准备前后夹击，营救被捕的战友，双方发生激战。留驻于高洛村的马队闻得消息后，赶忙开来增援张、杨二人，却又遭到另一路义和团的阻击。结果，杨福同等突围而去，义和团队伍也遭到很大伤亡。

5月21日，杨福同再次率清军马队到城北约30里的石亭村查禁义和团，双方又一次交战。激战中，义和团民被杀1人、捕走2人，另有多人负伤，余者被清军马队冲散。杨福同在石亭村中留下30多名清军，限令义和团在3天之内解散，然后得意扬扬地率队回到涞水城内。

自杨福同来到涞水后，义和团队伍连番遭到挫折，阎洛福等义和团首领不禁有些愤怒，决定对杨福同还以颜色。他们一方面广散揭帖，邀约团民赶往石亭村，一方面坐将下来，进行周密的策划。大师兄、二师兄等对杨福同恨之入骨，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阎洛福见人人摩拳擦掌，十分高兴，他对大家说：“杨福同近日在这里连番得手，杀伤我们弟兄不少，我们是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然，他还真以为我们就怕他。我想，这小子狂妄自大，加上几次取胜，肯定认为我神团不堪一击。我们正可利用这一机会，设法再把他引出城来，杀他个人仰马翻。”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得到了战友们的赞同。

5月22日，由新城、定兴、容城、房山、涿州、易州等县应邀而来的义和团共数千人，赶到石亭村，对留驻于村中的小队清军进行围攻。杨福同闻得消息后，不禁哈哈一乐道：“这些无赖拳匪，真是不知死活，几番吃我败仗，居然还敢闹事。只是他们忽聚忽散，剿之不尽，却也令人气恼。今天我得给他们点厉害瞧瞧，好让他们知道马王爷头上三只眼。”当即带马步清军70多人，杀气腾腾地由县城出发，扑向石亭村。

待杨福同逼近石亭村时，事先安排在村外望风的团民已然看得清楚，乃返身回村，告诉了阎洛福。阎洛福一摆令旗，数千团民们迅速撤出村子，在村北两狼山的一条峡谷中设下了埋伏，并派出小队团民引杨

福同追杀。

杨福同赶至石亭村，见义和团已经离去，不禁气恼非常，即挥队向北追杀。当他追至两狼山脚下时，手下有人提醒他注意不要中了拳民们的埋伏，他却狂妄地说道：“小小拳匪，能有几人识字，几人知兵。这个地点倒是设伏的好地方，可惜这些人谁能够想出这样的妙计来？”说着话，手中马鞭一挥，督率清军扑进峡谷。正得意间，忽听两厢杀声震天，漫山遍野的义和团民从两边杀出，与清军展开激战。至此，杨福同才暗悔自己确实小瞧了义和团。他拔出战刀，一面与冲到近前的拳民厮杀，一面破口大骂义和团民为匪徒。忽然，一名义和团战士冲到他的马前，手起刀落，砍断了马腿，杨福同由马上翻身栽下。义和团民恨透了这个家伙，不等他站起身，纷纷举刀将其剁死。有两个清军差官见主将落马，扑向前来营救，也被义和团民挥刀砍杀。其余官兵溃逃而去。

直隶总督裕禄得知杨福同被杀的消息后，大为震惊，赶紧向朝廷奏知此事，并在上奏中提出“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如敢再行抗拒，即严行捕剿”的主张，同时调聂士成部步队三营、邢长春部及原驻天津马队和驻高碑店马队数营，开往保定、涞水和涿州，会同镇剿。

但是义和团经过石亭一仗，士气大震，面对着清军的大队官兵，也不稍畏惧。为了避敌锋芒，他们由涞水转往北距北京仅30里的涿州，数日之内，聚集了约有3万之众。5月27日，义和团占据了北京南部门户涿州城，涿州知州绝食三日，自尽身亡。义和团还在涿州城的四门上下，树起了“兴清灭洋”的大旗，数万名团民立于城墙之上，齐声欢呼，龙廷帝都已可收入眼底矣！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四 津门儿女 誓扫洋寇卫家国

1 裕禄改变了态度

还是在1899年春，天津就在山东和直隶两省的影响下，闹起了义和拳。到1900年初，拳场、团场逐渐增多。3月，王荫荣在天津西郊张家窝设立了“坎字总团坛口”。4月，山东人刘呈祥和韩以礼分别在天津西郊的高家庄和大南河设立了“乾字团总坛口”，到5～6月间，元城城厢内外也都普遍设立了拳厂。6月8日，杨寿臣在三义庙建立总坛。天津的义和团也和北京、直隶等地一样，风起云涌地发展着。到6月10日，天津城厢内外已遍设坛口，天津知县阮国桢出示禁止，无人加以理睬。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激起了中国人民更大的愤怒和更高的斗争热情。从6月14日起，义和团开始大规模地涌进天津城内。也就在这时，静海义和团首领曹福田率其所部乾字团来到天津，在吕祖庙设立总坛口，加入到抗击列强侵略的战斗行列。

曹福田，天津静海人，家境贫寒，曾经当过兵。当义和团运动兴起时，他也在自己的家乡静海、盐山一带组织义和团，队伍很快发展到数千人之众。当时，张德成也在静海一带设团，张自称为太平天国天王，曹福田就自居为天国东王杨秀清，并自称为“署理静海一带义和神拳”。他还经常往来于南皮、庆云、盐山和青山等地，积极地发展力量，组织斗争。当八国联军挑起武装侵华战争时，曹福田毅然决定把自己所部义和团队伍拉到天津，投入到抗敌反帝战斗的最前线。

义和团进入天津之后，随即展开了打教焚堂的斗争。14、15两日，义和团烧毁了天津城内的八处教堂，在30年前天津教案中被天津人民焚毁过一次的望海楼法国天主教堂，再度化为灰烬。为了支援义和团的斗争，天津城内各大小铁铺昼夜不停地为团民们打造兵器，赶制刀械。阮国桢见禁止人们练拳设坛不住，又转而禁止铁匠们帮助义和团打造兵器，试图借此遏制义和团在天津的发展。他派人扮作义和团众的模样，佯装入铺购买兵器，探听情况，然后由他亲自率领衙役，堵住街口，逐

铺搜查，把打造好的各种兵器全部收缴，不准售于义和团民。他的这种做法，令义和团民十分气愤。6月16日，大队团民涌进县衙，在公堂之上设起了拳坛，并砸开了县衙的牢狱，将被捕的义和团首领刘得胜等一百多人释放。阮国桢见势不妙，脱身逃往裕禄的总督衙门内躲避。

接着，义和团又涌向直隶总督衙门，强迫裕禄出来与他们见面。也就在这几天，裕禄对义和团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他曾多次与山东巡抚袁世凯一道，联合对直隶的拳民们进行残酷的镇压，使义和团组织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现在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朝廷决意要招抚义和团，用以抗击外敌。而列强的武装干涉，也使他觉得国家又将大难临头，民众的抗敌热情如此高涨，也使他有些感动。因此，在外患日逼的形势下，他放弃了以前对义和团的力主剿除的做法，转而主张招抚。他还上奏朝廷道：“目下天津义和团团民，已经集聚不下三万余人，整日里以焚烧教堂、逐杀洋人为事。眼下外患猝来，天津为帝都门户，负有护卫之重责，因此断难再分派兵力对义和团进行剿除，只得权且对其暂行招抚，并借以御敌，以为治标之计。”他态度的转变，使义和团在天津获得了合法的地位。现在团民们因被天津知县激怒，逼上门来，他只得出见。他对团民们好言相慰，劝说他们不要闹事，有什么要求只管对他提出，一定尽最大的可能为之解决。团民们声称，自己要打鬼子，可是手中没有武器，请总督大人发给兵械。裕禄无奈，只好命人打开武库，把武器弹药分发给团民。

总督大人态度的变化，使得团民们有些诧异，同时也深受鼓舞。他们从督衙武库取得武器后，又从各个衙门和城内富室家中征用了一批马匹鞍嚼；在天津和塘沽的码头上，没收了招商局和洋人们的大米和其他物资，用以改善自己的装备和物资供给，战斗力也因此提高。

曹福田进入天津后不久，即在谭文焕的引荐下，前往总督衙门，与裕禄会晤，就天津的战守事宜与之商量。裕禄对义和团的态度既已发生变化，同时自己也正为天津的危局而心焦不安，因此，对于曹福田的到来，自是另眼相看。他知道曹福田是天津地面上最为重要的义和团首领，自己将来与洋人见仗，正可借他一臂之力。言谈中，裕禄觉得曹福田并非如外人所传说的那样是一个“无赖奸猾”之徒，而是一个有志有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的血性男儿，心中不禁对他又多了几分好感。他对曹福田大加褒扬了一番，临别时还给了他一支大令，执掌生死之权，并可用以调动各部官兵。

英雄的天津女儿们，也冲出了自己的小天地，投身于保家卫国的战斗行列中。在天津义和团队伍中，有一支由青年妇女组织成的队伍，它就是“黄莲圣母”林黑儿率领的“红灯照”。在后来的抗击八国联军的天津保卫战中，这些英雄女儿们担任着维护治安、缉拿奸细、侦察军情、供应粮草和救护伤员的任务，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黄莲圣母更是英姿飒爽，声名远震。当她率领红灯照刚到天津时，裕禄竟亲自来码头迎接，用自己平日所乘的大轿将她抬至衙署大堂，然后身着朝服，向她行下九拜大礼，后来也还不时前往黄莲圣母的坛口拜访。对于林黑儿向他提出的要求，裕禄也尽可能地予以满足。

就这样，天津儿女们全都行动起来，时刻准备着在海河两岸抗击外敌的入侵。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西摩尔险遭没顶之灾

由于得到清政府的默许，义和团大批地涌进了北京城，闯入王公府第，有的甚至进入了紫禁城内。整个北京城几乎成了义和团的天下。在北京的列强公使们，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怎么也想不通，清政府为什么会在各国的强大压力面前，不仅没有像它所答应的那样，把义和团严行取缔，反而变本加厉地予以纵容，居然容许拳民们闯进了北京城。公使们从对清政府的颐指气使转而考虑自己眼下的处境了。他们担心会被困在北京城内，于是天天聚在一起开会，商量对策，同时纷纷致电各自本国政府，请求立即命令游弋在大沽口外的各国舰队尽快协商，采取共同的行动。

6月6日下午，列强驻大沽舰队的高级海军将领们，在英国军舰“百人长”号上召开联合军事会议，讨论中国的局势并决定在必要的时候对华采取一致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列强政府也电致各国驻华公使，授予他们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任何行动，包括调动军队的全部大权。大沽口外的各国海军将领也都接到各自本国政府令其与其他国家将领协同动作的训令。这样，由列强驻华公使们叫嚷了许久的联合武装干涉中国的计划，得到了各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列强又一次共同挑起了武装侵略中国的战争。

鉴于清政府态度的急剧变化和义和团在北京活动的猛涨，各国公使愈发感到不妙。6月9日下午到晚上，他们连续开会，决定致电大沽海军，催促他们速派联军，开至北京，解救所处的危局。在天津，列强驻津领事和前期到达租界的陆战队指挥官们，也于当日晚间在法国领事杜士兰家中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北京公使们向他们提出立即组织联军进入北京的要求。最后决定，第二天即派出一支联军队伍乘火车赶往北京，由英国西摩尔中将担任统帅，美国的麦卡加拉上校担任副统帅，同时他们还要求直隶总督裕禄为进京的陆战队准备好火车。当天夜里，列强又从大沽口外的军舰上调集军队，连夜乘炮艇和鱼雷驱逐艇，溯海河而上，于次日凌晨在塘沽登陆，转乘火车到达天津租界内。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6月10日上午，西摩尔率领由英、美、法、俄、日、意、德、奥8个国家的官兵组成的联合陆战队共2000多人，由天津火车站抢车登程，向北京进犯。八国联军武装侵略中国的战争终于拉开战幕，义和团抗击列强侵略的战斗也更加激烈了。

西摩尔自信，用不了几个小时，他就能率领首批联军冲到北京，参加各国公使为他准备好的盛大欢迎宴会，然后在饱酒足饭之后，再在中国的都城里耀武扬威一番。他压根没有把那些手持长矛大刀的义和团放在眼里，心中只是一个劲地嘲笑公使们胆小怕事、清政府软弱无能。因此，联军出发时根本没有作什么准备，每个陆战队也没有带什么辎重，每个人也只带了两三天的干粮和二百多发子弹。他们心想，从天津到北京才几多路，到了北京之后，吃的用的还能少得了。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此番向北京的进犯，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原来，为了阻止八国联军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早把京津铁路分段拆毁，锯掉沿途电线杆，使北京和天津的铁路交通和通信全部中断。所以，西摩尔联军在开出天津不远，就只能一边抢修铁路，一边向前移动。而广大的义和团民则在铁路线的两侧，埋下伏兵，随时准备给侵略军以打击。

八国联军的进程很慢。本来在正常的情况下，乘火车从天津到北京，全程只需几个小时，但是直到次日傍晚，联军才推进到京津铁路的中途廊坊车站。

12日，正当侵略军在车站附近抢修铁路时，数百名头包红巾，手持大刀、长矛和木棍的义和团战士，突然从铁路北侧冲将过来，闯至铁路线上，一阵猛砍猛杀。联军士兵们措手不及，仓皇地逃向车站。义和团则紧跟追杀。一时间，声动天地，血洒满地。团民们个个舍生忘死，与侵略者展开了惨烈的肉搏。

正当双方厮杀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美国上校麦卡加拉率领一队美国兵从后面赶到，他们在铁路两旁架起大炮，对义和团进行猛轰，团民们当场有60多人伤亡。但是义和团毫不畏惧，胆气极壮，冒着敌人的枪林

弹雨，直扑敌阵。其中一个拳民冲到麦卡加拉面前，挥起长矛向他直捌，被麦卡加拉用手枪打死。

这场以古老的刀剑对全新枪炮的战斗，持续了两天，义和团虽然伤亡惨重，但是人人心中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抱着要把洋人赶尽杀绝的信念，前仆后继地战斗着。附近村庄的义和团和村民们闻讯，也纷纷赶来助战，把这些联军紧紧围困在车站一带。他们时而上前去袭击联军，时而后撤拆毁路轨，搅得八国联军焦头烂额，心胆俱裂。

西摩尔东奔西突，靠着枪炮从义和团的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于14日晨开动火车继续北上。但是当他们开出廊坊车站仅数里，火车重又停了下来。西摩尔把头伸出窗外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再向前，铁路全部遭到义和团的破坏，路基上，空空荡荡，连根铁轨、枕木的影子都没有。义和团把枕木撬开烧掉，把铁轨拖走扔掉，侵略军想抢修铁路都没有办法了。义和团却一直尾随着八国联军，一旦遇有小队洋兵离开火车时，就冲上前去，一顿刀砍斧剁，将他们尽数杀死。西摩尔一见不妙，只得下令倒回到廊坊车站。

下午，联军留在落垡车站的一小队英军，陷入了上千名义和团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些英军架不住义和团人多势众，便开动一辆巡道车跑到廊坊，向西摩尔求援。西摩尔只得亲率一支队伍，带着大炮，乘坐火车，回兵援救。靠着大炮的狂轰滥炸，才把义和团逼退。当晚，西摩尔又匆匆率队赶回廊坊，仍然企图从这里强行向北京进发。

八国联军此时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他们一边要抢修铁路，一边又穷于提防义和团的勇猛攻击。就这样，西摩尔在廊坊与义和团相持了将近一周时间，虽然急得他火星直冒，但依旧是寸步难行。随着和义和团的多次开仗，联军的弹药消耗得很快，食物和水也成了致命的难题。西摩尔一见形势不妙，心中暗悔自己太过大意，只得派出一列火车回驰天津，想运来一些粮食和弹药。但不料想从杨村向东的铁路此时已经全被拆毁，这列火车开至杨村，就再也无法向前挪动了。

前进无路，后退无途，西摩尔坐困廊坊。6月18日，董福祥所部甘军2000多人，奉命进驻京津铁路沿线。于是义和团立即和清军将士们联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合战斗，向困守在廊坊车站的八国联军两次发起进攻。战斗从上午11时打起，一直厮杀到下午1时。尽管甘军和义和团伤亡数百人，却也给联军以沉重的打击：打死6人，打伤48人。

在中国爱国军民的联合攻击下，八国联军沿京津铁路入京的企图终于落空了。西摩尔决定放弃廊坊，撤回杨村，取道运河，由通州进京。同时他又派人赶回天津送信，求援船只和补给。但是义和团由不得他轻易逃跑，当天夜里，又一次向他发动了猛袭。

一周多来的左冲右突，挨饿受怕，使得这批撤至杨村的联军人人筋疲力尽，个个都巴望着躺下来睡上一个好觉。西摩尔也惊虑交加，数夜没有合过眼，两眼熬着赤红，十分疲惫。傍晚，他下令派出十几个意大利士兵在车站周围放哨警戒，其余官兵一律休息。这些人有的躲在车厢里，有的睡在站房里，一合眼即鼾声四起，沉沉睡去。担任警戒的意大利士兵也都数日未眠，个个困顿不堪。鼾声向他们传送着倦意，还没有等到换岗，他们就无精打采地拄着大枪打起瞌睡来了。

这时，从杨村车站四周茂密的青纱帐里，扑出了一支精壮的义和团队伍。他们轻捷地隐蔽前进，逼近车站和车厢。其中有几个团民轻身掠上站台，未等那几个疲乏的意大利哨兵有所觉察，便把寒森森的匕首捅进了他们的心窝。后继的团民们一拥而上，冲进车厢一通猛砍。联军士兵们从睡梦中惊醒，有的人还没有摸到武器，就被团民们的大刀斜肩带背地劈死。等到他们完全清醒过来，义和团战士们早已安全撤回，隐身于茫茫夜色之中，给八国联军又留下了6具死尸和30多名伤员。

西摩尔这时意识到自己的进京之路，已经水陆俱穷了。虽然他连续接到北京公使们的告急报告，但是他自身都是泥菩萨过河，再也顾不得去北京援救公使了。西摩尔明白，自己的这支队伍现在已经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进退两难的境地，继续前进不再是明智的决策了，而且，离开天津越远，他们被义和团全歼的危险性就越大。

西摩尔此时再也不愿意去冒这个险了。6月20日凌晨6时，他下令从杨村向天津撤退。由于回天津的铁路已经全遭破坏，由陆路乘车已经不可能。他只得决定把上百名伤员和所剩不多的弹药装在抢来的几只木船

上，沿北运河回撤。其余的人则沿河岸步行，由美、法、意三国军队走在前面，英、俄、日、德、奥五国的军队在后边护卫伤员。沿途之上，不断遭到义和团的袭击，他们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再也不敢与义和团短兵相接，只要一发现义和团的行踪，就立即开炮轰击。在进入天津地界后，又多次遭到曹福田所部义和团的袭击。直到6月26日上午9时，才狼狈不堪地溃退入天津租界。

从6月10日西摩尔率军登程，到26日逃回租界，前后整整16天的时间，八国联军完全陷入了义和团的汪洋之中，险遭没顶之灾。联军近2000人的队伍，被义和团和清军击毙62人，打伤228人。八国联军首次武装进犯北京遭到了失败。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老佛爷要“大张挞伐”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北京的情况。

自从5月底列强使馆卫队进入北京后，在各国驻京公使的指挥和操纵下，他们横冲直撞，欺官害民，在文明古国的帝都里，犯下了累累罪行。

6月12日，一位头扎红巾、腰系红带的人在使馆区马路上经过，被德国公使克林德看见，他不分青红皂白，认定此人是义和团民，令人捕住，交给了使馆卫队。第二天，克林德又在美国使馆门前的马路上，抓走了一名义和团民。附近的团民们闻讯前来相救，反遭美国兵的机枪扫射，伤亡惨重。同一天晚上，有很多义和团民经过崇文门，拥进北京城，当经过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使馆区时，迎面遭到两国士兵的射击。同时，奥匈帝国的士兵还向王府井大街的人群发炮轰击，团众死伤无数。接着各国卫队又集中兵力，趁夜追杀进城的义和团民，给义和团造成很大伤亡。14日，比利时公使姚士登，在东单大街上，逢人便射，打死打伤团民数十人。下午，克林德又带领一队德国水兵，在内城城墙上行走，当发现在城下的沙地有人练拳时，他毫不迟疑地下令开枪射击，当时打死团民20多人。同一天，使馆卫队又获得消息，义和团正在一个庙宇中，对几个教民施刑审问，他们派出一支马队，荷枪实弹地杀到，把30多名义和团民全部杀害。16日，他们又在另外一座庙宇中，杀死义和团民40多人。

在使馆卫队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同时，列强公使又擅自划定使馆防区，东交民巷、前门东城根、南御河桥、东长安大街、王府井大街等地，都派有各国士兵把守，戒备森严，气势汹汹，禁止中国人来往。他们在四周张贴告示，宣称：“来往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遵，枪毙尔命。”侵略气焰甚嚣尘上。

使馆卫队的血腥暴行和列强公使们的嚣张气焰，激怒了北京城内数以万计的义和团战士和爱国官兵们。他们与侵略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6月11日，因西摩尔联军迟迟没有到达，各国公使心中焦虑，他们派出日本使馆的书记生杉山彬出城探看。当杉山彬乘车行至天坛附近时，遇到3天前调驻北京的董福祥部清兵。董军士兵厉声问他是谁，杉山彬态度蛮横地告诉说，自己是奉命前来迎接西摩尔联军的。此言一出，便激起爱国官兵的愤怒，清军一个营官不等他说完，即抽刀上前，将其刺死，然后断其四肢，戮其尸身，发泄了他对洋人的刻骨之恨。

6月13日下午，千余名义和团民头裹红巾，手持大刀，开至孝顺胡同，一把“神火”焚毁了亚当斯教堂。驻守在这里的美国士兵见义和团人多势众，不敢抵抗，带着洋教士和教民们逃进了东交民巷的使馆。同日下午，双旗杆的英国伦敦会、八面槽的法国天主教堂、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的美国长老会、西四羊肉胡同的基督教堂、西直门内的法国天主教西堂、宣武门内的法国天主教南堂等11处洋教堂，全部被义和团民们纵“神火”焚毁。半日之间，紫禁城东西南北，硝烟遍起，烈焰冲天。义和团民的呐喊声响彻云霄，使在北京的侵略者们心惊胆战，同时也震撼着皇城内清政府的满朝官员。

列强卫队在皇城之外的横行恣虐，义和团和爱国清军的激烈抗击，使清政府不得不再一次认真研究对列强和义和团的态度。6月16日，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集御前会议，光绪皇帝、大学士、六部九卿等百余人参加，就对义和团的剿抚和对列强的战和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这许多年来，光绪皇帝一直憋着一腔怒气无处发泄。待群臣跪拜礼毕，他即怒诘众臣：“现在义和团在京师内越闹越凶，到处打教焚堂，洋人更是虎视眈眈，怒不可遏。我且问你们，为什么不尽力弹压，驱散教民，以息洋人之怒，保我祖宗社稷平安？”

众臣见龙颜震怒，声色俱厉，个个心惊胆战。翰林院侍读学士永亨膝行向前，乍着胆子奏道：“臣刚才在董福祥处，他自言可以把拳民尽数逐出城去。请皇上下一诏谕，责其去办就成了。”不等他说完，端王载漪在一旁伸出大拇指，厉声嘲讽道：“好主意！这倒是失却民心的第一法门！”永亨慑于端王威势，再不敢言语。

太常侍卿袁昶在槛外高声说道：“臣有话上奏！”光绪帝没有好气地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传旨召进。袁昶说道："拳民实乃乱民，朝廷绝不能引为恃仗。就算他们有邪术，但从古到今，从没有听说过靠邪术能够成就大事的；对于洋人，绝不能轻易开衅。内则纵容乱民，外则列强肇衅，内讧外患，国家危矣！"

慈禧太后别有心意，隔帘对袁昶道："法术虽不足恃，难道人心还不足恃么？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可借助者，仅止人力而已。倘再失民心，则国家之本将何以安处？"停了一下，她接着说道，"现在民心也已变动，总当以顺应民心为紧要之事。故卿之所奏，不合道理。"

袁昶重又争辩道："民心从背叛朝廷到忠心朝廷，这只是左道拳匪迷惑人的说法。只要捕杀拳匪的首要人物数十人，余者都是乌合之众，当可望风而散。如果我们自己剿办了拳民，尚可望免得外国调兵入京，代我剿办。否则，洋人陈兵于外，拳匪交哄于内，大局就不好收拾了。"太常少卿张亨嘉也在一旁说："拳民实不足以为朝廷之恃。"慈禧太后总是在帘后摇首不纳。

仓场侍郎长萃跪在张亨嘉后面，大声说道："义和团民皆是义民。我从通州来，那里若无义和团卫护，则早就落入洋夷手中了。"载漪、户部侍郎傅良等闻言附和，都说人心不可轻失。

光绪皇帝说道："人心何足恃耳，只是给朝廷增添祸乱而已！现在你们张口则人心不可失，闭口即称兵开仗，想数年之前的朝鲜一役，创巨痛深，至今犹新。何况今日以诸国之强，十倍于昔日之日本，吾国若何就能抵挡？"载漪道："董福祥军，颇有斗志，昔年剿除叛回，立下大功。今日用之抵抗洋人，当能有所斩获。"光绪帝摇头道："董福祥骄纵难用，敌人又是精兵利器，已非昔日叛回所可比拟。"侍讲学士朱祖谋也在一旁称董福祥"无赖不可用"。

一时之间，大殿之上，群臣纷纷奏对，皇帝、太后各自发表意见。对于义和团，有人说剿，有人说抚；对于列强，有人主战，有人主和。议论纷陈，莫衷一是。最后，慈禧太后决定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进京。同时派人安抚义和团，设法解散。然后散会。

慈禧太后对洋人是又恨又怕。同样，对于义和团，她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她一直有一丝幻想，想利用义和团击败洋人，以雪历年之耻。所以在端王等人的游说下，心中倾向于招抚义和团。17、18、19日3天，慈禧太后连续召集群臣会议，决定方案。

就在19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满朝文武大惊失色，慈禧太后更是惊恐异常。当天决定，招抚义和团，对列强宣战。会上，慈禧太后即命许景澄到各公使馆传谕，限令他们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同时寄谕裕禄，令其招抚义和团，用抵洋兵。光绪皇帝不愿轻启战端。当许景澄动身前往各国使馆时，他牵着许的手道："先不慌着走，待慢慢商量个妥当之策。"慈禧怒斥道："皇帝放手，不要误事！"侍郎联元也向慈禧谏道："法兰西为传教国，战衅也只是启自于法。即便要战，也只应对法国一国宣战，断无与十一强国结怨之理。否则，国家危在旦夕矣！"言毕伏地痛泣。慈禧太后此时早已怒气攻心，失去理智，再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列强用了五六十年的时间，在这东方的国度里建下了无与伦比的"基业"，捞到了前所未有的益处，岂是清廷一句话便能赶得走的？在接到清廷的逐客令后，当天晚上，各国公使复函总理衙门声称：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期限过于苛刻了，我们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再者，义和团到处活动，京津之间铁路交通完全断绝，安全没有丝毫保障；中国政府必须担保没有危险，我们才能考虑离开北京回国的问题。很明显，列强费了好大的劲才迫使清政府允许他们在北京派驻公使，好就近取便，左右清廷。虽然现在他们对义和团的激烈反洋运动十分恐惧，但是要想让他们轻易离京回国，注定是不可能的。

20日晨8时左右，各国公使聚集在一起协商如何应付清廷的照会。德国公使克林德认为，如果到总理衙门进行一番恐吓，按照以往的惯例，肯定能够迫使中国屈服，从而放宽他们出京的期限。其他各使都不大同意他的看法，他们心知，中国朝廷既已下令赶他们出京，则对洋人的态度肯定变得十分强硬，义和团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朝廷的纵容。所以，现在前往总理衙门是毫无用处的，甚至到时没人出来接待他们。

克林德没有说服别人，乃决定自己一人前往。他随身偕翻译人员和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数名水兵，行至东单时，遇清军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率领部下数十人沿街巡逻。克林德不仅拒绝清兵拦轿盘查，还首先从轿中向恩海等人开枪。恩海闪身让过子弹，拔枪反击。枪声响处，轿夫四散，克林德被当场击毙。

听到克林德的死讯，德国进京的卫队，荷枪实弹，倾巢而出，然而等他们到了出事地点，除了地上的血迹之外，余下只有尘土飞扬。轿夫和清军早已踪影全无。于是他们伙集别国土兵，在街上四处寻衅，开枪乱射，打死打伤许多无辜平民。

义和团民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20日下午，他们出动数千人，联合董福祥部甘军，张旗列队，开到东交民巷，开始围攻列强使馆。他们从东交民巷东西两端分别攻入，一部分拳民手持火把，猛向前冲，直扑洋人使馆的楼房；另一部分拳民则攀援登高，呐喊助威，声动天地。有的拳民找来长竹竿，把火把绑在竿头，捅破百叶窗子，扔入室内。一时间，紫禁城外，顿起一片火海。不到两个小时，东交民巷东口的意大利、比利时、奥匈帝国的3座使馆和西口的荷兰使馆被火焚烧。义和团和爱国官兵们攻破了洋人的第一道防线。使馆卫队只得退防台基厂大街以西。

6月21日，慈禧太后在洋人的步步进逼和义和团及爱国清兵抗击侵略热情更加高涨的形势下，发布了宣战诏书，声称要向列强“大张挞伐”。诏书中称义和团民为“义民”，为“朝廷赤子”，表示要以二十余省、四万万生民，恃天理人心，与列强之奸谋武力对仗，以“剪彼凶焰，张我国威”。同一天，义和团大队人马开到西什库，开始攻打法国天主教北堂。这样，在皇宫的西北角上，又点燃起了一处反帝烽火。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五 国都沦陷 北京城惨遭浩劫

1 李秉衡哀叫三声“死罪”

下一步，八国联军的目标便是杀向北京，去占领这座中华帝国的文明古都，再次把清政府打垮打服。

8月4日，联军1万多人，从天津出发，沿着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5日联军占领北仓，6日攻下杨村。宋庆、马玉崑收集残部败退通州。直隶总督裕禄见大势已去，事不可为，口呼智穷力竭，有负国恩，自杀殉国。

8月6日，时任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的李秉衡带同几个幕僚，出都御敌。李秉衡，奉天海城人，字鉴堂。对于外强凌侮，他一贯主张抗击。1897年巨野教案中，因其对大刀会采取纵容的态度，并表示要坚决抗击外族的侵略，在德国的压力下，被清政府革除山东巡抚职。从1900年起，清廷起任他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他依然积极主张抗战，并曾亲赴江阴江防阵地，饬令官兵，凡发现有敌舰入江，便可开炮轰击。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天津后，李秉衡奉朝廷之诏，率师进京“勤王”。在慈禧太后面前，他力阻屈膝求和，强烈要求开赴前线，与八国联军决战。7月底，慈禧太后任命他为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节制各省进京勤王之师，抵御列强来犯之敌，保卫京师。

李秉衡受命于危难之际。临出国都，他慨然宣誓道：“宁为国而捐躯，勿临死而缩手。”数百名义和团民感于他的一腔斗志，紧随其旁，开往前线。

8月7日，李秉衡抵达码头，与夏辛酉的勤王军会合后，继续向前。9日，到达河西务，齐集所辖勤王之师张春华、陈泽霖、万本华和夏辛酉四军。这时，八国联军已尾追溃败的清军至河西务。李秉衡虽名义上节制四军，但实际上，各军将有惧心，兵无斗志，自是无力与来势汹汹的八国联军对抗。在八国联军的猛烈攻击下，河西务很快失守。李秉衡只得退至码头。

李秉衡依然想重振旗鼓，与联军决战。无奈联军来势太猛，各路勤王军军心涣散，畏敌如虎。陈泽霖军不战自溃，逃奔济宁；张春华军望风披靡，狂奔而溃；万本华军溃逃向北，败退山西；夏辛酉军败而向南，逃往山东。李秉衡再退至通州张家湾。

8月11日，八国联军攻至张家湾。这时，随同李秉衡出京的数百名义和团民也被八国联军打垮冲散。在他的身边，除了几个幕友外，已无一将一卒，再无丝毫力量抵御联军。李秉衡见败局已定，勤王无果，心情惨痛。他对身旁幕友痛诉道："弟此番奉诏出都，勤王御敌。但连日来目击情形，令人痛心。军队数万充塞道途，然皆存惧敌之心，闻得敌讯，则即溃逃一空。弟虽名义上节制各军，督师抗战，实未一战，吾心何甘！致令洋人所经，焚掠一空。弟自少及老，所经兵火，不在少数。兵将似今日情形者，实属罕见。国家积弱，屡蒙外辱，岂旦夕之故哉！岂旦夕之故哉！这张家湾一地，就是我的死所了。你们各寻生路去吧！"言毕痛泣。

遣散诸僚之后，李秉衡面向京师，匍匐于地，惨声高喊："皇上！皇太后！臣上负朝廷隆恩，下负生民热望，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人心之人了！臣心力交竭，天下事从此不可问矣！臣死罪！死罪！死罪！"说完服毒自尽，捐躯于国门之下。

李秉衡死后，八国联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张家湾。12日，联军向通州进攻，宋庆望风而逃，通州这座古城落入联军魔掌，即刻化作一片废墟。13日，八国联军经过一路烧杀，在身后抛下了一片片焦土瓦砾后，终于兵临北京城下。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慈禧的“西狩”

在八国联军的大队人马杀到北京之前，各国公使和使馆卫队一直处于义和团和清军的围困之中，惶惶不可终日。从6月21日清廷向列强宣战后，大队义和团和清军开至东交民巷使馆区，由荣禄统率，轮番攻击。但由于使馆区内的洋人依仗着坚墙高壁，进行拼死抵抗，中国军民虽猛攻多日，却始终不能攻下使馆区。

地处皇宫西北角外的西什库教堂，也成为义和团与侵略军作战的主要战场。西什库教堂又称北堂，是法国天主教在北京城内最大的教堂，同时也是列强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指挥部之一。法国主教樊国梁在这里经营多年。为了对付义和团的攻击，他把先行进京的使馆卫队中的40名法、意士兵调到北堂，并把数十名洋教士和上千名教徒聚集在一起，组织武装，负隅顽抗。

就在义和团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候，皇城内的慈禧太后却又逐渐改变了态度，变战求和。她因一时火大，赌气般地向列强宣战，似乎仅为了以此向侵略军发一发脾气而已，一旦她发觉自己的震怒未被列强放在眼里，列强反倒是步步进逼时，她转而变得低三下四，开始向洋人眉目传情，试图求和了。对义和团，她一方面控制利用，一方面瓦解剿除，使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蒙受巨大的损失。

驱逐洋人出京和宣战诏书发布还不到5天，6月25日，慈禧太后就令荣禄差人在御河桥上悬起了白旗，树立木牌，上书“钦奉懿旨，保护使馆”，并责令围攻使馆的中国军民停战，开始同使馆内的洋人议和。慈禧太后态度的骤然变化，使得中国军民非常不满，董福祥部甘军当天击毙了一名为荣禄向使馆内送信议和的使者，并再一次从四面八方向使馆区开枪射击。

但是，慈禧和荣禄都没有把中国军民奋勇抗敌的坚强决心当做一回事，这一天夜间，他们又派人为使馆区的洋人们送去面包、牛肉、鸡蛋和水果等食物，向侵略者讨好献媚。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6月26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与列强驻上海领事，议定《东南互保章程》，向列强屈服，并致电朝廷，力主剿除义和团，与列强罢战求和。7月8日，慈禧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电召入京，主持议和事宜。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北京形势骤显紧张，慈禧太后更加惊慌失措，她一面电诏各省派兵进京勤王，一面于7月17日致电美、德、法三国，乞求停战议和，同时下令清军停止对使馆区的进攻。8月7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连连电催，不分水陆，火速进京；并授权李鸿章，即日与列强政府电商，先行停战，筹措议和事宜。

可是，慈禧太后暗护使馆、卑屈求和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八国联军的理睬。侵略军依然杀气腾腾地扑向北京。慈禧太后眼见京师势将不保，一面暗骂洋人不够交情，自己这些年来对他们唯命是从，把自己的家当向他们奉送了不知几许，只是这一次自己的脾气发得稍稍大了一点，他们就不依不饶，非要打到北京来不可。同时，她也暗自在心中打定主意：一旦京师真的不能保全，说不得只能把这花花世界拱手让于洋人糟蹋一番了。她先于心中立定了“西狩”避敌的方策。8月6日，她任命大学士昆冈为留京办事大臣，同时派军机章京为前站先行，到长辛店待驾，为自己逃离京师作好了准备。消息传出，上下为之震动。

8月14日，八国联军迫不及待地向北京发动攻击，守城清军和城内的义和团与之展开激战。北京保卫战的战幕拉开。

俄军首先于凌晨攻破东便门，进入外城，接着向内城攻击，遭到内城守军和义和团的激烈抵抗。中国军民在内城城墙上的箭楼之中，向下枪炮齐发，重伤攻入的俄军。在京城东部，日军猛攻朝阳门和东直门，同样也遭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日军久攻不下，恼羞成怒，集中50多门大炮，向东直门和朝阳门猛烈轰击，炸毁了朝阳门城楼和大段城墙。到晚上9时，一队日军工兵，在夜色掩护下扑到朝阳门下，用炸药将城门炸开；与此同时，另一队日军也攻破了东直门和安定门，由东、北两个方面突入内城。但在内城，日军同样遭到了中国军民的殊死抗击，直到次日下午，日军才进至东交民巷的使馆区。

正当日、俄两国军队拼死进攻内城之际，英、美军队也向兵力空虚

的南城发动了进攻。下午1时许，英军几乎未遭到任何抵抗便攻入广渠门，突进外城，首先派兵占据了天坛。然后按照英国公使事先送来的密信上所描绘的道路，避开清军守军，在御水河中寻找到可通内城的水门，砸开铁栅栏，涉过没膝深的污水，由水门进入内城。到下午3时许，英军首先开入使馆区。1个小时之后，美军也以同样的方法进入内城，抵东交民巷。

八国联军攻入内城，北京便告陷落。但这时，紫禁城和皇城依然在清军和义和团的防御之下。进城的联军久已垂涎紫禁城内的奇珍异宝，他们决定进一步攻打皇城。

在八国联军向北京疯狂进攻的同时，慈禧太后在紫禁城内被吓得六神无主，颜色更变。14日，她一天召开5次御前会议，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决定“出京西巡”，以作暂避之计。因路途凶险，随行护驾几乎无人敢于承担。最后，能应召进宫的大臣，只有载澜、载漪、刚毅等少数几人，余者早已逃避无踪了。

8月15日，天尚未明，载澜驰入宫内，气急败坏地告诉慈禧，洋人已突入内城，并且正在准备进攻皇城。慈禧闻言大惊，身着金银宝衣，欲投水自尽，载澜上前把她拉住，劝道：“不如暂离京师，徐为后计。”至此，老佛爷可真是再也没有咒念了，她又赶忙更换轻衣便装，携光绪皇帝、大阿哥、奕劻、载漪和刚毅等十几位朝臣，由数千清军护驾，由西华门出德胜门逃出皇城，继经颐和园、居庸关等处，狼狈万状地向西“巡狩”。荣禄没有赶上随驾西巡，也仓皇地从西直门逃出，收拾残兵败将，败向保定。

在清廷上下弃国外逃的同时，八国联军向皇城发起了进攻。联军野蛮地用大炮轰开了前门、天安门，由此攻入皇城，清军和义和团付出惨重的牺牲，终于没有能抵挡住列强的攻击，被迫撤出。昔日庄重森严而又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此时已处于八国联军的炮口之下。

16日晨，联军派出法、俄、英、奥4国军队约2000余人，带着8门山炮、4门野战炮和3挺机枪，由大清门向西，至宣武门折而向北，再从西安门进入皇城，前往解除西什库教堂之围。一路上遭到隐蔽在街垒、民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房和围墙后面的义和团和爱国清军的节节抵抗。法国主教樊国梁爬上教堂高端，几次吹响法国军号，才与援军取得联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联军部队攻入北堂，解了西什库之围。中国军民与侵略者从一条街战斗到另一条街，从这个院落打到另一个院落。但是，在八国联军猛烈炮火的轰击下，他们付出了600多人牺牲的代价，最后撤出了战斗。

至此，八国联军完全控制了北京。四十年前陷落的悲剧，今日再度在清王朝的帝都重演。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六 白山黑水 军民携手战仇雠

1 东三省的义和团

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东北三省。这一年的3～4月间，营口一带盛传有神师降世，专收青少年为徒，传授神技，刀砍不伤，火烧不焚，当地很多民众争相加入。到5月初，奉天城就有人公开设坛练拳，收徒传艺，组织义和团。当时有一个叫张老道的义和团首领，从关内来到东北，在盛京东部地区收徒聚众，传授神拳，义和团运动在东北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东北地区的义和团也同北京和天津地区一样，男的称作义和团，女的称为红灯照，一时之间，练拳入团，蔚然成风。

随着义和团在东三省逐渐走向高涨，长期潜伏在东北地区的白莲教之一支礼教这时也开始公开活动。他们同义和团结作同党，以师兄弟相称。到6月间，奉天、盛京和黑龙江三省均出现了义和团组织。他们到处散撒揭帖，耍刀舞棒，扬言要杀尽天主教和耶稣教中之人；同时还拆毁铁路，焚烧教堂，逐杀洋人，给列强在东北地区的侵略权益以极大的打击。此时，正值直隶义和团大批拥进天津、北京，东北地区的义和团也深受鼓舞，热情更加高涨。7月间，奉天省内自海城向北到开原的铁路，除鞍山站之外，全部被义和团拆毁。天主教在盛京的总堂也被团众焚毁，主教纪隆被击毙。在吉林和黑龙江省境内的洋教堂同样遭到义和团的攻击和焚烧。这样，从奉天南端的辽东半岛到黑龙江畔的瑷珲城，从三省东部地区的珲春、牡丹江到西部地区的扎兰屯，义和团在整个白山黑水间点燃了反洋斗争烽火。

中国广大的东北地区，一直被沙皇俄国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俄国人既不容许其他列强势力伸入这一地区，同时更不能容忍中国人民的反抗。而最终侵吞中国的东三省，更是沙俄长久以来的既定国策。义和团运动在东三省的蓬勃兴起，使沙俄在东北的权益遭到很大的打击。所以，俄国在与其他列强一道挑起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的同时，又决定单独大规模出兵中国东北地区，镇压义和团运动，维护其在这一地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区的特殊权益，进而实现它制造一个“黄色俄罗斯”的迷梦。

俄国财政部大臣维特和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曾就此事进行多次密商，库罗巴特金当时就十分露骨地叫嚷道：“义和团在东北地区的反抗，将给我们一个占领满洲的借口，我们正可借此时机把这一地区变成第二个布哈拉。”维特似乎更狡猾一些，他不愿一下子撕去“和平友好”的虚伪面具，过早地对中国采取毫不掩饰的战争手段。他认为：“我们暂时不要去有意地激怒中国人，这样才好保持我们在满洲的地位和利益。”沙俄政府也不希望即将竣工的中东铁路受到战争的影响，同意了维特的想法。6月26日，维特致电清廷内部亲俄的李鸿章，虚伪地声称：如果能使满洲的中国官吏维持地方秩序，并能设法保护北京使馆及俄国侨民，则俄国决不对华宣战。同时，他还电令俄派驻中国的机构对李鸿章及东三省的军政长官予以重金行贿，企图借清政府之手，扑灭义和团在东三省的反帝怒火。

但是，义和团的铁拳把维特的“和平”侵略计划击得粉碎，东三省人民的反抗斗争更加走向高涨。维特恼羞成怒，收起了他以往的虚伪面孔，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建议，对中国东北地区出兵10万至15万，并叫嚣着要把中国人打得粉碎。

尼古拉二世接受了维特的建议。从6月下旬开始，他宣布沿阿穆尔军区的军队进入战备状态，并在该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进行军事动员。6月29日，沙俄南乌苏里派遣军和外贝加尔派遣军，共计22个步兵营、26个骑兵连，携带70门大炮，开往东北中俄边境。与此同时，中东铁路沿线的“护路”军队也开始频繁调动。沙俄大规模入侵的战争阴云，笼罩在东北地区上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寿山联民御侮

黑龙江将军寿山，字眉峰，1860年生于瑷珲。他是明末著名抗清将领袁崇焕的七世孙。甲午战争中，曾与其弟永山一道，提师南下，在凤凰城与日军血战数日。永山战死，寿山重伤。1899年，寿山被朝廷任命为黑龙江副都统，帮办边防练军事宜。1900年1月，前黑龙江将军恩泽病故任所，由寿山署理将军一职，主持江省军政。寿山上任伊始，目睹着外患日侵，国难迫切，乃废寝忘食，加紧训练新军，整顿军务，同时对江省吏治积案予以清理整治，革除弊端。不数月，黑龙江省军务吏治为之一振。

寿山从东三省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中，看到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刻骨仇恨，同时也看到了蕴藏在人民中间的巨大力量，于是决定联民抗敌。6月末，他出示招募团民，认真备战。7月上旬，江省军民开始并肩战斗，向盘踞在境内的沙俄侵略者展开进攻。

对于沙俄的侵略阴谋，寿山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各国觑我积弱，谋之已久。不厌其欲，必不可止。”战争之势业已形成，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力量，誓死抵抗外来入侵。所以在俄国人的汹汹来势面前，寿山一面加紧练军备战，一面积极地组织义和团力量，联合军民，决心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7月1日，寿山上奏朝廷，剖陈东三省所面临的形势，力主战议，敦促朝廷断大计，固根本，安人心。他在奏折中写道：“从前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故甲午一战，营勇见敌辄溃。前事未远，负痛方深，将士半系阅历之人，各省亦多精练之卒，正宜及其锋而用之。”在侵略者面前，我愈退而敌愈进，我愈畏而人愈欺。所以他恳请朝廷，示敌镇静，万勿动摇，不失时机地利用民心人力，与敌决战到底。

这时，八国联军已经攻占大沽炮台，广大的爱国官兵和义和团众也正在天津与敌人进行殊死鏖战。在发出奏折的当天，寿山接到了军机大臣函文，令他分练义和团民，厚集兵力，以御来敌。接旨后，寿山即于7月2日对黑龙江副都统发出咨文，令其备兵设防，编练义和团民，同时

还令各部修理库储之旧有军械，发给团民，共事抗敌。

7月8日，沙俄阿穆尔总督格罗德柯夫借口“护路”，向寿山提出要把集结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俄军，途经瑷珲、齐齐哈尔，开往哈尔滨。寿山当即严词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并郑重地向俄国人提出：铁路在中国境内，自由中国负责保护，俄军如有进犯，定将遭到坚决回击。同一天，寿山又致电出使俄国大臣杨儒，请其转告俄国外交部，重申这一立场。

其实，出兵“护路”只是俄国人的一个幌子，沙俄的真正目的是要吞并整个中国东北三省。尽管它曾一再表白自己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只是为了护路和镇压暴乱，但是实际上，连他们自己也公开承认，他们是借义和团反帝斗争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自己谋求利益。“从战事一开始，军部的欲望不仅是要惩罚义和团，而且也是想吞并满洲，这是一件公开的秘密。”

沙俄决意对中国扩大战争，对寿山的声明没有理睬。7月12日和13日两天，满载军队和战备物资的俄国兵舰和驳船，沿水路下航黑龙江，运往大沽、旅顺和哈尔滨等地。14日，阿穆尔军事长官格里布斯基派出一队俄兵企图越江偷袭瑷珲，拖带着4只驳船的“米哈伊尔”号轮船和拖有两只吊帆的“色楞格河”号军舰也奉命支援岸上行军的部队，准备随时把他们运到右岸。

寿山全力部署战备。他委派瑷珲副都统凤翔、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通肯副都统庆旗，分任北、西、东三路翼长，负责瑷珲、呼伦贝尔和呼兰各县的防务，并委派程德全为行营营务处总理，往来于各军之中进行联络。寿山明令凤翔等人：“如果俄兵过境，宜迎头痛击，勿令下驶！”

7月14日，俄军舰船继续顺流而下，当驶至三道沟附近的河面时，受到瑷珲守军的阻截。俄舰头目科尔什米德上校强令两舰起航，并发炮轰击卡伦山清军营地，企图越江。清军官兵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清军将士英勇作战，毙伤敌军7人，重创俄军两舰。15日，格里布斯基又令俄军舰船进攻瑷珲，并亲率骑、步、炮兵增援。双方枪炮齐发，交战激烈。当晚，中国黑河驻军炮击对岸海兰泡俄军，给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侵略军造成重创，粉碎了敌人渡江入侵的阴谋。

格里布斯基渡江不成，反受重创，十分恼怒。他反咬一口，硬说中国军队开枪挑衅，决计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报复。7月17～21日，他指挥俄军连续在黑龙江左岸中国的领土上制造了海兰泡大血案和江东六十四屯大血案，在不到四天的时间里，俄国侵略军残杀我无辜同胞一万三四千人，然后把尸首推入黑龙江中，滔滔江水，为之塞流。

寿山闻知惨讯，痛心椎骨，怒不可遏。他下令瑷珲守军痛击来犯之敌，并主动打过江去，为死难的无辜同胞报仇。瑷珲副都统凤翔眼见着同胞的惨死，更是怒火万丈，毅然下令驻军，踏浪渡江，进击俄军。7月17日晚，500多名义愤填膺的爱国清军和义和团战士，乘船飞渡黑水，到了与右岸的卡伦山相对的卜尔多屯，在江东六十四屯苦难的同胞们的配合下，埋伏于俄军一号哨所附近的一处洼地里。18日凌晨，中国军民在这里首先伏击了由一号哨所蹿出的百余名俄军。经过一场激战，打得敌人抱头鼠窜，在身后抛下一具具尸体。留于哨所内的数百名俄军听到枪声，从睡梦中惊醒，顾不得穿衣着靴，仓促应战，被中国军民打得乱作一团，狼狈地窜往渡口，爬上轮船，逃往精奇里江北岸。这一战，打死打伤俄军不下100人，给侵略军以应有的惩罚，同时也为江东六十四屯的同胞们渡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8日当天，英勇的中国军民，安全渡江，回到了瑷珲。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齐齐哈尔的陷落

8月16日，俄军再度疯狂反扑。连年刚博夫集中6个步兵营、5个半骑兵连、20门大炮的兵力，猛攻北大岭。署北路翼长恒玉督率中国军民浴血苦战，重创敌军。但终因孤军无援，武器落后，将士死伤惨重，不得已于当日晚撤离。撤离时，练军一营营官赵德春率所部力战掣敌，不幸阵亡，全营将士争前死敌，全部壮烈牺牲，北大岭终陷敌手。俄军随即翻过北大岭，直扑齐齐哈尔。

凤翔死讯传至省城，寿山不禁痛哭流涕，仰天长叹道："天乎！奈何夺我左右手耶！"他当即电令自己在北路军中的儿子，为凤翔善治后事，视若父丧。他本人也亲至齐齐哈尔北关，设奠哭祭。

大兵压境，痛失良将，寿山心焦似焚，坐卧不安，思欲把将军印信交付江省副都统萨保护理，自己亲赴前线督战，萨保等人苦苦劝止，终未成行。

8月18日，俄军进逼墨尔根城，副都统博栋阿不事抵抗，所部弁兵，全行溃散，墨城陷落。接着，俄军又攻陷布哈特。恒玉率军退于博尔多的河南屯，据守讷谟尔河南岸。

在北路俄军长驱侵入中国东北的同时，西路军也于7月30日由阿普该图侵入，先后占领了完工车站、海拉尔，然后经雅克石、免渡河，向兴安岭另一要地西大岭进犯。退守西大岭的中国守军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主动出岭迎击敌军，打了几次胜仗。8月13日，在雅克石和免渡车站，双方激战甚猛，中国守军踏破敌军营寨9座，迫退敌军900里。但后来在呼伦贝尔附近的小桥子、黑山咀一带，受到敌人的四面包抄，损失很大。24日，俄军又自火燎沟窜入，进犯西大岭，中国军民腹背受敌，西大岭失守。东北路俄军也很快攻至呼兰。中国军民与敌人在这里展开浴血厮杀，情势十分严峻。

然而，在东北军民为保卫国土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的关键时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却被侵略者的汹汹来势吓破了胆，变战求

和。8月7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主持与侵略者谋求妥协求和事宜。8月14日，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西奔西安。15日，李鸿章分电列强，请求罢战求和，未获列强答应。

关内京津之地，八国联军群魔乱舞；关外齐齐哈尔三面受敌，形势十分严峻。在此情况下，黑龙江将军寿山的抗俄意愿仍然十分坚定。他因亲赴前线督战未能成行，乃派行营营务处总理程德全赴前线督战，迎击来敌，同时向恒玉发出指令，要求他一定要扼守住讷谟尔河南岸。在省城，因守城兵力已然空虚，他更加紧操练义和团，恃为长城，又令萨保抓紧时机，挖沟掘壕，准备固守。

8月19日，寿山接到吉林将军长顺来电，称驻俄公使杨儒来电说俄国人有意缔和。24日，又接到上谕，告诉他朝廷已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并指责他妄开边衅，罪在不小。

本来，寿山此时已然心惨意痛，拟与俄国人拼个鱼死网破，与省城齐齐哈尔共存亡。但是长顺的来电和朝廷的上谕，使他有些进退维谷了。然朝廷之命终难抗违，他只得写信给屯驻于博尔多的程德全，告诉他：朝廷已经派任全权大臣与各交战国议和，则俄国也自当在内；京师既已与俄国议和，则东三省亦自在内。指示程德全与在博尔多的北路俄军议和谈判，阻止俄军向齐齐哈尔推进。

但沙俄对中国的东北地区觊觎既久，战端已开，自无“缔和”之意。8月19日，尼古拉指令侵华俄军在占领北京之后，应将主要战场自直隶移向东北三省。格罗杰克科夫也致电俄陆军部大臣库罗巴特金建议：“把俄国与中国的边界向南推进，将额尔古纳河与阿穆尔河的右岸和乌苏里江的左岸满洲的一部分，并入我们的领土是绝对必须的”，并且还认为，沿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小兴安岭、肯特岭、老爷岭和崔家沟岭等山的山脊与中国划界，是俄国“应当提出的最低要求”。

程德全奉寿山指令，三次亲赴俄营与敌军当局谈判。但是，连年刚博夫秉承沙皇的意旨，狂妄地叫嚣：“我们不和中国人谈判，要坚决地向齐齐哈尔进攻！”程德全阻止俄军向齐齐哈尔进犯的意图不能达到，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只得与连年刚博夫议定：俄军不攻城、不夺财产、人民官吏愿去者不阻、俄军在城北2里安营、清军向南撤离等。同时他飞函把情况向寿山禀告。寿山见无法阻止俄军来犯，齐城处于兵少饷绝的困境，而朝廷却又三番两次地电责他“妄开边衅”，他心知败局已定，遂抱拼却一死，以图保全齐城吏民的心念，静观待变。

俄军长驱直入，进逼齐齐哈尔。8月28日，连年刚博夫出尔反尔自食其言，片面撕毁了与程德全所订的和议，下令炮击南撤的清军，对齐齐哈尔发动攻击，同时口口声声要见寿山。寿山在衙署之内听到炮声，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决意以身殉职。

寿山死意既决，召集恒玉及瑗珲五司各官，黯然说道：“现在大局已成瓦解之势，士气损丧，不可复振。我身为江省将军，进不能保疆卫土，退不能抚吏安民，损兵失地，万身莫赎。只能图报来世了，后事汝等好自为之。”他又嘱托程德全和萨保说：“寿山辜负国恩，不能战，不能守，亦不能与俄人见面，万望汝等勉力忍耻，保全性命，收拾残局，护我江省父老。”言毕，泣下沾襟。他还致书连年刚博夫，请求他静候朝廷意旨，万勿残杀城内无辜居民。又把将军印信和阖省之旗营官民与残败练军托付给萨保，携回内地，以期各有着落。

然后，寿山写下他给朝廷的最后一道奏折。在奏折中，他痛陈江省因兵饷两绌、增援不至而致惨败的经过，表彰在抗战中忠勇献身的将佐，向朝廷保举卓建功勋的官员，恳请抚恤阵亡将士，并恳切地向朝廷提出了开设旗垦、增设民官、切实布防等治理江省的办法，以期强盛于异日。他还留书程德全等人，嘱托他们免死忍耻，代他向世人剖白自己战守两难、进退维谷的心迹，并期望他们可“图展鸿谟于他日，并可代弟吐气于将来也”，字字句句，直如杜鹃啼血；一腔忠贞，恰似长虹贯日！

一切安排妥当后，寿山命左右抬出棺椁，身着朝服，就卧于其中，吞金腹中，从容就义，时年仅41岁。

寿山死后，8月21日，连年刚博夫率领俄军进入齐齐哈尔，至此，黑龙江省全境终告沦陷。与此同时，其他几路俄军也分别攻占了吉林、

奉天两省，哈尔滨、珲春、吉林、盛京、营口等城，全部陷于沙俄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无辜的东三省人民陷进了深深的苦难之中。

但是，沙俄侵略者的淫威没有使东三省人民屈服，他们很快擦干了丧亲失家的痛泣之泪，重新拿起武器与侵略者展开了战斗。在海龙、通化、宁古塔，在所有的城镇乡村，中国人民重又点起了抗击侵略的烽火。他们发动了大小数百次的战斗，先后克复十余个县、数十个村镇，涌现出一大批为民族生存舍生忘死的英雄，形成了巨大的抗俄声势，显示出了中国人民保卫国土的坚强决心，粉碎了沙俄制造一个“黄色俄罗斯”的美梦。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七 朝廷卖国 义和团扫清灭洋

1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一旦真的与列强翻脸交战，慈禧太后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绝非洋人的对手。八国联军兵临皇城，也使她彻底明白了自己假义和团之手消灭洋人、重新封关锁国以成一统的美梦已然化归泡影。怀着对洋人的极端恐惧，慈禧一行仓皇逃离京城，出居庸关，一路向西逃去，经宣化、大同，9月10日，行抵山西太原。山西巡抚招待甚殷，把他们一行安排在巡抚衙内。一个来月的逃亡生活，使清廷君臣文武历尽了风霜雨露，尝尽了辛酸苦辣，早已失去了往日在紫禁城内的森森威风。

逃亡路上，慈禧太后在车辇之中，担惊受怕。她越想心中越不是个滋味：40年之前，自己就曾和咸丰皇帝一道，被英法联军逼出京师，逃亡奔命。不期想40年后的今天，自己又遭此厄运，真是造化弄人。但此时慈禧太后却逐渐消却了对洋人欺凌的一番怨气，也不怪自己朝廷的腐败卑怯及疆吏将士的无能，反倒觉得义和团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洋人们携枪带炮，紧追不舍，她不敢发作；但这积压在心中的怨毒，她只得找借口向义和团身上发泄了。9月14日，清廷在太原颁下谕旨，声称：这次祸端全由“拳匪”引发，虽然朝廷多次降旨对之严加痛剿，但是拳民仍然胆敢到处啸聚，杀害良民，抢劫财物，视朝廷法度如无物。如果不对之严行剿办，则不足以惩凶戒顽。所以，命令直隶省各路统兵大员，对凡是有拳民聚集的地点，则勒令缴除器械，即日解散；倘使义和团再敢反抗，即当痛加剿除，“以清乱源而靖地方”。

昨日尚自对义和团昵称为“朝廷赤子”，今天却就如狗脸一翻，严令痛剿。堂而皇之的词句，掩饰不住慈禧太后的媚外嘴脸和卑怯心理。

八国联军在京、津、直隶一带四面出击，慈禧太后在太原如坐针毡。她觉得自己依然没有逃出危险地境，决意率领随行文武，离开太原，继续西逃。10月1日，清廷一行由太原再次动身，经平遥、介休、侯马，渡黄河，入潼关，过渭南，于10月26日到达西安。路途所经，各个州县铺张接待，扰民征捐，最终还是苦了平民百姓。到西安之后，慈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禧一行先驻于南院陕甘总督府署，不久即移往北院巡抚衙内。此后一直在这里滞留。直到八国联军撤离北京，方才离陕返京。

早在7月8日，清廷即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召其北上，主持议和。8月7日，清廷又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令其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两日后，李鸿章便遵从上谕在上海致电列强各国政府，请求接洽议和谈判事宜，但是遭到日、美、德等国的奚落和拒绝。德皇威廉二世当即明白地表示：“如果李鸿章落到我们手中，我们将扣他作为人质。”同时，威廉还狂妄地扬言：“在最近的将来，不是外交而是用武力来决定一切！”他希望利用时任八国联军最高统帅瓦德西的权力延宕战局，彻底击垮正在逃亡途中的清政府，以为将来向中国提出最高限度的侵略要求打下基础。所以他直言不讳地明令瓦德西：“中国人只要胆敢反抗，就把他们打碎！对于战后赔款的索取，也务必提高到最高的限度！”

对于李鸿章的全权代表的身份，各列强国家也各持有不同的态度，分歧很大。俄国一直希望装扮出一副伪善的面孔，首先向列强各国提出了撤兵议和建议，试图以此博得清政府的好感和信赖，换取它在中国东北三省的独霸权益。8月17日，俄国外交大臣即通知列强政府，请求各国同意李鸿章前往大沽，并接受他全权议和大臣的资格。

但是，列强为了各自的在华利益而勾心斗角。俄国人迫不及待地表态，李鸿章又素有亲俄的倾向，使其他国家都觉得俄国人居心叵测，深恐俄国政府通过李鸿章与清政府进行秘密交易，进而侵害各自的在华权益。所以，英、日、德等国都极力反对李鸿章作为议和全权代表。李鸿章虽迭次致电各国，呼吁停战议和，均未被理睬。

李鸿章数十年间为清廷倚为干城，与洋人打了不知道多少次交道，自然也不是一个愚笨迂腐之人。他看出了自己陷入夹缝之地，不被列强理睬的关节所在。8月25日，他上奏朝廷，请求添派英、美、日所企望的奕劻、荣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为全权大臣，共同办理与列强的议和事宜，用以减轻列强对议和代表的争议，早日把列强各国拉到谈判桌边来。8月31日，清政府接受了李鸿章的奏请，下谕添派刘坤一和张之洞为议和大臣，并再次敦促李鸿章迅速回京，会同奕劻力挽危局。

9月15日，李鸿章乘英轮“平安”号从上海出发，北上赴津。临行前，他联合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等人上奏清廷，以各国公使和领事们的要求为理由，请求朝廷严惩对义和团采取过纵容态度的载勋、载澜、载漪、赵舒翘、刚毅等人，以舒列强心中怨怒，为议和谈判开道。

9月18日，李鸿章从海路到达塘沽。第二天，慈禧太后在太原接到李鸿章等人的密折，立即召集军机大臣商讨对策。慈禧此时把一头怒火发向端王载漪：“这一大祸都是因你而起，你只能惹事，不能了事，今天京师、天津全部被洋人占领，国事糜烂不堪，弄得我们有国难回，东躲西藏。现在又有人弹劾于你，你自己说说看怎么办吧！”说罢愤愤不已。在座诸位要臣见慈禧震怒，也都屏息无声，垂首而立。9月25日，清廷再次发布上谕，表示对纵拳肇祸的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端王载漪、贝勒载濂和载滢、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等诸王大臣“分别轻重，加以惩处”。为了向洋人表示诚意，这道上谕还说“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把战端开启的全部责任揽在自己的身上；慈禧太后不惜对不离身边的重臣心腹严加重责，以示自己忏悔知过之意。

10月1日，李鸿章在天津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当时联军头目瓦德西正在天津，李鸿章曾两次请求与之会晤；但是，瓦德西肩负威廉二世重托而来，怎么也不会把清政府的全权大臣放在眼里，他说：“我只负责领兵征战，至于订交议和等项外交事宜，属诸国家政府外交部门，非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拒绝了李鸿章的求见要求。

10月4日，法国政府提出了包括惩治义和团和纵容义和团凶犯、禁止武器输入、赔款、列强在北京设置永久性卫队、拆除大沽炮台和占领大沽至北京铁路沿线的两三处军事据点等内容的6项条件，建议各国接受，作为共同对华谈判的基础。

列强各国从自己的侵华权益出发，也都先后对此6项条件表示了承认。日本政府还对6条提出了补充意见说：“凡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可以作为议和基础的一切要求，在开议之前，都预先要提交给在北京的各国代表审查。”这一补充意见也得到了各国的一致同意。10月10日，部分在京的驻华公使召开会议，对法国的建议进行讨论，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见。

同一天，李鸿章在百余名俄兵的护送下，到达北京，与另一位全权议和大臣庆亲王奕劻晤谋，对列强采取了一次主动的外交活动。10月15日，李鸿章、奕劻二人向各国驻华使节发出一份同文照会，代表清政府向各国政府提出了议和建议5条。其主要内容为：第一，中国承认攻击各国使馆是违反国际公法并已经认罪，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第二，中国承担偿付赔款的责任；第三，建议各国可自行决定，或修正现行商约或商订新的条约；第四，总理衙门机关和档案请交付中国政府，各国从中国退兵；第五，和议开谈之后，各国即当停止战争。但是，各国公使接到这份同文照会之后，全都对之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更有人指责李鸿章说：“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他对列强还持如此说法，其态度不啻是十分狂妄而野蛮的，同时也是不自量力的。”他们心中自有主张，岂能容忍中国政府的议和大臣插话言语，与自己讨价还价。

10月16日，法国政府再度向各国提出备忘录，请求各国支持法国照会提出的对华议和原则，并把6条谈判基础正式通知清政府的议和大臣。19日，它又提出了根据各国意见修改后的6条。与此同时，英、德、日、美、意等国政府也分别授权其驻华公使同其他各国使节就向中国提出谈判基础问题进行谈判。10月20日，已撤到天津的俄国公使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回到了北京。

这样，一方面八国联军在瓦德西的指挥下，从北京和天津出发，四处攻掠，疯狂地镇压义和团和中国军民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列强各国的公使们经过几个月的吵吵闹闹，终于坐到谈判桌旁，商议有关停战议和，以及如何极尽限度地敲诈清政府及中国人民的问题了。英、法、德、日、俄、美等11国公使在西班牙公使馆内召开了数十次会议，讨价还价，彼此争斗了两个月之久，于12月22日，把各方面的利益和要求，归纳为《议和大纲十二条》，于24日以联合照会的形式递交给李鸿章和奕劻，同时宣称，他们的要求不容更改，如果清政府拒绝接受，列强就将继续占领北京、天津和直隶。

李鸿章和奕劻接到照会，见列强提出的12条分别是：第一，治罪祸

首，应按中国极重之律法从事；第二，中国允照赔偿各国各款；第三，派清室近支亲王一员赴德国谢罪，派大臣一员往日本谢罪，并应允在北京为德使克林德建立牌坊；第四，凡曾滋事的各个地方，应罚停止考试五年；第五，拆除大沽炮台；第六，由天津至北京沿途允由洋兵择处设卡；第七，允各国使馆永驻卫队；第八，此后遇杀害洋人之事而地方官有过者，永远革除不用；第九，凡专供战务之材料，禁止运进中国；第十，凡治罪谕旨及晓谕告示应悬晓二年，团匪拳会即令解散；第十一，各使觐见礼节应酌改，总理衙门应仅设大臣一人；第十二，上开各条约照允照办后，各国兵队方能撤去。

李鸿章和奕劻接到照会后，不敢擅自做主，即刻致电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向她报告了12条的详细内容。

慈禧太后从太原逃到西安后，一直处在惊恐不安之中。她生怕列强不肯议和，继续西进追击，自己则无处可逃；又怕列强把自己列作祸首，战战栗栗，未稍自安。待接到李鸿章等人电告之列强《议和大纲十二条》，见列强并没有把自己列作祸首，不禁感激涕零。第三天，即12月27日，慈禧太后对李鸿章和奕劻发出电谕：“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慨！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竟毫不迟疑地批准了列强提出的12条。之后，清政府又在议定书上签字画押，加盖御玺，于次年1月16日分送各列强使馆。至此，清政府一字不改地将议和大纲全部接受了。

1901年2月10日，清廷发布所谓的《罪己诏》，在这一谕旨中，慈禧太后又一次对列强的“宽大处理”表示感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并信誓旦旦地指天发誓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很明显，慈禧太后为了讨得列强侵略者的欢心，决意要竭尽中国的物力财力，满足侵略者贪得无厌的嗜欲，只要能换得列强对自己的宽宥，即便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全部出卖干净，慈禧太后也已在所不惜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扫清灭洋，义和团名传青史

中国人民古朴的刀剑和神拳终于没有能够抵挡住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清王朝卑污的投降政策更成了这一批民族血性儿女们反帝御侮的羁绊，义和团运动遭到了列强侵略势力和封建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

但是，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同胞的鲜血、破碎的家园更坚定他们抗敌的决心，清廷的怯懦和卖国也最终使他们抛弃了对这一腐败王朝的最后一线希望。他们从血泊之中爬将起来，来不及擦去身上的血污，顾不得掩埋战友们的尸身，便又紧张地投入到新的战斗中。他们断然抛弃了“扶清”旗号，高擎起“扫清灭洋”的大旗，为民族，为国家，前仆后继，浴血战斗。

1901年，在八国联军到处屠杀中国人民、疯狂劫掠的同时，直隶、京津等地的许多州县便先后爆发了“抗洋捐”、“反摊赔款”的斗争。在安平、深州等地，有700多个村庄组织了自保身家的联庄会，有20多万人参加，与八国联军、洋人教士及清朝军队对抗。他们在田宪瑞的率领下，首先树起了“扫清灭洋”的大旗，同清军和来犯的法国侵略军英勇作战，屡创来犯之敌。同年7月，退踞雄县的义和团余众在祁子刚的领导下，奋而起义，他们高呼着“反清灭洋”口号，与清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并继承了义和团反洋仇教传统，在新城一带，时伏时起，坚持了多年的斗争。

和直隶人民的反抗斗争遥相呼应，四川省义和团（又称红灯教）此时也迅速发展壮大。1901年3月，在四川巴县地区，红灯教首领发布揭帖，明确地提出了“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并约定，于是年端午节戌时，天下各处，共期征战。到了端午节这一天，红灯教徒在成都打毁教堂，发动了红灯教起义。到1902年，红灯教势力蔓延至全省30多个州县，樵夫牧童，全都加入到战斗的行列中。他们围攻州城，摧毁教堂，打富济贫，惩治清吏，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侵略者和腐败的清王朝封建统治者。其中以廖观音和曾罗汉为首的义和团队伍，力量最为强大，拥众数千人之多，活跃在川西华阳、成都一带，势若狂风骤雨，对

这里的反动势力进行横扫。

1902年，在直隶广宗爆发了景廷宾领导的起义。景廷宾，广宗东召村人，武举出身。早在1901年春，为了反对广宗县官绅教士所议定的向教会赔偿“损失”的2万吊京钱和1万多两的地方赔款，他就曾两次聚众抗议，宣布中国人不纳洋差，展开了抗洋捐的斗争。广宗县人民纷纷响应。他们以东召村为中心，组织起联庄会，由景廷宾任总团首，领导群众进行斗争。1902年3月，直隶总督袁世凯派重兵进犯东召村，架炮狂轰，景廷宾率众撤退。4月间，他们转战至巨鹿厦头寺，在那里与赵三多率领的义和团余部会师，并把附近百姓迅速发动起来，壮大斗争队伍。景廷宾号称“龙团大元帅”，推赵三多为主将，在厦头寺前树起了“扫清灭洋”和“官逼民反”两面大旗。起义军一度攻占了威县和广宗县城，声势大振。反帝灭洋的斗争烽火，燃遍了直、鲁、豫3省交界的24个州县。

袁世凯派遣段祺瑞、倪嗣冲等率新军与德、日、法三国军队共6000多人，向景廷宾发动猛攻。景廷宾率众转战至广宗的件只村。5月8日，清军大队围攻件只村，景廷宾率众抵抗，与敌人展开肉搏。最后，起义军突破重围，转战到成安县，坚持斗争。袁世凯又调派重兵，前往追剿。7月25日景廷宾、赵三多在河南临漳战败被俘，余部四散。至此，这场遍及3省24县的“扫清灭洋”的斗争被中外反动力量暂时扑灭下去。

在湖南，中国人民又一次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帝斗争。1902年8月间，辰州2000多人揭竿而起，发动起义，打毁教堂，杀死了英国传教士罗国瑜和胡绍祖。在平江、祁阳、醴陵等十余个州县再一次出现“民教纠纷”，人民的斗争情绪又趋高涨。9月，贺金声在邵阳蛇林桥聚众起义，远近各地的哥老会首领纷纷前来投效，不日便组成了一支拥众3万多人的武装队伍，号称为“大汉佑民灭洋军”。贺金声自任元帅。他刊刻揭帖，发布《劝各国教士文》，严正指出：“各国逼我中国太甚，滋酿祸端之事极多，而教堂尤为第一大宗”，义正词严地警告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将所立教堂，速自收除”，然后尽快滚出中国去，否则灭洋军一到，即要杀得个鸡犬不留！同时，他还以大汉灭洋军大元帅的名义，颁发告示，传帖招兵，并致函湖南巡抚俞廉三，希望他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能当机立断，誓与湘省豪杰，努力同心，以立不朽之业。起义军的浩大声势，迫使俞廉三只得采取阴谋伎俩。9月23日，俞廉三派人以宣慰议事为名，设筵置阱，诱骗贺金声赴会，将他逮捕，并于27日晚杀害。同时，清军也随即出动，扑向起义群众。义军奋起抵抗，但终因仓猝应战，群龙无首，遭到失败。

冒着八国联军的枪林炮雨，挨着清政府不时由背后施放的冷枪暗箭，中华民族无数的英勇儿女倒在血泊之中。义和团走过了悲壮的历程，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遭到了悲惨的失败。他们驱逐侵略者的伟大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中华大地被英雄们的鲜血染成了赤色，天空也为我们民族空前劫难和耻辱低垂着愁云！

但是，在那世纪的交叉点上，中国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波澜壮阔，声势浩大，数年之间席卷了全国每一个角落，震撼了世界。义和团民们用自己的碧血丹心，向地球东西方对中华民族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列强展示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坚定决心和伟大力量。他们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的不屈气概和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敢精神，向列强显示了中华民族“民气坚劲”的内蕴和不可凌辱的雄强气象，击碎了列强企图挟战胜之余威，瓜分中国的黄粱美梦。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感到了中国的不可征服，他在给威廉二世的报告中，十分沮丧地写道：“中国人所固有的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这一点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是欧美列强，还是德日帝国，都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征服此桀骜不驯的国民，统治此天下四分之一的生灵，所以诸国历来所倡的瓜分之事，实为下策！”侵略者自己也已经知道，瓜分中国的企图，不啻是痴人梦呓，一派妄想耳。

义和团对八国联军的抗击，以及它“扫清灭洋”的勇猛斗争，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戳穿了它认贼作父、奴颜婢膝的卑怯嘴脸，打乱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凡是有义和团活动的地方，人民皆扬眉吐气，封建主义的纲纪法度，尽遭爱国人民的毁弃。那些平日羽翼洋人、趋炎附势的贪官污吏，也在这滔滔洪流之中，受到了人民的严厉惩罚。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苦苦争斗，播下了民族独立的种子，并以自己颈颅的血汁浇灌它，催它出芽，护它长大，终于在20世纪新曙光的照耀下张开了鲜

艳之花。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中国史话》总目录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中国史话》编辑委员会

主任 陈奎元

副主任 武寅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巍 刘庆柱

步平 张顺洪 张海鹏

陈祖武 陈高华 林甘泉

耿云志 廖学盛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作者小传

贾维

贾维，1954年生于上海市。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参加《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写、美国学者易劳逸《毁灭的种子》一书的翻译；专著有《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谭嗣同研究著作述要》等，并主编《半生风雨录》、《贾亦斌文集》、《贾亦斌诗词集》等书。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一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1 南北形势与宁汉分裂

从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胜利。由广东出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先后占领了湘、鄂、赣、闽、皖、浙、苏等地区，控制了武汉、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其势力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黄河流域，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然而，就在这时，南方革命阵营内部却发生了重大变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实行“清党”，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4月15日，广州也发生了反革命政变。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基本失败。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

这样，1927年春夏之际，在南北对立的同时，长江流域又出现了宁汉对峙的局面。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同时并立，形势错综复杂。

在北洋军阀方面，盘踞中原的吴佩孚集团已基本被消灭，其余部龟缩于河南洛阳、巩县一带，苟延残喘。孙传芳的五省联军遭受重创，退守江北，实力大为削弱。只有张作霖的奉军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尚属完整。张作霖成为残存的北洋集团的中心人物。

在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等人的拥戴下，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继续与南方的国民党政府相对抗，同时作出妥协的姿态，通电“讨赤”和“息争”，宣称“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标题，即属救亡之同志”。他又诡称“与中山为多年老友”，“宗旨本属相同”，企图以“讨赤”的旗子，分化南方阵营，联合南京政府和阎锡山，共同反对冯玉祥和当时尚未反共的武汉政府。

南京政府以蒋介石、胡汉民和桂系集团为主角，辖区有江苏、浙江、安徽一部、福建、上海、南京市。广东、广西也属南京节制。因地处东南富庶地区，得到江浙财团的支持，南京政府的财政来源比较充

足，岁入可达2亿元之多。其主要的武装力量，是蒋系和桂系的军队。

南京政府成立后，一面积极准备“西讨”武汉，一面与张作霖暗通款曲，谋求妥协。一时“蒋奉阎三角联盟”之说甚嚣尘上。但因张作霖坚持“统二不统一”，不肯让出北京的宝座，双方的谈判没有结果。而张宗昌、孙传芳陈兵江北，构成严重威胁，南京政府不得不继续进行北伐。

1927年5月1日，蒋介石决定第一集团军分三路北伐：第一路以何应钦任总指挥，由镇江、常熟渡江北上，肃清江北；第二路蒋介石自任总指挥，由白崇禧代理，从浦口渡江北上，由津浦路正面作战；第三路以李宗仁任总指挥，由芜湖渡江，北上解六安、合肥之围，联合进攻陇海路。

武汉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在地，但它实际控制的只有湖北、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唐生智、张发奎部是其军队的主力。南京宣布反共后，掌握武汉政府大权的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对国共合作更加动摇，反共倾向日趋明显。从军事上看，武汉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摆脱孤立，寻找出路，武汉政府也把希望放在继续北伐上。4月19日，武汉举行第二期北伐誓师典礼，决定由唐生智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分兵三路沿京汉线北上，进攻河南奉军。

冯玉祥的国民军是宁汉之间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宁汉双方都欲拉冯自重，削弱对方。但冯玉祥却认为当前的大敌是奉、直军阀，宁汉双方应消除分歧，共同致力北伐，完成统一，因而表示“对于任何个人方面，不敢稍存厚薄之成见”，并电劝双方“相忍互让”。

1927年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就任武汉政府所委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向河南出动，沿陇海路东进。5月26日，攻克洛阳；31日，进抵郑州；次日占领开封。

与此同时，武汉第四方面军也挥师北上，5月28日，攻占临颍，大败奉军；29日，占领许昌。6月1日，第二集团军与第四方面军在郑州会师。入豫奉军因战事不利，被迫退守黄河北岸。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在津浦线方面，第一集团军亦于6月2日攻占徐州，与第二集团军会师，直鲁军退向山东境内。

陇海路会师后，宁汉双方争取冯玉祥的活动进入了更加紧张的阶段。6月10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重要会议。为争取冯玉祥的支持，武汉方面做出了重大让步。双方决定：第四方面军按“原定计划”班师回汉；河南、西北军政大权交冯独揽，由冯任开封政治分会主席，负责指导陕、甘、豫等省政务。冯则拒绝了共同“讨蒋”的要求，而提出愿调解宁汉之争，武汉方面的希望完全落空了。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武汉政府便将第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由唐生智任总司令，以与蒋、冯、阎平起平坐。

南京方面也不甘落后，郑州会议10天之后，6月20日，蒋介石就和冯玉祥在徐州举行会议。此为蒋冯第一次会面，蒋介石盛情款待，吹捧冯为“北方军事领袖”，许诺每月接济西北军军饷200万元，极尽笼络之能事。会谈中冯坚持北伐为当前急务，不同意进兵武汉。双方遂决定共同北伐，第一集团军负责津浦线，第二集团军负责京汉线。关于武汉问题，冯表示愿意劝说武汉政府立即“清党”，并迁往南京实行合并，冯玉祥的态度表面上“不偏不倚”，但实际上有利于宁方而不利于汉方。在争取冯玉祥的问题上，南京占了上风。

山西的阎锡山集团是各方争取的另一支重要力量。北伐战争开始以后，阎锡山一直态度暧昧。直到1927年4月，南胜北败的局势明朗化，他才迟迟做出表示，下令取消北京任命的“督办”名义，自称“晋绥总司令”，并令军队信服三民主义。4月25日，武汉政府为争取阎锡山支持北伐，特任其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但阎拒不接受，而把宝押在南京方面。6月，阎下令山西“易帜”，改悬青天白日旗，军队改称国民革命军；并通过决议在山西实行“清党”和拥护南京政府。接着，阎在太原就任自封的“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做出了参加北伐的姿态。

6月上旬，南京政府决定进行北伐第四期作战，从徐州、皖北、苏北三路进攻山东。6月18日，鲁南战役开始，但作战进展并不顺利。7月上旬，第一集团军进攻临沂受挫，战事呈胶着状态。

为配合津浦线作战，冯玉祥也命第二集团军渡过黄河，向奉军发动进攻。冯同时按照徐州会议的决定，向武汉施加压力，要求汪精卫“速决大计，早日实行”清共，并于7月7日率先在洛阳宣布“清党”。

在内外压力下，武汉政府决定抛弃孙中山亲手制定的三大政策，加快反共的步伐。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步蒋介石后尘，实行“分共”；同时，仍称蒋介石是“党国惟一的敌人”，南京政府是“伪中央”，号召“打到南京去”，调集兵力，积极准备东征。蒋介石也从津浦线抽调主力，策划西讨武汉。宁汉之间，顿时剑拔弩张，战云密布。

正当武汉、南京准备大动干戈之际，中共于8月1日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汪精卫、唐生智于慌乱之中，急忙调集重兵镇压。

在津浦线战场，7月24日，直鲁联军趁第一集团军主力南调对付武汉之机，立即发动反攻。徐州得而复失，北伐战事呈逆转之势。蒋介石只得暂停征讨武汉，亲自督师反攻徐州。但南京军队已无斗志，反攻失利，直鲁军趁势猛攻，宁军节节败退，于8月中旬全线反撤至长江南岸。孙传芳军旋跟踪至江北沿岸，形成隔江对峙，第一次渡江北伐完全失败。

在遭受严重挫败的情况下，宁汉双方不得不把分歧暂时搁置一边，以谋求妥协。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宁汉合流与“中央特别委员会”

1927年7月中旬，冯玉祥鉴于北方军事形势严重，建议召开开封会议，调解宁汉冲突，并派代表分头疏通。于是，“宁汉合作”的呼声开始高涨起来。南京方面桂系集团积极活动，扮演了重要角色。8月8日，由李宗仁出面致电汪精卫等，称赞其决心“分共”，并邀其来宁商谈。10日，汪精卫复电李宗仁，虽仍坚持“武汉之中央党部及政府，实为党国之最高机构”，但承认对共产党“防制过迟，致酿成南昌之变，深感内疚”。这是宁汉双方数月来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它打开了双方协商谈判的大门。

冯玉祥倡导宁汉合作于外，李宗仁等积极响应于内，武汉唐生智又通电讨蒋，使蒋介石处境十分被动。蒋抽调主力讨伐武汉，导致徐州之败，更成为桂系发难的理由。蒋将北伐失败归咎于武汉牵制，李宗仁却说：“早就不要顾及上游，因武汉方面，可以商量，可以合作。”蒋只得表示：“只要武汉可以合作，如果以我在成为合作之梗，那我可以辞职下野。”李、白等“武装同志都说蒋先生要歇歇”，何应钦则态度暧昧。

面对桂系的压力，蒋介石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8月13日宣布下野，返回奉化原籍。临行前为推卸津浦路战败责任，他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枪毙。14日，胡汉民等亦随之辞职，行前电冯玉祥谓“一柱擎天，惟公有焉”。蒋、胡等离去后，宁汉合作遂加速进行。

8月14日，白崇禧等电汪精卫，称蒋已辞职离宁赴沪，现双方所争持者皆不成问题，请派代表赴浔面商。19日，武汉政府宣布迁都南京。22日，李宗仁与汪精卫在庐山举行会谈，就宁汉合作达成初步协议。9月5日，汪精卫等汉方要员抵达南京。接着，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为了统一党务和组建新的中央政府，在上海开始了讨价还价的谈判。汪精卫以国民党“正统”自居，遭到各方的严重抵制，宁派力主非汪下台无以平党员之愤。汪一气之下，于9月13日宣布“引退”，秘密离沪赴赣。15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在南京举行，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其任务及职权为：行使国民党中央执行、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监察委员会之职权，到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为止；统一各地党部；筹备国民党三全大会。次日，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宣告成立，稍后，组成了新的国民政府，名义上取代了宁汉分裂的局面。

中央特别委员会是国民党的临时领导机构，它虽说以宁、汉、沪三方合作为基础，但实际上获利最大的是桂系集团和西山会议派。主持特别委员会日常工作的是所谓的“执政三常委”，即李烈钧、蔡元培和谭延闿。由于蒋、汪、胡三巨头均不在位，特别委员会缺少真正的中心人物，内部派系复杂，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它的致命弱点；而且特别委员会的成立，以中央执监委员会议代替中央全会，违背了国民党党章规定的组织程序，也为反对派留下了口实。由此可见，特别委员会的地位是虚弱的，它的寿命必然是短暂的。

正当宁汉分合、扰攘不定之际，南北军事形势又变得紧张起来。8月26日，孙传芳军强渡长江，占领龙潭，切断宁沪交通，情势危急。何应钦第一军会同李宗仁第七军由南京和镇江两头夹击孙军，激战五日，全歼敌军，取得龙潭大捷，使成立不久的南京政府得到巩固。

龙潭之战提醒南京注意来自北方的威胁，而同时武汉方面也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汪精卫等在宁汉合流中一无所获，自不甘心。9月21日，汪精卫、唐生智返鄂，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并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特别委员会。唐生智自任湘、鄂、皖三省联军总司令，决定依靠湘、鄂、赣三省地盘，与南京政府相对抗，并派兵布防长江下游，威胁南京。宁汉合流的局面又为宁汉对立所代替。

原武汉政府的另一支重要武装——张发奎部，则在黄琪翔率领下，于9月中旬返回广东，企图另创局面，重谋发展。为了对付上述威胁，南京决定双管齐下，同时进行北伐和西征。

南京政府于9月6日再度下令渡江北伐，第一集团军分别从采石、浦口、江阴渡江北上。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面对奉、直的军事压力，也开始采取联合行动。9月29日，阎锡山誓师讨奉，分两路进攻奉军：阎亲率右路军沿平汉路前进；商震率左路军沿京绥路进攻，晋奉战事爆发。10月9日，冯军也从陇海路对直鲁联军发起攻击，并在兰封战役中

重创敌军。为统一指挥北伐军事，南京政府任命何应钦为第一路军总指挥，率部沿津浦路进攻孙传芳军。第一路军于11月8日发起攻击，16日攻克蚌埠；并与第二集团军会合，于12月16日再克徐州，将陇海路东段之敌肃清。

桂系集团为了扩大势力范围，急于打通南京与广西老巢的联系，故对割据两湖的唐生智视作眼中钉，极力拉拢程潜和谭延闿，主张讨伐唐生智。在桂系的策动下，南京政府对武汉发动了政治、军事两方面的攻势。10月上旬，南京政府派孙科等到武汉与汪精卫、唐生智谈判，要求取消武汉政治分会和改组安徽党政机构；同时，调兵遣将，紧锣密鼓地准备西征。唐生智不肯放弃安徽的地盘，宁汉谈判破裂，南京遂以此为借口发动武力讨唐。10月20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以李宗仁、程潜为第三、第四路军总指挥，分别率江左军和江右军由江北、江南两路西上，进攻唐军。

西征讨唐得到了两广和冯玉祥的响应。冯军从河南沿平汉线南下，威逼武汉；驻在鄂西的鲁涤平第二军也宣布反唐。唐生智四面受敌，只得退守武汉。西征军进展迅速，10月27日攻占安庆，并分三路入鄂，很快逼近武汉。唐生智见大势已去，被迫于11月11日通电下野，转道赴日本；军队则由刘兴、李品仙、何键率领，退向湖南境内。11月14日，西征军占领武汉。南京政府决定撤销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以程潜为主席，桂系胡宗铎任武汉卫戍司令。西征军随即攻入湖南，占领长沙，唐生智余部相继接受改编，西征讨唐遂告结束。

西征讨唐是国民党新军阀间的第一场内战。在这场内战中，原来盘踞两湖的唐生智遭到严重挫败，而桂系集团则掌握了两湖地区的军政实权，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原来在宁汉之间保持半独立地位的广东，现在成了与南京对立的另一个中心，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出于加强自己实力和围剿南昌起义军的目的，接纳了由江西返粤的张发奎第四军；并采取联汪立场。10月7日，李济深与张发奎联名电请汪精卫回粤，“主持党国大计”，同时派代表赴汉迎汪南下。汪精卫知唐生智不可恃，遂于宁汉战争爆发前一日转道赴广州，其他汪派人物也纷纷南下。10月29日汪抵粤后，即主张召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恢复中央执、监委员会，取消特别委员会。这样，宁汉对立刚结束，宁粤对立的局面又出现了，国民党内部依然四分五裂，纷争不已。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二“第二次北伐”

1“第二次北伐”的发动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为“巩固党本，团结内部”，加强自己的领导地位，首先于1928年2月上旬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这是南京政府建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会议决定：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厉行“清党”；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处设立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别任主席；改组国民政府，由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稍后还任命蒋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

二届四中全会是在汪精卫、胡汉民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蒋介石趁机独揽了党政大权。

全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继续北伐，会议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要求蒋介石“统筹全局，从速遵办”。

继续北伐确实是当时南京政府的迫切需要。从政治上看，“继续北伐、统一中国”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它看起来是完成孙中山的未竟事业，也符合一般人民的心愿，在政治上居于主动地位；同时国民党内矛盾重重，难以解决，惟有北伐可以转移视野，缓和矛盾，以便集中力量打破僵局。从外交上看，继续北伐，推翻奉张的北京政府，结束南北对立的局面，是南京政府获得国际外交承认的关键。国民党一再宣称，“北伐为解决一切外交问题的枢纽”，就是要取得列强的承认，获得惟一代表中国的资格。从军事上看，国民政府虽已拥有半壁江山，但奉系张作霖实力尚存，张宗昌、孙传芳困兽犹斗，依然是一个不可小看的威胁。鉴于此，蒋介石提出“目前要义，首在完成北伐”，冠冕堂皇地打出了“第二次北伐”的旗帜。

两次北伐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前者是国共合作推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革命战争，而后者虽然也打着孙中山和国民革命军的旗号，但却塞进了蒋介石的私货，成了蒋介石收服北洋军阀残余以统一中国的战争，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其进步性大打折扣。

当时北方主要有三个战场。首先是晋奉战场，作战双方为阎锡山晋军与张作霖奉军。自1927年9月下旬晋奉战事爆发以来，晋军无力独挡奉军主力进攻，被迫从河北、绥远分别向山西退却。晋军傅作义部孤军奋战，坚守涿州城达3个月之久。

其次是陇海路战场，对峙双方为冯玉祥国民军与张宗昌直鲁联军。冯军从10月上旬对直鲁联军发起攻击，战况极其激烈。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冯军在兰封、考城一线，血战多日，将敌全线击溃，取得重大胜利。

再次是津浦路战场，作战双方为何应钦第一路军与孙传芳及直鲁联军。11月上旬，第一路军开始向孙军发起总攻击，16日攻占蚌埠；然后与冯军会合，击退敌军反攻，于12月16日再克徐州，将陇海路东段之敌肃清。

第二次北伐以蒋、冯为主力，津浦路蒋军与平汉路冯军能否互相配合，是第二次北伐成败的关键。因此，四中全会刚结束，蒋介石就赴徐州前线视察，与冯再次会晤。2月16日，蒋、冯在开封举行重要会议，就河北、山西先取守势，集中兵力以解决山东的作战方略，达成一致意见。2月28日，北伐军正式编组：蒋介石任总司令，何应钦任参谋总长；第一集团军，蒋介石（兼）任总司令，下辖18个军，共29万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下辖25个军，共31万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任总司令，下辖11个军，共15万人；海军，杨树庄任总司令，下辖4个舰队。稍后，南京政府又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3月16日，蒋介石颁布《北伐总方略》，提出第二次北伐从4月开始，其目标是“消灭奉、鲁军阀”，“肃清直、鲁、热、察、绥境内反动军队”；作战分为前后两期，规定前期须进展至胶济路亘高唐、清河、南宫、石家庄之线，后期须进展至山海关、承德、多伦之线。“前期作战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一集团军左翼部队及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首先攻占济宁，同时第一集团军之右翼及中央部队占领日照、临沂、兖州之线；第二阶段，第一集团军主力进占济南，第二集团

军主力全力猛攻河北之敌，进取石家庄，第三集团军全力协攻。“后期作战任务”为：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分别沿津浦路、京汉路、京绥路急进，会师京津，同时各以主力部队向榆关、承德、多伦猛烈追击。

可以看出，所谓第二次北伐，其作战目标是有限的，它只限于关内，而不包括东北，不敢触动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此次北伐以第一、第二集团军为主力，在作战步骤上，采取了先取山东，后取平津的方针；在作战对象上，采取了先打孙、鲁，后打奉张的策略。

北京安国军政府此时却举棋不定，攻守屡易。起初，张作霖鉴于山西地处华北腹地，而晋军战斗力又较弱，决定迅速击破晋军，一举攻下山西。无奈山西地形险要，晋军筑阵坚守，奉军屡攻无效，只得派重兵对山西严加封锁，放弃了攻占的企图。

攻山西不成，张作霖又调集主力，转而大举进攻河南冯军，企图各个击破，然而伤亡惨重，却毫无进展。

面对国民政府大举北伐，安国军政府在军事上部署如下：孙传芳第一方面军团驻鲁南，总部设在济宁，张宗昌第二方面军团驻鲁西，总部设在滕县，孙、张联手作战，当津浦路第一集团军的正面及第二集团军的侧面。张学良、杨宇霆第三、第四方面军团系奉军主力，驻冀中、冀南，总部设在石家庄，当京汉路第二集团军的正面；张作相第五方面军团驻京绥路及冀、察、晋边区，对山西戒备封锁；褚玉璞第七方面军团驻冀南，总部设在大名，当第一、第二集团军之侧面。安国军士气低落，顾此失彼，在战略上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给北伐的顺利进军提供了条件。

至3月底，北伐准备一切就绪。31日，蒋介石赴徐州督师。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7日，蒋在徐州举行誓师典礼，并下达总攻击令，第一、二、三集团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路挺进，第二次北伐正式开始。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鲁豫作战与济南惨案

第二次北伐经历了三个阶段。从4月7日蒋介石下达北伐总攻击令开始，到5月初济南惨案为第一阶段，主要战场在山东与河南；5月上旬国民党军绕道北上，到6月中旬进入平津为第二阶段，主要战场在河北；9月初至下旬，主要战场在冀东，经过滦河会战，迫使直鲁联军接受改编，是为第三阶段。

第二次北伐开始之时，山东是双方争夺的主要地区之一。在鲁南方面，第一集团军刘峙第一军团担任中路，由徐州附近出动，沿津浦路正面挺进，直取临城、滕县；陈调元第二军团担任右翼，由海州、新安镇一带出动，向日照、临沂等地进攻；贺耀祖第三军团担任左翼，由徐州以西丰县、沛县地区出动，向鱼台、济宁之敌攻击。在鲁西方面，方振武第四军团由豫东归德出动，进攻金乡、济宁；第二集团军孙良诚第一方面军，向巨野、郓城、汶上、济宁、大汶口进攻。

战斗之初，第一集团军进展顺利，到4月14日，已重创张宗昌直鲁联军，先后攻克郯城、台儿庄、鱼台、枣庄、临城、日照等地。此时孙传芳见津浦路正面鲁军吃紧，亲率主力5万人向徐州反扑，攻陷丰县，徐州危急。蒋介石一面命令各部固守，一面急电冯玉祥派兵驰援。冯急调石友三部火速增援，向孙军发动猛攻，重创敌人，迫使孙传芳仓皇撤退，徐州转危为安。第一集团军接着又攻占滕县、邹县、峄县等地。

在此次战斗中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表现突出，该部首下郓城，继克巨野，大破孙军，俘敌万余；随后又与友军配合，占领兖州；并乘胜追击，于21日克复济宁，为鲁南会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与鲁南作战相比，豫北作战则要艰苦得多。4月5日，奉军以主力向彰德方面第二集团军发起进攻。奉军凭借其优势兵力，依靠炮兵、战车和飞机的支援，全线猛扑。冯军兵力不足，并且尚未布置完竣；冯玉祥以鹿钟麟为北路总司令，指挥孙连仲、刘骥等部拼死抵抗，多次击退敌人进攻，战况空前惨烈。冯玉祥以彰德方面战事吃紧，一面迭电李宗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仁，请其派兵北上，一面调韩复榘星夜驰援，发起反攻，终将敌攻势遏制，韩部伤亡惨重。

第二集团军在豫北的苦战，吸引了奉军的主力，有力地支持了山东方面的作战。相持至4月底，第一集团军在山东进展迅速，冯军亦在彰德发起反攻，奉军始向河北退却。

再说山东方面，济宁克复后，张宗昌部退据博山、泰安一带，孙传芳部退守肥城、界首区，企图继续负隅顽抗。蒋介石决定乘胜进攻，不让敌军有喘息之机。蒋本人自徐州专程抵兰封野鸡岗会晤冯玉祥，商定攻济事宜。4月25日，第一集团军及第二集团军先后发起攻击，开始了以攻克济南为目标的新作战。张、孙军队接连战败，实力大损，士气低落，在国民党军连续进攻下，无力抵抗。第一集团军进展迅速，数日之内，连克莱芜、界首、泰安、肥城，并于5月1日占领济南。张宗昌残部北渡黄河，退往德州。孙传芳也离开济南北逃。

山东作战至此告一段落。就在此时，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济南惨案。

不惜用武力阻止国民党军北上，以阻挠中国统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方针。早在1927年5月，国民党军第一次渡江北伐，进入山东境内时，日本田中内阁就决定干涉，派兵进驻济南，为此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6月底至7月上旬，日本外务省还召开了东方会议，决定“在帝国权益及侨民生命财产受不法侵害之虞时，将以必要，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保卫之”。

第二次北伐开始以来，日本一直密切注意中国事态的发展。4月19日，日本政府看到“山东形势剧变”，济南旦夕可下，直鲁军队已无力阻挡国民党军北进，悍然决定再次出兵山东，直接进行武装干涉。

4月下旬，日军先头部队相继抵达济南。5月2日，日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由青岛抵济南，在正金银行楼上设立司令部，并在街道交叉路口构筑工事，架设铁丝网，积极备战；同时派人与国民党军联络，一方面刺探军情，另一方面麻痹对方。

第一集团军进城部队为第一、二、三、四军团，分驻城内和城郊。5月2日，蒋介石率总司令部抵济南，在旧督署设立总部，并委派第四军团长方振武兼任济南卫戍司令。鉴于日本出兵，济南形势严峻，蒋介石急令外交部长黄郛到济南与日军谈判，并派张群赴东京就日本出兵山东问题寻求外交解决，但在军事上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防范措施。

正当国民党军为胜利进入济南而陶醉之时，5月3日上午，日军首先对驻市内商埠的第四十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国民党军毫无准备，损失惨重。

对于日军的武装挑衅，蒋介石一面严令驻商埠的中国军队全部撤退，一面派外交部长黄郛到日军司令部进行交涉。日军毫无诚意，竟将黄郛扣留18个小时，并公然践踏外交惯例，强行冲进交涉署，将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9人捆绑毒打。蔡当即说明自己的身份，并对日军的暴行提出抗议。残暴的日军竟割去他的耳鼻，又挖去其舌头和眼睛，然后将蔡枪杀。其他人员除两人逃出外，全部被残杀。日军还在济南开枪炮轰，断绝交通，任意搜查、逮捕、杀害中国军民，济南顿时成为恐怖之城。

5月7日，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公然提出：严罚与本事件有关系之南军高级干部；曾加危害于日本人之军队，全部在日本军面前解除武装；限中国军队12小时内撤出济南，胶济铁路沿线两侧20华里以内，禁止驻扎华军；停止排日宣传等要求。5月9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出兵声明，宣布增派第三师团赴山东，准备进一步扩大事态。

在日军咄咄逼人的侵略气焰面前，蒋介石惊慌失措。5月4日，蒋命令大部中国军队撤出济南，只派少数部队留守城内，维持秩序。5日，蒋介石偕黄郛等仓皇撤离济南，移驻石家庄，与冯玉祥紧急会商。经过讨论决定：济南事件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津浦路第一集团军避开济南，绕道北进，继续北伐；京汉路增调兵力，加紧进攻；蒋介石暂回南京主持全局，北伐军事暂由冯玉祥统一指挥。

9日，蒋介石在泰安调整北伐部署，将主力嫡系第一军团撤至泰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安、大汶河以南地区“待机行动”，以谋自卫；令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率第二、三、四军团及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迅速渡河，向德州进攻。同时发出通令，要求全体军人“忍辱负重，避免冲突”，绝对禁止参加抗日集会和游行，否则“定以军法从事”；并以“未遵军令回避日军”为由，下令免除贺耀祖本兼各职。

10日，蒋介石在兖州会晤由宁北上的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商定以完成北伐为前提，济南事件仍用外交方式解决，确定了对日妥协的方针。

11日，在蒋介石“暂行让步”、“不留一兵一卒”的命令下，守城部队撤离济南，突围而出，牺牲惨重。日军占领济南城后，即举行入城仪式，升挂日本国旗，并到处奸淫掳掠，屠杀伤员和平民。

据统计，在整个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共死亡3254人，受伤1450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又一罪行。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冀东会战与东北易帜

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的关系很深，日本支持张作霖是想换取更多的侵略权益，但张鉴于全国人民的反对，未能满足日方的全部要求，并且有所抵制，使日本怀恨在心。日本关东军决定趁其兵败回奉之机，杀死张作霖，制造混乱，以便直接出兵占领东北。6月4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带人在京奉铁路的皇姑屯车站，将路经此地的张作霖专车炸毁，张身受重伤，次日送回沈阳后身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事件发生后，奉系元老张作相等人秘不发丧，并派人秘密通知张学良。张闻讯后，即化装潜回东北。6月20日，年仅27岁的张学良通电就任奉天军务督办，次日公布张作霖逝世的消息。7月4日，张学良在沈阳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迅速稳定了东北人心和政局，挫败了日军趁火打劫、扩大侵略的阴谋。张学良就职之日，发表宣言称：“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决不轻言战事”。于是在国民党军进入平津、奉军退出关外后，双方之间的战事就完全停止了。

然而，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残部，尚有数万人马，盘踞在开滦、唐山一带，继续负隅顽抗。直鲁联军抢掠地方，扣押车辆，断绝交通，并与日军和旧安福系相勾结，阴谋制造叛乱，对平津地区的安全仍然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南京政府收复平津后，决定继续用兵，彻底消灭直鲁联军残余。7月15日，蒋介石下令肃清关内张宗昌、褚玉璞部直鲁残军，组成东征军，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直鲁联军是奉军的昔日盟友，因此张学良电请南京政府暂勿进攻，奉方愿承担改编直鲁残部的事宜，以和平方式解决。张宗昌前往沈阳，要求允许进入东北。张学良忌其狡诈多变，担心放虎入境，养痈遗患，遂拒绝了他的要求；而提出由奉军改编直鲁联军，大部给资遣散，张宗昌断然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同意国民党军进行东征，以武力解决直鲁联军，奉军予以配合。

9月3日，白崇禧发表东征讨张宣告，命令各部队攻击前进，第二次北伐的最后一个阶段——冀东滦河会战开始。东征军以第四集团军为主力，兵分三路，白崇禧自兼中路总指挥，方振武、徐永昌等率左右两翼，总兵力近10万人。直鲁联军虽然困兽犹斗，但已不堪一击，经过8天战斗，东征军连克丰润、唐山、开平、滦州。直鲁联军炸毁滦河铁桥，固守滦河以东地区。15日，东征军分三路渡滦河会攻昌黎，奉军亦向直鲁军发动攻击。23日，直鲁联军在国、奉两军的夹击下，无力抵抗，请求停战缴械，接受改编；张宗昌潜逃，褚玉璞出走。历时20余天的滦河会战宣告结束。

至此，这场以收服北洋军阀残余为目的的第二次北伐战争，终于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胜利而告结束。

奉军撤出关外后，南京政府鉴于张学良的态度和东北的特殊情况，决定争取张学良，用政治方式和平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对奉方代表表示：希望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决不诉诸武力；要求东北实行易帜，通电服从国民政府，实现全国统一。张学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深感无中央政府之支持，则无以对抗日本的胁迫和侵略，因而拥护全国统一。他表示赞成三民主义，“决无妨碍统一之意”，“惟因对外则有某方（指日本）窥伺，对内则新遭大故，变更太骤，虑生枝节”，请宽以时日。南京表示谅解。双方还达成默契，东北易帜后，东三省仍由张学良治理，内政维持现状。

日本则极力反对东北易帜，通过各种方式向张学良施加压力，企图阻挠中国统一。

7月19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张学良转达日本首相田中的意见，称“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殊无与联系之必要”。

7月24日，本为预定东北易帜日期，因日本蛮横阻止，张学良深恐发生“第二济南惨案”，为避免日本武力干涉，被迫决定暂缓实行。

8月上旬，沈阳为张作霖举行丧礼，日本派特使林权助前来参加，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再次对张学良进行恫吓。林权助警告说：“若东北当局无视日本的反对，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将自由行动。”林还蛮横地说：“即谓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张学良严正回答：“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本国为本位。余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但在日本的巨大压力下，张学良不得不宣布：东三省易帜，延期3个月。

在此期间，张学良一面竭力与日本周旋，一面请国民政府放心，同时为东北回归做了若干准备。他下令释放所有被奉方逮捕的国民党员，以示真心服从；协助解决了直鲁联军残部，恢复了平奉间交通。东北与国民政府的联系日益密切，双方都派有常驻代表，在相互之间沟通协商。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选任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张学良复电表示接受。10月10日是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的国庆节，张学良在沈阳举行招待会和阅兵式，以示庆祝，并以这种方式表明他与国民政府的关系。11月6日，张学良派莫德惠赴日参加日皇加冕典礼，日本首相田中不得不在口头表示，易帜“为中国内政问题”，莫以此为对东北易帜之默认，返奉复命。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等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易帜，服从国民政府。日总领事闻讯后捶着桌子责难：“突然易帜，等于宣告断交”，并威胁说：“日本方面现在看你的态度，必要时有采取断然措施的可能。”张学良不为所动。

东北易帜使张学良加入了国民党新军阀的阵营，从此把自己的命运和南京国民政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它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阴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三 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

1 新内战的酝酿

第二次北伐的完成，形式上实现了在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全国统一。国民党对此大肆吹嘘，隆重庆贺。

1928年7月6日，国民政府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祭告典礼，四大集团军司令蒋、冯、阎、李都前来参加。蒋介石在祭文中宣称：北伐完成，全国统一，“此实千载一时之良机”，表示要与民更始，促使“全国庶政入于正规”。

然而，抛开这些美丽的辞藻，就不难发现，这种“统一”实际上是相当脆弱的。如果说，在推翻北洋军阀的过程中，国民党各个集团之间还能保持某种程度的团结和联合的话，那么，第二次北伐刚一结束，国民党阵营内部的矛盾立刻尖锐起来，为了争夺权力和地盘，各派势力展开了激烈角逐。表面的统一之下，隐藏着极大的危机；暂时的和平之中，酝酿着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

北京政府垮台后，南京国民政府成为惟一的中央政府，蒋介石掌握了南京政府的党政军大权。但南京政府所能直接治理的地区，仍然只限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南京、上海五省两市，第一集团军的部队，绝大部分都驻扎在这一地区。

开封政治分会主席是冯玉祥，所辖地区主要为河南、陕西、甘肃（当时青海和宁夏尚未分省）等省，虽然区域很大，但都比较贫瘠偏僻，冯的第二集团军主要部署于该地区。第二次北伐中，冯玉祥一心想得到河北省和平津两市，但蒋介石却把它们给了阎锡山，只把山东划给了冯军，任命孙良诚为山东省主席，冯玉祥对此大为不满。

太原政治分会主席是阎锡山，所辖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由于阎又兼代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并任平津卫戍总司令，第三集团军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河北省和平、津两市，成为除南京中央政府以外，地盘最大、最富的一个集团。

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是李宗仁，下辖湖北、湖南两省，但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并不完全听命于李宗仁。第四集团军主力驻扎在湖北地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4个军参加冀东会战之后，即驻防该地担任警备任务。如何把分布在华北、华中和广西的桂系势力连接起来，使之首尾呼应，是桂系集团处心积虑企图达到的目的。

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是李济深，辖广东、广西两省，李济深的第八路军和桂系留守部队驻在此地区。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和东北军在名义上已隶属南京中央政府，但实际上仍保持很大的独立性，自成体系，对关内的政治军事纷争采取观望态度，暂时不予介入。

由此可见，冯、阎、李都心怀不满，明里暗里与南京政府相对抗，企图进一步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则企图利用各派的矛盾，用种种手段削弱各方的力量，迫使他们就范，以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为此，双方展开了错综复杂的较量。

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并使之合法化，积极拉拢胡汉民，排斥汪精卫派，在党内建立起“蒋、胡合作”的领导体制。

1928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五中全会，这是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会前，当时还在巴黎的胡汉民多次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建立“以党训政”的训政制度和设立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制的中央政府。全会接受了胡的建议，决定迅速起草约法，以确定训政和五权制政府之原则。

8月28日，胡汉民由欧洲回国，随即与蒋介石进行磋商，就各项重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9月15日，胡汉民发表《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提出“党必须有完固重心及发动，政府必有适当组织，党与政府之纲领须规定”。18日，国民党中常会加推胡汉民、孙科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公布《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托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这一纲领是国民党所谓“训政时期”的“根本大法”，它规定了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基本原则，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10月10日，南京政府宣布改组，成立五院制政府，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蔡元培、戴季陶分任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院院长。

此次国民政府的改组，使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掌握了一切政治及军事权力，国民政府的组织形态由原来的委员制一变而为领袖制，蒋介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裁权力。

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权力，蒋介石又一手操纵包办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出席大会的406名代表中，由蒋记中央指派和圈定的竟达333人，占全部代表的82%，成为名副其实的“钦定”大会，汪精卫派被完全排除在大会之外。

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处分汪精卫等案，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并强调要将地方的政权、军权、财权完全集中到中央手中，以求“绝对统一”；会议产生的中央党部，由陈果夫、叶楚伧、戴季陶分任组织、宣传、训练部长，陈立夫任中央秘书长，蒋系集团牢牢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大权。

蒋介石在巩固自己地位的同时，开始采取措施对付盘踞一方的军事实力派。他沿袭中国历史上封建君主剥夺藩镇权力收归朝廷的故伎，采纳了政学系政客杨永泰建议的策略，决心实行“削藩”，企图以此消除各地军事实力派的军权和地盘，将权力集中于蒋氏中央。

“削藩”的第一步是裁撤各地的政治分会。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撤销政治分会，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引起了激

烈争论。主张废除者冠冕堂皇地声称，现在军政时期结束，训政开始，依照建国大纲的规定，各省的政治由各省政府负责处理，处于中央与省之间的政治分会，自应裁撤，否则将使地方割据状态合法化。反对者也振振有词地说，为了清剿共产党，稳定地方，政治分会实有存在的必要。这些不同意见实际上代表了不同派别的利益。张静江、李石曾因会议争持不下，愤而离宁赴沪，迫使会议一度中断。最后大会达成妥协，同意各地政治分会继续保留到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之时，但对政治分会的权限加以限制，将任免地方党政军官员的权力收归中央。

“削藩”的第二步是将各实力派的首领调到中央做官，使其脱离老巢。1928年10月10日改组成立的国民政府，对各实力派首领都封予了中央的高官厚禄。冯玉祥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阎锡山任内务部长，李济深任参谋部参谋总长，李宗仁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蒋介石还敦促他们立即到南京任职。但各实力派首领因害怕中了蒋介石的调虎离山计，都不肯前来。冯玉祥托辞由鹿钟麟代行军政部长职务，阎锡山保荐赵戴文行使内政部长职务，李宗仁则很快离宁返汉，李济深也避而不就参谋总长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削藩”的第三步是裁兵，即削减各大军事集团的兵力，并将其置于南京政府的控制之下。蒋介石知道，各实力派视枪杆子为命根子，绝不会轻易拱手交出。因此不得不谨慎从事，先从扩大宣传、制造舆论入手。

1928年6月12日，南京政府为北伐告成发表《对内宣言》，将裁减兵额列为五大要政之一，并根据蒋介石的建议，在南京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办理裁兵事宜。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蒋介石的裁兵建议，宋子文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经济会议，提出了《克期裁兵从事建设案》，称：现在全国共有84个军，共220万人以上，一年所需军费为6.4亿元，而现在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4.5亿元，“自非重行厘定军制，大加裁汰，实无以苏民生之积困”。为裁兵大造舆论。

7月11日，蒋介石邀请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北平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西郊汤山开会，商讨军事善后问题。经过两天的讨论，大家在形式上就整军裁兵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共同签署了《军事整理案》。其主要内容为：①设立编遣委员会，负责整编全国军队，原来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各集团军总司令与海军总司令，一律取消；②选择各集团军中的精锐部队，编为50个至60个师；③全国军队打破原建制，统一编制，分期集训，军官分批调入中央军校训练或派往国外学习。

1928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军事整理案》，并强调“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要“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之制度及习惯”；“全国军队数量必须于最短期间，切实收缩”。随后国民政府宣布取消各集团军名义，明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并特派何应钦负责筹备组织全国编遣委员会，以此表明裁兵的决心。

各实力派表面上都接受了统一整编的原则，但实际上，各怀鬼胎，想方设法使整编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

1928年12月，蒋、冯、阎、李、白齐集南京，举行编遣会议预备会议。冯玉祥首先提出了他的编遣标准：“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接着，冯又提出了具体的编遣方案，主张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部队编为8个师。

这一方案明显对第二集团军有利，难以为各方所接受。善于观察风向的阎锡山此时提出了自己的编遣方案：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杂牌部队编6至8个师；除此之外，另设中央编遣区，由中央再编6至8个师。在这一方案中归蒋介石整编的部队数额有所增加，第三、第四集团军的数额并未减少，只有第二集团军的数额减少了，因此对冯玉祥最为不利，却正中蒋介石的下怀。

1929年1月，编遣会议在南京正式开幕。蒋介石把上述两个方案提交会议讨论。经过激烈争吵，多数代表赞同阎氏方案，反对冯氏方案。在阎锡山方案的基础上，会议通过了《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规定除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舰队，由编遣委员会直接办理缩编外，其他

地区共设立6个编遣区，第一、二、三、四编遣区负责整编原第一、二、三、四集团军之部队；第五编遣区属于东北军；川、康、滇、黔各部队的编遣划归第六编遣区。缩编后全国陆军不得超过65个师约80万人。会议还正式成立了以蒋介石为首、包括各派军事领袖在内的全国编遣委员会，负责全国军队编遣事宜。

全国编遣会议的主要精神是，大量裁减各地的军队，剥夺地方实力派所掌握的军政权力，以收归于蒋氏南京中央。蒋介石对此并不隐晦，他在多次讲话中一再举日本明治维新为例，以日本天皇自视，要求各实力派以日本长州、萨摩诸藩为榜样，“深明大义，毅然决然奉还大政，归命中央”；并要大家吸取西乡隆盛因抗命中央而被镇压讨平的教训。各实力派自然不难理解他的弦外之音。

蒋介石的意图引起了冯、阎、李等人的恐慌和反感，他们预感到面临的危险，纷纷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使编遣会议通过的各种文件，统统成为一纸空文，根本无法贯彻。编遣会议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它不仅没有达到蒋介石削弱和消灭异己力量的目的，反而激化了各大实力派与蒋介石的矛盾，埋下了此后国民党新军阀一系列战争的种子。

编遣会议后，蒋介石继续推行消除异己、集权中央的既定方针。他见软的一手不能奏效，便准备采取硬的一手，企图通过军事和其他手段迫使各方屈服。这时，策士杨永泰又献上分而治之的策略：“军事解决第四集团军，政治解决第三集团军，经济解决第二集团军，外交解决东北军”，蒋介石视为锦囊妙计，决定先在桂系头上开刀。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蒋冯战争

在各集团军中，冯军人数仅次于第一集团军，战斗力最强，所以冯玉祥曾经是蒋介石极力拉拢的主要对象，冯对蒋也推崇备至，竭诚拥戴，双方的关系一度打得火热。

第二次北伐时，蒋、冯曾于开封会议后，在郑州按传统方式交换兰谱，结为兄弟。冯年长为兄，蒋年轻为弟。蒋的盟词为“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冯的盟词为“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两人指天画地，信誓旦旦。然而，当暂时的互相需要不复存在，利益的冲突摆在面前时，两人立刻由“死生不渝”的结拜兄弟变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

收复京、津时，蒋介石抬阎抑冯，将接收大权交给阎锡山，使冯玉祥大为不满。在编遣会议中，蒋介石又否定冯氏方案而采纳阎氏方案，削减冯军名额，更使冯玉祥为之愤愤不平。国民政府改组后，冯玉祥曾率领他的文官武将，到南京“中央”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但好景不长，“削藩策”使蒋介石与各方“诸侯”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冯玉祥也疑虑丛生，倍感威胁。在1929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蒋当着冯的面，再次提到日本明治维新，诸藩归还大政，西乡隆盛因抗命而被讨平的故事，要大家借彼鉴此，功首罪魁，自己选择。冯玉祥对蒋的含沙射影极为恼火，会后对亲信说：“蒋先生今天又说西乡隆盛，今天还有西乡隆盛吗？谁是西乡隆盛呢？”一怒之下，遂不辞而别，出城渡江返回开封。蒋冯关系出现裂缝。

在蒋桂战争中，冯玉祥表面支持南京政府讨伐桂系，但暗中仍与桂系保持联系，意存观望。他派韩复榘率兵南下鄂北，并非想真正参战，而是欲乘蒋桂两虎相争之机，坐收中间之利。蒋介石看穿了冯的意图，认为冯“态度莫测，（与桂系）俨有遥与呼应之势”，命令部队对韩复榘部保持戒备，“以备非常事变”，打败桂系之后，蒋介石就将兵多将广、占有广大地盘的冯玉祥视为最大的敌人，迫不及待地转移兵力，调兵遣将，准备对付冯玉祥。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蒋冯冲突的直接起因是山东接收问题。第二次北伐时，蒋介石将河北和平津划给阎锡山，冯军只获得了山东，冯系孙良诚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当时，济南和胶济沿线都在日军手中，冯军所掌握的地区不过全省的1/3。冯军虽拥有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5省，但都是贫瘠地区，收入短绌，财政困难，处境十分艰苦，因此对接收相对富庶、财源较丰的山东省，以改善全军状况，抱有迫切的希望。

1929年4月，日军开始从山东撤兵，接收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但蒋介石为防止冯军扩张，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另派部队接收青岛至潍县以东与沿海地区，不让孙良诚接收山东全省。冯军对此反应强烈。孙良诚于4月25日辞去山东省主席职务，次日即率部离鲁返鄂，并通电全国说明离鲁原因及经过，蒋冯矛盾迅速激化。

蒋介石积极准备讨伐冯玉祥。他于1929年4月制定了《国军对冯警备计划》，提出：“为防编遣期内冯军发生异变起见，国军集结主力于豫西、鄂西及平汉、陇海沿线一带，伺其发动，一举而歼灭之。”并命令第二路第一军集中信阳、广水、花园间，第二军集中襄樊、邓县、新野间；第五路第八、九两军集中洛阳、郑州一带，第十军集中许昌、郾城间；第一路第三、四两军集中徐州、开封间，积极备战。同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为发动讨冯战争制造舆论。蒋冯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军事部署，冯玉祥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5月中旬，冯玉祥在陕西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蒋介石挟战胜桂系之余威，气焰正盛；而冯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前有蒋军，后有阎军，形势十分不利，遂决定收缩兵力，缩短战线，将部队从山东、河南一律撤至潼关集结。随后，冯军各部队纷纷西撤。韩复榘、石友三部从信阳、襄樊撤退，并炸毁武胜关隧道，以断绝蒋军进兵之路；孙良诚部亦由河南西撤，并将归德至马牧集之间的13座桥梁及铁路、电线悉数破坏。5月16日，冯军将领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等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下野，并宣称拥护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统50万大军与蒋周旋。

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宣布永远开除冯玉祥党籍。次日，国民政府下令查办冯玉祥。蒋介石为此发表告第二集团军将士书，称冯为“叛党之军阀”，蒋军将领何应钦、刘峙、朱绍良等亦为之摇旗呐喊，致电蒋介石要求“中央迅颁明令，用张达伐”。南京政府杀气腾腾，一片讨冯之声。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使出惯用的伎俩，对西北军进行分化瓦解。他首先策动韩复榘、石友三叛冯投蒋。韩本不愿放弃现有地盘撤回西北贫瘠地区，故对冯玉祥的西撤决定颇有异议，又受到蒋介石的拉拢利诱，遂决定背叛老长官，投靠新主子。他将旧部从陕州带到洛阳，脱离冯玉祥，5月22日，韩复榘发出通电，声称“维持和平，拥护中央”；次日又通电拥蒋。石友三立即在许昌通电响应，也宣布拥蒋反冯。蒋介石对韩、石二人奖励有加，送去500万元作为韩、石两部的经费，分别委任韩、石为河南、安徽省主席，石友三还担任了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

此外，蒋介石又先后策动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叛冯投蒋。在蒋介石的利诱、瓦解策略下，西北军出现了第一次大分化。

蒋介石的另一着棋，是动员其他实力派参加讨冯。他首先拉唐打冯。唐生智重新出山后，不甘地处一隅，时刻企图问鼎中原。蒋介石任命他为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又于5月23日委以讨逆军第五路总司令，唐生智欣然就任，即率领所部由唐山一带赶赴徐州，并通电全国宣布讨冯。随后，又在蒋军配合下沿陇海线西进，充当讨冯的先锋。

山西阎锡山是蒋介石拉拢的另一主要对象。蒋利用冯阎矛盾，极力拉阎反冯，以孤立冯玉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诡称西北军若展开行动，山西将成为首要目标；表示愿与阎采取同一立场：对冯方针“和战皆惟兄意为准。如果作战，则一切计划亦由兄先决定”。阎锡山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武力讨伐，主张和平解决。他于5月22日致电冯玉祥，劝其下野，并表示愿意“陪兄远游，去则同去，来则同来，南山可移，此志不变”，做出了愿与冯一同下野的高姿态，以取悦双方，抬高自己。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蒋、阎之间达成了逼冯下野的共识，对冯用兵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问题，决定以冯之去留为转移，去则罢兵，不去即讨伐。蒋介石还制定了《讨逆作战第一期作战计划》，兵分三路，蒋自兼南路军总司令，以阎锡山为北路军总司令，唐生智为东路军总司令，对冯军取包围态势，定于7月发起攻击。

冯玉祥外有蒋介石的强大压力，内部又分崩离析，审时度势，不敢贸然迎战，遂决定接受阎锡山的下野劝告，采取避其锋芒、免战自守的策略，以等待时机再行反蒋。5月27日，冯玉祥发表下野通电，称将“洁身引退，以谢国人”，“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服”。同时，西北军在潼关坚守不出，避免战争，保存实力。阎锡山即偕其夫人徐友梅，亲抵山西运城迎接冯玉祥。在得到蒋介石保证生命安全的许诺之后，冯玉祥于6月25日抵达太原。阎锡山随即将其安排在太原西郊的晋祠住下，并盛情款待。同日，阎锡山、冯玉祥联名发表出洋通电。北方形势趋于缓解，一场迫在眉睫的蒋冯战争的危险暂时消除了，军事冲突代之以波谲云诡的政治较量。

阎锡山邀请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完全是故作姿态。其实，他既不打算下野，更不准备出国，而是视冯玉祥为奇货可居，将其作为筹码，同蒋介石做交易，迫使蒋对晋系做出让步。

6月30日，阎锡山应蒋介石电邀抵北平，报告冯玉祥出洋事。蒋力劝阎勿出洋，下午蒋复至阎住宅再三挽留。阎锡山仍然不肯轻易放下姿态，他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系出洋前来向蒋辞行，拟于7月15日同冯氏夫妇在天津乘南岭丸出发，先至日本，度过夏季再游欧美，家属等随行。但7月2日，阎锡山忽称吐泻住进德国医院，谢客养病。

7月9日，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在北平西山举行会议，决定由阎锡山负责全权处理西北军善后问题。蒋、阎二人经过密谈，蒋介石委任阎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阎则答应协助蒋尽快解决西北军，达成了共同对付冯玉祥的秘密协议。阎锡山达到了目的，没有必要再做表演，就以身负“党国重任”、“各方坚留”为借口，将出洋事搁下不提，并把冯玉祥由晋祠迁到离太原更远的五台县建安村软禁起来。

蒋介石打败了桂系，挫败了冯军，自以为地位巩固，再无人敢公开

挑战，决心趁着有利形势，借助军事胜利之声威，贯彻“削藩策”，把上次编遣会议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全国编遣实施会议于8月1日至6日在南京举行。会议发表了《国军编遣实施会议宣言》，宣布实行“大裁大减”，把各编遣区应当保留的军队数量，从原来的10个至12个师一律压缩到7个至9个师；大会的各项决议都没有讨论的余地，会议宣称是否实施编遣决定，是“革命与反革命”、“革命与不革命”和“革命与假革命之所攸分”。

蒋介石加紧推行“削藩”，使他与各实力派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各派力量都在四处活动，重新组合，这种情况为冯玉祥再次反蒋创造了条件。

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的背信弃义十分痛恨。为了拆散蒋阎联盟，软禁中的冯玉祥设法授意留陕主持西北军的宋哲元，要他绕开阎锡山直接同蒋介石联系，向南京靠拢。于是，西北军在7月中旬派代表到南京求见蒋，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要求接济军饷。蒋介石认为西北军向他屈服了，就派于右任、贺耀祖到西安宣慰与点编西北军，安抚冯部将领，供给军饷，还将已被免职的冯系人物请回南京，并任命鹿钟麟署理军政部长。南京与西北军的关系有所缓解。

阎锡山对蒋、冯关系的缓和深感不安，担心双方联手对己不利。8月10日，南京政府又批准阎锡山辞去本兼各职，任命商震、徐永昌分别为山西与河北省主席。阎锡山认为蒋介石可能会对他采取行动，遂决定改变对冯玉祥的态度，拉冯反蒋。他于中秋之夜，亲自前往建安村，设宴陪同冯玉祥赏月，以示赔礼道歉，席间阎大骂南京，并说：“反蒋的时机已经到了”，极力怂恿冯再度兴师反蒋，并表示愿意精诚合作，负责一切供应。冯玉祥同意捐弃前嫌，与阎合作。他们约定，先由西北军发动，拥戴阎为首领，晋军随后响应，共同反蒋。阎还派人前往西安，与宋哲元等人接洽，提出第二、三集团军应该密切合作，一致行动。

冯玉祥与阎锡山商定反蒋计划后，即指示宋哲元、孙良诚出面发动倒蒋，他则暂居幕后指挥，以留回旋余地。西北军接到指示，立即厉兵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秣马，准备行动。

10月10日，宋哲元在西安举行誓师大会，宣布讨蒋。同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联名发表措辞激烈的讨蒋通电，列举了蒋介石六大罪状，指责其“假中央集权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宣布拥戴阎锡山、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副司令，“率四十万武装同志，即日出发”。西北军以石敬亭、孙良诚、庞炳勋、宋哲元、刘汝明、冯治安、孙连仲、张维玺、田金凯为第一至第九路总指挥，实际总兵力约20余万人。

发出讨蒋通电后，西北军即兵分三路向河南进攻，一路由孙良诚指挥，沿陇海路出潼关东进，进攻洛阳、郑州；另一路由孙连仲、刘汝明指挥，出紫荆关，进袭南阳；第三路由张维玺指挥，从汉中、兴安出老河口。宋哲元也将总部由西安移到潼关，以便就近指挥。

10月11日，南京政府以“破坏编遣，背叛中央，陈兵作乱”为由，明令讨伐宋哲元等西北军将领。1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称“冯系逆军乃中国统一之最后障碍”，号召彻底消灭“逆军”，并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以方鼎英、刘峙、韩复榘、何键、唐生智为第一至五路军总指挥。为拉拢唐生智，蒋介石特任命其为前敌总指挥，并下令前线各军均归唐统一节制，还称“即本总司令亦惟唐总指挥之意见是从”。蒋介石将唐生智第五路军集中于郑州、巩县、登封、许昌一带，阻击潼关东进之冯军；方鼎英第一路军集中于郾城、叶县一带向西进攻；刘峙第二路军集中于襄樊、广水、花园一带，相机北进。蒋军的作战意图是先将冯军主力歼灭于潼关、紫荆关、白河以东地区，然后长驱西安，一鼓而荡平之。

战事之初，西北军攻势甚猛。陇海线是其主攻方向，西北军在这里集中了孙良诚、庞炳勋军的全部和宋哲元、石敬亭军的大部。10月12日，孙部前锋已占领洛阳，并继续向东进攻，双方在黑石关、登封、临汝一带展开激战。至28日，冯军又攻克登封。31日，唐生智第五路军转守为攻，全线出击。11月1日，蒋介石亲抵许昌指挥作战，唐生智也亲至西村前线督战。冯军顽强抵抗，蒋军派飞机助战，投弹轰炸，双方伤亡惨重。相持至11月中旬，冯军不支后退，战局急转直下。16日，蒋军

攻克登封；次日，又下临汝；20日，占领洛阳。在南线，蒋军相继攻占老河口、谷城和南漳。西北军固守陕县、潼关，主力退回陕西。

西北军第二次反蒋，前后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其主要原因是阎锡山的出尔反尔和西北军内部的不团结。

蒋冯战争爆发后，阎锡山没有照原来约定的计划起兵响应，而是按兵不动。蒋介石为了分化冯阎同盟，竭力拉拢阎锡山。10月28日，南京政府特任阎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许诺每月拨款680万元给阎作为“协饷”。阎锡山见形势于西北军不利，遂见风使舵，改变态度，附蒋倒冯。他先劝冯玉祥命令西北军停止军事行动，实行编遣，将进入豫南各军退回潼关；接着，又于11月5日宣布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同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以表示晋系完全拥护中央。随后晋军对冯军处于敌对状态。这样，就使西北军陷入了被动的孤军作战的境地。

从西北军内部看，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宋哲元与孙良诚争当首领，互不相让，在郑州以西的战斗中，两人各行其是，互存戒心，争相西撤，使西北军陷入混乱，全线动摇，导致了战争的失利。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5 蒋唐石战争

1929年秋冬之际，北方的蒋冯战争和南方的蒋张桂战争相继爆发，其他地方实力派也都在酝酿反蒋活动。汪精卫认为反蒋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回国就近指挥反蒋运动，准备取代蒋介石，登上南京的宝座。10月初，汪精卫从法国回到香港，打出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的招牌，与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

为统一各地的反蒋武装，汪精卫分别委任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李宗仁等人，为“护党救国”第三至第八路总司令，第一、第二路总司令留给冯玉祥、阎锡山，因条件尚不成熟，故暂未发下。

汪精卫的这一番举动，增加了反蒋运动的声势，给改组派和各实力派打了气、提了神。于是，唐生智、石友三又趁机起兵反蒋，蒋张桂战争的烽火尚未熄灭，蒋唐石战争的枪声又打响了。

唐生智在蒋桂战争中凭借蒋介石的支持东山再起，1929年3月被任命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后又到南京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蒋冯战争中，唐生智率部打败西北军，为蒋介石立下了功劳。但他始终对蒋存有戒心，主张拥汪上台，取代蒋介石。在改组派的串通下，唐生智与冯、阎及其他实力派都接上了联系。唐、阎还达成协议，唐同意拥戴阎为领袖，共同反蒋；阎提供50万元作为唐军经费；并约定当唐部发动后，阎立即通电响应。

石友三原为冯玉祥的部将，蒋冯战争中为蒋所收买，与韩复榘一起叛冯投蒋，被任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此时蒋介石命令石友三率部赴粤支援陈济棠攻打桂系，并指定石部在与南京一江之隔的浦口集中，然后分乘木船到上海，再乘海轮去广东。石友三认为蒋的企图是在沿长江东下途中将其部强行缴械，于是决定与唐生智同时举兵反蒋，唐部南下攻取武汉，石部从浦口进攻南京。

1929年12月1日，由唐生智领衔的75名将领发表通电，劝请蒋介石“幡然改图”、“立即罢兵”，并警告说：如“有违斯旨，仍存自私者，

即全国公敌，势当立即铲除”。3日，唐生智等又发表迎汪联张（发奎）通电，称“汪精卫先生为总理最忠实之信徒”，张发奎之第四军“在党有光荣历史，在国有特殊之勋劳”，“敢有摧残第四军者，是为革命军人之公敌”。5日，唐生智在郑州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并发表《告将士书》，称“今者反蒋空气，弥漫全国，大势已去，无法挽回”；认为蒋介石“政治实非其所长”，要求其“奉还政权”，实行“汪、蒋、阎三先生通力合作”，意在拥汪捧阎贬蒋。

石友三与唐生智互相呼应，也于同时采取行动。蒋介石本来约定某日上午，过长江到浦口检阅石部并训话，石友三决定乘机将其劫持，然后举兵起事。蒋为了慎重起见，先派陈调元到石部观察动静。陈调元发现石部情况异常，立即电蒋，劝其改期。石友三见计谋不能得逞，即于12月2日起兵反蒋，用大炮隔江猛轰南京，并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称将“率十万健卒直取南京”。当时，南京城内兵力极为空虚，只有一个宪兵团和几千军校学生，但石友三不敢进攻南京，炮轰之后，即率部向北撤往蚌埠、滁州一带。

唐生智、石友三反蒋通电一出，各地纷纷响应。胡宗铎在湖北施南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七路军总司令，并致电蒋介石称：“足下自命不凡，以为我即中央，中央即我，天下莫予毒也”；谓蒋“有袁世凯之野心，而无其能力；有吴佩孚之横暴，而益以奸伪，恶贯满盈，民怨沸腾”。西北军将领发表通电，表示愿竭全力援助唐生智和石友三。河南省主席韩复榘通电响应唐生智。许崇智也在香港致电蒋介石，劝其下野，谓“弟试自问，此时尚能打开四面楚歌之局面否？”甚至连旧北洋直系军人齐燮元也通电劝蒋停战，主张和平。蒋介石一时成为众矢之的，颇显孤立。

蒋介石为了扭转不利形势，对阎、石、唐分别施以不同策略，采取拉拢阎锡山、张学良，安抚诱降石友三，集中打击唐生智的方针。

阎锡山和张学良是华北时局的重心，能否争取他们是讨唐成败的关键。因此，在准备讨唐的同时，蒋介石派吴铁城以劳军为名去东北拉拢张学良，派赵戴文回山西劝说阎锡山反唐。阎锡山见唐生智反蒋后大捧汪精卫，对自己只是轻描淡写恭维几句，因而觉得唐言而无信，没有诚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意，大为不满，加上赵戴文的极力劝说，于是就同意与改组派断绝关系，助蒋反唐。张学良在吴铁城的劝说下，也表示反对改组派，支持中央讨唐。

12月20日，阎锡山与张学良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毅然决然，拥护中央统一，共同奋斗”；阎锡山还通过赵戴文告诉南京，他“已具十二分的决心消灭改组派”。蒋介石还许诺打败唐军后将河南划归阎支配，换取晋系同意出兵讨唐。阎锡山前后态度的陡然改变，使局势顿时改观，许多原来列名反蒋的将领，纷纷发表声明，否认参与反蒋，表示拥护中央。

安抚诱降石友三，以瓦解唐、石同盟，是蒋介石的另一重要策略。石友三在浦口起兵后，屯兵蚌埠、滁州一带，与南京近在咫尺，威胁很大。蒋介石急调驻上海的熊式辉第五师，渡江进驻浦口、浦镇地区，摆出追击姿态；又调驻山东的陈调元部南下夹击，以纾京畿之危。驻徐州的马福祥与石友三是结拜兄弟，但此时也表示支持南京。石友三数面受敌，进退两难，陷入困境。蒋介石派马福祥、李鸣钟出面对之予以安抚。

阎、张拥蒋通电一出，石友三见势不妙，也赶紧通电表态，称“嗣后友三一切举动，自当以钧座为转移”，立即撤销护党救国军名义，恢复第十三路军番号，并派代表到南京向蒋解释“误会”。蒋介石命石部开往河南商丘，归韩复榘节制。石友三倒向蒋介石，使唐、石同盟宣告破裂，唐生智顿时成了孤家寡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解决了石友三，蒋介石调集军队准备讨伐唐生智。12月7日，南京政府以唐生智“背叛党国，附逆有据”，明令褫夺本兼各职，严缉拿办；并组成讨逆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阎锡山为副司令，刘峙任第二路总指挥，率部沿平汉路北上，进攻郑州；阎锡山兼北路军总指挥，率晋军由河北、山西向南推进。19日，蒋介石电令讨逆军全归阎锡山指挥。20日，讨逆军在平汉线发起总攻。

唐生智自通电反蒋后，即将所部从豫西东调，分布于平汉路南段的郑州、许昌、漯河、确山一带，准备攻取武汉作为根据地，进而联合桂

系，再创局面。唐生智大肆封官，一口气委任了21个军长，6个师长，表面上阵容浩大，但其实际所能依靠的武力，只有嫡系刘兴和龚浩的2个军，力量十分薄弱。

战争开始后，唐生智自动放弃郑州，将主力集中于许昌、郾城间，沿平汉路陆续南下。21日，北路晋军孙楚部，兵不血刃，进占郑州。24日，唐军主力刘兴、龚浩部到达驻马店，唐生智本人亦亲抵前线指挥；唐军孙殿英部断后，扼守许昌。

唐军作战方针为“首先占领四平一带待机阵地，乘机击破敌军后，分路向武汉方面进击，以攻取武汉”。蒋军在确山一带构筑工事，阻挡唐军南下，双方展开激战。唐军为突破蒋军防线，不顾风雪天寒，发动猛烈攻势，但均为蒋军击退。

1930年1月1日，驻扎在南阳的杨虎城部于元旦之夜突袭并攻占唐军的重要据点驻马店，唐生智仅以身免。经此一击，唐军被拦腰切断，全线动摇。唐生智为挽回败局，调集部队发动反攻，未能奏效。刘峙亲赴前线指挥蒋军作战，将唐军龚浩部包围歼灭。唐军遭此重创后一蹶不振，唐生智急令残部向东北撤退，集结汝南附近，企图进入皖北与石友三部会合，复欲向泌阳移动，图攻襄樊，均为蒋军所阻。5日，阎锡山亲到郑州督战，指挥晋军南下。唐军遭蒋军南北夹攻，弹尽粮绝，士卒疲惫，加上天气恶劣，冰雪载道，完全失去战斗力。

1月6日，唐生智见大势已去，遂致电阎锡山，请准只身出洋，所部交刘兴负责，听候改编；随即离军出走，化装潜往天津。刘兴等奉命将唐军残部在漯河集中，由中央第二路军全部缴械，所有官兵，悉数运往汉口，给资遣散。唐生智军至此被彻底消灭。

此次战争实际作战时间，从1929年12月20日开始，到1930年1月6日结束，前后总共不超过20天。唐生智的败亡如此迅速，殊出汪精卫等人的意料，改组派发起的“护党救国”运动受到严重打击，蒋介石更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但改组派和反蒋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重新组合，纠集力量，准备与蒋介石再作较量，一场更大的反蒋内战风暴又在酝酿之中。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四 蒋阎冯桂中原大战

1 反蒋派大联合

到1929年底，先后发生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张桂战争和蒋唐石战争，都以蒋介石的胜利和反蒋派的失败而告结束。只有晋系阎锡山，周旋于南京和各派之间，朝秦暮楚，翻云覆雨，成了惟一的不倒翁，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成为盘踞晋冀察绥和平津地区、影响时局的中心人物。然而，随着桂系、冯玉祥、张发奎和唐生智的相继失败，阎锡山与南京之间的回旋余地也越来越小，被推上与蒋介石短兵相接、正面交锋的地位，蒋阎矛盾迅速激化，阎锡山由拥蒋转为反蒋。

促使阎锡山决心反蒋的主要有下列四个因素。第一，感觉蒋介石削平群雄后，刻意图晋，咄咄逼人。蒋唐石战争中，阎锡山助蒋反唐，率兵南下河南参战，但蒋介石自食诺言，没有把河南省的支配权给阎，反而任命韩复榘为河南省主席，迫使晋军撤回原驻地；蒋还把自己的嫡系部队由南方陆续调往北方，集中在徐州、蚌埠等地，并在河南屯驻重兵，以威胁、防备晋军和西北军。

南京咄咄逼人的态势，使阎锡山感到蒋介石的“削藩”之剑迟早会落到自己头上，与其等待挨打，不如铤而走险。在财政上，阎锡山控制的河北、平、津地区的大部分税收，被南京政府收为“国有”，而按规定应由中央负担的此一地区卫戍部队军饷，南京并未按时如数发给，截至1929年8月，积欠达584万余元，阎锡山虽一再交涉，仍毫无结果。南京政府还以各种方法缩减、克扣晋军的经费和军饷。阎认为这是蒋介石企图用经济手段控制、搞垮晋系，因而愤愤不平。

第二，对待西北军问题上的分歧。蒋介石为消除冯玉祥对南京政府的威胁，一直坚持采取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企图彻底解决西北军问题。阎锡山与冯玉祥虽有矛盾，但又有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之感，害怕西北军为蒋介石彻底解决后于己不利，故希望留有余地。于是，他做出悲天悯人的姿态，出面为西北军“要饭吃”，一再请求

南京接济、维持西北军，甚至自己掏腰包，予以接济。其目的是一方面以此彰显南京政府之过失，使西北军对之更加怨望愤懑，另一方面借此对西北军示惠笼络，以便操纵利用。因此，阎锡山在致南京的文电中多次要求：“中央对冯军所许诺的事项，亦应一一兑现……第二集团军目前所感到困难的是给养无着，将来所希望的是平等待遇”，应予满足。在给宋哲元的电报中他表示愿“拍胸担保二集团军吃饭”，如不能做到则不妨碍二集团军“自求活路”，阎锡山偏袒西北军的做法，更使蒋介石觉得阎冯勾结构成威胁，急于消除隐患。

第三，西北军的压力。对于西北军，阎锡山一面养虎自重，同时又担心为虎所伤。他认为“冯军僻处西北，与晋为邻，我方不可无虑”，“中央与第二集团军之战争，决不可使之变为二、三集团军之战争”。然而，阎锡山利用蒋冯矛盾，劝冯下野，随后又软禁冯玉祥，并收编、吞并冯军部队，以壮大自己。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自然引起西北军的强烈不满。软禁中的冯玉祥对鹿钟麟面授机宜，要其提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口号，以对阎锡山施加压力。鹿还秘密派人到南京表示：“蒋主席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我们现在要拥护中央，攻打阎锡山，报仇雪恨。”南京表示愿意接济冯军反阎。西北军的动态使阎锡山极为紧张，他深知只有拉住冯玉祥，联合西北军，共同反蒋，才能解自身之危。

第四，各派反蒋势力的怂恿和推动。桂、冯、张、唐反蒋相继失利后，阎锡山成为具备反蒋资格和实力的惟一人物。各方反蒋力量纷纷派人向阎锡山接头游说，鼓动拥戴，使阎觉得时机成熟，众望所归，于是决心公开打出反蒋旗帜，与蒋介石一决雌雄。

1930年1月中旬，阎锡山在太原召开晋军高级将领会议。会上他表示：“蒋介石实在逼得咱们无路可走。现在各方面都愿倒蒋，我也有这个意思。”会议统一了内部意见，确定了反蒋大计。

2月10日，阎锡山发表“蒸”电，提出“整个的党，统一的国”的口号，指责蒋介石把持党政大权，造成党和国家的分裂；称“今者锡山确认为武力统一，不特不易成功，且不宜用之民主党治之下”。这封电报将蒋阎分歧公布于众，并开始了南京、太原之间长达两个月的电报战。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针对蒋介石“武力统一”的方针，阎锡山打出“和平统一”的旗号与之对抗，称“今日非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的力量互相残杀与整个的团结的问题”，提出欲解决国事，“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由”，要求蒋自动下野，“在野负责”。

针对蒋介石独揽大权，实行个人独裁，阎锡山主张“党人治党，国人治国”，他还建议成立元帅府或枢密院、元老院，参与决定党国的方针大计，以分蒋氏之权。

对于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国民党三全大会，阎锡山认为其“非国民党之三全大会，乃钧座之三全大会”，“党国危乱，实肇于此”，要求予以取缔，另“请由我全体党员同志投票，取决多数”，以成立新的国民党中央。

阎锡山的主张立即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反蒋派纷纷响应，通电表示拥护。蒋介石承认，“阎锡山倡出党人治党，国人治国的议论，党国的基础几乎动摇”。为反击阎的舆论攻势，蒋介石通电指责阎“是以礼让为名，争夺为实，不惜甘为党国罪人”，坚持要“戡乱定变，铲除封建势力，制止反动行为，以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谭延闿、胡汉民、吴稚晖等为之摇旗呐喊，拥蒋的军人政客也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反蒋、拥蒋的阵线逐步趋于明朗。

阎锡山公开反蒋后，各派反蒋势力立即奔走活动，加强与阎的联系，企图建立新的反蒋联合阵线。

在蒋唐石战争中，阎锡山曾经反对过改组派，现在两者的关系又密切起来。2月18日，蒋介石派特务袭击了改组派在上海的总部，当场打死改组派中央负责人王乐平。21日，汪精卫就此发表对外声明，谴责蒋介石实行政治暗杀。24日，汪又致电阎，表示赞成以党员投票解决国民党内纠纷，并指责蒋“好乱怙权，悍然不顾”，称“如和平无望，则以武力制裁”。阎锡山需要改组派这面旗帜，以对抗南京政府，因此奉汪为精神领袖，让人电请其回国“集中革命力量”。

改组派遭受蒋介石的残酷打击，在南方无法立足，便于3月将其总

部转移到阎锡山控制下的北平，陈公博、王法勤也分别由香港、上海北上天津，以便在北方开展活动。4月3日，改组派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平津执行部”，作为改组派的对外活动机关；又在阎锡山的资助下创办了《民主报》，作为改组派的反蒋喉舌。西山会议派受到南京政府的通缉，其领袖邹鲁、谢持等也逃往天津租界避难。阎锡山特派代表欢迎陈公博、王法勤、邹鲁、谢持、覃振等去太原，共商联合反蒋大计。四川的刘文辉、香港的唐生智也都与阎取得联系。太原、北平、天津成为各派反蒋势力麇集的中心。改组派与阎锡山达成一致意见，由阎主持政治，冯玉祥、李宗仁主持军事，汪精卫主持党务。但反蒋派联合成立新的国民党中央的努力，由于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迟迟不能实现。

反蒋派的武力主要依靠阎、冯和张桂系军队。2月21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等人联名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对阎锡山表示拥戴。但张桂联军地处西南一隅，又一直处于蒋、粤军的围攻之下，处境维艰，一时难以有所作为。因此，阎锡山欲与蒋介石一争高下，势必要借助西北军的力量，建立阎冯军事合作。阎锡山便再次主动与冯玉祥言归于好，携手反蒋。

2月25日，阎锡山亲自到建安村看望冯玉祥，当面向冯表示反蒋决心。为了消除冯的怀疑，他还把拟就的讨蒋电稿念给冯听，博得了冯的称赞。两人于28日相偕返回太原，共商讨蒋大计。双方决定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司令，组成联军共同讨蒋。但阎担心冯不忘前仇，以后会寻机报复，故对释冯一事仍不无顾虑。冯玉祥托人转告阎：“我除倒蒋没有第二条路”，以解阎之疑虑。阎于是决定释冯回陕主持讨蒋军事。冯临行前一天，阎又亲自登门告别，对冯所受委屈再次表示歉意，并说：“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律待遇，决不歧视。此心耿耿，惟天可鉴！”阎还当场拨给冯大洋50万元，手提机关枪200挺及其他军械。历来吝啬的阎锡山这次表现得意外的慷慨大方。

3月8日，冯玉祥结束8个多月的软禁生活，动身返陕。回到潼关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后，冯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宣布联阎反蒋，决定全军出动，开赴河南与蒋决战。

正在此时吴稚晖来电劝冯摒弃干戈，服从中央，3月14日，冯玉祥亲自拟电答复。电文云：

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数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然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疾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

冯玉祥重返西北统帅军队并树起联阎反蒋的旗帜，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原来叛冯附蒋的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孙殿英等都发表通电，声明服从冯的指挥。韩复榘也致电潼关西北军司令部，表示愿与西北军采取一致行动。

3月15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由鹿钟麟领衔发表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领导讨蒋。

18日，西北军开出潼关。26日，占领洛阳，前锋继续沿陇海路向东推进。

与此同时阎锡山也宣布与南京断绝关系，在所属地区查封、接收南京中央派驻机构，清除蒋系势力。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并宣布率军陈师中原讨蒋。同日，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潼关、桂平就任副总司令。张学良则表示严守中立，谢绝就职。

针对反蒋派的行动，南京政府也采取了相应措施。4月5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称阎“举凡所有阴险狡诈，悉集一身”，着各省政府、军队一体严拿归案讯办。7日，国民党中央决议，永远开除阎锡山党籍。5月1日，蒋介石公布讨逆军战斗序列，亲任总司令，并通

电全国将士，宣布讨伐阎、冯。

反蒋派声势浩大，自称此次是第二、三、四集团军大联合，共同对付第一集团军。其组织系统和作战方略如下：

桂军为第一方面军，李宗仁任总司令；下辖3路军，第一路军张发奎，第二路军白崇禧，第三路军黄绍竑，约3万人马。第一方面军由广西分三路出兵湖南，进取武汉。

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鹿钟麟任前敌总指挥，下辖6路军，孙良诚第一路军、庞炳勋第二路军、吉鸿昌第三路军、宋哲元第四路军、孙连仲第五路军、张维玺第六路军，约30万人。第二方面军担任河南境内陇海、平汉两线的作战任务，分头向徐州、武汉进攻。

晋军为第三方面军，阎锡山任总司令，徐永昌任前敌总指挥，下辖6路军，孙楚第一路军、傅作义第二路军、杨效欧第三路军、张荫梧第四路军、孙殿英第五路军、万选才第六路军，总兵力20余万人。第三方面军投入津浦、陇海战场作战，主攻济南，并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路南下，直捣南京。

石友三部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兖州，以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

内定张学良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四川刘文辉部、湖南何键部为第六、第七方面军，但均未就任；后又加委樊钟秀部为第八方面军。

讨蒋联军的总兵力达到70余万人。

蒋介石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部署。他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在山东战场拒守黄河两岸，阻止晋军沿津浦线南下；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防守徐州、砀山一带，并沿陇海路两侧西进，进攻归德（今商丘）；以何成濬为第三军团总指挥，防守平汉路许昌以南各地，牵制西北军主力；陈调元为总预备军团总指挥。蒋介石本人带领庞大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坐镇徐州指挥。蒋军总兵力亦达70多万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蒋阎冯桂大战分为陇海线、津浦线、平汉线和湖南四个战场。陇海线位于全局的中央，津浦、平汉两线是它的两翼。陇海线方面的胜负，对于整个战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双方都把主力投入这里。因这场大战主要战场所在地河南、安徽和山东，属于中原地区，故史称中原大战。

古老的中原大地，战云密布，作战双方的100多万大军，厉兵秣马，准备厮杀。民国史上规模空前的军阀混战揭开了序幕。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东北军入关与反蒋联军的失败

张学良是蒋介石和反蒋派都极力争取的关键人物，东北军的倾向对中原大战的结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东北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张学良本人即位不久，内部有欠巩固，因此他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不到关键时刻不轻易表态。

1930年春中原大战酝酿之际，他就通电劝请双方“各捐成见，共息争端”。战争爆发以后，张学良一直严守中立，主张和平，避免卷入内战。

蒋介石和反蒋派为了争取张学良，接二连三派出代表与张联系，南京、北平、太原与沈阳之间，各方使节络绎不绝，紧张地进行“穿梭外交”。

反蒋派起先委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国民政府”成立后，又推选其为七名国府委员之一，张学良概不就职，反蒋派的努力没有取得结果。

蒋介石为争取张学良下了更大的本钱。他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又任命东北系人物为平津卫戍司令、河北省主席、青岛市长和外交部次长，以示将华北和平津交由东北军掌握，张学良虽未表态，但不能不有所心动。

蒋还派吴铁城、张群长驻沈阳，给予巨款，以拉拢张学良及其周围人物。吴、张二人采取“盯人”战术，紧随张氏左右，形影不离，居则同乐，出则同行，随时随地施加影响，使阎、冯和汪精卫的代表几乎没有插嘴的余地。

在吴铁城、张群等人的不断劝说、督促之下，张学良终于私下在口头上表示：如果蒋军攻下济南，东北军即出兵入关。

8月中旬，津浦线蒋军攻占济南，陇海线冯军“八月攻势”受挫，反

蒋联军颓势已现。9月中旬，张学良在沈阳北陵别墅召开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决定站在南京政府一边，出兵华北，以尽快结束战争。

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的通电，要求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在与记者的谈话中，他又表示东北军虽然出兵，但并非与阎、冯军为敌，希望阎、冯自动下野，所部接受改编，东北军“乃站在中间而偏向南方而已。决不为落井下石之举”。蒋介石对东北军出兵极为欢迎，把处理华北政局、收编华北反蒋的大权完全交付张学良，又将河北、平津、青岛的行政权力交由张支配；南京政府立即汇给沈阳500万元，作为东北军的开拔费，又拨1000万元公债款，资助东北军。

9月17日，张学良发布进军关内的动员令，随即组成第一、第二两个军，共12万人，分别由于学忠、王树常任军长，待命出发。张学良指示于学忠，入关后要争取做到一枪不发，和平接收。

9月20日，东北军开始南下。每到一地之前，先通知晋军撤退，避免冲突。21日，东北军开抵天津，22日进驻北平，晋军均于事先撤走，由东北军和平接防。张学良随即任命鲍毓麟为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张学铭为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旋即升任天津市长。9月27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东北军迅速完成了对河北、平津地区的占领和政权的接收。

张学良决定派东北军入关，敲响了扩大会议的丧钟。消息传到北平，政界诸要人如临世界末日，惶惶不可终日。汪精卫强作镇静，于9月19日致电张学良，提出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召集合法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约法、清剿湘鄂赣共产党等四项意见。他并色厉内荏地宣称：“如张决进兵，情势恶化，则无论太原、西安，均可作为根据地，依照原来计划进行。”摆出了一副困兽犹斗的姿态。同时决定将扩大会议移至太原继续办公。次日，汪精卫率领部分扩大会议成员，匆匆离开北平，乘车去石家庄转赴太原。

北平“国民政府”宣誓就职不到10天，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流亡政府。聚集在“扩大会议”旗帜下的反蒋联盟，迅速土崩瓦解。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东北军入关，使阎、冯军陷入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困境，加速了反蒋联军在军事上的崩溃。阎锡山见大势已去，于张学良发表“和平通电”的同日，即通电全国，称蒋军使用毒瓦斯，“我惟有退避三舍，以救民命”，并下令晋军实行总退却。

东北军占领平、津后，即分兵两路，一路沿平绥线向张家口前进，一路沿平汉线向高碑店、保定推进。

9月22日，津浦线晋军开始总退却，洛口黄河北岸晋军退往德州；下游青城、利津及上游东阿、平阴之部队同时撤退，并将黄河铁桥炸毁。蒋军随即渡河追击。9月25日，晋军放弃德州西撤，蒋军占领德州。27日，南下的东北军到达泊头镇、沧州一线。津浦路北段完全落入蒋军和东北军之手。

到10月中下旬，南线东北军抵达正定、石家庄，冀南晋军全部由正太路经娘子关撤回山西；北线东北军进抵张家口，冀北晋军沿平汉路退回山西大同，河北晋军完全肃清。

在陇海、平汉线，形势对西北军也极为不利。反复无常的石友三见势不妙，主动放弃阵地，退出战斗，率部投蒋。阎锡山已失去战斗意志，为保存实力，他密令与冯军并肩作战的晋军徐永昌部，扔下盟军不顾，立即渡河北撤，使西北军顿时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

在不利形势下，冯玉祥一面令宋哲元部西撤，退守洛阳附近一带，以保持通往陕西的退路；一面将陇海、平汉两路的冯军战线缩短，以集中兵力，准备与蒋军决一死战。冯玉祥没有审时度势，及时安排西北军撤退，反而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孤注一掷，与蒋军硬拼，结果丧失了撤退的时机，使西北军难以避免彻底失败的命运。

9月下旬，陇海路冯军主力退守兰封、杞县一线，企图作最后抵抗。蒋军以蒋鼎文部为中央军，陈调元部为右翼军，朱绍良部为左翼军，在陇海路全线发起强大攻势。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张钫等人，用收买安抚等手段，加紧对西北军进行策反和分化。

9月24日，蒋介石发表《告阎、冯军将士书》，劝告阎、冯军投降，称：“东自兰封、杞县、通许、尉氏、洧川、长葛、新郑，西至荥阳、汜水，我军大包围之计划，已告完成。诸君当已知之审矣，将何以自为计乎？困兽之斗，势已不许。欲退至大河以北，则突围非易。欲由禹县等处西窜洛阳，我军已早有严密堵截之准备。诸军今日已无可退，实亦不必退不必逃。中正爱护诸君，仍如往昔，虽取包围之势，决无歼灭之心。”

在蒋介石的攻抚并用、软硬兼施下，西北军军心动摇，呈现出兵败如山倒之状。9月27日，冯军主力吉鸿昌部倒戈投蒋，改编为蒋军第二十二路军，掉转枪口进攻开封。这是冯军瓦解的开始。28日，冯军张占魁骑兵第二师也在杞县向蒋军投降，改编为蒋军骑兵第三师，向中牟、郑州攻击前进。29日，蒋军攻占兰封、杞县、禹县，冯军退守郑州、开封一线。

在平汉路方面，蒋军向坚守许昌、尉氏一线的冯军发动猛攻。9月22日，上官云湘部进克须水镇，截断了郑州与洛阳之间的交通线。蒋、冯两军主力在荥泽、荥阳一带激战。双方激战至30日，冯军防线相继崩溃。蒋军徐源泉部攻占尉氏，复向洛阳前进，以截击西撤之冯军；朱绍良、蒋鼎文部占领陈留，冯军孙连仲部被迫后撤。10月1日，蒋军攻克长葛、朱仙镇，冯军孙殿英部败退。2日，蒋军岳维峻部攻占许昌，杨虎城部占领洛阳附近的龙门及郊区西工。冯军大部退守新郑，一部退守黑石、孝义一带。

至此，蒋军平汉、陇海两大战场已经连成一片，形成了会攻郑州、开封之势。

蒋介石将平汉、陇海两路兵力统一部署，分成左、中、右三个军团：刘峙中央军团、何成濬左翼军团、陈调元右翼军团，开始会攻郑州、开封。冯军此时兵无斗志，已不堪一击。10月3日，蒋军右翼集团占领开封。6日，中央军团攻克郑州，冯军梁冠英部投降，其余残部渡过黄河，退往豫北、冀南和晋南。8日，蒋军又攻占新郑，围缴敌军四五万人，将黄河以南完全肃清。接着，蒋军杨虎城、徐源泉部乘胜围攻洛阳，遭到冯军顽强抵抗。相持至18日，守军葛云龙部，力不能支，遂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向蒋军投降，冯军在陇海线的最后一个重镇洛阳也宣告失守。

为了切断冯军撤往陕西老巢的退路，在进攻洛阳的同时，蒋介石命令杨虎城部组成“拯陕军”，沿陇海路全力西进，攻取潼关。10月15日攻占陕州。经过激战，又于25日攻克了历来有天险之称的潼关，冯军宋哲元、赵登禹、刘郁芬率残部向渭北退去。29日，蒋军兵不血刃进入西安。

西北军败的败，降的降，溃不成军，反蒋联军彻底失败，中原大战宣告结束。

随着战场上的失败，太原扩大会议也黯然收场。10月27日，扩大会议在太原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长达8章211条的约法草案，后来被称之为“太原约法”。这个一纸空文的“约法”，成了扩大会议的墓志铭。11月1日，汪精卫等离开太原前往天津，随后又离津赴香港，其他成员也各奔东西。扩大会议这个国民党反蒋联盟的怪胎，前后只存在了两个多月就烟消云散了。西北军残部和晋军余部全部被改编。孙连仲接受蒋介石命令，所部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宋哲元部由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张学良将晋军改编为4个军，分别由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任军长。

11月4日，阎锡山和冯玉祥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为了消除隐患，迫使阎、冯早日出国，南京政府还发布通缉令，在全国通缉阎、冯，并派飞机轰炸太原以示威胁。11月底，阎锡山被迫离晋经天津赴大连，冯玉祥则潜往宋哲元部驻地山西稽山县隐居。

反蒋派纠集声势浩大的反蒋联军，拼凑所谓的“中央政府”和“中央党部”，与蒋介石进行一番生死较量，但最终仍然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反蒋派失败的原因在于：第一，从双方经济实力对比看，南京政府占了压倒优势。蒋介石拥有中央政府的名义，得到江浙财团和美、英、德、法等帝国主义的支持，控制了中国主要的富庶地区，操纵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因而得以动员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持长期的内战。而阎、冯等地方实力派，只能依靠华北地区落后的地方经济，财政上处处捉襟见肘，难以与南京政府相抗衡。

第二，从政治上看，反蒋派是一个由各派军阀、官僚和政客组成的复杂而又松散的政治集团，他们各有各的打算，内部矛盾严重，彼此争吵不休，只是由于互相需要而暂时纠集在一起，不可能成为统一的力量，当战争进行到关键时刻，在蒋介石分而治之的策略面前，很快就分化瓦解了。

第三，从军事上看，反蒋联军的主要武力阎、冯和张桂军之间，没有严格统一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缺乏有效的协同配合，而且互存戒心，企图保存实力，往往陷于各自为战的境地，有利于蒋介石各个击破。东北军拥蒋入关，从根本上改变了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使阎、冯军腹背受敌，极大地加速了反蒋联军的失败。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和反蒋派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通过这一战争，蒋介石基本上消灭了几支实力强大的地方军阀，扩大了南京政府控制区域的版图，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反蒋势力则受到了极大削弱，尤其是冯玉祥，西北地盘尽失，惨淡经营20多年的西北军全部瓦解，从此一蹶不振。第二次北伐后出现的冯、阎、桂三大军事集团与蒋氏中央分庭抗礼的局面不复存在，但南京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并未彻底解决。

当国民党新军阀忙于混战之时，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湘、鄂、赣地区得到了蓬勃发展，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形成了很大威胁。因此，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就掉转枪口，全力“围剿”红军，进行“剿共”战争。

中原大战是辛亥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牺牲最为惨重的军阀混战。历时7个多月的战争，给双方造成了重大伤亡。据保守的统计，在战争中蒋军死伤9.5万人，反蒋联军死伤15万人。而它给人民生命财产所带来的损失，对社会经济文化所造成的破坏，则更为严重，难以估量。以主要受害地区河南省为例，据该省所编《民国十九年豫灾纪实》统计：“因战事死亡人口达十二万余口，受伤人口一万九千五百余口，逃亡在外者达一百一十八万五千余口，被军队拉夫达一百二十九万七千七百余口，其中因以致死者三万余口，而兵士之死亡者尚不在内。财产损失包括破坏及被焚房屋在内，总计为六亿五千一百四十六万九千余元。而间接及无形之损失尚不在内。全部损失据估计十年之后方可恢复。”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五 国共“围剿”与反“围剿”战争

1 第一、第二次“围剿”的发动

1930年秋，中原大地国民党新军阀自相残杀的枪炮声逐渐沉寂下来，蒋介石正得意洋洋地到处吹嘘“讨逆”的胜利。这时，他突然发觉，在南京政府的大后方，在广大的湘、鄂、赣、皖、闽等地区，到处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苏维埃区域，中共领导的红军，已由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严重威胁着南京政府的统治。

惊慌失措之余，蒋介石立即调转枪口，纠集大量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对红军和苏区发动了一连串大规模的“围剿”。于是，另一种形式的残酷内战，即国共“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取代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其程度之激烈和时间之漫长，都超过了后者。

首先，让我们追溯一下苏维埃运动在中国的开展和红军与苏区发展壮大的经过。

红军和苏区的发展

“苏维埃”一词出自俄语，意为会议或代表会议。苏维埃最早出现于俄国1905年革命，是组织工人罢工和起义的领导机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苏维埃运动也由俄国扩大到世界各国。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提出了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并要求在落后国家成立工农苏维埃政权。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国际指导下，逐步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在强调不要忘记苏维埃宣传的同时，又提出要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于是，中共便走上了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道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标志着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建立的统一战线实际上已经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但共产国际为了挽救国民革命，要求中共“退出武汉政府”，“但不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退出国民党”。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上通过了《左派国民党政纲》，决定展开“左派国民党运动”，即在政治上继续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合作，重新集结力量，以广东为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完成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在军事上，“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下”，以武装起义反抗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反动政策。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共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和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周恩来、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遭到失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很快受挫，起义队伍向湘南地区转移。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虽然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但在形式上，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子，不符合大革命失败后的客观形势，也难以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1927年8月，共产国际就中国革命问题发出指示：“必须把苏维埃的宣传口号变成直接斗争的口号”，提出由苏维埃领导革命运动，由中共领导苏维埃。9月，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果断地停止了“左派国民党运动”，提出推翻国民党政权、适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确立了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方针，把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苏维埃运动提上了日程。

1927年12月，中共发动广州起义，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提出“以赤色恐怖消灭白色恐怖！”在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下，广州起义很快失败了，但是，中共领导的通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运动，从此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到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发动第一次“围剿”之前，全国已经形成了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左右江等苏区，下面分别叙述之。

中央苏区

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是领导全国苏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它是由以下几个苏区发展演变而逐步形成的。

湘赣苏区。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进驻湘赣交界之处的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到1928年2月，以井冈山为依托，建立了以茶陵、遂川、宁冈三县苏维埃政府为中心的湘赣苏区。1928年1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进入湘南，开辟了以永兴为中心的湘南苏区。后因国民党军“围剿”，朱德、陈毅率部向井冈山转移。4月，朱、毛两部在宁冈会师，共同组成红四军，建立了湘赣边苏维埃政府，湘赣边区进入全盛时期，湘赣边区和湘南苏区，与琼崖苏区、海陆丰苏区，是全国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四个苏区。

湘鄂赣苏区。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发动平江起义，成立了红五军，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平江、浏阳、修水一带展开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此后，又转战于湘赣和湘鄂赣地区。到1930年，湘鄂苏区与湘鄂赣苏区连成一片，成立了红八军和红十六军，与彭德怀的红五军合编为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

赣南闽西苏区。1929年1月，为打破国民党军对井冈山的“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沿途号召“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相继开辟了以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为中心的赣南苏区，和以上杭、龙岩、永定为中心的闽西苏区，闽西地方红军编为红十二军。1929年11月，罗炳辉等发动吉安起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赣西苏区，成立了红六军。1930年1月，红四军由闽西回师赣南，极大地推动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地就要到来”，“而中国之内首先出现的将是江西苏维埃，因为江西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都比各省要成熟”。3月，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以统一领导赣西南各县红色政权。6月，红四、六、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提出要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制定了发动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武昌和长沙，提出要“会师武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汉，饮马长江”。7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进至南昌周围，稍作佯攻后，即撤围休整。7月底，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趁湘桂军阀混战，一举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并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后又主动撤出，给国民党以极大的震动。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胜利会师，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红一方面军成立后，进行了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围困长沙十二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三十余里”，因久攻不克，遂主动放弃原计划，转而进攻江西吉安。同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克赣西南重镇吉安，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使赣江两岸的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为中央苏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鄂豫皖苏区

鄂豫皖苏区以横跨三省的大别山山脉为中心。1927年11月，中共鄂东特委发动黄（安）、麻（城）起义，起义队伍攻占黄安县城21天，后退入黄陂山区坚持游击战争。黄麻起义是建立鄂豫皖苏区的起点。1929年5月，河南商城爆发金寨起义，创建了豫东南苏区；同年9月，又成立了包括黄安、麻城等八县在内的鄂豫边区，将其与豫东南苏区统一起来。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初，皖西相继爆发武装起义，建立了以六安、霍山、霍邱为中心的皖西苏区，它是鄂豫皖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鄂豫边区和皖西苏区联合组成鄂豫皖特区，并组成红一军；6月，又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鄂豫皖苏区正式形成。鄂豫皖苏区是全国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红色区域，它地处中原，东临津浦，西扼京汉，北靠陇海，南逼长江，与中央苏区和湘鄂西苏区遥相呼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洪湖湘鄂西苏区

湘鄂西苏区以洪湖地区为中心，是由贺龙、周逸群领导建立的。1928年3月，贺龙、周逸群发动桑鹤边起义，攻占了桑植县城，建立起湘鄂边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并开展游击战争。到1929年6月，桑植、鹤峰两县苏区连成一片，不断扩大，当地红军编为红四军（后改为红二军）。1930年春，洪湖地区的地方武装又组成红六军，先后攻占沔阳、

潜江、石首等地，成立了鄂西苏维埃政府，标志着洪湖苏区正式形成。同年7月，红二军与红六军会师公安，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

闽浙赣苏区

1928年1月，方志敏、邵式平领导了赣东北弋（阳）横（峰）年关暴动，并坚持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2月，成立了包括弋阳、横峰等八县的信江工农民主政府。1930年夏，赣东北红军组成红十军，周建屏任军长，奠定了后来闽浙赣苏区的基础。

左右江苏区

1929年11月，邓小平、张云逸领导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了左右江苏维埃政府，并成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北调，次年抵达中央苏区，并入中央红军。

到1930年下半年，虽然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共产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但中共领导的苏维埃运动仍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农村红色政权已经分布到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河南、安徽、浙江等许多省份；红军人数超过7万，枪支超过7万，党员人数达12万以上。

193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统一编为8个军：鄂豫皖编为红一军；贺龙、周逸群部编为红二军；赣西南编为红三军；朱德、毛泽东部编为红四军；彭德怀部编为红五军；鄂西周逸群部编为红六军；广西左右江编为红七军；湖北阳新、大冶编为红八军。同年6月，中共中央又将长江流域的红军组成3个军团：红三、四、十二军组成红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红二、六军组成红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红五、八军组成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

第一次“围剿”及其被粉碎

1930年8月下旬，红三军团攻占长沙以后，蒋介石大为震惊，立即命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召集湘鄂赣三省党、政、军高级官员举行“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个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苏区红军的总方针。蒋介石得知红一方面军主力集中于赣南之后，决定以鲁涤平第九路军（辖5个师又1个旅）为主力，并调朱绍良第六路军（辖4个师又1个旅）由豫、闽入赣，蒋光鼐第十九路军（辖2个师又1个旅）由粤入赣协剿，全部兵力共11个师又3个旅，总计10万余人，抽调航空第一、三、五队赴赣助战。同时，在南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司令鲁涤平兼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江西“剿共”军事。

鲁涤平将所部分为3个纵队，第十八师张辉瓒部、新编二十师许克祥部为第一纵队，由张辉瓒兼任指挥，集中于丰城、樟树，以攻取吉安、永丰为目的；第五十师谭道源部、独立十四旅刘夷部为第二纵队，集中于新建一带，以攻取新喻（今新余）为目的；第七十七师罗霖部、新五师公秉藩部为第三纵队，集中于高安、上高，以攻取分宜、安福为目的；毛炳文、熊式辉两师担任预备队。南昌行营决定采用分路进攻、“长驱并进”的战术，并制定了下述作战方针：“以主力由永丰、乐安方面进剿，并各以一部由广昌、石城及兴国方面进剿，将匪军包围于宁都以北及东韶、东固间地区而歼灭之”。

11月中下旬，国民党军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的广阔战线上，开始向江西苏区分路发动进攻。12月上旬，蒋介石亲赴南昌视察，并发表《告民众书》，声称此次“剿共”大军共有30余万众，海军有兵舰20艘，飞机数十架，四面围堵，无异罗网，“惟诚心悔过投顺者赦免，携械或擒杀匪首来归者有赏。”

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围剿”，红一方面军发布了第一次反“围剿”命令：“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之”。具体作战部署如下：①先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筹措给养，训练部队。②红三军团为中路军（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迅速渡过袁水南岸，集中队伍，向樟树前进，相机略取之。③红四军、红十二军（由林彪、罗炳辉指挥）为右路军，经崇仁向抚州前进，相机略取抚州。④红三军（由黄公略、蔡会文指挥）为左路军，担任赣江西岸一带地区扰敌工作，牵制敌人进攻吉安。

由于红军主力迅速转移，使国民党军屡次扑空，但敌军仍一意孤

行，不断向根据地中心逼近。

12月16日，国民党第九路军主力新编第五师公秉藩部进至陂头，第十八师张辉瓒部进至古县，第五十师谭道源部进至招携一线，并继续向前推进。红军见敌军来势汹汹，大部队迅速撤退，只留下小部队牵制敌人，以诱敌深入。19日，公秉藩师进攻东固，红军略作抵抗后即撤往龙岗，国民党军占领东固。20日，张辉瓒师与公秉藩师在东固会师。东固战斗小胜，使国民党得意忘形，蒋介石特奖新五师公秉藩部银洋1万元，并将其番号改为第二十八师，以资鼓励。

鲁涤平为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其他部队未能抵达指定位置，即命令张辉瓒、公秉藩、谭道源3个师长驱直入，“先行进剿”。国民党军孤军深入，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创造了条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分析了敌情，认为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为鲁涤平的嫡系部队，2个师各1.4万人，是“围剿”的主力，张辉瓒又是前线总指挥，而红一方面军主力有4万人，完全有能力消灭这2个师，如此便可基本打破敌之“围剿”，于是决定趁其处于运动之中和立脚未稳之际歼灭其主力。

12月28日，张辉瓒师由东固东进，抵达龙岗。红一方面军立即调集红三、四、十二军和红三军团，予以围歼。30日，将张部十八师团团围困于龙岗地区。张辉瓒孤注一掷，亲自指挥4个团向红军猛攻，均被击退。激战至下午，红军将第十八师截为两段（中间距离约2公里），形成各个包围。是时风雨大作，红军发起总攻，反复猛冲，突破敌军阵地，先后击毙敌五十三旅副旅长洪汉杰及一○五团团长朱先志。张辉瓒率师部直属队负隅顽抗，后见大势已去，企图自杀未遂，被红军俘获。余部溃散四逃，全军覆没。前来增援之敌，得知第十八师被歼，张辉瓒被俘，急速后撤。

是役红军歼灭敌第十八师师部和2个旅近1万人，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被活捉的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后经东固群众大会公审被处决。

龙岗大捷之后，红军乘胜挥师东向，分成左、中、右三路，追歼敌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五十师谭道源部。1931年1月3日，红军进抵东韶附近，随即向敌五十师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仓促应战。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左、中路军分别突破敌军阵地，敌五十师伤亡惨重，团长黄敬、团副谭济康相继被击毙。谭道源见势不妙，乘红军右路军尚未到达指定位置，急令所部向南丰、洛口逃跑。东韶战斗歼灭国民党军五十师1个多旅，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40余挺。

东韶战斗后，国民党军接连丧师，阵脚大乱。南昌行营命令第二十八师立即撤回吉安，第八师、第二十四师撤回南丰。此时第六路军尚在闽境，未能入赣；第十九路军虽然进驻兴国，但已无法挽回整个“围剿”的败局。至此，国民党对江西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被粉碎，总计损兵1.5万人。国民党当局在事后检讨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时，不得不承认红军的优点是：“凭借苏区组织，从事作战准备”，“确保主动，避免于不利态势下作战”，“乘虚蹈隙，机动集中兵力，先后各个击破我第九路军第十八、第五十两师”；而“我军兵力之部署过于分散，各军师之行动又无统制，步调不齐”，“以致第一次‘围剿’作战失利”。

第二次“围剿”的失败

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立即调兵遣将，准备发起新的大规模“围剿”。

1931年2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离宁赴赣，组织对江西苏区的第二次大“围剿”。蒋介石吸取了上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强调，此次“围剿”，当“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并据此制定了第二次“围剿”的作战方针：“以歼灭赣南匪军为目的，以主力分由东、北、西三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协剿，并依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原则，将匪军严密封锁，逐渐缩紧包围圈，断绝匪军物资来源，最后一举而歼灭之。”蒋介石声称在“三个月内，一定可以将其完全消灭！”何应钦也宣布：“政府此次剿赤，早具消灭决心，赤匪一日不灭，大军一日不他调。”

国民党第二次“围剿”所动用的兵力，除参加上次“围剿”的第六、九、十九路军外，又增调王金钰第五路军（辖5个师）和孙连仲第二十

六路军（辖3个师）参战，总兵力达20万人。

4月1日，国民党军分兵四路发动进攻，蒋光鼐第十九路军主力2个师由兴国向龙岗、宁都方向前进；王金钰第五路军主力三个半师由泰和、吉安、吉水、永丰向东固、潭头、沙溪方向前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主力2个师由乐安、宜黄向大金竹、洛口方向前进；朱绍良第六路军主力两个半师由南丰、康都向广昌方向前进，开始大举“围剿”江西苏区。

在这次“围剿”中，国民党军向前推进十分谨慎，每日只前进5里、10里或20里，每占一地即构筑工事和进行“驻剿”，伴之以大肆烧杀和严密封锁，同时进行反共宣传，以造成苏区的经济困难和人心恐慌。

第一次反“围剿”后，红一方面军主力虽然减至3万人，但经过休整后，斗志更加旺盛。从1931年3月起，江西苏区军民便开始积极准备，以反击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3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制定了反“围剿”计划，提出要“分散密布，坚壁清野”，命令红军立即撤离东固、龙岗地区；红五、八军分别开往宁都、兴国、永丰、宜黄、乐安等处山中；红九、十军分别进入万安、遂川一带策应；红十二、二十军进入吉安、泰和一带；红二十二军进入永新、宁冈、莲花与攸县、醴陵联络；各部必须避实就虚，乘机进攻，分散密布，随时变动，使国民党军无可捉摸，难以防范。鉴于各路国民党军中，蔡廷锴部、孙连仲部和朱绍良部的战斗力比较强，红一方面军决定集中力量打击战斗力较弱的王金钰部，首先争取在运动中歼灭其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

此时，王金钰第五路军分为三路，向东固推进。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及第四十七师1个旅为右路，经富田向东固攻击前进；第四十三师郭华宗部为中路，向潭头攻击前进，尔后协助右路进攻东固；第五十四师郝梦龄部为左路，向沙溪攻击前进，尔后协同中、右两路会攻东固。南昌行营一再提醒各路指挥官：“均须稳扎稳打，并确实联络，互相策应，避免孤军深入，以防被匪军各个击破。”4月7日，右路公秉藩师攻占富田。中、左两路进展缓慢，直到5月中旬才抵达指定位置。5月13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日，左路郝梦龄师攻占沙溪；15日，中路郭华宗师攻占潭头。至此，第五路军各师迫近东固，准备协力进攻东固。

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东固山区等待20余日，终于捕捉到了歼灭敌军的战机。5月15日，红一方面军下达作战命令，以红三军团为左路军，红三军为中路军，红四军、红十二军为右路军，共同围歼由富田进犯东固的敌公秉藩师。16日，公秉藩师由富田进犯东固，途中突然遭到红军主力的猛烈进攻，猝不及防，顿时陷入混乱之中，大部迅速被歼。第二十八师无线电队的全部人员和器材均落入红军之手，师长公秉藩亦被当地赤卫队俘获，后被红军误认为白军营部书记予以错释。红军乘胜追击，又歼灭敌军1个旅大部，并收复固陂、富田。富田战斗歼灭第二十八师及第四十七师1个旅大部，缴获枪支5000余支，火炮30余门，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

富田战役之后，红军主力星夜转移于潭头方面，17日围攻敌四十三师郭宗华部。郭师力不能支，向水南逃窜，企图退至潇龙河北岸据守。潇龙河水深流急，无法徒涉，而原先架设的便桥又为赤卫队拆除，郭部只得转向白沙逃窜。红军乘胜追击，于19日在白沙截住逃敌，经激战，全歼敌四十七师1个旅和四十三师一部。白沙战斗，红军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山炮2门。

上述战斗进行之时，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奉命绕道向红军侧后进攻。5月21日，第二十七师高树勋部在中村与红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22日上午，红三军团和红四军对中村发起猛烈进攻，激战六七小时，于当日下午占领中村，残敌窜回乐安。中村之战，红军歼国民党军二十七师1个旅，缴获各种枪支3000余支。

红军在痛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和第二十六路军之后，开始挥师东进，迎击朱绍良第六路军。此时，第六路军为避免孤军深入，慌忙向广昌收缩兵力，并从5月23日起，开始由广昌向南丰撤退。红一方面军决定乘敌军第五师胡祖玉部未及撤离广昌之机，攻歼该师。27日，红军直逼广昌城下，从南、北两面展开攻城。经过一天激战，于当晚9时攻克广昌城，歼灭守军第五师一部，重伤师长胡祖玉（6月3日胡死于南昌）。胡师余部向南丰溃逃。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中第四仗的胜

利。

广昌战斗之后，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约7000人，从宁化仓皇撤回建宁。红一方面军决定集中主力攻打建宁的刘和鼎师，为开辟新区创造条件。5月31日，红三军团突然出现在建宁城下，城内守军刘和鼎以为是小股红军，贸然出城迎战，被红军消灭大部，刘和鼎率残部逃往延平，红军顺利进占建宁、泰宁。建宁之战，红军歼敌3个团，俘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2500余支和足供红军全军半年之用的大批西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最后一仗的胜利。

从5月16日至31日，红一方面军在半个月内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横扫700余里，接连在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等地打了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国民党军事当局事后分析失败原因，被迫承认：红军“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分散配置，集中攻击之指导要领，均合机宜”；其机动灵活，连续作战，“符合避实击虚之原则，尽其游击性运动战之能事”。而国民党军参战各部，因“历史不同，互信未立，自难密切协同发挥统合战力”，故“以约一倍之兵力，四面围剿，仍感不足”。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对鄂豫皖和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围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诬指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起突然进攻，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蒋介石“不予抵抗，力避冲突”的命令下，纷纷撤往关内，使日军很快占领了整个东北。

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点燃战火，悍然向闸北中国守军发起攻击，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高潮，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多次发表宣言，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国许多城市都召开了各界抗日救国大会，举行游行示威，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厉行对日经济绝交”，“组织抗日义勇军”，“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在全国抗日运动冲击下，国民党内的矛盾也更为激化。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于1931年12月15日宣布辞职。国民党的统治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军和苏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红一方面军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将红军主力由兴国西部南移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肃清当地的地主武装，扩大和巩固苏区。到1931年冬，赣西南苏区和闽西苏区已经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拥有29个县和300余万人口的中央苏区。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成立了以朱德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红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出现了一个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苦民众利益，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相对立的革命政权。

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和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下，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下，于1931年12月在江西宁都举行武装起义，全军加入红军，改编为红五军团，进一步壮大了红军力量。

在鄂豫皖地区，红四方面军接连发起了苏家埠和潢光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使鄂豫皖苏区迅速扩大，拥有26个县和350余万人口，主力红军增至4.5万人，地方武装20余万人。中国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蒋介石下台后，仍然控制着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权。没有他的支持，南京政府显得群龙无首，运转不灵。于是，国民党内请蒋复职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背景下，经过一番紧张的幕后活动，蒋介石与汪精卫终于就共同执政达成了权力分配的秘密协定。1932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这样，蒋、汪合作，重新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实权。

蒋介石一上台，就全力谋求结束上海抗战，对日妥协，以便腾出手来对付红军和苏区。5月5日，中日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同意扩大日军在上海的驻扎区域，将十九路军撤离，并取缔抗日活动。上海停战之后，蒋介石立即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作为国民党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准则。他视“剿共”为头等大事，宣称他的第一个责任“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要求部下“专心一致剿匪”，并警告说：“嗣后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

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会商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会议决定先“肃清”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的红军，然后再“围剿”江西中央苏区，并由蒋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亲自加以指挥。在“清剿”方式上，提出以政治、经济配合军事，以求根本肃清苏区；在军事行动上，要求互相配合，齐头并进。蒋介石还特别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调：“剿匪须硬干、快干、实干”，要不惜一切代价。

为了“围剿”红四方面军，蒋介石调动了26个师又5个旅共30万人，分三路进犯鄂豫皖苏区。中路军司令部设在河南信阳，蒋介石自兼司令官，刘峙任副司令，下辖6个纵队，进攻豫南鄂东红军。右路军司令部设在安徽六安，李济深兼司令官，王均任副司令，下辖3个纵队，进攻皖西红军。左路军司令部设湖北，司令官是何成濬，副司令是徐源泉，下辖4个纵队，进攻鄂中红军。

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以其中路军之陈继承第二纵队和卫立煌第六纵队为主力，实行稳扎稳打，分进合击，击破红军主力后，则并进长追，四面堵截。其“围剿”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攻占黄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红军主力赶出鄂豫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地区，接着由北向南，将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之长江沿岸而消灭之。

8月上旬，国民党军中路军和右路军开始大举进攻，猛扑鄂豫皖苏区中心地带。红四方面军主力仓促应战，未能阻止敌军前进，13日国民党军占领黄安。接着进攻新集，红军在激战5天，毙伤敌军2000余人后，向皖西转移。9月9日，鄂豫皖苏区的政治中心新集失陷，14日商城又失守。9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主力进至皖西金家寨地区，与红二十五军会合。

蒋介石发觉红军主力西移，急调部队追击堵截，围攻皖西苏区。在此情况下，10月10日，张国焘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留少数部队在苏区坚持斗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会后，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转战鄂陕川地区，从此未再返回鄂豫皖苏区。

在湘鄂西苏区，国民党军左路军10万余人在何成濬、徐源泉指挥下，从7月中旬开始发起大规模进攻。其计划是：第一步先“包围歼灭”襄河北岸之红军，尔后转入襄河南岸作战；第二步再“摧毁”洪湖苏区。国民党军集中兵力进逼，急欲寻找红军主力决战。7月下旬，红三军被迫转移至荆门东南地区，襄北地区为国民党所控制。8月上旬，国

民党军全力“围剿”洪湖苏区。至9月上旬，洪湖苏区几乎全部失陷，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遭受重大损失，医院、兵工厂等全部被焚毁，红三军主力被迫转移至鄂北地区。至此，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均告失利。

在鄂豫皖和湘西苏区得手之后，国民党军开始将进攻矛头转向江西，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大“围剿”。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赣粤闽湘边“剿匪”总司令部，由何应钦出任总司令，并制定了下述作战方针：“为求迅速歼灭赣南匪军主力，以三路分途向匪巢进剿，主力集中于中路，包围匪军主力于黎川附近地区一举而歼灭之。”具体部署为：以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统率蒋军嫡系12个师；以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统率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等部6个师又1个旅；以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统率粤军6个师又1个旅。总兵力共30多个师30多万人。陈诚率领的中路军，是这次“围剿”的主力，下辖3个纵队：第一纵队罗卓英，下辖3个师，驻乐安、宜黄地区；第二纵队吴奇伟，下辖3个师，驻抚州地区；第三纵队赵观涛，下辖4个师，驻金溪、浒湾一线。1931年1月底，国民党军各路部队开始分头行动。

红一方面军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部队得到了扩大，此时共辖第一、三、五军团和第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总兵力约7万人。红一方面军遵照中央的指示，在敌人部署未定之时首先进攻，以调动敌人，于2月12日对敌军的重要据点南丰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立即调兵增援，企图同红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红一方面军以一部佯装主力，向黎川前进，诱敌东进；主力则秘密转移至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陈诚果然上当，立即调兵东进，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当时由宜黄、乐安向黄陂开进的国民党军第一纵队比较孤立，红一方面军决定集中兵力，争取在运动中首先歼灭该敌。

2月27日，国民党军第一纵队第五十二师李明部和第五十九师陈时骥部，分别沿登仙桥和固冈一线向黄陂前进，当时细雨浓雾，道路泥泞，国民党军行动非常缓慢。下午1时，红一军团首先向敌军发起进攻，将第五十二师拦腰切断，激战3小时，歼灭第五十二师师部，俘虏师长李明，红三军团也随即投入战斗，战至次日上午，全歼第五十二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师。

与此同时，红五军团、红十五、二十二军也开始围歼敌第五十九师。28日，红军发起全线进攻，激战至下午，歼灭第五十九师大部；该师师长陈时骥率残部数百人逃往蛟湖，3月1日在登仙桥附近全部被歼，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役，红军歼敌近2个师，俘虏万余人，缴获枪支万余支、迫击炮40多门，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

黄陂作战失败后，陈诚于3月中旬调整作战部署，将分进合击方针改为中间突破，命令所部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围歼”红军主力于广昌地区。红一方面军决定乘敌前后纵队之间拉开距离，后纵队力量比较薄弱之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第十一师萧乾部于草台岗、徐庄地区。3月20日，第十一师陆续到达徐庄、草台岗一线。当夜，红军各部先后进入攻击位置，次日凌晨，发起全线猛攻，展开激烈战斗，霹雳山、雷公嵊一带战斗尤为惨烈。红军迅速突破国民党军防线，对敌分割包围，战至下午，敌军第十一师大部被歼，师长萧乾受伤逃脱，旅、团长以下军官伤亡惨重。

草台岗战役，红军歼敌第十一师又1个营，俘虏6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至此，第四次大“围剿”基本被打破。

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和草台岗战斗中，歼灭了蒋介石嫡系部队3个师，俘虏近2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5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特别是国民党军第十一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王牌军，它的覆灭，使各路国民党军为之丧胆，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士气。蒋介石承认：“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大“围剿”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参考书目

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2.戴向青、余伯流等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中、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4.张同新著《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5.朱汉国等著《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

6.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第六卷《从内战到抗战》（1935～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中国史话》主要编辑出版发行人

总策划 谢寿光 王正

执行策划 杨群 徐思彦 宋月华

梁艳玲 刘晖春 张国春

统筹 黄丹 宋淑洁

设计总监 孙元明

市场推广 蔡继辉 刘德顺 李丽丽

责任印制 岳阳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抗日战争史话》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日战争史话/荣维木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7

（中国史话）

下载资料请关注我的博客https://

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Ⅰ.①抗… Ⅱ.①荣… Ⅲ.①抗日战争-史料 Ⅳ.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8291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话·近代政治史系列

抗日战争史话

著者/荣维木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人文分社（010）59367215

电子信箱/renwen@ssap.cn

责任编辑/吴超

责任校对/白桂芹

责任印制/岳阳

总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6.75

版次/2012年7月第1版 字数/132千字

印次/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3507-7

定价/1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

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2011年4月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目录

一 近代中日两国的基本关系

1 清廷的没落与日本的崛起

2 日本出兵台湾

3 日本的大陆政策

4 甲午战争与台湾军民的抗日斗争

二 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局部抵抗

1 柳条湖事件与东北沦陷

2 伪满洲国的成立与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3 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4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与局部抵抗

三 中国的抗战准备与西安事变

1 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换

2 中国的抗日军事准备

3 中国的抗日经济准备

4 西安事变爆发，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四 卢沟桥事变与中国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到来

1 卢沟桥事变

2 八一三事变

3 国共两党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4 持久战方针与国共两党的战略分工

五 阻敌于前、制敌于后

1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

2 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

3 国共两党的对日情报战

4 两个战场的变化对中国抗日全局的影响

六 侵略者的加害罪行

1 日军的屠杀罪行

2 日军的性暴力犯罪

3 细菌战与化学战

4 日军对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七 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融合

1 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建立

2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盟的建立

3 中国抗日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

4 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与盟国的支援

八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 敌后战场的反攻作战

2 抗战后期的正面战场

3 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对日宣战

4 日本投降与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九 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

1 走向现代民族国家之路

2 沿海工业内迁与工业化传动

3 社会文化的变迁

4 进步力量主导了中国未来走向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一 近代中日两国的基本关系

1 清廷的没落与日本的崛起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隋唐时期就建立了密切关系。从徐福东渡的传说，到日本至今仍沿用的汉字，都说明中国曾经对日本发生过巨大影响。在华夷秩序影响下，中日两国的发展走向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那时，欧美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荷兰、美国，基本完成了近代工业化历程，开始大规模向海外扩张，以寻求更多的殖民地原料市场与商品贸易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同处东亚地区的中国和日本难免受到西方列强的威胁，维持两千年之久的华夷秩序必将解体。

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英国的炮艇叩响了中国的大门。当时主政中国的清廷，未能抵挡英国的坚船利炮，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武器窳劣固然是中国失败的一个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开始走向没落的封建帝国，无论它如何努力，都难以抗拒新兴的资本主义主宰世界的潮流。1842年，中英两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不久，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典等西方列强效仿英国，也先后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逐渐成为西方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和中国一样，日本也很快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入侵。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驶抵日本江户湾的浦贺港，通告日本幕府，要求日本开港通商。由于佩里率领的舰船是黑色的，该事件在日本被称为“黑船事件”。事件的结局与鸦片战争一样，日本幕府最终只能屈服。1854年，日美签订了《和好条约》，通过这一条约，日本被迫开港，美国在日本享有最惠国待遇。此后，英、法、俄、荷等西方列强步美国后尘，逼迫日本政府与它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开始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然而，面临着相似的命运，当时的中日两国的统治者却采取了不同

的应对方式，两国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先说中国。中国是世界上封建制度形成最早且封建制度最完善的国家。在历史上，中国创造过许多人类文明，并以此导引过人类的进步。但是，也正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完善，使得资本主义很难在它的内部成长。最终，鸦片战争中止了中国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如何适应新的世界，对于一贯闭关锁国、以天朝自居的中国来说，是严重的考验。然而，尽管当时中国已经有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哲，但遗憾的是，主政中国的清王朝仍然抱残守缺，不肯从制度上革旧布新。在此状态下，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洋务运动”，最终未能使得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从此，中国从一个拥有完整主权的封建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断地割地赔款，不断地经济侵袭，使中国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成为任列强瓜分强食的俎肉。

再说日本。同样遭到列强侵略的日本，选择了与中国不同的应对之策。“黑船事件”对日本国内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震动。与中国不同的是，面对列强的“船坚炮利”，日本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师夷长技以制夷”，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对西方何以会“船坚炮利”产生兴趣，并对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探讨如何对日本进行改革。几乎与中国“洋务运动”同时，1868年明治天皇政府成立后，宣布废除幕府制，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新的中央政权。此后，明治政府开始对内政、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的明治维新。此后，明治政府制订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目标，而把“脱亚入欧”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基本国策。明治维新后，日本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国力。但岛国的条件限制了日本的发展，于是，日本开始效仿西方列强，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日本的大陆政策

日本历来有武家文化的传统，早在11世纪日本就出现了武士阶层，即以从事战争为毕生职业的军人集团，国家政权及地方机构也操持在武家势力的手中。明治维新后，武家文化的传统不仅没有遏止或消除，反而随着西方列强瓜分世界浪潮的出现而蔓延，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对外政策。另外，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受岛国地理的影响，日本缺少发展资本主义的原料市场、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于是，在武家文化的支配下，向大陆扩张便成了日本的基本国策，矛头指向首先是离日本最近的大陆——朝鲜和中国东北。

1868年4月6日，刚上台的明治天皇颁发的《五条誓文》和《宸翰》（天皇亲笔信）即宣示：“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868年年末，木户孝允抛出了“征韩论”。他认为，“韩地之事乃皇国建立国体之处，推广今日宇内之条理故也。愚意如为东海生辉，应从此地始。倘一旦动起干戈，不必急于求成，大致规定年年入侵，得一地后，要好自确立今后策略，竭尽全力，不倦经营，不出二、三年，天地必将为之一变，万世不拔之皇基将愈益巩固矣”。[1]1870年，日本外务省也抛出《外务之三条紧急事务》，把解决朝鲜问题视做“实现经略之远谋”。这些设想很快就付诸了行动。

1875年9月，日本海军云扬号舰秘密行驶到朝鲜江华海峡的月尾岛前海。9月19日，井上良馨率领20几名士兵乘小艇沿盐河向朝鲜内陆深入，途经朝鲜的永宗、顶山等岛，窥测草芝镇炮台，寻找武装寻衅的机会。9月20日，云扬号也溯汉江而上停泊在永宗城附近，井上下令向朝鲜炮台开炮，并登岸占领了朝鲜首都门户的永宗岛要塞，肆意杀戮城中百姓，掠走36门大炮及其他财物。

“云扬舰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向海军发布准备对朝作战的紧急命令。但由于朝鲜与中国有朝贡关系，故日本先派员与中国交涉。1876年1月11日，日本派森有礼为特命全权公使，在北京与清政府交涉。森有礼谎称日船在驶往牛庄途经江华岛时遭到朝鲜岸上炮台袭击，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日船被迫防卫。清政府担心日本万一用兵祸及东北，对于日本明显的侵略行为毫无微词，反而劝说朝鲜“忍耐小忿”，对日本“以礼接待”。清廷的软弱再次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1876年1月，日本派全权大使黑田清隆、副使井上馨率领7艘军舰、800余名士兵驶往朝鲜，2月4日到达江华岛。失去清廷庇护的朝鲜，在日本的压力下于2月27日，在江华府签订了不平等的《日朝修好条规》（又称江华条约）。然而，日本并没有满足，继续以军事施压为前奏，攫取在朝鲜的特殊权益。

江华条约签订后，朝鲜各地掀起了反对和抵御外来侵略的群众斗争。斗争波及朝鲜的旧式军队。1881年7月，朝鲜发生兵变。兵变士兵包围了日本公使馆，处决了日本军事顾问堀本礼造少尉，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往仁川。消息传到日本，日本立即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会议最后决定出兵干涉，派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率领两个中队先行，陆军少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全礼景范率领舰队随后，另组成混成旅团集结在福冈待命。次年，通过日朝《济物浦条约》，日军进驻朝鲜。

在驻兵朝鲜的同时，日本也开始觊觎中国大陆。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草拟了《征伐清国策案》。该案认为，中国兵员虽众但有名无实，应趁其弱势“折其四肢，伤其身，使其不得活动。并将中国分裂为数国，始得确保日本之独立”。该案主张以8个师团的兵力进攻中国，其中5个师团在山海关与滦河之间登陆，直趋北京。再以2个师团进攻长江要冲之地，阻止江南援军。

关于战争时间，该案认为要有5年的准备。这正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时间相吻合。

同年，日本海军部也制订了征伐中国的方案。该方案内容十分详尽，包括参加战斗的日军舰队编队和数量，各舰船的主攻方向、进攻目标、战斗目的、陆海军的配合作战、后勤保障，等等，从海战直至协助陆军进攻北京的全部战争过程都详列其中。日本对中国朝鲜和中国大陆的步步紧逼，说明作为国家战略的大陆政策逐渐酝酿成熟。

1890年，日本内阁大臣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方针》，首次提出了“利益线”问题。他说，“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守卫主权

线，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疆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之安危有紧密关系之区域也……方今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惟独守卫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须保护其利益线”，“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之后，山县还先后发表了《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公开鼓吹日本应该“领有朝鲜、满洲及俄国沿海州”。山县有朋的《军备意见书》和《施政方针》等得到帝国议会和内阁的认可，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出笼。其后，日本对外扩张的每个步骤，如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都是在大陆政策的指导下实施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二 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局部抵抗

1 柳条湖事件与东北沦陷

以甲午战争为标志，清王朝的腐朽已经到了无以挽救的地步。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延续了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制度被彻底摧毁。但是，在帝国主义环伺下，中国并未摆脱民族危机。1905年，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南满地区的权益。1915年，日本又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以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为基础的不平等条约。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进一步提出了攫取满蒙的计划。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日本为了尽快摆脱困境，急于向中国扩张。这样，由关东军策划的柳条湖事件终于爆发。

从1929年开始，关东军陆续制订了《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对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处理满蒙问题方案》等一系列以占领中国东北为目标的方案。1931年，关东军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终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1931年夏，关东军利用侨居在长春附近万宝山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因租地挖渠引起的冲突，以保护朝鲜人为由，开枪镇压中国农民，打伤多人。日本事后反而颠倒事实，在朝鲜大肆宣传华人排斥朝鲜人，在朝鲜煽动了一场骇人的暴动排华事件。在事件中，在朝鲜的华侨死亡142人，受伤546人，失踪91人，财产损失413万元以上，逃难者达6000余人。

1931年6月，日本参谋本部派中村震太郎中尉，打着“考察农业”的旗号潜入兴安屯垦区一带，目的是“收集对苏决战方面以及兴安屯垦地区的作战资料”。[1]因兴安屯垦区属于边境军事地区，东北长官公署早以照会各国领事馆，不准外国人进入。中村一行4人化装成中国人模样，从泰来出发沿绰尔河西进，沿途收集了当地的大量情报。25日，屯垦军第三团第三营官兵在驻地附近发现中村一行4人形迹可疑，遂将其带到团部审查，并从他们携带的物品中搜查出记录沿途中国军事、道

路、矿藏等情报的笔记。由于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事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即向国内发出所谓的“中村大尉被虐杀事件真相”。声称“绝不能漠视此次不祥事件”。在东北的日本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等右翼团体还组成了“母国访问团”，返回日本四处游说，叫嚣日本的“满蒙生命线”受到“威胁”，煽动“武力解决论”。日本陆军省则鼓吹以此为契机，“坚定不移地推行大陆政策”。

终于，关东军迫不及待地发难了。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位于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西南方向的柳条湖，一声爆炸揭开了日本侵吞中国东北的序幕。按着早已策划的部署，一小队日军在距沈阳不远的柳条湖秘密炸毁一小段铁轨，伪造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的现场。之后，关东军立即出动独立守备第二大队进攻北大营的中国军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攻击沈阳城，独立守备第五大队急速赶到沈阳支援。在日军向北大营发起攻击的当时，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接到上级的指示是：“不准抵抗，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2]但在日军的进攻下，东北军也做了有限的抵抗，直到第二次接到不准抵抗的命令才撤出战斗。结果，可以驻扎万余官兵的北大营轻易落于敌手。148人捐躯，186人负伤；26辆战车，112挺各式机枪，33门迫击炮、平射炮，1302支长短枪支，以及大批弹药都落于敌手。[3]而日军仅付出战死2人、负伤23人的微弱代价。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从沈阳的满铁附属地向城内发起了进攻。地方军警也接到不准抵抗的命令，把沈阳城轻易地让给了日本人。

沈阳城沦于敌手，大批公私财产也尽陷敌手。仅武器一项，中国国内最为先进的各式飞机262架，另有迫击炮、山炮、野炮等3091门、战车26辆、机枪5864挺，长短枪118206支以及大批弹药，都成为关东军的“战利品”。[4]次日，营口、安东、凤凰城等重镇也被日军侵占。

与此同时，关东军第三旅团向吉林进犯。日军首先进犯二道沟，守军事先得到不抵抗命令，但也进行了有限度的抵抗，一时交火激烈，日军阵亡28人，但守军第二营官兵也损失惨重。中午时分，不抵抗命令再次传来，守军撤出战斗。在南岭，情况相同，日军阵亡38人，中国守军退出阵地。9月21日晚，关东军占领了吉林省城。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日军占领辽宁、吉林省会后，立即把进攻矛头指向黑龙江。但是，在嫩江桥遭到了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著名的江桥抗战，在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的指挥下爆发了。

11月4日，日军组成以滨本喜三郎大佐为指挥的嫩江支队，在3列铁甲车、数十门大炮、5架飞机的掩护下向大兴阵地发起猛攻。在前线指挥的马占山当即下令还击。日军的进攻队形很快被击溃，伤亡100余人，其中战死者30余人。日军遭受重创，急忙增派步、炮兵5个大队，于11月6日拂晓卷土重来。在日军凶猛的炮火轰击下，黑龙江省军队的阵地几成平地。但中国守军官兵在敌人面前毫不畏惧，浴血厮杀，终于顶住了敌人凶猛的攻势。到了傍晚，马占山考虑官兵们鏖战3天，伤亡严重，遂下令撤至三间房防线。

11月11日下午，日军先是出动骑兵500余人，在大炮的掩护下向三间房阵地猛扑。随即，大批日军在第十五旅团长天野、第三旅团长长谷部以及2个联队长铃木、森连的指挥下，兵分3路扑来，天上还有10余架飞机狂轰滥炸。马占山亲自到一线指挥，官兵们士气大振。到晚8时许，击退日军。直到14日，日军连续发动进攻均未奏效。

11月17日夜，从朝鲜开来的日军第八混成旅团赶到战场，兵力大增。而马占山部却孤立无援，在官兵大量伤亡和弹药缺乏的情况下，马占山只好下令撤出战斗。日军遂占领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江桥抗战结束。

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的抵抗日军侵略的战斗。虽然抵抗最终失利，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据日本统计，此役，日军共阵亡167人，伤600余人。[5]江桥抗战的消息传到关内后，全国上下立时轰动起来。北京大学600余名学生停课去顺承王府请愿，要求张学良出兵抗日、收复失地。上海各大学的师生也组织起请愿团督促政府出兵。杭州、广州、太原、济南、汉口、徐州、厦门、南昌等地的爱国师生、各界民众也积极行动起来，一些学生还自发组成“抗日援马团”，奔赴东北要求参加马占山队伍投身抗战。

然而，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情

况下，日军继续扩大对东北的侵略。早在10月，关东军就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而轰炸锦州。11月27日，关东军开始进攻锦州。1932年1月3日，锦州沦陷。至此，日军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从黑龙江到山海关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3倍的11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东北很快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伪满洲国的成立与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武力侵占东北全境，继而于1932年3月9日扶持溥仪建立了“满洲国”。“满洲国”名为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独立国家”，而实际上完全是日本的傀儡政权，关东军是“满洲国”的最高统治者。关东军通过由日本人任总务长官的总务厅，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实权，一切事务必须取得日籍官吏的同意。溥仪只是关东军操纵的工具。

伪满洲国成立的第二天，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即与“满洲国”“执政”的溥仪以换文形式签订了《日满密约》，规定：（1）“满洲国”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日本”，而经费由“满洲国”负担；（2）“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线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施”均委请日本及日本指定之机关；（3）日本军队“认为心要之各种设施”，“满洲国”“竭力援助”；（4）日本人可任“参议”和“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关东军司令官有“保荐”权、“解职”权；（5）以上各项在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为“立约之根本”。半年后，以上述内容为基础的《日满议定书》正式签订，日本取得了在东北的一切既得权益，并拥有了驻兵权。9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承认“满洲国”。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立即对东北采取了残酷的殖民统治。

首先，为了巩固殖民统治，关东军对东北各地抗日武装进行残酷镇压。关东军对东北抗日武装发动了多次“扫荡”作战，仅1935～1936年3月间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东北抗日武装在日军残酷军事进攻下死伤者共有1.1万多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巩固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更加紧了对抗联的镇压。1939～1942年，关东军在伪满洲国所属的间岛省、通化省和吉林、牡丹江省的部分地区，出动日伪军警7万多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使抗日联军遭受巨大损失，抗联著名将领杨靖宇将军在1940年3月的日军“扫荡”中英勇牺牲。关东军还在东北实行所谓的“治安肃正”，残酷屠杀无辜平民，制造了无数起血腥屠杀事件。1932年9月15日，日军在辽宁省抚顺市南部的平顶山村制造大屠杀事件，屠杀当地村民3000多人。为了切断抗日武装和人民的联系，从1933年起，关东军在东北建立“集团部落”，用刺刀威逼百姓离开家园，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到日军指定的地区居住，实行归屯并户。到1938年，约共建立了1.25万个集团部落。在推行集团部落的过程中，日军实行血腥的三光政策，把民房全部烧光，不愿迁移的百姓统统杀光，财物抢光。1934～1936年，仅通化县就被烧毁民房1.4万间，废弃耕地33万亩。

其次，日本实行“日满一体的计划经济”，对伪满产业进行大规模开发，疯狂地掠夺战略物资。日军占领东北后，首先攫取了东北的交通运输事业，抢占铁路，交给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满铁经营。同时，日军又掠夺了东北煤、铁等矿产资源的开采权和经营权，抢占阜新、北票等煤矿，交由满洲煤矿股份公司（即满煤）和满铁经办。满铁、满煤接手后，为了满足日本发动战争的需要，对东北矿产资源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大肆开采矿山，掠夺石油、煤炭、钢铁及其他战略资源。在金融方面，日本侵略者强占东三省官银号和中国、交通、边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成立由日本人控制的满洲中央银行、满洲兴业银行，控制东北的金融系统，通过发行伪钞、公债，强制储蓄和通货膨胀等手段筹措战争经费。此外，日本大肆移民东北，强占土地，掠夺粮棉油等农产资源。1932～1934年，日本先后组织了5次移民，把日本人迁移到东北定居、垦殖。1936年，关东军司令部又通过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计划从1937年起的20年内移民百万户。东北的数十万农民的土地被日本移民强行“收购”或掠夺，广大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日本移民的佃户，饱受着日本移民的剥削，更多的农民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还有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到煤矿做矿工，这些矿工遭受奴隶般的非人待遇，多数死在矿井之中。

再次，日本在东北推行奴化教育政策。伪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在东北建立了在其直接领导下的“协和会”，通过该组织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日本占领东北地区后，封闭原有的公立学校，组建由日本人掌管的“日满学校”，并规定私立学校也必须接受日本人的严密监督。原有的教学内容与教材全部被废止。1932年6月，日伪当局又强令各学校“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许多教材和书籍被焚毁。同时重新编写教材，向当地学生宣扬“日满一体”、“同文同种”、“王道乐土”以及“忠君爱国”等殖民统治思想与封建道德观念。殖民当局还禁止对中国学生讲授中国历史，并强制推行日语教

学，许多教材完全用日语印制。殖民统治者还强迫中国学生每天向日本天皇遥拜，诵读天皇诏书，企图以此养成中国学生对天皇的忠诚。另外，日本人还对学校内中国师生的思想活动进行严密监视，对教员实行严密的“思想检定”，并在各个学校中安插特务，控制中国师生思想。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与局部抵抗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国民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到围剿江西红军和对付反蒋派系身上，希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武力统一中国，树立和巩固蒋氏独裁政权。因此，他们对帝国主义主宰的国联寄予极大希望，盼望西方大国出面对日本施压，幻想三国干涉还辽的旧梦重演。然而，国联根本无力约束日本，虽然做出几项不痛不痒的决议，但没有阻止日本对中国的扩大侵略。

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昂扬，尤其是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各界民众、工人、知识分子纷纷走上街头，抨击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呼吁政府停止内战、领导抗日。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国民政府也进行了有限度的抗日。

侵占东北后，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又在上海挑起事端，不宣而战，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了进攻，驻守淞沪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反击，“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

当天夜里，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以20多辆装甲车开路，向闸北区的宝山路、虬江路、广东路、宝兴路、横滨路、天通庵路、青云路一线发起攻击。中国军队顽强阻击，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2月10日，国民政府增派第五军由张治中率领，参加淞沪会战，使中国军队作战人数达到5万余人。与此同时，日军也派遣2个师团增援，在上海的兵力达到7万余人，并且在装备上优于中国军队。

3月1日晨，日军对淞沪地区发起总攻，日军先以飞机、大炮猛轰了3个半小时，然后，日军第九师团、第二十四混成旅团以及海军陆战队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向江湾、庙行以及闸北八字桥一线发起猛烈攻势。各路守军在凶猛的敌人火力下仍然坚持战斗。直至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淞沪战役结束。是役，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阵亡官兵4270人，负伤9830人。另外，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下，有6080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名市民死于非命，2000余人负伤，失踪1.04万人，财产损失达16亿元。另外，中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被全部焚毁，东方图书馆收藏的数百万册书籍资料，包括涵芬楼所藏的10万多册宋、元版珍贵图书以及清乾隆年间编写的四库全书，均被焚毁或被日军掠走。[6]据日方记载，日军侵犯淞沪地区总计阵亡官兵769人、负伤2322人。5月5日，在国联代表团以及西方大国公使的斡旋下，中日签署《上海停战协定》，虽然日本停止了对上海进攻，但其势力得到扩张。

淞沪抗战历时33天，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官兵以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激发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抗日热情，全国掀起了又一轮各民族、各阶层、各派别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国民政府调整了对日方针，从完全不抵抗转变为有组织、有限度的抵抗，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1933年1月1日，日军突袭山海关，3日占领了山海关。国民政府要求张学良加强热河防务，并派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前往督促。1933年2月下旬，日军兵分南、北、中三路向热河大举进犯。孙殿英奉张学良之命率第四十一军由山西驰援热河。3月1日，日军出动飞机轰炸赤峰，然后发起地面进攻。冯占海、唐聚五部义军配合孙殿英军在赤峰城内外与敌展开一场殊死厮杀。战至26日，孙殿英部和其他义勇军余部撤出战斗，热河北部大部分沦陷。此役，孙殿英部阵亡军官45人、士兵1823人，负伤军官24人、士兵1537人。[7]

防守南线的万福麟部的6个步兵师（原是旅建制），也于2月27日在沙帽山与日军激战。战至3月4日，热河的南部也落于敌手。而守卫热河省会的汤玉麟根本未做抵抗，致使日军仅以128名骑兵，于3月4日轻取承德。

热河沦陷，日军兵逼长城一线，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全国上下一片震惊，谴责当局的声音此起彼伏。南京政府也意识到局势的严峻，除组织东北军和原西北军的宋哲元、庞炳勋、商震等部参战外，还抽调了3个中央师北上。

3月初，日军分别向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和冷口发起攻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长城抗战打响。

在古北口一线，守卫在这里的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一二师、一一o师及中央军的第二十五师。战斗从3月5日开始，至12日结束，中国军队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最后因未能抵挡住日军的飞机大炮，古北口失守。在喜峰口一线，守卫在这里的是华北第三军团所辖的6个师10个旅。战斗从3月9日开始，至4月11日结束。在这里，日军遭到了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虽然最终防线被日军突破，但仍然显示出中国抵抗侵略的决心。特别是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夜袭日军阵地，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获得全国人民的赞扬。在冷口一线，守卫在这里的是守军商震的第三十二军。战斗从3月6日开始，至4月11日结束，虽然未能阻挡住敌人的进攻，但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长城抗战除了在喜峰口、古北口、冷口与敌鏖战外，战场还在南天门、八道楼子、兴隆、新开岭、石匣、酒河桥、南北团汀以及滦东、察东各地展开，中国军人不畏强虏，奋勇作战，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血的代价，以鲜血和生命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组织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抗战活动。然而，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政策下，蒋介石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剿共”方面。5月31日，中日在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此协定虽然暂时制止了日军向华北的进犯，但国民政府被迫放弃了河北19个县、2个设治局，近4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的治理权，使日本侵略势力渗透到了华北。

《塘沽协定》签订之前，日军就开始觊觎察哈尔省。1933年5月24日，盘踞在多伦的日伪军南侵，沽源守军因无人负责指挥，纷纷后撤，日伪军轻易占领了沽源，察省形势顿现危急。为了抗击日军，5月26日，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发表了抗日通电。从6月开始，抗日同盟军即与日伪军展开了战斗。至7月，在连续取得胜利后，抗日同盟军决定攻打日伪盘踞的多伦。从7日至12日，经过激烈的战斗，抗日同盟军共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收复了多伦。

抗日同盟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国民党中央以干扰中日关系总方针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的名义，迫使抗日同盟军解散。之后，察北地区空虚，使日伪有了可乘之机。1936年1月，汉奸李守信在日本人支持下，同苏尼特右旗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勾结，成立“蒙古军司令部”和“蒙古军政府”，公然宣布脱离中国政府的节制。为了粉碎日伪阴谋，绥远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率部发起了绥远抗战。

绥远抗战从1936年11月15日开始，到12月19日结束。整个抗战又分为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战斗和锡拉木楞庙战斗。

11月15日，汉奸王英纠集5000余人向红格尔图进犯，日军7架飞机也开始向中国守军阵地投弹。傅作义亲自到前线指挥战斗，战至18日，日伪军无功而返，中国军队毙敌1000余人，俘虏300余人，其中有电台台长日本人八牟礼吉和日本人雇员松村利雄。傅作义决定乘势收复日伪盘踞的百灵庙。23日晚，百灵庙战斗打响。激战至24日上午，中国军队收复了百灵庙。此役击毙日伪军300余人，其中日本军20余人，击伤600余人，俘虏300余人。

百灵庙大捷，振奋了全国人民。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坚决支持绥远抗战的通电，并号召全国人民支援晋绥前线。国民政府外交当局也正式发表声明，指出“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论其背景作用为如何，自应予以痛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第三国无得而非议”。[8]其后不久，中国军队又成功地收复了锡拉木楞庙等地，基本肃清了绥远境内的日伪军，历时5个多月的绥远抗战，以中国军队的胜利结束。

[1] 〔日〕片仓衷：《杀害中村震太郎的犯人》，《目击者谈满洲事变》，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89，第71页。

[2] 吉林文史资料委员会：《吉林文史资料》第11辑，吉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第6页。

[3] 陈觉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第44、45页。

[4] 陈觉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第44～71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331页。

[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05，第202页。

[7] 邓一民等：《长城抗战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101页。

[8] 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第83页。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三 中国的抗战准备与西安事变

1 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换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又逼迫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队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侵略势力向华北渗透。面对侵略者的肆无忌惮，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更加猛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集团内部敦促当局抗战的呼声也日甚一日。在这种情势之下，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一系列转变。1936年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二中全会上做了“最后关头”的讲话。他说：“中央对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一点说，假如有人真要强迫我们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这是第一点。其次，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危害到我们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最低限度，就是如此。”[1]蒋介石的这番讲话，标志着中国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这种政策的转变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民党内部调节了派系纷争。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蒋介石致电冯玉祥，邀请他出席会议。另外，蒋介石还亲自飞到太原访问阎锡山，请其参加代表大会。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对中原大战时的死对头摆出了竭诚礼贤的姿态，尚属首次。除阎锡山、冯玉祥外，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等著名反蒋派人士也被邀请出席此次会议，9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当年的反蒋派大员胡汉民、汪精卫、冯玉祥、邹鲁等名列其中，还推举胡汉民和汪精卫分别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又任命冯玉祥、阎锡山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为总参谋长。至1936年9月，以抗日反蒋为口号的两广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标志着国民党内部的武力纷争结束。所谓的“安内”，除了针对中共之外，已经向着共同“攘外”的方向转变。

其次，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策的重要内容是武力“剿共”。虽然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仍然重兵包围红军，但在此之前，也开始了和平解决国共矛盾的尝试。1935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年末，宋子文、宋庆龄选派与其有私谊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赴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络，转达南京方面有意同中共谈判的信息，获得中共中央的首肯，董携带中共中央的谈判条件返回复命。1936年，红军东征回师宣言，明确提出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同年，蒋介石派驻苏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先后同中共代表团的潘汉年和王明会晤，就有关国共第二次合作事宜交换了意见。此后，中共代表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先后在上海和南京多次晤面，双方就共同抗日事宜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虽然谈判没有取得结果，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来两党十余年的对立开始松动。

再次，以筹备抗日为中心的外交调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霸占中国东北，也侵犯了西方大国在中国的权益，引起西方国家的“震惊”和关注。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指出，“中华民国1931年9月18日前在满洲之最后行政当局，已遭破坏……美国于事实上或法理上，均不承认任何事态为合法”。[2]美国的“不承认主义”无疑是对日本侵略政策的“棒喝”，虽然没有震慑日本的侵略野心，却越发加剧了日本同西方国家的矛盾。国民政府早已意识到西方国家同日本之间的矛盾，所以暂缓推行限制或取消西方国家在华特权的“革命外交”，以争取西方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国民政府有意起用亲英美派官员，且在敦促国联插手日本侵略事端的同时，频繁同西方国家接触，争取获得国际道义、舆论和经济方面的援助。九一八事变后，苏联《真理报》虽然发表评论抨击日本的侵略行径“为不合法，更非为自卫而出兵”，[3]但在具体行动中采取了“严正的不干涉政策”。[4]然而，日本占据了东北，毕竟对苏联远东地区构成威胁，因此苏联也急于修复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破裂的中苏关系。国民政府以争取苏联援华制日为目的，也开始了与苏联的外交活动。1932年12月，中苏之间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双方互派大使。除了争取苏联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外，国民政府之所以重视同苏联的交往，也包含了通过苏联解决与中共之间问题的动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中国的抗日经济准备

为了筹备抵抗日本侵略的经济实力，国民政府在以下方面做了努力并取得了效果。

首先，在金融方面完成币制改革。国民政府成立当初，实行银本位金融体制，随着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各资本主义国家强化了掠夺中国资源的步伐，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为了进行币制改革，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了《币制改革紧急令》，规定以中央、中国和交通三家银行（后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1法币等于英镑的1先令2便士半，与美元的汇率为100：30。其他银行禁止发行，各种货币限期到指定银行兑换，今后禁止白银或其他货币流行。法币代替银圆，使中国的货币趋于相对稳定，也使国内的金融危机和物价暴跌的现象有所缓解，并刺激了生产的复苏和商品的流通，增加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可能。同时，由于中国成为英镑集团成员，英国逐渐增大了对华投资和贷款。1936年5月，中国又与美国签订了《白银协定》，中国通过出售白银，获得大量美元外汇，也刺激了美国的对华投资。

其次，开展资源调查与加强工业交通建设。“一·二八”事变显示了东南沿海将成为日本首先觊觎的地区。1932年3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的决议，准备以西北地区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从1932年开始，国民政府就派出大批官员、学者前往各地进行资源调查。1935年，国民党第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明确规定了国民经济建设的28条计划，并将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的资源司合并，改称资源委员会，拟订了3年重工业建设计划。资源委员会成立后对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青海等省的矿产资源进行了广泛调查，计划建设钨铁厂、炼铁厂、锌矿厂、炼油厂、氮汽厂、飞机发动机厂、原动力机厂、工具厂、电机厂、电线厂、电话厂、电子管厂等。至七七事变爆发，共建成21个厂矿，包括金属开采、冶铁、机器制造、电工器材等重工业。而且，这些厂矿均考虑到国防的需要，全部远

离沿海地区。由于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中国的现代化工业每年以7%左右的速度增长。到1936年，各项经济指标都达到中华民国历史以来的最好水平。另外，1935年，国民政府把铁、公路交通的建设工作放到重要位置上，提出要尽量发展各县各省区之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力谋货物流通之便利，使之适应经济建设和国际形势的需要。到1936年6月，国民政府经营的铁路里程达7416公里，其中干线6796公里，支线620公里。公路里程为115702公里。

上述经济建设计划的制订与实施，为以后的持久抗日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四 卢沟桥事变与中国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到来

1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晚，驻丰台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北平西南宛平县城附近举行军事演习。10时40分左右，在演习地区发出几声枪响，随后，日军声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城搜查。其实，失踪士兵很快归队，但日军仍然要求进入宛平城。日军的无理要求遭到了中国守军的拒绝，次日清晨5时，日军一木清直大队长率第1联队第3大队向驻守龙王庙和铁路桥的中国守军发动攻击，并占领了龙王庙铁路桥东头。日军另一部则向宛平县城东门发起进攻，炮轰城墙，并攻占了县城东北方的沙岗。驻守在这里的第二十九军奋起反击，卢沟桥事变爆发。由此，日本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面侵华战争，而中国全民族团结一致的浴血抗战也拉开了帷幕。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大陆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日本既定侵华政策的必然产物。早在1936年1月13日，日本陆军省就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第一次北支（华北）处理要纲》，该纲要实际上是日本陆军省制定的如何一步步完成对华北侵略的纲领性文件。根据要纲的精神，日本加快了对华北的军事部署，将华北驻屯军由原来的1771名增加到5774名。同年，驻屯军挑起两次丰台事件，迫使中国军队退出丰台。1937年4月以后，驻屯军开始在平津近郊演习。从6月起，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一带的演习日益频繁，并以进攻占领宛平城为目标，其目的非常明确。因此，尽管七七事变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偶然的，而实际上它的发生与日本的侵华政策有着必然的联系。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部立即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调兵北上，令孙连仲、庞炳勋等部，向保定、石家庄集中。而日本于7月10日接连召开首、外、陆、海、藏五相会议和内阁紧急会议，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陆军部关于增兵中国的提案，天皇随即批准了向华北派兵的提案。但为了争取更多的运兵时间和诱使守军妥协，日本放出“现地谈判”的烟幕。11日，第二十九军与驻屯

军签订了现地停战协议，在协议中，中方做了极大让步，如令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表示遗憾，处分负责官员，保证将来不发生类似事件；中国军队为避免与日本在丰台过于接近而招惹事端，改以保安队在卢沟桥城厢及龙王庙维持治安；彻底取缔抗日团体。但这一切，根本无法阻止日本扩大侵略的野心。20日，增援华北的各路日军集结完毕，对北平形成包围之势，并迅速转入临战状态。同日，日本内阁批准了陆军关于“使用武力解决事变”的决定。

日本军队在完成一系列军事部署后，随即开始向平津地区进攻。25日和26日，中日两军分别在廊坊和广安门发生冲突，预示着大战即将来临。

28日，日本驻屯军发表对中国军队“出师讨伐”的声明，集中兵力从西、东、南三面向北平大举进攻，并出动飞机轮番轰炸中国军队工事，第二十九军奋起反抗，但因驻地分散，兵力无法集中，造成重大伤亡。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以及许多中国官兵英勇牺牲。当日晚，宋哲元率第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命张自忠留守北平与日军周旋。30日，北平沦陷。

就在北平激战的同时，驻天津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率该师第一一四旅主力，协同天津市保安队，于28日凌晨向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海光寺日军兵营等地发动攻击，并相继收复天津东站和总站。次日凌晨，日军分四路进攻中国驻军，但遭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并攻入日本租界。日军急调援军增援，并在飞机、战车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反扑。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被迫撤离天津，30日，天津失守。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八一三事变

早在1936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即有占领上海、南京的计划，其主要战略设想是：“以第九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新编第十军（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1]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基本上是按这一作战计划行动的。

中国方面，因长江流域为国民政府政治经济倚重地区，故对其防卫也早有筹划。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拟订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即提出：“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长江、海岸阻敌上陆，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心攻击而歼之。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最后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巩卫首都。”[2]淞沪会战开始后，中国军队作战基本上以此案为指导。

1937年8月9日18时左右，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大山勇夫中尉和斋藤与藏水兵驾汽车到上海虹桥机场，企图强行越过警戒线，中国门卫制止无效，将其二人击毙。10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电令佐世保除第一航空队外的其他第三舰队所属部队立即向上海前进。11日，上述日军到达上海。12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又将原配属于华北派遣军的第二航空队转隶长谷川指挥。当日，上述两支部队开赴上海东南泗礁山。同日，日军参谋本部制订增兵方案，决定派遣第十一师团、第三师团组成一个军增援上海。此案得到内阁会议批准。中国方面，军事委员会于11日决定“围攻上海”，并做了相应的兵力调整。

8月13日下午，中日两军首先在八字桥交火，战斗迅速蔓延，淞沪会战打响。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表示：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破坏无余……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为膺惩中国军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队的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今即采取断然措施。”17日，日本政府决定放弃“不扩大方针”。9月2日，日本宣布将“华北事变”改称为“中国事变”，天皇并敕令追加军费预算，表明日本决心全面占领中国。

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事变，短短5个星期，日本侵略者把战火从平津扩大到淞沪地区，从华北扩大到华东，原来的局部挑衅发展成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因此作为日本全面侵华战略的导火线的卢沟桥事变也就成为必然之事了。正如时在日军驻屯军参谋长任上的桥本群少将战后回忆时所言：“纵使卢沟桥事变或许能得到避免，但第二、第三次同样的事件，即作为解决根本问题的导火线的小事件仍将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此言道出了历史原委。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持久战方针与国共两党的战略分工

1937年8月7日至12日，国民党提前在南京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防会议，商讨抗战大计。这次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对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和各自战略方针作了具体分析。会议讨论了《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制订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方针，强调“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在此原则下，“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战力，待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以达到最后胜利”。其后，蒋介石对持久战略进一步进行了阐述：“我们的战略，是以持久抗战，消耗敌人的力量，争取最后阶段的胜利。”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1937年8月7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提出了中共方面拟定的《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基本情况，提出了全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主要内容为：战略方针为持久防御战；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基本作战原则是运动战，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战略上应是内线作战，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造成主力运动歼敌之有利时机。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对中国共产党持久战的战略理论进一步概括、深化和完善，标志着中共持久战理论臻于成熟。

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阐明了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规律。中日战争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此构成了战争双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毛泽东通过对抗战客观规律的总结，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阶段。而战略相持是抗日战争必须经过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抗战不可或缺的部分，强调这一阶段“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但它又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取决于第一阶段大城市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同时，相持阶段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力量将逐渐上升，日本力量则逐渐下降。因此，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由弱变强、由守转攻的关键所在。

第二，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强调抗战政治动员的重要性。认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必须坚持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动员和依靠群众进行战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第三，规定了抗战的作战方针和作战形式，确定了运动战、游击战的基本战略地位。毛泽东指出：“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中国军队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因此，中共主张，对日作战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辅之以正面的阵地防御战。另外，毛泽东还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认为此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它有自己一整套关于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原则；由于中日战争具有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根据地。

实行抗日持久战战略方针是国共两党的共识。但在具体的实行中，两党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在主观上主要缘于抗战路线的差异。中共的持久战主要是着重于政治，而国民党则主要着重于军事。中共认为，持久战的基础是动员广大民众，实行全国范围的、全民族的人民战争，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打败日本的侵略，实现国家的独立解放，所以，共产党的持久战，基本方面在于政治战略，多注重于民众的组织动员。而国民党方面虽然提出了民众重于士兵，但主要还是依靠政府和军队，将持久抗战的希望寄托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上。而在客观上，国共两党的军事分工也影响了该战略的实施。

在1937年8月的国防会议上，国共两党就明确地进行了军事分工。由于当时国民党军队无论从人数和装备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共产党军队，因此决定由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防御作战，而由共产党军队担负侧后支援。这种分工是合理并且可行的。在这种分工之下，中国的抗日战争形成了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而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不同于敌后作战，除了依靠正规军进行阵地战和运动战之外别无选择，只是到了抗日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才考虑运用游击战。而在广阔的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它的人数与装备根本无法在阵地战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只有游击战和适当条件下的运动战才是它施展身手的作战方式。

尽管国共两党在作战方式方面存在差异，但总的来看，两党军队都执行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没有正面战场防御阶段的努力作战，敌后战场将难以开辟；没有相持阶段敌后战场的努力作战，正面战场也难以维持。中国抗日战争能够坚持到最后胜利，是在持久战方针下两个战场共同努力的结果。

[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第1卷，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第102～103页。

[2] 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五 阻敌于前、制敌于后

1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部队战斗序列和作战指导方针。为了统一军事指挥，首次将国土按抗战需要划分成5个战区，冀、豫为第一战区，晋、绥为第二战区，苏、浙为第三战区，闽、粤为第四战区，山东、苏北为第五战区。此外，还编成4个预备军，作为军事委员会领导之下的独立作战机构，构成国民党领导下的正面战场。8年抗战中，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湘桂会战等22次大型会战，此外，还有远征军两次赴缅甸作战，共伤亡官兵321万人，其中131万人阵亡。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贯穿了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方针，其中关系到战争全局的战役分别有如下几个。

淞沪会战

上海比邻南京，而沪宁地区是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又是西方国家利益所在之重地，上海得失不仅维系中国抗战前途，且与国际观瞻相系。因此，八一三事变第二天，国民政府即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当天，第九集团军在总司令张治中的指挥下，开始向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进攻。中国空军也参加了作战。15日，日本正式宣布组建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先期增派5个师团向上海增援，部兵力达到20万人。日军增援部队登陆后，中国也立即增加兵力，先后投入78个师、7个独立旅和其他部队，总计75万多人。

淞沪战役是在上海及外围地区进行的。双方激战两个月后，日军依靠强大的火力虽然突破中国军队主要防线，但中国军队仍然顽强抵抗。为了尽快占领上海，11月5日，日军第十军10万人在金山卫登陆，日军

投入兵力超出30万人，形成了对中国军队的大包围。此时中国统帅部因幻想九国公约签字国的干涉，拖延了撤退时机，日军包围网形成。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撤退。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不乏英雄事迹。如中国飞行员阎海文座机中弹被迫跳伞落入敌阵后，开枪打死数名日军，最后举枪自尽。日军敬佩其英勇气概，立“支那勇士”之墓于上海大场；中国空军第二大队分队长沈崇在座机中弹后放弃跳伞机会，驾机猛撞敌舰，炸沉日军巡洋舰一艘，自己也与敌舰同归于尽；守卫宝山的姚子青率一营官兵与数倍的日军奋战2昼夜，绝不后退一步，最后全营壮烈牺牲；守卫四行仓库的副团长谢晋元率800壮士孤军奋战，坚守阵地4昼夜，多次打退敌人进攻；童子军少女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向四行仓库守军敬献国旗，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淞沪会战历时3个多月，虽然上海失陷，但日军遭到自开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意志，赢得了向大后方撤退战略物资和人员的时间，同时也减轻了华北战场的压力。此役，中国军队伤亡30万人，日军伤亡4万人。但是，淞沪会战也暴露了正面战场节节防御、步步退守而缺少运动战的弱点，致使日军占领上海后长驱直入，于12月13日轻易占领中国首都南京，24日占领杭州，使中国宁沪杭长江三角地区全部沦陷。

太原会战

日军占领平津后，兵分三路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各地进攻。1937年8月，日军先后攻占了南口、大同，9月3日，向山西发起进攻。历时2个多月的太原会战开始。日军投入兵力约合4个半师团共14万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计58万余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参加了战役。

太原会战包括天镇战役、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等一系列战役。

天镇战役从9月3日开始至12日天镇失陷结束。在战斗中，日军除以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飞机轮番轰炸外，还首次使用了毒气弹，造成中国军队官兵的大量牺牲。

平型关为内长城南端重要隘口，据守灵丘至大营之公路，为日军由灵丘进攻雁门关背侧的必经之路。9月22日平型关战役打响，第二战区部队与日军在平型关外围激战数次，损失很重。25日，林彪、聂荣臻指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设伏一举击溃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取得了八路军出师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

忻口右托五台山，左倚云中山，是晋北通向太原的门户。10月1日，日军开始向忻口进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在忻口与日军会战。卫立煌指挥第十四集团军担任正面防御，朱德指挥的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为右集团军，由杨爱源指挥的第六集团军为左集团军。其间，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阳明堡机场焚毁日机24架，有力地支援了忻口会战的友军。11月2日，中国军队在“固守太原，依城而战”的方针下撤离忻口。忻口会战中国军队以5万余人伤亡的代价阻敌30天，歼敌2万余人。

11月7日，日军开始进攻太原。战至当晚，守城官兵仅存2000余人。8日夜，日军突破城垣，守军突围。9日，太原沦陷。太原会战，中国军队伤亡10万人，消灭敌军3万人。会战的意义在于大量消耗了日军，牵制了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的作战行动。

徐州会战与台儿庄大捷

徐州位于江苏省西北部，邻近与安徽、河南、山东三省交界之处，是沟通津浦、陇海两铁路的重要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要地。日军占领南京后，华北日军与华中日军为了打通津浦路，沟通华北和华中的联系，把进攻矛头指向徐州。为此，日军由津浦路南北两端同时向徐州进攻。而中国方面，国民政府和第五战区长官部早在1937年10月就制订了保卫徐州的作战计划：一方面固守黄河天险和苏北、东海及胶东半岛沿海，阻止华北日军南下侵犯或从海上登陆，同时调集部队集结徐州，与敌进行持久抗战。

1938年1月，在津浦路南线，占领南京的日军华中方面军开始实施北上打通津浦线的作战计划。第五战区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和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利用淮河、淝河、浍河等地形，阻止日军沿津浦线北进。2月8日，日军向小蚌埠第五十一军阵地进攻，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率部驰援。日军退回淮河南岸，日军华中方面军企图北上合围徐州的计划破产。

在津浦路北线，由于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退，致使日军长驱南下。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组织军事法庭对韩复榘进行审判，判处其死刑并在武汉予以处决，这是中日开战以来第一个被军法处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38年2月，第二十二集团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及第三集团军之一部，于徐州北线作战，进攻鲁南、鲁西之沿津浦路南下之日军。徐州会战拉开序幕。

徐州会战范围广大，含鲁南、鲁西、苏北、安徽之江淮之间的大片境域。1938年2月，日军板垣征四郎之第五师团企图以主力沿胶济路西进，至淮县折而南下，夺取临沂，从地面包抄徐州。李宗仁命令庞炳勋部在临沂建立防御阵地，以诱敌深入，并火速调派张自忠将军的第五十九军兼程驰援。在张自忠和庞炳勋的内外夹攻下，日军坂本支队大败而归。此役，中国军队以伤亡3000余人的代价歼敌3000余人，压制了敌人的攻势，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3月14日，日军右翼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由邹县以南的两下店进攻滕县。守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赶赴滕县守卫。敌我激战2昼夜，王铭章及2000余官兵壮烈牺牲。17日晚，日军攻占滕县。

3月20日，日军濑谷支队在攻陷滕县后孤军深入，沿枣台支线向台儿庄突进，企图一举攻占徐州。23日，日军向台儿庄发动进攻，次日晚突入台儿庄城东北角，随即被我军歼灭。26日，日军装甲车向台儿庄猛攻，我军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率部分兵力猛攻敌背后，另一部在庄内与敌展开激战。日军一部攻入台儿庄西北角，池峰城组织敢死队与之展开肉搏。同时，汤恩伯军团在峄城、枣庄附近，消灭了前来增援的日军。4月6日，李宗仁亲赴台儿庄指挥作战。战至7日夜，日军大部被歼，其余日军残部向峄城、枣庄撤退。我军收复台儿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台儿庄战役历时近20天，以伤亡近2万人的代价，击溃了日军精锐部队第五、第十师团主力2万余人的进攻，歼敌万余。台儿庄会战的意义不仅在于消灭了大量日军，更在于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击退日军进攻的战役，从而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

台儿庄战役后，日军大本营为了迅速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决定由南北两路夹击徐州，参战部队约25万人。为阻止日军打通津浦线，中国调集大量精锐部队，至5月初，徐州附近的部队已达60余万人。

5月5日，日军开始从南北两个方面向徐州西侧迂回包围。在南面，日军连陷蒙城、永城，向萧县、砀山、宿县进攻。在北面，日军连陷郓城、单县、金乡、鱼台后，从河南濮阳南渡黄河，攻陷山东菏泽、曹县，直插河南兰封。至中旬，日军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中国军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保存实力，中国军队主动撤离徐州。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中国军队也完成了撤退计划，日军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之阴谋破灭了。

在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与日军精锐部队周旋了5个月，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为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

为了阻止日军追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不仅下令炸毁了郑州南面的平汉路，还下令炸开黄河大堤。6月6日和7日，中国军队分别于赵口和花园口两处，炸开黄河大堤。黄河决堤，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日军华北方面军的长驱南下和徐州方面日军的西进，为部署武汉会战争取了时间。但黄河决堤也给豫、皖、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3省44县390万人从此流离失所，经济损失达10亿元。

武汉会战

武汉位于长江和汉水之交汇处，平汉、粤汉两铁路之连接点，是华中地区的交通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日军占领徐州后，日本大本营随即制订了攻取武汉的作战计划。此役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指挥，参战兵力达25万余人，海军和航空兵均参加了会战。

中国方面，早在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制订了以保卫武汉为核心、在外围发动运动战以消耗敌人赢得时间的作战计划。1938年6月，第一战区主力调至长江两岸布防。同时成立了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负责长江南岸的作战。李宗仁第五战区负责大别山麓作战。在会战中，中国方面先后投入124个师、2个骑兵旅、7个野战炮兵团、3个要塞炮兵团，共75万人，蒋介石亲自任作战总指挥。

6月初，日军向安庆进攻，12日，占领安庆，武汉会战打响。日军师攻占桐城潜山后，南京到武汉的第一道防线——马当（垱）封锁线直接暴露在日军的攻击下。24日，日军开始进攻马当。战至26日，日军施放毒气弹，守军因官兵大量伤亡被迫撤退，马当要塞遂告陷落。马当失守后，日军沿江继续西进，7月26日，占领九江。8月22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攻取武汉的命令，日军华中方面军分南北两路向武汉进攻。武汉会战全面展开。

南路方面，日军波田支队沿长江西进，中国军队节节抵抗。战至10月，日军已逼近武昌。而此时中国军队采取了外线配合内线的运动战方针，成功地消灭和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延迟了日军推进速度。如在九江以南的战斗中，中国守军依托庐山两侧及南浔铁路北段的有利地形进行顽强抗击，给日军以重创，日军30多天才推进了2公里半。在正面久攻不下的情况下，9月21日，日军以第一〇六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各一部孤军深入，进至德安西面万家岭地区，妄图从背后偷袭我军。中国军队则采取了运动战，将敌人围困。10月7日，中国军队发起总攻。9日，蒋介石下令必须在10日前拿下万家岭，作为给双十节的献礼。当晚19时，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全线攻击，经过激战，占领了万家岭、雷鸣鼓等地。战役结束后，万家岭战场周围约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是日军的尸体和马的骸骨。此役，中国军队歼灭日军3000余人，伤敌无数，并缴获大批辎重，史称万家岭大捷。

北路方面，7月24日，日军第十一集团军第六师从安徽潜山向太湖进攻，至8月3日，先后攻占太湖、宿松、黄梅等地。中国军队展开反攻，一度收复太湖、潜山、宿松。但在日军的反击下，中国军队被迫向广济撤退，并在广济以东与日军展开激战，中方战死上千人。至9月17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日广济、武穴相继沦陷。29日，田家镇要塞失守，日军直逼汉口。

大别山麓方面，8月下旬，日军第二集团军在安徽合肥集结完毕，20日分南北两路进攻武汉。第五战区分别在六安、霍山地区，富金山、固始地区，商城、麻城地区，潢川地区，信阳地区组织防御，顽强阻敌。南路方面，在富金山至商城一带阻击战中，中国军队歼敌1000余人。在南打船店、沙窝地区，守军凭借大别山各要隘，顽强抵抗，激战多日，日军以伤亡4000多人的代价，才突破大别山地区防线，至10月25日，占领麻城。北路方面，日军第十师团于8月28日突破守军防线攻占六安后，强渡淠河和史河。9月6日，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在潢川一带与敌激战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由于久攻不下，日军使用了化学武器，造成守军重大伤亡。18日，潢川西北之日军，又从息县分兵攻击罗山县城，切断了五十九军向西的退路。19日凌晨，张自忠下令趁夜向潢川西南方突围。五十九军孤军苦战12昼夜，以自身伤亡4000余人的代价歼敌3000余人，完成了阻击日军的战略任务。

为了策应武汉会战，日军于5月10日攻占厦门。9月又以3个师团组成第二十一军，10月12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21日攻占广州。

至此，武汉已被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为保存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日军26日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武汉会战牵制了日军12个师团的兵力，前后历时4个半月，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国民党军事当局制订的“以持久之抗战争取我之时间”的战略方针初步得到了体现和实施，国民政府得以把沿江地区重要工业设施内迁至西部，为进行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时期。

战略相持阶段的战争特点是，日本已无力全面进攻，中国也无力全面反击，正面战场的局部争夺与对峙成为常态。但是，在这样的局部争夺与对峙过程中，正面战场仍然进行了多次影响战争全局的战役。以下择其主要的加以介绍。

桂南会战与昆仑关大捷

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厦门后，于1939年又相继占领了汕头和海南岛，从而基本封锁了中国沿海交通线，此后，中国西南成为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1939年秋，日军为切断中国西南补给线，决定发起桂南战役。

10月14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了作战命令，其内容为：中国派遣军与海军协调行动，切断中国之西南补给路线。同时，又调集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和海军第五舰队、海军第三联合航空队组成参战部队，共3万余人。11月15日，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日军在50艘舰艇、100余架飞机的配合下，从广西钦州湾登陆，随即分三路进攻，连陷防城、钦州，并向北推进。11月22日，日军强渡邕江，次日占领南宁。12月4日，又占领昆仑关，从而切断了从桂林经南宁和镇南关通往越南的国际交通线。为了夺回昆仑关，军事委员会火速从湖南、江西、广东、贵州等地紧急调集杜聿明等9个军15万余人南下作战。

12月18日凌晨，中国军队在100多架飞机和多门大炮的协助下分三路在南宁与昆仑关之间展开反攻。战至中午，我军先后占领了昆仑关外围的金龙山、仙子山、老毛岭、414、600等重要制高点。昆仑关东北及西侧之653高地、罗塘高地，敌我双方反复争夺，阵地多次易手，最终，守备高地的日军第五中队弹尽粮绝，全部被歼。20日，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命令第二〇〇师强攻昆仑关受挫。23日，我军突入日军阵地与敌展开肉搏。24日，我军克复罗塘高地，扼守高地的日军除2人被俘外，其余全部被歼。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增援昆仑关，被我军阻击于九塘东北枯树岭地区，日军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被围困在昆仑关的日军不仅断粮，且弹药几乎用尽。29日凌晨，第五军主力在炮兵和装甲车的配合下再次对昆仑关发动围攻，与日军在昆仑关隘口周围的崇山峻岭间展开激战。30日，中国增援部队到达，相继攻占了同兴、界首及其东南各高地，打破了昆仑关日军的防线。31日，第一五九师占领653西南高地，随即新编第二十二师攻入昆仑关，迫使日军向九塘方面退却。1940年1月1日，日军增援部队到达九塘，与我军形成对峙状态。1月28日，日军发动反攻，至2月2日攻占宾阳，3日再夺昆仑关，并相继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攻陷上林、武鸣。但此时日军已经无力坚守阵地，为避免战线过长，日军开始回撤。中国军队乘势追击，先后收复宾阳、武鸣、昆仑关等地。7月，日军攻陷龙州。9月，日军第二十一集团军主力陆续进入越南。10月，第四战区第十六、第三十五集团军（共6个师）乘势发起反攻，先后收复龙州、南宁、钦州。11月30日收复镇南关。12月14日，日军全部撤出桂南，历时一年的桂南战役结束。

昆仑关大捷是正面战场自武汉失守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正面攻坚战的重大胜利。此役歼灭日军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在内的日军4000余人，但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第五军就有1.1万余人负伤，5000余人牺牲。

三次长沙会战

武汉会战后，中国第九战区所属的湖南一带成为抗击日军、屏障西南的前哨阵地。1939年8月15日，日军第十一军决定发动赣、湘北部地区作战，消灭第九战区主力部队，以加强“在华中建立中央政权”的势头。为此，日军第十一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集中10万兵力，在赣北、湘北、鄂南三个方向，开始了对以岳阳至长沙之间为重点的中国军队的分进合击。中国第九战区以16个军30多个师共40万人的兵力，采取逐次抵抗、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及长沙周围与敌周旋，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

赣北方面，战斗从9月开始到10月结束，经过敌我反复争夺，日军未能推进。湘北方面，战斗也从9月开始到10月结束，日军消灭湘北中国军队和占领长沙的企图未能实现。在鄂南方面，战斗也进行了月余，到10月恢复了战前对峙状态。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采取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方针，不仅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军消灭第九战区主力的企图，而且保存了自己的主力和战略空间，是一次成功的战役。

为了进一步消耗日军，1939年11月下旬，蒋介石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决定发动冬季攻势。各战区于12月上旬至次年2月，先后开始作战行动，在鄂北、豫南、粤北及鲁、苏敌后广泛出击，破袭敌人之交

通线，袭击敌人防线，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在冬季攻势期间死伤了5～6万人。这是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进行的第一次主动出击作战。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尽快结束日中战争，在岳阳、临湘地区集结约12万人的兵力，在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指挥下，准备再次攻击长沙，目的是打通粤汉线，消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为保卫长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对当面日军发起攻击，以牵制日军集中兵力。第九战区由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集中12个军33个师，一部在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布防，一部在株洲地区机动，逐次抗击日军进攻，诱日军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歼灭之。此次战役从9月开始至10月结束，共进行了33天。

第二次长沙会战，据中方统计，日军伤亡4.8万余人，击落日机3架，击沉汽艇7艘。而中国军队伤亡也很惨重，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遗弃尸体5.4万具，被俘4300人。

两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为了打通粤汉线策应香港与南洋作战，第三次向长沙发动进攻。第三次长沙会战从12月24日开始至次年1月15日结束，共计23天，战场包括湖南、湖北和江西。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伤亡将士3万余人，击毙日军5万多人，俘虏日军139名。第三次长沙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的胜利而告终结，同时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国对敌作战的第一次大捷，在国际社会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战争相持阶段，除上述会战外，正面战场在华北、华中还先后进行了多次会战。其中，1939年3月至5月的南昌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在正面战场的首次交锋，由于中国最高指挥当局贻误战机，反而使日军首先发起攻击，同时战术上又犯了死拼阵地战的错误，导致南昌失守。中国军队战死14354人，受伤17033人，失踪10565人，伤亡惨重。[1]1939年5月的随枣会战，我军以伤亡2万多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3万余人，达到了牵制日军进攻，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目的。1940年5～6月的枣宜会战，中国军队以3.7万人的伤亡代价消灭日军7000人，中国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以身殉国。1941年1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月的豫南会战，共毙伤日军9000余人，使日军打通平汉铁路南段和解除中国军队对信阳日军威胁的战略意图未能实现，中国军队取得局部胜利。1941年3～4月的上高会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26天，以伤亡900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5万人，取得了会战的重大胜利。1941年5月的中条山会战，前后历时一个多月，是整个抗战期间山西省境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此役中国军队伤亡4万余人，并有3万余人被俘，这些战俘中的大多数被日军送往日本充当了劳工。

正面战场的以上会战，各有胜负。虽然有些会战指挥失当，造成了失地与官兵的大量伤亡，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会战起到了逐次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战略作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国共两党的对日情报战

抗战期间，为了相互刺探对方的兵力部署、军事动态、战略方针等情报，中日双方都展开了激烈的情报战。

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曾派出千余人潜入中国，进行非法测绘。后来中国发现，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竟然比中方的军用地图还要精确，重要地段的一棵树、一间房，都记录得一清二楚。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日之间的情报战随即展开。1937年8月淞沪会战开始后，为了刺探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兵力动员和配备等情况，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派助手南本实隆少将潜赴上海搜集情报。南本到上海后，找到自己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时任国民党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谋长的杨振华，以金钱相诱惑，希望杨振华能够提供有关中国军方的重要情报。得知这一消息后，戴笠决定派军统驻上海办事处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文强除掉南本。文强化名李文范，冒充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之子，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的身份由杨振华引荐给南本。双方见面后，南本表示以数百万元报酬换取中方情报。文强将计就计，向南本提供了假情报。南本进而提出暗杀宋子文的要求。戴笠决定以商量谋杀宋子文计划为诱饵，除掉南本等人。后由于日军已从金山卫登陆，南本提前撤离，暗杀计划未果。

在南本案发生的同时，与川岛芳子齐名的日本女间谍、号称“帝国之花”的南云造子潜入上海，以金钱和女色收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机要秘书黄凌父子。8月5日，黄凌以其特殊的身份，将最高军事委员会做出的封锁江阴要塞江面，袭击在长江上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的绝密情报出卖给了日方，使得日本军舰和商船在国军封江前就顺利逃脱。黄凌又将蒋介石将乘坐英国驻华大使寇尔的专车由南京赴上海的消息出卖给日本特务，所幸蒋临时改变了行程才侥幸逃过一劫。8月底，在黄凌的协助下，2名日本特工潜入中央军校，企图刺杀正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讲的蒋介石。2名特工的行踪被保卫人员及时发现，乘混乱之机，2名特工乘坐黄凌的汽车逃走。几次泄密事件，嫌疑集中到黄凌身上，国民政府首都警备司令部专门从事对日反间谍工作的外事组设计逮捕了黄凌父

子及其手下的汉奸，并将之处死。

面对日本的情报战，国民政府针锋相对，加强了对日本的情报搜集工作。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国防军事的需要，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建立防空情报网。1935年9月，中央航空学校与戴笠特务处合作，准备建立防空情报电台网，目的是建立宁、沪、杭地区的防空预警机制。11月，中央航空学校防空总台建立，王允吉任总台长，在杭州湾外花鸟山建立了防空监视分台，次年改组为航空委员会防空总台，设于南京小营，陈一白为总台长，杭州改为分台，同时增设东南沿海及滁州、徐州、海州、温州分台，并举办防空训练班，培养航空情报人员。

国民党在战前建立的防空情报网，在淞沪会战中显露作用。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日本飞机18架袭击上海，当日机升空后，设于温州及花鸟山的防空情报网即发现了日机的行踪，中国战机立即起飞拦截，击毁日机3架。15日，日机15架轰炸南京，又被我空军击落6架，击伤1架。武汉会战后，为了保卫西南大后方，国民党又在武汉、重庆等地设立防空情报网，侦察敌机情报，提供防空预报，以减少因日机轰炸而造成的伤亡。

国民政府的对日情报工作，主要由以戴笠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第二处担任。1938年9月，第二处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负责。武汉会战前夕，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戴笠开始在浦口-信阳，郑州-信阳、南阳-许昌等地沿铁路重点市乡及机场附近，建立情报网与电台。戴笠在武汉成立了“随节办事处”，由唐纵主持，负责搜集情报。又派李叶任华北办事处主任，2个月内在河南建立了16个情报组与秘密电台。戴笠本人则亲自坐镇芜湖上游长江沿线的特工网。

在一切情报工作中，国民政府的密码破译取得了显著成绩。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统、军统、交通部电政司、军委会机要室等纷纷设立电台，招募人才，开展工作。1940年4月，蒋介石将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军委会机要室密电股、军委会密电检译所、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军政部研译室合并，组织成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简称军技室）。这些机构多次破译了日本外务省拍发到世界各地的密电，并破获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了许多日本其他方面的重要密电。其中极为重要的是破获日军袭珍珠港的情报。

从1941年5月起，军技室相继破获了日本外务省与驻夏威夷首府檀香山总领事馆之间的往来密电六七十份。这些密电显示了日本对美国在珍珠港舰队的高度关注，其内容包括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军舰艇的总数、停泊位置及进出港的时间、珍珠港内美军官兵上岸和下海的时间和规律、星期天美军官兵休假的起止时间、夏威夷的气象情况等。通过对大量情报的分析，中方判断日本军队将有一次很大的军事行动。12月3日，军技室又破译了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国大使野村的一份密电，根据情报内容，判断日军正准备向太平洋地区运动，有袭击美国珍珠港的迹象。军技室迅速将该情报送交蒋介石，蒋介石立即通知美方，但该情报未能引起美国重视。几天后，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另外，1943年中国方面曾破译一份无限日文密码电报，得知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乘飞机赴南洋的时间。这份密电被军技室译出后即报蒋介石，转知驻渝美方。罗斯福总统亲自做出“截击山本”的决定，并命令驻瓜乌韩德逊机场的美军指挥官马克·米尔其海军少校派出战斗机空中伏击。4月18日，山本乘坐中型轰炸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飞往南洋。美军16架战斗机在布干维尔岛上空截击命中山本座机，同机11人全部身亡。

在密电破译方面，国共两党还进行了相互合作，为了帮助国民党尽快找到日军密码、变换密码的规律，中共曾将八路军所获的三种日本陆军双重密码电报本，交给了国民党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从而使国军掌握了日方密电的规律和特点。

国民政府情报部门还与苏联、美国、英国等情报部门进行合作。1938年7月成立中苏情报合作机构“技术研究所”。[7]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特工部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SOE（Special Operation Executive，特别行动执行部），与中方的特工组织进行合作，并在重庆派驻了代表，任务是由英国出资并配给装备，训练出一支中国别动队，用于对日开展骚扰、牵制作战，并在敌后开展破坏、游击和情报战。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命令中统与SOE进行合作，搜集马来亚、缅甸等地区的日军情报。[8]与美国方面，1943年7月，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与军统合作成立了中美合作所，其宗旨为“在中国沿海与中国沦陷地区，及其他日敌占领区，打击中美共同敌人”。从1944年4月至战争结束，共获得气象情报8万多件，这些情报为美军轰炸台湾与空袭日本提供了气象服务。在破译敌方电讯方面，1944年9月至次年8月，共向美方提供了11万件情报，美方据此击沉日方军舰25艘以上，并在1945年1月7日美军大举空袭日军澎湖、琉球海空军基地时，击沉日军战舰83艘，炸毁敌机210架，给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9]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也建立了专门针对敌后根据地的情报特务机构。在每次进行大的战役行动前，日本特务或化装成商人、小贩，潜入根据地，或收买汉奸，刺探情报。针对日军的情报战，中共首先发动广大群众，建立群众性的反情报网，在各抗日根据地，从县到乡都建立了锄奸部（科），并经常对广大群众进行防奸防特教育，每个村庄的人员通行必须有抗日政府的路条，设置岗哨，查验路条。广大群众还自觉地成为抗日武装的情报人员，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比如打柴、放牛、走亲戚、做买卖时留心日伪军动向，及时把情报反映给八路军、新四军。

另外，中共也在沦陷区建立隐蔽战线，打进敌伪内部，开展对日伪的情报战，先后在华北、华中、华南以及重庆等地建立了情报组织。这些情报组织，通过不同的情报网络，搜集敌方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台儿庄战役前，中共情报部门获得日军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后，即将情报交给李宗仁。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李宗仁专门发电表示感谢。

1939年，中共中央社会部成立，任命潘汉年为副部长，负责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日伪的情报工作。在他的指示下，中共党员关露打入汪伪李士群的“76号公馆”，袁殊打入日特“岩井机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斗争需要，潘汉年决定亲自打入汪特工总部。1942年2月的一天，潘汉年由袁殊陪同，来到上海愚园路1136弄李士群的家，与李士群直接见面。2个月后，李士群提供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新四军军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部驻地进行“扫荡”的有关军事行动的计划。潘汉年及时把情报报告给新四军总部，从而粉碎了日伪的这次“扫荡”计划。

潘汉年在上海，还积极引导日本进步青年，为中共从事情报工作。通过“日支斗争同盟”等渠道，得到了日本御前会议记录、大本营“扫荡”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及汪精卫政权的许多绝密情报。

通过在上海、香港建立的各种情报网，潘汉年先后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国际情报。如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的情报，根据这些情报，毛泽东写下了《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的党内指示。又如，1941年11月，在国民党军技室破译日军发动珍珠港事变密电的同时，中共情报部门也从满铁绝密通报中分析认为日本将袭击珍珠港，并预测了袭击时间，潘汉年及时将该情报通过国民党军统，转给美国情报部门。

在重庆，中共建立了以阎宝航为首的情报网。在德国进攻苏联前，阎宝航得知德军即将进攻的情报后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中共向苏联通报德军进攻的准确日期。斯大林特意给中共发了一封感谢电报：“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情报，使苏联提早进入战备。”1944年夏，阎宝航在重庆从国民党军委第三厅获得了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等地布防的绝密情报后速报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然后通过延安转报苏联。阎宝航提供的情报，为苏联军队出兵东北提供了帮助。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鉴于阎宝航在“二战”中在情报战线的重大贡献，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把三枚卫国战争纪念章授予阎宝航和他领导下的情报人员阎明诗、李正文。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六 侵略者的加害罪行

1 日军的屠杀罪行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史无前例的屠杀罪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典型，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此时，尽管日军最终占领了南京，但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显然已经成为泡影。本以为很快就可以结束战争的日军士兵，现在不得不放弃回家的念头。面对战争的胶着状态，狂躁不安的情绪在日军内部不断蔓延，军纪迅速败坏。为了提高军队的士气，侵华日军的指挥机构便默许其官兵对中国军民的种种暴行。其实，早在南京大屠杀之前，在日军在从上海向南京的进攻途中，所到之处，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每天都有大量烧杀抢掠的事件发生。1937年11月13日，日军向常熟县城进犯，其先头部队沿途烧杀抢掠。仅吴市一带，被日军杀害的百姓就有571人，被奸污的妇女达374人。11月23日，进犯无锡东亭的日军杀害村民1821人，强奸妇女504人。[1]

由于中国军攻当局的指挥失误，致使大量中国军队士兵未能从南京撤退，虽然他们对日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多数人成了日军俘虏。按照国际法，对于放下武器的俘虏应该保证其生命安全。但日军公然置国际法于不顾，从最高司令到下级军官都层层下达了杀俘令。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亲口命令对战俘“纪律肃正”，即屠杀。天皇的叔叔、继松井石根之后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朝香宫鸠彦王也曾签署“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中岛当天日记还记录了这样的暴行：“今日中午高山剑士来访，当时恰有七名俘虏，遂令其试斩，还令其用我的军刀试斩，他竟出色地砍下两颗头颅。”可以看出，随意杀害俘虏已经是从日军上层到士兵的普遍暴行。而所谓的俘虏，其中也包括了更多平民。屠杀从日军占领南京一直持续到次年3月，又以最初6个星期内屠杀最为严重。

南京大屠杀是以集体屠杀为主要手段。南京的中山码头、煤炭港、

草鞋峡、燕子矶、三汊河等地均成为日军的屠场。当年曾亲自参加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士兵的日记保留了大量的屠杀证据。原日本陆军下士栗原利一在笔记中记录了日军在长江边一次杀害1.3万余名中国军人的暴行。栗原写道：“12月17日或18日，从午后开始，将中国人反绑双手连成一串，押送到长江边。本来上级说把俘虏押送到岛上去，可突然又下达了射击的命令。枪杀大约持续了1小时。俘虏为了躲避平射而来的枪弹，纷纷趴在已死的尸体上，结果形成了尸山。”仅据当时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第十三、十六、九、一一四师团及第六师团第二十三联队部分士兵的日记记载，有据可考的上述师团屠杀的俘虏数目高达5.8万人左右。

当时在南京的外国人也亲眼目睹了这场恶魔般的屠杀。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主席贝德士博士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曾指出：“大批中国士兵在交出武器投降后，于最初72小时内，即在城外被机枪扫射处决，大多数在扬子江边。我国际委员会雇佣工人搬走3万多这些士兵的尸体，这是我们作为救济计划巡视和指导的工作。”

德国驻华大使馆秘书罗森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12月18日到20日，我们在南京附近英国‘蜜蜂’号炮艇上。在这段时间内，日本海军少将近藤对美国海军上将霍尔特说，南京下游的大扬子岛（按：应指八卦洲）上还有3万中国部队，必须‘清除’掉。这种‘清除’或许像日本人说的‘肃清’，就是杀害已毫无防卫能力的敌人，是违反战争人道的最高原则的。”

日军还以搜捕“扫荡”俘虏为名，有目的地屠杀了大批青壮年平民。日军第九师团第六旅团在“城内扫荡命令”中指示士兵：“青壮年可全视为败残兵和便衣兵，要全部将其逮捕监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指出：“对于一般男子的有组织的大量屠杀，显然是得到指挥官的许可而实行的。它的借口是中国兵脱下了军服混入在平民之中。中国平民被集成一群一群的，反绑着手，押运到城外，用机关枪和刺刀集体的被屠杀。据现在所知道的，达到兵役年龄的中国男子，这样被害的达两万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屠杀一直持续到次年三四月份。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立案调查，听取了亲眼目睹中外证人10余人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100余件书面证词，最后做出判决认为：“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包括在内。”而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

除屠杀外，日军占领南京后还恣意强奸中国妇女。被害妇女包括9岁幼儿和77岁老妪，还有孕妇和尼姑，许多妇女被轮奸致死，其中有些人遭受了残酷的性迫害。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有许多强奸案例。无论是受害者还是试图保护受害者的家庭成员，只要有反抗，死亡是很寻常的惩罚。在全城众多的少女和老妪被强奸。伴随强奸，还有许多变态和虐待狂的事例出现。许多妇女在强奸后遭杀害，尸体被毁坏。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南京城里发生了近2万起强奸案。”[2]另据战后南京政府1946年的一项调查：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估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8万之多，其中有65920名因拒奸而死难。[3]

抢劫，也是日军在南京实施的暴行之一。南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日军连在南京的外侨与各国驻南京外交机构也不放过。梅奇牧师在其12月19日信中说：“整个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馆的汽车。”伴随着抢劫而来的是大肆焚烧。日军放火的目的是为了掩饰其抢劫的罪恶行径，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肆虐达7周之久，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罗森于1938年1月15日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

除南京大屠杀事件外，凡日军所到之处，几乎都发生过屠杀惨案。屠杀伴随着日军对中国侵略的全部过程。

在华北，日军在河北制造“万全惨案”，杀害无辜百姓300余名。在

河北灵丘，1个月之内杀害百姓达1200余人。[4]在山西天镇一天即屠杀1248人，全家被杀绝者400余户。在山西朔县县城，3天杀害3800多人。[5]在原平县，杀害者合计近5000人。在河北藁县梅花镇杀害1547人，其中46户被斩尽杀绝，24人造成终身残疾。在成安县城和附近村庄，连续3次大规模的屠杀，5300余人被害。[6]在河北井陉县制造了“黑水坪大血案”。从14日至24日的10天中，日军杀害无辜百姓近1000人，仅在老虎洞就用毒瓦斯毒杀村民155人。在河南安阳县城，杀害无辜居民2000余人，其中既有刚出生的婴儿，也有年逾古稀的老人。[7]在河南省清丰县城屠城，3天残杀1096人。[8]在河南长垣城，屠杀城乡居民1700余人。在浚县县城内外，制造了血腥屠杀民众4500余人的浚县屠城暴行。[9]

在华东与华中，日军在苏州杀害6700多人。在扬州日军以帮助运送弹药为名，抓捕了400余名青年，当行至万福桥时，日军把这400余名青年全部杀害。在湖南省南县厂窖镇，日军3天共杀害中国同胞3万多人，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后的另一个大惨案。

日军还常常以中国战俘或被捕平民作为新兵“试胆教育”的工具。例如，1942年7月26日，侵占太原一带的日军补充新兵340人，旅团长津田守弥少将下令对新兵进行“试胆教育”，即以中国战俘为活靶进行砍杀和刺杀训练。是日，有220余名俘虏被日军当做活靶被集体杀害。过了几天，日军又以同样的方法，杀害了另外120余名俘虏。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日军的性暴力犯罪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官兵除了经常对中国妇女实施强奸外，还建立了“慰安妇”制度，进行有组织的性暴力犯罪。

“慰安妇”制度正式确立始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特别是在占领南京期间，日军的疯狂强奸行为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为了平息国际舆论的谴责，日军决定全面启动“慰安妇”制度，企图以“合法的”性慰安来减少军队中大量的性暴力事件的发生。

1937年12月底，南京已经有专门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了。而在上海，1938年1月2日，首批日军“慰安妇”104人从日本到达吴淞口。13日，日本华中方面军东站司令部设立的杨家宅“慰安所”正式挂牌。关东军也于1941年7月提出招募2万朝鲜“慰安妇”的计划，从而将“慰安妇”制度推广到所有侵华日军之中。根据中国学者的调查和统计，从1932年“慰安妇”制度在上海萌芽，1937年“慰安妇”制度全面启动实施，到1945年战争结束，日军在中国建立的各种形式的“慰安所”遍布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华南、西南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这些“慰安所”有军方直接设立的，有军方指定日侨或朝鲜人开设的，有汉奸在日军命令下设立的，有日军各部队就地建立的。在“慰安所”中充当“慰安妇”的妇女，除少数是日本妇女外，主要是朝鲜和中国妇女，而又以中国妇女人数最多。从淞沪战役开始，日军就开始强掠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直到占领南京时，强掠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罪行被推向了高峰。

在“慰安妇”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日本军方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从“慰安妇”的征集、输送、登记、身体检查到“慰安所”内部的管理以及对业主和士兵等，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如对“慰安妇”的人数的规定是，每29名日军配备1名“慰安妇”。关于“慰安妇”的总人数，由于史料的缺失而难以精确计算。一般认为，总数在三四十万人。其中，中国妇女被日军强掠充当“慰安妇”的人数在20万以上。另有学者披露，在战后协助美军整理情报的一位日本人曾说过：“中国‘慰安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妇’的数字，占日军在亚洲战场征用占领区妇女当随军妓女的67.8%。”[10]如按此比例推算，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当在24～28万人。

日军“慰安妇”的多数是中国受害妇女，不仅与日本侵略战争的战场主要在中国相关，更主要的是与日本的侵略政策有直接关系。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资料，曾记载了日本情报部大雄一男给日本陆军部的一份文件，该文件中表述：“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了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在中国领土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我们必须更多地征用中国女人作‘慰安妇’，从精神和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11]1941年10月18日，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东条英机在接受美国记者约瑟·道格拉斯采访时更是厚颜无耻地说：“我以一个东方人观念看，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缺少的具有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从中可以看出“慰安妇”制度与日本侵华战争之间的密切关系。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军上层默许纵容士兵任意掳掠强奸中国妇女。从淞沪战役开始，侵华日军各部队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强行掳掠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1937年11月，苏州陷落，有2000多名妇女被掳去供日军奸淫。无锡陷落后，也有3000多名妇女被掳去强奸。杭州被攻陷后，有2万多妇女被掳去，分为上、中、下三等，编了号码供日军挑选奸淫。[12]日军占领南京后，肆无忌惮地强掳中国妇女，建立“慰安所”。甚至置国际公法于不顾，公然从在华西方人设立的安全区内抢掠妇女。当时在南京的西方人的记录，提供了许多日军强掳中国妇女的证据。当时在南京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日本人想到一个奇特的主意，要建立一个军妓院。”[13]曾任日军特务的永富博道在战后作证时也说：“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我作为日军特务机关的一名成员，专门负责诱拐中国妇女。部队从上海向南京进攻途

中，我亲自负责设置了6个‘慰安所’。在沿途，我把一些逃难的中国年轻妇女诱拐到慰安所。”

“慰安妇”不是普通妓女，而完全成为了日本军队的性奴隶。在各种各样的“慰安所”中，她们忍受着种种非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她们被严加看管，不能随便外出或走动，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在日本军人的眼里，“慰安妇”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种“军用物资”，她们没有任何身份，在随部队转移时，被标注为“弹药”或“餐厅用品”。“慰安妇”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即使在城市中较为正规的“慰安所”，“慰安妇”的房间也是非常拥挤、狭小、肮脏，一般只有两三张席子大小。而那些在前线中的“慰安所”，仅仅是用几块布或棕榈树叶围挡一下，地上铺上草或席子即算完事。因此日军士兵往往把这种“慰安所”称为“流动厕所”、“军用厕所”。

在恶劣的环境中，“慰安妇”每天都要忍受日军的性折磨。一个“慰安妇”每天必须接待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日军，她们的身体完全成了性机器。无节制的性折磨，使“慰安妇”的身体严重受伤。“慰安妇”得了性病或怀孕，因为不再有价值，下场只有一个，等待死亡或者被杀死。因此，当时“慰安妇”的死亡率非常高。海南石碌“慰安所”初建时骗招而来的300多名中国妇女，至日本战败投降时，仅有100多人幸存，其余均被折磨致死。黄流机场“慰安所”，原有广州妇女21人，最后仅活下了4人。[14]感恩县新街市“慰安所”，40名中国“慰安妇”最终也仅活10来人。[15]有学者综合各种史料之后估算，有75%的中国“慰安妇”在战争中被日军折磨致死。[16]即使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受害妇女，她们的噩梦并不因为战争的结束而终止。正如台湾一位学者所言，“受害者在‘慰安所’的时间虽然只是她们数十年岁月的一小部分，但是过去的遭遇对她们的健康、婚姻、心理以及社会适应却造成难以弥补的影响”。她们的心灵和精神受到了巨大伤害。[17]一些“慰安妇”终身未嫁，有的虽然结了婚，但许多丧失了生育能力。

日军在侵华战争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卑劣、最丑陋的制度。20世纪90年代，许多受到迫害的“慰安妇”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道歉和赔偿的诉讼，但她们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其中多数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人已经含辱去世。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日军对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日本在用军事侵略征服中国的同时，为了平息国际舆论的谴责，也为了彻底征服中国人民，达到最终侵吞中国的战略目的，在其铁蹄所到之处，运用“以华制华”的手段，通过收买和培植汉奸势力，建立傀儡政权，对中国人民进行殖民统治。

北平沦陷后，日军在华北的特务机关扶持汉奸于1937年8月1日组成“北平市地方维持会”；9日，汉奸江朝宗就任“地方维持会会长”；10日任伪北平市市长。在北平“地方维持会”成立的同时，8月1日，日军也在天津成立了“地方维持会”。11月，日本先在张家口扶植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改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2月14日，华北伪临时政府在北平中南海正式宣布成立。

日军在占领上海后，即于12月5日在浦东地区扶植汉奸苏锡文，成立了类似“维持会”的上海伪大道市政府。1938年3月28日，日本在华中地区扶持的伪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以梁鸿志为行政院院长，温宗尧为司法院院长，陈群为内政部部长。伪维新政府成立后，先后在日军占领的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和蚌埠成立了各省市伪政府，其下成立了各县级伪政府。

华北、华中临时性汉奸政权的建立并不能满足日本进一步吞并中国的需要，它急需扶持建立一个能够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相抗衡的伪中央政权。因此，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后，于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迅速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首次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方针，声称日本“帝国所企求的，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在“建设东亚新秩序”方针的指导下，日本对中国国民政府一面继续进行军事打击，一面加强了政治诱降，其诱降的主要目的是分化国民党政权，策动汉奸亲日派叛国投敌。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日本的诱降得到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的响应。1938年11月，汪精卫任命手下的高宗武和梅思平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与日本方面的代表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等人在上海新公园北侧东体育会路七号的一所空房子陆续进行了数次秘密谈判（这所房子在会谈后作为土肥原贤二的住所，被命名为“重光堂”，故这次会谈被称做“重光堂会谈”）。随后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文件。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携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等人由重庆出逃河内，随即陈公博、林柏生等人也逃离重庆。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声明（第三次近卫声明），呼吁“日满华三国应以建立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联合起来，共同谋求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汪精卫立即做出响应，于29日发出“艳电”，表示接受近卫提出的“和平原则”，公开投靠日本。

1939年11～12月，汪氏集团与日本通过谈判，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和《秘密谅解事项》等密约。这些密约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密约。其主要内容为：汪精卫集团承认“满洲国”，中日双方在华北和蒙疆设立“国防上及经济上”的密切合作区和防共的特殊军事区；在长江下游实现中日间的密切合作，在华南地区实现军事上的密切合作；汪伪各级政权聘请日本人担任顾问；伪军和伪警察由日本派教官训练；给予日本开发、利用中国资源的便利；等等。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日本侵略者扶持汉奸建立傀儡政权后，在占领区采取了一系列维持其殖民统治的政策和手段，这些政策和手段，以军事镇压和政治控制为主体，以经济统制和精神奴役为重要组成部分。

军事镇压主要表现在为了切断占领区与抗日力量的联系而实行烧光、抢光和杀光的“三光政策”及制造无人区。从1933年起，关东军在东北建立“集团部落”，用刺刀威逼百姓离开家园，到日军指定的地区居住，实行归屯并户。到1938年，共建立了约1.25万个集团部落。在华北，日军仿效关东军的做法，在冀东长城内侧制造了“千里无人区”，仅热河省就有21多万户，107万人被集家并屯，分别占总户数、总人口的

33.14%和28.17%，许多被驱赶的居民，忍饿挨冻，流落他乡。而在所谓的“治安区”内则建立“良民证”制度和“联保制度”，一户“通匪”，10户株连。而在大城市，搜捕、关押、审讯、迫害、屠杀平民百姓的事情经常发生。设在上海的“汪伪上海76号”，济南的“泺源公馆”等特务机构都是著名的杀人魔窟。

在经济方面，日本以经济统制的方式，对沦陷区进行全面的经济掠夺。日军占领东北后，首先攫取了东北的交通运输事业，抢占铁路，交给满洲满铁经营。同时，日军又掠夺了东北煤、铁等矿产资源的开采权和经营权，对东北矿产资源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开发，掠夺煤炭、钢铁及其他战略资源。日军在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后，首先抢占了铁路、公路、港口、码头等设施，以便于把掠夺的战略物资运往日本。同时推行经济统制政策，全面统制金融、物资、产业等领域。在金融统制方面，日本在华北扶持伪北平政府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银联券作为唯一流通货币，禁止其他货币流通。日本还在伪蒙疆设立蒙疆银行，滥发纸币。在华中，日军指使汪伪政权设立南京华兴银行以及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建立以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统制网，操纵货币发行权和流通。在产业统制方面，日伪在华北设立了华北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了华中振兴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中振兴公司）。通过这些公司和子公司，日本攫取了华北、华中地区丰富的煤炭、金、银、铅、石棉等矿产资源的开采权和经营权。为了筹措经费，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日伪当局还在占领区大力推行鸦片政策，鼓励种植，武装走私，垄断经营。

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政策。伪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在东北建立了在其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特殊组织，即臭名昭著的“协和会”。这是一个打着实行“建国精神”旗号，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统治的殖民机构。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后，仿照在伪满洲国成立“协和会”进行奴化统治的办法，成立了“中华民国新民会”。这是一个有明确纲领的汉奸文化组织。其章程规定：“本会为信奉新民主主义、与政府表里一体之民众团体，以实现中日满之共荣，并期剿共灭党之彻底，而贡献世界和平为目的。”通过这些文化机构，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殖民主义的思想灌输和精神奴役。而且日伪仿照在伪满洲国的做法，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沦陷区强令各学校“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向当地学生宣扬“日满一体”、“同文同种”、“王道乐土”以及“忠君爱国”等殖民统治思想与封建道德观念，禁止对中国学生讲授中国历史，并强行规定日语为必修课程。日伪在沦陷区推行的奴化政策，其目的是要消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把中国人民变为甘心充当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顺民”。

除了军事镇压、经济掠夺、奴化教育外，日本殖民统治者还在沦陷区大量抓捕和奴役劳工。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华北日军就开始把在作战中俘获或缴械的士兵送到东北服苦役。1939年后，日军在中国沦陷区的石家庄、太原、济南、北平、塘沽、保定、开封、临汾、平遥以及南京的浦口等处陆续设置了战俘集中营，关押俘获的战俘和抓捕的无辜百姓。日军将各战俘集中营改称为所谓的“劳工教习所”、“训练所”、“收容所”等，将战俘及抓捕的百姓集中收容后，押送到东北充当特殊工人。1941年秋到1942年秋，日军在河北、山西两省交界的平原与山区及长城沿线强行推行“集家并村”，制造千里“无人区”，烧毁成千上万村庄，并将百姓强行驱赶到日军制造的集中营似的“人圈”，同时，把全部青壮年劳力连同家属强掳到东北充当特殊劳工。[21]据统计，从1941年春至1943年年末，日本华北方面军将其在对中国军队作战与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时俘获的中国军人和抓捕的根据地平民近20万人，作为“特殊劳工”输往东北。[2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本土劳动力的缺乏，日军还把大批中国劳工强掳到日本从事繁重的劳动。据华北劳工协会等统计，1942年1月至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日本向东亚各地输出华北强制劳工总数有据可查者达262.4175万人，其中向东北输出235.4万人，向蒙疆输出17.08万人，向华中输出5.916万人，向朝鲜输出1815人，向日本本土输出近4万人。

劳工被强制招募后，立刻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在日军、特务或警宪的严密看管下，被关在密不透风的闷罐车中送往作业场所从事各项繁重的苦役。为了防止劳工逃跑，在这些地方都拉上了电网或铁丝网。无论是劳动还是吃饭、走路、睡觉，都有日本军队或日伪把头的监视。劳工不能擅自离开劳动场所，不能随意说话。逃跑者一旦被抓回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将其当众打死。劳工的日劳动时间平均达13个小时。

劳工劳动的场所基本没有安全设施，在超强的劳动强度下，经常发生安全事故，伤人、死人现象更是频繁。更为残忍的是，日军为了保守秘密，往往在军事工程完工后，把劳工秘密杀害。

被掳往日本的劳工命运更加悲惨。据日本战后不完全统计，2年内在日华工被折磨致死者近7000人，死亡率平均17.5%。其中14个企业的劳工死亡率超过30%，另有伤残劳工6778人，2项之和达劳工总数的1/3。

[1]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血证》，成都出版社，1995，第232、233页。

[2] 张宪文等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第607页。

[3] 《南京市政府致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代电稿》（1946年5月4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12）·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第468页。

[4]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7卷《日军暴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第59页。

[5]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15、19页。

[6] 左禄主编《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第90页。

[7]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侵华日军在河南的暴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22～23页。

[8] 《侵华日军在河南的暴行》，第88页。

[9] 《侵华日军在河南的暴行》，第387页。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0] 转引自江浩《昭示：中国慰安妇》，作家出版社，1993，第53页。

[11] 《远东审判案》备用资料第103册第52章，第342页；转引自江皓《昭示：中国慰安妇》，第62页。

[12] 孟国祥等：《中国抗战损失及战后索赔始末》，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第139页。

[13] 孟国祥等：《中国抗战损失及战后索赔始末》，第285页。

[14] 符和积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下册，海南出版社，1996，第750页。

[15] 符和积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下册，第647页。

[16] 苏智良：《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人民出版社，2000，第101页。

[17] 江美芬：《从人类学的观点谈慰安妇的心路历程》，妇女救援基金会主编《台湾慰安妇报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第181页。

[18] 童远忠《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19] 高士华：《中国山西省的日军毒气战》，《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20] 《小川政夫笔供》（1954年8月10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5）·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第455页。

[21] 陈平：《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第65页。

[22] 解学诗、〔日〕松村高夫：《满铁与中国劳工》，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3，第122页。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七 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融合

1 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建立

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经在欧洲和日本滋生。1929年爆发的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为法西斯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条件。缺乏议会民主传统的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党派和组织则乘机利用民众对社会的不满和要求“革新”的愿望，大力推进法西斯运动，建立了法西斯专政，企图通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手段解决经济危机。

1922年10月，意大利国王埃曼努埃尔授命墨索里尼领导的“国家法西斯党”组阁。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由此建立。随后，墨索里尼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完全控制了议会，建立法西斯特别行动队，对反对派和政敌采取恐怖行动，取消言论自由，强制解散一切反法西斯性质的政党和政治团体，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和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社会。在对外关系上，野心勃勃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极力向地中海沿岸地区和非洲扩张，妄图把地中海变成意大利内湖，以“恢复罗马帝国的光荣”。1923年，意大利强占阜姆港，1926年，通过签订《友好安全条约》控制了阿尔巴尼亚。在非洲，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葡属安哥拉、法属北非领土都有扩张野心。

在巴黎和会上受到严厉惩罚的德国，从1925年起经济迅速发展，到1929年，德国的工业总产值已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随着经济实力的恢复，德国统治阶级要求归还殖民地、修改边界、废除赔款等条目，竭力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加快了德国法西斯夺取政权的步伐。希特勒在20年代初组建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在经济危机期间，利用民族主义煽动复仇情绪，法西斯势力迅速扩展，到1932年已拥有党员100万人。1933年1月，希特勒宣誓就任帝国总理。1934年8月希特勒自封为“元首”。希特勒上台后，阴谋策划了“国会纵火案”，借此对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实行大逮捕和大屠杀。10月，德国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1935年，突破《凡尔赛和约》规定的陆军10万限额，扩军至30万，海军人数增加一倍。1935年3月重建空军，战争的机器即将启动。

1919年8月，日本第一个民间法西斯团体——犹存社在东京成立。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使日本经济遭受更严重的冲击。全面经济危机期间，民间法西斯运动和军队法西斯运动迅速发展，在日本掀起一股法西斯浪潮。1931年10月，以少壮派军官组织的法西斯组织“樱会”策划发动武装政变，后因泄密流产，但未受到军部的惩罚，从此法西斯恐怖活动更加有恃无恐。1932年5月15日，一批法西斯少壮派军官发动政变，杀死首相犬养毅。22日，组成了在军部指导下的斋藤实联合内阁，它标志着日本历史上政党内阁时代的结束和军部法西斯体制正在形成。1936年2月26日，主张以武装政变的急进方式实现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皇道派少壮军官，发动政变，杀死内阁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等人。军部内主张通过上层以合法稳健方式推进改革，建立法西斯统治的“统制派”利用此次兵变控制了政权机构，确立了法西斯军部的统治地位。1936年3月，广田弘毅内阁成立，其成员名单基本遵照陆军的旨意确定。广田内阁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天皇制军部法西斯体制的形成。

无论是德国、意大利，还是日本，对外扩张都是法西斯政权的重要政策。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同时，德、意法西斯也大肆对外扩张。1935年10月2日，墨索里尼发表战争演说，公开宣布以武力吞并埃塞俄比亚。10月3日，30万意大利军队突然侵入埃塞俄比亚境内。1936年5月，意大利军队攻占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正式宣布吞并埃塞俄比亚。1937年6月，德国军方就被要求做好3种战争准备：一是对法国进攻，二是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突然袭击，三是吞并奥地利。同年11月，希特勒召集军政头目召开“领袖会议”，准备在欧洲发动战争。次年，德国吞并奥地利。1939年，德军攻占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在法西斯共同利益驱使下，德、意、日三国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构建联盟，最终结成“三国轴心”。1936年10月，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应邀访问柏林。两国达成协议，决定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方针，发展两国空军，德国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兼并，意大利赞成德国对奥地利的占领，两国决定承认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并进一步加强对佛朗哥政权的援助。协定还划分了两国在多瑙河和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德、意法西斯侵略同盟初步建立。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934年3月，日本派出“德国通”大岛浩为驻德武官；6月，日本成立日德协会和旅德日本人协会；11月，东京成立日德文化研究所等学术团体。1934年和1935年，日本多次派军舰访问德国，以示对德友好。希特勒还亲自接见了到访的日本舰队。两国关系迅速靠拢。1935年春，德日法西斯就建立同盟问题开始试探和接触性谈判。同年年底，日本参谋部情报部德国组组长若松前往德国，先后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会谈。德日谈判强调反苏、反共。1936年7月，德国正式向日本提出了经过希特勒亲自审定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草案文本及秘密附件。8月7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决定实现日德合作。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正式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意大利也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其后，匈牙利、伪满洲国、西班牙、保加利亚、芬兰、罗马尼亚、丹麦等国也相继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中国抗日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全面抗战在坚持了4年半之后，终于汇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中国的抗日战场随即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对于中国，早在1941年11月15日，日军大本营制订的“帝国陆军整个作战计划”中，规定在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对华作战的战略方针为：“对中国，要与帝国海军配合，大致保持目前态势，同时消灭美、英等地方在华势力，政略和谋略相结合，努力镇压敌人，务期使蒋政权屈服。”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和指示，日本中国派遣军于1941年12月10日发布第320号命令，具体规定了派遣军在中国各战场的具体任务。这些任务主要包括：使蒙疆地区、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山东省各要域及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之治安迅速得到恢复；确保岳州至长江下游之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尽力击破敌抗战力量；占领广州附近、汕头附近及海南岛北部各要域；竭力确保重要资源地域，以增强日军战力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采取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因此，中国战场仍然要由中国军队独立担当作战。但盟国承认中国战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罗斯福就曾高度赞扬中国抗战，他说：“在亚洲，中华民族进行的另一场伟大防御战争则拖住日本人。”1942年春，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塌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打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他的话道出了实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兵力分布情况是：日本本土4个师团，朝鲜、中国东北15个师团，太平洋战场10个师团，中国关内21个师团、20个旅团又1个骑兵集团。正是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使日军主力受制于中国战场，有限物资消耗于中国战场。中国的抗战在客观上支持和配合了美英等“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

侵华日军按照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的构想，加紧了在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和掠夺，并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同时加强了军事进攻。

在正面战场，日军继续在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地区发动进攻。

1942年4月，由美国航空母舰起飞的B-25型轰炸机，轰炸了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后，返回至中国浙江省空军机场降落。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到轰炸，朝野震惊。4月21日，日军大本营决定进行以摧毁浙赣两省飞机场为目标的浙赣作战。5月，浙赣会战爆发。由于中国第三战区兵力较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从第九战区抽调部队加强第三战区，并令第三战区加紧袭击日军，力保浙赣间的各个机场。同时引诱日军主力，以减轻陕西、湖南两地所受的压力，确保四川的安全。第三战区准备以少数兵力配置浙赣路西段，进行持久对日军作战；集中主力于浙赣路东段，利用既设阵地持久抗战，并竭力袭扰日军后方，牵制日军；在金华、兰溪预筑坚固阵地，竭力抵抗日军；最后在衢州附近与日军决战。第九战区的一些部队则向赣东活动，策应第三战区的作战。5月中旬，日军分路进攻金华、兰溪，中国军队坚持防守作战，使日军锐气顿挫。日军第十五师团司令官酒井直次在作战中触雷毙命。6月上旬，日军向衢州发起总攻。中国守军与优势日军浴血奋战4个昼夜，为战区主力重新部署争取了时间。6月6日，衢州失守。7月1日，浙、赣之日军在横峰会合，浙赣铁路全线被日军占领。7月底，日军打通浙赣路、对沿线各机场进行破坏后，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各参战部队开始撤退。中国军队乘势反攻，收复失地，至8月下旬，除金华、兰溪等战略要点继续被日军占领外，基本上恢复了战役前态势。中国军队在浙赣会战中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比较有力的抵抗，以伤亡7万余人的代价，较大程度地消耗了日军力量，日军战史承认此次会战，其死伤在1.7万人以上。

在敌后战场，日军为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加强了对占领区的控制，为此向华北、华中等地日益发展的抗日游击力量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扫荡”。日军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实际上已成为侵华日军的主要作战方式。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各部队实行主力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兵团地方化，并抽调大批精干人员充实到区、县，普遍加强人民武装的建设。各抗日根据地的一切青壮年男女，都在自愿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成人民抗日自卫军。在这种三位一体的军事体制下，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使敌后游击战争得以广泛地开展起来。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击战、水上游击战、武装工作队等作战形式，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41～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对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支持。

中国军队除了在中国国内战场抗击日军外，还配合盟军进入缅甸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23日，中国和英国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率先成立。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时为英属地）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国远征军。这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1942年1月20日，日军向缅甸发动进攻。2月16日，缅甸首都仰光告急。英军要求中国远征军主力火速入缅协助作战。接到英军请求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命令位于滇缅边境待命的第五军和第六军依次入缅，第六十六军作为总预备队。3月12日，正式成立了“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卫立煌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下辖3个军10万人。

3月8日，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第二〇〇师进驻缅甸重镇东吁，接替英军防务并掩护其撤退。杜聿明亲赴东吁指挥。从3月18日开始直至29日，中国第二〇〇师同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展开激战，历时12天的东吁血战，中国远征军共歼灭日军5000余人，最终粉碎日军企图在东吁聚歼中国远征军主力的计划，而且重创日军第五十五师，有力地支援了英缅军。中国远征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师长戴安澜殉国。

3月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以中国远征军第五军主力在彬文那附近会战击破日军的计划。4月初，远征军在彬文那地区集结兵力，部署歼敌。但因担任侧翼防守的英军放弃阵地，要求远征军接防，使该

战役计划未能实现。4月中旬，英缅军第一师等部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地区，向远征军告急。中国远征军应英军紧急要求，发动攻势，于4月19日成功解救被围之英缅军7000多人，其中包括英军司令亚历山大等高级军官、传教士和记者等。仁安羌大捷使中国军队扬威海外，轰动英国。英国当局后来还向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八师的师、团长等授勋表彰。

此后，日军主力继续沿东吁、曼德勒轴线实施进攻，并以一部兵力向腊戍突进，企图占领远征军后方基地腊戍，切断远征军退路。4月29日，日军攻占缅北重镇腊戍，切断滇缅公路，大批战略物资被日军掠走。在曼德勒地区，英军在远征军掩护下，向印度境内撤退。兵力分散的中国远征军各部队则向密支那方向转移。5月1日，曼德勒失守。5月8日，日军攻占密支那，中国远征军回国退路完全被切断。同时，日军继续向中缅边境推进，与中国军队隔怒江对峙。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主力沿中缅边境撤回云南。新编第二十二、第二十八师因援助英军受阻，被迫穿越山峦重叠、人烟稀少、蚊蚋成群的野人山，于7月底退至印度，不久即在印度兰珈集中受训。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历时半年，转战1500公里，伤亡5万余人，有力打击了日军，支持了英缅军队的抵抗，显示了中国抗日军队的良好作战能力，受到盟军和国际舆论的赞誉。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八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 敌后战场的反攻作战

1943～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同盟国家的根本性转折。反法西斯盟军在各条战线展开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成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5月13日，美英联军胜利结束在北非的军事行动，9月上旬在意大利登陆，迫使意大利投降。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2月7日，取得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胜利，从此日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美军开始战略反攻。中国敌后战场军民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并于秋季开始了局部的攻势作战。

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从1944年开始，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抓住有利战机，对日伪军普遍展开局部反攻。

在华北，1944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共作战4400余次，毙伤敌军2.29万余人，俘日、伪军及争取伪军投诚、反正2.22万余人，拔除敌据点、碉堡1600多个，解放人口758万。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共毙伤日、伪军3.8万余人，俘3.49万余人，争取敌军反正、投诚3200人，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收复失地6万余平方公里，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晋绥边区军民共收复敌伪据点92个，收复村庄3108个，扩大面积2.4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40余万。[1]山东军区进行主要战斗3514次，攻克与逼退日伪据点1265处，毙伤日军4580余人，俘日军292名，歼灭伪军5.4万人，争取伪军1.1万人反正，解放国土4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930万，军队发展到15万人，民兵游击队发展到37万人，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5个巩固的根据地。[2]1944年，华中敌后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华中敌后军民从1943年冬渡过最困难时期，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时期。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在华中，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进一步恢复原有地区，争取新的发展，主动地有重点地对敌展开攻势作战。1944年1、2月间，苏中军民向日、伪军连续发动攻势，相继攻克大官庄等敌据点17处。3月，苏中军区发起车桥战役。此役，共歼灭日军上校以下官兵460余人和伪军500余人，解放国土100余平方公里，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的联系。车桥战役是华中敌后战场转入反攻的标志。车桥战役后，苏中地区的日、伪军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4月，苏北军区发起高（沟）杨（口）战役，经16天血战，歼敌2000余人，收复了六塘河两岸地区，使淮海、盐阜两区完全连成一片。5月，苏北军区又攻克淮盐重地陈家港。淮北军民在攻势作战中，解放泗洪、灵璧、睢宁三县城之间的广大地区。苏南军民一度攻入长兴、溧阳等县城。淮南部队攻入盱眙、定远县城。皖中、浙东部队在1944年，也对日、伪军进行了积极的作战。1944年，华中敌后军民共作战6500多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收复失地74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余万。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展为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江、浙东、鄂豫皖8个根据地，极大地改善了各地区的斗争局面。

在华南，1944年东江纵队由数千人扩大为万人以上的游击兵团，威逼广州市郊，出没于香港地区的九龙附近，组织海上游击队，炸毁九龙铁桥。在广九路以西，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在广九路以东，也控制了大部分地区。9月至10月，东江纵队对部队进行整编，建立支队编制。战斗在珠江三角洲的人民抗日武装，挺进中山县五桂山后，积极向日、伪军出击，在战斗中壮大了部队，巩固和发展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1944年6月，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在雷州半岛成立，并在各地普遍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独立总队改编为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下辖4个支队，4000余人，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各支队积极寻机作战，积极打击日、伪军，在琼山、文昌、澄迈等县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1944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局部反攻作战中，共作战2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2万人，俘虏日、伪军6万余人，争取日、伪军将近3万人反正，缴获各种火炮100余门、轻重机枪1200挺、步枪8万余支，收

复县城16座，攻克据点碉堡5000多个，收复国土8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00多万。[3]

1945年，敌后军民普遍对日伪军展开了新攻势。八路军、新四军在1945年的春、夏季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攻克与收复县城61座，扩大解放区24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把敌人进一步压缩到大中城市周围和主要交通线及沿海重要地区。到1945年春夏，全国已建立19块抗日根据地，如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山东、苏北、苏中、苏浙皖、淮北、淮南、皖江、浙东、河南、鄂豫皖、湘鄂、东江、琼崖等根据地，总面积约为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作战，在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和英、美盟军的对日作战，同时也为对日转入全面大反攻准备了重要条件。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抗战后期的正面战场

1943年初，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后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朝着有利于反法西斯人民的方向发展。同年秋，太平洋战场的形势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军已被迫转为守势。在印缅战场，盟军也正积极准备反攻缅甸。日军为早日从中国战场抽身，加强了对华攻势作战。随之，中国正面战场战事开始频繁。

常德会战

1943年11月，日军为了策应太平洋战场和印缅作战，牵制中国军队南下进攻，发动了常德会战。在此次会战中，日军投入的兵力有：第十一军，下辖5个师团，总计28个联队，另有飞行第四十四战队及大批伪军，共计10万余人。

国民党军投入此次会战的部队有：第六战区，包括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第三十三集团军等；第九战区，包括第九十九军，第十军，第五十八军，第七十二军等。总兵力：2个战区，计16个军43个师，共计21万余人。

常德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属于湘西重镇，川贵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武汉失守后，这里更成为重庆大后方的物资唯一补给线。

在会战中，日军求胜心切，疯狂进攻，中国军队则拼死作战，在常德及其附近地带多次与敌反复厮杀，战况惨烈，牺牲惨重。日军进攻常德市一地时，就先后投入约3万兵力，300余门火炮。中国守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兵力仅9000余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与敌鏖战，坚守16昼夜，重创敌人，中国守军虽然牺牲惨重，但官兵宁可战死，绝不投降。在整个50余天的会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伤亡6万余人、师长阵亡者即有3人的代价，也给骄狂的日寇以沉重打击，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日军虽然曾艰难攻占了常德，但中国军队二线兵团随即展开反攻。会战以日军的被迫退却而告终。

在此次会战中，中国空军以及美军驻中国基地的空军也积极参战并取得重大战绩。中美空军集结轰炸机和驱逐机约200架，对日军飞机、舰船、地面部队展开攻击，有力地支援了地面作战。

常德会战，中国军队依托阵地节节顽强阻击，迟滞日军进攻，给敌重大消耗，并以反攻恢复了原来态势，给日军重创，粉碎了日军的作战企图；同时在战略上也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并配合了盟军在印缅战场的反攻作战。

豫湘桂战役

1944年初，反法西斯战争在世界各主要战场节节胜利，日本侵略者被动挨打，处境困难。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对日军的反攻与进攻不断增强，日本在南洋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而且在中国的长江补给线也在中美空军的攻击下也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日本决定在中国战场上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并摧毁中国南部的中美空军基地。日本大本营把这次豫湘桂作战称做“打通大陆交通作战”，代号为“一号作战”。日军参加“一号作战”的总兵力约51万人、战马10万匹、火炮1551门、坦克794辆、汽车15550辆，从1944年4月至12月，历时8个多月。其参战人数之大、作战区域之广、作战距离之长、作战时间之久，都超过日本陆军以往的任何一次会战。

对于日军的大规模进攻，国民政府缺少足够的准备。另外，太平洋战争爆发及中国战区成立后，蒋介石的战略指导方针发生改变，他把胜利的希望过多地寄托在英美方面，因此出现积极配合盟军作战而忽略国内作战的思想。这种松懈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虽然国民党先后出动了100万军队节节抵抗，却最终没能阻挡住日军的进攻。

豫湘桂战役包括河南会战、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三个阶段。战役的第一阶段是河南会战，日军出动的兵力约15万人，中国军队在35～40万人。由于作战准备不足，日军在4、5月间先后攻陷郑州、洛阳等地。之后，日军以13个师团为基干，总共投入36万余人开展了长衡会战，中国方面投入30多万兵力阻敌。日军6月攻陷长沙。6月26日，日军占领衡阳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机场，并包围衡阳。中国政府调集各路援军增援，但未能突破包围圈。4万守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反复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使日军遭受重大伤亡，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阵地被日军突破，8月8日中国军队放弃衡阳。随后，日军从湖南、广东及越南三个方面向广西进攻，开始了桂柳会战。11月，日军攻陷桂林、柳州。之后，日军向贵州方向进攻，12月2日占领独山。国民政府为之震动，为了保卫西南后方，立即集中一切可用之兵力投入贵州作战，8日收复独山，迫使日军退回广西。12月，豫湘桂战役结束，日军打通了从华北到华南再至印度支那的通道。

在短短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六七十万人。丧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146座，失去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日军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始终没能全线通车。并且，在“一号作战”中日军消耗了庞大的兵力和作战物资，也使其战线拉得更长，兵力更为分散，占领区守备更为薄弱。日军在中国的攻势开始由强转弱。

豫西鄂北和湘西战役

在豫湘桂战役中，衡阳、桂林、柳州及粤赣边区的中美空军基地尽遭摧毁。在此情况下，中美开始扩建湖南西部芷江、湖北西北部老河口的机场，使之成为美军在华空军的两个最大的航空基地。1945年初，所建的空军基地投入使用，连续向日军主要交通干线华北、华中的铁路、公路和长江、湘江的航运展开攻击。为了消灭美国空军力量，日军于1945年初接连发动老河口和芷江作战，向豫西鄂北和湘西地区发动进攻，豫西鄂北和湘西战役开始。

1945年3月，日军第十二集团军集结4个师团约7万人的兵力，坦克100余辆，骑兵2000人，各型飞机106架，分别集中在湖北荆门以北地区到河南舞阳、叶县、鲁山、洛宁等附近地区。1945年3月21日，豫西、鄂北日军同时发起攻击。在豫西方面，日军第十二集团军分别由鲁山、叶县、舞阳、沙河店地区，分三路向西进攻。25日，日军以一部进攻南阳，主力向西突进。26日，日军骑兵第四旅向纵深突进，占领了老河口机场，随后，在日军第一一五师团支援下经激战于4月8日攻占老河口。

4月12日，中国军队在老河口实施反击，将日军逐出该地。30日，南阳守军第六十八军第一四三师与日军激战7天后，由城东南突围，南阳失陷。在鄂北方面，日军由荆门地区北犯，于23日黄昏进占宜城，29日攻陷襄阳，30日占领樊城。4月16日、18日，中国军队分别收复襄阳、宜城以及樊城。襄河以西恢复会战前态势。在作战中，中国空军第四、第十一大队及中美混合团，直接支援地面作战，攻击日军及其后方，共出动各型飞机1000余架次，取得了显著战果。此次会战，日军虽达成进占豫西控制老河口空军基地的目标，但遭到相当大的打击，伤亡1.5万余人。

豫西鄂北战役刚刚结束，日军又向湘西发起了进攻。湘西地处黔川东面的门户，是进出黔、川，通向贵阳、重庆的军事要冲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美设在粤赣边及湘桂地区的空军基地被日军破坏之后，芷江机场，成为空军的重要基地。为了侵占芷江空军基地，掩护湘桂、粤汉两铁路交通线，1945年4月，日军以第二十集团军第一一六、第四十七、第三十四、第六十八师团等部共8万人，由益阳、邵阳、东安之线向湘西地区发动进攻。湘西会战从1945年4月9日开始，至6月7日结束。中国军队调集第三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集团军等共10个军20个师，加上空军第五、二、三等4个大队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共400余架飞机，总兵力11万人，采取节节阻击，诱敌深入，包围聚歼的作战方针。

4月9日起，日军由邵阳地区分四路向西进攻。中国军队在邵阳、新宁以西地区对日军展开逐次阻击，并准备向日军实施反击。4月30日，中国军队完成集中后向武阳地区日军实施反击，5月1日克复武阳。日军向东南溃退。我军向东追击，于12日克复高沙。日军残部3000余人在向东溃退中再遭我军的截击，伤亡惨重，最后被围歼于武冈附近。5月6日我军日攻克新宁城。此后，中国军队以全力向东追击。在邵阳方面，我军于5月6日挫败日军6000余人的进攻后，在空军的有力支援下，于8日向日军实施全线反攻。

湘西会战，中国军队作战指挥得当，反击行动有力，会战中共毙伤日军2.4万余人，缴获大小火炮24门，步枪1300余支，机枪100挺，战马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47匹，其他战利品20余吨，基本实现了预定作战计划，粉碎了日军攻占芷江机场的企图。湘西会战后日军已无力在中国战场进行攻势作战，开始转入战略收缩防御阶段。

桂柳反击战

1945年4月，日军从广西等地实行战略收缩。中国军队乘势追击，发动了桂柳反击战。桂柳反攻作战中，中国军队已处较大的优势，参战兵力为2个方面军、1个集团军、6个军共14个师，其中多数是新编练和装备的美械师，日军只有久战疲惫、兵员不足的3个师和2个独立混成旅。在空军方面，中国已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占有绝对优势。桂柳反攻作战从5月开始至8月结束，中国军队先后收复南宁、柳州、桂林等湘桂铁路沿线各城镇，毙伤敌军9000余人。台湾出版的战史说：“不及三月之间，推进七百五十余公里之距离，进展五万余平方公里之幅员，此实乃反攻致胜之先声。”

缅北反攻战

1942年5月，中英联军在缅甸防御作战中失利，日军占领缅甸，英军败退印度，中国远征军大部退回滇西，一部翻越野人山进入印度，后组成中国驻印军。

缅甸的失守，对远东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消极影响。日军占领缅甸，打开了进攻印度的门户，印度已处于日军的直接攻击之下，岌岌可危。印度一旦失守，日军便可进逼中东，控制印度洋，与德国、意大利在军事上直接呼应，这将增加盟军在北非和欧洲战场的压力，影响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能力。因此，盟军从缅甸失守后，就开始考虑如何反攻缅甸。

1942年6月，史迪威由印度返抵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关于在印度训练10万中国军队和在云南装备训练30个师与收复缅甸的计划，得到蒋的赞同。7月18日，史迪威正式向蒋提出“反攻缅甸计划”。10月15日，史迪威飞赴印度与英印军总司令韦维尔商讨收复缅甸计划。随后经过中、英、美三国的磋商，三方同意在1943年春季发动代号为“安纳吉姆”的作

战行动。1943年5月，罗斯福、丘吉尔及美、英高级军事幕僚在华盛顿举行“三叉戟”会议，会议决定于1943年秋季发动收复缅北的攻势，打通中印公路，作战主要由中英军队从印度东部的利多及中国军队从云南进夹击缅甸北部来实施。反攻缅甸的作战任务主要由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担任，英军只担任助攻。作战目标主要是收复缅北和打通由利多经胡康河谷、密支那、八莫连接滇缅路的中印公路。8月，美、英首脑和军事当局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再次召开战略会议，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又一次被列入议程进行商讨。会后，罗斯福和丘吉尔致密函给蒋介石，得到蒋介石的积极回应。

1943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依据同盟国魁北克会议的决定及东南亚战区攻势计划，与盟军协定，以中国驻印军主力，联合英、美盟军一部，沿中印公路向缅北推进，正式开始实施缅北反攻作战。

1943年11月28日，中国驻印军先行部队攻克胡康河谷的日军重要据点于邦，取得缅北反攻的第一个重大胜利。12月28日，中国驻印军分兵两路向缅北大举进军。1944年3月5日，中国驻印军攻克缅北门户孟关；6月28日，攻克战略枢纽孟拱；7月11日，打通了从加迈，经孟拱到密支那的铁路、公路交通。当中国驻印军主力在孟拱与日军激战之时，中国驻印军一部对孟拱以东的密支那开始攻击。从5月中旬开始，经过2个多月的激战，8月3日，中国军队终于攻克了密支那，歼灭日军2000余人，日军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自杀身亡。至此，缅北各战略要点均为中国军队掌握。缅北反攻作战第一阶段作战结束。

1944年8月至10月，中国驻印军决定利用雨季进行整补。10月10日，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下达第二阶段作战命令。中国驻印军相继攻占缅甸重镇八莫、南坎。1945年1月27日，中国驻印军攻取芒友，打通了中印公路，并与中国远征军会师。3月8日，中国驻印军攻克腊戍。3月9日，英印军占领曼德勒。3月30日，中国驻印军与英印军于乔梅会师，缅北之日军大部被歼灭。缅北作战胜利结束。

在缅北反攻作战中，中国共投入16个师17万余人的兵力，收复缅北城镇50余处，毙伤日军3.1万人，缴获步枪1100余支，轻重机枪600余艇，汽车600余辆，打通了中印和滇缅公路，牵制了日本缅甸方面军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预备队，为英印军在帕尔地区的作战和整个缅甸战场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滇西反攻战

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中国远征军一部由缅甸撤至滇西。1943年2月，蒋介石任命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负责训练部队，筹划反攻方案。1943年11月，陈诚因病辞去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接替该职。

1944年4月中旬，中国远征军为策应缅北方面中国驻印军作战，打通中印公路，制订作战计划。5月，中国远征军下达攻击命令，第二十集团军各部，在强大的炮、空火力支援下，强渡怒江成功，揭开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的序幕。经过1个多月的激战，第二十集团军先后攻克马面关、桥头、北斋公房等日军坚固据点，并越过高黎贡山，向腾冲攻击。第十一集团军各部队也于6月初，分别在惠通桥、毕寨渡、三江口附近渡过怒江。

6月下旬，远征军长官部电令第二十集团军分兵3路，向腾冲攻击。腾冲扼滇缅公路要冲，位于大盈江东岸，四面环山，地形险峻，且城内工事极为坚固，外围各据点也是半永久性工事，易守难攻。当时，腾冲、龙陵、松山、平戛为日军在滇西高黎贡山的4大据点，其中尤以腾冲最为险固。6月25日，第二十集团军第五十三、第五十四军，分别越过龙川江上游向腾冲推进，至28日迫近腾冲外围。日军据险顽抗，第二十集团军攻击进展迟缓，苦战月余，日军被迫退入城内固守。经过2个月的苦战，中国军队于9月14日克复腾冲，日守军全部被歼。与此同时，远征军于9月8日攻占松山，全歼该地日军；11月攻克龙陵。腾冲、龙陵作战，远征军总计毙伤日军1万余人，俘260余人，缴获日军步枪1777支，轻重机枪164挺，火炮16门。中国远征军伤亡2.5万余人。

远征军攻克龙陵后，于11月6日沿滇缅路及其两侧分3路，向芒市、畹町进攻以扩大战果。11月20日攻克芒市，11月底进至遮放。1945年1月上旬，3路大军均进抵畹町附近，对日军形成包围，1月24日攻占畹町。27日，中国远征军与缅北作战的中国驻印军在芒友会师。至此，中

国西南国际交通补给线完全打通，中国云南省的领土完全收复。1月28日，中、美高级将领在畹町举行会师典礼。3月，中国驻印军攻占腊戍，缅北、滇西作战至此结束。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发动的缅北、滇西反攻作战，历时1年多，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解放缅甸领土8万余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歼灭日军4.8万余人，俘日军647人。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伤亡官兵约6.7万人。

缅北、滇西反攻作战，揭开了正面战场反攻的序幕。反攻的胜利，不但粉碎了日军封锁中国并从西南进攻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企图，保卫了西南边陲，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当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各大报纸竞相刊登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进行热烈的庆祝。中共中央也通过《新华日报》表示热烈祝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日本投降与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的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对日军发动全面反攻。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华中、华南根据地近100万正规军、220万民兵，向日、伪军展开了宏大规模的全面反攻。

晋察冀军区部队在8月以后的大反攻中，共歼灭日、伪军7万余人，解放了察哈尔、热河省的全部，河北省大部，山西、绥远、辽宁各一部，收复张家口、宣化、集宁、丰镇、承德、秦皇岛、山海关、绥中、锦州等70多座城市。晋绥军区部队经10余天反攻作战，共收复城市22座。晋冀鲁豫边区部队于8月13日开始对日、伪军进行全面反攻，共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收复县城59座。山东军区于8月11日进行全面反攻，共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解放县城46座，攻克烟台、威海卫等沿海城市、港口6处。8月11日，新四军向华中各地日军发出最后通牒，随后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新四军各部队在这次大反攻中，共歼灭日、伪军7万余人，解放县城40座，重要市镇440余处，收复了大片国土。在华南，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等人民武装力量也发动了反攻作战并取得辉煌战绩。东北抗日联军，也随同苏联红军参加了消灭关东军的战斗。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武装力量和东北抗日联军，在对日军实行全面反攻中，伤俘日、伪军39.87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正面战场，日军已无力继续作战，而随着日军的收缩，国民党军队跟进占领了沿海及交通线附近的许多城镇。

此时，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已经穷途末路。8月9日，日本军政要人在皇宫防空洞内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战与降的问题。铃木首相根据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等情况，认为日本已经到了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地步。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

津美治郎、军令部总长丰田贞次郎也不得不默认严峻的事实，但反对无条件投降。正当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争论不休之时，当日美军又在长崎投下了第2颗原子弹。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铃木首相请天皇“圣断”，天皇同意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作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附带条件。8月10日，日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政府，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转交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照会称：日本政府准备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经苏联政府赞同的联合公报所列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即上项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有损天皇为最高统治者权利的要求。日本政府竭诚希望这一谅解获得保证，且切望迅速得到关于对此的明确表示。

8月12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美、英、中、苏四国政府答复日本。答复强调：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能签字于必须之投降条款，使《波茨坦公告》之规定能获实施，按照《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

8月12日和13日，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反复召开内阁会议、皇族会议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同盟国复文。14日，召开御前会议，天皇见大势已去，做出接受盟国答复的决定，并要政府起草《终战诏书》。是日，日本政府正式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播送《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6日，日本天皇向国内外的日本陆海军人颁布敕令，命令他们遵照《终战诏书》向同盟国军队投降。从这时起到9月中旬，远东、东南亚各国、南太平洋地区和太平洋诸岛的300多万日军，陆续向同盟国军队投降。

9月2日9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向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受降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将、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国政府的代表签字。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签字仪式上发表简短宣言。他说：“以今天这个严肃的仪式为转机，从过去的流血和蛮行中，奠定更美好的世界——建筑在信赖和谅解之上的、能为人类的尊严和人类最理想的愿望即自由、宽容和正义的实现做出贡献的世界——才是我最大的希望，也才是人类真正的希望。”签字仪式结束后，数千驾美式飞机越过“密苏里”号军舰上空，庆祝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纪念时刻。

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国民政府决定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同日，毛泽东为《新华日报》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此后，中国人民一直将9月3日作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各战区分别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包括：中国（东北除外）、台湾、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全部日军。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受降典礼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受降主官陈仪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长达50年的宝岛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10月25日被定为台湾光复日。

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进程中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的巨大民族觉醒、空前民族团结和英勇的民族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进行大小战斗共计近20万次，重要战役200余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战争结束时接受日军128万人投降。中国战场歼灭的日本军事力量，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70%，对其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

[1] 晋绥军区副参谋长陈漫远1945年1月在武工队长会议上的报告。

[2] 1945年1月9日《大众日报》。

[3] 1944年12月31日《解放日报》

[4] 国际条约集编辑部：《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77～78页。

[5]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241页。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九 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

1 走向现代民族国家之路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完全打败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由此摆脱了在旧国际体系中的屈辱地位，完成了从衰落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在战争中，中国不仅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提高，而且以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为标志，中国从真正意义上走上了现代民族国家之路。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100年间，列强强加给中国近千项不平等条约，因此，中国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清末改良派、戊戌维新派曾明确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其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都曾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斗争。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也先后向列强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对时局主张就提出“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规定，党目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取消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所订的一切不平等的条约”。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又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制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纲。随后掀起群众性的反帝废约运动。至1930年，中国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关税自主权，但是在废除列强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等方面，难以取得进展。而抗日战争则为中国废除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对于中国抗战的作用，英国驻华大使早在1938年5月关于中国战况的报告中就说过：“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而战，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打败日本才能把我们从亚洲的灾难中解救出来。”[1]由于中国抗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以此为背景废除旧约和订立新约的时机成熟。

1942年，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26国公约（后称《联合国宣言》），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重要成员。美英为了

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军，于1942年10月9日，分别通知中国政府，愿意立即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权益，并准备尽快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以便缔结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的条约。10月24日，美方向中国驻美大使馆提交了美中条约草案。30日，英国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英中条约草案。随后，中国外交部提出修正案，经过2个多月谈判，终于在1943年1月11日，分别在华盛顿签署《中美新约》，在重庆签署《中英新约》。5月20日，中美、中英正式交换批文，即日生效。

美、英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后，享有对华不平等条约特权的巴西、加拿大、挪威、荷兰、比利时等国，也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并与中国签订平等关系的新约。通过废除旧约和签订新约，解除了长期束缚中国人民的枷锁，恢复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为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庆祝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指出：“我们应当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各地在战地环境许可下，均应于旧历元旦前后召开军民庆祝大会，庆祝中英、中美间新的关系与新的团结，坚定军民抗战信心，号召军民为驱逐日寇，完成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到底。”其他各党派、各群众团体及全国各族人民，都为签订新约而欢欣鼓舞。

对战时废约给予何种评价，这是一个尚有争议的问题。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并不标志着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决定这一状况的主要因素是此时的国力差距及历史的遗留影响，而并非基于条约的规定。就法理而言，中国已经恢复了曾经丧失的部分国家主权，在法律上已不再处于被歧视地位，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得到了确认。虽然这距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尚有距离，但这毕竟是民族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梯。废约之所以实现的主要原因，既不是美、英两国的恩赐，也不是中国外交技巧发生了作用，而是中国军民5年多的浴血奋战。如果没有中国付出巨大牺牲而牵制住100万日军，战时废约是不可想象的。毫无疑问，无数中国抗日军民的生命鲜血换来了废约的实现，它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从此，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跻身世界四大强国之中。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当然，废约的实现与名列“四强”，并不标志着中国已经真正地与英、美、苏等强国平起平坐了。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它仍然是一个弱国，在国际交往中还未能完全摆脱受人支配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作为新中国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彻底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规定：“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在完全意义上取得了独立主权地位，走上了现代民族国家之路。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社会文化的变迁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文化领域发展因素的积累。这主要体现在文化机构和学校的内迁对文化落后地区的影响，大规模人口流动促成的新生活方式的出现，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各思想流派的活跃等方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许多大城市相继沦陷。为了使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得以延续，国民政府决定将高等院校内迁至西南后方。这是国民政府为保护教育和人才所实施的一个重要措施。从1937年起，各高校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迁移。1938年，国民政府还特别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学校和研究所的迁建工作。高校内迁基本于1939年年底完成。到1940年学校和学生都恢复到战前水平，大学为113所，学生为52376人。到1946年，大学为189所，学生达129326人。另外，一些中学也参加了内迁。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保存了中国高校教育资源，同时对于改变地区文化教育的不均衡状况及推动西南、西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内迁高校中多数迁至文化落后的偏远地区。抗战之前，中国高校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而西部地区少有高校，有的省份连一所专科学校都没有。西部高校的总数低于北平一市，更不足上海的一半。战时高校内迁，完全改变了这种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的情况。内迁高校多数在战后返回，但也有部分高校中的部分专业课程教育以及教员留在了当地，为当地高等教育继续发挥作用。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内迁高校的师范教育，为西部落后地区培养了大量教师，也为这些地区教育的长远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内迁高校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取得了教学与科研的进步。一些研究成果被应用到当地生产，如土壤和农作物的改良，工业生产的技术革新，等等，起到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

抗战期间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人口大迁徙带来的特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殊的文化交融和社会变迁。社会学家孙本文认为：整个抗战时期由于东部人口大量迁入西部地区，使得后方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民俗方面“使东西两部风俗得接触的机会。不仅使一般人民知道全国风俗的不同，而且因相互观摩，而得接触和改良的利益。加诸抗战期间，生活上一切因陋就简，可以省却平时的许多繁文缛节。我国社会上不少礼仪获得合理化和简单化的机会”。[8]社会风气和人民素质，都发生了变化。而国民素质的提高是建设现代化国家必备的条件之一。

战时社会文化变迁，还表现在妇女运动的兴起方面。中国是一个长期受到封建主义影响的国家，妇女的地位一直十分低下。虽然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重大社会动荡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开启并取得了成绩，但是总体上看，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广大妇女仍然处在男权压力之下。而抗日战争的到来，很快改变了这种状况。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体的反侵略战争，战争的胜负影响着无论男女的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而战争的一般规律有两点是明显的：一是妇女的弱势使其更容易受到伤害，前述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暴行说明了这个问题；一是战争的完成需要大量的男性走上前线。前者，促成了妇女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与自身命运相关的战斗中去。而后者，又为妇女参加这样的战斗提供了条件。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根据地，妇女运动都得到了空前发展。

在国统区，以新运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简称“新运妇指会”）为典型，大量妇女被组织起来服务抗战，做出了很大成绩。1938年5月，宋美龄提议将新运妇指会改组成动员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全国性总机构，得到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各界妇女代表的支持与赞同。改组后的新运妇指会提出了妇女在战时的任务是宣传救护、征募慰劳、儿童保育、战地服务、从事工农业生产与合作事业等工作。该机构下设慰劳组、生活指导组、训练组、生产事业组、文化事业组、乡村服务组、儿童保育组、总务组和联络委员会。各分机构负责人包含各党派、各团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统一战线组织，它为组织动员广大妇女群众投入抗日运动做了许多工作。

新运促进总会组织的战时服务团、医务委员会、伤兵慰问组等服务团体直接服务于抗日前线。据统计，从1939年春到1942年底，新运医疗队共治愈受伤人员达10余万，敷伤60余万人次，施行大小手术1万余次，矫治骨折800多人。[9]在后方，新运总会及新运妇指会开办了许多小型工厂，招收受难同胞工作，一方面使其自力更生，改善生活，另一方面又为政府增加了战时物资，支援了抗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妇女运动也蓬勃开展。为了培养妇女干部，延安设立了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20日，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最后他总结说：“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中国女子大学培养了一大批妇女干部，她们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在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还大量举办妇女认字班、培训班，等等，不仅培养了许多基层妇女干部，也使大量农村妇女因认字而改变了精神面貌。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新。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中国史话》总目录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中国史话》编辑委员会

主任 陈奎元

副主任 武寅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巍 刘庆柱

步平 张顺洪 张海鹏

陈祖武 陈高华 林甘泉

耿云志 廖学盛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作者小传

方之光

方之光，1933年生，浙江诸暨人，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特约研究员。著有《太平天国兴亡史》（合著）、《洪秀全》、《中国近代史讲座》、《太平天国通史》（参与）等，其中《太平天国兴亡史》、《太平天国通史》分别获1985年、1995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主编《太平天国史论丛》第一、二辑，《太平天国史新探》，《太平天国史论考》，《太平天国史研究》第一、二辑，《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太平天国史新论》等。联合主编《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何桂清书札》、《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等。发表论文150余篇。

龚云

龚云，1971年生，湖北南漳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从事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和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研究。著有《路线：中国共产党的磨难》、《铁路史话》、《中国近代史研究》（合著）、《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形成的评析（20世纪30~60年代初）》等，编有《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副主编）等，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一“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近代农民的悲惨生活与反抗斗争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乡村已处于破产和崩溃的边缘；中国的农民过着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挣扎在生死存亡线上。“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不甘屈服和沉沦的中国农民，为了求得自身解放，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波澜壮阔的反抗浪潮，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赢得现代农民战争的胜利，翻身得解放，成为土地的主人、命运的主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近代农民的反抗斗争

面对悲惨的生活处境，素有反抗传统的中国农民，为生存所迫，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反抗斗争，最后由旧式农民造反发展为席卷全国的现代农民运动。

早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农民起义就异常活跃，只不过那时地方局限性较大，斗争的矛头尚未直接指向封建王朝。鸦片战争后，原有的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天朝上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打击，农民暴动屡屡发生。据官书《清实录》记载，1843～1850年间，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不下70多起。这些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最后促成了在洪秀全领导下横扫南方数省，斗争矛头直指清王朝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的兴起，激发了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东南各省汉族居住区，主要有天地会各支派的起义；在西南多民族杂居地区，主要有贵州苗民及号军起义、云南回民起义和川滇边李永和、蓝大顺起义；在西北地区，则有陕甘回民起义。

太平天国失败后，所谓的“同治中兴”也只不过是封建王朝垂死前的回光返照而已。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由南向北扩展，由沿海向内地侵入，由城市向乡村渗透，民族矛盾日益加剧，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广大农民的生存处境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尤其到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在中国大修铁路，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者的整个基础遭到破坏。由于铁路的修筑，占去大量粮田，破坏了许多房屋，导致农民无家可归，被迫背井离乡；洋货的倾销，加速了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破产；原有的内河航线被废弃，造成大批运输工人的失业。由于西方的宗教侵略深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影响农民生活更为直接，因此农民自发的反侵略活动，主要表现为19世纪60年代后在地方士绅和秘密社会领导下的接连不断的反洋教运动。据统计，19世纪中期以后，仅大规模的有影响的教案就达30多起，一浪盖过一浪的反洋教浪潮，最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汇合成席卷华北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的失败，导致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清政府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巨额的战争赔款也主要转嫁到亿万农民头上，从而加速了农民的破产。义和团失败后的农民斗争主要表现为接连不断的抗捐抗税运动。在此过程中，以破产农民为主体的下层游民的互助团体——秘密会党不仅参与了各地民变，而且与新军一道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王朝统治被推翻了，但代之而起的是封建军阀统治，广大乡村的面貌一如既往，而且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军阀的黑暗统治和穷兵黩武，农民处境越发艰难。大量的败兵游勇和频繁的自然灾害，使得民国初年的土匪极其活跃，从而爆发了一场“梁山好汉”式的农民造反——白朗起义，在中州大地上演了最后一幕“劫富济贫”式的中世纪农民造反的悲剧。

白朗起义失败后，一方面，连年军阀内战，给乡村社会造成极大破坏；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不断增强，其影响开始由城市向乡村扩展，尤其在沿海、沿江受西方冲击的广大农村，影响越来越大，这就为农民运动实现由旧式农民造反向现代农民运动的转型提供了社会条件，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首先在南方农村兴起了现代农民运动。

“一唱雄鸡天下白”。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沈玄庐在浙江萧山揭开了现代农民运动的序幕。随后彭湃、毛泽东分别在广东、湖南借国共第一次合作所造就的大好形势，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乡村转移，经过艰难探索，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在这条道路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发动了土地革命、减租减息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领导亿万农民推翻了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使广大农民实现了“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愿望，成为土地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人。

纵观一百多年来中国农民如火如荼的反抗斗争，可以看出如下特点。

其一，近代中国农民的反抗斗争次数多、规模大，呈现一定周期性。鸦片战争后不久就爆发了席卷东南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运动；仅过三十余年，又爆发了惊天动地的义和团运动；再过二十多年，又兴起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农民革命。以上还是仅仅就全国性的农民运动而言，如果包括地方性农民运动，那么农民斗争是一浪盖一浪，一波连一波。

其二，近代中国农民反抗斗争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政治性特别突出。在近代初期，主要是反对封建王朝统治，太平天国的直接打击对象是腐朽的清王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民族危机的加剧，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主要斗争目标，故而义和团运动竖起了“灭洋”的大旗。20世纪早期开始的现代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则将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举，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整体性的变革。

其三，近代中国农民运动受外来势力的冲击和民主革命势力的影响较大，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艰难历程。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先后在华南和华北爆发，与帝国主义势力由南方向北方扩展直接相关。20世纪20年代的农民运动主要在民主革命领导力量影响较深的南方兴起。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由南向北战略转移，日本侵略者自北方向南方全面入侵中国，农民的反抗斗争在北方尤为活跃。中国近代农民运动由旧式的农民造反向新式农民运动的转变经过了大半个世纪，而且还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实现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二“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太平天国运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紫荆山中拜上帝

在洪秀全为太平天国这场农民运动锻造精神武器的同时，冯云山“历山河之险阻”，“尝风云之艰难”，来到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宣传拜上帝教，开辟了紫荆山根据地。

紫荆山区位于广西桂平县西北端，纵横数十里，群山环抱，地僻而险，杂居着汉、壮、瑶等族的贫苦农民。这里人烟稀少，物产不丰，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文化教育也非常欠缺，文盲充斥，巫术流行，山民们终年劳作，艰苦淳朴，渴望温饱型的小农经济生活，因此易于接受平均平等思想的宣传。同时，因为文化落后，人们普遍迷信，崇拜神灵。冯云山选择这个地方，经过艰苦的革命活动，使之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祥地。

冯云山初到紫荆山，身无分文。他心怀大志，脱下长衫，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农民、烧炭工之中，当雇工，做零活，甚至拾粪采樵，历尽艰辛，与劳动群众结下深厚情谊，备受他们信任与爱戴。冯云山向他们宣传拜上帝教，播下了革命火种，发现和培养出杨秀清、萧朝贵等山区农民首领，建立了第一个拜上帝活动中心。冯云山在宣传拜上帝教的过程中，把一些浅显的拜上帝教知识传给农民，这样也适合于农民那本来就很实用粗糙的口味。据后来在紫荆山入教的李进富称：“拜了上帝可消灾难，登天堂。”李秀成也说：“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俱不敢拜别神。”这也反映了广大农民对拜上帝的理解。无知无识的农民往往以实用的态度来理解宗教。他们之所以信仰拜上帝教，是因为信仰上帝可以使他们躲避灾祸，可以使他们过好日子。对于许多在与本地人抗争中处于弱势的客家人来说，加入拜上帝教是因为拜上帝教能够提供有效的保护，“为逃避他们的敌人和取得生活必需品，他们甘愿顺从任何形式的膜拜”。后来在拜上帝教的壮大过程中，许多人“因食而随”，因此拜上帝教的信徒多为“农夫之家”、“苦寒之家”。

在向农民宣传拜上帝教的同时，冯云山注意用宗教纪律把信徒团结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在一起。后来，冯云山又以学识广博被大冲村地主推荐就任塾师，以教书为掩护，周旋于一些地主、富户与农村知识分子之间。他谦虚厚重，谈吐不凡，把拜上帝教与儒家经典熔于一炉，便于向有钱人宣传。冯云山并没有提出平均平等主张，而是加强劝善宣传，富户们一般对拜上帝教采取容忍与中立态度，大大减少了传教阻力。

由于冯云山善于适应客观斗争环境，在群众思想觉悟的范围内做艰苦细致的宣传组织工作，而且敏锐灵活，应变能力较强，既争取富户的中立，又深深取信于农民群众，因此“紫荆山拜上帝之教徒未几即逾二千之多，其数且增”。太平天国第一个革命基地终于粗具规模。

1847年8月，洪秀全带着他的几篇理论著作来到紫荆山区，看到拜上帝教已有二三千教徒，喜出望外。他和冯云山将抄写的拜上帝教小册子各处散发，向信徒灌输三篇“原道”的主要观点，并制定“十款天条”等宗教仪式和纪律，规定拜上帝教广大信徒的生活准则，以巩固拜上帝教。为了提高拜上帝教的权威，树立上帝的“惟一真神”地位，洪、冯二人又积极领导教众开展破除偶像、捣毁神庙的斗争。

拜上帝教的迅速传播，引起了地方地主士绅的恐惧和仇视。1848年1月，紫荆山地主王作新勾结官府逮捕了冯云山，使紫荆山区教众张皇不安。杨秀清与萧朝贵乘机亲自出马，先后声称天父上帝、天兄基督附身，以稳定众心，并乘机扩展权力。杨、萧二人原是山民首领，又精通巫术，现在他们把这种在紫荆山区盛行的巫术纳入拜上帝教，立即在信徒中产生了巨大的精神控制力，稳定了众心，使拜上帝教度过了暂时的艰难岁月。

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拜上帝教声势越来越大，同时也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除洪秀全、冯云山外，还有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

1850年，拜上帝教的信徒已达数万之众。此时，天地会起义在广西各地风起云涌，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打乱了广西地方当局的阵脚，形成了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面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领导数万拜上帝教教众，于1851年1月在金田村举行

起义。尽管这次起义发生在南方的边远山区，但它以坚强的组织、严明的纪律和执著的信仰脱颖而出，很快显示出强大的生机。金田起义犹如一份宣言书，庄严宣告：鸦片战争后连绵不断的起义，开始汇合成一场强大的革命，太平天国，正是这一革命运动的中心所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和实践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便提出了较完整的改造社会的方案。《天朝田亩制度》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农民英雄们改造中国社会的设想。

早在创立拜上帝教之初，洪秀全就激烈抨击了陵夺斗杀、人欲横流的社会现象，并认为社会弊端所在是一“私”字。为此，他提出了“天下一家”理论，憧憬建立一个类似唐虞三代的大同社会。

起义初期，洪秀全便许下“小天堂”的诺言，并在军队中推行一切私财归公、平均分配消费品的圣库制度。

定都天京不久，在1853年三四月间，太平天国领导人依据“人无私财”、“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原则，制定了废除私财与私营工商业的《百姓条例》，并毫不犹豫地立即把军队中实行已久的圣库制度、男营女馆制度等在天京城内全面推行。《百姓条例》宣称：“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全行归于天王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所有少妇闺女俱备天王选用……”《百姓条例》是太平天国在建都后所设计的第一幅“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美好画图。它否定了地主和小农土地所有制，否定了私营工商业，勾勒了一幅全部生产资料归公，由国家保证生活资料分配的新制度的蓝图。一方面，它提出了“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的过高分配标准，显示了“济民博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豪迈气概；另一方面，它又公然宣扬“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所有少妇闺女俱备天王选用”，表露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思想。朴素的公有理想与极端的专制主义在《百姓条例》中得到了统一。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天国领导人的心目中，“公有”、“国有”、“王有”是三位一体的。与在城市实行“人无私财”，把城市变成“大军营”，居民分为“男行女行”，和部队一样编制，“给与衣食，视同一体”的同时，太平天国对广大农村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采取了以“贡献”取代赋税的做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太平天国根本不承认土地私有，对建立

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的现有赋税制度也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而“以下供上”的贡献制度则较能体现“公有”、“国有”、“王有”三位一体的指导思想。

在《百姓条例》和圣库制度实践的基础上，太平天国于1853年11月制定了更为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这一文件全文仅3000字，内容却十分丰富，从田产均耕的土地制度、兵农合一的基层社会组织，直到宗教与教育、司法、选举与黜陟等，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核心为田产均耕的土地制度，全篇亦因此而得名。

《天朝田亩制度》开篇即宣布“功勋等臣世食天禄”，因而该制度是为“后来归从者”，亦即普通百姓（准确地说是普通农民）所设计的一幅理想生活的蓝图。其根本指导思想是：“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也。”

《天朝田亩制度》要点包括：

第一，“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

第二，“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

第三，“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总之是一句话：“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王救世旨意也。”

第一点讲的是土地所有权。该制度虽未明确土地为国家所有，但从“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等规定来看，实际上否定了包括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内的土地私有制，企图建立土地国有制，但比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田皆天王之田”的提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法，更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第二点讲的是按人口平分土地。《百姓条例》只强调了分配的均等，但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粮从田出，没有土地，“居住有所，衣食有资”只能是一句空话。《天朝田亩制度》强调按人口平分土地，规定妇女可与男子一样受田，更是对古代仅男子受田的均田制的重大突破。

第三点讲的是取民政策。与《百姓条例》相比较，主要体现了由“全部征收”到“剩余归公”的原则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天朝田亩制度》以25家的“两”为基本单位，说明太平天国企图建立的土地国有制，是以农村公社经济为基础的。

按人口平分土地是《天朝田亩制度》的精华所在，并进而成为太平天国立国的一个重要原则，咸丰四年（1854）五月，东王杨秀清在答复英人质问时曾郑重声明：“田产均耕一事是也，人人皆上帝所生，人人皆当同享天福，故所谓天下一家也。”“田产均耕”是为保证“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服务的。基于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原则，《天朝田亩制度》一方面抓住土地所有权不放，不使土地成为农民的私产；另一方面抓住分配权不放，只许农民过着“通天下皆一式”的生活，而将剩余产品都收归国家。这样，它便从根本上与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脱节了。

所以，《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指导革命的作用，它属于恩格斯所批评的那种仅是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解决社会弊端的空想方案，因而，“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陷入纯粹的幻想”。它终于被束之高阁。《百姓条例》颁布之初还曾轰动一时，而《天朝田亩制度》则几无回响，以至清廷专门搜集太平天国情报的张德坚多方打探仍对其一无所知，并怀疑其是否“梓行”了。

但《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历史文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达到了中国几千年农民运动的最高峰，是前所未有的。它表达了广大农民对急剧的土地兼并和残酷的地租剥削等社会罪恶的抗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以土地为触媒，历史上

曾爆发过多次农民起义，不少农民领袖曾就此社会问题提出过一些主张。历史上许多思想家曾就此提出过各种设想，如黄宗羲主张恢复井田，颜元、李塨主张均田。然而，唯有太平天国才将农民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作了具体的理论性阐述，提出了田地均耕、财富均分的设想。这是以往任何一位思想家都无法比拟的。从这个角度讲，《天朝田亩制度》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并对后人颇有启迪，如后来中国共产党就继承了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做法。

但绝对平均主义毕竟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首先，《天朝田亩制度》设想平均分配生产资料（土地制度）和生活资料（圣库制度），取消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将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理想化和绝对化，这就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开了历史的倒车。

其次，劳动者以“两”为单位所领取的生活资料都是一个平均数，并不考虑自己的勤惰、丰歉等具体情况，这必然会损伤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社会的低效率。

再者，太平天国将军队中的圣库制度推及整个社会，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若要维持整个社会成员的均匀饱暖，就不得不相应降低人们的消费水准，这就必然会伴生出禁欲主义，而依靠禁欲主义来维持人们的意志、信念是不会长久的。圣库制度后来名存实亡即为例证。

正因为《天朝田亩制度》的严重空想性，决定了它的基本内容是不可能实行的。它的部分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消极方面愈益显露，迫使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修正，被迫退回到现实中来。

太平天国在天京城内废除私财与私营工商业，实行诸匠营、百工衙制度。虽然这种制度对太平天国军事供应和社会经济生活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种在手工业基础上废除私人经营，实行国家公营与平均分配的方法，严重地摧残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因而不能维持久远，最后太平天国领导人不得不将废除私营工商业转变为保护和鼓励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天京居民对家庭和私有财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产的破坏深感怨愤。他们的不满情绪被一些效忠清朝的敌对分子所利用，其中最为突出、对太平天国领导人震动也最大的便是吴长松、张继庚等人于1854年谋划开神策门接应江南大营的事件。现实逼迫天国领导人允许恢复家庭和私有财产。在农村实行的“贡献”政策逐渐走向反面，人们不愿主动进贡了。天京粮食供应的紧张使得太平军的一些部队采取了名其曰“打贡”的强制没收的极端措施，结果激化了太平天国政权与当地人民的矛盾。残酷的现实迫使太平天国领导人于1854年夏初采取“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后又被迫允许“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恢复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希望把亿万农民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但他们却没有足以否定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尽管他们可以把平均主义的武器磨得锃亮，放射出一束夺目的光彩，却无法摧毁封建制度的枷锁，超越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反而被迫回到现实，承认和接受现存社会制度，旧世界得以在太平天国名义下重建。

1864年7月19日天京的陷落，宣告了这场规模大、时间长、影响远的农民革命风暴——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天国英烈们的美好理想，终成一枕太平梦，让后人几多憧憬，几番慨叹。

1 洋教士们深入腹地

此起彼伏的反洋教运动，构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前驱。

除了早期的景教外，西方教会势力深入中国，起于明代。到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禁教，教会势力基本被击垮。鸦片战争后，西方基督教挟着“坚船利炮”的威势再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传教士的参与策划，《天津条约》中塞进了容许在中国传教的所谓“宽容”条款。传教士可在中国凭借不平等条约，依仗外国政府的武装和领事裁判权，宣扬基督教的福音。在《北京条约》中，法国传教士更擅自加入了“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传教士们开始大批地深入中国腹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直接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国家主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每发生一起教案，传教士就向公使馆告状，公使馆立即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接着就是清政府对人民的镇压和向外国侵略者的屈服。传教士得逞后愈加放肆，人民对之就愈痛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来反抗，如此循环，使矛盾不断激化。

传教士深入中国腹地后引起农民反抗的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霸占土地。自从1860年把所谓“给还旧堂”用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之后，天主教传教士在内地强行勒索房地产，采用种种手段霸占土地。最常见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强迫捐献。传教士对有房地产的教徒以宗教语言强迫他们捐献房地产，或教堂内的设备，诸如椅子、桌子之类，或庙宇。如山东德州第七屯有一寡妇吴氏，因在1878年灾荒时领过传教士的一点救济，1881年在传教士的花言巧语下，将一处宅院、七间平房、一间门楼、二分庄东地捐献给教堂。

盗买盗卖。传教士通过不法教徒盗买公产或亲属产业转手给教堂。如1882年，在黑龙江呼兰县，传教士贡罗斯通过窦至等人将郭定恒的产业盗买到手。后来郭定恒起诉，传教士不但拒绝回赎，反而开枪打死交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涉的官员，并抢先向官府告状，要求赔款3000两银子，结果竟然打赢了官司。

低价勒索。这种情况在中国发生灾荒时最为常见。传教士利用灾情严重、农民纷纷逃荒之际，用极低的代价买进大片土地。1876年至1879年间，华北发生严重灾荒，大批传教士乘机到灾区以低价购买土地。等到灾荒过去，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返乡时，因无力购买土地，只得被迫在全家入教的条件下充当教堂的佃农。传教士有时也采取低价永租手段。美国传教士黄安河在内蒙古用恐吓手段租田地1000顷，署曰永租，由约1000个教民耕种，并课其租。此外又牧羊、牛、马千余，在堡内服役者50余人。

占领垦地。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内蒙古一带。传教士采取占领垦地的手法召佃开垦。早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传教士即已渗入内蒙古一带占领垦地。到19世纪70年代，规模扩大，1871年在乌兰察布盟四子旗乌尔图沟，传教士一次占领垦地就达4500亩。

传教士在中国霸占了大量土地之后，除用于教堂及其附属机构建筑外，其余土地由佃农耕种，强迫他们将收获的四五成甚至八成交给教会，进行残酷的地租剥削，并且要佃农献纳鸡、鸭、鱼、肉等供其享用，还令佃农从事修造教堂、拉柴赶车、种菜挑粪等无偿劳动，利用青壮佃户充当教堂打手，如不履行上述义务，传教士就以罚款、罚送匾、罚送酒、刑责或收回土地、开除教籍等方式惩办佃农。例如，江苏宿迁地主周甲信天主教，每亩收租七斗半，而佃农周乙等40人也信天主教，但因无力负担地租，抗拒不缴，传教士竟勒令佃农周乙等交罚款130千文，制匾五方，设酒席五桌。

其二，包庇教民和把治外法权延伸到中国教民。所有教徒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真正的信教者，一般都是比较善良的，只是受了传教士的宣传而入教的；第二类是吃教的，没有什么信仰，有的因为生活贫穷而入教，有的属于二流子或流氓地痞被收买入教的；第三类是仗教的，就是企图依仗教会势力保护个人或家庭利益的，多数为地富土豪。后两类教徒往往是民教争斗的肇事者。传教士往往不问是非曲直，妄加包庇，甚至包揽他们的词讼，逼迫地方官让步。在传教士的包庇纵容

下，不法教徒作奸犯科，欺压乡里，引起广大农民的普遍反抗。

其三，任意干涉中国内政和以武力要挟。早在1861年，恭亲王奕䜣奏称：“（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者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

清政府采取保教抑民的政策，其结果更加助长传教士的嚣张气焰。如1886年，镇江一个木匠与传教士立契承包了一项很小的建筑，由于亏本要求略加补偿而发生口角，传教士告到美国领事那里，领事强迫道台惩治该木匠。道台仅仅说了声需要查对一下账目，领事就电告上海总领事，马上派军舰到镇江要挟。还没有等军舰开到镇江，道台就下令逮捕木匠，先让其在镇江美国领事馆门前带枷示罪，然后再行惩处。

传教士们深入中国腹地之后，上下渗透，步步推进，在中国广阔的领土上按行政区划分设教区，深入到各个城镇和村落，变外来为内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股特殊势力。虽然传教士中不乏真诚献身于传教事业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国带来西学，但西方基督教本质上是排他性的，它以“救世”的面目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以“优越文明”的姿态，鄙视中国原有的文化，反对包括祖先崇拜在内的儒家学说和社会习俗，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国原有文化的抵制。更重要的是洋教本身就是凭借着西方大炮和不平等条约硬行闯入中国人生活的，这本身就给众多的中国人带来沉重的屈辱感。在广大农民眼里，这些传教士只不过是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代表着西方侵略势力，是外来的异端。为了反对洋教势力的渗透，为了反抗传教士庇护下的教民的欺压，广大农民以自卫和排外的形式展开了反洋教斗争。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他们反侵略、反欺凌的热情被封建顽固势力引向不分青红皂白、盲目排斥一切外人和外来事物，引向烧逐杀的非理性行为。

从鸦片战争后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传教士引起的大小教案共400余起，大部分集中在19世纪最后30年，而这30年也正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期。这一段时间反洋教的舆论和行动几如海潮江波，逐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浪而起，现略举数例，从中可窥一二。

衡阳教案。1862年传教士在衡阳等地强占民房，建立教堂，绅民发出《阖省公檄》，揭露传教士罪恶。群众捣毁衡阳、湘潭等地教堂和育婴堂。法国代办向清政府施压。结果清政府将衡阳、湘潭两位知县革职，并勒令当地政府赔款、重建教堂。

酉阳教案。1865年，法国传教士玛弼乐因在酉阳支持教徒欺压百姓，被群众击毙。法国公使派兵到四川相威胁，迫使清政府处死民众1人，徒刑2人，赔款8万银两。1868年，法国传教士李国在酉阳组织教堂武装，修筑工事，奴役人民，激起公愤。民众于次年初焚毁教堂，杀死李国。教堂武装乘机报复，杀死民众145人，伤700余人，百余户民房被焚毁。法国参赞罗淑亚与清政府谈判，主凶竟逃回法国。结果民众被处死2人，徒刑10人，赔款3万银两。

巨野教案（又称曹州教案）。1897年德国传教士在曹州附近唆使教徒压迫人民，激起民众公愤，巨野县农民杀死张家庄德国传教士2人。济宁、寿张、单县、武城各县群众和农民在大刀会的号召下，纷纷响应。德国借口传教士被杀，将军舰驶入胶州湾，强行登陆。结果清政府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处死民众2人，徒刑3人，赔款22.5万银两。

农民反洋教运动，从根本上说是反侵略的斗争。它是在近代民族主义尚未形成以前，遭受侵略的人民用传统武器表达本民族情绪的一种形式，是19世纪中后期民族自救运动的组成部分，集中展现了农民群众中日益高涨的爱国激情。反洋教运动也是普通农民在清王朝丧失“防洋”功能的情况下一种自发的求生存斗争，是被迫发出的“排外”吼声。

到19世纪末，面对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狂潮，广大农民开始有了国亡家破的民族危机意识，有了救亡的迫切感。“上下之人举以为忧”，“群求发奋自强之道”，于是“君子谋于朝，小人谋于野”。在野的劳动人民，便由反洋教、反洋货、反洋人，归结为“灭洋”：1894年从皖南到山东的大刀会活动地区喊出了“光华灭洋”的口号；1898年，四川大足余栋臣提出“顺清灭洋”，山东冠县赵三多要“助清灭洋”，以及在直鲁交界各地的“保清灭洋”、“辅清灭洋”，最后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

统一为“扶清灭洋”。正是反洋教运动中形成的“灭洋”意识，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自觉”意识，沟通了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职业，使成千上万的人投入到义和团运动中。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不到三月遍地红”

1900年春，山东义和团的一部分冲破袁世凯的束缚，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控制的心脏地带——北京和天津挺进，与直隶的团民会合，展开更大规模的反帝斗争。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反教会斗争一直连绵不断，参加的群众非常广泛。赵三多、阎书勤在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1898年冬，大名府枣强县就组织起义和团，竖起“助清灭洋”旗帜，捣毁了县城北面的教堂。1899年，河间府景州也出现了义和团，并攻打直隶南部生家河天主教总堂。

1900年春天，山东少数团民转移到直隶南部，当地人民纷纷邀请他们前往设坛授拳。开州、献县、景州等地，很快出现了“习拳者益众，焚香设坛，人心若狂，官亦不敢过问”的局面。在河间县，义和团于1900年3月初“公开传习”，数旬之间遍地皆是。

随后，义和团逐渐向直隶西南各州县发展。4月底，晋州、定州、新乐、宁晋、广宗、获鹿等县已是“拳场林立，指不胜屈”。5月初，有部分团民渡过滹沱河，北攻深泽、无极等地教堂，“或拆或焚，均成平地”。

义和团还冲破种种障碍，向保定地区推进，从保定向北发展到新城、定兴、涿州一带，进入北京，向东发展到雄县、霸县、静海等地，进入天津，从而在京、津、保一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斗争中心。

义和团向京津进军，使帝国主义惶惶不可终日。1900年4月6日，英、美、法、德四国公使胁迫清政府限“两月以内，悉将义和拳‘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清政府马上电令直隶总督裕禄严加镇压。裕禄接令后，立即派杨福同等将领，带兵对义和团进行“围剿”和堵截，企图阻止义和团挺进京津。

但是义和团的反帝革命洪流不可阻挡。4月，义和团在任丘县击退

前来镇压的清军。5月，义和团攻打涞水教堂，焚烧了教堂，并惩办了20多名作恶多端的教士和教徒。裕禄闻讯，立即派杨福同率清军直扑涞水。杨福同部在途中陷入义和团的伏击圈，被杀得人仰马翻，杨本人突围未成，被扎伤堕马毙命。5月27日，义和团两三千人攻占涿州城，并在四门上下竖起“兴清灭洋”旗帜。接着，义和团直趋北上，将涿州至长辛店的铁路、车站、桥梁、电杆尽行焚毁。29日，义和团占领丰台车站，逼近北京。

面对义和团运动的强大声势和沉重压力，清廷中以载漪、刚毅、徐桐为首的顽固派，决定对义和团采取招抚利用政策，将其纳入团练的合法轨道，加以控制，消弭其反封建的倾向，变成反对社会变革、捍卫封建传统、对付外国侵略者的群众力量。顽固派也迫使慈禧太后改变犹豫不决的立场，倒向他们一边。强烈的“亡国灭种”意识，辅之以清政府的招抚利用政策，使得义和团由山东进入直隶，由乡村进入城市后，便成燎原之势，迅速以京津为中心，在华北燃烧起来，并波及东北和西南，在全国蔓延开来。

1900年6月，义和团力量已经威震京津。他们烧毁了教堂，惩办了罪大恶极的传教士。义和团“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盆，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这种盲目排外的情绪倾泻了许多小生产者生路断绝之后的发指眦裂之恨。这种愤恨酿成于血泪和饥饿之中。但这种愤恨所包含的愿望又与旧的生产方式连在一起，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洋人洋物，于是所有的外来之物便成了痛苦的原因。他们在大街小巷张贴各种标语，表达了强烈的“灭洋”决心。有张揭帖说：

还我河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

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在天津，各处遍贴义和团的揭帖，说：“大师兄，砍洋头；二师姐，杀官兽；打倒洋和官，百姓有盼头。”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6月，船夫张德成和游勇曹福田领导的义和团组织，黄莲圣母、董二姑、刘三姑领导的妇女组织红灯照，浩浩荡荡进入天津，成为影响最大、战斗力最强的几支队伍。全城设坛二三百处，团众达五万人。他们冲入监狱，把被监禁的百姓全数放出；取出海关道署军械库的枪支弹药来武装自己。义和团还加紧制造武器，天津城内外“业冶铁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日夜相继”。在义和团的打击下，帝国主义分子和卖国官吏威风扫地，如丧家之犬。天津这座北方大港成为反帝的中心。

在北京，广泛流传的义和团揭帖说：“最恨和约，祸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不平等条约的深恶痛绝。他们痛恨那些“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的卖国官吏。义和团出于对西方侵略的本能抵抗，进而对一切与西方有关的人和物统统加以反对，主张学习西方和进行社会变革的维新派也被置于反对之列。他们公开提出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后来在顽固派的怂恿下，又准备进宫行刺主张变法的光绪皇帝。6月初，京郊义和团开始进入北京城。到6月下旬，全城坛口已有一千左右，人数逾十万。这样，义和团实际上已控制了京津地区。

席卷京津的义和团革命风暴，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特别是北方各省反帝斗争的高涨。

1900年6月，盛京（沈阳）城内贴满了义和团揭帖，揭露沙俄帝国主义的罪行，高举“御俄寇，保国土”的大旗，号召人民起来把侵略者“驱赶出中国的领土”，大规模地开展反对侵略的斗争。盛京燃起的反帝烽火，迅速扩展到整个东北地区。

1900年5月，山西省以太原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遍布全省四五十个州县。内蒙古蒙、汉、满等各族人民，也积极投入反帝斗争，七八月间斗争进入高潮。

当义和团运动席卷中国北方的时候，南方各省的反帝浪潮也风起云涌，6～8月间，浙江、四川、江西、云南、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都相继爆发了会党和群众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义和团激烈的反侵略“灭洋”行动引起了帝国主义更大的侵略。1900年6月10日，英、法、德、美、日、意、俄、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借口“保护商民教士”出兵中国。义和团运动因此由反洋教斗争发展为武装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作为一个爱国的民众团体，义和团以血肉搏枪炮的气概显示了顽强的民族精神。

俄国记者扬契维茨基在《八国联军目击记》一书中记述了1900年6月2日夜间发生在天津火车站的悲壮场面：

每一次射击之后，我们都听到了刺耳的号叫声，只见红灯掉落了，溃散了，熄灭了。但是团民们仍然挥舞着大刀长矛，高喊“义和拳！红灯照！”向车站前进。

他们中有一位师傅，是个脸色阴沉的高个子老头。他带领一群团兵径向我们连冲过来。

走在前头的小孩子举着大旗，上面写着“义和团”三个大字。

月亮照耀着这些丧失理智的莽汉，照耀着他们的大刀和旗帜。

一排子弹射过去了，大旗倒下了，又举了起来，接着又倒了下去。

义和团作为以旧式生产者为主体的民众爱国团体，作为旧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在自发地担当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以新的武器去反抗外国侵略，只能借助于传统的过时的武器去对抗拥有现代武器的侵略者。这样，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社会意识通过正义的行动而奇特地表现出自己的活力，义和团的民族英雄主义便历史地具有一种非理性的外观：“习拳者持咒面向东南方，三诵而三揖，即昏绝于地，顷之手足伸展，口作长歔，一跃而兴，舞蹈不已。”其咒文有“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如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以神道为武器，显示了群体的愚昧，万千来自下层社会的人们手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执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火牌、飞剑，勇敢地对抗帝国主义的火枪快炮。在这个过程中，愚昧升华为悲壮。

在义和团运动中，破产小农和手工业者归复自然经济的强烈愿望使他们的眼界无法越出中世纪，因此他们在英勇反抗侵略的同时，又本能地守护着两千年来陈腐的固有之物。而后者正是排外主义的应有之义。在列强组织军队干涉之后，促使义和团的“排外”行动达到高潮，烧教堂，杀教士和教徒，甚至只要见到外国人便立即杀掉，一切外来之物也都成了焚烧的对象。

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屠杀和清政府的配合绞杀下，义和团很快陷于失败。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充分昭示了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及其深厚的力量。

1 “中州真主”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国社会丧失了最高权威，从而进入了剧烈的动荡时期，随之而来的军阀干政又加剧了盗匪活动的滋长。结果自“民国创立后，没有一片区域没有土匪，没有一年土匪偃旗息鼓”，中华民国几乎成了“中华匪国”。民国初年，中州大地上出现一个外号叫“白狼”的绿林好汉，他率领的部众，席卷豫、鄂、皖、陕、甘五省，攻克五十多座城镇，历时三年半，威名响彻中外，上演了一场“梁山好汉”式的悲喜剧。

辛亥革命前，地处中原的河南，广大人民在封建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剥削下，无法生存，纷起反抗。民国初年，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托名共和，厉行专制”，人祸天灾，交相煎迫，河南农民的武装斗争更趋活跃。在这个条件下白朗起义相应而起。

白朗，字明心，1873年出生，河南宝丰县大刘村人。因为其身材高瘦，腿长而行快，故因其名而绰号“白狼”，反动统治者即加以利用，借以渲染白朗义军的“凶残”。当时人们讹传白朗为日本人，或说为一富家公子。其实白朗出身农民，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姐，家中约有荒地200亩，雇有一个长工，在当地是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白朗幼时读了一年多私塾，后辍学务农。青年时期的白朗，身高五尺有零，背微弯，脸圆微黑，双目圆大，眉浓黑，臂力过人，喜欢弄武玩枪，发必中的。白朗曾在家乡宝丰为政府运盐，由于他“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敢于为同伴打抱不平，因此被选为盐队的首领。他侠肝义胆，乐于助人，人们称他为大家的“管大哥”。这一美称很快在当地传开。

1908年，白朗因事和本村地主王真发生口角，遭王家众人痛打。事后白朗和一帮朋友找王家评理。在冲突中，王家老父亲被白朗推倒在地，回去后不久即死去。据传王父之死并非因白朗所致，而是王家弟兄为瓜分家产，乘机将其父害死。王父死后，王家诬告白朗打死人命，贿通县令将白朗逮捕入狱达一年之久。白朗家人先后变卖了100亩地才将白朗赎出。在狱中，狱卒对白朗百般折磨勒索，将他吊在大梁之上痛加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鞭打，旧仇加新恨，使白朗发誓非向狱卒报仇不可。回家后，白朗对其母说，我们受人欺负，没法站住脚了，非“蹚”不可！经母亲苦苦相劝，白朗方作罢。于是，白朗决定去禹城项大人（德高）处干马队。可是项大人见白朗的红马剽悍俊美，硬要以红马相挟，白朗因此愤而返家，但回家后那匹红马还是被人抢走了。

1911年宝丰一带兵荒马乱，白朗的母亲为避免被抢，打点家中值钱之物送往城里女儿家，不料途中被清乡的官军全部抢走，送财物的两人则被关在站笼里囚死，白朗城里的姐姐家中也被洗劫一空。面对这个是非颠倒、恶人横行的人间地狱，白朗忍无可忍，在朋友的敦促下，终于走上了绿林之路。

1911年在家乡跟他起事的仅有二三十人，但他“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以是能得众。先奔于（临）汝、鲁（山）、郏（县）、宝（丰）之间，结识豪侠，渐成规模”，只因武器缺乏而未能大举。白朗于是在1912年春将宝丰县长的儿子劫去勒赎，索价新式五响钢快枪10支，并且缴获了前来赎人的保镖10余支快枪。经此一事，白朗势力大增，在绿林中的威望也提高了。同年10月，当地的匪首杜启赋等人被杀，余众无所归依，纷纷投奔白朗。从此，白朗愈发枪多人众，影响日大。

1912年冬，白朗面对河南都督“剿抚兼施”的政策，拒绝“招抚”，带领队伍在北自禹县南至桐柏山的豫西广大农村往来流动，消灭分散的地主武装，收缴武器。他的队伍纪律严明，所到之处，高呼“打富济贫”的口号，“专打大户老财，对贫苦人民多方体恤，秋毫无犯”，“违者就地正法”，并将夺取的地主富豪的粮食财物分给贫苦人民，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队伍迅速扩大。到1913年8月起事进入高潮时，他已联合起34支队伍，总计两三万人，成为颇有声势的绿林义军。

1913年夏，“奋起陇亩，纠合豪杰，为民请命”的白朗，以“中华民国抚（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的名义宣称：

满业倒了气运，

袁贼逆命权衡。

我国现在无印，

受定国棵（课）何用？

袁贼一概独吞，

假作民国扬名。

我军来到地方，

百姓并不逃行。

现在中州真主，

荡荡如同天神。

这样，“中州真主”白朗开始借讨袁之名来演出“绿林好汉”的活剧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传奇英雄的穷途末路

白朗起义是20世纪初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呈现“流寇”特征的绿林英雄的农民造反，“劫富济贫”是其主要行为指向，这也决定了白朗这位传奇绿林英雄的穷途末路。

白朗公开倡言“劫富济贫”，所到之处皆能实行，并且有比较严明的军纪保证。在荆紫关，白朗军张贴布告称，“嗣后本军过境，尔商民等但能箪壶迎师，不抗不逃，本大都督亦予以一律保护，决不烧杀”。在白朗军所经之处，的确做到了如布告所称的那样。在邠县，白朗亲自将违犯军纪侵犯穷苦百姓的亲信杀死。在白朗本人的绿林生涯中，攻城陷寨，劫洗富豪无数，却从未置房买地，蓄财肥己。据传白朗起事初期，手下的人将掠得的财物用牲口驮至其家，白朗坚辞不受，主张散给贫苦农民。他常说：“我白朗不是为买产业才干起来的，只要咱穷兄弟都有吃的有住的，咱自己要房子要地干啥。”正因为白朗以身作则，白朗军才能始终以此为旗帜，从而获得下层民众的欢迎。“该匪以劫富济贫为惟一手段，故所至之处，贫苦小民均极欢迎，并乐为耳目”。在白朗故乡流传这样一首歌谣，表达了广大贫苦农民对白朗的爱戴：

老白狼，白狼老，

抢富济贫，替天行道，

人人都说白狼好，

两年以来贫富都匀了。

究其一生所为，可以看出，白朗就是想通过四处“劫富济贫”，以实现穷苦兄弟食饱衣暖的均平社会理想。

然而，“劫富济贫”是不可能实现均平社会理想的，绿林英雄有其先天的不足。因为“劫富济贫”这种要求产生于不均平的社会，体现着下层劳苦人民对经济、政治地位平等的强烈渴望。但是这种绝对平均的理想

由于所蕴涵的反进化因素决定其不可能落地生根，同时在实践上它是以对富庶地区的掠夺和破坏为代价的，贫苦小农可以受惠一时却不能持之以久远，其结果是不但未能改变贫困局面，反而使相当数量农民受兵祸之累而陷入更加穷困的境地。绿林好汉虽与农民血肉相连，是农民的保护神，也得到农民的有力支持，但也有着强烈的地域限制。白朗军崛起于豫西，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而豫西以外的地区，下层民众的反应则较为冷淡，甚至完全持敌视态度。“流寇”式的白朗军在远离故土时，常常陷于孤军奋战的境地，最后在北洋政府军队的围追堵截下溃散、沉寂；“劫富济贫”不能导向革命，它只是下层人民对现行不公正社会的强烈抗议，是对现行社会的破坏，它不可能实现社会变革。

这种种局限决定了绿林英雄白朗失败的命运。

白朗义军自1913年8月起事进入高潮以后，在豫、鄂、皖交界处以声东击西战术纵横驰骋，倏忽无定，神出鬼没。常常一日夜能强行军二三百里。1914年1月，他们连克豫东南的光山、潢川、商城和皖西的六安、霍山，直逼皖中的舒城和鄂东的英山，“如入无人之境”，使袁世凯惊恐万状。为了挽救危局，袁氏将张镇芳（河南都督）、赵倜（护军使）革职，另行委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河南都督，长驻开封，统一指挥豫、鄂、皖三省正规军两万多人进行会战，企图“聚歼”白朗军。

然而就在北洋军队的重重包围中，白朗率军顺利突破重围，离开安徽，在豫南越过京汉路，进入鄂北，于3月7日兵不血刃地攻克鄂北重镇老河口，震惊朝野。3月14日又攻克豫、陕交界的荆紫关，打开了进入陕西的大门。白朗义军的节节胜利，使袁世凯政府“劳师糜饷，遗笑中外”。但同时西进陕甘也标志着白朗军声势渐衰，预示着白朗这位传奇英雄穷途末路的到来。

随着与家乡的空间距离的日益增大，白朗军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进入陕西后，虽然“白狼召良”四个字早已在汉水流域传播开来，四面八方的应征者蜂拥而至，但这些人不是农民，而是以前的匪帮和秘密社会成员，以及长期饥饿的难民。进入陕甘后，地方主义在白朗部下中逐渐抬头，以对抗甘肃农民的地方主义。许多人离开故乡之后害起了“思乡病”。对于外省人的不信任感甚至明显地渗入起义军内部关系之中。湖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北人总是被另眼看待，过河时，总是先由他们下水以试水流的缓急。白朗完全信任的只有那些来自大刘店的同乡。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在队伍中引起很大不满，因此在返回河南途中，开小差的人很多。正如一个幸存者所回忆的：“白朗不肯使用外省人，这是我们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北洋政府的围追堵截和由陕入甘后回民的顽强抵抗下，白朗军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许多重要骨干主张返回豫西家乡。众志难违，原来主张西进的白朗不得不同意收兵东归。

白朗率军摆脱2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于1914年7月上旬又通过荆紫关回到豫西，为了避免被官军集中包围，义军化整为零，分为四路活动，但由于官军的重兵围剿和“清乡严洗”，很快被各个击破。

1914年8月初，白朗回到宝丰时，身边只剩下100多个战士。他们与数千名官军进行了两天两夜的战斗。官军被这支隐蔽在山间的几十名疲惫的幸存者所阻。这场战斗是对白朗那令人惊讶的超凡魅力的最后赞颂。8月7日夜晚弹尽粮绝，白朗遣散了所有的战士，只留下贴身保镖，希望借助夜幕得以逃脱，但他意外地被一支巡逻队打死。这位绿林好汉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白朗的头颅被割下来，验明正身后送到开封，放置在一只木笼中，悬挂在开封南门示众，警告所有梦想步“白狼”后尘的人们。

然而豫西南的农民对“白狼”是难以忘却的。面对残酷的屠杀，“白狼”的旗帜在数周内又被无数小股的贫苦农民队伍举了起来。他们继续在夜晚“劫富济贫”，而在白天耕地或躲藏起来。

白朗死后，河南当局为了毁坏白朗在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委派专人演出剧目，白朗被画成白脸，穿着中国舞台上传统反派角色的服装。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当局的做法引起愤怒农民的骚乱，遭到他们的抵制。之后百姓编写了自己的剧目，白朗的形象更接近他留在人们心中的真实记忆：英雄人物传统的红脸。到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开始进入这一地区时，他们发现，人们仍然怀念着“白狼”，把白朗的队伍同白莲教和红枪会一起看做是过去的“革命团体”。

1 沈玄庐和萧山衙前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后最早领导的农民运动，是中共早期党员沈玄庐领导的1921年浙江省萧山衙前农民运动。这场新式农民运动点燃了中国现代农民运动之火。

沈玄庐，又名沈定一，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人，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因排行第三，同乡人又称他为三先生。他出任过知县、知州，又是军阀政府的省议员，在地方上很有势力和影响。但当时的沈定一却信奉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1920年，他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上海党的发起组在积极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还重视农民运动。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曾指出：“中国农民占全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都有了十分的可能了。”沈定一也很重视开展农民运动，他认为：“中国机器工人不多，农民在国民中占最大多数，中国底社会革命，应该特别注意农民运动。”为此，他于1921年4月从上海回到了衙前村，专门从事农民运动。

沈定一回到家乡后，首先从办教育入手，从自己家里空出数十间房屋，筹办衙前农民小学。他邀集原浙江第一师范的进步教员刘大白和“一师风潮”中的著名学生领袖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等来衙前，一面筹办学校，一面开展农民运动。

他们通过访贫问苦和社会调查，动员穷人将子女送到小学读书，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他们对农民说，要过好日子必须破除“命中注定八字苦”的思想，农民当牛做马过着如此贫困、痛苦的生活，这都是地主田主掠夺剥削的结果，都是这私有制社会造成的结果。在筹办农村小学时，他们还办起了龙泉阅书报社，出借革命进步的书籍报刊。在衙前小学里，沈定一还经常与教员们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共同探讨社会变革问题和农民革命问题。因此，筹办中的衙前农村小学实际上成为开展农民运动的活动中心。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沈定一和农村小学的教员们在进行思想发动时，同农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热心为农民排难解忧，得到农民的信赖和拥戴。这年5月，衙前村的一些农民因上年赊去的油菜子钱无法要回，生活窘迫。沈定一就从自己家里拿出一笔钱分给这些农民，并对他们说：“这笔钱本来不是我的，这是你们种我的田还来的租，就是你们农人自己的血汗。现在只好算农人帮助农人，不好算我帮助你们。”佃农们听到自己的东家说出这样的话，都极为感动。这样，通过日常生动而又实际的教育启发，农民们开始懂得到了许多革命道理，并从内心里感到，三先生和这班专门从城里跑到乡下的教书先生都是关心他们的疾苦，为他们谋利益的人。因此遇有事情都愿意找三先生等人帮忙解决。

沈定一和农村小学的教员们为了有组织地开展农民斗争，改变农民一盘散沙的状况，就向农民介绍城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情况，启发农民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沈定一还经常对农民说：“一根麻秆容易折断，一捆麻秆就折不断，大家要团结，人多力量大。”他还说：“我好比蟹墩，侬（你们）好比蟹脚，大家爬起来就着力哉！”

在沈定一等人的教育启发下，觉醒了的农民开始积极投入捍卫自身权益的斗争。这年5月，在沈定一等人的支持下，农民们捣毁了青黄不接时乘机哄抬米价的“周和记米店”以及附近的米店，迫使粮商恢复原价。接着，他们又通过与绍兴知事的当面说理，争得了原被绍兴官绅把持的萧绍公河西小江的养鱼权和捕鱼权。这些斗争的胜利，使农民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为了唤醒更多的农民投入斗争，沈定一等人从1921年8月开始，先后在衙前、坎山、航坞山北、塘头等地进行演讲。沈定一在演讲时头戴毡帽，身穿农民服，操着当地的方言土语，讲的道理明白易懂，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沈定一等人在演讲中大声疾呼，希望农民尽快觉悟，不要等待观望，赶快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他向农民指出“国家是劳动者的”，“国家主权归你们掌握”，号召农民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土地公有，“你们赶快团结呵！你们精密的组织呵！大地主总有一天会投降你们的！”这些演说具有极大的鼓动力量，许多农民都是第一次听到。他们说听了三先生的讲演，真是“如见天日”，因此这些演说的内容也很

快在萧绍平原的农村中传播开来。

这时，萧绍各地涌现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萧山县的李成虎、陈晋生、汪四十、朱梅云等；绍兴县的单夏兰、沈阿香、王阿二、陈祝生等。农民积极分子的涌现，为建立农民自己的团体——农民协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这年盛夏，衙前的农民听到了湖南长沙农村有个大荒会专吃大户的消息，议论也要建立这样的组织。沈定一十分赞同，他提议农民应该建立农民协会。从这时开始，衙前村便开始秘密组织农民协会。李成虎是办农民协会最积极的人。办农民协会要有领头的农民，他自告奋勇地说："头我来做，我老了，不要紧的！"他还对大伙说："好要大家好，有要大家有，要少交租有饭吃，就要办农民协会。"因此，在他的积极带头串联并组织下，衙前村农民协会于9月中旬首先建立起来。

经过4个多月的思想发动和紧张筹备，1921年9月，衙前农村小学正式开学，衙前农民协会也正式宣告成立。9月26日，在农村小学的开学典礼上，颁布了《衙前农村小学宣言》。《宣言》明确提出，衙前农村小学将为穷人的儿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学校将坚持无产阶级的教育性质，摆脱和摒弃"为有产阶级训练爪牙的教育"。因此，由沈定一独资创办的这所农村小学，只免费吸收农民子弟入学。开学时有学生100余名，分设5个班，一边学文化，一边学习革命道理。

9月27日，衙前及附近一些村子的农民在衙前东岳庙隆重集会，宣告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会议发布了经全村农民议决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章程》。《宣言》指出：世界上的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土地应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章程》共14条，明确指出"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在这次成立大会上，还民主选出了衙前农民协会领导。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以及《宣言》、《章程》的发布，有力地推动了萧绍各地农民协会的建立，标志着衙前农民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衙前农民协会成立以后，萧绍农民听说组织农民协会可以少交租，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都仿照衙前筹建自己村的农民协会。各地纷纷派人来衙前，有的索取《宣言》和《章程》，有的要见三先生，还有的要请三先生等去演讲。每天来五六百人，有的步行，有的摇着大船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来。《宣言》和《章程》分发完后，一再重印。农民们拿到“红绿告示”（即《宣言》和《章程》）后高兴地说：“这张纸头可是个宝贝，是减租的把柄，地主来收租，拿出来一照，地主就二话没说了。”

在短短的一两个月中，萧绍地区先后共有82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在这个基础上，11月24日成立了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

农民协会成立后，领导农民开展了抗租减租斗争。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还发出告示，作出“三折还租”的决议（即按原租额的三折交租）；规定改大斗为公斗（每斗15市斤）量租；取消地主下乡时要佃农负担的“车脚费”；反对交预租，提出种当年地，还当年租，看年成好坏还租。这些减租规定，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减租斗争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减租决议公布后，沈定一首先带头从自家开始减租，扩大了影响。各地开始减租后，地主田主上门收租时，佃户往往就说“先议定租水，再交租”，如果不合农民协会的“三折还租”等规定就拒交。但是地主也常常威胁佃户说：“你们不交租，门板也要拆。”佃农因有农民协会做主，有三先生等人支持，坚决要求减租。萧山南沙二三十个村还联合发表了《萧山南沙组织农民团体宣言》，决心不怕牺牲，誓与地主豪绅斗争到底。这时地主因收不到租，也联合起来，一次集中了80余只收租船，同时分头向农民收租。农民协会闻讯后，立即鸣锣，聚集了1000余农民，高呼斗争口号，向收租船掷泥块石块，吓得地主不敢上岸收租，迫使他们空船狼狈逃走。各地不断发生扣留或捣毁收租船的事件，有的不法豪绅因强行逼租而遭到农民的痛打。为了扩大抗租减租声势，各地农民协会还联合组织农民到萧山、绍兴县城进行“跪香请愿”，要当局体察民情，下令减租。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以单夏兰为首的千余农民到绍兴县城的请愿。虽然这次请愿遭到反动军警的殴辱和驱赶，但扩大了政治影响。

在农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下，地主豪绅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风，许多地主吓得不敢出门收租，有的同意佃农三折还租的要求，有的还向减租农民求情说好话。三折还租以后，许多农民原来一年到头吃糠咽菜，现在第一次看到了完租后剩下的稻谷，全家欢天喜地。萧绍地区风起云涌的

农民抗租减租斗争，搅动了地主阶级的酣梦。他们惊恐万状，并暗中勾结军阀官吏镇压农民运动。1921年12月18日，正值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在东岳庙开会时，100余名全副武装的官兵包围了会场，逮捕单夏兰、陈晋生和龙泉阅书报社管理员孙继良等3人，打伤3人，并搜去了各村农民协会委员的总名册。随后，反动当局派人搜缴农民协会宣言、章程、会员名册等文件，封闭了农协干部的住宅，严禁农民集会演说，强行解散农民协会，并逮捕了农协委员李成虎。方兴未艾的衙前农民运动，在反动派的武装摧残下陷入低谷。

李成虎被捕后，在狱中遭受严刑审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1922年1月24日，李成虎在萧山县狱中被凌虐致死。李成虎是中国现代农民革命中第一个倒下去的英勇无畏的斗士。他牺牲后，遗体运回来，由沈定一出资，葬在衙前村的凤凰山麓。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在他的墓碑上写道：

四山坟墓堆里，找不到第二具；

中国农运史上，这位推第一人。

衙前农民运动，标志着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开启。它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近代农民运动开始走出旧式农民造反的死胡同，进入有领导、有组织、有目标的新式农民运动阶段。它不仅打击了当地的封建势力，而且显示了中国农民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能量，帮助和教育了先进分子，使他们从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正如衙前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宣中华当时著文所指出的：农民一旦组织起来，将成为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如果有人同他们一招呼，一提醒，则枯草遇火，不论山上的、地上的、田里的，都大大地燃烧起来，迎风施威，将不能或遇了！”他还指出：“包含着三四万万农民的中国，农民数目要占人口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中国，如果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仍然把农民遗弃了，这仍是农民的敌对，农民的侵害者！”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毛泽东和湖南农民运动

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与被誉为“中国农民运动之王”的毛泽东的领导分不开的。

毛泽东（1893～1976），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对农民就比较熟悉。早在1919年7月28日，他就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号召农民联合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说：“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还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党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的去求解答。”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主持的湘区党组织在主要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从事农民运动。1923年毛泽东从常宁水口山工人中选派刘东轩、谢怀德二人回到家乡白果开展农民运动。当年9月中旬，在白果召开了一万多人的农民大会，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民组织——岳北农工会，并开展平粜和阻禁地主外运粮食及棉花的斗争，会员迅速发展到10万多人。农会斗争坚持到11月下旬，在军阀势力和地方反动武装、土豪劣绅的联合镇压下，转入秘密状态。岳北农民运动埋下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一颗火种。

1925年2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后，组织领导了湘潭地区的农民运动，先后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建立了20多所农民夜校，宣传革命真理，成立雪耻会20多个，声援五卅运动。当年6月成立中共韶山支部，11月又成立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推动了全省农民运动的发展。同年12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1926年1月1日，他又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民各阶级阶层进行了初步的阶级分析，并且明确提出广大农民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对农民所作的阶级分析，是中国共产党内以至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这个问题作出的比较系统的阶级分析，对于当时的农民运动及后来正确分析农村各阶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骨干。其中一部分回到湖南，极大地促进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到北伐出师前夕，湖南已有农民协会会员4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万人以上，为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5月至6月间，毛泽东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9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更充分地阐述了这一问题：“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1926年11月，毛泽东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开始领导全国农民运动。12月，毛泽东应湖南农民代表大会之邀，回到长沙参加湖南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从工农商学联合战线的角度，再次论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这时，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推动下，席卷全国的农村大革命风暴已经来临，湖南成为这场风暴的中心。到1927年1月，农会会员发展到200余万人，4月又激增到518万多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2500万人。在农会的领导下，千千万万农民被发动和组织起来，向着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展开猛烈的攻击。他们把几千年的封建地主特权打得落花流水，使农民协会成为乡村的唯一权力机关，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他们开展减租减息、退押等项斗争，提高了自身的经济地位；他们拿起梭镖、长矛和大刀，打倒地主武装，建立了农民自卫队；他们展开政治宣传攻势，兴办农民学校，推翻了束缚在他们头上的族权、政权、神权等压迫，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开始动摇了！沉睡了几千年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农民们千百年来第一次扬眉吐气，他们正昂首阔步地奔进在通向翻身解放的大道上！
但“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极力诬蔑农民运动，攻击农民运动是“惰农运动”、“痞子运动”，“糟得很！”共产党内也有人认为农民运动“过火了”。为了回应这些诬蔑和责难，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对湖南农民运动作了考察，随后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这个考察报告中，他热烈地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也根本不是什么“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而是“革命先锋”，给了农民以坚决的支持。在1927年2月16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

在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之后，毛泽东回到武汉，1927年3月7日到6月18日，在武昌主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期间他还参加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和中共五大，主持了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毛泽东在这一段时间极力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并放手让湖南、湖北农民自己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认为，解决土地问题应该分两步：第一步，政治没收，即“没收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第二步，经济没收，“凡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在中共五大上，毛泽东提出“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要求。

但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举起屠刀挥向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的工农群众，土豪劣绅也乘机反攻倒算。如湖南的土豪劣绅利用团防，勾结土匪，大肆屠杀农民，仅在“马日事变”的两天之内，长沙一带被杀害的农民就达一万多人，无数农协会员倒在血泊中。全国各地农民运动陷入了低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毛泽东一面领导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同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对农民的疯狂反扑进行斗争，一面提出“上山”的主张，认为“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可以保存革命力量。但这个主张没有被中央所采纳。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大革命惨遭失败，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也随之失败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

1927～1937年，中国共产党吸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独立领导根据地农民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土地革命，开辟了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长期指导中国共产党，最后使土地革命遭到挫败。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分田分地真忙”

毛泽东在井冈山点燃的星星之火，很快以燎原之势在全国蔓延开来。全国各地纷纷开辟了类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大大小小的红色政权区域。从1927年底到1930年年中，已形成了有军队十余万人、农村革命根据地十几块、遍及全国十几个省的红色地带。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形成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党政权相对立的工农民主政权。到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时，苏维埃政权已拥有红军30余万人，人口上千万。随着各级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苏区广大农民不仅第一次享有参政议政的各项民主权利，直接参与各地乡村苏维埃的政权管理，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在红色政权区域里，到处呈现“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热火朝天景象。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广大农民进行土地斗争的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

1929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到达赣南后，结合中共六大精神，总结赣南土地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将原来井冈山根据地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从而更好地保护了中农的利益。1929年7月，在上杭召开了闽西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在具体政策上作了若干新的规定：要区分大中小地主，并给地主以生活出路；只没收富农“自食以外多余部分”的土地，不要“过分打击”；要使中农不受到“任何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在以乡为单位和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1930年6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长汀南阳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案》，又规定了“抽肥补瘦”的原则。1931年春，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土地为政府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此，2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封题为《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的信，明确指出，土地由农民所有，租借买卖，他人不得侵犯。这样经过几年土地革命实践，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本上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和一整套分配土地的方法。土地革命路线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分配方法为：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第一次解决了在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根本问题，使党能够联合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雇农和中农，集中力量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这条路线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顺利地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

在党的路线指引下，土地革命在各个苏区先后轰轰烈烈地铺展开来。土地革命的步骤一般如下：

第一步，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政权和农会，为开展土地斗争作准备。

要开展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就必须先打倒地主豪绅统治。这是发动群众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分配土地的一项重要准备。各根据地创建伊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就在所到之处打土豪、分浮财，烧毁契约，废除债务，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广泛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建立农民武装和农会，组织以贫雇农为主体的阶级队伍，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使广大农民掌握权力。在工农民主政府中，设立“土地委员会”负责分配土地。土地委员会是由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由5～7人组成，它的成员必须是阶级立场坚定、有多年耕作经验和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贫雇中农。在开展土地斗争时，先由土地委员会进行研究，提出具体方案，再交工农兵政府讨论批准。这些组织的建立，为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

第二步，没收土地。

起初是没收一切土地。中共六大后，规定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财产，对公地和富农的多余财产也加以没收。

第三步，分配土地。

一部分地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种方法有助于争取群众，发动群众，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

一部分地区以劳动力和工具为标准分配。这种方法有助于发展生产，但主要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

中央鉴于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争取群众是最主要的任务，而发展生产是次要的，故统一规定以人口为标准进行分配。

关于分田的步骤和方法，各地颇不一致，但大体上分以下几个步骤：①召开群众大会，讲清分田的道理，并且当众焚烧地主的田契和高利贷债约，这是发动农民重要而有效的措施。烧掉了田契和债约，农民才敢分田。②清查田亩，划分等级。由乡土地委员会组织贫雇农到各家各户调查登记，算出本乡的土地总数、各种等级的田亩数和人口数。③按规定的分田原则分配土地。④宣布分田结果。分田方案提出以后，先开干部会研究，再开群众大会通过，然后张榜公布各户分田数，并在田头插上分田牌，写明该田的地名、亩数、归谁管等，登记造册，发给得田者土地证（证明所有权、使用权）。⑤召开群众大会。

按照以上步骤，土地革命先后在各根据地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到1929年秋冬，闽西根据地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方圆300多里的地区内，有50多个区600多个乡完成了土地分配的工作，近80万农民获得了土地。湘鄂赣、鄂豫皖苏区到1930年底，土地分配基本完成，湘鄂西苏区的土地革命到1930年秋也达到了高潮。

土地革命的开展消灭了红色区域内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广大农民摆脱了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获得了土地，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农民获得土地后，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积极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开垦荒地，使农业生产连年丰收。1933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1932年增加了15%，在闽浙赣边区增加了20%。赣东北农业也搞得比较出色，每年增产15%～20%，群众不但不饿肚子，还自给有余。中央苏区1934年比1933年增产10%多。同时，农民积极参军参战，踊跃支前，为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1932年1月至3月，江西苏区扩充主力红军6984人，地方武装4848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人，合计11832人。1933年，进一步掀起扩充红军的热潮，5月仅在江西省就扩充红军26529人。从1933年2月到1934年7月，中央苏区扩红的总人数有16万人，而整个中央苏区的人口在250万至300万人之间。

土地革命使千万农民成了社会的主人，这对彻底肃清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建立工农民主联盟，都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彻底的土地变革，它砸碎了套在广大农民头上几千年的封建枷锁，使终年受着压迫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广大农民第一次获得了朝思暮想的土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之奋斗却未能实现的事业，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在部分农村发生的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苏区广大农民的热烈支持，成为当时中国唯一能与国民党相抗衡的政党。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土地革命的结束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使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重，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客观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迅速结束“左”倾关门主义，调整各项政策，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全民抗日的历史趋势。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领导集体，结束了“左”倾中央的领导，为调整党的各项政策提供了条件。

在土地政策的调整方面，从根本方向来看，是不断抛弃“左”倾错误，朝着实现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一步一步地迈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要求在农村争取和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地主、富农。与此相适应，也要求改变对地主、富农的政策，即不再把他们当做土地革命的对象，而是当做民族斗争中的同盟者，把过去土地政策的明显的阶级特质，转变为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和民族性的特质。

因此，自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全面抗战，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发展和正式成形，中国共产党也逐步改变了土地政策，主要是停止了对富农一切土地财产的没收，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最后采取了减租减息的抗日土地政策，这意味着实行了十年之久的土地革命的结束。

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在中国局部地区进行的一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农民运动，它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土地革命的实行，使得革命根据地突破了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社会的框架，在中国局部地区实现了“绿色崛起”（亨廷顿语）。正是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变革中国社会和引导农民走上翻身解放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土地革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与农民建立了牢固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打下了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和最终取得胜利的最稳固的基石！

1 减租减息

1937年全民抗战开始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了调动亿万农民和开明地主分子的抗日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决定改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实行的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给农民的土地革命政策，而实行减租减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正式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写进《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公布于众。10月16日，刘少奇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将党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政策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抗日根据地的十大土地政策：没收汉奸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逃走的地主的土地，无租息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地方公有地分给农民；普遍减租，规定最高租额；保障永佃权；认真办理水利及救灾；协助农村合作社的发展；保障农民有组织农民协会的自由；惩治敲诈盘剥农民的土豪劣绅；禁止高利贷；等等。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土地政策指引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但在抗战初期，各根据地尚处于创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政策尚不完善、具体，广大农民未能充分发动起来，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或“左”或“右”的错误，要么对群众工作不够重视，要么对地主联合不够而打击过重，因此初期的减租减息运动总的看来进展较为迟缓，发动不够普遍，开展不够深入，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起来。

到1942年，中共中央和各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大力加强对减租减息工作的领导，广泛深入动员农民群众，不仅完善了减租减息政策，而且使之在各地得到普遍贯彻执行，从而使减租减息运动在敌后根据地广泛开展起来。

为了普遍和彻底地实行减租减息，中共中央在总结前一段减租减息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于1942年1月和2月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执行此项决定的三个附件，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系统、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理论、政策和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实行的土地政策，简而言之，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依据如下。

农民（包括雇农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必须依靠农民，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地权、政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

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士绅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所以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人权、地权、政权和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实行一致抗日。只是对于坚决不愿悔改的汉奸分子，才采取消灭其剥削的政策。

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不但有抗日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所以对富农应采取削弱其封建部分（减租减息），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并保障富农的人权、地权、政权和财权。

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政策，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关于实行“二五”减租问题。以抗战爆发为界，减租是减以后的。所谓“二五”减租，即按照原租额减去25%。在游击区及敌占点线附近，可低于“二五”减租，只减二成、一成五或一成，以能相当发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及团结各阶层抗战为目的。

二是关于佃权问题。如租用契约及习惯上有永佃权者，应保留之；无永佃权之约定者，不应强迫规定。但在抗战期间，地主收地退租，应顾及农民生活，应由政府召集租佃双方加以调剂，或延长佃期，或只退佃一部分，如承租人于两年内无故不耕或力能付租而故意不付，出租人则有权收回土地。

三是关于债务问题。以抗战爆发为界，减息是减过去的，对于抗战前成立的借贷关系，应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如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原本两倍者，本利停付；对于抗战后的息额，“应以当地社会经济关系，听任民间自行处理”，政府不宜规定过低息额，致使借贷停滞，不利民生。

以上土地政策，是四年多来减租减息实践的总结，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战土地政策的完善和成熟，推动了各地减租减息活动的普遍健康开展。

从1942年初开始，各根据地普遍出现了一个贯彻中央决定，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高潮，减租减息运动发展为一场普遍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农民群众充分的组织发动和普遍参与，是1942年以后减租减息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刘少奇曾总结了当时华中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的步骤和方法：

派工作团下去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先是选择几个中心县，在中心县里，找二三个中心区，在中心区里，找二三个中心村，把大多数干部和最强的领导干部派到中心县、区、村去。中心区、村的干部，开始做宣传工作，沿村宣传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在中心区、村，集中力量发动群众，突破一点，打开局面。非中心区、村则及时宣传中心区、村进行减租减息的成绩和经验，造成声势，相互呼应。

“中心区、村在开始发动群众时，由政府与工作团负责人访问地主，召开士绅、地主座谈会，说明群众运动要求，讲清政策，减少顾虑，同时工作团挨家挨户访问农民，和农民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注意发现积极分子，通过积极分子联络和发动广泛的群众。在群众酝酿成熟的基础上，召集全村农民大会，讨论和决定有关问题，选举农会筹备会。应找出当时当地农民最迫切的问题下手（比如借粮），通过这些斗争的胜利，提高农民的热情和信心。还应加紧教育和训练积极分子，然后成立农会，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中心区、村减租减息的影响一传开，非中心区的农民也自动起来了，也要求组织农会。这就是非中心区被中心区所推动，这时候，中心区、村即可留下一部分干部做巩固工作，其他干部转移到非中心区。这时到非中心区，群众就会自己找上来了。一个月到两个月，就可发动千百万群众，形成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潮流。”

这样，广大农民被广泛地动员起来了，树立了农民在乡村的政治优势，迫使地主阶级不得不接受政府的减租减息法令。在减租减息过程中，广大农民为保佃减租，还依据法律与地主进行说理的斗争，这种斗争方式人们称之为“斗法”。在抗日民主政权支持下，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法”，不仅能够有效地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而且在法的约束下，可以避免一部分农民拒不交租交息和无端侵犯地主地权、财权和人权的“左”倾现象，有利于农村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随着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的发布，减租减息运动发展到以“查减”（检查减租政策的实施情况）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在各根据地普遍深入地进行减租减息运动的过程中，广大农民迎来了抗战胜利的到来。

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改善了农民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在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有力地支持了长期的民族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由于同时坚持了交租交息，保障了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所有权，一部分开明士绅还参加了民主政权和管理工作，使农村阶级关系得到缓和，从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租减息削弱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引起了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变动。许多贫苦农民因为减租减息改善了生活条件和经济条件，以买进、典进和赎田等方式获得一部分土地，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量大为减少，农村地权由原来集中走向分散。与此相联系，农村中贫农和雇农的数量大大减少，中农富农的数量显著增加，地主的数量明显下降，过去农村阶级结构中的两极分化转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这就为进一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兵民是胜利之本”

毛泽东说过：“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民众之中，中国的抗日实质上就是农民的抗日。”抗日根据地的农民，经过减租减息运动，经济上初步翻了身；经受了民主运动的洗礼，在政治上站了起来。他们的抗日积极性也随之高涨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全民抗战的时代激流中去。

“解放区呀么嗬嗨，大生产呀么嗬嗨……”各根据地农民唱着这首嘹亮的歌曲，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兄妹开荒，劳动竞赛，到处都是一片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正是广大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投入生产，才使根据地做到“丰衣足食”，保障了前线供应，维系着抗日根据地的存在，支撑着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

“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军民鱼水一家人，根据地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每逢节日和收获之时，广大农民穿红挂绿，敲着锣，打着鼓，牵着牛，拽着羊，支援前线的八路军奋勇杀敌、收复失地。“天上有星星，地上有咱八路军；八路军呀千百万，赛过天上众星星”。这是根据地广大民众对八路军的热情歌颂。在广大根据地，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情景到处可见。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广大农民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病员，全力支持子弟兵打鬼子，出现了“子弟兵母亲”戎冠秀那样的杰出的双拥模范。在“千里无人区”，也广泛流传着“当代佘太君”邓玉芬大娘的事迹。邓大娘是丰滦密中心区张家坟南猪头岭人，她和丈夫任宗武含辛茹苦地扶养着7个儿子。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丈夫先后把大儿子任永全、二儿子任永水、三儿子任永兴送去参加游击队，她和丈夫也都成了村里抗日骨干分子。后方医院设在她家，老两口就成了伤病员最贴心的护理员。当时子弟兵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猪头岭上有个温暖的家，家里有一位亲切慈祥的邓妈妈！”1941年秋敌人发动万人大扫荡，疯狂制造“无人区”。地方上成立了民兵组织，邓妈妈又把不够参军年龄的四儿子任永合、五儿子任永安送去参加了民兵，同他们的父亲一起战斗在“无人区”里。在敌人一次突

然袭击中，丈夫和五儿子被杀害，四儿子被抓走。当时被组织上安顿在长城内基本区的邓大娘，悲痛欲绝，她谢绝了同志们和乡亲们的挽留，毅然带领着小六、小七回到已成为“无人区”的猪头岭，坚持抗日战争。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大儿子牺牲在战场，二儿子战斗负伤后死在家里，四儿子惨死在劳工集中营中，小六在兵荒马乱中走失。邓大娘当时身边只有最小的儿子了。邓大娘眼里已没有泪水，只是默默地夜以继日地操劳，春种秋收，做鞋缝袜，支援前线，照顾伤病员。她将满腔的仇恨和悲痛埋在心里，暗暗祝福小儿子快快长大成人，替丈夫和儿子报仇。1944年春日军搜山，为了保护父老乡亲，邓大娘用烂棉絮塞进病重的小儿子的嘴里，以免哭出声暴露目标，最后小七活活憋死在母亲的怀抱里。邓大娘见此惨景昏厥于地。她在小儿子坟前守了一夜。当曙光照红了万里长城，坚强的邓大娘，这位“当代佘太君”，又一次战胜了巨大的精神创伤，重新站了起来。邓大娘是无数英勇支援抗日的亿万农民的代表。正是千千万万个邓大娘，以他们的血肉之躯筑成了一道新的长城，支撑着中华民族。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根据地的农民除了在后方生产支援前线外，还踊跃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广泛武装起来，组织起来，一方面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一方面拿起简陋的武器，和敌人拼杀搏斗。为了配合八路军作战，根据地的每一个人都充分动员起来，以至敌人心惊肉跳地说：“冀中每个老百姓都是八路军！”在根据地，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民兵们在大路旁、田野里掩埋地雷；老大娘坐在树荫下做针线放暗哨；小孩子手拿红缨枪查路条。晋察冀根据地的一首《交通战》民歌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民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场面：“模范队，青抗先，拿上镐头和铁锹，到处开展交通战。破坏铁路割电线，铁线网络都割断。汽车路，封锁线，截断捣毁莫迟延。鬼子交通没法办，我们好打歼灭战，管叫鬼子要完蛋。”千万农民在同日军作战时发扬了英勇献身的精神，他们成功地运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爆炸运动”等作战形式，发挥自制的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的威力，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保卫了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组织起来，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水上雁翎队、敌后武工队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外，开辟了极为广阔的敌后战场，使日军真正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也使人民革命获得了坚实的基地，不仅加速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而且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亿万农民还一再掀起参军热潮，使八路军、新四军由初期的5万余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20余万人，极大增强了人民革命武装力量。正是亿万农民广泛地动员起来，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得到高度发挥，他们满腔热情地投入全民抗战，才最后赢得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自卫战争的伟大胜利。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不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赢得了亿万农民的衷心支持。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达一亿多人口，这是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牢固基础，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全民族抗战的形势下的继续运用和发展。“日头花，圆溜溜，朵朵花儿朝日头，晋察冀百姓千千万万，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两首不同地区的歌曲，道出了根据地亿万农民的心声，表明中国的农民已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农民的向背，决定着中国的前途。经过抗战，中国农民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他们翻身解放的带路人，这实际上已提前宣告了国民党政权最终覆亡的无可奈何的命运……

1 反奸清算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和平民主方针，力争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国内和平。为适应这种政治形势，从1945年9月到1946年4月，解放区在农村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同时开始没收与分配敌伪土地。这一时期的减租减息运动主要是以反奸清算为内容展开的。

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在《减租和生产是保护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目前我们的方针，仍然是减租减息而不是没收土地。”12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指示，重申减租政策，指出“在一切新解放区，要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在老解放区，则应复查减租减息，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1945年冬到1946年春，各新解放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运动，老解放区则发动群众，开展查租查息工作。

新解放区，由于长期遭受日伪统治，农村的土地关系极为复杂。一部分土地曾为日伪所占领，如东北地区，仅“满拓地”、“开拓地”即约占东北耕地面积的12%；其他部分土地多为地主、富农所有，其中有些地主被农民称之为“昭和地主”，即依仗日本人势力发展的汉奸地主，战后这些地主与敌伪残余势力相互勾结，继续作恶，欺压农民，妄图复辟。故而，新区的群众性减租减息运动是围绕反奸清算运动展开的。

从1945年9月起，在华东、华中、华北各新区普遍开展了反奸清算运动。各地提出了“打倒汉奸！打倒国民党特务！打倒恶霸！讨回八年血债！打狗腿子找狗头，打小鬼抓首恶分子！”的反奸口号。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各地召开了群众大会，把汉奸及其后台拉到大会上示众，让农民控诉他们的罪行，然后予以处置。各地群众从惩办罪大恶极的汉奸卖国贼入手，清算奸伪的迫害凌辱，清算奸霸贪污霸占，清算地主转嫁的敌伪负担，清算额外剥削，清算黑地等。在斗争中，把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使群众不但得到了一些经济利益（汉奸的财产），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而且提高了政治觉悟，逐步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开始提出减租要求。各地民主政府积极满足这种要求，并依据中共中央1945年11月7日的指示精神，相继公布减租法令，结合反奸清算，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这次减租减息运动由于和反奸清算斗争相结合，起动快，声势大，很快形成高潮。到1946年春，各区参加运动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50%。如在山东蒙阴地区，1946年3月5日有20余万人参加减租运动，80%的农民从汉奸、恶霸、地主手中分得或赎回土地，40%的农民参加了群众组织。

随着运动的深入，日本投降后开始的激烈的“反奸运动”，逐渐发展成对土地制度的进攻。起初，许多农民积极分子把“反奸运动”仅看做是对战时所受损害的一种报复。他们痛恨汉奸，希望把汉奸打倒，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只是无秩序地自发地对汉奸复仇，杀汉奸，没收汉奸财产。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农民开始认识到“反奸运动”仅是向地主阶级发动全面进攻的前哨战。经过减租，广大农民开始自觉和有计划地向地主阶级进攻了。这首先是从没收与分配敌伪土地开始的。斗争重点的转移，使20年前开始的、因抗战而推迟了的土地革命，又一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这场斗争。1946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了《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规定：所有东北境内的一切日伪地产，开拓地、满拓地及日本人和大汉奸所有地，应立即无代价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所有。为适应当时国内和平形势的需要，还特地规定：“保护人民之财权地权，除敌伪地产及日人和汉奸地产外，任何人不得非法侵占。”这就明确指出除敌伪土地外，对一般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不予变动。在这个指示发布后，东北各级民主政府发布命令，公布处理公地的办法，组织干部下乡发动农民分配敌伪土地。在斗争中，一般都坚持了：第一，把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反对“地归原主”和“原佃优先”的主张，因为敌伪土地原主有的是地主、富农，原佃户亦多属富农或富裕的中农；第二，在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强调依靠贫雇农，注意团结中农，孤立破坏分地的地主、富农分子；第三，基本上采取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

其他新解放区也开展了没收和分配敌伪土地的斗争。华中解放区，对敌伪占领的土地采取了廉价放领的政策，最高者不及普通地价的50%，最低者为普通地价的10%；在山东新区，对敌伪土地没收后，按先佃户、后抗属、再贫农，先贫后富，先群众后干部的原则实行分配；晋绥区规定：凡敌伪强占的土地应退还原主。

通过反奸清算运动，广大农民获得了不少“斗争果实”。如山西省潞城县张庄，广大农民从大大小小的剥削者手里没收了总共1300多亩土地，还从各种机构手中没收了300多亩土地，这些土地占全村土地总数的1/4还多。牲口、农具、粮食、房屋的情况也是如此。没收的牲口有26头，占全村所有大牲口的一半多；村里总共有800间房子，没收的就有400间；没收的屯粮在100吨以上。此外，还有好几百块银元，许多珠宝首饰，几屋子家具，几十件农具和成百套衣服。

在新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同时，老解放区开展了查租查息工作。老区虽在抗战时期实行过减租减息，但由于地主的破坏和干部的麻痹情绪，发动群众不够深入，所以减租工作存在着不彻底现象，如减租后地主夺佃，或明减暗不减，或减租后不订租约，负担不公平等。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要求各老区必须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查减”工作。

查租多以自然村为单位，重点教育干部克服麻痹思想和太平观念，并用算账对比、回忆诉苦和说理等方式启发佃户，使他们克服“变天”的思想顾虑，勇于同地主进行斗争，深入减租、保佃，同时把查租与生产结合起来。

查租减租斗争的开展，使老解放区农村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进一步减少了，贫农、雇农、中农的经济地位上升了。农民的阶级觉悟也随之提高，不断克服“信天命”的封建思想，相信共产党，相信组织起来的力量，使他们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睡在自己的房屋里，走在自己的土地上，撒着自己的种子，盼望着自己的收成。

这一时期的减租减息运动，已初步向解放区的中国农民展现了一个崭新世界的蓝图，吸引他们去为这个新世界的完全实现而英勇奋斗！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减租减息运动，开了解放战争时期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的先声！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中国土地法大纲》

“五四指示”发布以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果，但由于“五四指示”作为一份过渡时期的历史文献，其本身存在着局限性，使得土改工作进行得不彻底，加之约有1/3的地区尚未着手进行土地改革，这种状况已远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革命形势。尤其到1947年夏，中国革命战争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全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为了总结前一段时间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加快土改工作的步伐，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刘少奇主持下，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普遍实行平分土地政策，并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并于同日公布了《大纲》及《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大纲》的公布，标志着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平分土地阶段。

《大纲》以斩钉截铁的语言，宣布了封建土地制度的死刑：

第一条，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第二条，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第三条，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

第四条，废除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一切债务。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此时所要实行的是全面、干净、彻底地消灭农村的封建制度，土地必须“回老家”——为耕种的农民所有。

关于分配方式，《大纲》在第六条和第八条作了明确的规定：

第六条，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

第八条，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个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

《大纲》还规定：土改的执行机关，是“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组织人民法庭，以保障土改的实施。

《大纲》是发动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彻底反封建的土地纲领，是亿万农民翻身解放的宣言书，是照亮国统区农民通向解放的灯塔。它表明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绝无和解的可能，把人民战争的主要目标从保卫解放区转移到在全国范围内打倒地主和买办阶级，促使了蒋军大批地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推动了国统区农民的反抗斗争，鼓舞了国民党后方都市中工人、学生、商人和职员的示威运动。但《大纲》中彻底平分土地的原则，则反映了对农民平均主义的迁就，滋长了土改中“左”的偏向。

全国土地会议以后，各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大纲》的指引下，自1947年冬开始，掀起了平分土地运动的高潮。各解放区派遣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宣传《大纲》。《大纲》在广大农村很快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平分土地！”“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在解放区的大地回响。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各乡村建立了一个由绝大多数贫农和中农所组成，并由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干部担任领导的巩固的农会；建立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社会各阶层的村代表大会及其委任的村干部（如村长、文书、民兵队长、治安主任和民政主任）组成的村公所。在这些组织建立后，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划分阶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级成分。划分阶级成分一般经过三个步骤：先由贫农团全体人员划分全村人口的阶级成分，然后由农会的全体成员再划一次全村人口的阶级成分，最后由村人民代表大会对全村人口的阶级成分作第三次即最后一次划分。在划分阶级成分以后，依据《大纲》的有关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平均分配土地。各地平分土地，多以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具体做法不一。有的地方采取“打烂平分”的办法，即重新丈量土地，评级，按人口平分；有的地方在原耕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抽近补远的抽补调剂办法；有的地方采取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方针。

平分土地运动从1947年11月起，到1948年春基本结束。这次运动的特点是全党全民动手，行动快，声势大，范围广，许多地方75%～85%的农民参加了运动，因此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更为普遍彻底，90%以上的地区实现了大体平分土地。

随着平分土地运动的高涨，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开始泛滥，导致运动中出现了严重扩大打击面的“左”倾错误。这些错误主要表现为：错误地把许多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对地主富农家庭滥用暴力，采取“扫地出门”的没收办法，片面强调挖地财；严重侵犯工商业，特别是地主富农的工商业。

面对土改中存在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及时发出指示进行纠正。1947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重发〈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两个文件的指示》；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作了《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了土改中“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及其产生原因，提出了纠正错误的原则及方法；1月1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文件，规定了进行土改的具体政策；4月1日，毛泽东发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强调：“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

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不是抽象的公正，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发展生产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才是革命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经过中国共产党这一系列纠偏举措，到1948年春，各地结合春种，调剂土地，使“左”倾错误逐步得到纠正。从1948年6月到8月，东北、华北、华东、西北等老解放区行政委员会，分别发出颁发土地所有证的指示，明确指出各老区的大多数土地改革业已完成，为保障个人土地所有权，特颁发土地所有证。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至此基本胜利结束。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参考书目

1.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中、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龙盛运主编《清代全史》第7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3.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4.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5.杜春和编《白朗起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6.郭德宏著《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

7.成汉昌著《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

8.中共浙江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衙前农民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9.蔡洛等著《彭湃传》，人民出版社，1986。

10.郑德荣、朱阳主编《中国革命史长编》（上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史话》主要编辑出版发行人

总策划 谢寿光 王正

执行策划 杨群 徐思彦 宋月华

梁艳玲 刘晖春 张国春

统筹 黄丹 宋淑洁

设计总监 孙元明

市场推广 蔡继辉 刘德顺 李丽丽

责任印制 岳阳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北洋政府史话》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洋政府史话/潘荣，魏又行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8

（中国史话）

ISBN 978-7-5097-1981-7

Ⅰ.①北… Ⅱ.①潘… ②魏… Ⅲ.①北洋军阀政府-史料 Ⅳ.①K25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1373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话·近代政治史系列

北洋政府史话

著者/潘荣 魏又行

出版人/谢寿光

总编辑/邹东涛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010）59367215

电子信箱/renwen@ssap.cn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责任编辑/宋荣欣 孔军

责任校对/刘静

责任印制/岳阳

总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5.5

版次/2011年8月第1版 字数/101千字

印次/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1981-7

定价/1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

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2011年4月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目录

引言

一 北洋政府的建立与洪宪丑剧

1 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的形成

2 北洋政府的建立

3 袁世凯独揽政权

4 洪宪丑剧

二 皖系当政与北洋派的分裂

1 段皖当政

2 府院之争

3 张勋复辟

4 冯段斗法

5 副总统难产

6 徐段失和，政潮迭起

7 皖系统治垮台

三 曹吴当政与贿选丑剧

1 亲家变冤家

2 “法统重光”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曹锟贿选

4 直奉再战

四 短命的执政府与安国军政府

1 夹缝中的段执政

2 奉直两系的明争暗斗

3 短命的安国军政府

参考书目

一 北洋政府的建立与洪宪丑剧

1 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的形成

在清政府没有设立“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之前，“北洋”、“南洋”只是地域上的概念。清代文人包世臣在《海运南漕议》一文中说：“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殖民势力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略进一步加深，为综合管理一切与外国交涉事务及与之有关的各项“洋务”，清政府于咸丰十年（1860）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不久又设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北方口岸对外交涉和通商事务。因对外通商事务不断扩大，同治九年（1870）三口通商大臣撤销，改设北洋通商大臣（简称“北洋大臣”），并加“钦差”名义，例由直隶总督兼任，管理直隶（含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通商交涉事务，兼督海防并办理其他“洋务”。北洋大臣在不封海期间驻天津，冬天封海期间则驻保定。天津海口冬季封海时间很短，所以北洋大臣多半时间驻天津。依据上述事实可以说，北洋大臣的设立表明清政府机构正在向适应资本主义列强的方向发展。

北洋大臣和例由两江总督兼任的南洋大臣虽都由地方总督兼任，但由于直隶总督握有控制近畿地方的实权，所以前者对清政府内外政策的影响当然要更大一些。19世纪后30年，北洋大臣基本上为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所把持。1901年11月，李鸿章临终时，曾口授遗疏保荐老部下袁世凯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而当时列强各国，也都看好袁世凯。例如李病逝后，德国公使穆默曾专程跑到武汉，敦促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清廷，保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此时掌握清廷实权的西太后见袁氏既熟悉洋务，为洋人信赖，又年富力强，便在李鸿章死去当日，下令由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不久又加赏太子少保衔。对这件事，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曾经作出这样一句尖锐的、脍炙人口的评价：“卖国衣钵传授有人，老贼死了等于不死。”

年届不惑的袁世凯不仅受到洋人青睐，而且得到数位元老重臣的举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荐，当然并非偶然，与其家世、经历及以往“业绩”等一系列的因素都有些关系。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别号容庵，出身于豫东世家大族。其叔祖袁甲三以在安徽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漕运总督，父亲袁保中虽未入仕途，但叔父袁保庆官居道台。堂叔袁保恒位居侍郎。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胞叔袁保庆做嗣子，备受父辈娇宠。同治十二年（1873），袁保庆病故于南京江南盐道任上，时任户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又把他接到北京教养。这样他从少年就耳濡目染了官场的种种权术，对其后一生的为人处世产生莫大影响。光绪五年（1879）袁保恒染时疫暴亡，袁世凯在京城失去靠山，只好携眷归乡。1876年、1879年他两次参加河南乡试，均名落孙山，于是一怒之下一把火烧光以往所作文章，决心弃科场，另走投笔从戎以军功发迹之路。

光绪七年（1881），袁世凯率叔祖旧部数十人赴山东投靠嗣父袁保庆的挚友淮军统领吴长庆，受到吴的提拔重用，很快就当上了庆军营务处帮办。此后又随同吴赴朝鲜，在1882年和1884年朝鲜的两次内乱中，因能随机应变，受到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赏识。1885年10月，清政府任命袁出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此后他在这一重要的交涉岗位上盘桓近十年，竭力推行李鸿章的外交政策。1894年7月中旬，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托词结束在朝鲜的使命，返回国内。战后，他见李鸿章因妥协乞和受到朝野谴责，行将失势，便加紧攀附其他显贵。不久通过西太后的宠臣荣禄等保荐谋得编练天津小站定武军的重要差事。1894年底，清政府委派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天津东南约70里的小站组建定武军。袁世凯到小站接手时，胡已组建起一支4700余人的新军。袁到任后，立即派人到华北添募步骑兵2500人，很快建成一支总数为7000余人的新式陆军——号称“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按德国陆军建制编为步兵五营，炮兵、骑兵、工兵各一营，另外还配有一支后勤部队。全军武器全部购自西洋，并延聘德国军官十余人任教官，按德国军事操典训练；各级军官大部分出身于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至1896年春武备生在该军中充任官佐者达130余人。就是这些人日后成为北洋军的核心——小站将弁。其中最著名的段祺瑞、冯国璋与王士珍等三人被称为“北洋三杰”。

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为其进一步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袁军在19世纪最后三年又两次得机扩编。当袁还未得督练新军美差之时，曾插足维新运动。在开始督练小站新军时，他脚踏两只船。到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要与维新派摊牌时，他见光绪帝势弱，便出卖了维新派。袁世凯能见风使舵，更得荣禄赏识。因此当1899年初荣禄设立北洋军务公所，将分驻京畿内外的毅军（宋庆部）、新建陆军（袁部）、武毅军（聂士成部）和甘军（董福祥部）改编为武卫左、右、前、后四军时，又允许袁部增兵两千，使所部兵力达到五位数。

袁军第二次扩编是1899年底袁世凯得署山东巡抚以后。19世纪末，原为民间反清秘密组织的义和拳逐步转变为以反洋教为主要宗旨的民众团体。山东巡抚毓贤无力剿办，便改义和拳为团练，遂使义和团席卷全省。这一形势令西方公使大为恐慌，屡次要求撤换毓贤。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1899年底清政府任命袁署理山东巡抚。袁到山东后，立即着手改造山东练勇，编成兵力近万的“武卫右军先锋队”。这样，加上武卫右军，袁统率的武装部队超过两万人，成为北方兵力最强的一支武装。西太后等流亡西安期间，袁最先解送京饷10万两银子，以示效忠。在清政府筹划庚子赔款之时，各省督抚均苦于无款可筹，拟请减少摊派数额，唯袁世凯不仅能筹足赔款，还在烟酒等税中提取了练兵经费。因此，他在李鸿章死后，不仅继承了李任北洋大臣时的权势，而且在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推行“新政”时起到带头羊的作用。

1901年5月，袁世凯最先提出新政意见十条，要点是充实武备、改进财政制度、开通民智、派留学生等等。

此后不久，他就奉命署理直隶总督，并先后兼任督办政务处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会议修订商约大臣、练兵处会办大臣、督办京汉路大臣以及督办电报事务大臣等职。可以说，在清末十年中，众多“新政”措施都是从直隶省由袁世凯推行到各省的，不仅编练新式陆军，他如创办巡警、开办新式学堂等举措也均如此。而袁世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扩张势力，形成了一个以己为首的庞大的北洋派系。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集团最大的政治资本当然莫过于北洋陆军。在其升任直隶总督后，他即派人赴冀南选募壮丁6000余人，编成10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营“新练军”。1902年6月，他在保定稍事整顿后，便设立北洋军政司（1904年改称督练公所）作为直隶省编练新军的指挥中枢，自兼督办。次年5、6月，军政司在保定组成北洋常备军左镇。这是全国最早成镇的新军，规模相当于民国时期的陆军师。1903年底至次年春，袁又以保阳练军马队及驻马厂的北洋亲军为基础，添募人马，编成北洋常备军右镇。清政府于中枢设立练兵处后，袁世凯任会办大臣。从表面看来，练兵处大权掌握在练兵大臣庆亲王奕劻手中，但实际并非如此，昏庸的庆亲王奕劻早已被袁买通。练兵处成立不久，奕劻便以“衰迈多病”为由，奏请西太后，责成袁世凯“悉心经营”。从练兵处办事机构的组成，就可以看出袁氏对练兵处的控制程度。袁的挚友，实际为北洋集团二号人物的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练兵处下设军政、军令、军学三司，而各司正副使的任命始终不出前述“北洋三杰”和家兵家将的小圈子。1904年，袁在“会办”督练新军的名义下，又先后编成北洋军第三、四、五镇。是年夏，清政府将新军改称陆军，并统一番号。京旗常备军称陆军第一镇，原北洋常备军左、右镇分别改称陆军第二镇和陆军第四镇。原第四镇改称第六镇。第三、第五两镇仍用原序号不变。至此，拥有当时全国最精良武器的6镇新军在袁世凯的领导下正式编成，共7万余人，其中除第一镇是旗兵，袁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5镇可说都在袁一手拉扯起来的徒党领导之下。就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特别是编练新军过程中，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形成并坐大，其主要成员文有徐世昌、赵秉钧、唐绍仪、朱家宝、梁士诒、朱启钤、孙宝琦、章宗祥等，武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人。我们下面要讲述的关于北洋政府的史话，从狭义上讲，就是这些人在清廷灭亡后把持政权，而又彼此争权夺势，祸国害民的历史。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势力能在清政府推行“新政”时期迅速膨胀，首先是袁世凯抓住时机，扩大军事实力的结果。自从湘、淮军兴起，汉族官僚的权势往往取决于手中握有军队的强弱多寡，袁氏深谙此中窍要。其次，袁世凯在办“新政”的过程中，极力插手路矿通商事务，不仅获得扩军所需经费，而且为其买通庆亲王奕劻等提供了财源。奕劻（1838～1917）是清朝获得世袭罔替封号的少数亲王（这种亲王俗称“铁帽子王”）之一。1903年3月他入值军机处，成为朝中最有实权的领班军机大臣。奕劻的昏庸和贪婪是有名的，自掌权之后，一直公开受

贿。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行贿者只要用红纸封装上银票，当面呈交给他，说一声“请王爷备赏”。他接阅银票后就回答：“您还要费心。”说毕塞进坐垫下，一场交易就算成功。袁世凯把持北洋范围的路矿、邮电等官办实业以后，财势雄厚，于是便利用奕劻爱财如命这一点，极力向他行贿，并和奕劻结成死党，把持朝政。总之，袁世凯和北洋势力得以在军事、外交、路矿、财政、教育各方面得到伸张，都得到奕劻的支持和默许。从外因上讲，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兴起则与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如前所述，李鸿章去世后，列强都把目光集中到既富权术又拥有相当实力的袁世凯身上。英国和德国的几任驻华使节都与袁过从甚密。1902年底至1905年，袁世凯的北洋派先后从以主持淮军粮饷起家的大买办盛宣怀（1844～1916）手中夺取招商局、电报局、沪宁路和中英银公司等一系列大型洋务事业的控制权，均得到英国在华势力的极力支持。而自镇压义和团以后，日本与英国结成联盟，也指望着袁世凯能成为帮助扩大日本在华势力的代理人，因此，向北洋地区派出大批顾问、教习，支持袁世凯的“新政”。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北洋政府的建立

武昌起义爆发后仅4个月，反动的清王朝就垮了台。这个维系了260多年的封建王朝迅速土崩瓦解，从外部讲，当然是同盟会领导的反清革命打击所致，但内部溃散的因素也不可小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05年以后，顽固的满族亲贵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剧烈斗争，严重地削弱了清中央政权，为反清革命力量造成进攻的“缺口”。

如前所述，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势力迅速扩张，至1905年北洋六镇建成后大有以北洋系控制朝廷，挟朝廷号令全国之势。尽管袁本人一直竭力设法减少满族亲贵的猜忌，但北洋势力的扩张对后者的政治垄断地位所造成的威胁，是无法掩饰的事实。1906年9月，袁世凯进京参加讨论改革官制，一些人在袁指使下提出取消军机处，改设责任内阁，遭到以铁良为首的少壮亲贵的强烈反对。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气氛十分紧张，以至有人担心双方会大打出手。后由西太后亲自拍板否定袁世凯等建立责任内阁的主张，仍设军机处，形式上宣布政府各部尚书满汉不分，但实际上在11个部中，汉官只有5人，满蒙贵族则有6人，而其中最关键的陆军部则由少壮贵胄的中坚人物铁良出任尚书。嗣后不久，清廷便宣布由陆军部接管全国陆军。近畿北洋六镇自然被列在陆军部接收对象之首。袁世凯深知自己权势过显已引起最高统治者们的不安，只好将北洋陆军一、三、五、六4镇指挥权交出来。不久，在少壮贵胄的鼓噪下，西太后又以军机处“旧人不足应付”为由，将袁调进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与此同时，另一声望高权势重的地方大员、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也被调入军机处。自太平天国运动被湘淮军镇压以后，对汉族地方大员来说，内调中央就是明升暗降。庚子事变以后清政权内轻外重的格局更加严重，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给清中央政府以沉重打击，而各省督抚的权力却增长不少。《辛丑条约》订立后，巨额赔款全靠各省分担，从而使清中央政府更加软弱无力。地方重要督抚，尤其是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不但握有一方军、政、财大权，而且办理相当一部分对外交涉，可以得到洋人的奥援，对清廷的政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晚清军机大臣的地位只是表面高高在上，实则只能承旨办事，对朝廷大政方针

的影响往往不如有实权的地方大员。

当然，袁世凯被调军机处后兵权虽被削去，但北洋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其多年精心培养出来的心腹，而中央各部的尚书侍郎和北方各省的督抚大员也半为其朋党亲谊，西太后又相当信任他，所以那几年袁在清廷中仍是拔尖的人物。只是到1908年11月中旬，光绪帝和西太后在两日内先后病亡时，他确实经历了一次脑袋差点搬家的危险。

西太后垂危之际，安排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年号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掌握军政大权。如前所述，载沣对北洋系势力不断扩张疑忌已久，一旦大权在握，再也不能容忍袁世凯继续盘踞要津。按他本人的愿望，不仅要将袁打入冷宫，而且要诛杀袁并重惩其党羽。但当他征询满汉重臣意见时，其主张不仅遭到奕劻竭力反对，一向与袁不和的张之洞也连称不可。这样，少谋寡断的载沣怕在内政外交上引出自己不能应付的麻烦，只好将袁驱逐出朝了事。随后，袁的几个重要党羽如唐绍仪、赵秉钧、陈璧、梁士诒等相继被罢官，王士珍、严修等则自请开缺。

以载沣为首的少壮贵胄扫除袁党可谓不遗余力，但北洋势力盘根错节，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清除殆尽的。袁世凯下台后，退居河南乡间，自称将不问国事，终老林泉。但实际上这只是他的韬晦之术，他倚仗着朝野的潜势力和某些帝国主义分子的青睐，一心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

袁世凯被逐使本来已十分虚弱的清贵族统治更加动摇。富有机谋的西太后当权时，尚要顾及朝廷大臣中满族亲贵与汉官的比例，以缓和上层的满汉矛盾。既无经验又无魄力的载沣竟想仅以皇族集权的简单办法来确保满族贵族的统治地位，当然只能加速清王朝的最后瓦解。徐世昌晚年曾感慨地指出，晚清袁世凯、张之洞和他本人各督一方，本可相安一时，都是那些少不更事的小王爷们（指载沣等人）把局面搞坏了。如从内溃是清王朝瓦解的主要因素之一来看，此话有一定道理。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时，袁世凯的家人正为袁准备次日的庆生宴（袁的生辰为农历八月二十日，在辛亥年阳历为10月11日）。武昌城被起义军占领的消息传到袁所居住的彰德洹上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村时，袁家满座亲朋正在觥筹交错之际。袁世凯闻讯大惊，即命撤宴，停止饮酒听戏。政治嗅觉极敏锐的袁世凯意识到，东山再起的时机到了。当时袁身边有一心腹曾力劝其乘机称帝，另开局面，袁考虑到各种因素认为成功的把握不大，未予采纳。14日，清政府任命袁为湖广总督，前往湖北前线督办剿抚事宜。袁以各种托词拖延行动，直到清廷不得已把湖北前线军权完全交给他方才动身。袁世凯夺取军权的计谋得逞后，又乘机把近畿的兵权抓到手中。11月1日，长期与袁氏沆瀣一气的奕劻奏请辞去内阁总理大臣，清廷即将此职改授袁世凯。而袁却以责任内阁须经国会公举为辞，不肯接受。载沣不得已，8日由资政院正式选举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掌握清政府军政大权后，便不再拿腔作势，将湖北前线的军事交给冯国璋等负责，本人则率卫队北上进京。此时袁已经有乘机取而代清的打算，其基本策略就是以南方革命势力压迫清廷，让位于己；反过来，又以清政府威胁南方革命力量，迫使其把民国总统的位置留给自己。实际上袁世凯自复出之日，就实行了这种一石二鸟的谋略。他在彰德向清廷提出的条件，列入“宽容武昌事变诸人”和“解除党禁”等内容，就是明显地在以革命压迫清廷，当然也是为向革命党人买好。11月初，北洋军攻占汉口后，袁又令湖北籍幕僚刘承恩致书黎元洪，提出实行君主立宪，双方早日议和。8日黎回信，拒绝君主立宪，但明确表示，如袁赞助共和，当推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总统”。此后，刘承恩又奉袁命到武昌与革命党人面谈南北和平问题。所谓君主立宪要求虽再次被革命党人拒绝，但袁氏此时却收到黄兴推翻清室以中国第一任大总统相许的复信。黄兴信中鼓励袁“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袁得到革命党人的许诺，内心异常兴奋，却不露声色。他懂得，革命党人许下的“大总统”绝非轻而易举可得。为使革命党人就范，他在回到北京后，迅即命令冯国璋再拿下汉阳，进一步向革命党人显示北洋军的实力。

1911年12月7日，清政府授袁世凯为对南方民军和谈的全权大臣。袁即日委唐绍仪为总代表，与民军和谈。17日，唐绍仪一行抵上海。次日南北议和首次会议举行。表面上南北议和的主要问题是国体问题，南方主张共和，北方主张君主立宪；而实际上，袁世凯关心的并不是表面上的国体和政体，而是他的地位。唐到沪后即向南方透底，只要南方能保证让袁做民国大总统，袁就可以赞成共和。正式议和之外，在袁世凯

的支持下，一些北洋军人还与南方建立秘密议和渠道。北洋军第一军总参议靳云鹏和直隶陆军学堂总办廖宇春等征得段祺瑞同意后，由廖潜赴上海，与江苏民军参谋长顾忠琛密谈南北议和条件。12月20日，双方达成五条秘密协议，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即确定共和政体，先覆清廷者为大总统。由于清室已在袁世凯掌握之中，此协议实质就是南方重申袁推倒清廷、赞成共和即举其为民国总统的许诺。得到南方的明确保证，袁世凯终于下定决心，并加紧了逼清室退位的行动。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对逼清室退位早就有所安排。11月底，顺直谘议局致电摄政王载沣，要求清廷“早行揖让”，“宣布共和”。一批绅士在京城肘腋之地发出这样的电文，袁世凯竟不过问，其心迹已然表露无遗。1912年1月初袁的心腹梁士诒便出面唆使驻俄公使陆徵祥等电请清廷让位。陆电到后，袁立即代为上奏。紧接着，他又以“军饷无着”为名，要求王室变卖盛京大内和热河行宫的器物。隆裕太后只好传令王公贵族“毁家纾难”。

袁世凯逼王公出钱接济军饷，当然不是单纯要几个钱，主要目的还在胁迫清贵族放弃政权。当他把形势不利，清帝只有宣布退位，皇室方可保全的意思透露给奕劻时，即取得后者首肯。有了奕劻做内应，袁世凯更少顾忌，便于16日与一些大臣联衔密奏清廷，说：“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政府缺兵少饷，“计无所出”，请皇太后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速定方针”。袁世凯明明是威胁清帝退位，但面奏隆裕时，却把不负清廷，一心为清皇族着想的假戏演得逼真。他跪在红毡上，一边耸动双肩，一边用袖口擦着眼泪，向坐在炕上的隆裕哭奏。隆裕听明白袁“哭奏”的实际内容后，唯有以泪洗面。坐在隆裕旁边只有6岁的宣统，当然不明白身边的两个大人各因何哭泣。

尽管袁世凯把自己的逼宫说成是万般无奈，还陪着隆裕流了不少眼泪，但逼宫就是逼宫，袁世凯奏请退位的消息一经传出，“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的说法便在满族贵族中占了上风，一些人摆出要与袁拼命的架势。在隆裕召集的有皇室王公参加的御前会议上，良弼、溥伟等与奕劻等人吵得不可开交。袁世凯见清室一时不肯就范，曾有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的打算。但这一计划同时遭到南京临时政府和满族亲贵两方面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反对，袁不得已，只好仍从逼迫清廷退位下手。1月26日，段祺瑞率领湖北前线的北洋将领40余人，联名电奏清廷，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同日，以保卫清室为职志的宗社党头领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宗社党人群龙无首，又遭北洋将领来电威胁，纷纷逃离北京，或奔大连、青岛，或走天津租界。隆裕见大势已去，2月3日授权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12日，清廷接受了优待条件，下诏退位。次日孙中山履行让位诺言，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并推荐袁世凯继任此职。15日，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总统原有三项附加条件：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能更改；新总统须亲自到南京就职；新总统必须遵守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及其他章程。袁世凯十分清楚，这些条件表明，革命党人对他并不完全信任。而北洋派势力的中心又在京津地区，他自然不肯脱离自己的根据地而到南京去受革命党人的约束。早在南北议和期间，他就以维持北方秩序为辞，要求唐绍仪对“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孙中山的三项条件公开后，他又以北京外交团不让他南下为借口，要挟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开始不肯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让步，坚持要袁南下就职，并派出蔡元培等人为专使，北上迎袁南下。袁当然不能因此与孙中山翻脸，便转而采取两面派策略，表面上不拒绝南下，暗中策划阴谋。2月28日，袁在与蔡元培等人谈话中，声称“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但次日晚，北京就发生“兵变”。这场兵变在京内外持续两昼夜，“内城被劫者四千余家，外城六百余家”。其间，南京临时政府曾提出调兵北上，帮助恢复北京秩序，遭到袁世凯的断然拒绝。帝国主义各国也支持袁，不仅从天津迅调军队入京，而且在舆论上攻击孙中山坚持设都南京为“意气用事”。大量事实表明，兵变的幕后指使者，就是袁世凯本人。当时有些革命党人虽然已识破北京兵变必然内有“隐情”，很可能是袁世凯耍的一个花招，但是由于当时多数革命党人在心理上害怕因北方秩序问题引起帝国主义干涉，孙中山在内外压力下再次让步。3月6日，临时参议院开会议决，准许袁世凯以电报形式向参议院宣誓后即在北京就职。10日，袁世凯在前清外务部公署宣誓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袁氏当上民国总统，标志着以他为首的北洋集团掌握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主要权力。所以后来人们把民国政府亦称为北洋政

府。

北洋政权与南京临时政府是有根本区别的。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占据主导地位，而北洋政府的主宰者却是大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当然我们也要进一步指出，在北京临时政府阶段，特别是前期（1912年3月至1913年3月），北洋政权仍然保留着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形式。唐绍仪内阁期间，除总统府由袁世凯亲自控制外，内阁各部基本上还是北洋集团和同盟会平分秋色的格局。尽管北迁后的临时参议院中立宪派势力有明显增长，但同盟会仍占优势。所以这一时期的北京临时政府还不是北洋派独家政府，而是北洋势力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袁世凯对这种局面并不甘心，他不能容忍异己者分享政权，更不能与革命党人和平共处。为了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他已在策划对革命党人下毒手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洪宪丑剧

袁世凯早就萌发了称帝野心。据他的把兄弟徐世昌等透露，至晚在武昌起义后，他已有成就帝业的打算，并与心腹有所商讨。当然，经他反复考虑，认为时机还未成熟，倾向“表面维持清室”。而在镇压“二次革命”，取缔国民党和国会，独揽政权后，袁世凯便认为“天下莫予毒”，可以着手实现自己成就帝业的愿望了。君主专制制度只能建立在封建集权之上，1914年袁世凯对政府机构进行改组，完全恢复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5月1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改设政事堂，政事堂设国务卿一人，直接对袁世凯负责。这个机构的性质实际上类似于前清的军机处。袁将国务卿的位置给了他的把兄弟徐世昌。而在国务卿之下又另设左右丞，由袁的亲信杨士琦和徐的心腹钱能训分别担任，二丞也直接对袁负责，以防止出现国务卿专擅的局面。国务院撤销，各部名义上由政事堂统辖，但各部总长却直接对袁负责。总统命令原仅钤大总统印，现加“政事堂奉策令”之类字样，并钤政事堂印，这恰是前清“内阁奉上谕”那种文字形式的翻版。总之，这次对政府机构的改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集一切权力于大总统。当时就有人撰文指出，按照袁记约法所实行的总统职权，是“假总统政治之名，行独裁政治之实”。

袁世凯还仿照前清的御史台、都察院设置了平政院和肃政厅，并根据前清的官吏品级制度，于7月正式推出了文官官秩，共有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九秩。在改组政府机构的同时，袁世凯还建立了一个所谓参政院，以副总统黎元洪兼院长。黎元洪进京之后，便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朝中闲人，虽然每月可得3万元的高薪，袁又与他结为亲家，但政治事务均不容其插手，兼任参政院长是他进京一年多得到的第一个还算具体的差事。参政70余人均是袁直接任命的，其中大多是昏庸老朽的前清官僚，如赵尔巽、瞿鸿

、丁振铎、李经羲、

昌等，余者皆为袁的亲党及可供他利用的一批文人政客，如梁士诒、周学熙、王揖唐、梁启超、熊希龄、严复等人。参政院一成立便宣布代行立法院职权，而根据新约法应该成立的“民选机构”——立法院和国民会议，终袁之世也未能成立，这个所谓“民国”中的一切机构、职务及人选，均为“钦定”。

由于一些旧官僚迟迟不肯进京“参政”，6月20日参政院才勉强开幕，出席者仅44人。到1914年底，开会20余次，主要做了一件事，即通过《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新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连任不受限制，而且只要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即可连任；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选举前取出交大总统选举会选举。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及立法院议员各50名组成。据此规定，袁世凯不仅实际上已经成为终身总统，如果他在金简上填上他三个儿子的名字，便已经成为袁氏世袭了。从这个选举法内容看，袁世凯虽然名义上仍称大总统，但实际享有的权力与昔日君主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袁世凯借改组政府机构之机，还削减了几位日后有可能尾大不掉的“权臣”手中的权力。首当其冲的是所谓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和陆军总长段祺瑞。

梁士诒（1869～1933），号燕孙，广东三水人。早年经唐绍仪介绍，被袁世凯聘为“北洋编书局”总办，从此追随袁。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由于协助逼迫清帝退位有“功”，一直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后又兼任交通银行总理和财政部次长，并代理部务，既包揽中枢机要又把持财政，事权之重，可以想见，一时被人称为“二总统”。因他能在短时期内筹措巨款，被称为“财神”。各届北洋政府都离不开的所谓交通系，即经他组织起来，并以他为头目。自受命组织公民党以后，其势力更加膨胀，俨然成为政府党党魁。他甚至向袁世凯建议“将秘书厅扩大组织”，而不必再设国务卿。对梁企图包揽政务，袁当选正式大总统后即开始有所不满。此次借改组之机，下令裁撤了总统府秘书厅，改设内史监，由原副秘书长阮忠枢为内史长，将梁调为税务处督办。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袁世凯对付段祺瑞的办法则是撤销总统府军事处，另设一个“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成立统率办事处的原因，袁世凯自称是为了集中陆军、海军、参谋部三部统筹军事，实际上就是要削段祺瑞的兵权。因为自北洋政府成立后，军权一直在段祺瑞控制的陆军部。内阁屡次更迭，但陆军总长一直由段担任。段祺瑞与袁世凯的关系，前面已有所涉及。他自1896年初，就被袁调到新建陆军。以后一直追随袁，是北洋军的嫡系，人们把他与冯国璋、王士珍并称为“北洋三杰”。辛亥革命爆发后，段在逼清室退位一事上为袁卖过死力。但自“二次革命”被镇压，国民党人的军事力量被瓦解后，袁世凯对在北洋军中已隐然自成派系的段祺瑞就不能容忍了。统率办事处成立后，陆军、海军、参谋部三部总长，都成“办事员”，一切军政均由值班办事员呈报袁世凯裁夺。这样原在段控制下的陆军部的军权在无形中就被袁收走了。段对此当然不满，日益消极。

为进一步直接将军队控制在自己手中，袁世凯以北洋军暮气沉沉为由，成立了一个以“模范团”为名的军官教导团，抽调部队中的各级军官前来培训。袁派王士珍、袁克定（袁的长子）等人负责该项工作，第一期袁自任团长，第二期由袁克定任团长，企图树立其在军界的威望，为公开建立袁家的新王朝做准备。

可以说到了1914年底，袁世凯已把昔日君主专政时代君主的权力都拿到手了，就差一个皇帝的名分了。此时，他便开始向心腹和某些舆论界有影响的人渗透他要称帝的意向。一天政事堂开会，讨论清室复辟的危险，袁公然说：“宣统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这不是明显地向在场者表明心迹，要心腹僚属为其设法吗！嗣后不久，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约请梁启超吃饭，只有杨度一人作陪。席间，袁屡以“变更国体”方可救国等话语试探梁，使梁启超对袁世凯的真实用意开始有所怀疑。

1915年初，正当总统变皇帝的戏法将要公开上演之时，袁政府忽然接到日本方面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不得不暂时中断帝制活动而转入中日交涉。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

顾。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扩大在华势力的好机会，迅速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并悍然出兵山东，强占青岛，控制了胶济铁路，夺取了德国在华权益。已经把一切权力抓到自己手中的袁世凯，此时如不是有家天下的野心，本可以在外交方面对日本略示强硬，为自己赢回一些声望。但袁不但同意不接受德国将胶州直接交还中国，而且还同意划出龙口等地区为“交战区”。而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包藏着更大祸心。一些日本政客和财阀此时正在炮制旨在吞并山东奴役中华的对华“二十一条”。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一反外交惯例，直接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袁严守秘密，尽快答复。

“二十一条”内容分为五大项：第一，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第二，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并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管理期限延长至99年。第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第四，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能租借或让给他国。第五，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铁路的建筑权让给日本；日本在福建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权。

“二十一条”要求是从经济到政治完全将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条约，袁世凯作为资深政治家一听就知道性质严重。日本故意直接向袁提出，违背外交惯例，袁世凯本完全有理由严正驳回，拒绝讨论。但他怀着帝制自为的私心，原来打算秘密让给日本一些权利，以换取其对帝制的支持，但没想到日本人胃口如此之大，竟然企图鲸吞中国，一时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将这个本应断然拒绝的条约交给外交部“会商”，同时不得不下令暂停推行帝制一事。

袁政府为了能在对日谈判过程中借助英美等国力量，有意将“二十一条”要求的一些内容泄露出去。国际方面，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确有所指责，但这并不能起到什么重大作用。而“二十一条”消息一经传开，中国国内反日舆论顿时沸腾。“二十一条”交涉正式谈判，就是在举国反日的声浪中进行的，从2月初至4月末，中日两国在北京正式会谈25次，始终未能达成协议。至5月6日，日本政府决定采取最后手段压迫袁，于次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日发出最后通牒，宣称除第5号各项允许以后再行协商外，限48小时完全应允。袁世凯原企望欧美列强出面作强硬干涉，未能如愿，便在决不得罪日本当局，以免当不成皇帝的心理支配下，决定对日屈服。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前往日本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方面提出的修正案，除第5号各项容日后协商外，其余诸项“即行允诺”。

袁政府接受日本最后通牒消息传出后，举国一致认为是奇耻大辱，各城市爱国团体纷纷集会，拒不承认“二十一条”。正是当时全国各界各阶层群情激愤，反日浪潮日益高涨，方迫使袁政府事后声明，此项条约是因日本最后通牒而被迫同意的。此后历届北洋政府也始终没有承认它有效，并于日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要求修改。所以“二十一条”从国际法来看并未得到确认，是不能成立的。而从事实上讲，也未能执行。

“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以后，袁世凯自以为已取得日本方面的谅解，便在当年夏重新开始因对日交涉一度暂停实行的称帝计划。一时间，社会上流言四起，什么“帝星朗照”、“金龙显身”、“共和不合国情”等邪说不胫而走，哄传京城内外，大江南北。

如今，我们对袁世凯称帝的内幕，已经基本了解。大量史料表明，就是袁世凯本人在幕后亲自控制着帝制运动，以往关于袁克定或杨度操纵帝制运动，一度蒙蔽了袁世凯等种种说法，都是皮相之谈。

袁世凯是一个极会做戏的伪善政治家。他幕前的表演和幕后的活动经常截然不同，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使跟随他多年的心腹有时都猜不透他的真实心意。很多人都知道当时所谓“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受骗的事。

1915年6月，冯国璋特地进京试探袁本人对帝制的态度。22日在袁世凯召见时，冯便佯以赞成袁称帝的自家人口吻向袁试探道：“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予以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不料袁世凯却正色答道：“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绝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60岁的人，我今年已58岁，就做皇帝能有几年？我想谣言之来历，不外有两个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

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的权力，于是就有人认为这是改革国体的先声，但是满、蒙、回各族都可以受爵，汉人中有功于民国者岂可丧失这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

接着，袁又以一派推心置腹的神色对冯说：“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当皇帝的最大之利，无非为子孙计。而我的大儿子身有残疾，二儿子想做名士，三儿子不识时务，其余还都太小，岂能把天下交给他们？何况帝王家从无好结果，我即为子孙计，也不能贻害他们。”

冯国璋还不放心，又试探了一句，说：“是啊，南方流言纷纷，都是不明了大总统的心迹，不过到了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天与人归的时候，虽然大总统谦让为怀，就怕推也推不掉。”

听了这话，袁世凯竟然脸色懔然，大声说：“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一些产业，倘若有人再逼我，我就到那里做寓公，从此不问国事。”

尽管冯国璋知道袁世凯会做戏，但总以为凭他和袁世凯的关系，袁总不会称帝在即之时，还把他蒙在鼓里。因此他认为，即使袁世凯对他讲的不完全是实话，但近一两年内或不致有帝制发生。此后，冯又两次拜谒袁世凯。袁优礼备至，几次赏赐平日喜食之物，还馈赠冯夫人（即原袁府家庭教师周砥）许多礼物。冯国璋把袁世凯同他的讲话转告梁启超，还通过新闻记者公布于报纸上。

事实上，冯国璋到北京对袁世凯的一番试探是白费劲了。袁世凯未向冯吐露一句实话。就在袁冯会见后不到一个月，袁世凯即要求其美籍宪法顾问古德诺准备一个文件，论述民主和君主政体哪一种更适合中国国情。实际上袁世凯对古德诺的主张非常清楚。古氏很快就拿出《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其结论是，中国实行君主制比共和制优越是毫无疑问的。8月3日，袁世凯的御用报《亚细亚日报》刊载了《共和与君主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与此同时，袁的心腹向杨度透露：极峰（指袁世凯）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构。随后，袁便亲自出面接见杨，一面暗示杨对外不可声张此事由他本人指使，一面却又指示杨可以找哪些人共事，安排具体办法。杨承旨之后立即行动，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于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23日，筹安会正式宣布成立，在正式发表的筹安会宣言里，翻来覆去只是一个意思：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国。

此后，筹安会又策动了表面上看来颇有声势的“请愿”风潮。一时间北京城内涌出了各式各样的“请愿团”，什么“商会请愿团”、“妇女请愿团”、“孔社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甚至还有“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因为请愿书大都是筹安会代办的，所以内容雷同，其中都有什么“父老兄弟苦共和望君宪”等词句。好像不改共和制为君主制，老百姓就不能活了。众所周知，交通系的首领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在帝制运动，特别是推动请愿一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后来被人们指为帝制祸首，当然并不冤枉。特别是梁士诒，向来缺少政治操守，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干了不少见不得人的丑事。但具体说到交通系陷入帝制丑剧这件事中，也还有一段隐情。帝制发动前不久，梁手下的干将叶恭绰（交通部次长）、赵庆华（津浦路局长）和关赓麟（京汉路局长）都因营私舞弊被参劾，而梁士诒本人此时正遭袁冷落，交通系一时岌岌可危。而就在这时，袁秘密召见梁，对其说，“参案本还有你在内，我下令除去”。一句话，说得梁冷汗不已。嗣后不久，筹安会成立，杨度等游说梁士诒。如前所述，梁在辛亥时期，因助袁逼清室退位而为北洋派立了大功，因此开始还有些犹豫。但他摸清了袁本人的态度后，立即跟上了形势，着手筹集巨款并参与收买和组织请愿活动。据传闻，梁在私下曾与死党讨论过是否参与帝制运动，并说了这样一句话，“助袁称帝不要脸，反对称帝则不要头，诸君何去何从”。梁和朱启钤因各自都有把柄握在袁的手中，当然不愿冒险犯颜，而是把请愿劝进视为保住交通系势力并重新邀宠的好机会，积极参加到推动帝制活动中。

以往人们谈论很多的筹安会的“请愿风潮”，实际上只是帝制运动的表面现象。帝制运动的核心是北洋军政界的劝进活动。在筹安会宣布成

立的次日（8月24日），被人们称为“干驸马”的袁家死党段芝贵和袁乃宽便在北京军警界召集大会，策动劝进。北京军警集会之后，京内外文武官员纷纷上密呈给袁世凯，请求袁早日改君主制。在幕后推动帝制的袁世凯最重视两方面的反应：第一，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和要人的反应；第二，各省封疆大吏和北京高级军政人物的态度。对各省的密电和北京军政要员的密呈，袁世凯不仅亲自阅览，而且有的还加了批语，甚至哪些应登政府公报，哪些缓登或密存，都有具体指示。鉴于这些密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袁亲自批阅后，均交政事堂存档。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曾下令销毁帝制公文，由于这些密档还有政治作用，未被销毁，今天则为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洪宪帝制内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9月16日，由梁士诒等幕后操纵的所谓“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即议决并咨请政府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其他解决办法。袁世凯遂下令，11月20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从这一命令看，袁世凯放慢了称帝的步伐。这是因为：第一，外交方面还没有把握；第二，北洋派内部有少数人对帝制公开表示不以为然，在政府中即有身为国务卿的徐世昌和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拒绝劝进。徐对前来征询意见的袁克定说：“我不阻止，亦不赞成，听君好自为之。”段祺瑞则称病退居西山，袖手旁观。在地方大员中则有冯国璋和张勋态度暧昧。段芝贵等19名将军联名劝进，冯、张二人都未加入。段芝贵、梁士诒等再次去电要求冯表态。冯则有意推张勋领衔，密电政事党和统率办事处。电报说，对一些人立会号召改变国体不敢轻易附和，希望中央“统筹立断”，并建议由国务卿定稿领衔，通电劝进，提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公议，以昭公正。张、冯等提出要徐世昌领衔劝进，这是有意给帝制派设置障碍。因为徐已表示对袁世凯谋求帝制采取“超然”态度，实际上就是不支持，袁世凯对北洋大员们的态度当然不能掉以轻心。他立即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对策。因段态度生硬，难于转圜，他正式下令免去段的陆军总长职，由附和帝制的王士珍接替。对冯国璋，则急派心腹南下，进行解释。9月下旬，冯国璋密电袁世凯，表明自己“并无他意”，并明确表示赞同袁称帝。对徐世昌袁也屡派亲信活动，但未成功。徐不仅仍拒绝领衔劝进，而且提出辞职。因徐手中并无兵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权，袁也就任他去了。

在表面上弥平北洋派内部分歧后，袁世凯及其身边急于追随“真龙天子”的党羽深恐夜长梦多，遂加快推行帝制。他们嫌召开国会会议的方法太过“繁琐”，决定另设所谓“国会代表大会”，表决国体。

10月25日，全国开始推举所谓国民代表。3天后，各省便举行国体投票，投票地点规定在将军或巡按使公署内，将军和巡按使是法定投票监督人。票面只有“君主立宪”四字，令投票人写上“赞成”或“反对”。11月20日，全国投票完毕，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12月11日上午9时，参政院开会，以总代表的名义汇查票数。各省代表共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1993张，无一反对，也无一废票。参政院随即通过了早已准备好的推戴书。当天中午，袁接到推戴书，立即发还，并虚情假意地表示推让。下午5时，参政院再次开会，通过了早已准备好的第二次推戴书，书中盛赞袁世凯的功业“迈越百王”，并于当晚再度呈上。袁自认为戏已做足，便于次日一早发布告示，声称“为救国救民”，只好勉登大宝了。

12月13日，袁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不到50天时间内接连提出两次“警告”，这次朝贺搞得颇为简率，似乎有点关起门来做皇帝的模样。朝贺后，政府内部算是改朝换代。此后，北洋派给袁的“呈文”都变为“奏本”，抬头也改为“大皇帝陛下”。新王朝年号取名洪宪。12月31日，袁世凯申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宣布“改元”而不同时举行登极大典，并非为了表示郑重，而主要是因为称帝者已经心虚。如前文已提到，10月底至12月中旬，日本联合英俄等国两次向袁政府提出缓行帝制的劝告。更令袁心虚的是，12月25日，云南在蔡锷将军等人领导下，宣布独立。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袁护国战争已经爆发了。

关于蔡锷等发起护国战争的事迹，本书限于篇幅，不能历述。概括地讲，护国战争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联合一部分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势力共同发动的。众所周知，最早举起讨袁旗帜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起中华革命党，多次发动讨袁起义，但是由于孙中山和黄兴意见分歧，革命党人未

能在国内形成很大实力，发动的反袁武装斗争屡起屡仆，未能得手。这就反而使曾经在民初政争中留下不光彩记录的进步党人抢到了反袁的旗帜。

在护国战争的打击下，洪宪王朝只经历了短暂的时日。从袁世凯承认帝制之日（12月12日）至下令取消帝制之日（1916年3月22日）只有102天，若从洪宪改元（1916年元旦）算起，至颁令废止洪宪年号之日（3月23日）止，则只有83天。真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袁世凯称帝失败，从外部原因讲主要是护国战争的打击和日本帝国主义拆台。日本对袁的打击还并不只是主动发起各国联合对袁政府进行警告，而且日本政府在暗中纵容本国财阀和浪人组织支持反袁势力。蔡锷能从袁世凯的严密监视下，由天津再入日本，转道台湾入海防再入云南，均因得到日本人士支持；而梁启超由上海转道越南再潜广西也得日本人庇护。其他反袁势力无论中华革命党还是以复辟清朝统治为宗旨的宗社党，也都或多或少从日本人手中得到一些武器和资金。袁世凯心中清楚，西南护国阵营必然得到了日本人暗中支持，便派周自齐为特使赴日游说，这本是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已经议妥的事情。但日本政府此时料定袁迟早必败，迅即改变对袁政策，突然宣布不接待袁政府的特使。至1月19日，日本内阁议决，不承认袁世凯的帝制，并于21日通知袁政府，这无啻于公开了日本要打倒袁的立场。据说此后不久袁世凯病势沉重时，曾自撰一副挽联曰：“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这个对联或许仅是时人为调侃袁世凯而杜撰的，但是日本确实要借反对袁的帝制而将其摘掉，并非虚言。

北洋派内部矛盾的发展则是洪宪帝制失败的主要内因。9月下旬，段祺瑞在巨大压力下虽被迫列名“劝进”，但实际上始终未改变反对称帝的态度。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请他出任征滇总司令，他拒不遵命。至1916年2月底，段便公开提出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等解决时局的主张。冯国璋最初表面上与袁世凯的关系并没有搞僵，但实际上对袁世凯威胁更大。云南起义后，唐继尧特派李宗黄为代表，驻上海与各方联系。袁世凯知悉此情后，电令冯国璋“严拿究办”。冯国璋不仅不执行这一命令，而且两次亲自接见李宗黄。第一次他向李表示：“至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低限度，我这边的队伍是决不会开去跟护国军打仗的。这一点，你请唐将军尽管放心。”第二次，冯又向李提出三条办法：立即复电唐继尧，表示赞同推翻帝制，恢复共和；由他负责维持长江中下游各部北军的绝对中立，尤将拒绝增援川、湘北军；必要时，联络长江各督发表通电，请袁世凯取消帝制，并宣布调停时局办法。3月中旬，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后，冯便联络靳云鹏、李纯、朱瑞和汤芗铭（一说无汤而有张勋）发出要求袁立即取消帝制的密电，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五将军密电”。据说袁世凯看到这封电报后，半晌说不出话来。次日（3月22日）他被迫宣布取消帝制。

袁世凯被迫下令取消帝制后仅两个半月，便在恐惧不安的忧虑悔恨中病亡了。一些史书干脆说其忧惧而死，现代医学告诉我们，人的精神状态与身体状态密切相关。古今中外，政治家因失败或失意愁闷致病进而一命呜呼者并不少见。袁世凯的身体向来不错。但是，云南宣布独立后不久，他就“政躬违和”了，精神委靡，不思饮食，只好请中医把脉开方。至2月下旬，袁被迫下令缓办帝制，病情又有所发展。3月下旬袁世凯被迫下令取消帝制后，本指望由徐世昌和段祺瑞出面，与护国军达成停战议和，保住他的总统地位。但是南方各省一致要求他退位。而且随着形势发展，北洋集团内部矛盾也进一步加剧。段祺瑞、冯国璋不仅不肯为袁卖力，而且逼其早日交出权力。与此同时，曾自命为袁氏“屏藩”的陕西将军陆建章却被暗中得到段祺瑞支持的陕北镇守使陈树藩挤走了。5月9日陈自任护国军总司令，并宣布陕西独立。陕西独立后不到半个月，四川将军陈宧又于5月22日宣布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至此，小半个中国已脱离了北洋政府的统治。而继陈宧叛袁之后，湖南将军汤芗铭也于该月底宣布独立。陈宧和汤芗铭原都是袁世凯亲手提拔起来并异常信任的心腹大将，因而他们宣布独立并与袁脱离关系，对袁的打击也就格外沉重。5月中旬，陕西宣布独立的消息报告袁后，袁的病势即加重了，办公室都去不成了，只能在卧室中办公和会客。5月底至6月初，四川、湖南独立的消息传来，袁便“大失常态”，脸色潮红，时而呆若木鸡，时而破口大骂，小便不通，痛苦异常，因病情发展很快，至5日，已呼吸困难，群医束手。延至次日上午10时半左右，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独裁者终于停止了呼吸。据有关资料看，袁氏很可能是由于急性肾炎转尿毒症而死亡，而导致急性肾炎的主要原因是精神上的压力。

袁死后不久，社会上曾流传有“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陈树藩、陈宦、汤芗铭）之说，这尖刻的讽刺上半句虽不确切，下半句还颇近情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二 皖系当政与北洋派的分裂

1 段皖当政

从1916年6月袁世凯病毙至1920年7月直皖战争结束，北洋政府基本上被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把持。段祺瑞能继承袁世凯衣钵，成为北洋系首领并把持政府大权绝非偶然。第一，他有自己的派系。第二，他抵制袁世凯称帝，捞到一些政治资本。如前所述，袁世凯的称帝活动公开后，段祺瑞躲至西山，以示不满。护国战争爆发后，袁请他出任征滇总司令，他又拒不遵命。帝制派投寄匿名信恐吓他，他坦然表示：“武人不怕死。”1916年2月底，他不顾袁世凯的面子，公然提倡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以解决时局。

袁世凯病毙，为段祺瑞兴起带来良机。原来与段联系比较密切的地方军政要员如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福建督军李厚基、陕西督军陈树藩、甘肃督军张广建、浙江督军杨善德和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等纷纷投到段的门下。段祺瑞通过这些地方军阀不仅掌握了大批军队，而且在西北控制了陕甘两省，在华东控制了安徽（皖南、皖中）、山东、浙江和包括上海在内的淞沪地区，在华南控制了福建。这些军事实力派人物与靳云鹏、徐树铮、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联手构成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集团的基本班底。段的嫡系之外，当时河南督军赵倜、热河都统姜桂题和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等也都依附于段。在文的班底方面，当时段祺瑞几乎得到原袁世凯全班人马的支持。元老徐世昌从开始一直属意以段继承袁的衣钵，维系北洋团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民国建立后一直为北洋系倚为财政支柱的交通系政客们，除梁士诒因洪宪帝制案遭通缉外，其余如曹汝霖、叶恭绰、陆宗舆、章宗祥等悉数与皖系军人合流。这些政客为皖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筹措经费，对外向欧美、日本银行借款，对内控制铁道，发行公债，聚敛民财。段祺瑞统治时期大举外债（主要是向日本），如金额最大的“西原借款”，其幕后牵线者就是以曹汝霖为首的新交通系。

阎锡山、张作霖和张勋等北洋旁系和地方势力不买总统、内阁和国会的账，但对段表示尊重。在北洋系中，有实力与段一争高下者仅冯国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璋一人，但冯因在护国战争后期企图以“调人”身份取代袁世凯，遭南方各方猜忌，此时又远离中枢，只好拱手让段暂居北洋领袖地位。

对南方各派反袁势力而言，北洋派中只有段祺瑞是可以接受的人选。袁世凯病毙次日，梁启超就明确表态：“收拾北方，惟段是赖。”与此同时，孙中山等也表示了大体相同的意见。其他有实力的南方头面人物，如陆荣廷、唐继尧等，对段也没有特别恶感。特别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还指望着段祺瑞能在西南地区分给进步党人一些地盘，以谋日后发展，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为段祺瑞捧场。当然段祺瑞对北京政权的控制力远不能与身败名裂之前的袁世凯相比。段并非不想像袁世凯那样，做个乾纲独断的大总统，但南方有西南地方势力存在，北洋集团内部又矛盾重重，他不敢做那样的尝试。当时的形势迫使他把黎元洪“请”到了总统位子上。如黎安心做段皖集团的工具，只管盖总统大印，不问其他，段黎合作或许能维持一段时间，但黎又不甘于如此，因而段黎自袁死后就处在矛盾和斗争之中。

1916年6月5日深夜，袁世凯行将咽气时，把后事托付给徐世昌和段祺瑞，次日上午，袁世凯死了。当时，徐世昌即向段祺瑞指出，南方阵营屡次宣称，要“恭承黎元洪为民国大总统”，此时如不让黎继任总统，南方定然反对，使北方陷于被动，为大局着想，最好让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虽然对黎元洪素无好感，但迫于当时形势，也不得不采纳徐的建议。因为不仅南方拥护黎当总统，帝国主义列强为稳定北京局势，也赞成黎出任总统。6日上午，英、法、俄、比、意等五国公使与日本公使在日使馆举行秘密会议，商讨袁世凯死后对中国的态度和措施（开会期间得到袁世凯的死讯）。午后，六国公使拜会了段祺瑞，英国公使代表六国询问袁死后继任总统的人选。段表示，由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各国公使一致赞成，并宣称，将对黎元洪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同时，段祺瑞还考虑到，如果不以黎元洪接任总统，自己直接上台，在北洋派内部也难得到一致拥护。

在段祺瑞主持下，袁世凯毙命当日，北京政府发布两个文告：第一个文告是袁世凯“遗令”。“遗令”申明：“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

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第二个文告是国务院通电。电称：袁氏“于本月六日巳正因病薨逝，业经遗令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而段祺瑞本人对请黎元洪出任总统是很不情愿的。袁世凯咽气后，他与时任教育总长的张国淦前往东厂胡同黎宅，以相视而坐半小时不出一言的特殊方式，履行了请黎元洪出任总统的手续。当夜，黎元洪听说北洋军人将对他有所不利，急派张国淦前往府学胡同段宅打听情况，段没好气地说：“我既然请副总统出来，这就是我的事了，他不要管，如果他怕的话，就请他来管吧！”而受到南方拥护的黎元洪，内心是赞同依据《临时约法》继任总统职位的。黎请张国淦起草的接任总统的布告，原有依据《临时约法》“继任”的内容。但黎的秘书瞿瀛等认为，这种写法恐怕会激怒段祺瑞。如段翻脸，黎的总统就有可能当不成，不如暂且忍耐。在瞿瀛劝阻下，黎元洪的就职告示既没有说依据什么约法，也没有说是“继任”，还是“代行”，仅宣布“于本月七日就大总统任”。黎元洪与段祺瑞在政治上的分歧，首先表现在对南方各派力量，特别是国民党人的不同态度上。这一点，从黎元洪继任总统后，两人在新阁员名单的磋商中，已可见端倪。

黎继任总统后不久，段祺瑞就向他提出一份新阁员名单，由汪大燮任外交总长，许世英任内务总长，陈锦涛任财政总长，刘冠雄任海军总长，章宗祥任司法总长，张国淦任农商总长，范源濂任教育总长，曹汝霖任交通总长。这个名单很显然基本是段祺瑞奉袁世凯之命所组织的内阁的原班人马。当段拿这个名单交黎元洪商议并审核盖印时，黎明确表示应多容纳几个南方人士以争取南方，实现南北和解，并将其中刘冠雄、章宗祥、曹汝霖、范源濂换掉，加入唐绍仪、孙洪伊、程璧光、张耀曾等4人。段祺瑞迫于形势，表面上同意黎的意见，将内阁名单做了变更。但此事被段泄露以后，引起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对黎元洪的极大不满。嗣后不久，段祺瑞、徐树铮为防止黎元洪今后再插手内阁及地方军政要员的人事安排，很快炮制出《国务院权限节略》。《权限节略》规定：“选定内阁阁员为总理专责；主持施政大计及统一行政步骤皆总理之职权。”段氏独揽大权，纵容亲信，骄横跋扈，是这一时期北洋政府内争不已、政局始终不能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张勋复辟

府院和国会两派之间政争迭起，给旨在复辟清室的张勋集团以可乘之机。府院关系因对德外交再度恶化后，段祺瑞和黎元洪都积极拉拢拥兵徐州的张勋。4月中旬，段策划“军事会议”时，就企图拉张进京，并借张之手压制国会，推倒黎元洪。为了诱张进京，段不惜以日后实行复辟为钓饵。当时，皖系干将倪嗣冲对张勋的谋士声称，一定要改组内阁，如黎元洪不以为然，即拥戴徐世昌，等到国势略为安定，再由徐世昌将政权归还“旧主”（指溥仪），要张勋出面拥段倒黎。

在段祺瑞积极拉拢张勋的同时，黎元洪也竭力争取张勋的支持。张勋在对待国民党人和国会、内阁等问题上虽与段态度一致，但在“参战”问题上却由于复辟派与德国的关系，与段大相径庭。黎元洪就企图利用段、张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把张拉到自己一边，屡派幕僚到徐州活动。而张勋的谋士们早已洞悉段黎用心。张勋的一个心腹明白地告诉张，段祺瑞欲借张勋名义分散西南各省和国民党人的攻击，“保全”自己；黎元洪则欲借张勋之口，“昌言”反对参战，“倒阁”、“去段”，张勋如到北京，必然左右为难，“不如置身局外，作壁上观”。张依计而行，拒绝段黎双方的邀请，蜷伏在徐州做复辟的准备。

张勋一面在京津布置力量，一面争取北洋各省的支持。5月，他多次写信与冯国璋商讨时局。19日，在北京开会的北洋督军联名呈请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勋得讯后立即发表通电，表示赞成。23日，张勋与倪嗣冲等督军举行第四次徐州会议，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等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倪嗣冲提出要发兵北京，推倒黎元洪和国会。张勋则乘势提出，推倒现政府后，各省共同拥戴清帝复辟。徐树铮为达到解散国会和驱黎的目的，当场表示，段祺瑞虽然不能公开支持复辟，但只要达到解散国会和驱黎的目的，其他一切在所不计。倪嗣冲、张怀芝等也随声附和。张勋见徐树铮和各省督军都赞同复辟，非常高兴，当场要与会者签名为信。

罢免段祺瑞后，黎元洪再次敦请徐世昌和王士珍组阁，但二人坚决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不肯。黎一筹莫展，只好请徒具虚名、毫无实力的老政客李经羲出面缓冲。

但是李经羲还未就职，倪嗣冲即在蚌埠宣布安徽“独立”，并截留津浦路车辆，运兵北上。在此前一日，奉天督军张作霖已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及段祺瑞复任，否则即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继皖、奉之后，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琳，山东督军张怀芝，陕西督军陈树藩，直隶督军曹锟，黑龙江督军毕桂芳等也先后宣布“独立”。诸多事实可证明，皖、奉等八省的“独立”，是段祺瑞和徐树铮一手策划的。

美国对北洋各省的叛乱极为不安，曾企图干涉，但遭到日本的坚决拒绝。日本外务省明确照会美国政府：“日本坚持早已声明的不干涉中国内政……故没有理由参加美国政府提议的对华一致劝告。”而英国明确支持日本，美国孤掌难鸣，只好隐忍不发。

北洋各省的“独立”，把早就想过总理“瘾”的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中，不敢露面。黎元洪再三派人催请，他提出必得有张勋进京保驾，才能就职。黎元洪别无他路，只好采纳这个建议，5月31日，他向张勋发出邀请电。6月7日，张勋率辫子军步炮兵3400余人北上。在张的武力威胁下，黎元洪放弃了自己的诺言，下令解散国会。

国会被解散后，国民党议员纷纷南下。黎元洪和被肢解的北京政府失去任何依赖，只好由张勋任意摆布。

7月1日，张勋在周围遗老们的鼓噪下，悍然宣布推翻民国复辟清王朝。张勋集团没有料到，他们发动的复辟不仅遭到全国各省、各界人民的一致声讨，在北洋集团内部也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南北各省军政长官，包括曾宣告独立的各省，响应者寥寥无几。早就在窥测时机的段祺瑞，看到重新上台的时机已经来到，便于3日向全国发出反对复辟通电。帝国主义出于自身的利益，对复辟也普遍持反对态度。复辟发生后，英、美、俄、法、日五国联合向张勋发出警告，要求保证黎元洪人身安全。

张勋复辟为段祺瑞重掌北京政府铺平了道路。被张勋辫子军轰下台的黎元洪，只好向段祺瑞输诚。7月2日，他特任冯国璋以副总统暂代总统职务，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派人将任令送交在天津的段祺瑞。

在日本寺内内阁的多方支持下，段祺瑞的军队很快击溃了辫子军，平息了张勋复辟。

由于研究系在反对国民党和黎元洪的争斗中为皖系效了大力，段重新上台后起用了不少研究系政客，组成皖系和研究系的混合内阁。黎段府院之争最终以皖系军阀和研究系的胜利告终。

冯国璋进京后，北京政府在冯、段合作的新体制下重新组成了。但这一体制是脆弱的。如前所述，冯国璋和段祺瑞之间早就存在着隔阂。在黎段的激烈斗争中，冯一直持第三者立场，不与段合作。此次复辟失败，冯国璋北上就任总统也是有条件的。冯离南京后，调心腹江西督军李纯接替江苏督军职务，李所遗江西督军则由冯的另一心腹陈光远接任。作为对等的交换条件，段提出任命傅良佐为湘督，段芝贵任京畿警备总司令，吴光新任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冯也接受了。冯、段二人各怀异志为新的府院之争埋下伏线。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5 副总统难产

徐世昌上台当了民国大总统后，依1913年宪法会议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还应立即再选出一位副总统。按常理，选副总统应比选大总统容易，因这一位置不仅法律上不很重要，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权力，竞争应相对和缓。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料到，选举大总统北洋各派虽然取得暂时大体一致的意见，但在推选副总统时，各派的冲突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调和，以致副总统选举长期不决，造成后来北洋政府的国家副元首位置一直空缺。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北洋派内部在副总统人选上出现重大分歧，是皖系军阀，特别是徐树铮控制的安福系政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前所述，早在1918年春，徐树铮首次出关联络张作霖时，即与张达成未来副总统举张的默契。张作霖自然为之心动，即派兵入关压迫冯国璋，成为北洋军阀中主战派的干将。而到了6月初，直系大军在吴佩孚率领下先后攻克长沙、衡阳后，段内阁却未拿出什么像样的犒赏，曹便以养病为名，从长沙返回天津，吴佩孚也按兵不动并放出要与南方言和的口风。曹、吴此举显然是对段祺瑞和徐树铮表示不满，也是一种要挟。徐树铮见状唯恐几年来策划的“武力统一”计划就此泡汤，便对曹许愿，将来副总统选举，非曹莫属。而安福系部分人则希望直接把他们的头子段祺瑞捧上台，以抵制徐世昌的和平政策。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及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则主张仍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冯表态不愿任副总统，最好选西南方面人士，梁士诒便又属意推举岑春煊。“长江三督”表示赞成梁的意见，以息南北争端。这样一来，各派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段祺瑞本人并未把副总统职务看在眼里，表示不愿当选。后来吴佩孚在湖南与南方眉来眼去，暗中来往密切，便决心以副总统换得直系支持。但这一决定却使张作霖大为恼火。为达到推举曹锟上台的目的，北洋政府先于9月7日发表了特派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命令，以此换得张作霖退出副总统竞选；又派徐树铮到安福俱乐部会议上，解释推举曹锟的理由。段祺瑞、冯国璋又正式宣布退出副总统竞选。这样，候选人便只剩下了曹锟。不料，安福系议员又提出了问题，认为在选总统时已尽了义务，现在选副总统不能再尽义务了。言外之意，便是要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钱。然而曹锟一毛不拔，认为徐世昌当选总统都没掏腰包，竞选副总统更无掏腰包的道理。经过王揖唐的四处奔走，北京政府决定付还曹锟军费150万元，用这笔钱作副总统的运动费，票价每张2000元，当晚就签发了支票。这样，可说是万事俱备，只待选举了。

10月9日，两院议员选举副总统联合会正式举行。议长梁士诒端坐主席台上等候达到法定人数进行投票选举，不料来人稀稀落落，等了一上午也凑不到法定人数。下午继续进行，仍是门庭冷落。王揖唐建议，关闭议会大门，只许进不许出，再派军警四出拉人，以凑足人数。不料，该建议一宣布，议席上的议员纷纷夺门而出，第一天的选举会便这样流产了。当天众参议员哪去了呢？旧交通系的议员竟是到万牲园参加游园会去了。当梁士诒在安福系的督促下派人到游园会去拉人时，游兴正浓的议员反而取笑前来游说的人，说：“游园迟到，应罚酒三杯。”研究系议员本与安福系不合，抵制选举自不待言；旧交通系与安福系表面尚能合作，何出此举？原来他们背后还有徐世昌和梁士诒的幕后指挥。再说安福系本身也有很多议员不出席，原因是《顺天时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曹锟以10万重金纳刘喜奎为妾。这些议员认为一个刘喜奎要值50个议员的身价，自己卖得太贱了，所以拒绝投票。徐树铮要求曹锟再出点“血”，曹锟寸步不让，认为替安福系保江山，还要为安福系掏腰包，太不划算。徐树铮无奈，只好让王揖唐再想办法。

王揖唐知道旧交通系的问题还得请徐世昌出面才能解决，便邀梁士诒一同去见徐。徐世昌道貌岸然地表示了自己公正不阿的态度，“以我今天所处的地位，对于副总统应当速选，迟选，以及选何人，都不便表示意见”。

10月14日，周自齐又邀了一批议员到天津去，把自己的私宅让出来作议员总招待所，又在四家旅馆设了四个分招待所，请在京议员来津饮酒看花，并将南市妓院全部包下，让北京的议员流连不返。待吸引到140名议员时，准备召开一次谈话会，请他们联合提出促进南北和平、推迟副总统选举两项建议。同时，梁士诒在北京也表示如果选举北方人士为副总统，则南北和平遥遥无期。梁士诒、周自齐均为旧交通系领袖，也是徐世昌的同党，他们反对选举副总统，与徐世昌“虚副总统一

席以待南方领袖”的意图如出一辙。造成副总统选举几度流产的不是别人，正是段祺瑞所扶植起来的北洋元老徐世昌。

然而王揖唐不肯罢休，10月15日，派出安福系大将克希克图带领8名孔武有力的议员，到天津来绑架逃会议员。王揖唐在天津的私邸派出一批家丁，分乘8辆汽车开到天津火车站，只待“肉票”一到，立即押上开往北京的专车。

克希克图等人分路扑向周自齐住宅及四家旅馆，不料人去楼空，一个“逃兵”也未捉到。束手无策之际，只好满大街乱找，无意中撞上了一位因惧内不敢进妓院的议员，方知“逃兵”们都“逃”进了妓院。于是克希克图纠集人马在凌晨3时30分冲到妓院，把正在“倚红偎翠”的议员一下子捉住40余位，连拉带扯地将他们塞进汽车。这些议员乱嚷乱叫，警察以为发生绑票，紧急拦车检查，直到押车议员拿出议员证才被放行。被绑架的议员要求回去取行李也未被允许，押上火车便被送回北京。一些议员在车站乘乱逃脱，也有些议员刚到北京便又逃回天津。

10月16日，王揖唐又在北京派出汽车多辆，分途抓议员到会投票。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派出武装警察到西城放哨，禁止议员离开会场。但这天到会人员更少，选举仍以流产收场。此事遂成为一桩风传全国的丑闻。

副总统选举流产表明徐世昌在当选后已与段祺瑞在政治上发生矛盾，并且难于在短期内完全消除。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7 皖系统治垮台

如前所述，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利用日本的参战借款，大肆编练本派系私军（即所谓“参战军”）早已引起国内各方面人士的强烈不满。南北和议破裂的主要症结之一就是南方强烈要求段祺瑞停止招募参战军，而皖系根本不理睬。而后不久段政府和日本签订的密约又被公开揭露于世，美国等西方列强出于各自利益，也明确表示反对北洋政府在战后继续编练参战军，并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其停止继续向中国支付参战借款。在这种情势下，段祺瑞、徐树铮一面暗中加紧编练自己的军队，一面又大做表面文章，进行遮掩。1919年初，段祺瑞自请将参战督办处改为边防督办处。2月，参战军改称边防军。与此同时，段祺瑞和徐树铮以所编新军全部驻扎于京畿和中原地区过于惹人注意，遂另辟蹊径，以开发和戍卫外蒙为辞竭力向西北扩张势力。7月18日，北京政府公布的西北筹边使官制明确规定，该使由总统特别任命，筹划外蒙地区交通、垦牧、林矿、硝盐、商业、教育、兵工事宜，所有派驻该地各军队，统归节制指挥。与蒙古地区毗连的奉天（今辽宁）、黑龙江、甘肃、新疆各省及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特区事务，也可由筹边使“与各该省军政最高长官及各都统妥商办理”。对此，张作霖当然不满，曾打电话给北京政府，请求在其部下吴俊升和孙烈臣二人中择一人任东北筹边使。徐世昌虽然很讨厌徐树铮，但为把其调出京畿，乐得自己身旁清静，采取请神不如送神的态度，同意段、徐这一举措。张作霖对此曾采取措施抵制，授意东三省60余名议员投票反对，但这个官制案最终仍获通过。这样一来，早有裂痕的皖奉同盟关系等于瓦解。

直系对段皖势力向西北扩张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直系曾唆使接近他们的议员不要赞成通过西北筹边使官制案，并大造徐树铮经营外蒙意在吞并东北的舆论。在皖系的威胁下，直奉两系联手制皖，成为两系首脑的最佳选择。1919年底，直隶、江苏、湖北、江西、奉天、吉林、黑龙江7省反皖联盟在暗中形成了。

直皖矛盾的激化由吴佩孚率军撤防北归拉开了序幕。1919年8月31日，吴佩孚与南方军政府代表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繁签订了《救国同盟

条约》，以解决直军北返时的后顾之忧，然后吴佩孚请求撤防的电报便如雪片般飞往北京。但北京政府在段祺瑞的控制下对此置之不理，曹锟遂决定让吴佩孚“自由行动”。1920年1月30日，南方军政府决定秘密接济直军开拔费60万元，直军撤后，由湘军接收防地。此后，吴佩孚便积极筹划北返事宜。

吴佩孚与曹锟的活动使段祺瑞大为不安，为切断直军北返的路线并控制曹锟与“长江三督”的联系，皖系非控制河南不可，于是皖系便开始策划撤换在直皖对立中态度不明朗的河南督军赵倜，由段的内弟吴光新取而代之。赵倜在皖系逼位的形势下为保自己地位，别无选择，只有向反皖派靠拢。吴佩孚在曹锟的支持下，通电反对更换豫督，这样7省联盟便扩大为8省联盟。尽管靳云鹏内阁在段祺瑞的逼迫下通过了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的任命，但徐世昌拒绝在该命令上盖印。段祺瑞闻讯大怒，当面骂靳云鹏无能，不配做国务总理；并于3月初指挥安福系发起推倒靳云鹏内阁的运动。但是，曹锟为首的8省督军立即通电反对，徐世昌也极力挽留靳云鹏。靳云鹏本属皖系，竟因直系之力而得留任，皖系阵营内部先行自乱。河南易督问题发生，促使吴佩孚不得不加速北撤。从2月底开始，吴派人将包括自己眷属在内的直军文职人员和家眷三千多人陆续护送北归，并发布撤防布告，以示北撤决心。段祺瑞见阻止无效，只好表面上同意撤防，暗中布置堵截，急调徐树铮率军回京，并决定由段祺瑞亲自出任川陕剿匪总司令，率边防军第一、三师进军陕西。而其真正目的并非向陕西进兵，而是假虞灭虢，先下郑州驱逐赵倜，然后扼住京汉路以阻断直军归路。段祺瑞认为，如与直军决战，战场也应选在河南，一者北京不受战火威胁，二者山东、安徽的皖系军队可侧击直军。段祺瑞率军出征的消息一传出，张作霖立即行动起来，提出边防军出征，北京空虚，奉军愿来“拱卫京师”，此举把段祺瑞的全盘计划彻底打乱了，只好大军停发，留驻京师，改为密电张敬尧迎头截击直军，与此同时急电吴光新火速率军南下，配合张敬尧击溃直军。不料吴光新刚一行动便惊动了王占元，他以为皖军要来攻武汉，便派兵迎击，吴军不敌溃败。

5月25日，吴佩孚指挥第三师撤防，张敬尧虽做了截击的准备，但吴光新不来，便未敢轻举妄动，眼巴巴地看着吴的大军通过自己的防地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扬长而去。湘军随即而到。5月27、28两日，湘军占领祁阳、耒阳两县，又攻克衡州、宝庆等地；仅十余日，便将张敬尧部全部击溃。

5月31日，直军第三师全部抵达汉口，王占元又为第三师补充军费60万元。6月7日，第三师到郑州。到了6月中旬，吴佩孚的全部人马都回到了中原，从保定到高碑店铁路沿线，到处可见第三师的旗帜和番号了。

大总统徐世昌鉴于局势紧迫，战事一触即发，急于找人调停直皖两系的矛盾，遂于6月7日、14日、18日连发三电，请曹锟、张作霖、李纯来京会商。曹、李二人均借口谢绝了，只有张作霖以“调人”身份应召来京。张一下车便声明：“目中无直系，只拥护徐总统。”20日、21日，张分别谒见了徐世昌和靳云鹏，然后又拜会了段祺瑞，表示要竭力调和两家恩怨。张作霖席不暇暖，便于22日赶到保定。此时，13省督军已云集保定，张一到，曹锟便举行各省督军代表会议，会上提出5项要求：靳云鹏留任总理；罢免安福系三总长；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解散安福系；撤销边防军，罢免徐树铮。张作霖返京后，徐世昌召集张、段二人到公府举行会议，并针对保定方面的5项要求提出一些折中性的意见，无奈双方均不肯退让。7月1日，曹锟发布《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及《为驱除徐树铮解散安福系致边防军西北军》的声明。在直系的压力下，徐世昌于4日下令，调徐树铮为远威将军，开去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一职裁撤，所部归陆军部管辖。段祺瑞闻讯勃然大怒，随即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并对各地皖系军队作了部署。7月6日，段在团河向张作霖摊牌，“罢免吴佩孚万事皆休。”张作霖说：“这恐怕办不到吧。”段斩钉截铁地说：“办不到也得办！你们办不到，我一定要办到！你回你的奉天，不必管这儿闲事！”张作霖无话可说，遂悄然离京，并随即宣布“局外中立”。

7月8日，段祺瑞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首要举行联席会议，安福系政客一致要求诉诸武力，并以内阁的名义呈请徐世昌惩办曹、吴。徐世昌不肯签署这道命令。9日，段便派徐树铮带兵包围总统府，并散布消息，如果免曹、吴令于晚间8时不下达，边防军则于次日上午首先开战。徐世昌不得已，只好签署了惩办曹、吴的命令。事已至此，

双方皆知难免一战。段祺瑞命名边防军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长。然后兵分三路，段芝贵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兼京师戒严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军总司令，魏宗瀚为第三路军总司令。又密令卢永祥进攻江苏、马良进攻德州以牵制直军后方。曹锟也在保定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兵分两路，从长辛店、杨村进攻皖军。张作霖此时也一改“中立”，派第二十八师等入关，总数达7万之众，分布于天津北仓、马厂、军粮城一带，摆开夹击皖军的阵势。段祺瑞本以为张作霖虽与徐树铮不和，但决不会直接出兵助直倒皖，当他得知奉军已达天津准备参战时，方寸大乱，急忙要求徐世昌发布“各军停战撤回原防”的命令，企图推迟战争的爆发，但战事已如离弦之箭，无可挽回了。

双方对战事的预测大相径庭。段祺瑞自恃有日本当局的支持，认为5天内即可攻下保定，击溃直军。曹锟对战事毫无成算，吴佩孚则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一星期动员，一星期作战，一星期复员。

7月14日，大战在京汉线上爆发。定国军第二路军总司令曲同丰挥军突袭直军，一举攻陷涿州、定兴，直军退出高碑店。西路军攻击得手后，徐树铮于15日晚指挥东路军向固安、杨村一线推进，16日上午占领杨村。17日，战局发生逆转，吴佩孚率偏师突插松林店，突袭皖系西路军指挥部，竟将司令官曲同丰及指挥部高级将领10余人全部生擒。驻扎在琉璃河的第一路军总司令段芝贵正在专车上拥妓取乐，接到报告，立即弃职逃回，西路军群龙无首，彻底崩溃。直军长驱直入进抵卢沟桥。东路军在占领杨村后继续猛攻直军。直军退至北仓一带，幸得奉军助战方能稳住阵脚。17日，直奉两军协同夹击皖军，夺回杨村，段祺瑞派兵支援，徐树铮正欲整兵再战之际，获悉西路军大败，知大势已去，化装逃回北京。段祺瑞此时困守孤城，手下亲信也大多水流云散，便想自杀，被左右劝止。18日，直皖战争结束。次日，段祺瑞通电全国，“引咎辞职”。

直奉大军于24日开进北京，26日，徐世昌下令取消对曹锟、吴佩孚的处分。28日，批准段祺瑞辞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西北边防军名义，西北边防军由陆军部收束解散，勒令解散安福俱乐部；后又下令通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缉安福祸首徐树铮、王揖唐等16人。至此，皖系势衰，再也无力问鼎中央政权了。

直皖斗争由冯国璋进京代理总统开始，历时三年，其间钩心斗角、冷热摩擦不可胜数，然而真正的兵戎相见仅短短三四天便告结束了。被消灭的仅是段祺瑞利用参战借款编练的边防军，而各省皖系军队基本没有很大的损伤。此次大战，皖系投入兵力多于直系，装备也精良，但一战即溃，原因很多。首先是皖系不得民心。自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政府对外投靠日本，大借外债，私订密约，出卖国权；对内培植党羽，大兴内战，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通过五四运动，广大人民看穿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各地民众团体纷纷通电拥直倒皖，在道义上，直系已占上风。这也势必会影响两军的士气。再者，皖军系初练，官兵少经战阵，而直军久历沙场，军官精于指挥，士兵战斗力强，尤其皖军的第十五师是由原属直系的冯国璋部队改编的，临阵倒戈，更兼吴佩孚久经战阵，用兵灵活多变，战术得当，一击而中皖军要害。另一重要原因是奉军的参战，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使皖军上下气夺，未战先败。当然皖系政治上的失势，并不能改变军阀政治的反动本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三 曹吴当政与贿选丑剧

1 亲家变冤家

皖系被打败以后，直奉两系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府。处在两大势力之间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难受得很，走了段祺瑞一个“太上皇”，却来了曹锟、张作霖两个“婆婆”。1920年8月4日，曹锟和张作霖进北京城时，徐世昌组织政府要员、社会贤达数千人聚集车站，以帝王之礼迎接这两位倒皖“功臣”。当晚，徐世昌在居仁堂设宴为二帅洗尘，亲自到门外迎候，左手拉着曹锟，右手拉着张作霖，并排进入宴会大厅，顿时大厅内掌声雷动。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徐世昌和直系、奉系在惩办皖系祸首、内阁人选和解散安福国会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

首先对段祺瑞这个最大的战争祸首，吴佩孚早就提出“置于汤山，听候国民公决”。但对此，徐世昌不能同意。曹吴进京后，他一再为段说情，表示愿担保一切。张作霖与段祺瑞本人一直未撕破脸，并且还想在处理战后问题上赢得一部分皖系势力的支持，从而增加将来同直系抗衡的资本，所以表示支持徐的意见，对段“决不稍有侵犯”。这样，曹锟也不好坚持己见。于是，惩治段祺瑞问题，就搁置不提了。关于安福系政客，直系曾开列一张共有30余人的祸首名单，但徐世昌和张作霖一致主张宽大为怀，从名单上划掉了不少。吴佩孚对此气恨不已。

内阁也是经过三方一番讨价还价才定案的，徐世昌本想用老友周树模组阁，曹锟则推举直系元老王士珍，张作霖坚持要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复职，最后徐、曹二人作了退让，靳内阁于11日组成。吴佩孚一向认为安福国会是非法的，就连安福国会选出的总统徐世昌也只是一个“四肢不全”的“半面总统”。所以他经常不称徐世昌为总统，而称其为“东海先生”。

8月1日，吴佩孚通电全国正式发表了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但立即遭到徐世昌、靳云鹏、张作霖的反对，靳云鹏认为“召开国民大会简直是要革我们的命”！张作霖立即要曹锟对此表态，曹锟也不太了解吴的真实想法，便通电声明“吴佩孚所发东电，未得同意，应予撤回”，并告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诚吴少发表意见。吴意识到自己尚不具备干政的实力，感慨之余，声明今后“不问朝政”，遂班师回洛阳，专心练兵去了。由于曹锟在国会问题上也让了步，安福国会得以自行宣告寿终正寝，“永久休会”。在战争善后一系列问题上，可以说都是曹锟一家让步，依从了徐世昌与张作霖的意见，其他两方为了安抚曹，给其在直隶督军之上又加了直鲁豫三省巡阅使的头衔。最后，8月下旬，徐世昌、张作霖、曹锟与靳云鹏就政务处理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为：此后国家大计必须先行征求曹、张同意；总统地位和靳内阁由曹、张共同维持；东三省及直鲁豫三省用人行政，由曹、张自主等。

分赃基本就绪后，曹锟、张作霖便在天津结为儿女亲家，由靳云鹏做媒，将曹锟7岁的女儿曹士英嫁给张作霖8岁的儿子张学思。

搞了政治联姻之后，曹锟认为可以和张作霖相安一段时间了。但这只能是一相情愿，直奉两系既然都要扩张本系，抢占上风就不可能相安无事。

首先是争地盘。直皖战争之后，张作霖为将自己的势力推进到长江流域，竭力保荐他的儿女亲家张勋为安徽督军，李纯则保举张文生继任安徽督军。由于张勋是丁巳复辟首犯，受到安徽各界的一致反对，致使张作霖染指安徽的计划受挫。1920年10月，江苏督军李纯突然自杀，江苏马上又成为直奉两系争夺的目标。张作霖立即举荐张勋继任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如江苏人民反对，情愿自己任江苏督军，把奉天督军让给张勋。曹锟则推举王士珍继任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任江苏督军。徐世昌考虑到江苏原系直系地盘，如被奉系吞并，势必引起直系及全国反对，并会打破直奉双方力量的平衡而引起风波，因此支持曹锟的举荐。张作霖无可奈何，只得再向直系作出让步，但由此对直系更加不满。

由于北京政府始终未能谋得外国借款，到1921年底，已经“穷”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了。各省军阀索饷，各部职员索薪，帝国主义索债，中交两行因储备空虚而限制兑现，闹得财政总长李士伟不敢到任。总统与总理各派私党把持税务机关，为自己一方搞钱，双方冲突日益激化，发展成府院对立的政潮。直系因军费分配不均早已对靳云鹏恨之入骨，张作

霖由于内阁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也与靳产生隔阂，认为靳在帮助直系扩大势力，因此两系均想倒阁。徐世昌早想更换新内阁，由自己属意的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组阁，梁与张作霖私交甚笃，奉系自然不会反对，但还必须得到直系的允诺。梁士诒便亲自出马向曹锟游说，吹嘘自己筹款有术，一旦上台可多发军饷。曹锟利令智昏，被其言辞所惑，便应允让他姑且一试。有了两系军阀的支持，梁士诒于1921年12月24日上台组阁，不料梁网罗了一个清一色的亲日派奉系内阁。随即，他便根据已与皖系、安福系相勾结的张作霖的建议，下令特赦了段芝贵、陈文运、魏宗瀚、张树元等皖系战犯；1922年1月5日，又公然起用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为实业专使和北京市政督办。至于给直系军饷的许愿早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奉系要饷则百般筹措，直系要饷便敷衍搪塞。这一下把曹锟和吴佩孚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对这个亲日内阁一天也无法容忍了，立即由吴佩孚挂帅，发起了一场声讨梁内阁的电报战，痛斥梁的亲日卖国政策，齐燮元、萧耀南、冯玉祥、陈光远一齐上阵，讨梁电报如雪片般漫天飞舞。然而梁士诒有张作霖做靠山，厚着脸皮硬是不肯下台。于是曹锟进一步施加压力，授意吴佩孚联络山东、河南、陕西、江苏、湖北、江西6省督军及省长联名上书徐世昌，要求大总统顺应民意，将梁免职，否则6省与梁内阁脱离关系。1922年1月23日，梁士诒虽被迫躲进天津租界，但既不请假，也不辞职。徐世昌只得让外交总长颜惠庆暂代内阁总理。

梁内阁为奉系效尽犬马之劳，现被吴佩孚挤下台，使张作霖恼恨不已。在开始一段时间，张未对直系的进攻予以反击，是因为直系兵力雄厚，而有所顾忌。为与直系抗衡，张作霖一方面与孙中山建立同盟关系，要国民党首先在南方战场发动北伐；另一方面极力联络和扶植皖系。3月初，奉、皖、孙三角同盟初步确立，张作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态度便日益强硬起来，遂以换防为名调动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情报，也立即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

曹锟对这种情况惶恐万分，一面约束吴佩孚切勿轻举妄动，一面派曹锐急赴沈阳安抚张作霖。此时孙中山的北伐军因受制于陈炯明，一时尚不能出动，所以张作霖也乐得暂缓一时，于是直奉两系的关系稍有缓和。吴佩孚对曹锟的软弱极为不满，坚决主张与奉军决战，便组织直系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将领继续攻击内阁。张作霖气愤已极，联合皖系通电表示一定要制裁这种破坏纲纪的行为。孙中山也表示将全力北伐，张作霖的态度立即强硬起来。4月10日，大批奉军涌进关来，以军粮城为大本营，一直开到德州附近。曹锟对奉军的大举进逼节节退让，命令所有驻津直军均撤回保定，驻德州的直军也撤到正定，曹锟还电令津浦路上的直军不得抵抗，所有营房及德州兵工厂均让与奉军，并表示必要时自己可以下台。

吴佩孚对奉军的进犯毫无退让之意，紧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部队，将第二十三师调往保定，第二十四师调往郑州，并急令陕西督军冯玉祥速来应援。

4月19日，张作霖通电建议召开和平统一会议，目的是按照孙、段、张三角同盟的预定计划，推翻北京政府。张作霖声称，谁敢反对，就以武力对付。

直系诸将领对于曹锟的不抵抗方针一致表示不满，曹也看出一味退让无济于事，遂下决心付诸一战。他打电报给吴佩孚：“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样办，我就怎样办。”

此时几条战线的情况均发生了变化，孙中山因陈炯明在背后掣肘，不得不回兵广州，北伐一时无法发动；海军总司令蒋拯在上海表示支持直系，卢永祥受到牵制；冯玉祥率军急赴河南，赵倜、张文生也不敢动了。奉系的两路盟军均被瓦解，奉军只能独立作战了。张作霖又想推迟决战，便指使卢永祥出面要求和谈。但吴佩孚不给张作霖喘息之机，25日，吴联合直系军阀联名通电宣布张作霖的十大罪状，然后当天便到前方督战去了。

张作霖见战争已无法拖延，便于29日赴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以孙烈臣为副司令，随即下达了总攻击令。

帝国主义国家除日本支持张作霖外，所有西方列强都支持曹锟。美国公使休士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限制军务会议的精神，全面裁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发出警告，不得在京奉路运兵；天津领事团声明，按《辛丑条约》规定，不许在天津驻兵。战事打响以后，帝国主义报纸

各自替所支持的军阀大肆宣传，西方国家宣传直军取胜，日本则吹嘘奉军大捷。从双方军力来看，直军实际投入前线的兵力有6万余人；奉军入关人数达12万人，超出直军一倍，武器装备也优于直军。然而直军训练有素，久经战阵，因此奉军也未占很大优势。在5月4日以前，双方在任丘、固安、霸县、长辛店一线交战，互有进退。5月4日，西线奉军第十六师突然停止战斗，致使西线奉军全线崩溃。第十六师原系冯国璋的部队，这次被奉军摆在一线充炮灰，终于在临阵罢战后倒戈。张作霖闻讯，急赴落垡，妄图挽救败局。但东线及中路奉军受西线败局的影响，军心动摇。张作霖知大势已去，只得下令退回滦州。

5月5日，徐世昌下令：“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均应听候中央命令解决。”徐不敢指责张作霖，便把叶恭绰、梁士诒、张弧三人定为此次战端的祸首，梁等人慌忙化名逃往日本去了。

河南督军赵倜与安徽督军张文生暗中约定配合奉军行动。5月4日，赵倜接获张作霖发来大获全胜的电报，不等张文生的军事配合，便独自发兵进攻郑州，被冯玉祥击败。5月11日，北京政府将赵倜撤职查办，改任冯玉祥为河南督军。

5月1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5月20日，东三省议会宣布“联省自治”，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这次直奉战争，是日本与西方国家争夺中国的反映，直系的胜利与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张作霖虽然败出关外，但军事实力并未受到很大影响，为以后中国政局的进一步动乱留下了隐患。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曹锟贿选

1923年6月，黎元洪被逐出京之后，北京政府只能暂由内阁临时摄政。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界的一致反对。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否认摄政内阁，各省团体纷纷通电痛斥直系军阀，浙江团体的电报更公开指斥曹锟为叛逆，就连研究系首领梁启超也警告曹锟不要一意孤行。

但一心要做总统的曹锟，对反对他当总统的舆论置若罔闻，逼着手下的幕僚政客拿出早日“登基”的办法。保派政客鉴于国会议员大批离开北京，提出以拥戴的方式举曹为非常大总统，或由曹锟以内阁总理名义代行总统职权，但吴佩孚对这些办法均不以为然，极力主张总统必由国会正式选举产生。于是曹锟及党羽决定在缓和与奉皖及国民党关系的同时，加紧收买议员，为利用国会选举曹锟做总统准备条件。曹锐、鲍贵卿二人分头游说段祺瑞与张作霖，又通过孙洪伊的关系去拉拢孙中山。可是三处均遭碰壁下场。但曹锟不见棺材不掉泪，决心用金钱来买大总统的位子。

由于议员纷纷出走，总统选举无法举行。被直系收买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为曹锟设计了“先宪后选”的圈套。曹锟本人只想早日过把总统瘾，并不需要什么宪法，开始对此计大不以为然，经吴反复解释，方明白所谓先行立宪，只是为将议员骗回北京，为大选创造必要条件，待议员人数凑够，再将“先宪后选”改为“先选后宪”就是了。

曹党“先宪后选”的圈套抛出以后，议员们将信将疑。为此，曹锟又发出通电，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统，全力支持国家根本大法的顺利完成。直系大小头面人物也纷纷发出通电捧场，一时间曹锟俨然成为一位不慕名利、一心为公的“圣人”。

而此时，用金钱贿选的幕后“故事”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张、段、孙三方结成反直同盟，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拆曹锟的台。一方要贿选，另一方便“贿不选”。张作霖拿出70万元，凡赴沪议员从7月份开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始，每人每月发给月费300元。黎元洪也在津接待赴沪议员，凡赴沪者每位赠路费500元。于是财迷心窍的议员们便纷纷离京赴沪。在上海，卢永祥又为南下议员专设了招待所及办公地点，并指定以上海纸烟捐、电报局收入、烟酒税及盐税余款为国会经费。7月14日，到沪议员已达200余人。曹锟见势不妙，便下令直系各省速筹贿选经费。直系大员们纷纷报效，萧耀南、齐燮元、阎锡山三人各送50万，田中玉40万，刘镇华、张福来、马联甲各30万，张锡元、陆洪涛也不甘心落后，各奉献20万元。直隶省长王承斌最为卖力，他将全省170余县分为大、中、小三等，饬令大县筹借3万元，中县2万元，小县1万元。另外，他还想出了“捉财神”的办法，逮捕贩毒分子500余人，先找出几个无力缴纳巨额罚款的“小鱼”毙掉，杀鸡儆猴，大毒贩们只好乖乖拿钱保命。仅此一项就捞到500多万元。经费筹足，曹锟一伙便宣布每位议员参加一次“宪法会议”发出席费20元，每周参加常会的出席费100元。此外还有“冰敬”（夏季津贴）、“炭敬”（冬季津贴）等各种名目。这样，在京议员每人每月可捞到600元，而在沪议员仅得300元，于是，在外议员又争先恐后奔回北京，仅几天工夫，曹锟就买到手500多名议员。此时，曹锟、吴景濂等便收回了“先宪后选”的鬼话。

9月初，曹锟的心腹山东省长熊炳琦、秘书长王毓芝和吴景濂在甘石桥成立“大选筹备处”，主持贿选事宜。为增加对议员的吸引力，吴提出议员每次出席费再增加100元，并准许议员任期延长一年。这样一来，更多的议员奔回北京。曹锟此时已急得如热锅蚂蚁。吴景濂等见议员搜罗得差不多了，便向摄政内阁正式提出大选问题，并且规定每张票价5000元，对一些“大议员”在普通票价外另给报酬，愿要官的也都作了许诺。但议员们担心投票后曹耍赖不付款，曹等又深恐付款后，议员不投票，究竟是“先付后选”还是“先选后付”，一时双方都不肯让步。

9月7日，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停会三个多月的众议院常会复会，先行通过了众议院议员任期延长案，随后参议院也通过了任期延长案。9月8日召开了选举总统预备会，为保证达到法定人数，规定大选出席费200元，带病出席者外加医药费200元。9月10日继续召开总统选举预备会，出席者431人，不足法定人数，吴景濂便指使众议院秘书长郑林泉冒签名为436人，会议得以开成，议决12日正式举行总统选举。被冒签的议

员纷纷通电揭露冒签名单的恶劣行径。12日正式举行总统选举会，大批军警出动阻止议员出京，并要求市民悬挂国旗以庆祝新总统诞生。为吸引议员前来投票，出席费提高到500元。但议员们吵闹一番后，竟一哄而散。

此时，身居保定的曹锟再也按捺不住了，急派在逼宫夺印、筹款助选两件大事上表现出异常才干的王承斌为贿选总司令，并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在双十节前坐上总统宝座。王承斌接“旨”后，急赴北京，制定出大选与公布宪法同时并举的方针，并毅然拍板，在选举前发给每票5000元的支票，选举完成后立即兑现。可是很多议员怀疑直系在银行中并无存款，王承斌请他们派人去天津直隶银行核查，查明无误后，议员们又担心直系势力下的地方银行将来会拒绝付款，要求将款转存外国银行，王承斌也答应照办。

而“贿不选”的反曹同盟也孤注一掷，在六国饭店特设机构，以每人8000元的价格收买反曹议员。重赏之下，两天便收买了40余人。由于有40人在手便可使总统选举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产，更兼财力有限，所以便停止了收买行动。不料这些议员毫无廉耻，刚在反曹派处领了8000元，转身又到吴景濂那儿去拿那5000元，被人们称为“猪仔”议员，真是并未冤枉他们。9月23日，在京议员已达600人以上。30日，议长吴景濂发出通告，定于10月5日正式举行总统选举大会。10月1日，“大选筹备处”开始给议员开支票，共发出573张，普通票价每张5000元。支票签名有秋记（吴毓麟字秋舫）、孝记（王承斌字孝伯）、兰记（王毓芝字兰亭）、洁记（边守靖字洁卿）四种，分别由天津“大有”、“劝业”、“麦加利”等银行兑付。支票一律未填日期，须在总统选出三日后，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私章才能付款。除普通票价外，还有10000元及10000元以上的特殊票价。

曹锟公开贿选总统，已是举国皆知，但开始尚无实证公诸报端。10月4日，浙江籍众议院议员邵瑞彭挺身而出，向北京地方检察院举报吴景濂等人的行贿行为，并将证据送交各报发表。证据是大有银行的支票5000元，上面未填日期，签名者为洁记，并盖有“三立斋”图记，背面注有一个“邵”字。在铁证面前，曹党无可抵赖，但检察院哪里敢立案。倒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是邵瑞彭怕遭迫害，阖家出逃。

10月5日凌晨，北京军警倾巢出动，不仅交通要道设了岗，而且保安队往来巡逻。众议院对面的城墙上架起了机关枪，众议院院内满布消防兵，个个头戴钢盔，手执水枪，处于一级灭火状态。所有入场者均要经搜身，旁听者搜身后，还要与介绍议员对质方得入内。凡进入会场者不得擅自退出，午餐由议院供给面包充饥。

选举会主席吴景濂8时30分到会时，议员席尚稀稀落落，只得改为不定时开会。等到11时40分，签到者才400余人。吴急忙派出180辆汽车去接未到议员；又派可靠议员分头去拉同党、同乡的议员，每人至少要拉一人回来。连重病难支的议员张佩绅、廖宗北、易宗夔等也被抬来了，待写票后方许抬回。为了凑足法定人数，临时决定不投票而肯出席者也一律照发5000元支票。这样，一些反对曹锟的议员得到姓名可保密的保证后也被拉来。一直闹到下午1时20分，签到者方凑够593人，达到了法定人数。吴景濂立即下令摇铃开会。

选举会签到人数，计有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准时出席者585人。报告完毕，便开始投票。共发出选票590张，至下午4时投票完毕。整整闹了将近一天。大会供应午餐茶点，并租下隔壁大中公寓的烟馆，有大烟瘾的议员要向吴景濂领取通行证，在军警监视下去吸烟。选举结果是，投票总数590票，曹锟得票480票，当选为总统。其余得票人有：孙中山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唐绍仪、张绍曾、严修等17人各得1票。还有废票12张，其中有孙美瑶（临城劫车案的匪首，招安后任旅长）1票，“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

10月10日凌晨，曹锟自保定赴京，上午10时，在怀仁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同日，还公布了“猪仔”议员们匆匆炮制的《中华民国宪法》。

据统计，此次曹锟所用的贿款高达1356万余元，其中各政党补助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费141万元，普通票价费304.5万元，特别酬劳费32.4万余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冰

敬”、“炭敬”及车马费190余万元，招待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曹锟的巨额贿款除通过在势力所及的各省摊派搜刮外，还用加征关税、滥发纸钞、出卖沧石、同成、道济铁路路权等手段聚敛而来。新闻界对巨额贿款的数量及来源作了披露后，举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直系军阀统治的运动。

曹锟当选次日，孙中山下令通缉贿选议员，并警告各国不得承认曹锟的总统职位，同时筹划讨伐直系的军事行动。随之，张作霖、卢永祥、唐继尧、杨希闵等先后通电反对贿选，并宣布与曹锟政府断绝一切联系。全国各地市民、学生掀起大规模的反贿选群众运动，纷纷调查受贿议员，并将名单公布于众。凡参加贿选的议员均被指骂为“猪仔”议员，不少“猪仔”议员财产被抄、住宅被捣毁，被家乡群众削除乡籍。杭州反贿选大会还通过一项决议，在西湖边铸一曹锟铁像，如秦桧夫妇一样，千秋万代被国人唾骂。以上种种表明，曹锟靠金钱贿选得来的总统位置，是不得人心的，只能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更加软弱和动荡。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四 短命的执政府与安国军政府

1 夹缝中的段执政

如前所述，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所部改称国民军。1924年10月31日，被国民军软禁的曹锟被迫批准颜惠庆内阁辞职，任命黄郛代理国务总理。11月2日，曹又被迫宣告退位，将大总统印信移送国务院，由黄郛摄行总统职务。至此由曹、吴集团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宣告终结。

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在推倒曹、吴政权的同时，还干了两件大事，这就是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和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冯做下这两件事情，表明国民军开始倾向革命，因此遭到北洋军阀们的忌恨，各帝国主义也不断地向其施加压力，使以国民军为靠山的黄郛临时内阁在北京很难维持下去。当然，已在北洋军中带兵多年，积累了不少政治经验的冯玉祥对这些后果事先并非没有考虑。10月23日，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在电请孙中山迅速北上主持大计的同时，又接受了倾向皖系的山东督理郑士琦提出的拥段祺瑞出山的建议，公开邀请段祺瑞先行出面就任国民军大元帅，处理军政事务；在段尚未到北京之前，暂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代行职权。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同时又请段祺瑞出山处理军政，这两件事之间明显存在矛盾，而且必然会使北京政变打开的新局面趋于复杂化。冯玉祥作出这种自相矛盾的决策，除了其思想水平的限制，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国民军本身实力单薄，尚难与其周围的北洋军阀势力抗衡。

段祺瑞早已料到，曹、吴被推翻后，自己会被推戴出山。实际上他和周围一些皖系政客早就在活动了。但是，他却不肯在张作霖表态之前，成为冯玉祥一派的旗帜。富有政治经验的段祺瑞深知必须得到具有更大武力的奉系认可后方能出山。再者，他也还要看看长江流域直系各省对自己的态度。30日，张作霖发出通电，推举段祺瑞为联军统帅，段便积极活动起来。在他的催促下，冯玉祥、张作霖先后抵达天津。经皖系政客竭力撮合，冯、张二人勉强坐到一起，讨论了政治和军事问题，这就是所谓天津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结果，是由张作霖、卢永祥、冯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玉祥、胡景翼、孙岳5人以联名推戴的方式，于11月15日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执行政府职权。21日，段祺瑞发出“马电”，宣告就任临时执政。在“马电”中，段祺瑞提出，要组织两种会议，“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针为主旨”，“一曰国民代表会议，拟援美国费府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还说，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完成使命辞职下野。后来的事实表明，段不仅迷恋国家元首的地位，而且从来未打算改弦更张，尊重民意，就职通电所作的许诺，不过是为骗取民众好感的假话，一纸空文而已。

21日下午，段祺瑞乘专车从天津驶抵北京。23日，摄政总理黄郛将新刻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大小二印转交给段。24日，段在铁狮子胡同临时执政办公处正式履职。

鉴于以前北洋历届政府屡屡发生“府院之争”，段祺瑞此次便将总统总理二者合一，使临时执政兼有二者的权力。而且由于大多数议员都参加了贿选，国会无法开会。乍看起来临时执政可以不受任何方面的牵制，独揽政权。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段祺瑞是由国奉两系拥戴而出任国家元首的。他本人的嫡系部队早已在直皖战争中被瓦解，此时身边只剩下一批政客、官僚，如此缺乏本派系实力为后盾的国家元首也只能听命于人。

25日，段祺瑞任命唐绍仪、龚心湛、李思浩、吴光新、林建章等人为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等各部部长，唐绍仪始终未就职，后由次长沈瑞麟为外交总长。这实质上是一个以安福系为核心，包括部分与国民军有渊源人物的混合型内阁。这个时期段采取了抑制实力强大的奉系的策略，以期国奉两系力量取得大体平衡，便于自己驾驭其上。国奉两系在华北划分势力范围的原则是：奉军在津浦线进至德州为止，而国民军则可沿京汉线向河南发展。这是段祺瑞提出的。1924年11月中旬，黄郛内阁征得段同意后，分别任命胡景翼、孙岳为河南督办和省长，使国民军控制了京汉线中段。冯玉祥深恐因此引起奉系不满，在段祺瑞就职次日，提出辞职，被段挽留。

但是，段祺瑞提出的划分国奉势力范围的原则意见并不能制止奉系继续向南扩张。12月7日，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卢永祥、李景林、张宗昌

等开会。卢永祥欲重返浙江，李景林盼望卢南下，把直督之位让给自己，张宗昌则希望随卢一道南下，借机谋得一省地盘，因此会议一致决定要求段祺瑞下令，免去江浙战争的肇事祸首江苏督军齐燮元之职，并命奉军南下。在奉系的压力和为皖系卢部争地盘之念的引诱下，段祺瑞改变了暂不触动长江各督的初衷，于12月11日下令，裁撤江苏督军一职，派江苏省长韩国钧暂兼江苏军务督办，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派李景林暂署直隶军务督办，齐燮元就地免职。此令发出，江苏各界恐战祸再起，纷纷通电反对卢永祥南下。而齐燮元也因得不到部下支持，只好将督军印信移交省长韩国钧，悄然赴沪。奉军进驻浦口之后，孙传芳深恐奉军入侵浙江，通电表示以武力抵抗南下奉军。齐燮元见有机可乘，也策动旧部将隶属于奉系的淞沪护军使张允明所部缴械，与孙传芳共同组成了浙沪联军，齐任第一路军总司令，孙任第二路军总司令，联名宣言反对奉军南下。段祺瑞为分化齐、孙联盟，于1925年1月14日下令裁撤淞沪护军使，16日下令斥责齐燮元挑起战争，派员查办；同日任命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郑士琦为山东军务督办，孙传芳为浙江军务督办，周荫人为福建军务督办。孙传芳因自身地位暂获保全便转而采取退守观望态度。17日张宗昌率奉军向齐燮元发起进攻，齐军一触即溃。28日齐燮元通电宣布下野，即日乘轮东渡。奉军于28日进驻上海。张作霖本想一鼓作气，连浙江也收入囊中，但段祺瑞力主和平，并派吴光新赴沪调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张作霖与孙传芳订立和平协定。奉系在二次江浙战争中有所退让与其后方形势有一定关系。国民军进占河南以后，随时可截断津浦铁路。因此奉系将领多劝张作霖收缩兵力，巩固后方。

此时，奉系在关内虽已取得直隶、山东、江苏和上海，但仍不满足，又竭力吞并安徽。段祺瑞在奉系压力下把鲁督位置让与张宗昌后，便把皖系仅存的地方实力派郑士琦调任安徽。但张宗昌不许郑从山东带兵赴皖，并以武力解散了忠于郑的鲁军。郑因而不敢赴皖就职。不久，奉段祺瑞之命在郑士琦到任前督理该省军政的王揖唐也被依附奉系的地方势力逼走。于是张作霖趁势保举姜登选出任皖督。段祺瑞见奉张如此嚣张，愤然表示：“安徽是我的家乡，我都管不了，还留在北京干什么！”张作霖见段不惜以去就力争皖督，方稍示退让，收回保荐姜登选的要求。6月18日，段祺瑞任命皖系吴炳湘为安徽省长兼督办。但吴手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中不掌握得力军队，无法应付毗邻的湖北、江西和浙江等地的直系势力。奉系又找到新借口，向段祺瑞施加压力。至8月底，段不得已，终于按照奉系的要求任命姜登选“督办安徽军务善后事宜”。此时，国民军已占领了陕甘两省，势力也有所扩大。唯皖系，不仅卢永祥丢掉的地盘不能夺回，即原据山东的郑士琦也被奉系剥夺殆尽。段见残存皖系势力在国奉两系排挤下，仅剩下一批政客、官僚，地盘军队全无，心中隐痛自不待言，但也无可奈何。有枪方能有势，枪多方能势大。既然缺乏武力为后盾，那么也只好看张作霖和冯玉祥的眼色行事。对段祺瑞的尴尬处境，张作霖看得很清楚，曾辛辣地讥讽这位当年威风凛凛的北洋上将而今如同一只“北京烤鸭”，两面受到烟熏火烤。

孙传芳认定奉军占据江苏、上海，必然危及自己的地位。杨宇霆、姜登选走马上任后，孙传芳便秘密召集东南各省会商讨奉军事。此时吴佩孚已经基本上控制了湖北，孙传芳遂与吴约定联手讨奉，占领南京后，请吴主持大局。此后，孙传芳便积极布置讨奉军事，10月10日，孙以奉军违反“上海永不驻兵”协定为名调动军队，15日，孙自称浙、闽、皖、赣、苏五省联军总司令，分兵五路进攻上海，没有作战准备的奉军只好撤出上海。随后，长江流域的直系各省纷纷通电响应孙传芳，并电请吴佩孚出山主持大计。奉军因战线太长，深恐国民军从后方再插上一刀，匆匆退守徐州。10月21日，吴佩孚重返汉口，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职。当时孙传芳曾盼望吴如约到南京，主持讨奉军事。但吴一心要借讨奉之名义假道河南先驱逐国民军，恢复昔日地盘再说其他。国民军在奉军退守徐州后正欲动手从侧翼攻击奉军，不意吴佩孚东山再起，并要假道河南，只好停止对奉军动作，增兵豫南，阻挡吴佩孚。张作霖很快便窥悉吴佩孚的用心，遂在表面上仍维持与冯玉祥的合作关系，暗中却联络吴佩孚共同制冯，直系也因此分化出联冯讨奉与联奉讨冯的不同路线。孙传芳占领徐州后，公开申明自己所辖东南五省退出吴佩孚为首的军事联盟。

段祺瑞见吴佩孚东山再起，深恐国奉战端一开，吴乘虚北上，危及自己地位，因此乃竭力撮合国奉二系。冯玉祥担心张作霖与吴佩孚联手，对是否与奉张决裂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而张作霖更害怕冯玉祥与孙传芳联手，不愿过早与冯决裂。为稳住国民军，张遂主动表示同意奉军

从北京周围撤军，并将保、大地区重新让给国民军驻守。但国奉之间矛盾是根本的利害冲突，不是张作霖作出一些小的让步就可以化解的。11月20日，冯玉祥与奉系重要将领郭松龄暗立密约。22日，郭松龄以清除张作霖身边“宵小”为名，自滦州回师奉天。最初郭军进展顺利，12月上旬陷营口，奉天全省震动，张作霖已准备易服逃亡。但就在张作霖岌岌可危时，日本关东军得到张某些许诺，突然采取行动，助奉作战，巨流河一战郭军大败，郭本人被杀。直督李景林原拟附和郭松龄倒奉，但待郭军起事后，他又转而宣布“中立”，这主要是因为吴佩孚在中间插了一手，把李景林拉入自己的阵营。

11月中旬，国民军征得孙传芳同意后，出兵山东。12月初，国民军向李景林提出“假道援郭”。李不答应，双方即在天津附近交火，因李景林曾属奉系，所以此战拉开了国奉战争序幕。12月下旬，李景林兵败，便率军南下与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

自国民军进攻天津，国奉矛盾即无调和余地了。李景林、张宗昌宣称“宁可将直、鲁地盘给与直派，绝对不愿归于国民军之手”。由于李、张二人竭力在张作霖与吴佩孚之间撮合，12月31日，吴佩孚通电宣称，停止讨奉。

自国奉战争爆发，段政府实际上已失去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各派军阀也不再注意段祺瑞的态度。只不过段本人恋栈，不肯下台，照旧发号施令。国奉开战之初，段本人的态度仍偏于国民军一方。

1926年1月上旬，张作霖以讨伐附和郭松龄倒戈的魏益三部为名，派兵入关。段祺瑞曾打电报予以制止。此前，为避各方反对的锋芒，段决定成立国务院，所选各部总长王正廷（外交）、于右任（内务）、陈锦涛（财政）、贾德耀（陆军）、马君武（司法）、易培基（教育）等，多为与国民军或国民党有历史渊源的人。至2月中旬，奉张与直系公开联合，张宗昌、李景林在张作霖支持下，分别就任吴佩孚领导的“讨贼”军鲁军、直军总司令，迫使段祺瑞进一步依靠冯玉祥来支撑执政府。当时，段任命冯玉祥为直豫陕宣抚使，主持讨吴军事，还任命冯玉祥的把兄弟贾德耀为国务总理。但冯寄望于本人宣布下野后，部属能与吴佩孚达成妥协，以保存实力，故以准备赴苏俄考察为借口，拒绝接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受段的任命。而段祺瑞拉拢孙传芳的手段也未奏效，以致新成立的贾德耀内阁首次会议无法如期举行。

直鲁联军一面自陆路进攻，一面自海路窥测大沽口。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直奉联合，不仅用轮船为直鲁联军运送军饷，而且掩护直鲁军舰艇驶入海河口。国民军被迫封锁大沽口，而西方驻华外交使团却因此向执政府提出抗议。

当时主持国民军的鹿钟麟答应重新开放大沽口，但要求外轮不得为直鲁联军运兵，不得掩护奉军舰只混入海口。但蓄意制造事端的日本海军3月12日仍派出舰只掩护奉、鲁舰队驶入大沽口，非但不听从炮台国民军反复制止，反向岸上开炮，国民军被迫还击，双方互有伤亡。16日，参加《辛丑条约》的八国公使联合向执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停止在天津大沽一带抵抗，撤除对大沽口的封锁，并限于18日正午予以满意答复，否则各国将采取行动。

帝国主义各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威胁国民军的消息传出以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京津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恨。3月18日，北京市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会后游行队伍到临时执政府门前，要求面见段祺瑞和贾德耀。执政府卫队竟突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队伍开枪，当场打死46人，伤155人。事后段祺瑞等还诬蔑请愿学生是“暴徒”。三一八事件以后，段祺瑞见国民军大势已去，又转而致力于联络奉军。鹿钟麟得到情报后便先发制人，于4月10日将执政府卫队缴械，段祺瑞事先得到通报逃匿东交民巷。次日鹿钟麟一面通电宣布段祺瑞残杀人民、背叛国民军的罪状，一面释放曹锟。但国民军谋求缓和与吴佩孚的关系的种种举措并未得到预期的反应。吴佩孚对鹿钟麟最宽厚的条件竟是要求鹿等下野并交出军队。而奉系唯恐吴佩孚收容国民军，更加紧进攻北京城。15日，奉军占领通州，吴军进抵西苑，国民军只得撤出北京，退守南口。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段祺瑞还一度指望张作霖和吴佩孚在无法就政局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仍然推举他继续执政。但是，吴佩孚对自己在二次直奉战争战败后曾受到段祺瑞的压迫仍耿耿于怀，因此不仅表示绝不拥戴段，还对外声称要拘捕安福党人，“监视段氏”。张作霖对段的态度

虽然比吴佩孚客气，但也明确表示不再拥段。至此，存在一年零五个月的临时执政府只有宣告自行结束一途了。4月20日，段祺瑞在直鲁联军保护下遁往天津，并通电全国，宣布“引退”。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奉直两系的明争暗斗

奉吴结盟对双方来讲均属权宜之计。吴佩孚欲借奉系势力清算当年冯玉祥反戈一击的旧账，并图谋借机东山再起，重掌国政；张作霖也想利用吴佩孚的力量打垮国民军，控制北京政府，形成奉系独揽天下的局面。因此在国民军退出北京地区后，奉吴双方即在组阁问题上产生摩擦。

吴佩孚在与张作霖结盟时，曾获得后者口头允诺，驱逐国民军后，改造北京政局由吴主持，奉系决不干涉。吴佩孚从挽回面子和建立听命于己的亲西方政府这两方面考虑，决定在请曹锟补行宣布辞职的同时宣布恢复曹当年颁布的宪法，并由1924年9月曹所任命的颜惠庆再度组阁。此即所谓“护宪不拥曹”。而奉系的打算与吴大相径庭。奉系主张恢复约法，重开国会，由张的亲家靳云鹏组织一个亲日的摄政内阁。但是张作霖既与吴有不干政之约，也不愿背上食言背约的恶名。4月25日，在吴奉双方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便对吴方提出的恢复宪法和颜内阁复职的意见，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实际上不置可否就是表示反对。会后，张学良一面重申军事问题“决与玉帅（吴佩孚）合作到底”，一面又由他人之口透露出最好由靳云鹏组阁的口风。

吴佩孚以张作霖已有诺在先佯作根本不解奉方暗示，于5月11日匆忙发表了曹锟补行辞去总统职务的通电。曹在通电中称“因病”辞职，由国务院“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但颜惠庆未得到奉张同意，并不敢贸然履任，次日即通电表示不接受组阁任命。久欲联吴制奉的孙传芳窥察吴奉间的矛盾，认为有机可乘，迅即改变策略于4月20日抢先通电拥护颜内阁复职。张作霖在吴孙可能联手制奉的压力下，终于在5月8日勉强表示同意吴关于内阁的主张。

5月12日，颜内阁宣布依法复职，翌日任命顾维钧为财政总长，施肇基为外交总长，张国淦为司法总长，郑谦为内务总长，张景惠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杨文恺为农商总长，王宠惠为教育总长，张志潭为交通总长。从这个内阁的表面阵容看，是吴奉孙三方混合体制，

但吴系人物占据总理、财政、外交和教育4个重要席位，实质上是以吴系为核心的内阁。奉系仅得了内务、陆军两席，甚为不满，遂决定奉系阁员均不参加。由于张景惠和郑谦不肯入阁，其他阁员也不愿贸然就职，内阁便成为只有总理而无阁员的单人内阁。中央政府落到如此受人冷落的地步，在民国政治史上实属罕见。奉系还用索讨军费的办法向颜内阁施加压力，声称讨冯军费用去7000万，应由政府偿还。吴佩孚早料到颜内阁无法长期维持，不过为维持自己威信，坚持要颜内阁在形式上走走过场，哪怕存在一天也好。在吴佩孚的压力下，杨文恺、杜锡珪、顾维钧、张志潭、张其锽、郑谦等人先后就职，并于6月22日举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内阁会议。该次会议办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以内阁名义发出通电，欢迎吴、张两位“大帅”入京，此外就是通电批准颜惠庆辞职，由杜锡珪代理内阁总理。这一届颜内阁可称是中华民国史上最短命的内阁了。

在政局极度混乱的情况下，野蛮的奉系军阀干了不少胡作非为的事情。4月24日，奉军逮捕了进步记者邵飘萍，并不顾北京报界的抗议，以取缔赤化分子为名，悍然将邵杀害。不久，张宗昌又以“宣传赤化”为名逮捕了《公言报》主笔林白水。林因在一篇文章中把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比作“肾囊之于睾丸”，惨遭杀身之祸。

冯军退出北京后，主力停驻南口一带，随时威胁北京，因此奉吴双方虽然在政治问题上鸡啄狗咬，但在军事上保持着合作关系。奉吴两系并与阎锡山达成协议，三路进兵夹击冯军。奉军攻热河，晋军攻绥远，吴军攻南口。南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奉系继续维持与吴的军事合作，也是想让吴为其火中取栗。阎锡山更是老奸巨猾，始终按兵不动，专等“盟友”先行用兵，待到两败俱伤之际再渔人得利。可是吴佩孚一心忙于组阁，也不急于发动攻势，因此在军事上始终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而冯军却乘机抢先向晋军发动攻势，拟重创晋军后，再集中力量对付南口的吴军。晋北战争5月中旬开始，晋军节节败退，到6月中旬，晋军已退至怀仁以南、雁门关以北。阎锡山一面亲自督战，一面连连派出要员催促奉吴马上进攻南口以解晋北之急。

吴佩孚素来轻视冯玉祥及其所部的战斗力。6月28日，他在长辛店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设立总司令部后，即宣布10天之内攻下南口，但吴佩孚带到京西打冯军的部队多是由国民二、三军改编的，很不情愿与第一军的老弟兄手足相残，有的甚至易帜倒戈。而就在此时，南方局势也发生重大变化。1926年5月，广东国民政府派军援湘作战，揭开北伐战幕。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主力直驱两湖。北伐军7月12日进占长沙，8月中下旬，连克平江、岳阳、蒲圻等重镇，进入湖北战场。吴佩孚在北京接到部下从两湖发来的求援电报，心急如焚，但又不愿在张作霖面前把脸丢尽，硬撑到国民军从南口撤退。直军和张宗昌的奉鲁军攻占南口以后，吴佩孚本想乘机把杜锡珪代理内阁扶正，然后再南下解决两湖问题。不想老奸巨猾的张作霖并不买吴的账，表面上虽然对吴客客气气，但暗地一直想方设法拆杜锡珪内阁的台。到了岳阳丢失的消息传到北京，吴佩孚再也顾不上与张作霖争夺内阁控制权了，21日晚，他把齐燮元找来，代理总司令职务，自己连夜南下。23日，他在保定召集紧急军事会议，次日便带着勇将刘玉春赶赴汉口。

当吴到达汉口查家墩直军司令部时，北伐军已攻到武昌桥头堡汀泗桥。27日，南北两军展开了汀泗桥争夺战。吴亲临前线督战，下令只许前进不许后退，退缩者一律处死，并派大刀队阵前执法。进攻汀泗桥的主力是叶挺率领的北伐军第四军独立团。该团连以上干部均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第四军在北伐军中享有“铁军”之称，而独立团在该军中又向以英勇顽强著称，其战斗力可由此推知。在独立团的冲击下，吴军执法队砍下了临阵退缩的营团长的9颗人头，也无法稳住阵地，终于在独立团的钢铁洪流面前土崩瓦解。吴佩孚连夜逃回武昌，一面命令部队在武昌掘壕固守，一面急电各方请求援兵。9月1日，北伐军兵临城下，一面围攻武昌，一面分兵由新堤下游的簰洲渡江，于9月5日进攻龟山。后由于吴军刘佐龙部归降北伐军，龟山落到北伐军手里。吴佩孚闻讯，命令刘玉春死守武昌，自己则带着靳云鹗等仓皇逃往郑州。8月17日，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冯为国府委员兼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于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先南下西安与国民二、三军会师，嗣后便准备进军河南，而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则把矛头对准了孙传芳。

孙传芳在吴佩孚与北伐军拼死决战之际，曾对江浙士绅讲了这样一

句话：“广东党军（北伐军）本像一团绳索，刀子不能砍断，但当拉成一道长线时，用剪刀就能剪断它。”吴佩孚败逃后，孙认为北伐军亦成疲惫之师，并且战线过长，“用剪刀剪长绳”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在得到奉鲁军“合作讨赤”，决不背后伤人的许诺之后，孙便将自己的所谓五省联军组成5个方面军，分别向江西、湖北、广东发起进攻。此时，北伐军也分兵进攻江西，双方围绕南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0月10日，死守了40余天的武昌城终于被北伐军攻克，使孙传芳里应外合、会师武昌的计划成为泡影。10月16日，浙江省省长夏超在杭州发动了响应革命军北伐的政变。后事变虽被孙传芳镇压下去，但孙军阵脚已被打乱。武昌攻克之后，叶挺部队又开进赣北。11月6日，北伐军占领九江，8日攻克南昌，江西孙军全部溃败。孙本人丧魂落魄地逃回南京。此时，孙传芳在福建的势力也被北伐军击溃。到了此时，孙传芳方认识到凭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北伐军抗衡，开始考虑向奉张靠拢，联奉图存。

逃回郑州的吴佩孚收拢残兵败将并略加整顿后，本想与坚守武昌的残部刘玉春里应外合，反攻武汉，但武昌城很快被北伐军攻陷，吴亦只能力求自保了。张作霖曾乘机提出奉军愿派兵援吴，假道河南反攻武汉。吴佩孚以前对王占元等使用过假虞灭虢的手段，当然不肯轻信张作霖的鬼话，断然拒绝奉军南下。1926年12月，张作霖派“援豫”总司令于珍率部进驻石家庄，直隶全境遂为奉系所有。但考虑到吴佩孚对奉军入豫的强烈反对及以吴军残兵尚可消耗北伐军一些实力，张未立即挥军进入河南。

当张、吴矛盾加深之际，吴佩孚所部直军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了。此时吴佩孚残部尚号称20万之众，其中以靳云鹗所部实力最大。但靳对吴早有不满情绪，而吴对靳更是猜忌日深。1926年春，因靳反对联奉制冯的方针，吴曾免去靳所有军政职务，后来吴、张关系恶化，靳才得机重掌军权。吴佩孚从武昌败退至河南后，愈加感到靳对自己地位有威胁，于是找了一个借口再度把靳免职。吴佩孚此举无异“搬石头砸自己的脚”。靳被免职后，其部下纷纷叛变，有的投靠了蒋介石，有的投靠了冯玉祥。吴部直军更呈土崩瓦解之势。1927年2月8日，张作霖发出进兵河南通电，吴佩孚电阻无效。22日，张宗昌部占领开封。一部分直军在靳云鹗率领下起兵反抗，但双方力量悬殊。不到一月内，直军各部先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后溃败。3月17日，奉军占领郑州。吴佩孚只好率卫队逃亡。在直吴内部进一步瓦解的同时，孙传芳所部直军也基本解体。

如前所述，江西丢掉以后，孙传芳便有意投靠张作霖。1926年11月11日，张由奉天抵天津。14日，奉系在蔡园召集会议，孙传芳的代表与会。会议讨论了合作抗拒革命军等问题。19日，孙本人又微服至津，亲自向张作霖赔罪并求援。而此时孙军各部多已和南方北伐军通款。夏超起义失败后，继任者陈仪、周凤岐均秘密接受了广东方面的任命。12月中旬，周凤岐公开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此后不久，安徽总司令陈调元也正式脱离孙传芳，接受了北伐军的任命。至此，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解体了。

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势力瓦解后，北洋军阀中尚能与南方北伐军抗衡者只有奉系一支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参考书目

1.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2卷，中华书局，1987。

2.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3.李剑农著《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

4.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57。

5.丁中江著《北洋军阀史话》，（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3。

6.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7.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全二册），中华书局，1984。

8.李宗一著《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

9.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2～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史话》主要编辑出版发行人

总策划 谢寿光 王正

执行策划 杨群 徐思彦 宋月华

梁艳玲 刘晖春 张国春

统筹 黄丹 宋淑洁

设计总监 孙元明

市场推广 蔡继辉 刘德顺 李丽丽

责任印制 岳阳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革命根据地史话》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根据地史话/马洪武，王明生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8

（中国史话）

ISBN 978-7-5097-2090-5

Ⅰ.①革… Ⅱ.①马…②王… Ⅲ.①革命根据地-史料-中国 Ⅳ.①K269.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1380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话·近代政治史系列

革命根据地史话

著者/马洪武 王明生

出版人/谢寿光

总编辑/邹东涛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010）59367215

电子信箱/renwen@ssap.cn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责任编辑/孔军 宋荣欣

责任校对/李敏

责任印制/岳阳

总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5.875

版次/2011年8月第1版 字数/108千字

印次/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2090-5

定价/1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

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2011年4月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目录

一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

1 路在何方 工农武装割据

2 运筹帷幄 创建中央苏区

3 星火燎原 在割据中崛起

4 祸起萧墙 由兴旺到挫败

二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政权与法制

1 开天辟地 建立苏维埃政权

2 廉政爱民 苏区干部好作风

3 革故鼎新 革命法制的诞生

三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经济与文化

1 土地革命 摧毁封建土地制度

2 改善民生 恢复和发展工商业

3 开源节流 建立财政金融体系

4 启迪民智 兴办文化教育事业

四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

1 抗日中枢 陕甘宁边区的巩固

2 挥师敌后 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黑云压城 抗日根据地的困难

4 天罗地网 神出鬼没袭击日伪

5 中流砥柱 抗日根据地的反攻

五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政权与法制

1 承前启后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2 励精图治 “三三制”与精兵简政

3 反腐倡廉 生存与发展的力量

4 新的探索 在战争中尝试法治

六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经济与文化

1 顾全大局 实施减租减息政策

2 众擎易举 大生产运动结硕果

3 公私兼顾 工商业的恢复发展

4 克敌制胜 完善财政金融体制

5 铲除愚昧 文教事业艰难拓展

七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建立与发展

1 战略收缩 内战前后解放区

2 向北发展 开辟东北解放区

3 逐鹿中原 重建中原解放区

4 谁主沉浮 车轮滚滚定乾坤

八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政权与法制

1 民心所向 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2 永恒命题 跳出“周期率”的考验

3 治国安民 革命法制更趋完善

九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经济与文化

1 暴风骤雨 土地改革全面展开

2 并驾齐驱 多种经济协调发展

3 走向胜利 财政金融渐趋统一

4 面向未来 文教事业蓬勃发展

十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胜利

1 历史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2 彪炳千秋 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

参考书目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一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

1 路在何方 工农武装割据

1927年，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而中途夭折了。中国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刚刚成立6年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27年3月到1928年6月，共产党员被杀2.6万人，革命群众被杀害近30万人；党的组织不断遭到严重破坏，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相继被捕牺牲，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离党团组织，有的甚至向敌人屈膝投降，带着敌人搜捕革命同志，党员数量在白色恐怖中由6万人急剧下降到1万余人。革命转入低潮。

然而，不是一切劫后余生者都泯灭血性，弯曲了脊梁。真正的共产党人，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拿起武器，重新站立起来，掀起了一场席卷神州的土地革命风暴。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先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像春雷，像闪电，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擎起的革命旗帜。

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决定立即派干部到各地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慷慨陈词，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观点。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对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省的秋收起义作了具体部署，并把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作为起义的重点。

为了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派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委员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赴湖南组织秋收暴动。

9月9日，在毛泽东领导下，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首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

继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贺龙、周逸群领导了洪湖农民起义，符向一、潘忠汝、吴光浩等领导了黄（安）麻（城）起义，彭湃等领导了海陆丰起义，杨善集、冯平等领导了琼崖起义，马尚德（后改名杨靖宇）领导了确山农民起义，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领导了弋（阳）横（峰）起义，郭滴人、邓子恢等领导了闽西农民起义，刘志丹、唐澍领导了渭华起义，等等。

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英勇不屈、前赴后继的斗争精神，给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给血腥镇压革命的国民党以有力的反击。同时，又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年轻和处于逆境中的共产党人面前：中国革命道路究竟该如何走？是继续用我们有限的革命武装与敌人争夺大中城市、坚持城市武装暴动，还是改变策略，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养精蓄锐，发展革命力量？对此，党内不少同志，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模式，选择了前者，而毛泽东等冷静客观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大胆地选择了后者。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转战到江西永新的三湾村。针对起义失败后，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减员严重、组织涣散的状况，在偏僻的三湾村，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实现了毛泽东治军的最重要措施——党指挥枪，即在部队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团有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亲自任书记。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部队进抵宁冈县古城。在古城，毛泽东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在井冈山“安家落户”，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在会上，分歧较严重，与会者争得面红耳赤。有的同志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事，国际上没有先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上也找不到记载；有的同志则坚持说：农村不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是进攻中心城市，放弃城市不打就是逃避斗争，是右倾的表现；有的同志还充满激情地大声疾呼：你们必须懂得，我们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要革命力量就是工人、工人！懂吗？那么，请问我们到农村依靠谁呢？难道去“占山为王”吗？这叫什么革命！

面对各种不同意见，毛泽东耐心地阐述道：“现在我们要在井冈山‘安家’，准备‘占山为王’，但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有马列主义指导的、共产党领导的，有主张、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大家想想看：哪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哪个皇帝真正统治过这些地方？一个普通的山大王他们都消灭不了，难道他们能消灭我们吗？”这一席话使会场上安静下来，人们静静地听着毛泽东的分析：“目前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敌人一贯长期地占据着中心城市，如果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战胜敌人，而又硬要同敌人硬拼，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长沙，并不是不想要，而是现在不能要。我们今天的战略退却，就是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待将来有足够的力量去夺取长沙，夺取全国的胜利。”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实行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湘赣边界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茨坪，顺利改造了当地两支带有劫富济贫色彩的绿林武装，在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地方武装和地方党组织，以及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到1928年2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前敌委员会，奠定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坚实基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的农民，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来到井冈山，实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朱毛会师”。两军会师后，5月4日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师共6个团和1个教导大队。6月，中国工农革命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红四军成立后，获得迅速发展，湘赣边界的各级工农兵政府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井冈山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热潮。

在井冈山，毛泽东结合一年多来湘赣边界的斗争实践，针对当时党内还存在的一些右倾悲观思想，于1928年10月和11月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不朽文章，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与条件，从理论上初步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在怎样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响亮地提出了震古烁今的6个大字——工农武装割据，即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三者紧密结合，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究竟如何实行土地革命，如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只能在革命的实践中去探索。此时，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然而在当时，个人的远见卓识，要想成为全党的共识，还需要时间和等待。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星火燎原 在割据中崛起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擎起了一面武装割据的光辉旗帜。在这面旗帜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武装起义保留下来的武装，一般都转入乡村，发动广大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力量在遭受严重损失后，又在武装割据中迅速崛起。

在赣西南地区，在赖经邦、刘经化等的领导下，1927年11月举行了东固地区武装暴动，并建立了东固革命根据地。1928年10月，东固区苏维埃政府成立。11月，召开了赣西南工农兵代表会议，以东固为中心成立了赣西南临时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至此，以东固为中心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东固革命根据地是江西最早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与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会师，并以东固革命根据地为立足点，开始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宁冈会师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东固会师则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因此，东固山又以“第二井冈”、“东井冈”而闻名于世。

在赣东北地区：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领导弋（阳）横（峰）暴动后，继续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成立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信江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军，建立了辖10余县的赣东北根据地，并颁布了临时土地法及其他各项法令。到1930年夏，赣东北根据地军民在粉碎敌人多次“进剿”后与闽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后成立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赣东北革命委员会和赣东北特区苏维政府。随后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到闽北、浙西、赣东北地区，形成了闽浙赣根据地。1931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辖52个县100余万人口的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从此，闽浙赣根据地和中央苏区连成一片。

在湘鄂西边区：贺龙、周逸群在领导桑（植）鹤（峰）起义和洪湖年关暴动后，坚持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武装力量逐步发展，并于1928年7月，正式成立了以贺龙为书记的湘西前敌委员会。随后又建

立贺龙任军长的工农红军第四军，湘西前委亦随之改为湘鄂西前委。到1929年夏，逐步形成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在此同时，以周逸群为书记的鄂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建了以孙德清任军长，周逸群兼政治委员的红军第六军，在鄂西建立各县苏维埃政权。1930年7月，红四军和红六军合编组成红二军团（红四军同时改称红二军），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并组成红二军团前敌委员会，周逸群任书记。随着湘鄂边、鄂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同年9月间，湘鄂西特委成立，邓中夏任书记，并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不久，湘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以洪湖为中心，纵横千余里，扼长江中上游咽喉，与鄂豫皖、湘鄂赣互为犄角，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腹地的湘鄂西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鄂豫皖边区：鄂豫皖边区党组织在领导黄（安）麻（城）起义后，又先后领导了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并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组建了红军第十一军，创建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根据地。为了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组织和军队，1930年3月和6月，鄂豫皖边区先后成立了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和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并将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重新组建了红十五军，次年初，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随后，红军获得较快发展，到1931年春，主力红军发展到3万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15个师，并于11月组建了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歼敌6万余人，建立了辖26个县，4万平方公里面积，350万人口，横跨鄂豫皖3省，南濒长江中游，北傍淮河，西达京汉铁路，东临江淮平原，主力红军4.5万人，地方武装达20万人的鄂豫皖根据地。

在湘赣边区：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湘赣边特委虽在组织上遭到很大破坏，可大多数成员留在边界各县，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战斗，共同抗敌，并着手党组织的重建和根据地的恢复工作。1930年1月，湘赣边和赣西两特委领导的地方武装组成红六军。3月，湘赣边、赣西、赣南三特委合并成立了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赣西南特委下辖东、南、西、北四路党的行动委员会。1931年夏，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湘东南、湘南两特委和西路、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南路、北路3个分委所辖赣江以西地区合并为湘赣省，辖江西、湖南25个县部分地区，人口约100万。其军队，1933年6月，与湘鄂赣红军合编为红六军团。

在湘鄂赣边区：1928年7月，彭德怀等领导平江起义后，组建了红五军，成立了平江工农革命政府。随后在湘鄂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11月，被敌重兵“追剿”的红五军一部在彭德怀率领下，转战至井冈山，与红四军在宁冈会师。次年3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回师湘鄂赣根据地。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部转战湘鄂赣边界期间，湘鄂赣边区特委领导根据地人民，依靠红军强大的军事力量，大力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打开了湘鄂赣根据地大发展的局面。1930年6月，湘鄂赣红军主力组成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黄公略任副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8月，红三军团在攻占长沙后，主动撤离，与红一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留在湘鄂赣苏区的红军，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粉碎了国民党的3次“围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1931年7月，湘鄂赣根据地成立了湘鄂赣省委，9月正式成立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至此，湘鄂赣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它辖20余县，拱卫中央苏区，威胁武汉、长沙、南昌等大城市，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广西西部：1929年12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百色起义后，建立了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接着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并建立了10余县的工农民主政权。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在广西龙州举行起义，并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由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随后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和左江苏维埃政府。左右江根据地由此形成。不久，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红八军遭到失败，左江红色区域丧失，红八军余部经过艰苦斗争，转移到右江根据地编入红七军。

在西北地区：1927年10月，唐澍、谢子长领导了清涧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红军。次年5月，刘志丹、唐澍、谢子长等又领导了渭华起

义，并建立了工农革命军。此后，这支革命武装在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挫折和失败后，终于建立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这两块根据地，位于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的接壤地区，北起长城，南至关中北部的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曾在20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东进抗日的出发点。

此外，大革命失败后，各地的起义部队在1932年前后，还建立了规模各异的根据地，如彭湃等领导建立了海陆丰根据地，古大存等领导建立了东江根据地，冯白驹等领导建立了琼崖根据地，李光华等领导建立了川东根据地，何昆、李硕勋等领导建立了（南）通海（门）如（皋）泰（兴）根据地，胡公冕、金贯真等领导建立了浙南根据地，等等。

这样，到1931年底，全国已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亦发展到10余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10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这些地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占优势的仍是沿用旧的耕作方式的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群众中大多数人不识字，封建的家族组织和迷信习俗很普遍。有些地区还有带着浓重的流寇思想和游民习气而啸聚山林的绿林武装。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色政权。经过艰苦的奋斗，历经挫折，使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和巩固起来，并使之成为积蓄和锻炼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中国革命在“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上，在承受了大革命失败的阵痛后，再次走向复兴。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二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政权与法制

1 开天辟地 建立苏维埃政权

随着一系列反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各级红色政权。当时在各根据地创建过程中，首先成立的是县、区、乡级红色政权，待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后，又成立了省级红色政权。这些政权都采取了苏维埃（苏维埃为俄文“会议”或“代表会议”一词的译音，是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至1907年革命和1907年二月革命时期创造的一种政治制度，十月革命后成为苏联权力机关的名称）的组织形式，故而史称苏维埃政权。

随着形势的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会议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一系列重要决议和法规，产生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建立了中央苏维埃政权。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从此，在中国有了两种政权：革命的红色政权和反革命的白色政权。这两种不同性质政权的对立，成为大革命后中国政治的长期特点。

苏维埃政权借鉴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组织形式的经验，采取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现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苏维埃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在各级苏维埃组织中，都设有共产党党团组织。党通过这些组织以及政权机关中的党员，表达对苏维埃工作的意见，随时随地从思想上领导苏维埃。苏维埃政府的一切主要决策，都应由该地党委会批准后方可执行。同时，苏维埃必须执行党的政策与决议。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经选举产生的。劳动群众对于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有选举、罢免权，同时对于苏维埃工作有批评、建议权，以期使苏维埃真正体现广泛的民意。而在苏维

埃代表大会的组织和工作程序上，则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在权力分配上，不采用三权分立制，而实行议行合一原则，由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与各级政权的行政、司法等机构不是对等关系，行政、司法等国家机构由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全部责任，并受其制约和监督。而各级行政、司法等国家机构并不能反制约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仅对选民负责和接受选民的监督。另外，苏维埃代表大会既为议事机关，又为工作机关。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专职的，他们一方面要将选民的意见和要求转达到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去，另一方面又要回到选民中去带头执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担任最高行政机构的人民委员会委员同时又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由各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直属市、直属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及红军所选举的代表组成，拥有颁布和修改宪法，制定各项法律，决定内政外交大政方针，审查并批准预决算，选任和撤销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及主席等职权。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

在地方政权体制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设立省、县、区、乡（市）四级苏维埃政权机关。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当地的最高政权机关。省、县、区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其下一级的代表大会选举和红军单独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省、县、区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同级执行委员会为该地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各级执行委员会均由同级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省、县、区各级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由其主席团为该地区的最高政权机关。乡（市）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乡（市）选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

苏维埃政权创立初期，各根据地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不同的行政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逐步统一了各根据地的行政机构设置，确立了中央、省、县、区、乡（市）行政组织体系。这一时期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行政领导体制采取了集体制与个人负责制两种形式，并实行双重领导制。

根据法律规定，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机构为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由正、副主席和人民委员组成，主席和人民委员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选任，负责指挥全国政务。人民委员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负责并按时向它们报告工作。人民委员会之下，设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各人民委员部。1932年2月，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后，建立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国民经济、粮食、司法、内务、教育10部，工农检察、中央审计两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外贸总局、国家人民银行及中央合作总社。各人民委员部还视工作情况设若干局、处、科等各种工作机构。如劳动人民委员部下设劳动保护、失业工人介绍、经济评判等3局。劳动保护局下设劳动检查科、技术检查科和卫生检查科，失业工人介绍局下设统计科、救济科，经济评判局下设统计科、指导科等。

苏维埃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省、县、区、乡（市）四级制。省、县、区以及5万人以上的市设立各级执行委员会，为当地的最高行政机构。各级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由其主席团为当地的最高行政机构。

苏维埃各级行政机构就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言，除人民委员会所属各部受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外，省、县、区、市苏维埃各部实行双重领导原则。一方面，各部分别隶属于上级有关主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另一方面，各部受本级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指导与节制，但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没有停止各部执行该部上级命令之权。而在苏维埃行政机构内部，分别采取两种形式的领导体制。中央人民委员会和地方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采取集体领导制度，人民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属各部，采取首长个人负责制。但这种首长负责制，是一种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充分发挥集体作用的个人负责制。

可以说，苏维埃政权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中，逐步走向成熟，它是未来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的政权雏形。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廉政爱民 苏区干部好作风

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是不同于一切剥削阶级的新型政权，它的根本宗旨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从这个宗旨出发，各级苏维埃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了许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措施，关心群众疾苦，处处为群众着想，始终将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摆在第一位。当时，苏维埃政权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能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瑞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经常深入民间，了解群众所思所想，与其他苏维埃中央领导人及普通战士一样，吃红米南瓜，每月享用5分钱的菜金。在叶坪时，毛泽东还经常帮助农民车水抗旱，亲自组织叶坪村的农民修水坝，并经常将中央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党团员们动员起来，组成“礼拜六义务劳动大队”，参加修堤、开荒、协助农民进行生产等。毛泽东到长冈乡进行调查时，发现长冈乡樟树塘木桥，四根木头断了一根，剩下三根，横栓又断了，走上去摇摇晃晃，容易跌倒，于是他立即指示干部要修好。他回瑞金后，还写信问乡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小桥修好了没有。

时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的蔡畅，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她下乡调查研究，不是先摆开场面听汇报作指示，而是笑眯眯地帮助群众干活，边干边谈，听到重要问题时，掏出小本记上，妇女们都把她像亲姐妹一样看待。

毛泽民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身为国家银行行长，大权在握，可在财务上却十分清正廉洁。他经常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背上装有衣服、笔墨、账簿、算盘的背包，下乡办公，筹款筹粮。有时他跋山涉水，赶不上吃饭，就饿着肚子，辛勤工作，从无怨言。

曾担任赣东北根据地省苏维埃主席兼财政部长的方志敏，一直保持

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好作风。有一次，方志敏返回家乡探视母亲时，他的一个婶婶以为他当了大官，有了财权，就向他讨钱买盐。方志敏听后，不禁大笑起来，对婶婶说：“我哪里有钱？我管的钱是公家的。我总不能用公家的钱给你买盐。婶婶，有困难请叔伯兄弟凑一点，帮帮忙吧！”方志敏式的“清贫”正是当时千千万万个优秀干部品格的真实写照。方志敏在《清贫》中写道：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指国民党方面——引者注）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正是在毛泽东、蔡畅、毛泽民、方志敏等大批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下，广大根据地的干部都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成为名副其实的群众带头人。

为消除和杜绝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这类腐败现象，苏维埃中央一方面强调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贪污是苏维埃政权下绝对不允许的事情，如若发现，就是政府的羞耻；另一方面动员政府工作人员和广大民众，发现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及官僚主义分子，可以立即揭发，而苏维埃政府将立即惩办，决不迁就姑息。为此，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训令规定，凡利用职权，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1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赢利者以贪污论罪；因玩忽职守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以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对那些身居高位、知法犯法的领导干部，法律规定要从严惩处，决不心慈手软。如当时中央政府总务厅苏维埃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7元7角，被查实后，逃跑未遂，经最高法院审判处以枪决。于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和少共县委书记等人均因贪污而被依法枪决。再如财政部会计处处长，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因以权谋私，将打土豪时收缴来的一只手表、一双鞋子、一支自来水笔贪污归己，同时以财政部名义打电话，让瑞金县财政局买白糖送到他家，结果被撤销处长职务并开除公职。

在严厉惩处腐败分子的同时，各根据地为保证政府的廉洁，还初步建立了行政监察制度、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体制，制定了有效的规章制度，并通过报刊进行舆论监督，有效地规范和制约各级政权机关党员干部的行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三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经济与文化

1 土地革命 摧毁封建土地制度

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都是在农村首先建立起来的。农村的首要问题，是土地问题。据1927年统计，占农村人口75%以上的贫农、中农、佃农等只拥有19%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25%以下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1%的土地。地主阶级凭借封建的土地制度，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剥削，使广大农民饥寒交迫，贫困交加。当时，湘赣边界流传的一首歌谣，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种了万担粮，农民饿肚肠；织了万匹布，农民无衣裳；盖了万间屋，农民住茅房。”由此可见，封建土地制度，是封建经济的基石。不摧毁封建土地制度，就无法摆脱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建立崭新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因此，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开展土地革命，就成了革命根据地的首要任务，也成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内容。对此，共产党人有明确的认识。

到1928年底，井冈山、海陆丰、湘南、闽西、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都先后进行了土地革命。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中，分田一般以乡为单位，男女老幼一律按人口平分，以原耕地为基础，好坏搭配。其经验集中反映在根据地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中。其他各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斗争中，也都有各自的经验和政策。但是，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各根据地的具体做法是各不相同的，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政策。

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土地问题上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土地革命的意义，初步规定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但是并不是说要放弃对于富农半地主的阶级斗争。”会议决议规定只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公有土地，纠正了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

党的六大对土地革命中的土地所有权、对富农的具体政策等问题虽然尚未完全解决，但它解决了上述土地革命中的一些主要问题，纠正了一些“左”倾错误，因而1928年底1929年春，党的六大决议传达到各革命根据地后，对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促进了土地革命的开展。

在赣南、闽西，1929年4月毛泽东根据党的六大决议和《井冈山土地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起草并颁布了《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根据六大决议将曾在《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一原则性的改动，明确了土地革命所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地主阶级，是消灭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承认了农民对原有小块土地的所有权，纠正了打击中间阶层，对自耕农的土地不加区别，一律予以没收的错误。

1929年7月，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总结了闽西土地革命的经验，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在具体政策上进一步规定：实行以乡为单位，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进行平均分配，对在乡地主“得酌量分与田地”。大会以后，闽西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形势，约有80万人分得了土地。

1930年6月，毛泽东根据群众斗争经验，在“抽多补少”分配方法的基础上，加上了“抽肥补瘦”的原则。在这两项原则指导下，赣西南根据地到1930年10月有30余县分了土地。

在赣南、闽西土地革命开展的同时，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广西右江等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根据在赣南、闽西土地革命的经验，1931年2月，毛泽东按中共中央的决定，以中央军委政治部的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封信——《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明确阐明了当时土地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土地革命中农民的土地私有权：“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这样，经过三年多在土地革命实践中的反复摸索，在总结各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条土地革命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路线和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一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摧毁了各革命根据地内的封建剥削制度，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因此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保证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仍能继续坚持并得到了不可遏制的发展。

土地革命虽已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但由于环境的险恶，以及当时革命根据地农业生产基础的薄弱，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存在不少困难。其中劳动力的严重不足，耕畜、农具的缺乏，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问题。

为解决劳动力不足，各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把广大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运动。

1929年，上杭县才溪乡贫苦农民为了帮助红军家属解决生产困难，按照传统的换工习惯办起了耕田队。1930年6月，毛泽东在才溪工作时发现了这一新生事物。在他的指导关怀下，1931年才溪乡出现了第一个劳动互助社。此后，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总结各地这种在个体经济基础上为调剂劳动力所建立的劳动互助组织的经验，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等文件，在各根据地建立起劳动互助组织。为了动员妇女也参加生产，有些地方还办起了托儿所，成立了妇女生产学习小组，学习莳田、耙田等生产技术，把妇女劳动力也组织起来。

此外，由于敌人对耕牛的掠夺宰杀，地主、富农、奸商对耕牛的故意宰杀和运到白区倒卖，根据地耕牛缺乏问题十分严重。解决耕牛缺乏的办法是发动群众，以没收地主及富农多余的耕牛、农具为基础，与农民共同集股购买耕牛和农具，组成犁牛站和犁牛合作社。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倡导下，犁牛站和犁牛合作社迅速发展起来。到1934年，瑞金、兴国、长汀、西江4县的犁牛合作社已达459个，社员在西江一县即达15075人。这样缺耕畜的基本群众不需花多少钱就能有耕畜使用，保证

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通过上述办法，革命根据地基本上解决了劳动力严重不足和耕畜、农具严重缺乏的问题，亦为进一步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工农民主政府的财政收入创造了条件。

当然，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中也出现过一些“左”的偏差和错误。这主要是1931年初，王明一伙把持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土地政策，给各根据地造成了严重恶果。如部分地区在上述错误土地政策指导下，进一步提出了“富家分坏田，中农分中田，贫雇农分好田”的口号；有的甚至规定中农不得参加苏维埃政权，不准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这种“左”倾政策，侵犯了中农利益，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的不安，后来被逐步纠正。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改善民生 恢复和发展工商业

革命根据地一般都地处贫瘠山区，工业和商业都极其落后。因此，要在这些落后地区创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必须首先建立国营工业和商业，再组织合作经济的工业和商业，同时也必须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这样，革命根据地就出现了国营工商业、合作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三种形式。

革命根据地的原有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只有一点小手工业，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敌人对苏区残酷屠杀和封锁，物资进出十分困难，革命前保留下来的一点小手工业也一度衰落下去。革命战争的发展，要求根据地的工业尽快地恢复和发展起来，以满足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因此，党和苏区政府在土地革命彻底扫除了封建剥削的基础上，开始了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革命根据地的工业由国营工业、合作社工业以及私营工业三部分组成。

（1）国营工业。国营工业的来源，一是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或器材，二是拨款新建。在苏区能没收的企业不多，更多的是拨款兴建。由于当时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服务于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因此，当时国营工业的主要内容是发展自给性的军需工业。各根据地都先后建立了一批兵工厂、炸药厂和被服厂等。如在中央根据地的国营工厂，到1934年1月已有32个，其中大部分都是军需工厂。规模较大的中央军委兵工厂，共有工人1000余人，几年中共配制4万多支步枪，40多万发子弹，6万多颗手雷，5000多颗地雷，修理2000多挺机枪，百多门迫击炮。设在瑞金的被服厂则有700多工人，缝纫机百多架。

国营工业中也办有一批民用工业。如中央苏区的中华织布厂、中华樟脑厂、通讯材料厂、卫生材料厂、交通材料厂、粉丝厂、草鞋厂、纺织厂、造币厂和钨砂矿厂等。

除中央根据地外，其他各根据地也办有各种国营工厂。如川陕苏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的最大兵工厂拥有工人1400余人，各种机床138台。民用工业则有食盐厂、煤矿、铁厂、纺织厂和造纸厂等。

在国营事业中，各根据地交通邮电事业获得很快发展，修筑了许多公路桥梁，正式建立了各级“赤色邮政”，改变了各根据地革命前边区乡村根本没有邮政机构的状况，揭开了人民邮政的新篇章。

在苏维埃政府下的国营工厂中，工人成了企业的主人。他们参加企业管理和制订生产计划。因此，他们虽然工资很低，工厂设备简陋，工作条件差，工作十分辛苦，但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很高。他们在“一切为着革命战争，为着前线的胜利”的口号鼓舞下，经常在8小时工作外主动加班加点增加劳动时间。他们还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动竞赛，以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工人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的积极性还表现在刻苦学习技术，积极创造革新方面。他们提出了“虚心学，快快学，我们多流汗，阶级兄弟少流血”的口号，并组织技术研究会，举行产品展览，以交流经验，提高技术。

（2）合作社工业。革命根据地的工业中，手工业占绝对优势，除一部分属国营工业外，绝大部分还是个体手工业。为了发展根据地的工业生产，繁荣根据地的经济，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各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在发展国营工业的同时，还极为重视个体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将个体手工业组织成生产合作社。

生产合作社是由劳动者集股，并共同参加劳动的集体生产组织，一般不允许雇工，剥削阶级分子不能参加。社员自己劳动，自己销售，赚的钱（除工资成本外的利润）提若干为奖金外，以50%的公积金扩大再生产，20%为公共事业（文化教育）费，30%照社员人数平均分配。也有的以40%按股金分配作为利息，10%作为公积金，10%作为办事人花红，40%照社员付给合作社的利益比例分红。

苏区生产合作社从1933年起发展十分迅速，规模大小不一，合作社的种类有几十种之多。如中央苏区的宁都县的生产合作社就有236个，社员13030人，共有股金15355元。整个苏区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使20多万手工生产者有了工作，也使军民的日常必需品得到了很大补充。

（3）私营工业。私营工业包括个体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对于个体小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在原料、资金、销售等方面给予有效扶助，并在生产和生活上予以合理的安排，使其逐步恢复发展起来。

随着革命根据地工业的逐步恢复和发展，根据地工人队伍不断壮大。为了保障工人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该法规定了8小时工作制，废除了封建的和买办的剥削制度，实行同工同酬，对女工、童工、青工特别加以保护，另外还在劳动保护、安全卫生、社会保障、职工会、雇佣手续、劳资冲突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但该法亦有些规定不适合边区落后工业的实际情况。因此，1933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组织修改了这个劳动法，并予以重新公布，史称“新劳动法”。

新劳动法的颁布，进一步调动了苏区工人的革命积极性，更有利于苏区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对发展根据地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和红色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革命根据地的商业，分为公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三个不同的部分。在各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其公营和合作社商业尚未建立和发展前，商品流通主要靠私营商业和农村圩场进行。

各根据地建立后，军队的需要激增，须与外地进行正常的物资交换贸易。但敌人对根据地实行了空前严密的经济封锁。因此，突破敌人封锁，建立公营和合作社商业，规范私营商业行为，大力开展根据地的内外贸易活动，就成为活跃根据地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支援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根据地的外贸（指根据地与国统区的贸易，下同），起初全部由私商掌握。一些奸商利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凭借各种旧的社会关系，在一买一卖之间，对根据地人民进行“吓死人的剥削”，牟取暴利。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扭转贸易上的不利地位和打击投机商人的过分剥削行为，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对外贸易机构，进行有组织的对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外贸易活动。1933年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了对外贸易局，具体领导对外贸易。如中央苏区就曾在各重要出口地设立10余个采办处，在邻近国统区的县相应地设立了对外贸易分局、采办处、代办处或采购站。1934年初，中央苏区还吸收群众入股成立了一个公私合营性质的中华商业股份公司，并在重要市镇成立分公司，经营商品输出入业务。

粮食是农村市场上最主要的商品，为了保证军粮民食的需要和粮价的稳定，各级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还成立了粮食调剂局或粮食调剂分局，对粮食的数量、保管、调运出口等进行管理。除粮食外，苏维埃政府还组织了钨砂、纸张、樟脑、竹木、茶叶等商品的出口。

工农民主政府为了更好地开展对外贸易，打破敌人的封锁，除健全公营外贸机关外，还奖励私人商业输出输入各种必要的商品，并对私人商业输入的日常用品和军用品进行减税，以资奖励。

由于各根据地工农民主政府实行了灵活的外贸政策，调动了苏区和国统区商人的积极性，沟通了两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从而基本保证了苏区的军需民用。在开展对外贸易的艰苦斗争中，苏区的许多干部群众战斗在敌人的封锁线上，千方百计地秘密运送物资，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热情和惊人的斗争艺术，不少干部群众还因此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在各根据地内部，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以合作社商业为主体，公营商业和私营商业一起发展的内部贸易网络。其中，合作社商业是革命根据地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工农群众集股组织的群众性供销组织，有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等形式。合作社有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一般省里设总社，县以下各级设基层社，其社员可在年终时分得部分红利。合作社商业的创办，完善了根据地内的商品流通体系，打击了奸商的中间盘剥，保护了消费者利益。因此，群众都说“合作社第一好”。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启迪民智 兴办文化教育事业

农村革命根据地都建立在偏远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文化教育一向是落后的。中国共产党在各地领导建立起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以后，即花了很大精力抓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使偏僻落后、交通闭塞的根据地人民走上了文明之路。

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为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发展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明确提出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免费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培养大批的有文化的干部，使根据地的广大民众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当时，在各根据地内，一切文化教育机关都掌握在工农劳苦群众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在根据地内，小学教育最为发达，从村到区、乡都设有列宁小学。根据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规定，苏维埃政权下的小学教育，对于一切儿童，不分性别与成分差别，均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但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中，必须保证工农子弟优先上学。1934年1月，据江西、福建、粤赣3省的统计，在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苏区内的学龄儿童多数进入了列宁小学，接受文化教育。

为了全面发展社会教育，扫除文盲，各根据地普遍开办了夜校、识字组、俱乐部和业余补习学校等。在根据地内，15岁以下的儿童一般入小学，16岁以上青年与成人入夜校学习。夜校的任务是扫除文盲，提高青年和成人的文化政治水平。

为了大力发展苏区教育，各根据地还十分重视师资的培养和教育。如中央苏区1932年以后，就先后创办了瑞金列宁师范、中央列宁师范、江西省第一短期师范、列宁团校、瑞金小学教员训练班、职工运动高级训练班、中央农业学校、中央教育干部学校等。

在大力开展初等教育的同时，各根据地为培养和造就大批有知识、有专业的干部队伍，还先后创办一系列专业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如中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央苏区就创办了苏维埃大学、中央苏区党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卫生学校与各类训练班等。

随着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地的文化艺术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如歌谣、演唱、活报剧、话剧等十分繁荣，部队和地方政府为繁荣和管理苏区文艺工作，陆续成立了专门从事文艺工作的机构和团体，开展各种形式的文艺活动，其中戏剧活动最为活跃。如在中央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和中央及地方苏维埃剧团，经常深入城镇、乡村、部队巡回演出，以满足苏区军民文化娱乐的需要。

红色歌谣是根据地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曾出现了成千上万的红色歌谣。这些红色歌谣，以歌颂党、红军和革命领袖为主，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对党和红军的真挚感情和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如中央苏区的“朱德毛泽东，好比是东风，吹起满天下，到处都是春”，“松树开花排是排，湖南来了个彭德怀，带领红军到江西，贫苦农民心花开”，“树大不怕狂风吹，堤高不怕大水冲，工农有了共产党，坚决革命没二心”，“杀了老子有儿子，杀了儿子有孙子，儿孙代代当红军，坚决消灭白匪军”。应该说，根据地的这类歌谣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人民斗争生活和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生动写照。

为推动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政策，指导根据地军民更好地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各根据地的党和政府，都在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克服纸张、印刷机械、油墨等各种原料的严重匮乏，土法上马，艰苦创业，建立了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其中，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工作，无论是规模数量，还是影响，在各根据地中都是最大的。到1934年初，中央苏区已有报纸杂志34种。《红色中华》鼎盛的时期发行到近5万份，《青年实话》发行到近3万份，《斗争》发行到2.7万余份。此外，如《战斗》、《苏区工人》、《红色江西》、《少年先锋》等发行量也达7000份左右。在当时频繁激烈的革命战争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中央苏区能出版的报刊种类如此之

多，发行面如此之广，是非常成功和罕见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四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

1 抗日中枢 陕甘宁边区的巩固

1935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胜利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

为了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领导，11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作为陕甘宁苏区的最高政权机关，下辖陕甘和陕北两省，关中和神府两个特区。

此时，中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中国共产党适应形势的转变，于12月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召开瓦窑堡会议，及时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迅速实现了陕甘宁边区的局部和平。随后，又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基本上停止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决定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五届三中全会。2月10日，中共中央为实现国共合作，共赴国难，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为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共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同国民党谈判中口头上达成的协议，按照团结抗日的原则，进行更名改制的筹备工作。1937年7月15日起，陕甘宁边区进行从乡、区、县到全边区的民主选举运动。9月6日，原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直属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领导，下辖23个县，人口约

150万。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实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在经济方面，边区政府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将过去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但对农民在过去土地改革中已经取得的果实，予以坚决保障。除减租减息外，边区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从各方面减轻人民负担，同时，采取发展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的政策来增加生产。在农业方面，边区政府发动组织互助组，发展合作运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发放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和种子的困难。在工商业方面，边区政府废除苛捐杂税，奖励手工业生产，严禁垄断居奇，保护正当商人利益。此外，边区政府还加强公营经济，以适应军队和机关的需要。

由于政治的民主、生活的改善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延安迅速成为全国千百万爱国青年一心向往的圣地，大批青年从全国各地，甚至从侨居的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泰国、缅甸等地，走过千山万水，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迫害，不畏艰苦，奔向延安。他们响应中共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号召，经过学习培养，很多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持抗战、建设巩固边区的骨干。

边区人民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抗日群众团体纷纷成立，如：边区总工会、青年救国会、农民会、妇女救国会、文化界救亡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等。此外，边区还组织了工人抗敌自卫军、农民自卫军、青年自卫军、妇女自卫军和少先队等。到1938年底，边区自卫军人数已达22万余人，并建立了指挥系统，经常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他们配合留守兵团有力地保卫了边区。

这样，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就成为全国人民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总后方和全国实行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黑云压城 抗日根据地的困难

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中国抗日中坚力量的日本侵略军，为实现变中国为其南进基地的目的，决心全力以赴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迅速结束侵华战争。为此，他们自1941年起调集重兵，持续对华北、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蚕食”和“清乡”。

在华北地区，1941年至1942年，日伪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有时反复“扫荡”一个地区达三四个月之久。在“扫荡”中，日军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大肆烧杀淫掠，制造无人区，使根据地人畜不留，庐舍为墟。如1941年1月，日军1500余人突然包围冀东丰润的潘家峪，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用机枪扫射屠杀群众1300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1941年8月，日军5万余人对晋察冀的北岳区和平西区进行为期2个月的“扫荡”，在北岳区阜平、龙华奸淫妇女近千人；在涞源东杏花村残杀无辜群众20余人，还将村长等人脑浆取出，称为“开脑汤”，逼群众喝下。日军在北岳区的这次“扫荡”，总计残杀群众4500余人，烧房15万间，抢走或烧毁粮食2900万公斤，抢走牲畜1万余头。

1942年5月1日，冈村宁次调集5万军队对冀中进行野蛮的“五一大扫荡”。5月27日，在冀中定县的北疃村，日军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一次毒死地道里的老幼妇孺800多人。在这次大“扫荡”中，冀中八路军减员达1.6万余人，区以上干部牺牲1/3，群众被杀被抓5万余人，造成了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悲惨景象。而太行区在1941年和1942年两年中，直接被敌人杀害和抓去的群众约有35万余人。

为了分割和“蚕食”根据地，日军还利用铁路、公路作为封锁的干线，沿线密布据点，沿点线修筑封锁沟、封锁墙，然后扩大支线，向根据地穿插延伸，逐步构成对根据地的严密封锁体系。据对冀中、太岳、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太行3区1942年的不完全统计，在20多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内，日伪修筑公路1万余公里，建据点1892个，筑碉堡岗楼5591个，挖封锁沟7600余公里，筑封锁墙560余公里。其中，冀中平原地区每100公里内敌人就修筑公路20公里，建据点1至2个，修碉堡10个，挖封锁沟20公里，筑封锁墙1公里，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个小块。这样，日军就对根据地形成了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分割的封锁网。然后在各区配置重兵，分散布置，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

更有甚者，日军为向抗日根据地核心区推行“蚕食”政策，割断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疯狂地烧杀抢掠，驱赶群众，毁坏村庄，制造“无人区”。在“无人区”内，日军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庄稼就毁坏，使根据地遭受了巨大损失。如日军曾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冀热辽区和平北区建起了长约850公里，涉及25个县，总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无人区”内数千座村庄被毁，无数平民被驱走和杀害。

此外，日军为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在对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上的“蚕食”封锁的同时，还在经济上实行封锁、掠夺和破坏。如抢掠根据地资财，破坏根据地内的生产设施、运输工具以及被服粮秣仓库等。

在华中和华南，日军亦根据其在华北的所谓经验，对根据地进行了血腥的“扫荡”、“清乡”和“蚕食”。

面对日军的“扫荡”、“蚕食”、“清乡”与野蛮的“三光”政策，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并未屈服，他们在敌后战场，拿起刀枪，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谱写了一曲曲英勇悲壮的历史史诗，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民族英雄。

当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日伪浴血奋战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仍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华北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衣被等物资；在西北则用50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并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在华中则于1941年1月发动了亲痛仇快的皖南事变，公然宣布新

四军为“叛军”。对此，中共中央于1月20日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将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分别在苏中地区、淮南地区、淮海和盐阜地区、淮北地区、豫鄂地区、苏南地区、皖江地区等地活动，建立和巩固了苏中、淮南、淮北、淮海、盐阜、豫鄂、苏南、皖江、浙东等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总之，由于日伪顽的联合进攻和敌我力量悬殊，加上华北地区连续几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秋即陷入困难状态。这种困难局面一直延续到1943年秋。到1942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已由50万人减为40万人，华北抗日根据地中的冀中、冀鲁边、冀南、冀东、大青山等根据地绝大部分变成了游击区，有的则变成了敌占区；很多抗日民主政权被破坏。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总人口由近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这样，由于战争频繁和日伪顽的封锁及自然灾害的影响，根据地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情况极端困难，物质生活极其艰苦，以至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当时的困难真是太大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5 中流砥柱 抗日根据地的反攻

1943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欧洲法西斯战争机器已分崩离析。在太平洋战场，美军给日军以重创，迫使日军逐步转入战略防御。

太平洋战场美军的战略性胜利，对中国战场产生了直接影响。日军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在中国战场方面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进行更加残忍的“扫荡”、“蚕食”，对国民党继续进行逼降和诱降，以巩固占领区，迫蒋投降，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另一方面又从中国的华北、华中抽调兵力驰援太平洋战场，并企图集中兵力打通大陆交通线，建立与东南亚的陆上联系，扭转太平洋战场的战争态势。这样，1943年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尽管仍很严重，条件仍然困难，但日军兵力的抽调，相对地减轻了中国敌后战场的压力，有利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在华北，中共中央北方局明确提出：“1943年华北党的基本任务，在于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以便迎接伟大的新时期之到来。”

为贯彻上述指示精神，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结合自己的特点，以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开展对敌斗争，逐步渡过难关，并使山区各抗日根据地得到发展，平原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为对日反攻作战作好了必要准备。

与此同时，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军民也粉碎了日伪多次“扫荡”和“清乡”，逐步度过了困难时期，根据地逐步恢复起来。

随着1943年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自1944年起在敌后战场发起局部反攻，打击牵制日伪军，扩大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初，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一年的局部反攻和整风、生产运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加强，根据地已拥有9000万人口和200多万民兵。正规部队不但在数量上增加到78万人，而且经过攻势

作战和练兵运动，军政素质和装备质量已有显著提高。这就为开展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扩大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1945年的任务》的演说。在演说中，毛泽东提出1945年解放区军民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要开展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把一切守备薄弱，在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待机将敌完全驱逐出去。此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制定具体作战方针和计划，领导本地区军民，展开了大规模春、夏季攻势作战，迅猛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在华北，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春、夏季攻势中，共发起战役战斗5558次，歼灭日伪军11.3万余人，攻占日伪据点3512处，解放县城54座，根据地迅速扩大，不少地区基本上连成一片，日伪军已被压缩在县城和大城市周围及铁路沿线，形成对日伪据点的包围态势。

在华中，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开展攻势作战，在1945年1月至8月，共攻克敌占县城2座，拔除日伪据点100余处，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并争取了4700余名伪军投降反正，解放区获得较大发展。在此同时，粟裕、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挥师南下，成立了苏浙军区，创建了苏浙皖抗日根据地。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辗转7省，跋涉8000余公里，战胜了严寒酷暑，征服了高山大河等自然险阻和日伪顽的围堵拦截，创建了湘鄂赣抗日根据地。

在华南，华南抗日根据地军民也展开攻势作战，并取得较大战果，建立了拥有300多万人口的巩固的根据地。

到1945年夏，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已发展到91万余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同时建立了遍于华北、华中、华南的19块抗日根据地，即：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山东区、晋绥区、冀热辽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区、琼崖区，所辖人口1亿多，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日军占领的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都处在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包围之中。而此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尚分布在西南、西北地区，远离抗日前线，未作反攻准备。

1945年春，雅尔塔会议后，世界战局发生急剧变化，德意法西斯迅速崩溃，日本法西斯则为挽救败局，继续作垂死挣扎。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

在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并出兵东北的时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8月9日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此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组织反攻大军，向日伪发出通牒，陆续向日伪发起全面反攻。

在华北，冀热辽根据地军民首先进入东北，协同苏联红军解放了全东北。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向平绥路东段，平汉路北段，津浦路北段进攻，解放了察哈尔省全部，并包围了北平、天津、保定等城市。晋绥根据地军民向同蒲路北段，平绥路西段进攻，解放了绥远、山西的广大国土。山东根据地军民向津浦路中段和胶济路进攻，解放了山东境内100多座县城。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向平汉路中段，陇海路中段进攻，解放了黄河沿岸的广大国土。

在华中，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沪宁、沪杭甬、浙赣、淮南等路及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进攻，直逼南京、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解放了华中地区大片国土。

在华南，华南抗日游击队集中主力，分别向广九路沿线、东江西岸、雷州半岛日伪军展开进攻，扩大了解放区，直逼广州、汕头、海口等城市，解放了华南地区大片国土。

从1945年8月11日到10月10日，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反攻作战中，毙伤日伪军23万余人，收复城市197座，解放国土近32万平方公

里，解放人口1870余万。

但是，在8年抗战中，从华北、华中退缩到西南、西北，丧失国土297万平方公里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剥夺了敌后解放区军民的受降权，被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包围的许多大城市与交通线，因国民党军队的阻挠，未能得到解放。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抗日根据地军民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长达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牵制和抗击了国际法西斯东方战场的力量，创造了不朽的抗战业绩，树立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良好模式。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五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政权与法制

1 承前启后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迅速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将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从而完成了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建立了一系列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然而抗战时期，各敌后根据地只有地方政权，没有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

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形式上属于中华民国的地方政权，但在性质上，则既不同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也不同于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参加这一政权的已不限于工人、农民，而扩大到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和一般地主，他们都享有选举权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只有汉奸和反动派被列为专政对象。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主力是工人和农民。

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参议会制度。参议会制度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过渡而来的。这一制度在陕甘宁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转变的初期，曾称议会制度。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作出了在各省、市召开参议会的决定。同年，国民政府颁布了《省参议会组织条例》和《市参议会组织条例》。为了保持与国民政府行政组织上的统一，陕甘宁边区议会制度改称参议会制度，并逐渐推广到其他根据地。当然，由于战时各根据地处于战争环境与分割状态，各自相对独立，因此政权组织形式的名称不完全相同。有的边区不一定称参议会，在参议会的级别构成及其他方面也略有差别。但总体说来，其组织原则、结构、职权和基本活动方式则大同小异。

抗日民主政权的参议会制度虽然名称与国民政府的参议会制度保持一致，甚至在组织结构上也存在相似之处，但其组织指导原则，则更多地保留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某些特点。如它继续实行民主集中制、党的领导、议行合一等原则，并在发展过程中，实行“三三制”与精兵简政原则。根据法律规定，各级参议会为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由选民选举产生。政府和司法机构由参议会选举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制约。政府必须尊重和执行参议会的决议而无任何否决权。如果政府认为参议会的决议不妥，其唯一的权力是详叙不妥的理由送交原参议会复议。送回原参议会复议的议案只复议一次，参议会如认为要求复议的理由不充足，可不予复议。如果复议维持原议，政府部门必须立即执行。因此，政府对参议会仍不存在权力制衡，而只存在分工。在各种政权机构中，参议会实处于全权和核心地位。

抗日根据地的行政机构主要有边区（省）政府（或行政委员会）、行政公署、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县政府、区公署（区公所、区政府、区行政委员会）、乡（村）政府。但各根据地所设的行政组织很不统一，同一块根据地在不同时期情况也不完全相同。如各边区（省）政府下设机构大体相同的有民政、教育、财政厅或处以及秘书处。此外，陕甘宁边区政府设有建设厅、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和审计处；晋察冀边区政府设有实业处；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设有工商管理和高级审判处以及公安局。各边区（省）政府于必要时还可增设专管机关。各根据地的县政府之下一般设有民政、财政、建设、粮食、教育、公安、司法、秘书等职能部门。

抗日民主政权各级行政机构采取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制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根据法律规定，凡属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须由集体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决议，各级行政机关的首长无权单独决定，也无权改变集体作出的决定；但政务的执行，则由行政首长个人负责，边区政府主席、各县县长和乡（村）长必须领导所属部门和人员认真贯彻执行各该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决议。

在政务执行方面，为能集思广益，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有的边区各级行政机构设政务会议为执行政务的领导机关，其主要职责在于听取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各行政部门的工作报告，讨论工作方针和具体计划，以便为行政首长提供参考。政务会议决定问题不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由行政首长个人裁决。行政首长对会议的决议须承担个人责任，不能借口经过集体讨论而加以推卸。这就是个人负责制。很显然，它也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融入了集体的因素，与苏维埃各级政府各部的首长负责制一脉相承。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反腐倡廉 生存与发展的力量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中共中央便及时地、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腐倡廉的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告诫全党：“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941年7月，中共中央在纪念建党20周年时，要求共产党员增强党性锻炼，个人利益服从全党利益，树立廉洁奉公、无私无畏、忠实朴素等作风。在此同时，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革命家写出了许多著作和文章，反复阐明保持共产党纯洁，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的警告和要求，在思想上武装了全党，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反腐蚀斗争的自觉性。在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各根据地的领导同志高瞻远瞩，洞察一切，率先垂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和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

为了有效地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大都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制度，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保障。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关于统一财政问题的通令》、《关于统一财政收入和消灭滥捐募现象的训令》、《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政务人员公约》等。其中，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将贪污罪详细列举了10条表现，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在此同时，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抗日民主政府要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的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的假公济私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以俸养廉的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化娱乐生活。1943年5月陕甘宁边区制定颁布的《政务人员公约》则规定了政务人员起码的行为规范：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成为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徇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也大都以陕甘宁边区颁发的廉政法规为蓝本，制定颁布了有关廉政法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廉政法规和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使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为及时监督和防范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抗日根据地还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监察机制，充分发挥民主监政的作用。其主要表现是：通过各级民选参议会对各级政府机关及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的全体工作人员行使监察权；鼓励人民批评监督政府，让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和监督权；各级政府的领导成员、各级参议会的议员及各级法院的院长，都是按立法程序由选民或人民代表民主选举产生，他们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代表着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向人民负责，并定期向人民报告工作，接受人民的审查；加强党和政府的自我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等。

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使根据地内形成了廉洁、勤政、奉献、牺牲光荣，贪污浪费、夸夸其谈、投机钻营、苟且偷生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在各阶层群众和海内外树立起廉洁、公正、勤勉的抗日民主政权形象，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反共顽固势力。如各抗日根据地的一些开明士绅在对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对比后，作出了抉择。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前清举人，著名士绅庞友兰就曾赞叹道：“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现敌、伪、韩（指韩德勤）、我四方面相比，以共军区域最能替人民谋幸福。”不仅如此，海外一些进步舆论也从公正立场出发，对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给予了中肯评价。如著名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国统区、日伪区和华中、华北抗日根据地作过实地调查和考察后，告诉美国人民：“在共产党地区，政府官员的生活是艰苦的，物质报酬是谈不上的。贪污勒索在中国久有传统，但在这里却没有什么机会。”“中国共产党是靠唤起人民内心的希望、信任和爱戴，不是靠空谈大道理而赢得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正因为如此，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获得广大民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以至日益巩固和强大起来。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六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经济与文化

1 顾全大局 实施减租减息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前，各革命根据地实行的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革命政策。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联合各阶级、各阶层一致抗日，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在各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这一政策的转变，是为推动国民党参加抗日，减少抗日的阻力；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的一个光辉典范。

减租减息的具体办法，在地租方面，一般实行“二五”减租。不论公地私地、佃种地等，也不论是钱租制、物租制、活租制和死租制（又称铁板租），一律照战前租额减低25%，如群众要多减时，也可以根据情况三七或四六减。在游击区及敌占区附近，则可以比二五减租少减一点，或20%，或15%，但总原则要以能调动农民群众抗日积极性及团结各阶层抗日为目的。在减息方面，总原则亦是要以能发动农民群众抗日积极性及团结各阶层抗日为目的，但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许可的程度，过去的借贷，在实行减息时都以年息一分半为计算标准，如付息已超过原借本钱一倍者，停利还本，如超过两倍者，本利皆停。

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一政策虽只是削弱封建剥削，不是消灭封建制度，但地主阶级出于阶级本性，对这一政策，阳奉阴违，采取各种手段来反抗和破坏这一政策的实施。某些地主和高利贷者，则企图用自耕、出卖、分家等手段来威胁农民，或将租额提高，达到明减暗不减的目的。有些地富分子，甚至趁机篡夺民主政权，用各种隐蔽方式来破坏和抗拒这一运动。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及时发动群众对地富阶级的各种反抗、破坏进行了坚决斗争，所以减租减息政策从1937年8月正式提出，到1942年才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942年1月，中共中央总结了前几年减租减息运动的经验，颁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规定了深入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路线和实施办法，更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进一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从而使广大农民通过这一运动得到实惠。

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还掀起了查减运动和清理旧债、抽回地契运动，即把抗战前抵押死的土地，或被地主、高利贷者巧取豪夺的土地，按年息1分计算，重新订立新约，把土地抽回还交原主，使农民重新得到了土地，如晋察冀4个区抽回土地64900余亩，这些土地都回到农民手中。

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一方面打击了封建剥削制度，提高了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承认了地主阶级的大多数（汉奸地主除外）有抗日的要求，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地位，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社会状况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作用，鼓励地主富农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承认地主富农有抗日民主的要求，以换取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与抗战。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众擎易举 大生产运动结硕果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相当一部分是国民政府颁发的军饷和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和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因此，如何突破敌人的封锁，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以巩固抗日根据地，就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而在根据地，农业人口占90%以上，人民生活的需要，战争的供给，主要依靠农业，当时的困难如不解决，不仅影响军事上的需要，而且影响工农联盟和根据地的稳固，因此党和政府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此后，各根据地党和民主政府，在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为发展农业生产，克服农村劳动力和农具缺乏等困难，大力组织农民群众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变工队、换工队、互助组等劳动互助组织相继出现，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开展起来。这些农业互助合作组织还是一种低级的形式，但它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力、合理利用土地畜力等优越性。除大量初级形式的组织外，个别地区还出现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如在陕甘宁边区的安塞县出现了“按工入股，集体分粮，土地归公有，成果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开荒队。

1941年，针对当时面临的困难局面，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保障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建设方针。随后各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是各抗日根据地全体军民参加的，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自救运动。因此，各根据地除继续大力发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以发展农业生产外，同时在军队、机关、学校等部门大力开展了从事工农业生产、发展公营经济的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鼓励生产，要求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特别是纺织原料。1941年初，中共中央下令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屯垦。3月，第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陆续开进南泥湾。南泥湾荆棘丛生，杂草遍地，野兽出没，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这支部队在缺乏资金、工具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经过不长时间的努力，就使“处处是荒山”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与此同时，在延安的党政军民学各方面数万人也都投入大生产运动。部队、机关、学校根据不同情况，担负不同的生产任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政军负责人，也都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亲手开荒、种菜、纺线。周恩来、任弼时等高级领导人还参加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不但有力地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人民生活也得到明显改善，基本实现了丰衣足食。驻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也大多实现了粮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自给自足。由于军民努力生产，收入增加，人民的负担也大大减轻了。

除陕甘宁边区外，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也在“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口号下，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甚至游击区的部队也坚持生产。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各根据地创造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多种形式。如人民政府发放农贷（包括贷款、贷粮、贷种子），支援牲畜，代制农具，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派出小股部队，打击敌人，掩护军民生产；农忙时节，部队大力支援农民抢收抢种；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并取得显著成绩。如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部队，1943年每人种地3亩，自给一季粮食。晋绥边区，1944年部队开荒达166000亩，收粮20000石，机关开荒32000亩。新四军直属部队1944年能自给8个月蔬菜，10个月的食盐与全年肉食。大生产运动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游击区也收到了效果，使部队给养有很大改善。

大生产运动不仅推动了解放区生产事业的全面发展，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军民生活，而且还改善了官兵关系，增加了官兵的劳动观念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和组织性，培养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优良作风，进一步密切了军民鱼水关系，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克敌制胜 完善财政金融体制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金融事业，继续发挥了苏维埃时期的优良传统，其财政方针既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的那种“竭泽而渔”的办法，也不是单纯在缩减财政开支上打圈子，而是执行了以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的总方针。因此，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以主要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发展经济，然后再从农民那里取得税收。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税和工商业税。

为了贯彻“取之于民，用之得当”的税收原则，各抗日根据地首先对根据地旧的税收政策进行了改革，取消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一切苛捐杂税，同时根据合理负担的精神制定了一些新的税收办法，以应急需。如各根据地都制定过《救国公粮条例》、《合理负担办法》和《公平负担办法》等征收农业税的办法和条例，规定起征点，采用累进制。但亦有些根据地采取其他办法，如晋察冀边区和陕甘宁边区采取过按占有的土地面积加征田赋，晋绥边区则实行对地租收入、自耕农收入和佃耕收入课以不同的税率。但到1941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都先后实行了统一累进税制。1943年陕甘宁边区颁布《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条例》后，农业统一累进税制就在各根据地全面推行。统一累进税制，以常年产量为计算标准，超产不纳税，鼓励超产，增加收入，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

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以农业税为主，约占总收入的90%以上。农业税一般约占产量的10%以下，1940年以后，由于根据地受到日伪的严密封锁，财政十分困难，税收略有增加，突破了10%，达到13%，农民负担较重。随着大生产运动在抗日根据地的广泛开展，各根据地的财政状况有了好转，农业税的税率亦随之降低，农民负担亦减轻。

工商业税，当时主要包括出入口货物税、酒税、烟税、工商营业税等。工商业税在抗日根据地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一般只占1%～5%，其征收办法都是以调节生产、鼓励增产和促进商品流通为原则。如陕甘宁边区，为了保护境内棉纺织业的发展，1944年将棉花与棉

纱进口税减到1%和2%。为了抵制布匹的进口，将进口税率提高到10%。为了满足生铁和制造武器的需要，对铁的进口予以免税。1944年，边区可以自行炼铁时，为了保护炼铁业，又将铁进口税提到50%。

由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政策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而财政支出主要是用于经济建设和抗战军需。对于行政费用开支则极力缩减，尽力抽出资金来发展经济。如陕甘宁边区，1942年的财政支出中，94%是用于投资工农业生产和供给抗战军需。

抗日根据地在健全完善财政制度的同时，也健全完善了金融制度。

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傀儡政府滥发伪币。国民党政府也采取了通货膨胀的政策。这不仅使持有法币和伪币的根据地人民遭受货币贬值的极大损失，吸收走了根据地的各种宝贵物资，而且由此引起的物价飞涨、市场混乱、生产停滞，又使人民生活失去保障。因此，各根据地民主政府为着保护人民财富免受日伪和国民党政府利用法币和滥发伪币进行的掠夺，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先后都建立了自己的银行，自己发行货币，驱除伪币和法币，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新货币制度。

当时各抗日根据地建立的银行，除陕甘宁边区银行是由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的而外，其他各根据地的银行，都是随着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而建立和扩大的。这些银行主要有：1937年建立的陕甘宁边区银行，1938年3月建立的晋察冀边区银行，1939年10月建立的冀南银行，1938年8月山东根据地建立的北海银行，1940年5月晋绥边区建立的西北农民银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江淮、盐阜、淮海、大江、淮南等银行及1945年8月建立的华中银行等。

抗日根据地银行的基本任务是发行货币，与日伪和国民党政府广泛地开展货币战、贸易战，严禁伪钞入境，停止法币使用，活跃经济，发展生产，粉碎日伪和国民党政府在根据地抢购物资、收买金银财富、破坏金融事业的阴谋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银行基本完成了这个任务，为争取抗战胜利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作出了贡献。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七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建立与发展

1 战略收缩 内战前后解放区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浴血苦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人们都在庆幸：苦难总算熬到了头，和平可以实现了，中国终于有了希望。然而，战后中国局势的发展却令人失望。人们脸上欢庆胜利的泪水尚未擦干，天空又出现了内战阴云。

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竟然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中共武装投降，由国民党军垄断受降大权。这自然不会被解放区人民接受。

毛泽东和朱德，一方面致电蒋介石，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态度，号召各解放区军民对日伪军开展全面反攻，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积极收缴日伪武装；另一方面要求解放区军民在对日伪军反攻的同时，提高警惕，充分作好自卫的准备，以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进攻。

正当人们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扰的时候，无线电波突然传来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一直视中共为心腹大患的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商讨和平建国大计。对此，毛泽东心系天下之安危，为和平毅然飞抵重庆，以实际行动击破了国民党先前散布的中共不要和平的谣言。

1945年8月29日，国共双方开始了正式商谈。由于谈判前国民党毫无准备，谈判开始后国民党没有拿出具体谈判方案来。中共则提出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主张坚决避免内战和实行政治民主化，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地方自治，承认各党派平等合法，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改革和裁减全国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等。但是，谈判中，蒋介石企图在“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借口下，要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谈判几度陷入僵局。为促使谈判早日达成协议，毛泽东决定将分布在广东、浙江、海南、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和河南等地的8块解放区让给国民党。此举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散布的“共产党只要地盘，争枪杆子，不肯让步”等谣言，使中共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署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亦即著名的《双十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国民党被迫承认了和平建国方针，同意坚决避免内战，承认各党派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权利，确定召开由各党各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等。但是，关于解放区和解放区的民主政权问题，国民党坚持不肯承认。为此，周恩来、王若飞等在毛泽东返回延安后，继续同国民党谈判，但最终未能就此两项问题达成协议。

在进行重庆谈判的同时，中共中央为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还从组织上调整和建立了各大区的党的机构。8月，撤销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组成了以聂荣臻为书记，刘澜涛、罗瑞卿、黄敬为副书记的晋察冀中央局；9月，将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山东局合并，组成以饶漱石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的华东中央局。同时决定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组成东北中央局；10月，又成立了以郑位三为书记，李先念为副书记的中原中央局。对各战略区的部队，中共中央也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调整和整编，使各解放区基本形成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从组织上完成了由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到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在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告诫各解放区军民不要寄希望于国民党发善心，对于国民党的挑衅和进攻，要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军民严阵以待。到1945年底，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予以坚决反击，先后取得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绥远战役、津浦路战役等战役的胜利，迫使蒋介石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接受中国共产党无条件停战的建议。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五项协议。但内战隐患依然存在。

为制止内战，保卫和平，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战争胜利，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将练兵、减租和生产作为克服困难，援助战争，争取胜利的中心工作来抓。这样，1946年上半年，各解放区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练兵、生产和减租运动及反奸清算斗争。

练兵运动是和进行自卫战争准备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准备自卫战争，1946年上半年，各解放区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①用在对日伪军大反攻中收缴的大量武器装备部队，整编与扩大人民武装，编组野战部队，扩大民兵组织；②对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普遍进行战斗训练，以提高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③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提高干部战士战胜敌人，保卫解放区的决心和信心，增强部队的组织纪律观念；④调整军队后方勤务工作，实行精兵简政，裁减老弱，加强基层，充实战斗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其中，野战部队练兵时重点是练攻城、练守城、练夜战，利用战斗间隙练习射击、刺杀、投弹等。各地方兵团和民兵的训练则以队形、射击、投弹、防特、刺杀和军事纪律、组织纪律的训练为主。这样，解放区在全面内战到来之前，就出现了一个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高潮。

反奸清算主要在新解放区进行，对象主要是日伪统治时期欺压群众，为非作歹，为群众所痛恨的伪官吏、汉奸、特务、恶霸分子等。对罪大恶极者，一般通过召开公审大会、控诉会，揭发其罪恶，然后根据本人罪恶情节予以惩处，对其财产实行没收，以平民愤；对犯有一般罪行者，则通过说理会、清算会，清算其贪赃、枉法、敲诈勒索的不义之财，吐出赃款，归还群众。

结合反奸清算斗争，新老解放区还全面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运动，使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得以减轻，生活得以改善。在减租减息运动中，一些解放区的群众，还在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了土地，有的地方甚至实现了“平均土地”。

此外，当时各解放区的党政领导还清醒地认识到，经过8年抗战，解放区人力、物力资源消耗极大，只有大力发展生产，才能渡过难关，恢复元气，改善军民生活，准备好击退国民党进攻的物质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各解放区党政领导在发动群众支援战争的同时，妥善安排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力，不违农时地进行生产，并发放贷款，扶持工农业生产。在此同时，各解放区人民政府还组织部队、机关、学校尽可能地助民劳动，开展救灾工作，尽可能节减开支。

解放区军民经过半年多的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和练兵、生产运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大为提高，军事和经济实力均有很大的增强，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1946年6月，蒋介石在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以后，公然撕毁停战协议等一系列和平协议，于26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同时，以此为起点，向全国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蒋介石的内战枪声，击碎了四万万同胞的和平希望！

战争初期的形势对中共来说是严重的。国民党无论在军队数量、装备和战争资源等方面，都明显地处于优势。在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中，从1946年7月到1947年2月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一共侵占了包括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冀热辽解放区首府承德、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等105座城市，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大攻势，各解放区军民坚决地开展自卫战争，英勇地迎击进犯的国民党军。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主力主动地避开敌军进攻的锋芒，转入敌军侧翼，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经过8个月的浴血作战，解放区军民歼敌66个旅，约71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1947年3月，蒋介石在解放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下，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战略，集中重兵，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以图摧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等首脑机关，聚歼西北和华东人民解放军。

面对强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沉着冷静，运筹帷幄。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开展人民战争，并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相继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

沙家店等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则在山东解放区，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

为配合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其他解放区军民还主动向全国其他战场的敌人展开进攻，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样，到1947年6月，解放区军民以劣势装备，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又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在反击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中，解放区的人民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战斗中，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日夜不停地抢送伤员、弹药和粮食，很多民工还为支援前线、抢救伤员而献出宝贵的生命。如孟良崮战役时，仅鲁中解放区随军的一线民工就达7万多人，二线民工有15万多人，此外还有众多的临时民工。没有解放区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就不可能有战争的胜利。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向北发展 开辟东北解放区

日本投降后，内战危机日益严重。为准备反击蒋介石发起的内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措施。其中，十分重要的决策是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的要旨是，阻止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北进，继续集中力量消灭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和控制东北。

东北地区，在日寇投降前，没有蒋介石的一兵一卒。大片的东北国土，是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在九一八事变中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的。然而，东北的抗日力量并没有销声匿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这支人民武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长白山下到松花江畔，从兴安岭山区到松嫩平原，与日寇浴血奋战，给深受日寇奴役蹂躏的东北人民带来了希望。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在东北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深受东北人民的爱戴。

东北地区与冀热辽解放区毗连，辽东半岛又与胶东解放区隔海相望，日寇投降后，东北人民十分期望我党我军能挺进东北，收复失地。因此，当时无论是在群众基础，还是地理条件上，我军向东北进军，都极为有利。况且，我军如控制东北，便与苏联、朝鲜连成一片，革命根据地长期受敌人分割包围的不利局面，将从根本上改变。

苏联出兵东北后，为配合苏军作战和受降，中共中央命令冀热辽解放区部队组成三路先遣纵队挺进东北。先遣纵队沿途拔除日伪据点，解放山海关，接管了锦西、锦州等地。9月5日在苏军秘密配合下，进驻沈阳，进入东北腹地，打开了通往东北的大门。

9月18日，中共中央在作出“向北发展”决策的同时，派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人抵达沈阳，正式宣布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为副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此同时，中共中央还调集山东军区6万余人，新四军第三师3.5万人以及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解放区的部分野战部队共11万余人和党政干部2万余人，挺进东北。这些

进入东北的部队和原在东北坚持抗战的抗日联军，统一组成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在东北境内广泛发动群众，消灭日伪残余，肃清汉奸，剿灭土匪，建立各级地方政权。

1945年10月，大批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帮助下，运抵东北。11月以后，国民党一面以重兵大规模进攻东北解放区，一面向苏军发动外交攻势，使苏军承诺延期1个月从东北撤军，保证将各大城市及长春铁路交给国民党接管。

在这种不利形势下，为确保“向北发展”战略方针的实现，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果断地确定了在东北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即：在目前不利形势下，应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以主力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发动群众，剿匪反奸，在东满、西满、北满等战略要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12月28日，毛泽东亲自给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进一步重申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再次强调要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城市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不是在国民党已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因为国民党不会允许我们在这些地区内建立根据地。在指示中，毛泽东还严肃指出，建立根据地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在“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胜利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东北我军主力迅速改变战略部署，以3/4的主力部队，有重点地分兵于西满、北满、东满广大地区进行剿匪及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

此后，在东北的我军一方面对国民党的大规模进攻进行适当反击，一方面集中力量在远离城市的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建立和扩大人民武装，清剿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民主政权巩固的土匪，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打击日伪残余，削弱城市和农村的封建势力，瓦解国民党在东北的社会基础。

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46年5月，东北解放区已初具规模，先后成立了热河省、松江省、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嫩江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省、黑龙江省、合江省、绥宁省、兴安省等11个省政府。与此同时，近30个市、专区、盟，200多个县和旗的政权也都先后建立起来。

但是，东北根据地创建初期，由于日军投降前后的破坏，土匪的骚扰，军费的巨大支出，致使根据地的财经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军需民用物资严重缺乏。很多部队连军用大衣、棉衣、鞋袜等物资都供应不足。1946年，东北解放区军民在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支援15万匹布的情况下才勉强过冬。

为解决财政困难，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陈云的提议，一方面没收敌伪资财，发行公债，征收公粮，开展对外贸易，驱逐伪币，成立各省银行，发行货币，建立革命的货币体系；另一方面，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经济，废除伪满时的一切苛捐杂税，整顿税收，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这些关于经济上的重大举措，为解决东北解放区的财政困难，反击国民党的进攻，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谁主沉浮 车轮滚滚定乾坤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的巨大变化。被迫固守战略点线的国民党主力集团已被解放区军民分别牵制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5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55万人，分布在沈阳、长春、锦州3个孤立据点；华北战场为傅作义集团，60万人，分布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地区；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60万人，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华中战场为白崇禧集团，约35万人，分布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近30万人，分布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

战局发展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抓住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四大解放区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由于交通条件限制，东北解放区负责人未到）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求歼国民党重兵集团。会议要求各解放区努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支援战争。各解放区的党和政府应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以便能有秩序地接管新解放的广大地区。

9月会议后，各解放区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高潮，各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则在全国各战场上，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随后，及时地将秋季攻势引向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

9月16日开始的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济南战役历时8昼夜，华东野战军共歼守敌9万余人。在济南战役进行的同时，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经52天鏖战，歼敌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辽沈战役胜利后，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及地方武装于1948年11月发起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淮海战役，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在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协同作战，歼敌55万余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使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面前，为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直捣南京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淮海战役硝烟正浓时，华北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协同作战，于1948年12月5日发起平津战役，攻占华北重镇张家口、天津等城市，和平解放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北平。战役历时64天，歼敌52万余人。至此，华北地区除归绥（今呼和浩特）、太原等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在解放战争初期，战略决战和随后向全国的进军中，支援前线成为各解放区政府的一项中心工作。为了支援前线，各大解放区的人民政府调集了大批干部，建立起各级支前委员会，组成坚强有力的支前指挥机构，每次较大战役，都有几万或几十万民兵、民工参战，保障前线的需要。在各个战场上，解放区政府不仅动员了随军作战的常备民工队伍，连妇女、儿童也动员起来为战争服务。

在东北解放区，3年中参战民工达313万人，担架30余万副，大车30万辆，马90万匹。广大翻身农民将生产的粮食，晒干扬净，选择上等粮食交纳公粮686万多吨，同时卖给国营贸易部门余粮180万吨。解放区的广大工人还发挥高度的劳动热忱，生产各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供应前线。4年中，东北军事工业生产手榴弹499万多枚，子弹2800多万发，各种炮弹305万多发，支援前线。仅辽沈战役中，东北解放区就动员了9.6万名民工，3.6万辆大车，1.4万副担架，随军行动。他们顶风冒雪，迎着枪林弹雨，不辞一切劳苦，以保证军队的需要。

在西北解放区，陕甘宁、晋绥、晋南解放区人民3年中有1527万余人参加支前活动，支前畜力达430万匹，出动大车10余万辆，运粮食34万吨，而为解放军碾米、磨面、做鞋等的人数则无法统计。

在华东和中原解放区，仅山东解放区4年中就有240万民工随军作战。仅在淮海战役中，就有543万民工直接或间接参战。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0万人，他们用肩挑、车推、驴驮、船运等原始方法，从千里内外，将330万吨弹药物

资，5亿多斤粮食，156万斤油盐，86万斤猪肉等及时送到前方。仅5亿多斤粮食，如用小车装，每车装300斤，把这些小车排成行，就可以从南京到北京排成5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在华北解放区，解放区人民为了支援前线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在平津战役时，华北解放区人民，在广大地区设置了以战场为中心的四面八方的供应线，动员了154万人，担架2万副、小车2万辆、牲畜10万头为前线服务。为保障平津战役的胜利，华北解放区人民还修桥372座，修路近7000公里，供部队使用。

在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最为壮观的应该是：成千上万的人民，数十万辆大车、小车滚滚拥向前线，这又不禁让人想起那首唱遍大江南北的支前歌谣：

手推小车吱嘎吱嘎响，大家忙着送军粮。

鸡还没有叫，天还没有亮，

起早摸黑赶着上前方。

不怕粮车重又重，不怕路儿长又长，

解放军吃饱有力量，打呀嘛打胜仗。

在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在荆棘遍地的羊肠山道，成千上万的普通百姓，带着对新社会的憧憬，挥汗流血，赴汤蹈火，用原始的小小车轮碾倒了蒋家王朝，迎来了中华民族的新世纪。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八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政权与法制

1 民心所向 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曾商谈和平建国问题，国内出现短暂的和平局面。由于国共合作未彻底破裂，内战未全面爆发，原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基本维持原状，其性质仍为抗日战争时期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政协协议，挑起了全面内战，使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各解放区不断加强政权建设，相继建立了华北人民政府、东北人民政府、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等大解放区人民政府，并在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些新建立的政权，性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已经不同于抗日民主政权，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几个革命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其基础是工农联盟，专政对象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解放区人民政权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军事管制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内战爆发前，各解放区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仍采取以“三三制”为特点的参议会制度。全面内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各解放区普遍取消了参议会，而代之以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是参议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过渡的形式。解放区最高级别的人民代表会议由区域代表、职业团体代表及聘请代表组成。在大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之下，各解放区所设立的人民代表会议极不统一。但老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之后，在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了区、乡（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为区、乡（村）两级政权的权力机关，并由它选举产生政府委员会，作为行政机构。

（2）军事管制制度。军事管制制度是在新解放的城市实行的一种过渡性的政权组织形式。实行军事管制的城市，以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城市统一的军政最高权力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不由民选产生，而由人民解放军总部或大军区、野战军前线司令部委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一般待其任务完成和城市人民政府建立之后，便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将权力移交当地人民政府和警备司令部，并宣布撤销。如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城市即如此。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自治运动，1947年5月1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在我国首次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内蒙古自治政府是由权力机关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的，是内蒙古最高行政机关，对临时参议会负完全责任。内蒙古自治政府下设民政、军事、财经、文化教育、公安、法院、民族委员会和办公、参事厅。自治政府以下地方行政区划分盟、旗（县、市）、区（街、村）。各级代表大会为各级地方行政区域的权力机关，各级地方政府都实行民选，由自治政府委任。

内蒙古自治政府是我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政府，它的建立对于内蒙古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设提供了经验。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各解放区先后自上而下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由于大片国统区和城市的解放，各解放区的行政区划和行政制度变化较大。其显著特点是边区向大解放区过渡，行署制向行省制过渡。行省以下仍为县、村，至解放战争后期各解放区基本上采取大区、省、县、乡（村）四级行政体制。如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由于形势日趋好转，1948年5月中共中央离开陕北，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为统一和加强领导，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令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董必武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8月，经过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决定，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改为华北人民政府，在华北4400万人口的区域内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统一的人民政府，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为不久诞生的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即发出重新调整行政区域的通令，宣布撤销晋西北、晋南、太行、太岳、太原5个行政区，恢复山西省，在太原建立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这样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就完成了由边区向大解放区、行署制向行省制的过渡。其他解放区也先后完成了过渡。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治国安民 革命法制更趋完善

解放区人民政权的法制建设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过渡的重要阶段，很多立法，都反映了这种过渡性质。

解放区人民政权具有代表性的宪法性文献，前期有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它由政权组织、人民权利、司法、经济、文化五部分组成。《宪法原则》确定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为人民民主政权的基本政治制度，规定边区、县、乡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为各级人民管理政权机关，人民不仅有政治上的各种自由权利，还有免于经济贫困、愚昧、不健康的权利，及有武装自卫权等。《宪法原则》还规定，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任何干涉。此外，《宪法原则》还规定人民民主政权保障耕者有其田，劳动者有职业，企业有发展的机会，欢迎外来投资，保障其合理利润，消灭贫穷，繁荣经济等。

《宪法原则》用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解放区的革命成果，推动了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促进了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了使《宪法原则》变为正式的宪法，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根据《宪法原则》拟定了《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并准备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通过。但因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军事进攻，致使这项制宪工作中断。

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区有代表性的施政纲领是1947年4月颁布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1948年8月颁布的《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其中《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首先规定，华北解放区的任务是为解放全华北而奋斗，并继续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争取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各种建设工作，恢复和发展生产，继续建设为战争和生产建设服务的民主政治，培养各种干部和吸收各种有用人才，以奠定新中国的基础。其次规定，尽可能地建立人民的、经常的民主制度，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由它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对于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的政策，《施政方针》亦作了明确规定。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得到贯彻实施，并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健全民主制度方面，以及在恢复与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作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上述宪法性文献外，各解放区人民政权还十分重视土地立法、刑事立法、劳动立法、婚姻立法、经济立法等。如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根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提出了劳动立法的一般原则，随后各地人民政府颁布有关劳动问题的一系列法令，指出工人阶级有组织工会的权利，有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的权利，实行劳动保险制度。针对劳资纠纷增加的情况，1949年7月全国工会工作会议通过《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劳资争议解决程序的暂行规定》、《关于私营工商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等。

随着解放区革命法制的进一步完善，解放区人民政权在基本沿用抗日民主政权司法制度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这一发展是解放区人民政权司法工作的任务体现出来的。当时，解放区人民政权司法工作的任务就是从法制方面保障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摧毁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司法制度，废除伪法统，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司法制度。

为了在解放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司法制度，各解放区人民政府，彻底废除伪法统，摧毁旧的司法机构，建立起人民司法机构，这些司法审判机构分为大区（如东北、华北、中原等）、省（行政公署）、县三级，统一名称为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法院由同级人民政府领导。这时期，各解放区还根据审讯汉奸和日本战犯及土地改革、军事管制等的需要，建立过军事法庭、特别法院、临时性土地改革人民法庭及由各市军管会成立的特别法庭等。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华北人民政府等大区人民政府的成立，各大区人民政府下都设立了司法部，管理司法行政。

解放区人民政权司法机关在沿用抗日民主政权司法机关诉讼审判监狱制度的同时，也作了一些新的改革。如在城市推广了人民调解制度，在新解放的大城市建立市、区、街道三级调解组织，取消一切诉讼费，建立新型劳动改造制度等。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九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经济与文化

1 暴风骤雨 土地改革全面展开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及时地适应了革命形势转变，适时地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等革命任务；提出了适应这些革命任务的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而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三大经济纲领的核心内容。

1946年春，随着内战的日益临近，国内阶级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支持广大农民反恶霸地主和清除汉奸的运动，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和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这个指示的灵魂是：坚决支持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五四指示”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开始向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进行土地革命的重要转变。此后，广大农民在“五四指示”指引下，通过反奸清算、退租算账、退押退息等斗争，从地主手中获得了土地。但是，“五四指示”规定了富农的土地一般不动，开明士绅、华侨等可以多保留一些土地，较多地照顾了地主富农的经济利益。因此，它是一个由减租减息到彻底平分土地的过渡政策，是与当时政治形势的过渡性相适应的。

1946年秋冬，国民党加紧向解放区进攻，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破裂。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有必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发动广大农民参军参战，保卫解放区土地革命成果。

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是中国共产党20年来领导土

地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大纲共有16条，规定了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于“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土地分配原则是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大纲还规定对地主富农区别对待，对中农利益适当加以照顾，对工商业进行保护等。

全国土地会议后，在《中国土地法大纲》指导下，各解放区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一个波澜壮阔、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很快在陕甘宁、晋绥、晋冀鲁豫、华中等老解放区，东北等半老解放区以及豫皖苏、豫陕鄂等新解放区普遍展开，其势如暴风骤雨，迅速形成了一个土地革命的高潮。但在土地改革中，也发生了不少右的和“左”的偏差，如发动群众不充分，不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或者产生绝对平均主义伤害部分中农利益；侵犯部分工商业和对地主、富农不区别对待，甚至出现乱打乱杀等现象。为此，中共中央为了正确执行土地法大纲，又为土地改革制定了一条明确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土地改革总路线的指引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到1949年6月，约有1.45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革命，广大贫雇农获得了土地，中农也普遍获得了利益，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被消灭了，同时也分得了一份土地，有了生活出路。

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进行与完成，推动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加快了革命胜利的到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封建土地制度是中华民族在近代被侵略、被压迫和贫困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因此，土地改革的完成，就打倒了封建主义，消灭了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根基，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民从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为我国民主化、工业化和独立富强奠定了基础。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土地改革的进行推动了解放区和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在农村，当压迫在人民头上的地主恶霸被打倒后，农民获得了解放，他们组织起来，参加农会、贫农团、民兵，许多从土改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充分酝酿，各解放区逐步建立起县、区、村的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们开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参加和掌握乡村政权，成为解放区的主人。

为了保卫土地改革的成果，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担负巨大的战争勤务。他们中有的母送子、妻送夫参加解放军，支援革命战争。更多的翻身农民则自带干粮，随军出征，抬担架，救伤员，押俘虏，送弹药，并以自己节省下来的粮草、被褥等物资支援前线的战争。可以说，土地改革后的解放区，为争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取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打倒蒋介石这个胜利”，这是毛泽东对土地改革意义的高度概括。

土地改革完成后的解放区，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克服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不足，以及农民个体经营的自身缺点和局限，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在苏维埃时期和抗日根据地领导农民劳动互助的经验，大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从而使解放区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又有力地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改善了农民生活，同时也为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走向胜利 财政金融渐趋统一

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人民政府在解放区实施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使解放区的农业和工商业得到很大恢复和发展，推动了财政金融的初步统一。

1948年以前，各解放区的财政金融虽是在中共中央政策的统一领导下，却是分散经营，区域之间联系较少，内部也不完全一致。当时，各大解放区都设有一个银行，发行限在本区域流通的货币。如东北解放区设立东北银行，发行东北币；晋察冀边区设立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晋察冀边币；陕甘宁边区设立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币；晋冀鲁豫边区设立冀南银行，发行冀南币；晋绥边区设立西北农民银行，发行西北农民币；中原解放区设立中州农民银行，发行中州币；山东解放区设立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苏皖解放区设立华中银行，发行华中币；等等。这些解放区银行发行的货币，为反对敌人经济封锁，打击敌人破坏财政金融、破坏市场、套购物资和法币起了很大作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改善解放区人民生产生活起了应有的作用。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原来采取由各区分别发行地方性质货币的货币制度，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48年，各大解放区相继召开了财政工作会议，统一了各大区内的财政、金融。同年12月又召开了各解放区的联合财政、金融会议，会议决定在石家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的人民币在全国流通。发行人民币的任务，首先是统一各解放区的币制，其次是稳定货币市场。这两项任务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都分别完成了。自从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金融机构，发行了解放区统一的货币后，中国就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统一的、稳定的货币体制，从而彻底地改变了过去的混乱现象。货币的统一，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大和胜利，也标志着中国革命胜利的到来。

在财政方面，1946年12月，毛泽东提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无论在早期分散经营的条件下，或在后期逐步进行统一的过程中，都始终贯彻了这一基本方针。所以财政收入和支出基本达到平衡。

当时，解放区的财政收入和抗日根据地时期一样，主要来源仍是农业税和工商业税。

所不同的是，在农业税方面，抗日根据地时期实行的是“统一累进税制”，而在解放区时期实行的是“比例税制”。因为各个解放区大都全面进行了土地革命，土地基本上已经平分，有条件实行“比例税制”。如华北解放区就规定，凡土地一亩常年产量10市斗的作为一标准亩，一个农业人口（不分男女老少）扣除一个标准亩作为免税点，然后按各户的标准亩数征收农业税。

工商业税，仍是包括出入口货物税、酒税、香烟税、工商营业税等。其在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仍不大。如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等边区，工商业税一般只占到财政总收入的1%～5%。解放战争后期，尽管先后解放了不少大中城市，工商业税有所增长，但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仍不高，如晋察冀边区在1948年工商业税仍只占财政总收入的10%左右。

解放区的财政支出，绝大部分仍是用于供给军需和投资工农业生产。

解放区的发展，财政金融的逐步统一，促进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较快发展，并为全国的胜利作好了准备，创造了条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胜利，一方面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和终结；另一方面又标志着革命胜利的到来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广阔的道路。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十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胜利

1 历史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主力已基本被消灭，长江以北的大中城市和乡村已几乎全部被解放。

为了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讨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会上，毛泽东指出：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党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同时，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等等。

在会上，朱德、周恩来等都作了重要的发言。朱德总司令意味深长地说：“过去从城市到农村，是个大转变。现在从农村转到城市，又是个大转变，我们的工作要适应这个大转变。”“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要把国家建设好，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的科学知识不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骄傲的人往往是幼稚的人。”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领导机关由西柏坡迁进北平城，这正式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了城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在革命实践中，取得了辉煌胜利。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20时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解放。

南京解放以后，人民解放军接着就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分别向华东、华中、西北、西南等地挥戈猛进，追歼国民党残敌。到1949年9月底，除西南和广东、广西等部分地区外，全国大陆的大部分省份和重要城市获得解放，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各大区、各省市的人民民主政权也开始自上而下逐步建立，国民党的统治被摧毁，建立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

为了统一全国人民对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的认识，毛泽东于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章全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文章并说明了各阶级在这个政权中的地位，以及它应当实行的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为建立新中国的政权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人民团体、国内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宗教界634位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这里，毛泽东喊出了中国人民此时此刻的共同心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人民曾经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进行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斗争，才换得这一天的到来。

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并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在正式国歌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国徽留待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再作决定。

9月30日，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员会。

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会议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关，开始执行各项政府工作。

会议决定向外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愿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面对30万群众，向着全世界，亲手升起了第一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并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取得全国胜利，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为了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就需将新老解放区以大城市为中心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建立新结构、新形式的人民政权机关，以便更好地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设立东北人民政府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辖山东、江苏、安徽、福建、浙江、台湾）、中南军政委员会（辖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西北军政委员会（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南军政委员会（辖四川、贵州、云南、西康）以及绥远军政委员会。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还任命了东北人民政府和各军政委员会主席及部分新区各省人民政府的领导成员。至此，各解放区人民政权已圆满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彪炳千秋 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军队和革命人民，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终于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夺取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这条胜利的道路，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因此，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革命根据地是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战略阵地。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毛泽东等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曲折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幼年走向成熟的缩影。在革命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先后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进行了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运动，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文化事业，改善了群众生活，建立了革命的法制和秩序。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建设成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实验区和保障革命战争胜利的坚强阵地，它是新中国的雏形。

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学会治国安民艺术和造就大批优秀骨干的重要基地。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国革命不能首先在城市取得胜利，必须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长期积蓄力量，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根据地建设和革命战争，是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演习。如毛泽东所说，在这个演习过程中，“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在这个演习过程中，“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

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根据地政权的领导是学会治国安民艺术，掌握全国政权的重要准备。在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党的建设、廉政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军队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套密切联系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军、治政和从事经济文化建设的优秀领导骨干，许多同志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坚。因此，革命根据地不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政策和建设事业有着重大的影响。

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集中党的集体智慧，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并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在中国革命道路、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战略战术原则、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党的思想路线等一系列中国革命问题上，都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这不仅直接指导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而且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实践中又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丰富和发展，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幅璀璨夺目、波澜壮阔的画卷。今天，学习和研究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对于汲取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国家独立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的艰难革命历程，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中国史话》总目录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中国史话》编辑委员会

主任 陈奎元

副主任 武寅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巍 刘庆柱

步平 张顺洪 张海鹏

陈祖武 陈高华 林甘泉

耿云志 廖学盛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作者小传

寇伟

寇伟，男，1963年5月生于北京。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87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曾在澳门大学葡文学院葡萄牙语言与文化专业学习，获硕士学位。2000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中葡关系史、澳门史、中日关系史。撰有《甲午战争史话》、《中国近代妇女报刊通览》（合著）、《中国近代史演义》（合著）等著作，发表《1553～1849年澳门主权归属问题》等论文数十篇。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一 战云密布 日本阴谋侵略扩张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史书记载，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中国人到达日本列岛。以后，两国人民往来不断。隋唐时期，中国经济发达，国富民足，中日交往也空前密切。中国鉴真大师东渡扶桑，日本遣唐使到唐朝都城长安（今西安）。华夏民族的风俗、服饰、饮食以及丰富绚丽的思想文化，都深深地影响着日本。即使是今天，大和民族在服饰、饮食习惯和思想文化等方面也还留存着华夏民族的遗风。两国政府间与民间的交流几乎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外交等所有领域。纵观两国交往的历史，尽管也有过不愉快的时期，如明代以日本人为主的“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一度严重威胁了明朝的社会生活秩序，迫使明政府调整对外政策，实施了海禁。但总的来说，和平友好仍是中日两国交往的主旋律。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武装到牙齿的日本

当清朝皇帝做着天下唯我独尊美梦的时候，英、美、法等国的资本主义已得到飞速发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疯狂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它们在世界各地强占领土，开拓殖民地，掠夺资源，倾销产品，加紧殖民奴役和经济掠夺。此时，东邻日本也蠢蠢欲动。原本，差不多同一时期，同样处于封建统治下的日本，实行的同样是封关锁国的政策。在德川幕府统治下，日本只允许中国和荷兰的商人在长崎通商，对其他国家的通商要求一概拒绝。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率舰队闯入江户湾（今日本东京湾），以武力打破日本的封关锁国政策。次年，美国又强迫日本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胁迫日本对美国开国。日本被迫“开国”后，英、俄、荷等也纷至沓来，掠夺了一系列特权。日本与中国一样，都面临着被压迫、遭奴役的命运。面对这一局面，日本统治者做出了与清王朝皇帝完全不同的选择。1868年，在结束了幕府统治后，天皇睦仁改元“明治”，开始进行维新，逐步解决了各地藩主的封建割据，在全国形成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在外交上，日本派遣大批人员出国考察、了解国际社会，重新制定自己的政策，期望早日跻身于强国之列。君主体制的确立，使得多年蛰居京都宫中、毫无实权的天皇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开始自上而下地扶植、保护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出现了不同于欧洲列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形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农村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存，各级议会中有1/3议席被中小地主或大地主占据，使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有强烈的军事封建色彩”。由于自然、地理、人口等条件的限制，日本国内市场狭窄，资源匮乏，资本原始积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大的掠夺性和侵略性。面对英、美、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抢占殖民地的狂潮，日本也不甘落后，积极策划，强化军事工业的发展。1868年，以天皇名义发表的《宸翰》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明确规定负责处理外交事务的官员职责是“监督贸易，开疆拓土”。在这样的侵略方针指导下，邻近的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朝鲜就成为其“开疆拓土”的首选之地。

1891年，日本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政府《施政方针》中，公然抛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要捍卫“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主张。人们对“主权线”不难理解，涉及国家疆域版图，而“利益线”则耐人寻味。在《施政方针》中系指：凡是和日本国家疆域有“密切关系的区域是也”，而这个“区域”即指朝鲜、中国。在这种侵略方针驱使下，日本开始了疯狂的扩军备战。由于日本是岛国，进行扩张就必须首先建立强大的海军。天皇睦仁更是从王室经费中拨出专款支持购买军舰。1892年，在法国订购的巡洋舰“松岛”、“岩岛”驶抵日本。此前一年，“桥立”舰已建成并交付日本海军。1893年，从英国购买了“吉野”号。次年，“秋津州”舰也竣工交付日本海军使用。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已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达6万吨。陆军组建了6个野战师团、1个近卫师团，均配有炮兵、骑兵、工兵等，现役兵力达12.3万人，野、山炮计240门，战马3.8万匹，战时总动员兵力可达23万。为扩大军需产品生产，除强化国内军工企业、大量制造枪炮弹药外，还拨出巨资从欧洲购买武器弹药等战备物资，仅1894年购买军火就花费日元达420多万。为准备发动战争，海陆军频繁进行联合或单独军事演习，而所有这些演习，都以中国为假想敌。在疯狂扩军的同时，日本政府还向中国、朝鲜派出大批间谍，化装成商人、旅行者，有的干脆就化装成中国人，千方百计地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人文等各方面情报。大特务头子川上操六更是亲自出马，对中国的烟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进行实地勘察，熟悉山川形势，了解风土人情，探查军队部署。日本间谍绘制的军用地图，将中国东北、山东半岛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条道路，甚至水井，都标示得清晰准确。日本为发动侵略战争下了大的力气，做了精心的准备。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二 不宣而战 日军发动侵略战争

1890年起，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日本社会也呈现经济危机征兆。棉布、豆油生产下降，粮价暴涨，外贸逆差增加，工人失业，广大民众处境恶化。以伊藤博文为总理大臣的内阁与议会之间矛盾不断扩大，冲突加剧，内阁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对议会的不信任案，伊藤只有辞职或第三次解散议会这两种选择。鉴此，为转移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摆脱困境，避免垮台，寻机发动侵略战争便成为摆在伊藤内阁面前的当务之急。外相陆奥宗光在写给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信中称：“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不能用一般手段使这种慌乱的人心安定下来。但是毫无借口就发动战争也是不可能的。”日本驻华盛顿公使建野乡三也表示，“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国内现状不满中转移出来，我们宁愿反华战争”。正当伊藤焦急万分、千方百计寻找对策之际，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的内乱给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伊藤遂不顾一切，抓住这个机会全力发动侵朝战争。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蓄意挑衅 攻占汉城

1894年6月6日起，李鸿章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2400多人，分批自塘沽乘船，经海路开往朝鲜牙山。这支军队除担负为朝鲜“平息叛乱”的任务外，对日本的战争蓄谋竟一无所知，毫无准备。北洋舰队丁汝昌派“济远”、“平远”、“扬威”在仁川近海巡逻护卫。刚刚被议会不信任案弄得狼狈不堪的伊藤博文，得知清军入朝，如同捞到救命稻草，立即开动战争机器，紧急征用邮船公司的轮船，以备向朝鲜运兵之用。日本内阁随即以“保护”使馆、侨民为名正式通过派兵入朝决议。此议迅速得到天皇的认可。6月5日，在参谋本部内设立大本营，参加者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部长等，大本营直属天皇，从而避开了议会的监督。天皇旋即下令，派一混成旅团前往朝鲜。同日，以保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任为名，派先遣部队近400人随大鸟乘“八重山”舰从日本横须贺军港出发驶向朝鲜仁川。随后，陆军少将大岛义昌指挥由4000人组成的混成旅团，从12日开始，陆续在朝鲜仁川登陆，至16日，日军已全部登陆完毕，在朝兵力远远超过入朝清军。早在6月7日，即大鸟圭介率先遣军前往朝鲜途中，日本撕下伪装，照会清政府，称日本“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派驻中国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称“朝鲜现有重大变乱事件……帝国政府拟派兵若干，前往朝鲜”。在造成既成事实后，日本政府开始向清政府摊牌。

清政府获悉日本出兵朝鲜，极为震惊。李鸿章马上意识到这一事态的极端严重性，深切忧虑双方军队同时在朝，那么即有在朝开战之可能。本着避战的宗旨，总理衙门照会日本政府，据理驳斥日本派兵入朝的借口，建议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此建议遭到日本断然拒绝，日本政府复照宣称：“帝国派遣军队多寡，由帝国政府自行裁决，其进退行止，毫无受他人掣肘之理。”

其时，朝鲜国内局势已趋平稳。迫于清军入朝的压力，东学道起义军向朝鲜国王提出惩办贪官污吏和私通日本者、废除苛捐杂税、平分土地、解放妇女等、12条要求后，已于6月12日撤出全州。鉴于朝鲜形势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已经缓和，清政府已准备让军队从牙山内撤回国。如果清军撤回，日本处心积虑挑起与清朝战争的图谋就将很难实现。为达到拖住在朝清军、寻机挑起战端的目的，日本又向清政府提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其内容包括由两国各派委员调整朝鲜财政，裁汰冗员，设置警备兵力等等。此时，清政府看出日本意欲长期侵占朝鲜，挑起中日战争的端倪，李鸿章遂展开其自以为得计的那套“以夷制夷”的外交交涉，希望欧美各国出面调停，企图借列强来压迫日本，使其同意撤军。6月21日，总理衙门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之方案，2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向中国发出绝交书，“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决定独立担当“改革朝鲜内政”的责任，并向朝鲜增兵。日本政府训令大鸟圭介，授权他采取一切手段，制造战争借口。至此，日本政府已撕掉了最后一层伪装，明火执仗地干起来了。

6月26日起，大鸟圭介连续向朝鲜明确提出包括政治、财政、法律、军事、警察、教育制度等内容的“改革”纲领，共计5条26项。7月10日，又提出“补充说明”数十条，规定日本有架设电线、修筑铁路等特权，并限期答复。7月16日，日本与英国成功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列强中，尤以英国对日中争端态度最为模糊，鉴于英国在远东的实力存在，日本始终有所顾虑而不敢轻举妄动。此次日英达成协议，日本担心英国出面干涉的顾虑彻底打消了，便更加无所顾忌，放心大胆地发动战争了。

就在与英国订约次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制定了作战计划，天皇颁布诏令，恢复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的现役，任其为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很快组成以伊东祐亨为司令长官的联合舰队，开往朝鲜西海岸巡弋，寻衅挑起战端。23日，大鸟圭介指挥日军攻入汉城朝鲜王宫，囚禁国王，威逼国王生父大院君李罡应出任摄政，建立傀儡政权，胁迫他宣布废除中朝之间一切条约，并“委托”大鸟圭介率日军驱逐驻守牙山的清军。明火执仗的日军，却非要假惺惺地为自己披上一件“接受朝鲜请求”而与清军开战的外衣，企图依靠这种拙劣的、掩耳盗铃式的手法蒙蔽世界的视听。日中之间，战云密布。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激战成欢驿

按照日本大本营的安排，对清军偷袭是水陆并进、双管齐下。与丰岛海面激战同时，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率日军从汉城南下，直扑驻防牙山的清军。驻守牙山的4000名清兵在叶志超、聂士成统领下，分兵把守要地。聂士成自请率2000余名士兵移防成欢驿，叶志超率部守公州为后援。

成欢驿位于朝鲜忠清道平泽县东南，稷山县西北，是汉城至全州的必经之地。成欢驿东西高山丘陵环绕。东有月峰山，西有银杏亭、牛歇里高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聂士成将士兵布置在左、右两翼，左翼以牛歇里高地为主，右翼依成欢驿东面之月峰山修筑防御工事。7月25日，闻知日军向成欢驿扑来，聂士成慷慨誓师，激励将士英勇杀敌。果然，7月25日夜，日军约4000人，兵分两路，偷袭成欢驿。由武田秀山中佐率领的4个步兵中队、1个工兵中队担任右翼进攻。夜3时许，担任偷袭任务的日军悄悄渡过安城渡，到达佳龙里。因夜色昏暗，伸手不见五指，加上道路崎岖泥泞，前锋士兵迷路，闯入村内，打算抓人问路。此刻，日军的一举一动，早被预先埋伏的清军看得真真切切，眼见日军进入伏击圈，武备学生周宪章、于光炘等率士兵20余人，突然从道路两侧民房内向日军猛烈射击。日军猝不及防，黑夜中又不辨方向，搞不清清军的人数及位置，只好一面胡乱射击，一面匆忙后退，至全部匍匐于水田之中，狼狈不堪。接应梯队的日军听到前方激战，急于救援，时受伤的山田四郎中尉率3个分队向前急奔，因地形不熟，黑夜之中前冲心切，有29人误冲入沼泽之中，全部淹死。中队长松崎直臣大尉为摆脱不利处境，只好下令日军冲锋。清军骑兵出现在佳龙里村边，并射出密集枪弹，松崎被枪弹击中头部，当场毙命。日军大惊，全队仓皇逃走，拥上狭窄的安城渡桥，踩伤、溺死多人。就在前队日军行将瓦解之际，武田率大队赶到，再次向清军发起冲锋，战斗异常激烈。可惜清军伏兵少，骑兵因沼泽、水田地形不利展开而后撤。步兵也只有20多人，又无后队支援，终于不支，周宪章等2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凌晨4时，日军终于攻占佳龙里。此战，清军伏击打得漂亮，将士英勇善战，不畏牺牲，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重挫日军锐气。只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统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一指挥，布防人数过少，后援不继，伏击战先胜后败，极为可惜。

就在右翼日军得手之时，大岛义昌率9个步兵中队、1个炮兵大队和1个骑兵中队，对月峰山清军发起进攻。由于在兵力、火力上清军处于明显劣势，交战不到2个小时，第一、二营垒即被攻破，仅余三、四营垒。面对日军8门野炮的密集炮火，聂士成临危不惧，指挥若定，清军士兵无不以一当十，奋勇杀敌。后因弹药用尽，后援不继，三、四营垒也被日军占领。激战至早晨7时30分，成欢驿左、右两翼布防阵地均告失守，清军伤亡很大。余部被迫退守成欢驿街道，遂被日军四面包围，不得已，聂士成率部突围，退往公州。镇守公州的叶志超却贪生怕死，拒不救援，反以敌众我寡、公州难以再守为由，竟自率部沿朝鲜东海岸经清州、兴塘渡汉江、大同江退往平壤。聂士成无奈，只好随叶志超北走，沿路收集残部，历时月余，行程1000余里，终于回到平壤。成欢驿之战，是中日陆军在朝鲜的一次小规模交锋，以清军战败，丢掉牙山、成欢驿，损失8门大炮及大批大米、弹药等军需物资，败回平壤而告结束。日军仅死37人，伤50人，而清军却有200余人伤亡。这是清军继丰岛海战的又一次失败。此二战，极大地挫伤了清军士气，也极大地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日军完全切断了中国与朝鲜西海岸的海上通道，为进攻朝鲜解除了后顾之忧。陆奥宗光趾高气扬地宣称：牙山胜利的结果，使得“从前那些应否以强硬手段迫使朝鲜改革，以及高谈我军先攻中国军队的得失等议论，已被全国城乡到处飘扬的太阳旗和庆祝帝国胜利的沸腾的欢呼声所淹没”。通过发动对华战争，日本政府不仅避免了垮台的结局，而且初步尝到了战争带来的好处。

1 平壤保卫战

早在7月下旬，日本为强化战时体制，吸收枢密院议长、内阁首相、外相列席大本营会议，以求达到一致对外。为了取得这场蓄谋已久的战争的胜利，日本大本营精心制定了作战计划，明确指出作战的目的，是最后在直隶平原与清军主力进行决战，击败清军，迫使清政府投降。大本营还认为，日中海军的交锋将对整个作战计划起决定作用，特制定两个阶段的作战方案。第一阶段，由第五师团出击朝鲜，牵制清军，留在国内的陆军则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联合舰队在黄海或渤海寻找战机与北洋舰队主力决战，力争夺取制海权。第二阶段，根据海战结果，考虑三种选择：甲案，如果海战胜利并取得制海权，即运送陆军主力于渤海湾登陆，进入直隶平原与清军主力决战；乙案，如海战虽胜但并未取得制海权，即再派陆军赴朝，驱逐在朝清军，扶植朝鲜“独立”；丙案，如海战失败，则坚守在朝既有地盘，以图时局变化。这是一个侵朝侵华并重的战争方案，核心是首先击垮北洋舰队，取得制海权。宣战后，鉴于何时与北洋舰队主力交战难以确定，大本营遂将计划稍作调整，以陆军对朝鲜、海军对中国同时下手。8月14日，大本营决定将第五师团后援部队及第三师团全部投入朝鲜战场，合编为第一军。任命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为军长，星夜启程，率军前往朝鲜的釜山、元山、仁川集结。次日，在日本国内颁布《军事公债条例》，强征民众献金7600万日元，为发动战争作物质准备。9月8日，山县有朋率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中将、军参谋长小川又次少将在联合舰队的护卫下到达仁川，以统一指挥在朝日军。甫抵仁川，山县有朋即指挥日军全线展开，分进合击，包围平壤。

清政府的宣战，不如说是“被迫应战”更为确切。面对日军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及部署，面对光绪皇帝的切责，李鸿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匆忙调集军队，分南北两路入朝，支援在朝清军。南路2500人，经海路增援牙山；北路水陆并进，跨过鸭绿江集中于平壤。此次入朝，调动卫汝贵的盛字军、马玉昆的毅字军、左宝贵的奉军和丰升阿的奉天、吉林的练军，总计约1.4万人，8月下旬到达平壤。此时，成欢驿兵败逃至此地的叶志超却颠倒黑白，虚报战功，将千里逃跑上报为屡战屡胜。李鸿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章不辨真伪，上奏皇帝。8月25日，上谕叶志超总领平壤各军，并对他与日军交战接连获胜而传旨嘉奖，发军士饷银2万两。平壤阵前诸将，本对叶志超丑行一清二楚，闻听清廷任命这等败将督军，说谎者反而受奖，“一军皆惊”。将帅之间矛盾激化，造成临战将帅不睦。叶志超却得意忘形，并不认真筹备战守，日日摆酒设宴，夸官炫耀。平壤之役未开，而败局已定。

在日本宣战之后的9月8日，大本营由东京迁入广岛，以就近指挥。天皇也到达广岛，亲自坐镇。日军1.6万人，按照山县有朋的指挥分4路扑向平壤，前锋大岛混成旅团已于12日进抵平壤外围并发起佯攻。14日，日军后续部队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

平壤，北依崇山，东、西、南三面有大同江环绕，城墙高达10米，玄武门外牡丹台为全城制高点，地势极为险要。任清军驻平壤各路总指挥的叶志超，日日“置酒高会”，醉生梦死。一听日军来犯，慌了手脚，急忙召集众将，以“我军弹药不济，地势不熟”为由，提出撤出平壤，其实就是又要弃城逃跑。左宝贵挺身而出，坚决反对临阵脱逃，力主抗敌，称：舍身报国，在此一举。叶志超见左宝贵反对甚为激烈，又顾虑朝廷严词切逼，不敢贸然违抗，才匆忙布置防守，制定了一个死守平壤城的作战计划。令马玉昆守城南、大同江东岸，卫汝贵守城西、西南，左宝贵、丰升阿、江自康守城北，自己躲在城中，号称“居中策应”。

15日凌晨，围城日军发起总攻。马玉昆驻守的大同江东岸船桥里阵地遭大岛义昌部猛烈进攻。马玉昆，字景山，安徽蒙城人。出身贫寒，性格坚毅沉稳，胆识过人。1864年投宋庆之毅军，积功至副将，以总兵记名。曾出嘉峪关与左宗棠共抗阿古柏及沙俄的侵略，以“勇略冠诸将”。后调至北洋，驻防旅顺。此次入朝，面对强敌，马玉昆沉着冷静，指挥士兵奋勇杀敌。战场上枪炮声震天动地，日军伤亡惨重，连预备队也投入战斗。激战中，日军一度突入清军阵地，而清军士兵无一后退，双方展开白刃格斗，日军伤亡过多，狼狈逃走。稍停，日军又发起新的冲锋，双方多次展开肉搏战。鏖战多时，卫汝贵亲率盛军过江助战，清军士气大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在马玉昆指挥下，清军官兵跃出堡垒，向日军发起反冲锋，炮兵也越打越猛。日军自凌晨战至中

午，水米未进，饥饿疲惫，弹药用尽，旅团长大岛义昌、联队长西岛助义等指挥官均被击伤，自“将校以下死者约一百四十名，伤者约二百九十名”，第21联队中各大队长非死即伤。第2、4、10中队除一名少尉外，所有军官也非死即伤。战至午后1时许，大岛义昌见实在难以支撑，下令撤退，日军将来不及运走的尸体草草掩埋，匆忙逃离战场。船桥里一战，清军重创日军，获得大胜。这是清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唯一一次较重大的胜利。此战后，日军对马玉昆及其部下闻之丧胆。在船桥里歼敌的同时，驻守城西的卫汝贵，除率兵支援马玉昆外，也顽强挡住了野津道贯率领的第五师团主力的进攻，战事呈相持状态。

城北战场，是平壤保卫战的主要战场。城北玄武门之牡丹台，巍然屹立于平壤城北角，据全城形胜，是全城制高点，可谓天设险堑。另有4座堡垒拱卫，“垒壁高五丈，炮座完备，掩蔽坚固”。若此地一失，平壤全城必然告急。日军也看到了牡丹台的重要，投入进攻的朔宁支队和元山支队，总计7000余人，约占日军进攻平壤总兵力的一半。15日凌晨4时30分，日军先以猛烈的炮火，向玄武门外牡丹台的清军堡垒发起炮击，继而又以步兵轮番发起冲锋。镇守此地的清军将领左宝贵，亲自登城指挥，激励清军奋勇杀敌。左宝贵，字冠廷，山东费县人，1856年加入清军，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而多次被提升，赏戴双眼花翎、穿黄马褂，头品顶戴，赐“建威将军”，驻防奉天。左氏治军严整，部下战斗力极强。此次战前，左宝贵当众怒斥主帅叶志超贪生怕死、急于逃跑的丑恶行径，发誓与平壤城共存亡，并派兵日夜看守叶志超，防备其逃跑。战场上，他高声呐喊，鼓励士兵“进则定有异常之赏，退则加以不测之罚，我身当前，尔等继之”。将士感奋，全力死战。日军几次冲锋都被击退，伤亡惨重。战斗之激烈程度空前，“四处如天崩地塌，满空似落雁飞蝗，日月无光，山川改色，鸟望烟而遁迹，兽闻响而潜踪”。双方兵士“互相混战，草木皆红”。

日军见清军拼命，一时难以得手，遂改变策略，集中炮火猛轰清军堡垒。至晨8时，清军城外4座堡垒均被日军炮火摧毁。日军元山、朔宁两支队会合后，分东、北、西三面包围牡丹台并发动总攻，全力与清军争夺这个平壤城的制高点。左宝贵见日军进攻凶猛，命令用速射炮平射，横扫日军，大量杀伤敌人。激战多时，日军集中炮火，猛攻牡丹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台，炮弹如飞蝗一般，击破牡丹台胸垒。日军施放榴雾弹威力极大，将清军速射炮全部击毁，步兵随即冲上牡丹台，清军几经白刃拼杀，终于不支，退入玄武门，牡丹台遂告失守。

坐镇玄武门指挥的左宝贵，眼见情况危急，几次派人前往叶志超处请求发兵增援，均遭拒绝，遂亲自前往叶营求援，百般陈述利害。叶氏顾及自身安全仍拒绝发兵增援。左宝贵愤然离去，返回激战中的玄武门。他抱定必死的决心，换上黄马褂，头戴珊瑚冠，岿然立于城头，指挥杀敌。操炮士兵中弹身亡后，左宝贵亲手点燃大炮，连发36弹，炮弹连连在敌阵营中爆炸。日军指挥官惊呼“凡能击中头戴红顶翎者，万金赏”。激战中，先是一发炮弹在左宝贵身边爆炸，弹片击中胸部，而他继续带伤操炮不止。随后不久，其面部、左胸相继中弹，血染征袍，但他仍巍然挺立大声指挥士卒还击，直至被抬下城后“始殒”。主帅阵亡，属下3个营官也非死即伤，指挥失灵，但数百士兵毫不退却，英勇不屈，奋勇发射枪铳。嗣后日军炮火将城楼摧毁，仅剩4根柱子。清军无险可据，与登城日军拼死搏杀后，退入城内。日军乘机攻占玄武门。左宝贵是甲午战争中清军高级将领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第一人。消息传到国内，朝野震惊。光绪皇帝也亲作御制祭文，对左宝贵之死表示痛悼。朝廷谕令从优抚恤，加恩入昭忠祠，赠太子少保衔，其战绩及死事情形，宣付国史馆立传。左宝贵的英雄行为，极大地激发了朝鲜民众的爱国热情，平壤百姓至今仍传颂着这位白马将军的故事。

随着左宝贵战死，牡丹台、玄武门的相继失守，平壤保卫战进入异常艰难的时刻。由于马玉昆、卫汝贵挡住了日军对平壤西南方面的进攻，且激战一日，日军死伤近700人，伤亡人数远多于清军，弹药，粮食已经用尽，因在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艰难。如果叶志超能妥为筹划，战事尚有一搏。此时惊恐万状的叶志超，早已方寸大乱，心中只盘算着如何逃命。因此他一面命令仍坚持战斗的马玉昆、卫汝贵率部火速撤退，一面于下午4时，在七星门上挂起白旗，派一朝鲜人持停战书送至日军兵营，并在未与众将商议的情况下，以统帅身份下令弃城逃走。

这天深夜，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清军从各门涌出，有的从城

墙攀援绳索而下，由于指挥不利，命令传达不通，突围清军群龙无首，全无队形，四散拥挤而逃。加之道路狭窄，泥泞不堪，乱成一团，仓皇沿义州大道北逃。日军预计清军会趁雨夜突围，早已设下埋伏，半路突然冲出，截杀清军。混战中，清军全无抵抗能力，前面的士兵遇日军排炮轰击，只得掉头回跑，后面的军队不知底细，舍命前冲，黑夜之间，不分敌我，竟致互相残杀。既遭敌炮，又中己枪，自相践踏，哀号之声震动四野。军士们有的投水自尽，有的拔刀自刎，有的头碰石碑，更有的自缢树枝，遍地死尸，血水和着雨水，将山川草木染红。仅箕子陵二三百步之间，清军尸体山积，堵塞道路。50步内，伏尸竟达120人，马30匹，相互枕藉，惨不忍睹。仅这一夜奔逃，清军有2000余人被击毙，680余人被俘。日军以征服者架势进入空无一兵的平壤城，将清军遗弃的35门大炮、1000余支步枪、数十万发子弹、1000余顶帐篷及粮草、马匹、金银等物，全部收缴。平壤保卫战，以清军惨败而告结束。

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陆军的一次大规模战斗。清军死、伤、失踪2000余人，被日军俘虏700余人，损失大量武器弹药，并退出朝鲜。日军以死180余人、伤500余人、失踪10余人的较小代价，竟取得如此显赫战果。其实，日军发动平壤战役带有极大的冒险性，首要的是粮草、弹药极为缺乏，由于战线过长，运输补给十分困难，每个士兵仅有一小盒弹药和两天的干粮，军官也只能每天喝一碗稀饭。清军占据平壤，地势险要，工事坚固，粮饷弹药充足，只要坚守2～3日后，日军即会不战自退。日军指挥官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久战，倘清军勉力坚守几日，胜败形势很难预料。日军在供给如此困难情况下，仍大败清军，实属侥幸。在清军方面，由于众将对叶志超不服，大敌当前之平壤前线，形成“有将无帅”的局面。危急时刻，叶志超不仅不派兵增援策应，反而下令弃城逃走，将平壤拱手让与日军。叶氏狂奔500余里，渡过鸭绿江，逃入中国境内。这样一个贪生怕死之人，却又故伎重演，向朝廷虚报战功，诿过他人，矫饰败绩。李鸿章从中包庇，叶志超竟博得“力疾督战”的美名。皇帝下旨，对叶志超“深入异地，苦战连日”极为嘉许，称“此次退出平壤，实因众寡不敌，伤亡甚多，尚无畏葸情事”，“加恩免其议处”。叶氏躲过惩罚。昏庸的朝廷反以“临敌退缩”、“克扣军饷”等罪名将平壤保卫战有功之将卫汝贵处死。如此奖罚不公，可见清军大败亦在情理之中。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四 激战辽东 日军侵入中国东北

日军在平壤、黄海战役中连连得手，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日本大本营立即做出布置，把侵略战火烧进中国本土，以实现“深入中国境内，攻占其首府，以迫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的作战计划。至此，“经略满洲”就成为首先要达到的目的。由陆军大将大山岩为第二军司令官，统辖第一师团、第二师团及第十二混成旅团，总兵力达3万余人。拟于辽东半岛登陆，进攻金州、旅顺、大连湾，入侵辽南地区。由山县有朋率领的第一军，下辖第三、五师团，从朝鲜义州渡鸭绿江入侵中国东北辽东地区。两军作为左右翼，互相配合作战。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鸭绿江防全线崩溃

攻占虎山后，山县有朋率第五师团渡江，进驻虎山。日军按照预定计划，立即兵分三路，进犯九连城。10月26日拂晓，日军向九连城发起总攻，集中所有炮火，向城内猛轰，但见“鸟雀惊飞”，不见城中动静。急忙停止炮击，派士兵攀墙进城，打开大门，日军大队冲入城中后，发现并无一名清兵。原来，虎山兵败后，各路清军纷纷夺路而逃，阵形大乱而不可收拾。宋庆屡屡催促刘盛休率所部过河增援虎山，刘却只进到缓河岸边即逃回。刘部见虎山失守，士卒惊恐万状，纵火焚烧军营，四散逃避。宋庆无力继续组织有效抵抗，只得连夜退走凤凰城。清军苦心经营的鸭绿江防线，费尽心思谋划的以九连城为防守中心的防御体系，竟如此不堪一击，仅一日一夜，即告失守，可谓一大奇闻。而驻守大东沟一线之清军，一闻虎山、九连城败信，也闻风而动，连夜逃走。清军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日军仅以死34人、伤115人的微小代价，一举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侵入中国内地。而清军死伤则难以计数，仅虎山战场，就遗尸近400具，18门大炮及大批枪支弹药、粮草也尽落敌手。

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九连城后，又连拔安东（今丹东）、凤凰城。就在宋庆率本部毅军从凤凰城退守摩天岭之际，依克唐阿尚在长甸城驻守。当日军突击抢占安平河口时，其曾派兵增援，后又派马队统领侍卫永山率队驰援，并有斩获。直至得知日军占凤凰城后，为避免腹背受敌，依克唐阿才率部撤守宽甸城，退守赛马集，以与宋庆军协守摩天岭，以期固守辽阳、奉天，保卫这块清朝“陵寝、宫阙、历代圣容、宗器国宝尊藏所在地”。原来，日军为达到“进逼辽阳、奉天”，“取奉天度岁”的目的，在接连占领长甸、宽甸城后，又于11月18日，在南北夹攻下，攻占岫岩。岫岩为一战略要地，西通海城，东邻凤凰城，北通辽阳，为兵家必争之地。驻防此地的清军丰升阿见无力坚守，率部退走。至此，日军几乎完全控制了东边道所，并在安东县设立民政厅，任命书记官小村寿太郎为民政长官，实施殖民统治。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海城争夺战

为了打通与在辽东半岛登陆的日军第二军的联络，互相支援，山县有朋及日军第一军将领急于攻占海城，以控制辽阳南路这个重要的战略城镇。海城地处辽南，居交通要冲，东连岫岩、凤凰城，西通牛庄、营口，北控辽阳、奉天，南达盖平、金州，实为极为重要的战略重地。然而，对是否攻占海城，日本大本营却有不同的看法。由于严冬将至，气候寒冷，日军连日征战，受伤亡、疾病、寒冷的困扰，军中减员极多，急需休整。11月9日，大本营命令日军第一军退至九连城附近，在碣河与大洋河之间建立宿营地，全军扎营，休整待命，为来年春天发动春季攻势做准备。然而，武断的山县有朋却固执己见，于11月25日强令日军进攻海城，因而与大本营的争论表面化了。大本营为维护权威，制止山县的冒险行为，由天皇下诏，调山县回国“养病”。由于进军令早已下达，山县虽然起程回国，接到攻击令的日军却仍冒着严寒，急扑海城。经过沿途激烈交战，日军终于在12月23日攻占海城。

鉴于海城重要的战略地位，清廷急令宋庆自盖平驰援，以保护营口、牛庄。宋庆留章高元的嵩武军、张光前的亲庆军守卫盖平，亲率9000余人连夜北上，在海城西南的马圈子、感王寨一线扎营，伺机反攻海城。占据海城的日军，见处于清军四面包围之中，盖平又有清军驻防，牢牢阻隔了与第二军之间的联系，又发觉清军大军进至海城外围，十分紧张。为了争取战场主动，连日征战的日军不顾伤病员增加、粮草缺乏等困难，抢先从海城出兵进攻驻扎马圈子一带的清军，排出18门大炮及3个中队的步兵。12月19日午后，日军在用排炮轰击后，发起步兵冲锋。清军毫不示弱，奋勇还击，战场上炮声如雷，“天地为之震撼”。日军步兵冲锋在开阔地上，毫无遮拦，被清军士兵像打活靶一样射杀，“死伤颇多”，“鲜血淋漓，染红满地积雪”。午后2时，日军在付出75名官兵阵亡的代价后，占领马圈子，清军后撤。

午后4时，日军向感王寨东北的香水泡子发动进攻。日军在两尺深的积雪中艰难进攻。宋庆的毅军打得异常英勇，4门速射炮准确地落在进攻日军的队中，步兵也依托民房墙壁，顽强射击。日军死亡惨重，其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中一支120人的队伍仅40人生还，只好匍匐于地，等待增援。随着两个大队的日军增援部队投入战斗，清军感王寨第一道防线被突破。毅军临危不惧，官兵们前赴后继，轻伤不下战场，拼死与日军搏战。日军指挥官也由衷叹服，称毅军“不愧为闻名的白发将军宋庆的手下，不轻露屈挠之色”。双方战至下午5时50分，日军终于占据感王寨，宋庆率残部退往田庄台。此次激战，自上午直打到黄昏，双方都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方承认，此仗日军死伤408人，这个数字，尚不包括冻死及害怕被俘而自杀的在内。清军伤亡约500人。清军在此仗中虽毙伤了大量日军，但毕竟丢掉了感王寨，使本来岌岌可危的海城日军固守孤城成为可能。日军随即展开进一步攻势，以期打通第一、二军之间的联系。

海城，素有“辽沈门户，海疆咽喉”之称，清廷非常重视。当海城失守的消息传出后，“宁、锦诸城大震”，清廷的祖宗陵寝之地受到了直接的威胁。此一惊非同小可，清廷急调各路援军，驰援辽阳，以期夺回海城。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吉林将军长顺率部紧急驰援辽阳。奉天将军裕禄部及驻守海城西南田庄台、盖平、营口等地的宋庆部加强备战。至12月底，清军在海城的北、西、南各重镇集结兵力达170余营。清廷还在关内急调各路援军，出关增援，以期反攻海城。

日军在攻占海城的同时，就发现自己处于数万清军三面包围之中，第五师团又被牵制在凤凰城一线，难以抽身。在山东半岛登陆的日军，距海城较远，且有盖平清军阻隔，难以增援。为打通与海城的联络，日军反复衡量，于1895年1月3日，由乃本希典指挥的第二军之混成旅团北犯盖平。l月10日，日军分左、中、右三路向盖平发动猛烈进攻。

此时，驻守盖平的有章高元部清军8营，守南门外盖州河一线；张光前及杨寿山、李仁党守东门外凤凰山一线。士兵们浇水成冰，使盖州河面坚硬光滑，以期阻止日军进攻。清晨5时，日军全线发起冲锋，战场上枪炮声如雷贯耳，炮弹枪弹在空中纷飞，如倾泻的暴雨。日军兵卒拼力冲击，清军官兵誓死坚守。章高元更是激扬士气，亲临阵前，往来指挥，毫不畏惧。士兵们“精神百倍”，拼死杀敌。日军正面突破的企图不仅未能实现，且伤亡惨重，陷于困境。见正面强攻不行，日军遂绕攻凤凰山，以期从侧翼突破清军防线。凤凰山战场一时间硝烟弥漫，枪炮

声震天动地，“仿若天地即将崩毁”。不久，张光前支持不住，阵地被日军突破。7时50分，凤凰山被日军占领。8时15分，日军从盖平城东南攀城墙而入。

正在盖州河顽强阻击的章高元，发现城东南挂起日本旗，急令杨寿山、李仁党率队回援。二人冲锋在前，直闯入日军步兵队中，左冲右杀，直扑城南门。不料，日军施放排炮，杨寿山“忽一飞子洞胸而入，仆地气绝”，李仁党也“中子殒命”。二人双双为国捐躯，所带官兵，大多阵亡。日军击溃清军援军后，立即架炮猛轰坚守盖州河的章高元部。此时，清军援军徐邦道率部赶来，无奈日军炮火过猛，章、徐两人只得率部撤走。9时40分，盖平城全部陷于敌手。日军虽占得盖平，但也付出了伤亡334人的惨重代价，是日军侵华以来伤亡较大的一次，但毕竟占据了盖平，实现了预定计划。清军也有近700人伤亡，但战场主动权尚在手中。

为彻底切断日军第一军与第二军之联络，挽回盖平失利的被动局面，缓解日军对奉天的威胁，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清军开始反攻海城。

1895年1月17日，依克唐阿与长顺共率2万余清军开始联合反攻海城。经过协商，依克唐阿率部由西北进攻，长顺由东北、北面进攻，形成对海城的半圆形包围。早8时，长顺率部发起进攻，清军炮兵排炮向日军驻守的城外双龙山狂轰，步兵随即攀岩而上。日军居高临下，组织炮火猛烈还击，用密集弹雨阻止清军。双方战到下午2时35分，长顺部伤亡60余人，缓缓撤下。依克唐阿部主攻西路，官兵们骁勇异常，猛攻日军驻守的欢喜山阵地，日军力不能支。第一军司令野津道贯与第三师团长桂太郎正在山上观战，清军一发炮弹突然飞来，竟从二人中间穿过，惜未能爆炸，二人侥幸逃得性命。日军指挥官惊恐之余，恼羞成怒，以3个大队猛烈反攻。清军在予敌以重大杀伤后，渐渐力不能支，加之夜幕降临，且战且退。第一次反攻海城遂告失利。

第一次反攻失败后，长顺退往海城以北10公里的柳河子，依克唐阿退守海城西北15公里的耿庄子。1月22日，经过几天休整，两支部队再次进攻海城。依克唐阿率部攻占海城西北6公里的大富屯、小富屯。清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军“五人一帜，十人一旗”，“头上缠着红色头巾，手持抬枪、鸟枪、连发枪等火器”，小心谨慎，一步一射。当进至海城西北1公里的徐家园子时，埋伏已久的日军突然杀出，将依军拦腰截为两段。依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进攻城东双龙山一线的长顺部接依军救援急报，即率部绕到城西，抢攻晾甲山日军。长顺部将晾甲山三面围定，猛烈进攻，无奈日军炮火过猛，见依军撤走，遂下令后撤。此战，由于日军设有埋伏，加之开花炮威力巨大，清军遭受重大损失，共伤亡600余人。第二次反攻海城又告失利，依军及长顺部士气受到很大挫折。

连续两次反攻失利，并没有动摇清廷夺回海城的决心。此时，在山东登陆的日军正全力进攻威海卫，以期全歼北洋舰队。而清政府则拟派出议和大臣张荫桓、邵友濂赴广岛与日本政府进行议和谈判，故为增强谈判筹码，急需海城反攻胜利。清政府下决心夺回海城，除责令依克唐阿、长顺、章高元参加第三次反攻战外，又增调徐邦道的拱卫军和李光久的老湘军加入战列，总计3万余人，分左、中、右三路合击海城。长顺担任左路进攻，直取海城东北的头河堡、二台子及双龙山；右路徐邦道、李光久进攻城西的柳公屯一线；中路由依克唐阿部进攻欢喜山。2月16日上午10时，清军左、右两路同时开始进攻，本着战前约定的“以分军先抢山头为上”的战术，长顺军约3000人“吹响进攻号，呐喊着猛进”，直扑双龙山。日军恐惧，拼命开枪开炮。炮弹在长顺军“头上炸裂，榴弹在周围迸散”，官兵死伤严重，被迫后撤。依克唐阿的中路进攻由于日军炮火过猛而败走。徐邦道、李光久的右路进攻颇有声势，率先抢占了唐王山西侧高地。在继续攻击中因山势陡峭，多悬崖绝壁，又被日军炮火压制，始终未能抢上山头。午后3时，被迫撤走。第三次反攻，虽激战一天，清军仍以失利告终，伤亡200余人，而日军仅伤亡14人。担任牵制任务的辽阳知州徐庆璋率兵勇3000人，大炮8门攻打析木城，也因日军早有准备，炮火猛烈而败走。

清军接连三次进攻海城，虽未得手，但依克唐阿、徐邦道、李光久等均扎营距海城几公里之地，对海城仍紧紧包围，战场主动权仍掌握在手中。在三次反击战中，李鸿章的淮军暴露出腐败无能、屡战屡败的情形，根本无法抵抗日军的进攻。淮军将领叶志超等在战斗中的拙劣表现，引起朝廷言官的弹劾。清政府为夺回海城，决定起用湘军。1894年

12月28日，经过反复斟酌，光绪皇帝颁旨，任命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节制关内外各军。刘系湘军名将，一贯主战，此次奉命督师，奏请署湖南巡抚吴大澂和宋庆帮办东征军务。朝廷立即允准，并下令湘军部将迅速组军增援关外。湘军旧部新疆布政使魏光焘、江苏按察使陈湜，湘军悍将李续宾之子李光久纷纷率部开往辽东战场。刘坤一于1895年2月9日抵达山海关。此时，关内增援部队仍源源不断出关，除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原有清军外，关内之京畿、北塘、天津、大沽等地驻军也纷纷调防。至2月下旬，集中在海城周围参加反攻作战的计有依克唐阿、长顺、宋庆、吴大澂、魏光焘部100多营计6万人，加之关内的军事调动，总计约在400余营，20万人。为协调后勤供应，除天津东征粮台外，又增设湘军东征粮台，专门负责东征军队的后勤供应。这次军事调动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清廷在陆军方面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集中了能够调动的一切军事力量，足见清廷对此次海城反击战的重视程度。

与前几次反攻海城不同的是，此次清军进攻主要集中在大平山和海城2个战场。

大平山位于大石桥西南，为连接盖平及营口的咽喉要地。日军自占领盖平后，限于兵力，只派少数部队驻防。为配合反攻海城，牵制日军，宋庆等率部奔袭大平山。2月21日凌晨，宋庆、马玉昆率部从营口出发，8时许，进抵大平山，与日军展开小规模的战斗。下午3时，宋庆部占据大平山，马玉昆也驻扎西七里沟。不久，徐邦道也前来助战，扎营大平山北6公里之老爷庙、姜家房，至此，清军总数已达1.2万人，大炮10门。23日到达盖平的日本第一军第一师团，于24日开始向大平山发动进攻，以期为下一步进攻营口作准备。

24日晨7时，日军第一旅团在乃木希典率领下从右路进攻大平山之东侧，西宽二郎指挥第二旅团为左路，进攻大平山南面，师团长山地元治率本队为预备队向大平山清军发起全线进攻。经过一番猛烈炮击后，左路日军攻占东七里沟，随即向马玉昆驻守的西七里沟进犯，日军排出12门大炮，发射“榴霰弹四百余发”。马玉昆指挥士兵奋勇还击，军士们在民房墙壁上凿出枪、炮发射孔，向在雪地上蜂拥而来的日军猛烈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击，日军伤亡很大。战至下午4时，进攻日军子弹用尽，加之平地毫无遮拦，只得“伏地避弹”，情况十分狼狈。山地元治急令预备队增援，日军士兵为摆脱困境，拼死冲锋。清军阵中，宋庆、马玉昆纵马往来驰骋，指挥士兵奋勇抵抗。宋庆坐骑中炮，摔伤腰部，换马后继续指挥。清军官兵十分感动，“迎炮以上，呼声动天地，无不以一当十”。日军在大平山战场20公里的范围内，有50～60门快炮不停地向清军轰击，清军官兵死伤颇多，但毫无退却之色。战场上，马玉昆率百余亲兵被日军围困，搏斗尤为激烈。马玉昆左冲右突率部杀出包围，见还有清军士兵被困在内，遂又挥兵杀入，救出被围士兵，而百余名亲兵仅剩20余人，被迫放弃西七里沟。日军右路也攻占了大平山东部，大平山阵地遂被日军占领。大平山之战是清军四次反攻海城战斗中较为激烈的一次，清军伤亡惨重。日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伤亡官兵300余名，加之激战一天，爬冰卧雪，饥寒疲惫，军中竟有1000余人被冻伤。

在海城战场，清军沿袭以前的进攻路线，兵分三路，依克唐阿担任中路突击，从北面进攻双山子、教军场；长顺从东路，进攻距海城仅1公里的栗子洼；吴大澂的湘军和徐邦道的拱卫军从西路进攻唐王山、晾甲山。2月21日上午9时许，清军全线发起攻击，在炮兵掩护下，长顺军向双龙山东侧、依克唐阿军向欢喜山及双龙山之间的甜水沟猛烈进攻，造成两路夹击双龙山的态势。日军急忙抢修加固工事，并组织炮兵、步兵全力反攻。激战多时，依军大炮多门被日军击毁，难以招架，步兵只得后退，两路进攻，同时受挫。

在西路攻击中，吴大澂指挥部将李光久、刘树元，徐邦道率领副将胡延相、蒋顺发及梁永福将晾甲山团团围住，合力猛攻。日军官兵难以招架如此凶猛的攻击，向山顶仓皇逃窜。恰在此时，进攻唐王山的清军罗应旒见日军逃窜，挥兵从山后偷袭，不料遭遇从盖平前来增援的三路日军围困，处境异常危险。徐邦道等立即调转炮口，全力轰击增援日军，一面率队增援，经过苦战，虽杀退日军，但伤亡很大，难以再行攻击。且依克唐阿、长顺两部，连遭挫折，进攻锐气远不如前，战场上一遇日军，步兵往往畏缩不前，只靠炮兵远远地轰击而已。清军第四次反攻海城，再一次以失败告终。

四次反攻失败后，清廷仍未动摇攻下海城的决心。2月25日，再次谕令东征各军，以“现在关外大军云集，各营枪械亦齐，声威较壮。海城距贼毗连处，经依克唐阿等攻剿，凶锋已挫，亟应联络各营，鼓励士卒，齐心并力，迅图克复海城，再行合军南剿……”。于是宋庆、吴大澂、依克唐阿、长顺等前线将领经协商，遂定于27日分三路再次反攻海城，这已是清军第五次反攻海城了。

27日，西路进攻部队在李光久、刘树元、徐邦道、梁永福等率领下，分头猛攻。徐邦道指挥进攻唐王山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炮火猛烈，徐邦道指挥炮队还击，一发炮弹竟与徐邦道擦身飞过，营官刘桂云中炮阵亡，徐邦道只得下令退走。随后，各队清军也纷纷败退。北路依克唐阿部击退日军对大富屯的进犯，统领寿山又乘胜攻占日军双山子阵地。28日，天降大雪，平地深3尺。驻扎在海城的日军主动出击，第五旅团进攻欢喜山，双山子第六旅团进攻沙河沿、大富屯等地，分路进攻清军。激战多时，清军在寿山、德英阿等将领指挥下，坚守阵地，奋勇还击，日军退走。此时，为解海城之围，日军施“调虎离山计”，第五师团进攻摩天岭及辽阳，第三师团进犯鞍山，以实现山地元治和野津道贯确立的会攻牛庄、营口计划，同时，牵制围攻海城清军。驻守奉天的裕禄和辽阳的徐庆璋慌了手脚，急电海城前线诸军救援。清廷急令长顺、依克唐阿率部增援辽阳。此二军一走，海城北面空虚。3月2日，魏光焘、晏安澜与诸将再议会攻海城。但诸将多有难色，不愿马上进攻。只有徐邦道率部与日军在海城西南唐王山苦战。由于各军犹豫不战，徐邦道孤立无援，不能深入，只得退走。第五次反攻海城也告失利。

清军集中兵力，前后五次反攻海城，最后两次反攻兵力竟达6万人，是海城日军的9倍。缘因围城清军各将领心志不齐，又缺乏统一指挥，屡战屡败。前三次反攻主将为长顺和依克唐阿，而长顺消极避战，且依克唐阿“忠勇有余，智略不足”。第四次反攻又加宋庆、吴大澂为主将。海城前线实际上由吴大澂指挥，他言过其实，自命不凡，却并不熟悉军务，临战前求神算卦，希望通过此战，飞黄腾达，而对与日军交战，则不认真准备，如此统帅，焉有不败之理。日军进犯辽阳、鞍山，清军陆路战场已呈败象，再也无力主动进攻海城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6 土城子大捷

攻陷金州当晚，日军即制定了进攻大连湾、夺取旅顺军港的作战计划。11月7日凌晨，日军兵分三路，开始实施攻击。本来，日军估计，大连湾为北洋重地，修筑有最新式的炮台，极为坚固，且装备有最精良的大炮，火力强大，远非金州可比，预计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可当日军进攻之际，却发现如此重地，清军竟已经弃守。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缴获清军遗弃的大炮、枪支、弹药、马匹、军帐无数。原来，驻守大连湾的清军守将赵怀业，一闻金州失陷，惊慌失措，率部连夜逃往旅顺，将大连湾拱手让给侵略军，使得旅顺口也直接暴露在日军枪口之下。清军三日之内，连丢金州、大连，旅顺危急，朝野震动。

旅顺素有“东洋第一坚垒”的称号，与威海卫隔海遥遥相望，恰似两把利剑，共扼渤海之门户。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的顶端，港口位于老铁山东北麓与黄金山西麓之间，东西狭长，南北窄小，中间有一虎尾状沙丘，将港湾分为东、西两澳。港口最窄处仅九丈，可通过铁甲巨舰。旅顺口北面从西北至东南一带，群山环绕，呈半月形拱卫港口，自然地理条件极为优越，实属天然军港之最佳地点。清政府从1880年起，苦心经营10余年，耗费无数白银，修建船坞。在东西两岸，修筑炮台、堡垒，设置360度旋转大炮。东炮台群计有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炮台，并在松树山以东、二龙山以西、鸡冠山以西设立临时炮台；西炮台群由椅子山、案子山、望台北炮台等组成。在这些炮台中，以黄金山炮台最为坚固，配置了360度旋转大炮，如从海上攻击极为困难。各路炮台均建于群山之上，“连络不断”。爱国诗人黄遵宪曾写诗称赞旅顺口的险要坚固：“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炮台屹立如虎阚，红衣大将威望严。”可见其何等坚固。其时，驻防旅顺的清军加上自金州撤回的徐邦道部和连顺部，总兵力已近1.5万余人，如各将同心协力，旅顺足可坚守。李鸿章也把保住旅顺的希望寄托在“诸将才能”身上。他致电旅顺清军统帅、前敌营务处道员兼船坞工程总办、代北洋大臣节度的龚照玙，要求龚与诸将协商，明确此战，“系背水阵，除同心合力战守外，别无他法”。但龚照玙并不与诸将认真商议如何防守，而是畏敌如虎，屡思逃跑。在11月6日金州失守的当天晚上，他以“商运粮米”为借口，

突然乘鱼雷艇赴烟台，因做贼心虚，不敢会见时在烟台的山东巡抚李秉衡，以致被李奏参。此后，他又以“请援”为名改乘商船跑到天津。龚此番临阵脱逃，在旅顺造成极坏影响，士兵人心浮动，船坞局及水旱雷学生、军械局自委员以下纷纷逃走。西岸旱雷队长张启林竟把电箱损坏，带水勇4人逃走。后李鸿章严饬龚“即日回防，激励诸将同志固守”，龚才被迫返回。但如此贪生怕死之人焉能联络清军同心固守！驻守旅顺的清军5位统领，总兵姜桂题，记名提督黄仕林、程允和、卫汝成和记名总兵张光前，再加上赵怀业和徐邦道，共7位将官，且又不相统属，各行其是，当面临日军进攻的危急时刻，又一次出现了类似“平壤战役”清军“有将无帅”的局面。在商议防守事务时，面对诸将消极避战，徐邦道极为义愤，虽以新败之军，仍慨然请战，力主在旅顺北之要地土城子设埋伏，以逸待劳，截杀日军。徐邦道慷慨动容，言辞激烈高昂，历数主动击敌之必要，恳切希望众将一同前往杀敌。而各位统领却装聋作哑，默不作声，不愿前往助战杀敌。徐邦道激于义愤，竟然独自率所部进抵土城子。卫汝成被徐邦道的爱国杀敌精神感动，率部前往助战。

11月15日，日军第二军进逼旅顺。连日大胜，使日军官兵骄横跋扈，不可一世。18日上午10时，秋山好古少佐率日军前锋第一骑兵大队耀武扬威，蜂拥而来，进抵土城子，日军突然发现数百名清军出现在前方阵地。根据以往经验，日军认为只要稍作攻击，清军就会败逃狂奔，所以，没有把眼前的清军放在眼里，对进攻也并未作精心准备。10时30分左右，清军阵地突然响起冲锋军号，清军步兵向正在准备进攻的日军发起冲锋，漫山遍野，潮水般扑向日军，清军骑兵也从两翼同时杀出，包抄日军后路。冲锋的清军士兵士气旺盛，动作神勇，转瞬之间，即杀到阵前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战场上刀枪并举，枪弹横飞。清军由于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加上士兵系徐邦道旧部，骁勇善战，团团围住日军，猛攻不已。日军遭此突然袭击，措手不及，伤亡惨重，左冲右突不得脱逃。秋山少佐急忙派人冲出重围，向后续日军第三联队第一大队的丸井正亚少佐求援，丸井急忙率部赶来营救。不料，援军又被清军包围在长岭子地区，不得前进。中午，清军在长岭子以南约2公里的东北沟东南高地上架炮猛轰日军，步、骑兵在炮火掩护下，联合发起冲锋。士兵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军旗手高擎红白、红蓝旗帜，冲锋在最前面。战场上，炮声如雷、枪弹如雨，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日军自入侵中国以来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在战场上历经十数仗，未见过如此阵势，纷纷抛弃伤员、死尸，大败而逃。伤兵逃不走的，有的剖腹自杀，有的“自割喉咙而死”。秋山好古在卫兵保护下侥幸逃得性命。土城子之战是甲午战争期间清军在陆战中的一次较大胜利，毙伤敌近60名，沉重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战后，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今后在与清军交战中，要“慎重戒备”，“决不能妄加蔑视”。清军此役获胜，证明只要指挥得当，配合有力，战胜日军绝非幻想。激战中，尤以徐邦道部出力最大，伤亡也最大。徐部自金州撤回后，来不及休整，此次又鏖战约6个小时，士兵饥饿疲惫，水米未沾。如不撤回旅顺，竟连一顿饱饭都不能吃上。可憎的是后路诸将消极避战，拒不接应，致土城子战役的胜果无法巩固。徐邦道被逼无奈，遂放弃土城子，班师回旅顺休整。后日军卷土重来，旅顺直接暴露在进攻日军的眼皮底下。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五 鏖战山东 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1 日军登陆荣成湾

清军在辽东半岛虽然丧师失地，但整体防御能力并未被完全摧毁，主战派在清政府仍有相当势力。为实现决战直隶平原的计划，进一步逼迫清政府投降，日本大本营经过反复谋划，选择山东半岛为突破口，其目的在于占领威海卫，封锁渤海湾，消灭北洋舰队，从根本上摧毁清军的防御力量。侵略方案甫定，大本营即以第二军第二师团和在日本本土的第六师团合编成“山东作战军”，由大山岩指挥，实施在山东半岛的登陆作战。经过反复侦察、精心挑选，伊东祐亨与大山岩选中了山东半岛成山角西南方一个叫荣成湾的海湾作为登陆地点。

荣成湾西距威海卫水路约30公里，湾口十分宽阔，水底为泥沙，北岸有近1000米长的沙地，汽艇可直驶至距岸边3米的地方，舢板更是可以直接靠岸。且沿岸多丘陵，易于抢占。早在1888年12月，日本海军大尉关文炳就受日本参谋部指令，到威海卫等地侦察。在70多天的侦察中，他写了一份报告《关于威海卫及荣成湾之意见书》，称荣成湾，中国人叫做“养鱼池水口”，湾口宽阔，底为沉沙，“无论遇到何等强烈之西北风天气，舰船亦可安全锚泊。况且，本湾位于直隶海峡外侧之偏僻海隅，一旦清国与外国发生海战，即成为军事重地”。他建议“欲攻占威海卫，争先取该湾以为基地”。有了这个前提，伊东祐亨又派八重山舰长平山藤次郎海军大佐实地勘察，果然证实了关文炳的报告，这里不仅有平坦的沙滩，便于登陆汽艇靠岸，更重要的是此地距威海卫仅几十公里，登陆日军可转瞬攻击威海卫。种种有利条件，促使伊东祐亨与大山岩下了最后的决心。

1895年1月19日，日本海军调动了几乎全部力量即25艘军舰，实施登陆掩护，另拨出50艘运兵船分三批从大连湾出发。20日拂晓，驶抵荣成湾。此时，天空飘着雨雪，大地白茫茫一片，日军先头部队登陆侦察地形，被驻防清军哨兵发现，清军随即开枪射击。日兵急速逃回并发出求援火箭。日舰遂排成横阵，用舰炮向岸上猛烈轰击两个多小时，日军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大队开始登陆。驻防此地未经正式训练过的数百河防营士卒早在日军炮击之始，即四处溃散。少部驻防清军也纷纷撤走。日军登陆，全无阻碍。五天之内，在未受到清军任何攻击、干扰的情况下，日军3.5万人、战马3800匹登岸，并迅速进兵，占领荣成县，实现了登陆山东半岛的目的。

清政府，特别是主持北洋军务的李鸿章，始终没能拿出一个成熟的见解和切实可行的方案，在日军登陆前后的关键时刻，朝中大臣们仍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有的大臣主张袭击日军运兵船，不让日军登陆，有的大臣如张之洞和刘坤一等，主张增援威海后防。丁汝昌则认为与其坐等围攻，不如主动出击，截杀日军，决战于海上。而主管北洋事务的李鸿章，始终不能拿出一个成见。最初，他希望将海军撤往烟台。几天后，他又发电给丁汝昌，要求丁率舰队“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退至烟台”。在与刘坤一磋商后，他又改变主意，致电丁汝昌，要求丁率北洋舰队死守威海。此时的李鸿章仍是那套“避战保船”的指导思想，严令丁汝昌“不许出战，不得擅离威海一步”，并威胁说，如有“违令出战，虽胜亦罪”，并告丁汝昌“望保全铁舰”，执意死守，从而完全错过了阻击日军登陆的大好时机。就连伊东祐亨事后也承认，如果清廷能派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前来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这是李鸿章的又一次失算，而这次失算，直接断送了山东半岛，断送了北洋舰队。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南北帮炮台陷落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端，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隔海相望，共扼渤海门户，同为拱卫渤海湾的锁钥。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时期，为防御倭寇的骚扰，曾在此处设卫，名威海卫。威海卫城三面环山，背后峰峦叠嶂，南北两岸山势险峻，向东伸出突入海中，形成天然保护屏障，实为难得的天然良港。而刘公岛则巍然屹立于港口中央，将海港分为南北两口，巨舰出入，畅行无阻，并与南部日岛、西部黄岛构成威海卫港的天然屏障。威海卫港自然地理条件夺天工造化，是军港的最佳地点。刘公岛上设有北洋水师提督署、水师公所、水师学堂、兵营、制造局、鱼雷局、医院等重要军事设施。刘公岛与黄岛之间修筑了大堤。岛西设有船坞，岛南设有铁码头。在威海卫港南北岸设置陆路及海岸炮台多座，称南帮炮台和北帮炮台。在刘公岛、日岛、黄岛也花费巨大力量修筑炮台，装备了从德国克虏伯厂和英国阿姆斯特朗厂购买的新式大炮。还在公所后炮台和日岛修建“暗台”，即交战时大炮可以从地下井中升至地面，“圆转自如，四面环击”，交战后，又退回井中，“敌人无从窥，炮弹不能及”。为弥补后防空虚，充实南北岸炮台后路，还在陆路增建多座临时炮台。至战前，威海卫防区共建有各类炮台25座。并在海港东、西两口敷设水雷和拦阻设施，用铁索将直径一尺半、长一丈的方圆木材连接起来，每隔一定距离用巨绳系于海底，以防风浪和潮水的冲击。各式水雷则遍布于防材附近。由于南口过于宽敞，为防备日艇夜间偷袭，将南口完全堵死，只在北口留一活动门，平时关闭，用时打开。为加强统一指挥，李鸿章又任命前署广西巡抚臬司李秉衡为山东巡抚，主持威海卫防务。李秉衡到任后，大力招募兵将，整顿防务，至战前，山东半岛的清军总兵力已达60营计3万余人。但以此兵力防守自成山角至烟台的300里长的防线，确感单薄。加之难以判定日军的准确登陆地点，李巡抚就采取了分兵驻防要地的办法，将这3万余人，分别摆列在防线的重要地段上。这样，就使本已不足的兵力更显捉襟见肘，整个防御陷于处处被动、处处挨打的境地。

1895年1月25日，日军分左、右两路进犯威海卫，欲从后路抄袭威海卫城和北岸炮台。威海卫海岸炮台系德国人汉纳根设计，在设计上存

在着严重缺陷，其致命弱点是后路没有防御设施。而日军也正是利用了威海卫防御体系上的这一致命薄弱环节，从后路包抄进攻。日军以右纵队沿荣成至威海大道经九家疃，进犯南帮炮台。左纵队沿荣成至烟台大道，进攻温泉汤一带，切断南帮炮台后路。海军联合舰队则正面进攻海港，配合陆路进攻，以期全歼北洋舰队。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日军的这一策略是奏效的。

1月30日拂晓，日军对南帮炮台发起总攻，联合舰队也从海上发炮助攻。右纵队日军又分左、右翼，猛扑威海卫南岸的制高点——摩天岭。陆军少将大寺安纯指挥左翼第十一旅团士兵，向清军营官周家恩指挥的守军猛烈进攻。摩天岭地势险要，是群山中的最高山峰，“炮垒峨峨，高耸入云，仰头才能望到”，是整个南帮炮台防御战的关键。清军由于防守兵力过于分散，没有突出重点，驻防此地的仅有一个营，士兵为新近招募而来的，仅配有8厘米的行营炮8门。而就是这一个营，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开战之初，日军先头部队踏响清军预先埋设的地雷，死伤严重，进攻受挫。日军见正面强攻难于得手，转而先攻下摩天岭西侧山头，再向摩天岭发炮轰击，步兵也连续发起进攻。日军三次爬上摩天岭炮台，与清军展开肉搏，又三次被清军赶下炮台。台上“清军大旗倒了三回，硬是竖起了三回”。日军虽几度冲锋受挫，却仍依仗人多势众，冲锋如涨潮的海水一般，一浪连着一浪。周家恩虽率部血战，终于寡不敌众，所部全部壮烈牺牲。摩天岭炮台在整个南帮炮台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的陷落，使驻防南帮炮台的清军失去了制高点，整个南帮炮台防守也更加困难。日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终于占据重地，负责指挥的大寺安纯少将得意忘形，踏上炮台，指手画脚，耀武扬威。适此时停泊在港内的北洋舰队驰来增援南帮炮台守军，忽见摩天岭炮台挂起日军旗帜，定远等舰立即向摩天岭日军发炮轰击，一发炮弹洞穿大寺安纯胸部，立毙。这个被日本帝国誉为“一代良将”的大寺安纯，成为在甲午战争中第一个被清军击毙的日本将军。日本《二六新报》的随军记者远藤飞云也中炮毙命。

30日上午8时，占领摩天岭炮台的日军，立即使用炮台上的清军大炮，居高临下，向清军驻守的杨枫岭炮台猛烈轰击，掩护日军步兵的进攻。驻守杨枫岭炮台的清军，也仅有一营兵力，在副将陈万清指挥下，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奋起抵抗。与此同时，清军南岸炮台中的三个海岸炮台皂埠嘴、鹿角嘴、龙庙嘴也发炮轰击日军，北洋舰队定远等舰也驶近南岸，开炮猛击进攻日军，以支援陈万清部。一时间，炮弹横空纷飞，飞弹急如骤雨。激战多时，日军的冲锋被一次次打退，官兵死伤惨重。清军也伤亡过半，但毫不退却，仍拼力死守。战至中午11时许，炮台弹药库被日军炮弹击中，起火爆炸。炮台上一片火海，难以再守，清军被迫放弃，杨枫岭炮台遂告陷落。日军占领南帮陆路炮台后，立即对三个海岸炮台发起攻击。

由于陆路炮台失陷，本来后防就十分空虚的三座海岸炮台，越发孤立危险。设计上的缺陷，此时暴露无遗，一旦日军从后面进攻，则炮台几无防御能力。龙庙嘴炮台深据海港内部，仅有守军40余人，形同虚设，一旦失守，日军可利用龙庙嘴炮台大炮直接射击港内北洋舰队及刘公岛守军。果然，日军发现了清军防御中的这一薄弱环节，集中兵力猛攻龙庙嘴炮台。龙庙嘴炮台位于摩天岭西北，几乎没有外围防御设施，炮台前沿既无高墙屏障，又无地沟保护，守将刘超佩甫一开战，即逃往刘公岛。唯有40余名清军士兵死守不退，先是发炮轰击日军，继而又刀枪并举，与攻入炮台的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情景异常惨烈，场面惊心动魄。鏖战多时，怎奈寡不敌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炮台随即失陷。日军登上炮台，立刻使用该台大炮，向鹿角嘴炮台猛烈轰击，继而步兵发起冲锋。由于鹿角嘴炮台守军既无步枪，又未配备机动小炮，巨炮在如此近距离内对进攻之敌形成死角，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很快，亦告失守。日军在占领了龙庙嘴、鹿角嘴炮台后，开始海陆夹攻皂埠嘴炮台。

皂埠嘴炮台是威海最大的炮台，设有28厘米及24厘米德国造克虏伯大炮共5门，火力强大。日军在舰炮的掩护下，分兵多路，从几个方向猛攻炮台。激战良久，守台清军将士大部阵亡，日军开始攀登炮台。眼见炮台即将落入敌手，丁汝昌早就选派一队敢死士兵，计25名，冒着浓烟烈火登岸，奋勇冲上炮台，装填炸药炸炮。但见硝烟散处，日本旗帜刚刚在炮台竖起，日军官兵正手舞足蹈庆贺胜利之际，即闻巨响，山石横飞，连同日军士兵一起，冲上半空。仅剩的8名清军敢死队员，飞速登上岸边小艇，刚刚驶离，炸起飞落的巨石即轰然砸在小艇刚刚停泊的位置上，激起冲天水柱，场面惊心动魄，蔚为壮观。此时，在海湾战舰

上用望远镜观战的西方海军，也为北洋舰队士兵英勇果敢的壮举惊得目瞪口呆。南帮炮台失守，清军死亡达800余名，另有50余名被俘。广丙舰帮带大副都司黄祖莲在炮战中奋勇作战，不幸中炮阵亡。这位在黄海大海战中立下战功的将领，为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日军虽占得炮台，也付出惨重代价，死伤近230人。

日军夺得南岸炮台后，立即抢修大炮，猛轰港内之北洋各舰，除镇远舰事先因故受伤外，定远、济远、来远三舰奋勇还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北洋三舰巨炮，倾泻如雨弹丸，日军占据的炮台完全笼罩在硝烟及爆炸的火光中，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只见炮台上乱石、树木、弹片上下翻飞，日军士兵身首异处，血肉横飞，大炮亦被炸坏。日军被迫停止炮击。当双方炮击正酣时，从南帮炮台下撤的清军约800名被日军围困在海埠、城子和沟北村一带。营管陈万清虽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士卒奋勇突围而出。几十名自愿担任掩护的清军士卒，弹药用尽而不甘被俘虏受辱，毅然跳入岸边的船坞中，壮烈捐躯。皂埠嘴炮台的失守，标志着南帮炮台也无地可守。丁汝昌无奈，只得撤往刘公岛。威海卫港保卫战，由此进入了最后的也是最为激烈的阶段。

2月1日，日军吸取了进攻凤林集时遭北洋舰队炮轰损失惨重的教训，转而从西面迂回进攻威海卫城。午后1时，由伏见贞爱亲王指挥的日军第二师团第四混成旅团开始向威海卫西路的清军阵地发动进攻，大批日军士兵拥上结冰的双岛河，顶风冒雪，号叫着扑向孙万龄部防守的河南岸。被一连串胜利刺激得狂妄已极的日军士兵忽略了坚如铁滑如镜的宽阔冰面，加之寒风挟着大雪扑面而来，连眼睛也睁不开，冲锋兵卒一步一跤，行进极为迟缓。此时，孙万龄抖擞精神，指挥清军士兵集中火力，猛烈阻击。日军多次冲锋，均被击退，自称“死伤四十五名”，而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仅遗失的洋枪就达479支。面对如此大好的战场形势，清军本应乘胜追击，但驻防侧翼的阎德胜贪生怕死，畏敌如虎，见日军来势汹汹，并不指挥士卒认真阻击，却于激战正酣之际，不顾战场大好形势，竟自率部撤走，以致侧翼阵地被敌突破，清军防线全线动摇，孙万龄不支而退走。双岛河战役的胜利果实遂付之东流。

日军渡河后，顺利地占领早被清军弃守的威海卫城。兽兵进入城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是日军继制造了旅顺血案后，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兽兵们自拥入威海卫城开始，就挨家挨户地疯狂抢劫，奸淫烧杀，“操戈入室，持刀登堂，拆毁我房屋，搜取我衣裳，糟蹋我黍稷稻粱，屠杀我鸡犬牛羊。一至黄昏，四起火光”。老百姓们“或以子救父而首犯锋芒，或以弟救兄而身被旗枪，或被发缨冠以救乡邻，不转瞬而仆尸道旁”。日军制造了无数起骇人听闻的惨案。为征用农夫，运输抢来的东西，又用残酷手段，残害不愿为日军出力的威海百姓。在长峰村、九家疃村、海埠村制造了一连串的集体屠杀血案，罪行累累，令人发指。

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后，旋分兵攻打北帮炮台。北帮炮台居于威海卫城东北，自西向东，依次为祭祀台、黄泥沟、北山嘴三座炮台，地势险要，工事坚固，与刘公岛相距仅4里，干系重大。丁汝昌派广甲舰管带吴敬荣率水手200多名协助戴宗骞的绥军镇守。戴宗骞，以镇压捻军起家，是个贪婪狡猾、贪生怕死的无耻之徒。在日军进攻南北帮炮台之前，竟将平日剥削士兵得来的8000两白银偷偷运到烟台，由其儿子带往安徽老家。由于他平日不作训练，士兵临战，纷纷哗变。至2月1日日军进攻时，身边仅剩10余名亲兵。前来助战的广甲舰200名水手也随之溃散。丁汝昌怕北帮炮台大炮落入敌手，遂命敢死队员将炮台弹药库炸毁，并将戴宗骞押往刘公岛。戴自知罪行深重，服毒自杀。北帮炮台不战而落入敌手。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悲壮的结局

早在2月8日，北洋舰队内一部分洋雇员就已开会酝酿投降之事，并推定远副管驾英国人泰莱和教习、德国人瑞乃尔向丁汝昌“劝降”。而实际上策划此事的主谋，是总教习英国人马格禄和美国人浩威。北洋海军威海营务处提调道员牛昶昞，也是投降叛变的积极参与者。泰莱和瑞乃尔的劝降，遭丁汝昌的严词拒绝，断然言道：“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为避免巨舰落入敌手，丁汝昌派人于9日炸沉已搁浅的靖远、定远舰。10日，刘步蟾在极度悲愤中自杀，实现了自己“苟丧舰，将自裁”的诺言。时人称其“志节懔然，无愧舍生取义”。在整个威海卫的防卫战中，丁汝昌恪尽职守，联络各军，“总期合防同心，一力固守”，他的表率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威海卫的局势，故在交战前几天，清军防守较为成功。随着战事发展，光靠威海卫现有的力量没有外援，是难以挽回威海卫的局势了。11日，是丁汝昌所许守岛待援的最后期限，晚间，得到水手回报，方知鱼雷艇管带王平逃到烟台后，谎报刘公岛已经失守，致使援军后撤西去。丁汝昌见毫无希望，乃召集众将会议，主张各将领率北洋所剩各舰，自行突围，以期保存数艘舰只，以备将来再图大事，却遭马格禄、牛昶昞的拒绝。丁汝昌无奈，又提出将镇远炸沉，以免落入敌手。会场一片沉默，诸将无人应声。此时，马格禄、牛昶昞等竟带头离会，众将也随之一哄而散。会后，马、牛二人派兵并持械威胁丁汝昌，要求他向日军投降，遭丁断然拒绝。深夜，马、牛等人又施计煽动水陆兵民至丁汝昌住所前齐声呐喊，“哀求活命”。丁汝昌眼见局势万难逆转，遂派人召牛昶昞来，告之“吾以身殉”，并令其“速将提督印截角作废”，即饮鸦片，自杀而死。一代良将，以死报国，实现了自己“决不弃报国大义，唯一死以尽臣职”的誓言。

丁汝昌死后，牛昶昞毫无顾忌，召集诸将及洋员在家中开会，商议投降事宜。推举护理左翼总兵署理镇远管带杨用霖出头，主持投降事宜。杨当即拒绝，高声朗诵文天祥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转回舰舱，“引枪衔口，发弹自击”，慨然殉国，宁死不降。护军统领总兵张文宣也自杀身亡。叛变分子经密谋策划后，由浩威假借丁汝昌名义起草了降书，并商定由广丙舰管带程璧光携降书至日本旗舰。

12日上午8时，程璧光乘镇北舰，上插白旗，向伊东祐亨投降。伊东要求于第二天先交出兵船、军械、炮台等。13日凌晨，程璧光再次前往松岛号，以时间仓促为由，恳求伊东宽限3日，伊东同意。下午，在程璧光陪同下，牛昶昞登上松岛舰，开门见山地告知伊东：丁提督已死，“我在刘公岛，丁提督次级也”，今特来商议投降之事。在交出刘公岛炮台、军械及北洋剩余各舰等问题上，双方没有异议。次日下午3时，在交出威海海陆军军官、洋员名册及兵勇军属统计表后，经牛昶昞、程璧光等再三恳求，伊东同意将康济舰归还，用来运送丁汝昌等灵柩及海陆将士、洋员去烟台。16日，牛昶昞与伊东祐亨共同签署《威海降约》，共11项，主要内容为：

①北洋水陆军各将官，包括雇佣的西人在内，须注明姓氏职衔，文案及兵勇须开一总数，以便分别遣返。

②中西水陆官员须发誓不再参与战事。

③所有军械应归放一处，并于2月14日开始遣返士兵。

④牛昶昞须于15日中午前将舰中军器、台上炮位清单交给日方，不得遗漏。

⑤中西水陆官员于15日正午以后乘康济舰返回华界。

⑥中西各官准许携带私人物品，但不得携带军器。

⑦刘公岛居住的华人，须安居乐业，不得逃跑。

⑧中西各官须于16日9点以前离开威海；船上水手如愿从陆路撤走，也于15日中午开始。

⑨老幼妇女可乘中国船离开威海，但日军可以搜查。

⑩运送丁汝昌等人遗体的康济舰，至迟于23日中午前离岛，并供中西水陆官员乘坐回华界。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⑴若陆路再行开战，日舰必开炮，此条约即告作废。

17日上午10时30分，日军摆出一副征服者的架势，正式占领威海卫。日本联合舰队大事张扬，举行捕获式，摆开阵势，耀武扬威驶入港口内。此时，港内除康济舰仍悬挂黄龙旗，以载运丁汝昌等人灵柩及遣返将士外，其余10舰都已换上日本旗，编入日本舰队。刘公岛各路炮台也升起日本旗帜。午后4时，冷雨潇潇，康济舰载着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等人灵柩及海陆将官和洋员，伴着哀鸣的汽笛，凄然离开威海军港。至此，历时近1个月的山东半岛战役，以威海卫军港的失陷和北洋舰队的全军覆灭而告结束，昏庸腐败的清政府和李鸿章消极抵抗的“避战保船”思想造成了如此惨重的结局，使得清政府苦心经营十数年的威海军港及北洋舰队毁于一旦。战斗中，虽涌现出一大批抛头洒血、挺身御侮的民族英雄，但终于无力回天，到头来还是血洒疆场，壮志难酬。清政府经此一败，更加丧失了抵抗信心，主和派开始在朝廷中占据上风。

1 牛庄失守

3月1日，日军进抵八盘岭，遭清军抬枪射击。双方交战不久，清军即先行撤走。当晚，第三师团本部宿营于甘泉堡。2日，日军合攻鞍山站，却发觉清军弃守，不战而得。本来，鞍山站南距海城，北接辽阳，西连牛庄，实为交通要道。驻防此地的清军守将依克唐阿、长顺中了日军佯攻辽阳的诡计，移守辽阳，才使日军得以轻易占据鞍山。3月3日，日军第五、三师团分成左、右纵队，向牛庄急进。

牛庄系辽河下游平原上的一个街镇，没有什么防御工事，清军布防大多以民房等建筑的墙壁作为防御掩体。光绪皇帝鉴于淮军屡败，不堪再用，遂于1895年1月起用湘军，出动6万人，驻扎在山海关内外。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澂、淮军统领宋庆为副帅，以期重振威风。这是清政府自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陆上出兵，也是光绪皇帝对日作战的最后一试。刘坤一是湘军“名将”，素以主战闻名。吴大澂是清流“名士”，也曾多次上奏，坚决主张对日作战。光绪皇帝决定起用他们，是想依靠这些主战名将，一举荡平入侵日军。刘、吴虽为名士，又都以主战著称，但实际上多是纸上谈兵，毫无实际战斗经验，对具体战守并无多少筹划，也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作战布置。朝廷在任命统帅后，又相继任命左宗棠部藩司魏光焘、湘军悍将李续宾之子李光久等率兵北援。当日军进攻牛庄时，驻守此地的魏光焘之武威军6营首先投入战斗，随后，李光久率5营老湘军赶到，也投入战斗。这样，在牛庄，11营清军抵抗着两个师团日军的进攻，双方力量悬殊。3月4日上午9时，日军第三师团发起进攻。魏光焘指挥清军隐蔽在街口临时构筑的一尺厚土墙后面，等敌临近，突然发起攻击，枪炮齐发。日军猝不及防，加之地处平坦地区，无任何隐蔽遮拦，伤亡惨重。日军指挥官大岛义昌见前队受挫，恼羞成怒，下令投入两个预备大队，拼命进攻，并集中所有大炮，倾力猛轰。战场上“枪炮声如百雷齐鸣，万狮齐吼，震耳欲聋”。日军发射的榴霰弹在牛庄上空爆炸，整个街镇完全被炮火的硝烟所笼罩。日军依仗人多势众，两面夹攻，如潮水般扑来。清军本来人少，加之鏖战多时，伤亡惨重，又无后援，难以抵挡，终于不支。中午，退入街区，开始巷战。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日军分别从西、西北、东、东北4路攻入牛庄。清军士兵则挨门挨户死守，逐街逐户与日军激烈争夺。市街西南一当铺内设有清军火药库，围墙高大，日军屡攻不下，便纵火焚烧当铺西侧民房，以期烧毁当铺，引爆炸药。清军则拼力死守，毫不退却。日军久攻不下，最后运来两门大炮轰击，弹药库爆炸，清军士兵大部牺牲。战至午夜，清军伤亡过重，所剩无几，再也无力支撑，魏光焘、李光久被迫率余部突围而走。杀红了眼的日军见清军脱围而走，随后紧追不舍。李光久见追兵迫近，便指挥百余名负伤士兵，隐蔽在一个村落的断壁残垣之内，设下埋伏。日军毫无察觉，以为清军已成惊弓之鸟，放心追赶，陷入埋伏圈，遭清军抬枪猛烈射击，瞬间毙命数十人。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又不知清军伏兵底细，仓皇逃走。李光久方率部安然撤走。零星抵抗直至次日凌晨，牛庄终于失陷。牛庄之战，激烈残酷，历时一昼夜，清军以弱敌强，以5000之众抗击1.2万如狼似虎的日军士兵，结果阵亡官兵1800多人，被俘近700人，损失大炮24门、步枪1800支、子弹近40万发及大量军需物资。日军也死伤士兵近400人。牛庄一失，营口陷于孤立境地，辽南战场，清军防御已现瓦解之态。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七 奴颜婢膝 李鸿章签《马关条约》

1 急病乱投医

早自甲午战争爆发起，清政府中就存在主和与主战两种意见，而持这两种意见的官吏又因为和战的争论而常常与后党和帝党的斗争相关联。慈禧太后虽然表面上已经撤帘归政，但实际上一直在幕后操纵，从未放松过对朝政的控制。她把朝中的官僚和地方大吏控制在自己手中，从而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军政大权，形成了以她为核心的后党集团。慈禧宠信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对他们言听计从。而这位李中堂又极善揣摸主子的心思，摸清了这位“老佛爷”的脉搏。眼下，慈禧极为看重自己的60大寿庆典，不愿继续与日本开战。因而，从一开始，对李鸿章“避战求和”的主张就给予了积极的支持，生怕与日本再次开战，搅乱了自己的生日庆典。朝中官吏为了筹办庆典，也乱成一团，无心战事。而已经亲政的光绪皇帝，不甘心处于听从摆布、受人支配的地位，想要取得皇帝的一切实权。他依靠他的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拉拢一批亲信官吏与后党抗衡，形成了帝党集团。为稳住江山社稷，光绪皇帝极力支持主战派，以期既打退日军的进攻，巩固清王朝的江山，又借此加强自己的实力。战争初期，国内主张坚决抗日作战的舆论高涨，且前方战事一时难以分出胜负，主战派大臣又交章上奏，备言只可战不可和、和议误国的种种理由，主和派深恐背上“误国叛国”的罪名，言行颇有收敛。及至平壤战败、黄海海战失利……一连串败报纷至沓来，主和派又开始活跃起来。1894年9月底，慈禧重新起用10年前被废黜的恭亲王奕䜣，主持总理衙门并会同办理军务。这位自中法战争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对外交涉的经办者，由此又得到了一个施展其“洋务才能”的机会，与李鸿章沆瀣一气，又一次开始了妥协求和的卖国活动。

首先，议和派请求英国政府照会美、德、俄等国，以赔偿日本军费和保证朝鲜独立为代价，希望列强干预中日战争，不期遭到拒绝。随后，清政府又直接出面，召集美、英、法、德、俄五国公使会议，恳求他们转请所在国政府联合干预中日战争，不料又遭拒绝。眼见寄希望列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强的幻想破灭，无奈，11月22日，清政府派出当时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带着照会及李鸿章致伊藤博文的亲笔信到达日本神户，以向日本政府求和。行前，在德璀琳一再要求下，清廷赐予他头品顶戴。照会中称“现与贵国小有龃龉，以干戈而易玉帛，未免涂炭生灵。今拟商彼此暂饬海陆两路罢战……应请贵总理大臣与德璀琳筹商，言归于好”。日外相陆奥宗光在偕同德璀琳抵神户欲求见伊藤博文的同时密电伊藤，表示目前清国难以满足日本之要求，对德璀琳及李鸿章的私人信函，以不接纳为宜。在伊藤指示下，由兵库县知事出面，以使节不合正常手续和资格为由，拒绝接纳德璀琳。清政府求和的努力又一次宣告失败，不得不将德璀琳召回。11月29日，德璀琳一行起程返回。真是有病乱投医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中日议和交涉

1894年11月22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会见总理衙门大臣，表示愿意为中日两国安排和谈。清政府此时已面临战场上连败局面，急欲求和，也就听从美国的摆布，同意与日本开始和谈，并建议和谈在上海举行。日本闻讯后断然拒绝和谈在上海举行，坚持和谈地点必须在日本，并要求清政府必须预先将全权委员之姓名与职位通知日本。而当清政府向日本提出同样要求时，竟遭蛮横拒绝。日本政府声称“无须事先将日本全权委员姓名品级通知中国”。对此，清政府深知自己是战败国，只得忍气吞声，默认同意。然而，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此，日本停战谈判的条件到底是什么，这不仅是清政府极为关心的，也是列强至为关注的焦点。其实，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外相陆奥宗光早就拟好了媾和条件，并与内阁成员和大本营重臣经过了反复磋商，一致决定在未与中国达成协议之前，将议和条款诸问题严格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决不向外界泄露，以防第三国插手。

基于保密的原因，日本政府以备忘录形式照会清政府，指责清政府“似尚未痛切感到有媾和的必要”，并宣称“如果不经过具备正式资格之全权委员会商议以后，日本不能宣布媾和条件”，并威胁“若中国政府对此不能同意，则此次之商议，即可暂告中止”。面对如此强硬的态度，清政府深感事态之严重，如不正式遣使，局面或将不可收拾。故在慈禧的大力支持下，12月20日，清廷颁旨，“著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会商事件”。此件当天即经田贝电达东京。此外，清政府还提出希望“日本立即任命全权委员，速定会商日期，并望于日本任命全权委员之日，决定两国开始休战的日期”。至此，清政府提出了一个关于和谈的极为关键的问题，即交战的中日双方先行停战。

本来，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国在开始议和谈判时，应先行停战，而一心想攫取巨大侵略利益的日本政府，既不同意会谈地点设在中国，也不愿停战，而是希望通过战场上的巨大胜利来增加自己在谈判中的筹码。12月31日，日本经美国驻日公使谭恩转称：只有等中国所派大臣到

达日本，日方“即日派出大臣，现时不必先言派几员，系何姓、职务”等。此前，还明确电告清政府，“日本政府选定广岛为全权委员之会议地点”，“至于休战条件，纵使日本政府许诺休战，亦须在两国全权委员会商后，始能明言”。日本政府此举，不仅蛮横地选定广岛为和谈地点，拒绝事前通报日方代表名单及职务，关键的是强硬地拒绝了清政府先停战后议和的条件。面对如此屈辱，清政府亦不得不委曲求全，即行答允，派张荫桓、邵友濂东行。

清政府求和心切，不惜卑躬屈膝，甘心忍受一切侮辱，内中自有其苦衷。自甲午开战以来，海陆军连战连败，丧师失地。陆军首败于平壤，再败于辽东半岛，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北洋海军先败于丰岛，再败于黄海，最后困于威海卫。光绪皇帝召见军机大臣，询问战和事宜，“声泪并发”。鉴于形势所迫，清政府开始寻求议和以结束战争。

日本大本营制定的直隶平原作战计划，纯粹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计划。此时，日军虽已兵发辽东、山东半岛，取得了一连串军事上的胜利，但是，日本毕竟是一个领土狭小、资源贫乏、人口较少的岛国，几个月的战争消耗，已使本来就十分不足的资源更显得紧张，人力、物力、财力已严重匮乏，难以为继，各项储备已不能再承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此，外相陆奥宗光也不得不承认：“国内海陆军备殆已空虚，而去年来继续长时间战斗的我军队人员，军需固已皆告疲劳缺乏。”然而中国幅员辽阔，非日本短时间内可以全部吞并，有鉴于此，狡猾的日本政府也希望通过谈判来达到战场上一时难以达到的目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李鸿章赴日签丧权辱国条约

1895年2月12日，威海卫战役已基本结束，北洋舰队的覆灭及威海军港失陷已成定局，清政府赖以撑腰的军事力量已损失殆尽，主战派在朝中已难言再战。此时，主和派则兴风作浪，大肆活动，四处游说，大谈“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老调，鼓吹求和是清王朝的唯一生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明确表示决定求和，并按照日本政府的暗示，决定派李鸿章为和谈全权大臣，赴日议和。第二天，清廷正式颁布谕令，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深谙权谋的李鸿章也深知此行任务艰巨，吉凶难测，况且眼前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李鸿章估计日本由于在战场上的一连串胜利，侵略胃口受到极大的刺激，恨不得将中国一口吞进肚里，此次议和，必定提出极为苛刻甚至难以接受的条件，如果答应日本的条件，必将在青史上留下骂名，遗臭万年，朝中对立面官吏也定会借此兴风作浪、百般弹劾。如果不答应日本的条件，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定不会善罢甘休。不能议和停战，回来后还是无法交代。前思后想，李鸿章觉得此去凶多吉少，遂上表称病，不愿前往。而朝中一些官吏对李鸿章拥兵自重、大权独揽又一贯消极避战的作法早就深恶痛绝，此时纷纷交章上奏，指出清军之所以一败再败，李鸿章应负有直接责任，并嘲讽李鸿章贪生怕死，不以国事为重，既然已经由他一手造成这个难以收拾的局面，也只有由他出面才能了断此事，“圆满”地处理对日交涉。清廷碍于众议，断然拒绝李鸿章的请求，责令他克日准备，即择期赴日和谈。皇命难违，李鸿章只好受命，打点行装，准备起程。

李鸿章先以其子李经方曾出使日本两年，熟悉情形，通晓东西语言文字为由，奏请挂参议一职，头衔仅次于全权大臣；继而选拔各级随行官吏，共计33人，内中仍然有科士达。此外，又带了厨子、茶房、打杂、轿班、剃头匠等大批仆人，又特聘法国驻华使馆慈巴茨斯医学博士作为随行医生，总计135人。3月14日晨，李鸿章登上悬挂着黄龙图案的德国商船，离开天津，前往日本，开始了一次注定他一生耻辱的求和谈判。

3月19日，李鸿章抵达日本马关。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则已先期到达马关，和谈地点定在红石山下的春帆楼。20日下午，双方开始第一次谈判。日方代表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傲慢无礼，飞扬跋扈。在互换敕书后，李鸿章即提出中日双方先行停战，再议和约的建议。伊藤博文则推托“此事明日再议”，随即以上次和谈张荫桓、邵友濂“全权”为辞，极尽讽刺诋毁之能事。李鸿章则低眉俯首，强赔笑脸，甘心受辱。双方第一次谈判，就在这种极不平等的气氛中结束了。

3月21日下午2时30分，双方开始第二次谈判。伊藤博文在会上首先发言，无理地提出以日本派兵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及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停战期内军费由清政府支付等停战条件。显然，这个过于苛刻的条件是难以被清政府接受的。李鸿章听完译员的口译后，大惊失色，连呼“过苛，过苛！”并再三恳求伊藤，先行停战，具体条款慢慢协商。他还厚颜无耻地对伊藤博文说：“贵方所指之天津、大沽、山海关三地，实北京之咽喉，直隶之锁钥也。倘贵军占此等要地，我方则反主为客，岂不令人有宛如异国领土之感？”并进而说：“贵国先要踞有三处险要之地。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系直隶所辖，如此于我脸面有关。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将何以为情？”就是这样的哀求，也遭伊藤博文的断然拒绝，第二次和谈，只得作罢。

为进一步威胁清政府，增加在谈判桌上的砝码及为日后夺取台湾作准备，日本在拒绝中国停战要求的同时，悍然发动侵略澎湖的战争，以期以此为跳板，进占台湾。

澎湖列岛位于台湾海峡之中流，与台湾之嘉义县及福建的厦门遥相呼应，大小岛屿林立，当海上交通要冲，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素为兵家必争之地。1884年中法战争中法军曾一度占领。自1887年起，清政府开始在澎湖列岛上修建防御工事，并责令闽浙总督谭钟麟、台湾巡抚邵友濂招兵添将，修建炮台，至1894年12月，计建有炮台5座，岛上驻军已达13营，5000余人。

1895年3月15日，日军后备步兵第一联队长比志岛义辉指挥由1个炮兵中队、3个步兵大队组成的混合支队，从佐世保军港出发，分乘7艘运兵船，在吉野等8艘军舰护送下，进攻澎湖。20日到达仓岛，由于海面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狂风大作，吉野号触礁重伤，只得推迟进攻日期。23日，上午9时20分，伊东祐亨指挥高千穗、浪速、秋津洲、桥立、严岛及西京丸护送运兵船驶近澎湖岛东部的里正角准备登陆。这天，风平浪静，万里无云，上午9时40分，岛上清军拱北炮台发炮轰击日舰，双方炮战异常激烈。11时30分，日军开始登陆，至下午2时，混合支队全部登陆完毕，遂即抢占大武山，以期越过这座山，拿下拱北炮台及马公城。由于清军增援不力，下午4时，日军攻占大武山。24日凌晨，日军开始进攻拱北炮台，在山炮及舰队速射炮的掩护下步兵发起冲锋，战至晨6时30分，日军冲进炮台，双方展开肉搏战，不久，日军占据炮台。上午11时许，日军分三路进攻马公城。此时，守城清军只有30多名，日军没费吹灰之力即占得此城。守卫圆顶半岛的560余名清军也在卫队营管带郭润馨等人的带领下投降。而清将朱上泮、周振邦、陈步梯在马公城陷落后，纷纷乘船外逃厦门及台湾。及日军登上渔翁岛，岛上已无一名清兵。至此，清廷经营多年的澎湖各炮台，大炮18门，2400支枪，百万发子弹，全部落入敌手。但日军也付出了代价，因水土不服，军中霍乱流行，有1000多名士兵病死。

日军占领澎湖后，在马公城设立“澎湖列岛行政厅”，以海军少将田中纲常为行政长官，开始了殖民统治。

澎湖列岛被占，使清廷本已十分脆弱的神经受到了更强烈的刺激。3月24日下午3时，第三次谈判继续进行。李鸿章在会上发言，将要求日本先行停战的条件搁置起来，提出议和条款。伊藤一面答以明日一定立阅，一面顾左右而言其他，并突然向李鸿章询问台湾之事，声称：“我国之兵已向台湾行进，但尚未接到来自南方之消息，情况难明。不知台湾之民如何？”李鸿章一闻此言，大惊失色，立刻意识到日本意欲侵占台湾，这是李鸿章始料不及的。为了贯彻“以夷制夷”的思想，李鸿章幻想以英国压制日本，便说“除我国之外，英国不欲他国盘踞台湾”。伊藤进一步威胁道：“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倘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这简直是赤裸裸地威胁，赤裸裸地讹诈。面对如此直截了当的要挟，李鸿章则委曲求全，丝毫不据理力争，唯恐和谈受阻，只是一味地低声下气，恳求日本尽快拿出议和条款。而伊藤博文仍旧是那一套，故意拖延时间。第三次谈判就在这种气氛中结束了，也

恰在此时，一个严重的事件发生了。

1895年3月24日4时30分，日本马关外滨町电信局前人头攒动，争看刚刚结束第三轮谈判，乘轿经过此地的大清国特命全权大臣李鸿章。突然，一男性暴徒冲出拥挤的人群，直趋轿前，向轿内开枪射击。李鸿章面部中弹，鲜血溅出轿楼，一时间人群大乱……大清国赴日和谈全权大臣在日本遇刺的消息，震动了世界，也打乱了日本统治集团事先的周密策划。

本来，日本侵略者的如意算盘，是以军事上的胜利为筹码，压服清政府，攫取更大的利益。之所以打着“和谈”的幌子，目的是排除美、英、俄、法、德等列强的干扰，独吞侵华果实。面对日本在华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和即将从中国攫取的巨大利益，其他资本主义列强坐不住了，五国纷纷表态，反对日本彻底打垮中国，称：如果日本不听劝告，一意孤行，那么列强将难以容忍，必定强行干预。也就是以“维持秩序为名，瓜分中国”，以期分享日本在军事上打败中国的“胜利果实”。面对这一复杂的国际局面，日本才选择了与清国谈判的这一途径。但伊藤等人无视国际惯例，不是以停战为前提，而是以清政府割让土地和赔偿军费为条件，几轮谈判都未能达成一致协议。正当和谈朝着日本事先设计好的程序进行时，却发生了李鸿章被刺事件，这是一个在国际交往中于法于理都不容的严重事件。李鸿章枪伤虽不致命，但已无法参加原定于次日的谈判了。这一不测之变，使日本统治集团极为狼狈。伊藤博文既怕李鸿章以受伤为借口回国而中断谈判，又怕列强趁机插手干预。为了稳住李鸿章，日本作出一系列姿态，以挽回损失。外相陆奥宗光亲到李鸿章住所表示“慰问”，天皇睦仁也降诏要求“严惩”凶手。而以深谙洋务著称的李鸿章却似乎没有看到这个可以利用的机会，相反，他在病榻上得到陆奥宗光关于日本已决定先行停战的表示后，虽脸缠绷带，仅露一眼在外，仍流露出十分欣喜的神情，表示随时可以在病榻上继续谈判。真真好一个乞和的全权大臣。

狡猾的伊藤博文发现李鸿章并无归国之意，立即抓住这一机会，竭力说服反对停战的武将们。30日，与李鸿章签订了不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在内的《中日停战协定》。表面上看日本同意休战，似乎是作了让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步，而实际上，休战期限仅21天。并规定如限期内和谈失利，停战协定即行作废。休战还不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为日后割占此二地预作了准备。可见，日本签署停战协定，是为了从中掠夺更大利益。而李鸿章竟也以能够实现停战而沾沾自喜，心满意足，认为自己在对外交涉上又一次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李鸿章等清廷和谈代表的一再催促下，陆奥宗光才于停战协定签署次日，拿出了早已拟好的和约底稿，其主要内容为：清政府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清政府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并可以将各项机器任意装运进口，而只交纳事先规定的进口税等。李鸿章看到这个底稿后，大为震惊。尽管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早有所料，但还是没能估计到日本竟贪婪苛刻到如此程度。如此丧权辱国的条款，李鸿章也深知难以承担责任，不愿背负这个千古罪名，凭着多年官场经验，意识到必须矛盾上交，借以摆脱罪责。于是立即将条款上报清政府。清政府接到条约文稿后，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也是议无所决，拿不出一个肯定的意见。而此时的慈禧，也想极力推卸这个割地卖国的罪名，装病躲入深宫，并表示“一切遵上旨”。光绪皇帝既不敢与慈禧公开决裂，也不敢贸然承担割地赔偿的罪名，犹豫不决，左右为难。

4月5日，李鸿章没有等到清政府的复电，而日本规定的答复期限已到，于是，以“说帖”的方式答复日本，对于和约中的割地、赔款、通商等条款找出种种理由加以辩解。次日，日方代表照会李鸿章，要求对和约条款必须给予明确的答复，不得拖延。伊藤威胁因李鸿章遇刺而升为全权大臣的李经方：希望能切实考虑“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完全是因为“中国请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议和”。如果因中方故意拖延，导致“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也。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面对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如此卑鄙无耻的武力威胁和赤裸裸的强盗无赖式的外交讹诈，李经方心虚胆寒，不敢再次提出修改条约的意见。4月10日下午4时许，中日全

权大臣举行第五次谈判，李鸿章已伤愈参加会谈。就在这次谈判中，伊藤不顾李鸿章的一再辩解、恳求，再次公然声称对条约文本只准说“允”与“不允”，并称已有数十艘运兵船开往天津。眼见和谈已无法继续进行，面对日本如此强硬的态度，清政府实在无计可施，只好连电李鸿章，同意签约。4月15日下午2时30分，第六次谈判开始，李鸿章终于拿出了看家本领，亮出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才能，先是恳求日本将2亿两赔偿费削减5000万，见其不行又恳求减少2000万。在其要求均遭拒绝后，最后竟还苦苦哀求伊藤博文，减少赔款额，以赠作回国旅费。真真是极尽奴颜婢膝之丑态。

4月17日上午10时，中日全权大臣在春帆楼举行会议，双方签署了《中日讲和条约》亦即《中日马关条约》11款，《议订专条》3款及《另约》3款。经中日双方认可的条约主要内容有：

①清政府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②清政府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

③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分八次七年内交清。

④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在上述各口派驻领事官员。

⑤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其制造的货物免征一切杂捐；各项机器也可任意装运进口，只交纳事先规定的进口税；等等。

同时签订的《专条》和《另约》，则规定了关于换约手续、威海卫驻兵、停战延期等内容。

《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空前的卖国条约，该条约无论从丧失主权之重，割让领土之多，还是从赔款数额之巨，都打破了中英《南京条约》以来的纪录。光绪皇帝在看到条约正式文本后，也认为割地一款太苛刻，一度拒绝用宝，但最终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予以批准。而日本侵略者由于通过条约攫取了巨大利益，为此欢呼雀跃，天皇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于签约次日召见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并降诏嘉勉，称此条约足以“显扬帝国之光荣”。李鸿章也深感罪名难抒，返回天津后，遣随员携条约文本至总理衙门，自己称病滞留天津。

《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耻辱和空前的灾难。大片领土的割让，严重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巨额的赔款，竟相当于清政府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倍以上。为了还债，清政府及各级官吏，必然变本加厉，加紧对广大劳苦大众的盘剥勒索；通商口岸的开设，使得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魔爪伸入中国腹地；对廉价劳动力和原料残酷掠夺，严重摧残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也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它们纷纷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使得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八 见利眼红 三国联盟干涉还辽

1 三国迫日还辽

《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此款严重威胁到了沙俄在中国东北、华北的侵略利益，使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就在日本公布议和条件的第五天，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即上书沙皇，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已对俄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建议联合列强进行干涉，声称：“我们的目的是双重的，在太平洋取得一个不冻港，并吞满洲的一部分以利修建外西伯利亚铁路。”这个建议当即被沙皇批准。就在《马关条约》签订当天，俄国政府立即开始行动，正式向英、德、法三国建议，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果日本不答应，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由于分赃不均，侵略者之间发生了龃龉。英国由于战前与日本订有条约，故对俄国的建议予以拒绝。而德国正想加入对远东的扩张和掠夺，对此议甚为积极。法国也出于同样的目的，积极加入了三国掠夺同盟，准备到东方大捞一把。1895年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劝告”日本政府立即放弃占领辽东半岛，并警告“日本必须让步，因为对三国开仗是没有希望的”。与此同时，三国海军也同时出现在日本海面，计有“俄舰数十艘，法舰十余艘，德舰六艘”，另有2艘在途中。停泊在烟台港口的俄国军舰更是昼夜升火待命，大有决心一战的架势。三国海军炫耀武力，给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九 保卫家园 台湾军民奋起御侮

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消息如晴空霹雳，震撼了华夏大地，朝野议论沸腾，举国上下，义愤填膺，反对卖国和要求严惩卖国贼的呼声响彻中华大地的上空。上海《申报》发出抗议：“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四川的农民义军也发布檄文，反对割地赔款，要求大兴义师与日寇决战。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入京应试举人，也参加到这一反帝的浪潮之中。康有为起草了一封长达14000字的上皇帝书，痛陈割让台湾，会使民心离散，列强势必争相瓜分中国的严重后果。1300多名赴京应试的举人在这封上皇帝书上签了字，并排成长龙队伍，前往都察院呈送此信。而都察院却以条约已签为由拒绝接纳。康有为的这个举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反响最为激烈的，莫过于台湾的广大军民。《马关条约》签字当日，割台的消息便传到了台湾，台湾全岛民众恰似“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悲愤已极的民众纷纷涌入巡抚衙门，抗议示威，怒斥清政府及李鸿章的卖国行径。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割台斗争在台湾展开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日军进犯台北

就在台湾民众自卫浪潮高涨之际，日本政府也加紧了武力侵占台湾的部署。烟台换约的第三天，晋升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为大将，出任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5月30日，李经方携道员马建忠、顾问科士达自上海起程，赴台湾交割。6月1日，到达台湾外海。次日下午，李经方在船上与日本派来的台湾民政局长水野遵磋商交割事宜。当天夜间，桦山资纪在商定的交割文本上签名盖章，交给李经方。偌大的台湾，就算交割完毕了。而在此之前，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的近卫师团约1.4万人及役夫700人、战马3400多匹和由海军少将东乡平八郎指挥的舰队，已于5月28日抵达台湾近海。日军经反复侦察，选定在台湾守军防卫薄弱的东北部三貂角的澳底登陆。此处地势开阔，水深浪缓，可泊巨轮。由于唐景崧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无端猜忌在援越抗法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战将刘永福，将其调离台北防区。而自己率领用20万两白银招募来的、未经战阵训练的、战斗力不强的义军驻守重要的台北防区，却忽视了对澳底的防守，认为此地为荒僻之所，仅派总兵曾照喜率两营士兵防守。5月29日下午1时，日军近卫步兵第一旅团开始在澳底抢滩登陆。曾照喜部与日军稍一交火，就大败而逃。日军大队迅速登陆，当夜，即在澳底宿营。次日，登陆日军西进，意在攻取基隆。

三貂岭是基隆屏障，为台北第一座高山。翻过山，有大小两条道路。大路通瑞芳，直达基隆；小道可绕至狮球岭后面。狮球岭位于基隆市街西北，扼基隆去台北的大道，二地均为军事交通要地。如此防御要地，本应加派重兵把守，而唐景崧仅派1营防军驻守三貂岭。5月30日晨，日军发起进攻，由于攻防双方实力悬殊，日军很快占领此地。唐景崧闻报，急派吴国华率700名士兵增援，又增派营官胡连胜、陈国柱、包干臣各率数百人增援。由于这些将领互不统属，且意见不合，终于被日军击溃。6月2日，日军第二联队第一、二、三中队齐攻瑞芳，守军以兵营为掩体抗击日军进攻，并与日军展开巷战，战事极为激烈，日军也被迫承认“我方死伤较多，由此可知敌的顽强”。因双方兵力过于悬殊，不久，日军攻占瑞芳，逼近基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6月3日上午，日军近卫师团分左、中、右三路猛攻基隆，日舰也从海上发炮助攻。守卫基隆的防军，除内渡的外，只有6营兵力，另加以瑞芳败退之军。双方展开激烈攻防战。至下午5时，守军伤亡惨重，力不能支，退往狮球岭。日军初战得手后，因所带粮草不足，且沿途掠抢困难，为了尽早抢占基隆，夺取粮食，供给士兵，日军对败退义军穷追不舍。与进犯基隆同时，日军也发起对狮球岭的攻击，驻防狮球岭的6营士兵，在候补知县胡友胜率领下，拼死防守，毫不退却。日军将狮球岭四面围定，轮番进攻。日军一位战地记者形容战场情形：“狂风暴雨席卷而来，枪炮声夹着风雨声，令人恐怖万分，守军勇敢顽强，巍然不动。我们的前面是水田和竹丛，行进艰难，由于相距过远，大炮也不能发挥作用，进攻一时难以得手。”战至下午6时，奋勇抵抗了一天的守军，弹尽援绝，阵地被日军突破，狮球岭遂告失陷。至此，外围险要全部丧失，台北危在旦夕。此时的唐景崧，见一败再败，早已无心恋战，心中盘算如何逃跑。俞明震力劝其退往新竹，联合刘永福、林朝栋二军，坚持抵抗。而唐景崧却不听劝阻，夜晚，携带巡抚印信从后门逃出总统府，乘夜逃往淡水，6日又乘船逃回厦门。民主国总统一走，城内义军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溃兵涌入城中即开始抢劫、纵火，不久巡抚衙门也燃起大火。台北城内，局势大乱。日军乘机攻城，纵有一批爱国将士拼死抵抗，惜无统一指挥部署，6月7日，日军占领台北。驻守台北后路的丘逢甲义军，因独力难支，也退往台中。丘逢甲因身为台湾民主国副总统而被日军严厉缉拿，被迫内渡。6月17日，桦山资纪主持了在台北的“始政典礼”，设总督府于台北。此举，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开始，宣告了台湾民主国的败亡。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保卫台中

日军在新竹站稳脚跟，并经反复扫荡，基本稳定了台北至新竹间的局势后，开始实施南进计划，进犯台中。由于沿途受到义军的处处攻击，故再次采取“烧光、杀光”政策，见房屋就烧，见人就杀，残暴野蛮之极。为阻止日军南犯，吴汤兴、徐骧、邱国霖、杨载云等各部义军在台中苗栗镇以北的尖笔山设防，严阵以待。日军以1万余人，并在海军支持下，气势汹汹扑来。8月8日黎明，日军分左、右两翼向尖笔山前的枕头山和鸡卵面发动进攻。分守此二地的徐骧和吴汤兴率部奋起抵抗，战斗极为激烈，后因日军炮火过猛，义军难以支持，才被迫撤走。9日，3个联队的日军在舰炮掩护下，向头份庄发起攻击。杨载云率部死守，誓不后退半步，在友邻义军相继撤走时，仍独力支持，毫不畏惧。杨载云，原籍湖北，后从军来台，屡立战功，被升为副将。日军侵台后，积极招募士兵，命名为“新楚军”。杨载云率这支义军参加反攻新竹的战斗，英勇非常。后退守台中，因他异常善战，智勇双全，在诸路抗敌义军中，威名大震，日军闻之胆寒。对他的功绩及威名，黎景嵩异常妒忌，黎氏不顾与日军交战正值危急时刻，竟然撤去杨载云新楚军统领之职，以李惟义统率新楚军。激战中，杨不顾个人恩怨，仍旧指挥士兵坚守，毫不退却。日军从正面进攻难以奏效，遂使用卑鄙手段，收买汉奸为其引路，抄袭杨载云义军的后路，切断了杨载云部与其他义军的联系。面对优势日军的四面包围和猛烈进攻，杨载云挺立阵前，指挥部下拼死战斗。不料李惟义却首先逃跑，牵动防守阵形，带动清军后撤，以致新楚军大营被日军冲破。新楚军士兵勉力苦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杨载云也“身中数枪”，捐躯沙场，实现了战前保卫家园不惜抛洒鲜血的誓言。新楚军自失去杨载云之后，一蹶不振。驻防尖笔山的徐骧义军孤掌难鸣，在重创日军并生俘数十名日军士兵后，被迫撤走，尖笔山、头份庄失守。

随着徐骧率部后撤，台中地区苗栗便成为义军在台中的最大据点。刘永福也于7月中旬派吴彭年等统领黑旗军士兵700余人北上，增援台中义军的防守。8月13日，北白川能久率师团主力进犯苗栗。上午10时，双方在苗栗东畔山前展开激战。日军凭借猛烈的炮火，连续摧毁数座义

军堡垒。吴彭年指挥部下顽强抗击，其属下黑旗军兵营管带袁锡清和帮带林鸿贵更是“身先士卒，屡冲敌锋”，不幸身中数枪，双双阵亡。吴彭年眼见爱将阵亡，仍骑白马挺立阵前督战，士兵感奋，殊力拼杀。战至中午，义军伤亡惨重，吴彭年被迫下令撤走。此时，身为苗栗知县的李烃却早已带着官印，内渡逃回福州了。14日上午，日军占领苗栗。

吴彭年率义军退守大甲溪后，重整队伍，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重新布置防御。8月22日，日军近卫师团以步兵为前导，马队、炮队断后，对大甲溪发动猛烈进攻。吴彭年指挥部下避开日军的锋芒，在大甲溪设下伏兵。

大甲溪是台湾第一大河流，蜿蜒于苗栗、台中、彰化之间，两岸乱石参差，林木丛生，山谷险峻。乘日军渡河之际，吴彭年率部突然从南岸冲出，猛击日军。日军猝不及防，狼狈逃回北岸。埋伏在北岸竹林中的徐骧义军，突然杀出，日军首尾不能相顾，被击毙击伤及溺水而亡者无数，残部夺路逃走。义军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数艘船的粮食，极大地振奋了士气。次日，被打得老羞成怒的日军全力反扑，义军也分三路出击迎敌，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激烈拼战。在头份庄败逃而此时镇守后路的李惟义，贪生怕死，没有挡住从后路包抄上来的日军偷袭部队，致大营失陷。各路义军见后路断绝，纷纷撤走。断后的一营义军为掩护大队义军撤走而力挡几个方面日军的猛烈进攻，全部壮烈牺牲，大甲溪失陷。

占领大甲溪后，日军开始全力进攻彰化。彰化城小，难以防守，城东的八卦山，可以俯瞰全城，守山就可守城。因而，守卫八卦山就成为保卫彰化城的关键。刘永福派5营黑旗军前来增援。经协商，义军由吴汤兴、徐骧等4营守八卦山，王德标率1营守中寮庄北，刘得胜率1营守中寮庄南，孔宪盈率1营守茄苳脚，李惟义率4营守彰化城并策应各路，吴彭年率军守城北大肚溪南岸。日军则以近卫师团为主力，分三路向义军阵地冲来。

8月28日晨，日军炮兵首先发炮，猛烈轰击正面防线的黑旗军部队，从而拉开了总攻的序幕。6个中队的日军分东、西、南三个方向对八卦山炮台猛烈冲锋，日军漫山遍野，蜂拥而上。义军殊死抵抗，吴汤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兴足蹬草鞋，帕巾裹头束腰，手持短铳，在山顶往来奔走，指挥作战，大呼杀贼，激励士卒。徐骧也率部拼力死战，猛烈反击进攻日军。激战数小时，八卦山守军伤亡殆尽，吴汤兴中弹倒地，壮烈牺牲，年仅35岁。徐骧独力难支，只得率20余人从后山突围而走，八卦山失守。占领八卦山的日军，架炮向彰化城内轰击。驻守彰化城的李惟义，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与知府黎景嵩抛弃守军，逃往台南。被日军收买的汉奸又打开西门，日军蜂拥而入，疯狂屠杀出逃的百姓，并与守城的部分义军展开巷战。彰化城内，百姓尸体到处可见。不久，彰化陷落。

此时，唯独西路战斗仍在激烈进行，面对日军对中寮庄、茄苳脚的猛烈进攻，王德标、孔宪盈率部奋力猛冲，激烈反击。黑旗军士兵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大量杀伤日军，战况呈胶着状态。激战中，吴彭年突然发现八卦山上竖起日本旗，十分震惊。为夺回这一防守的制高点，遂亲率数百士兵反击，以期奋力打垮日军，夺回八卦山。冲锋中，吴彭年身中数弹仍奋勇前冲，后因伤势过重，力竭倒地。他坚决不肯让亲兵搀扶他后撤，坚持裹伤再战，终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这位来自浙江余姚的勇士，以自己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及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转战台中各地，痛击日军。此次英勇牺牲，其爱国精神颇为时人称颂，世称“古人忠臣烈士，何以如此哉”，实不为过。王德标见吴彭年牺牲后，仍不退却，虽身上多处受伤，仍指挥士兵力战，后被左右亲兵挟持撤走。至此，台中防卫战结束，义军将士含泪掩埋了400多具遗体，余部被迫南撤。

面对义军节节失利，北白川能久踌躇满志，占领彰化后，立刻指挥日军兵分三路，直扑台南。8月30日，日军前锋进至大莆林，直逼嘉义县。由于台中诸城尽失，义军损失严重，坐镇台南的黑旗军统领刘永福虽苦于内无粮饷，外无援兵，但仍勉力维持。急令王德标率部驻防嘉义，提拔杨泗洪“节制黑旗前敌诸军，及各地义勇队”。杨泗洪，字锡九，号茂龄，江苏宿迁人。拳技世家出身，自幼习武。性情直率豪爽，素怀报国之心。曾在刘铭传麾下为将。中法战争随刘赴台，在沪尾一战中大败法军，由此威名大震。他曾9次返回大陆，招募兵勇。经他训练之后，这支队伍纪律严明、战斗力颇强。杨泗洪也被升为记名提督，署台湾镇总兵。后邵友濂继任台湾巡抚，裁撤防军，被降为营官。此次，

被刘永福委任为指挥，杨泗洪深为感激。8月30日，探知日军来犯，遂率部直扑大莆林。

大莆林位于嘉义城北30里，是通往台南的交通要道。9月3日，当杨泗洪率黑旗军逼近大莆林时，探听到日军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一个步兵大队已占据大莆林，遂即下令，将大莆林团团围住。日军发觉被包围后，为保住后退道路的畅通，急忙派出一个中队突围而出，回防要地他里雾。途中，遭遇黑旗军伏击，日军伤亡严重，难以再战，只好坚持到天黑，狼狈奔向他里雾。不久，黑旗军进攻他里雾，驻扎他里雾的日军全被黑旗军歼灭。日军无奈，只好又匆忙逃回大莆林。

9月5日夜，大莆林的日军已被围困了三天三夜，粮草断绝，又无外援，为避免坐以待毙，决定突围北逃。6日凌晨，正当日军刚要出逃之际，黑旗军和义军发动了进攻。在山炮的轰击下，黑旗军及义军将士勇猛异常，激战2个小时，日军弹药用尽，无力支持，只好冒死突围。日军破围北窜，杨泗洪身先士卒，率士兵奋勇追杀，不幸腿部中弹，仍裹伤继续追击日军。日军死伤惨重，且战且逃。追击中，杨泗洪见一日军将官落在后面，遂奋勇前冲，想生擒活捉，不料腹部又连连中弹，不支倒地，被部下救起。8日，杨伤重逝世，为保卫台湾不受日寇蹂躏而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杨泗洪奋勇杀敌、英勇捐躯的英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黑旗军及义军将士，他们化悲痛为力量，痛击日军。日军从大莆林突围后，拼命北窜。义军又收复台中之云林县，一时间，台中抗战形势大为改观，日军在台中处境极为艰难。

9月11日，日本从辽东半岛紧急抽调的第二师团及国内的后备队、工兵、炮兵等共计2万多人抵达台北，形势由此急转直下。为夺回彰化，义军决定冒险攻城。23日，各路义军合攻彰化，由于缺乏攻城重炮，仅凭步枪、抬杆等轻武器与拥有精良武器守城的日军交战，明显处于劣势。攻城战持续了三天，义军伤亡极大，首领黄荣邦牺牲，林文成受重伤，反攻彰化的计划终告失利。至此，台中全部失陷，台湾军民的抗战进入最关键的也是最困难的阶段。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参考书目

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1～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1～43，1987～1991。

3.孙克复、关捷编著《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4.戚其章主编《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

5.戴逸等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6.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

7.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

8.张炜主编《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9.戚其章著《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10.林伟功、黄国盛主编《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史话》主要编辑出版发行人

总策划 谢寿光 王正

执行策划 杨群 徐思彦 宋月华

梁艳玲 刘晖春 张国春

统筹 黄丹 宋淑洁

设计总监 孙元明

市场推广 蔡继辉 刘德顺 李丽丽

责任印制 岳阳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太平天国史话》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天国史话/张远鹏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

（中国史话）

ISBN 978-7-5097-1953-4

Ⅰ.①太… Ⅱ.①张… Ⅲ.①太平天国革命-研究 Ⅳ.①K25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5987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话·近代政治史系列

太平天国史话

著者/张远鹏

出版人/谢寿光

总编辑/邹东涛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010）59367215

电子信箱/renwen@ssap.cn

责任编辑/黄丹 乔鹏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责任校对/刘宏桥

责任印制/郭妍 岳阳

总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6

版次/2011年5月第1版 字数/109千字

印次/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1953-4

定价/1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

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2011年4月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目录

一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

1 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2 两广是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地区之一

二 拜上帝

1 洪秀全开始拜上帝

2 洪秀全、冯云山宣传拜上帝

3 武装起义的酝酿

三 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

1 金田起义

2 永安半载

3 入湖南，占武汉

4 顺江东下，建都天京

四 《天朝田亩制度》及前期各项内外政策

1 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2 各项经济政策的变化

3 对外关系的特点

五 建都天京后的军事活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 北伐

2 西征

3 镇江、天京城郊的战斗

六 天京事变与石达开的出走

1 天京事变的缘起

2 杨秀清、韦昌辉的相继被杀

3 石达开出走

七 李秀成、陈玉成、林启荣等的苦战

1 为稳定江西、皖北战局而努力

2 解天京之围

3 攻占苏南、浙江地区

八 改革内政的努力

1 李秀成的改革主张

2 洪仁玕总理朝政，提出《资政新篇》

九 战略形势逆转

1 清王朝与外国侵略者勾结

2 太平天国政局紊乱

3 安庆失守

4 天京沦陷

十 太平军余部的战斗

1 赣、闽、粤战场的战斗

2 陈得才等转战中原

3 赖文光痛歼僧格林沁

4 东西联军两路作战

5 历史的教训

参考书目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 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中英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矛盾，尤其是人民大众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北方以白莲教，南方以天地会为核心的人民群众斗争日益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开始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后十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主要采取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索取“战争赔款”。根据《江宁条约》，1842～1845年间，清政府向英国侵略者支付了2100万元的战争赔款。这一巨额负担，完全转嫁到中国老百姓头上。为了支付巨额赔款，道光皇帝公开发出命令，要各省总督、巡抚限期催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

第二，继续大量地向中国输出鸦片。鸦片战争后，鸦片走私进口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更加泛滥。外国侵略者通过鸦片走私大量榨取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马克思指出：“从1843年起，鸦片贸易实际上还是完全不受法律制裁。”

1840年进口鸦片20619箱，1850年增加到52925箱。有人统计，主要由于鸦片进口，1843～1846年四年之间，中国流出的白银计3900万至4700多万银元；1847～1848年间，每年约计流出1000万银元。上海和广州成了两个最大的鸦片走私输入口岸。鸦片从广州沿西江而上，一直倾销到广西。梧州、平南、桂平、贵县一带，烟铺林立。桂平的大湟江口，一个小小的墟镇，就有鸦片烟馆十几家。吸食鸦片的主要是地主、豪绅、官僚等剥削阶级分子，他们为了购买鸦片，进一步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第三，倾销洋货。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一些手工业，主要是手工纺织业受到摧残，小生产者的处境更困难了。如苏州、松江一带，手工织布业，因“洋布盛

行……是以布市销减，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广东顺德一带，织布手工业，也因洋布“贱售，女工几停其半”。

这三种掠夺形式，说明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不是采取战争手段，而是采取经济手段掠夺中国人民。他们利用从腐朽的封建政府手中取得的特权对中国人民进行剥削；或者通过封建政府和地主阶级的手，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其结果就是封建政府和地主阶级进一步压榨广大农民群众。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更加沉重，土地集中急剧发展，城乡失业流亡人口大量增加。1845年前后，甚至远在西南的贵州省黎平府属各地，也由于“佃户分租无多，而田主盘剥日甚，以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民穷财尽”，其结果就是原来已经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群众性的斗争汹涌澎湃，此伏彼起。统治阶级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抗粮抗租，拒捕伤官之案，层见迭出。”某些清朝官僚也认为，1842年1月湖北崇阳钟人杰起义，1844年7月湖南耒阳杨大鹏起义，1844年5月台湾嘉义县郭崇高起义，1845年10月浙江奉化张名渊起义，“皆因州县征收加重所致”。起义烈火在全国各地燃起。在北方，以捻军、幅军为主体的斗争遍及山东、河南和安徽等广大地区。据记载：“道光二十七、八年，沂、曹间号幅匪、捻匪者，所在蜂起，北至赵、魏，南及淮、徐、沂之兰山尤盛。”在南方，广西、广东、湖南一带的斗争最为激烈。道光三十年（1850），有人向皇帝奏报：群众斗争“自直隶、山东、河南及浙江、两湖等省……几于无处不然，而最多且甚者，莫如两粤”。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二 拜上帝

——反对清朝统治的思想武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洪秀全、冯云山宣传拜上帝

洪秀全按照《劝世良言》中所说的仪式自行洗礼，皈依上帝，并积极宣传拜上帝。首先信教并接受洗礼的是他的族弟洪仁玕和表弟冯云山。冯云山，广东花县禾落地人，生于一个“家道殷实”之户，自幼熟读经史、天文、历算、地理、兵法等书，成年后，家道中落，几次参加科举考试，也是“屡试不第”，后便在农村私塾教书为业。洪秀全根据拜上帝教义，把自己家中所供奉的偶像牌位去掉。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又拿掉村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这一举动引起一场风波，洪秀全也因此丢掉了村塾先生的教职。

1844年4月2日，洪秀全、冯云山离开花县家乡，到广州、顺德、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英德、曲江、阳山、连山等地宣传拜上帝[2]，沿途贩卖笔砚以为盘缠。5月21日到达广西贵县的赐谷村。洪秀全有位表兄住在那里。洪秀全和冯云山在赐谷村一带传教，发动群众，可是效果不够理想，信教受洗的只有一百多人。

9月5日，冯云山离开赐谷村到紫荆山区，深入广大贫苦劳动人民中间宣传教义。

紫荆山区极其偏僻，群山环抱，形势十分险要。此地居住着十分贫苦的劳动人民，包括农民和烧炭工人。在冯云山来到之前，曾经发生过以农民为主，并联合其他劳苦人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斗争。也就是说山民们具有一定的反抗意识；并且由于他们缺少文化，比较迷信，易于接受宗教宣传。因此，从地理环境和群众基础看，紫荆山区是比较理想的积聚革命力量准备发动起义的基地。1844年10～11月间，为了发动群众，冯云山深入紫荆山区古林社，脱下长衫，亲身从事体力劳动。他通过做短工、捡卖牛粪等接近广大劳动群众，宣传拜上帝。1846年春，冯云山又到大冲一面教书，一面继续传教。

1844年11月18日，洪秀全离开赐谷村回到广东家乡，仍以教书为业。在1845～1846年间，洪秀全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等著作，比较系统地阐发了他自己所理解的拜上帝教义，宣示其建立天下一家的太平世界的理想。

《原道救世歌》提出了“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的观点，宣扬天父上帝为古今中外共同的独一真神，人人都得敬拜上帝；并谆谆告诫“勿拜邪神，须作正人”，具体地提出了“正道”的典范和反对“不正”的若干要求，即反对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为赌博以及吸洋烟、饮酒、堪舆、相命，等等。可见，这是洪秀全对世人在宗教信仰及道德修养方面的具体要求。《原道醒世训》着重谴责了“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社会弊端；批判了国与国之间，省、府、州、县、乡、里，乃至族姓之间“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丑恶现象；明确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不应存“此疆彼界之私”，不应起“尔吞我并之念”；热烈歌颂了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贤上德”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号召天下凡间的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如此，则可“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显然，这是洪秀全提出的改造社会的理想方案。洪秀全用“大同”思想反对私有，显然是起着反封建的革命作用的。但是，废除地主阶级的私有制后怎么办？是废除一切私有制，还是保存农民私有制？对这个问题，洪秀全没有明确地回答，但是倾向性是很清楚的。他倾向于废除一切私有制，提出了“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的口号。

不论作者主观意图如何，《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三 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

1 金田起义

当1848年1月，冯云山被抓关入桂平县大牢，洪秀全去广东时，拜上帝会面临巨大的危机。地主团练对拜上帝信徒的威胁迫害加剧，拜上帝会群龙无首，人心惶惶。紫荆山基地的杨秀清、萧朝贵乘机而出。杨秀清，广西桂平人，出身于一个“世代耕山烧炭”的人家，自幼生长深山之中，很小就失去父母，“零丁孤苦，困厄难堪”，此人“性机警，喜用权智”，自称梦中能知未来事。一天他对人说：我昨天梦见某地方有金子，听者按他说的去找，果然找到了金子，非常惊异，认为杨秀清“神”了。其实这些金子是杨秀清预藏在那里的。萧朝贵，广西武宣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僻处山隅，自耕而食，自蚕而衣”。境遇很不好。他力大无穷，一天耕牛挣脱牛绳，逃出田边，他追上去抓住牛尾，牛被他拉得倒着跟他走。当地流行“降僮”风俗，就是鬼神附体说话。杨秀清于1848年4月声称天父下凡，“号召信徒同心共志，度过暂时的艰难岁月”；萧朝贵也在是年9月声称天兄下凡。杨、萧稳定了拜上帝会的情绪，也确立了对紫荆山区信徒的控制。

洪秀全、冯云山回到紫荆山后，因为官绅迫害，不便公开活动，只能依靠杨秀清、萧朝贵主持事务。洪秀全承认了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为天父、天兄代言人的特殊身份。这样拜上帝宗教的权力结构由洪秀全的一元领导，转变为洪秀全与杨秀清、萧朝贵的交叉二元领导。某种程度上说，杨、萧的权力凌驾于洪之上。杨、萧利用天父、天兄代言人的身份，主导洪的行动，洪秀全的行止谋划也需得到他们的同意。

为了制衡杨、萧，洪秀全不断注意笼络和提拔其他基地的首领。先乘杨秀清生病之际把韦昌辉拉进了中枢，后来又加上石达开。韦昌辉，初名正，广西桂平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韦家受大地主欺压，韦昌辉很是愤恨，在冯云山的开导下，献出家产加入拜上帝会。石达开，广西贵县人，出身于农村的一个小康之家。当他12岁的时候，就“凛然如成年人，自雄其才，慷慨有经略四方志，喜读兵法”。韦、石二人进入中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枢，使中枢权力结构一时得以平衡。

在金田起义前后，杨秀清、萧朝贵为了共成大业，也经常以天父、天兄下凡发言，肯定洪秀全编造的君权神授的故事——上帝派洪秀全下凡，主宰世间，洪秀全是真命天子的神话，并号召信徒拥护洪秀全，“共扶真主”。

1850年初至春夏间，远近各地的拜上帝会首领及骨干分子陆续被召至平在山秘密朝觐洪秀全，并聆听天父、天兄圣旨。据记载，有时一晚就“有几多众小来朝”，或“有好多兄弟到来”，甚至还有“他方兄弟来投”。神秘而又庄严的氛围使这些开国元勋们诚惶诚恐，又振奋不已。曾随父亲蒙得恩参加过朝觐洪秀全的蒙时雍后来回忆说：“我从庚戌年二月敬拜天父上帝、天兄耶稣，没有多少日子，即随先父到平在山面觐真圣主天王圣颜，仰蒙面诏教导，指引甚属精详。侄与先父从此格外信实认真，去邪崇正。其时令甚严肃，不准轻泄机关，故此不敢轻与人言。”

经过长期的精心策划，1850年4月3日（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于平在山穿起黄袍，正式成为太平天王。之所以择定于此日“登极”，据说是因为“二、十、一”三个字可以共同组合成一个“主”字。这一日期，后来被洪秀全定为“太兄暨朕登极节”。大约与此同时，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三人开始正式拥有了“军师”的名号。

拜上帝会对于洪秀全的登极，没有采取大肆张扬的做法，而是实行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洪秀全秘密登极后的第三天，萧朝贵即假借“天兄下凡”，告诫其“要避吉（即‘避凶’），不可令外小（即外人）见，不可被人识透也”。以后又指示会众“千祈不好泄漏天机，不好讲太平事”。

1850年夏，武装起义的时机已渐趋成熟。各地拜上帝会的首领根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实即拜上帝会领导核心的决策，各回所在，分头发动群众。洪秀全的家属也已派人从广东接来。太平天国史上被称为“金田起义”[1]的伟大斗争，就此揭开帷幕。为适应起义斗争的需要，拜上帝会领导核心内部进行了分工。已经就任太平天王的洪秀全，是起

义的拥戴对象，又非本籍人，不便公开出面，因而接受了“天兄”对他的安排——和家眷一起密藏“避吉”。对拜上帝会有首创之功的军师冯云山，同为外省人，又曾被桂平知县判决“递籍管束”，也不宜出头露面，因而亦被安排随同密藏。出面组织起义发动工作的，是另两位军师——杨秀清与萧朝贵，他们因有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资格，已把最高权威掌握在自己手里。由于杨秀清患病，一度口哑耳聋，实际事务系由萧朝贵主持，而由干练的韦昌辉襄理。

拜上帝会各基地纷纷行动。信徒们变卖家产，筹集军械粮饷，编练队伍，向金田开拔。有的基地在8月份就开始了武装集结。如贵县白沙团练挑起新的武装冲突，抢林凤祥家耕牛，挟众持械挑衅，还开炮轰击。林凤祥率众反击，连胜两场。秦日纲遣队增援，集结信徒180余人，粮谷2000石。据《贵县志》的夸张记载：8月20日，石达开聚众千人，至白沙圩，铸炮立营。9月底，进赴金田，而白沙信徒梁立泰在8月就到金田入营了。

十月初一日（1850年11月4日）是预定的公开揭帜起义的日期。虽然路远的陆川、博白以及广东信宜的大股人马，未能按时到达金田，杨秀清还是决定按计划起义。据《天情道理书》记载：“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国军务，乃

天下弟妹。”杨秀清重病5个月后，“霍然而愈，重掌军事”，统一领导指挥拜上帝各路人马揭帜起义。

11月4日，金田起义这一天，总部没有发动军事行动，倒是洪秀全、冯云山发动了一场战斗。1850年秋，洪、冯秘密住在花洲山人村，这一带形势险要，比较隐蔽，由思旺墟只一路可通。杨秀清等驻扎在金田村。敌军布防平南思旺墟，妄图隔断花洲和金田的联系。11月4日洪秀全派胡以晄带兵从花洲进攻思旺。敌署平南县秦川巡检张镛到思旺助守，打了一仗。到12月25日，洪秀全命杨秀清派蒙得恩带兵从西南面攻打思旺。27日，蒙得恩大败敌浔州协副将李殿元，阵毙张镛，花洲拜上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帝会众同时冲出，取得了胜利。28日接天王徙营出思旺上金田，史称“迎主之战”。

驻在浔州的周凤岐不甘心失败，又派贵州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等进攻金田。1851年1月1日，洪秀全、杨秀清在桂平蔡村江（距金田约五六里）设伏，又大败清军，击毙伊克坦布及所部300余人。周凤岐亲自率兵前往援助也被击败。清军遭此打击后，“相与谋坚壁之守”，不敢轻言进攻。敌人的初次“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敌人不敢进攻，聚集在金田村的各路拜上帝人马便在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恭祝天王洪秀全的38岁生日并庆贺起义的胜利[2]。凡参与此次祝寿者，后来都得到了“功勋加一等”的殊荣。洪秀全则以太平天王的身份，封立长子洪天贵为幼主，并宣布以明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改地支“亥”为“开”）。之所以建国号为“太平天国”，系因其为太平天王所治理的国家（按：太平天国将国家的“国”写成“国”，内中为“王”，含王居中治理天下之意）。“太平”者，治之至也，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安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天国”之称，则源于基督教之《新约》。

拜上帝会的各路兵马在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的指挥下，按照《太平军目》所订军制统一编组，形成了从两司马直到军帅的一整套相当完备的军事组织系统。这就是后来使清军闻风丧胆的太平军。由于团营的群众大都是阖家前来，太平军还将男女老少分别组织，使其各尽所能，为太平天国的开创大业贡献力量。

这时，已经建立了圣库制度，规定参加团营的人，不得私藏财产，“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

1851年1月初旬，洪秀全在金田向全军宣布了五条革命军纪律：

一遵条命；

二别男行女行；

三秋毫莫犯；

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

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出紫荆山区，进抵大湟江。清军迅速向浔州集中，达到一万多人，归钦差大臣李星沅统率，前线指挥为广西提督向荣。1851年2月18日，向荣进攻，被太平军打败于牛排岭。接着又战于屈甲洲，太平军佯败，先设伏兵于下游以抄清军之后，清军“前后受敌，遂败。士卒死者数百人，渊坑为满”。向荣两次败北，也不敢再言进攻，改用围困的办法。

3月10日，洪秀全率领起义军由江口突围经桂平新墟入紫荆山，并翻越紫荆山到达武宣东乡。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天王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领导核心正式确定。

太平军主力在武宣东乡，前锋进抵武宣县城东南30里的三里墟，武宣周围六七十个村子尽为太平军所占领。清兵“顿于武宣，怯贼不敢进”，挨到4月3日新署广西巡抚周天爵才伙同向荣四路出兵向三里墟进攻。洪秀全、冯云山亲自指挥太平军设伏抵抗，毙敌30余人，伤敌70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周天爵被迫缩了回去。

5月16日，太平军自东乡进入象州境，在中坪墟建立总部，而以百丈、新寨为犄角。这时，清廷方面派大学士赛尚阿继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军务。他们跟太平军后面尾追。6月9日太平军和乌兰泰部战于独鳌山、梁山村和马鞍山。太平军7位英雄战士，冲入清威宁镇营盘，敌大惊失色，“官兵计有千人，全行奔溃”。

7月2日，洪秀全复指挥太平军自象州中坪墟折回紫荆山区茶地、大坪村、新墟、莫村、思盘一带。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自3月中旬离开荆州山区攻击武宣、象州境，7月初旬返回紫荆山区，将近4个月的军事活动，主要目的在于招集没有能够到金田参加起义的拜上帝会众，起了发动群众，扩大队伍的作用。

太平军“前以新墟为门户，后以猪仔峡、双髻山为要隘”，固守紫荆山区根据地，抓紧时间，休整了两个多月。随后，洪秀全发布战斗口号：“同见小天堂威风”，意即“打到南京去！”1851年9月11日，太平军于夜间从金田突围向永安进发。向荣率所部尾追，到官村时，遭到太平军伏击，向荣全军覆没，敌人承认：“军械全失，几不能军……向（荣）之丧师失律，未有甚于此役者。”向荣兵败后逃入平南县城。9月25日，太平军先锋队伍，在罗大纲率领下，攻入永安州（今蒙山县），击毙清知州吴江等。这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城市。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永安半载

太平军占领永安后，主要做了下列五项工作。

第一，在政权建设方面，12月17日，洪秀全发布天王诏令，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永安封王标志着太平天国政权得到加强。

第二，在队伍内部，进行肃奸工作，揭露并镇压了周锡能的叛变阴谋活动。当太平军攻克永安后，清朝收买叛徒周锡能，企图外攻内应，颠覆太平天国。杨秀清侦知周锡能的阴谋，立刻假托天父下凡，锁拿周锡能进行审讯，将他的谋叛逆迹一一指出。周锡能无法狡辩，不得不供认。杨秀清将他押出朝门，斩首。杨秀清同时教导众兵将说：自今以后，每事俱要擦亮眼睛，时加警惕，一旦发现可疑的情况，就“该即刻禀报尔千岁，奏知尔主天王”。这个案子的破获，不仅粉碎了敌人外攻内应的阴谋，而且鼓舞了全军的斗志。

第三，颁行天历。天历是1848年南王冯云山在桂平狱中制订的，但是，颁布实行则是在攻克永安以后。在传统上，“正朔”是政权存在的重要标志之一。太平天国颁行天历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在政治上宣告与清王朝彻底决裂。清王朝对此十分恐惧，说太平天国“居然妄改正朔，殊属罪大恶极”。

天历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革除了旧历的若干迷信成分。旧历标明哪一日为祸，哪一日为福，哪一日为吉，哪一日为凶，等等。天历完全废除了这一套，并指出，这些都是“妖魔诡计迷陷世人”的“邪说歪例”。它指出：“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时时亦总是吉是良，何有好歹，何用拣择？”

第四，经济上，沉重打击地主阶级。太平军采取了多种方式。其一是发动群众，军民合作，没收恶霸地主的浮财。例如古苏冲口的富豪、富稳和富乐三屯居住的大地主在太平军进驻永安州时，逃入六贺山瑶

区，拒绝给太平军捐钱献粮。太平军动员了两千多男女军民去抄他们的家，“出谷子，抬肥猪”，整整搬了五天五夜，除了一部分分给参加斗争的群众外，其余全部运回州城储存。其二是发动群众，抢割地主的田禾，一半归太平军，另一半归佃户所有，不再给田主交租。1852年，一个清朝官员透露：上年“闰八月抢割之后，（太平军）仓庾甚丰……足敷今年正、二月之食”。对地主的打击，大大鼓舞了贫苦农民的斗志。农民“加入长毛队伍的更加踊跃，简直是村村都有”。

第五，太平天国还刻印了许多书籍，加强了对革命队伍的教育。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新刻的“旨准颁行”的书籍计有八部。这些书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永安期间刻印的。书的内容，有的是宣传革命道理，如《太平诏书》等；有些是规定革命队伍的组织和纪律，如《天条书》、《太平军目》等。

更重要的是，1851年，太平天国发布了三篇讨清檄文：《奉天诛妖救世安民》、《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凡属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者，又谕救一切中国人民，从前不知大义、误帮胡妖、自害中国者》。这三篇檄文分别号召清王朝的团勇、秘密会党、知识分子和在清政府工作的文武官吏，“各各起义”，“同心戮力，扫荡胡尘”。这三篇檄文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是有错误的，但是它揭露了清王朝的腐朽罪恶，控诉了人民群众的灾难困苦，它指出：“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漓，暴露如莽……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檄文还公开点了清朝皇帝的名，说：“今满妖咸丰……大叛逆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诛者也。”檄文揭示太平军的战斗目标是：“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在出广西、进两湖、沿江东下的过程中，太平军派人把这三道檄文广为散布。它成为进一步动员群众参加斗争的战鼓，在政治上有力地孤立和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人民群众纷纷加入太平军。

太平军驻扎在永安的过程中，广大群众踊跃参加革命，太平军人数增加到37000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金田突围，打破敌人的“围剿”，但是，敌人很快又形成了对永安新的“围剿”。赛尚阿、乌兰泰屯南路，大营扎佛子村一带；向荣搜集残兵败将屯北路古排塘一带。南北两路敌人总数在46000人左右。

太平军为了守卫永安，北路以龙眼塘、上阳村为基地，南路以水窦村为中心，建筑南北两线的防御体系。

1852年4月4日，洪秀全向全军发布了新的“突围令”，命令全军男将女将，遵守命令，“欢喜踊跃坚耐威武，放胆诛妖”；“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

4月5日夜三更，太平军以罗大纲为先锋，有准备地分队出永安城，东走古苏冲，突破敌人设在古苏冲口、玉龙关及龙寮岭口的三道防线，向昭平大峒疾进。清军乌兰泰率所部尾追。太平军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敌人尾追，给太平军造成了歼敌的好机会。太平军设伏于大峒，4月8日，大败清军，毙敌官兵达4000余人，乌兰泰全军覆没。

大峒山大胜以后，太平军由小路经中角傜山过天平坳，由山路出荔浦之马岭，经阳朔之高田墟，临桂之六塘，于4月18日直抵桂林城下。太平军屯扎在西南文昌门外象鼻山和西门外牛山，全军已增加到8万人。

自1851年9月25日攻占永安县城，到1852年4月4日永安突围，太平军在永安驻扎了六个多月。按照《天情道理书》的说法，“壬子岁时在永安，粮草殆尽，红粉亦无，妖魔十万四面重围，无路可走……三月，天父大显权能，命我们弟妹同扶真主，攻取桂林，其时移营冲围而出”。可见，在永安被围，火药、粮草耗尽的情况下，太平军才突围而出的。在占领永安前一个多月，1851年8月14日天王洪秀全在茶地发布的一个诏令说：“各军各营宜间匀连络，首尾相应，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众兵将各各遵。”攻克永安州城后一个月，天王诏令说：每场杀妖后，各两司马立即记录自己管下各兵的功劳，逐级上报，“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职高低，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过了半个月，天王又发布诏令说：“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

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小天堂”指的是南京，这是比较一致的看法。因此，打到南京去，在南京建都，在进入永安州城前后，在洪秀全的领导思想上是很明确的。永安突围的目的是攻打南京。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顺江东下，建都天京

太平军在武昌短期休整以后，于1853年2月9日撤离武汉，顺江东下。

离开武昌时，太平军井然有序，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表现了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军领导官员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高度组织能力。

2月6日，传令“各营备一月粮，锄锹四具”。

2月8日，开始登舟。

2月9日，各王及众官赴天王宫辞行，随往东王府集中，“以次出城”。天王旋即乘黄毡轿启行，随后有“肩舆百余乘”。城里各营天兵皆陆续由浮桥渡江下船，东门外留有千余人掩护，至全军撤退毕，始从浮桥渡江东退，半渡，即传令焚桥。

武昌的革命群众，纷纷随太平军东下，“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

当时有人描绘大军东下的阵容道：“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行则帆如叠雪，住则樯若丛芦。炮声遥震，沿江州邑，无兵无船，莫不望风披靡。”

1853年2月15日，冲破清两江总督陆建瀛设在湖北东部老鼠峡一带的江防防线，击毙翼长寿春镇总兵恩长。敌守军“全军大骇，反棹急奔”。陆建瀛跑得最快。他“见势难敌，弃师先奔。舟至小孤山，兵弁跪接，乃大呼曰‘贼势浩大，快走逃生’。兵皆感之”。他一直逃到南京。2月18日，太平军攻克九江府城。2月24日攻占安庆府城，击毙清安徽巡抚蒋文庆。“所有藩库饷银三十余万两，总局饷银四万余两，制钱四万余千，府仓米一万余石，太湖仓米二万余石及常平仓谷……城上大炮自二千五百斤至数百斤，共一百八十九位”，均为太平军缴获。人民群众

踊跃参加太平军，太平军人数增加到70余万人。

1853年3月4日，太平军进战太平府属之芜湖。

太平军出湖南，占武汉，沿江东下，连战皆捷，可以说，没有打过败仗。这固然是由于太平军英勇善战，指挥正确，但是，也还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太平军的胜利进军是和沿途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分不开的。

太平军由九江东下，安徽全省各地纷传太平天国诏书；清政府告示，只用短条，不写咸丰年号；称太平军为“西兵”、“西骑”。“甚至绅士胁其令长，预造烟户册，欲俟贼至郊迎三十里，跪而投册纳印者。有门首粘一黄纸‘顺’字者，有箕敛银钱、粮米、食物馈送者。”江南会党亦纷起响应。例如皖南宁国府一带会党谋起事，四贴安民告示，衔署：“特受开国军师平满统兵大元帅杨秀清”。

从敌人的防御力量看，反动派十分腐朽。如有人亲眼看到当时长江下游清军的设防情况，说：咸丰三年正月十六日（1853年2月23日）船抵达荻港，起先听说荻港驻兵两千人，想必有营垒以资堵截防御。等到了，只见芦席棚子数十间独立风雪中，大炮数尊横卧江岸，兵士散处嬉戏而已。过一天，到了梁山，江畔停泊兵船二只，船身脆薄，而外面涂以彩色，左右覆以渔网。十八日，停泊北河口，当初陆建瀛乘小舟逃回北河口，潜入城内，停在江边的兵船都不知道。

“好景南天一片红，扬帆迅速顺流东。”

太平军由芜湖沿江及夹江两岸三路并进，3月7日占和州，旋即进抵采石，复分水陆两路向南京进攻。南京“各乡争献贡物”，贡物有驴、猪、羊、鸡、米糕等，热烈欢迎太平军。

南京城内群众也积极行动，配合太平军攻城。3月18日“晚，城北居人笼竹巡街，忽见各家门墙或画红圈，或画白圈，或一或两，或朱书天字，或大字，或刀十字。周环十、三里，家家俱遍，先一刻无此也”。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在城内群众的配合下，城外太平军采取“穴地攻城法”，于3月19日清晨，轰塌仪凤门（北门），涌入城内，一支冲向鼓楼；另一支循金川门至神策门，经成贤街冲向小营，攻满城。满城是明朝在南京建都时的内城，当时为满族官员和八旗驻防官员居住之地。太平军路经黄家塘时，路上斩杀清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陆建瀛。攻聚宝门（南门）的太平军亦用云梯登上城楼，随即冲至水西、旱西两门，于是南面、西面三个城门大开。20日黎明，太平军大军从三门入城，直扑满城，克之，斩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

攻克南京后，太平军分兵继续东下，一支由江北向东推进，3月22日占江浦，31日克仪征，4月1日克复扬州府城；一支沿江东下，于3月31日克复镇江府城。太平军克镇江后，原计划立即东进，攻取苏州、杭州。但是由于向荣追到南京，乃改变计划，停止东进，坚守南京。

天王洪秀全于3月29日自水西门进入南京城，并改南京为天京，正式在此建都。

[1]　所谓“金田起义”，在太平天国文献中有特定的含义，系指以金田为中心的各处拜上帝人马举兵“共扶真主”，亦即仗义起兵勤王之谓。

[2] 按：人们通常以1851年1月11日为太平天国起义纪念日。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四 《天朝田亩制度》及前期各项内外政策

1 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1853年冬，天王洪秀全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力图创建地上“太平天国”的总纲领。

《天朝田亩制度》，是洪秀全根据《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中阐述的平等思想而提出来的。它不仅是一个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而且涉及政治、思想、文化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在此以前，在中国农民革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类系统的纲领。它的诞生标志着太平天国把中国农民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在政治上，全国人民都按照军事体系组织起来。每二十五家设两司马管理，两司马之上设有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监军、总制等官职。总制管一个郡，郡相当于清朝统治时期的府。两司马领导的二十五家是社会的基层组织。这样严密组织的目的是：“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上）。”《天朝田亩制度》把“杀敌”和“耕田”结合起来，体现了洪秀全思想的高度。他始终没有忘记杀敌，也没有忘记农业生产。农民革命的斗争目标，在这个纲领里是十分明确的。

军帅以下各级官员叫做乡官，都是由下面保举的。“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保举的条件是：第一，“遵守十款天条及遵命令尽忠报国”。第二，“力农”。保举方式是由两司马向卒长推举所辖二十五家中够条件的人，“列其行迹，注其姓名，并自己保举姓名于卒长”；“卒长细核其人于本百家中，果实，则详其人并保举姓名于旅帅”；这样层层上报，逐级核实，直到天王。然后由“天王降旨，调选天下各军所举为某旗，或师帅，或旅帅，或卒长、两司马，伍长”。这种推举乡官的制度，在建都天京后就开始施行。例如1853年11月，安庆太平军守将通知繁昌县荻港镇等地人民，“务须赶紧举官造册”；又通知荻港人民限“十一月初九日举齐旅帅两司马等官，填名造册，赴安徽省呈报”。

被保举为乡官者，在前期大多数是出身贫苦的劳动人民。外国报纸报道，安徽太平军“委派乡官……有一卖果品者考中举人，而得官职……他们施政，正直不阿”。清方人士也说：太平军在安庆，选择本地人为乡官，授以官职。

地主士绅掌握基层政权是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这个基础现在被摧毁了。忠诚于太平天国事业的积极分子掌握基层政权，出现了“文武各官三百六十行”的新气象。这对太平天国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人记载道：太平军行军所需各物皆悉取给于乡官。偶需锹锄千柄，或苇席千张，或划船百只，公文一下，“咄嗟立办”。可见，在政治、经济和支援军需等方面，乡官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

定都天京前，太平天国的条令大都是军律。自从建立地方政权以后，各地乡官均有审理民事诉讼之责。《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一套诉讼制度。据记载，乡官“上给贡赋，下理民事”，“催科理刑，皆专责成”，就是明证。

在经济上，《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废除土地私有制，重新平均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它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杂以九等”是什么含义呢？《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田分九等。其田一亩，早晚两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为尚尚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为尚中田；可出一千斤者为尚下田；可出九百斤者为中尚田；可出八百斤者为中中田；可出七百斤者为中下田；可出六百斤者为下尚田，可出五百斤者为下中田；可出四百斤者为下下田。尚尚田一亩当尚中田一亩一分，当尚下田一亩二分，当中尚田一亩三分五厘，当中中田一亩五分，当中下田一亩七分五厘，当下尚田二亩，当下中田二亩四分。当下下田三亩……（分田时）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

《天朝田亩制度》还对受田年龄作了如下规定：“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尚，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如十六岁以尚分尚尚田一亩，则十五岁以下减其半，分尚尚田五分。”

在这里，《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按人口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平分土地，保持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它又宣传“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它宣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这种思想在分配制度上暴露得更清楚。它规定：“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又规定：“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丧）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

实际上，《天朝田亩制度》通过在分配制度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否定了按人口平分土地和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主张消灭一切私有。

在文化教育方面，《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对教育制度进行了三项改革：一是废除私塾和书院制度，实行政教合一，由两司马兼任老师；二是教学内容废除四书、五经等孔孟经书，改为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真命诏旨书》大概就是《天命诏旨书》，它是癸好三年正月以前太平军发布的天父天兄下凡诏旨和天王诏旨的汇编，是一部政治文件；三是二十五家的童子都去读书，做到了幼童教育的普及。这里包括女童在内。男女有同样受教育的权利。

值得重视的是，太平天国注重成人教育。《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礼拜上帝那一天，“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这就是每七天对全体成年男女进行一次政治思想教育。英国公使文翰给英国政府报告中也提到在太平天国“女馆”中，妇女“均给予衣食及教育”。

对两千年来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思想，《天朝田亩制度》也有相当程度的冲击。它除规定男女平等分配土地外，还强调“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买卖婚姻，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十分鲜明的革命纲领，也是太平天国建设新世界的蓝图。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对外关系的特点

太平天国对待外国的主导思想并不是很明确的。1854年，杨秀清在《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中提出了对外关系的准则：“我主天王，奉天行道，凡事秉至公，视天下为一家，胞与为怀，情同手足。”又说：“天下之内，兄弟也。”太平天国把平等思想扩大到外交事务上，反映了农民群众追求新的国际关系的理想。但是，他们有时，特别在前期，却用对待“夷狄”的态度对待外国。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缺乏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怎样维护国家的主权，他们是模糊的。这样，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犯国家主权的一些活动并没有给予重视。他们也没有把外国侵略者和外国人民区别开来。他们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认识，还处在感性认识阶段。由于同拜上帝这一类似的宗教形式，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不止一次对外国侵略者说：“既系同拜上帝，皆系兄弟。”

在通商问题方面，太平天国宣布：“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但是，他们严正指出：“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害人之物为禁”，即不准贩卖鸦片。太平天国革命者维护人民利益，捍卫国家主权，主张严禁鸦片进口，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们又说：“立埠之事，俟后方定。”又说：“准尔英尊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照常经营商业。”在当时，侵略者所要求的“立埠”就是对他们开放港口；侵略者所要求的“自由出入”，“照常经营商业”，就是“自由掠夺”。这些情况反映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者们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本质缺乏认识。

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把中国作为掠夺的对象，当然不会坐视中国农民革命的胜利。金田起义以前，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就敏感地报道了中国即将爆发大革命的消息。金田起义不久，他们就意识到这场革命对他们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竭力想把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1850年8月24日，美国《每日新闻》驻香港通讯员从香港发出一封信惊呼：“大革命即将在广西爆发。”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852年8月，太平军刚入湖南，美国政府就派遣马歇尔（H.Mazshall）来中国。马歇尔是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1848年参加过侵略墨西哥的战争。他被“给予广泛的自由以处理在中国的变化不定的事件”。

当时，作为外国资本主义特别是英国侵略势力喉舌的上海《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连续发表社论，疯狂攻击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叫嚣干涉中国革命。

1852年10月16日的社论，污蔑太平军是“杀人的土匪”。

1853年1月15日的社论叫嚷“叛乱运动的最后成功将是敌视在中国的外国人的信号。如果外国不进行干涉，大清王朝被推翻，我们的损失将是很大的，我们的所得将是零”。

3月19日的社论公开鼓吹干涉中国革命，“希望英国政府将和皇帝一起，并帮助皇帝反对他的难以控制的臣民。最后的目的是签订一个新的通商条约”。

在《北华捷报》制造“干涉”舆论的同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Alcock）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他们策划干涉中国革命，但要压清王朝付出代价。

1853年1月3日，阿礼国给英国驻华公使、商务监督兼驻香港总督文翰的一份秘密报告，要英国政府“派出舰队占领镇江，封锁运河和长江的支流”。2月26日，阿礼国又给文翰寄去一份秘密报告，说：“最近叛军不可遏制地前进”，这个形势要求“阁下注意”，“英国用三四只兵船和士兵”就能够转变这个危险的局面。然后英国能够向清政府提出它要求的条件。这“不再是一个用武装调停或干涉以增加我们的利益的问题，而是一个如果不采取这样果断的行动，我们已经获得的商业和财源收入的利益是否可以不被无政府状态完全摧毁的问题”。3月3日，阿礼国再一次告诉文翰：“列强联合起来，或者是不列颠一国”，“当中国皇帝还处在能够缔结条约的地位时”，从他那里取得如下让步，无限制地进入内地和沿海的一切港口：“在北京建立直接的关系……以及鸦片贸易合

法化，这一切可以在两个月内取得。”

但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扼杀新兴的革命运动的企图并没有得逞。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太平军胜利进军，外国侵略者吓得不敢动手。

1853年3月25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官密迪乐（T.T.Meadows）向阿礼国报告说：“清朝皇帝在中国南半部之权力已完全丧失，无可恢复了。”文翰得到这个情报，大惊，在3月28日就给英国首相罗塞尔（Lord.J.Russell）一封信说：“在等候政府命令期间，我已决定：在任何形式之下，绝不左袒中国政府而加以干涉。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干涉，虽或在最初时可以得到完全不同之结果，但是，结果则是延长中国的内战而已。”1853年8月4日，文翰给英国外相克拉兰敦（Earl of Clarendon）的报告中进一步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我看不出外国怎样能从根本上救助皇军”；“就说给皇帝援助吧，那必须是很大规模的援助，如果‘叛党’的势力广泛而辽远地扩张起来，人民大众又普遍地愿意拥戴他们为统治者，这种大规模的援助也是没有效果的。花了大量的金钱，又达不到目标，只不过面对‘叛党’，把我们自己送上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而已”。

第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与清政府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清王朝暂时还不愿付出重大代价以取得外国资本主义的支持。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迫使清王朝签订了南京条约。可是，由于战后人民，特别是广东人民的英勇斗争，由于清王朝力图维护自己的“大国体面”，和对外国资本主义存在许多疑虑，直到50年代，清王朝并没有完全屈服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炮舰政策”。1850年9月29日英国首相巴麦尊（H.J.T.Palmerston）疯狂叫嚣：“我清楚地看到，我们被迫再打击一下中国的时刻正在迅速到来……口头警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他们很少注意语言。在他们接受意见以前，不仅要看到手杖，而且要让手杖打到他们的肩膀上。”直到1853年8月4日，文翰给克拉兰敦的报告中仍然说：“和清朝皇帝打交道，我们会发现他和从前一样傲慢自大，反对和我们扩大中外关系。”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说：“列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强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在1853年太平军第一次胜利高潮的时候，正很快临近一个危急阶段。外国人所怀的不平，简单地说：（一）商业社团，特别是英国商业社团，对于条约中的权益始终不满意……厦门、福州和宁波……已经令人失望。一般的情绪是：非将中国完全开放通商，则不会令人满意。（二）争取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失败正激怒着从事该项贸易的人们……（三）广州城依旧深仇似海，它的城门紧闭，它的居民怒容满面……（四）1850年即位的新皇帝时代，是看得出以公然排外的情绪为特征的。”丹涅特的这段话是从外国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但是，这些矛盾不解决，侵略者的欲望得不到满足，镇压中国革命的代价索取不到，他们是不会帮助清政府镇压革命的。

第三，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军抱有幻想。

当时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于太平军抱有幻想。他们幻想从太平军手中取得已经和尚未从清政府手中取得的特权。伦敦布道会的麦都思牧师（Rer.Dr.W.H.Medhurst）在1853年翻译和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印书以后，高兴地叫道：“多么好的一个道德革命！”当时，有人预测太平军成功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能够得到的利益有：“这个国家将对传播圣经和福音开放”；“偶像将被用强烈的手段打倒，同时基督教徒的安息日将作为休息日被建立起来”；“中国将充分地向我们的商业、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珍奇的事物和我们的文明的一切影响开放”。文翰给克拉兰敦的报告中说：“我也认为遇有机会和叛党协商时，我们从叛党手里所可获得的政治与商务利益，也大可超过皇党。和叛党交涉，我们要对付一班新人，直到今天为止，就我们所知道而论，这些人并不像不向我们就范的样子。”1853年5月30日，马歇尔在给美国国务卿麻西（W.L.Marcy）的报告中也说：文翰“处处为英国将该青年政权置诸卵翼之下制造机会”。既然存在着这些幻想，在勾结清王朝公开出兵干涉太平天国革命问题上就不能不有所犹豫了。

把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办不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很快干了两件事：一是到太平天国统治区搜集情报，妄图扭转太平天国的斗争方向，从革命农民手中取得侵略特权；二是积极进行“修约”活动，压清王朝进一步向侵略者屈服，出卖民族的主权。在第一件事方面，侵略者陆

续到天京进行活动。

外国侵略者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擅自闯入长江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破坏。太平天国革命兴起后，最早窜到天京的是英国驻清政府的“公使”、商务监督和香港总督文翰。他本来长期驻在香港。1853年3月21日，他赶到上海。4月20日，他从上海向英国外相克拉兰敦报告：由于“严重的局势”，他较长期地留在这个重要的港口是必需的。他说：在上海的外国团体已经“决定由他们自己组织一个自卫的组织，以便更好地保护他们的住宅和财产，并在司令官费士班（E.G.Fishbourne）的指挥下为保卫外国的地段做进一步的准备”。文翰还认为不到天京亲自侦察一下太平天国的情况，“对事件的可能进程作出任何清晰的估计”是不可能。

4月22日，文翰离沪，乘神使号（Hermes）兵舰沿长江驶向天京。动身前，他向克拉兰敦发出报告说：“由于对叛军对待外国人的意向究竟如何还弄不清楚……我认为应该立刻乘神使号兵舰进入扬子江。”

4月27日，文翰到达天京，他随即派出翻译密迪乐拜见北王和翼王。当密迪乐谈到英国政府对中国农民战争的态度时，太平军领袖“以充满自信心之冷静态度答曰：‘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这个态度表达了太平军的爱国立场和对战争的信心。但是当了解到侵略者也信奉基督教时，韦昌辉就把手搁在密迪乐的肩膀上说：“同我们的一样！同我们的一样！”“我等今后不特彼此相安无事，而且还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反映了他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是缺乏认识的。

4月28日，文翰把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中文本，赠送一份给太平军，目的在于使太平军“各首领明了英国政府与现时中国政府订有条约及该成约之详细条款”。这也就是幻想太平天国承认这些屈辱条约。文翰还进一步恫吓太平军说：“敝国与中国政府曾签订条约，有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经商之权利，如贵军或其他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对于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也必采取与十年前抵拒各种侵害之同样手段施以抵拒；彼时曾将镇江、南京及其附近各城占据，并签定和约。”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月29日，太平军赖检点会见了文翰，约好次日会见北王和东王。但是，30日一早，文翰却变了卦。他托言“风雨大作，天气不佳”，不肯上岸。他命令翻译密迪乐交给赖检点一封照会，照会的主要内容是打听太平军是否决定进攻上海。照会说：“敝国在上海建筑有住宅、礼拜堂、货栈等，且有许多英船常来上海口岸。贵军既已到南京，现距上海不远，我闻贵军将有进展到苏州、松江及其附近各地之企图。在此情势之下，我等急欲明了若贵军果进抵上海，则对于与英侨有关之行动，所抱之精神为何如耳。”

5月1日，太平天国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出了复照。复照没有理会英国侵略者的恫吓，也没有回答是否进攻上海。文翰来照要求太平天国承认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复照也没有理睬它。

英国侵略者的恐吓和讹诈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接着，密迪乐、斯勃里特、威廉等会讲中国话的英国侵略分子又到镇江搜集情况。他们搞到了关于太平军北伐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了解到当时太平军并没有进攻苏州和上海的意图。

文翰综合了他和他的随员所搜集到的情报，作出自己的结论：“如果叛军成功，至少传教士的活动可望获得完全的容忍。当他们得势时，他们看到外国人一般都和他们信奉同样的教义，可能对外国人抱友善的态度。他们无疑是会允许通商的，不过从他们的出版物以及他们的行为看，我们可以推断他们将严禁鸦片——不像现在这样的有名无实，而是真正的禁止……目前惟一可行的政策，是保持不卷入这一斗争中，力避与双方发生正式的联系，但（在中国的）外国人必须准备好足够的武力，来击败叛军可能发动的对他们的任何攻击。”1854年2月，包令（J.Bowring）代替文翰担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商务监督和香港总督。他到任以后，看到太平军势力迅速发展，清王朝危在旦夕，又决定派人到天京侦察。1854年6月15日他派遣麦华陀和卢因?包令（Lewin Bowring）乘兵舰响尾蛇（Rattler）和冥河号（Styx）从上海出发赴天京。太平天国领导人吸取了前几次斗争的经验教训，拒绝和侵略者会面。卢因?包令等以响尾蛇号舰舰长麦勒西（Mellersh）的名义给东王杨秀清写了一封信，要求买煤，也遭到拒绝。他们企图把响尾蛇号兵舰开

近太平军储煤的地方，太平天国战士整装以待。麦勒西向太平天国提出31个问题，请求答复。东王杨秀清等人“闭户三日”，起草了《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

这个照会涉及太平天国的各项制度。但是，它集中地阐述了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

接着，美国、法国侵略者也闯到了天京。

1853年12月6～14日，法国驻清政府的公使布尔布隆（M.de Bowrboulon）乘兵舰贾西尼号停泊天京八天，目的也是搜集尽可能多的关于太平天国的情报。

早在1853年4月2日，美国驻清政府公使就乘色士奎哈那号兵舰离开上海，想到天京搜集情报。他是最早企图到天京的外国侵略分子。可是，中途兵舰搁浅，被迫返回上海。

1853年5月5日文翰从天京回上海。6日，马歇尔去见他。文翰在马歇尔面前，大肆攻击太平军只有破坏活动，没有建设活动。这时，马歇尔已形成他自己的见解。他说：“我认为，我不能期待这些叛军成功以后，会有任何很有益的转变。”

7月10日，马歇尔提出美国政府干涉太平军的建议。他认为，维护清王朝的稳定，是“美国长远利益的目的”。但是，马歇尔的对华政策有他的前提，这就是清政府要允许宗教自由、通商自由和向美国开放扬子江。

麦莲（R.M.Mclane）继马歇尔为美国驻华公使，他于1854年4月到达上海。他和清朝官员第一次会面时即表示：“各国仰蒙大皇帝天恩，得在中国海口通商，俾有利益，实深感戴。现在贼匪据扰沪城，以致中华税务有碍，各国贸易有损……各国官商未能帮同剿贼，更感惭愧……刻下本公使亲自来沪，欲往镇江等处，察看贼匪情形。如果有可办之处，可以商量。并欲为整顿商务，使中华税务有盈无绌，方为安心。”

1854年5月22日，他乘色士奎哈那号从上海出发。25日到镇江，太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平天国江防部队开炮制止它前进。麦莲被迫停舰，派少校杜耳、翻译裨治文等上岸拜见太平军殿左五检点吴如孝。吴如孝要美舰停泊镇江，俟禀告东王，再去天京。27日美舰擅自开往天京。31日又侵入芜湖。6月2日返上海。

麦莲的一个随员在1854年6月24日的《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说：“我们得到许多事实，足以证明太平军已统治全国之大部——其领域之广，足以保证其最后的成功。他们已占有长江，远至鄱阳湖，或至上游更远的地方。”但是，美国侵略分子又不甘心中国人民的胜利。他们叫嚣“很可能是西方国家最后被迫干涉，使这次革命有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的方向”。麦莲根据他自己调查的结果，坚决反对承认太平天国，主张推行马歇尔提出的政策。他认为：尽管太平军控制了镇江以上400多英里的土地和1/5的人口，但是，太平天国不会履行现有的清政府对英、法、美三国签订的条约。他认为太平天国比清政府更难控制，他们对外国不会有像现在的清政府做过的那种让步。

三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太平天国统治区活动一番以后，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见有三点：第一，太平天国很强大，外国资本主义无力进行武装干涉；第二，太平军不会如同清王朝那样向侵略者屈服；第三，要和清朝皇帝打交道，压清王朝出让更多的国家主权和利益，等清政府屈服以后，再来对付太平军。

因此他们不得不宣布对太平天国采取“中立”政策。

“中立”政策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第一，所谓“中立”政策，就是外国侵略者等待新的机会干涉中国革命的政策。太平天国革命取得胜利意味着侵略者从中国领土上走开，因此，侵略者决不会对革命采取“旁观者”的态度。暂时不能动手镇压革命，就等待新的干涉机会。1853年8月4日，文翰在给克拉兰敦的信中说得很露骨：“我确实以为在目前我们对于叛军的将来动向与北方的局势并无积极的认识，因此我们所可作为者，也只限于注意局势的发展。多等一些时候，如果不是惟一的政策，也是最聪明的政策。”当时在伦敦出版的一份杂志上有人写道：西方列强专心于在克里米亚的战争和在中

国的修约，对于太平天国革命，采取了“等着瞧”的政策。“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当它出现任何缺口时，就夺取利益”。

名为“中立”，但倾向性是很露骨的。

从马歇尔到麦莲，美国执行的都是“亲清帝国”的政策。“中立和不干涉”不过是表面的装饰。不列颠保持“中立”，但是，它又主张“与清朝皇帝陛下联合”。

第二，所谓“中立”政策就是保持侵略者在中国已经取得的特权的政策。1853年5月20日，英国议会下院开会，外交大臣答复质询时说：文翰将去上海，英政府已颁发的命令是：“应该采取足够的防卫措施以保护英国人民（在中国）的生命财产。”这就是文翰在1853年5月7日提出的“武装中立”政策。当时文翰把神使号兵舰和一些其他兵船留在上海。他还准备从印度和驻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舰队中抽调船只来上海，以加强对付太平军的武装力量。

1853年4月7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歇尔伙同法国代表，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宣称：中国皇帝已经用条约保证两个国家公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外来武装占据租界，也不允许勒索居民的财物。违反者将受到武装反击。显然，它是针对太平军的。

与此同时，1853年4月8日在上海，在威妥玛（T.F.Wade）指挥下，一个英国人的“上海商团”（或称“上海义勇队”）组织起来了；美、英、法共同策划的“协防委员会”也建立起来了。不久，他们又挖掘互相贯通的宽阔壕沟，并在租界周围建筑栅栏。这些都是用来对付太平军向上海进军的。

第三，所谓“中立”政策，就是采取除大规模武装干涉太平军以外的各种方式瓦解中国革命的政策。当时香港英国当局公开宣布：“凡欲沽买大炮火药炮码等，每次须由刑讼司正使或两位绅士请领牌照，方准发卖。”当时谁能请到香港刑讼司正使或两位绅士代领“牌照”呢？显然只能是清统治阶级而不是革命的农民。这个条例实质上就是侵略者公开表示准许清政府购买它的大炮和火药，曾国藩的湘军一开始就是用洋炮武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装起来的。1854年8月，曾国藩对咸丰皇帝说：“两广督臣叶名琛购备洋炮，为两湖水师之用，现已先后解到六百尊来楚，皆系真正洋庄。”1854年广东天地会起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英、美、法三国侵略者却不断以大炮、火药、粮食运入广州城，接济被围困的清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两广总督叶名琛是一个封建顽固派，他是讨厌洋人的。1853年到1855年，上海小刀会起义也是被这三个侵略者镇压下去的。一位西方资产阶级作家说：镇压小刀会的重要性在于“为外国干涉创造了先例”。

“在中国内战中，英政府宣布中立，但未曾恪守。”当时在中国活动了12年的史卡斯作了最准确的结论。

外国侵略者在1853年宣布的“中立”政策的实质既然如此，一旦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或者太平军的进攻矛头指向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而外国侵略者又能够调用一批武装力量时，他们就会撕破假中立的面具，对太平天国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

再看沙俄的表现。1854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兼该地区俄军司令官穆拉维约夫搞了一个侵略中国的“条陈”，主要内容如下：

“总督应遵照最高政府对于中国的下列意图行事：

（1）目前，中国的清王朝，求助我国才得以保持王位，保持帝国的统一，也才可能对我国有利。因此……如清王朝有可能维持下去，则应设法使它向我国求援，然后我国出兵协助。

（2）假如清王朝大势已去，总督一方面应采取措施，保障我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安全，另一方面……并向清朝皇帝说明：他将得到俄国的保护，俄国将以武力保障他的帝位代代相传，永远不受侵犯，但我们必须在满洲……设立贸易机构，以此作为交换条件。

（3）一旦中国的政府发生变动，也不应容许中国的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俄国的保护。假如蒙古希望加入俄国国籍的意愿表白得明显，那就没有理由不让我国毗邻地区的居民

实现这一正当要求……

（4）中国一旦建立起新政权，则应设法同它建立友好关系与贸易关系。一开始就应坚决要求……中国一切港口对我国船只开放，要求中国派遣外交代表团赴圣彼得堡详细地商定我国同新政府的关系。”

不需要注释一个字，老沙皇仇视中国革命，妄图乘机侵占中国领土主权的野心暴露无遗。它要出兵干涉中国革命；它妄想霸占中国东北、蒙古地区；它还要侵入中国一切港口。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五 建都天京后的军事活动

1 北伐

太平军攻克南京后，钦差大臣向荣很快就在东郊孝陵卫扎下了“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琦善也率兵万余在扬州城外扎下了“江北大营”。不过，当时在广大地区存在着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北方，清咸丰三年正月（1853年2月）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路过清江浦、徐州一带，也不得不承认“饥民夹道，愁苦之声，颠连之状，惨不忍言。越日渡河，行经邳州、桃源、宿迁等处，沿途饿殍，市井街巷多弃尸。询之土人，皆云前年河决丰北，去年塞而复决，死者过多，而收葬者少”。在东南各省也是一派动乱景象。太平军顺江东下，尚未到达南京，苏州城内官僚地主乱成一团，“人情惶惑……始自官署家眷先各远避，而绅富遂纷纷矣”。太平军克复南京、镇江、扬州以后，苏州、常州一带戒严，常熟“人心震动，讹言谣惑，道路纷纷”。“常、昭城内绅民士贾先将家眷移居乡村。二月二十七日寅夜，误传紧急，终夜迁徙，几成空城”。阴历六月，常熟塘桥、西阳、金村等处群众“多乘势而起。凡富户平日收租行势者，积怨乡农，因此私忿放火毁屋。或有渡江避出者，被候要路抢劫”。

在这样的形势下，太平天国领导人决定分兵北伐和西征。

北伐军主力部队于1853年5月8日，从扬州出发，它的主将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这是一支精锐的部队，并不是偏师。当时有人估计，这支主力的人数共有“二万，为二十一军”。据说北伐军在出发前接受了洪秀全、杨秀清的指示：“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糜时日。”北伐军基本上是按着这个原则来活动的。他们原定由扬州沿运河北上，经徐州丰工渡黄河。当时黄河尚未改道，由徐州向东入黄海。驻扎在清江浦（今江苏省清江市）办理黄河堤工的江苏按察使查文经捏造北方有十万清军南下的谣言，并要各地准备粮草，太平军一时分辨不清，信以为真，故绕道皖北北上。这一支太平军经仪征、六合到天京对江的浦口，会合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殿左三检点朱锡琨所部，于5月13日由浦口分批北上。在乌衣一带击败察哈尔都统西凌阿的马队，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连克滁州、定远，5月18日占临淮关。周天爵有重兵把守宿州，北伐军遂由临淮关向西北进发。5月28日攻克凤阳府，接着，占领怀远、蒙城；6月10日，克皖北重镇亳州。这时活跃在河南的捻军主动与北伐军联系配合。6月13日，北伐军抵达河南归德（今商丘），“城上官兵因不敢敌，即下城开门”，大军入城。在归德缴获火药二万余斤，铁炮无数。北伐军想从离归德城西北四十多里的刘家口渡黄河，因船只都被清军抢走，“在此无船，难以过江”，因此，又向西走。“所过州县，绝无拦阻”，先后占宁陵、杞县、睢州，经陈留，于6月18日抵河南省城开封东18里的太平岗。当时开封“城外深沟两重，周围并无房屋，离黄河二十里，亦无船只”。北伐军没有攻打开封，南走至朱仙镇。6月20日，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等在朱仙镇向天京发出《北伐回禀》。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当北伐军进入淮北以后，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兵将日日加增，尽见骑马骡者甚多”。人民群众还以自己的物资，支持大军北上。

6月22日，北伐军至中牟，一路向西经郑州、荥阳，25日至汜水，当时汜水有渡船大小七八十只在河中未收，太平军遂用这些渡船从28日起在汜水口陆续渡河。跟在北伐军后面尾追的已革黑龙江都统西凌阿和新调来阻截北伐军的江宁将军托明阿、贵州提督善禄等部清军于7月4日赶到。因船少人多，太平军“未及渡河者尚有千余人”。一说“过河者约三四万人，未过河者亦约二三万人”。这一部分太平军“余氛尤足蔽日”，因敌追军赶到，渡河不得，转而南下。7月8日克密县，一路猛冲，取长葛，围许州，趋临颍，过郾城、西平、确山、罗山而入湖北之麻城。8月3日到达麻城之宋埠，8月10日克安徽英山，11日到达太湖，与西征军会师。

渡过黄河的北伐军于7月2日破温县，8日开始围攻怀庆府（今沁阳）。“怀郡殷实，且产火药兵器”，北伐军攻打怀庆，目的在于取得补给。

清怀庆知府余炳焘、知县裘宝镛闭城顽抗。7月13日，清政府派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理藩院尚书恩华及江宁将军托明阿为帮办，全力对付北伐军。7月15日，托明阿、西凌阿、善禄的追

兵，渡过黄河赶到怀庆城外。不久，钦差大臣胜保、山东巡抚李德“督带北直劲旅六万”，也到达怀庆城外。

北伐军围城近60日，把敌人打得狼狈不堪，敌人自供：“城内无粮，已食黄豆，再围三日，则不可问矣。”太平军为抢时间北上，于9月1日“黎明解围西去”。9月2日破济源，4日，由太行山小径入山西境，连克垣曲、绛县、曲沃、平阳（今临汾）、洪洞、屯留、潞城等城。复由黎城县折回河南，破涉县、武安，于9月底进入直隶境。

9月29日，北伐军由山间小路突袭河南、直隶两省的锁钥重镇——临洺关。钦差大臣讷尔经额及总兵经文岱所部万余清兵全部溃败。讷尔经额本来在河南守怀庆。怀庆解围后，他昏昏然“督凯旋之军万余人”回防直隶。在他到达临洺关的第二天，太平军乘其不备，来了一个突然袭击。清朝官兵万余人仓皇失措，全部溃散，讷尔经额率几十个人逃进广平府城，关防、令箭、军资、军书等物全部丢失。

临洺关大胜以后，北伐军连克沙河、任城、隆平、柏乡、赵州、栾城、藁城、晋州、深州等县，10月13日进至距保定60里之张登镇。

北伐军的胜利，使清廷惊恐万状，有人记载：“炮声如雷，京师震动，都中大员家眷及官绅商民无不鸟兽散。正阳门外大市若荒郊无人迹。”咸丰皇帝召集高级官员会议，“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有人统计，自咸丰三年（1853）春以来，京官之告假出都，富民之挈眷外徙，总计不下3万家。各街巷十室九空，户口日减，即如北城，向来烟户最繁，咸丰二年，有18000多户，这时仅剩8000多户。

北伐大军在敌人心脏地区的猛烈进攻，不仅在军事上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在财政经济上也使它罗掘殆尽。清政府承认：军兴三年以来，糜饷已达2963万余两。至咸丰三年六月（1853年7月），部存正项待支银仅22.7万余两。但是，清王朝是不甘心失败的，纠集了一切可以纠集的亲信力量以对付北伐军。僧格林沁和胜保的两支军队成为北伐军面临的重要对手。

胜保率所部亲军于10月13日到达保定。太平军改道由张登镇折回深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州，欲乘虚东进夺取天津，然后进攻北京。10月22日从深州出发，25日占献县，旋占交河，27日攻克重镇沧州，29日占领静海。李开芳又率领一支北伐军进至独流、杨柳青。10月30日北伐军进攻天津，离城仅10里。

当时，天津的官员士绅拼死抵抗。他们招募人员组成团练武装。他们还破坏运河堤岸，使“运河之水大至，环城数里，地洼下，皆成巨浸”。北伐军的攻势被阻。接着僧格林沁和胜保的两支军队又先后赶到，北伐军被迫分兵固守静海、杨柳青及独流三处，互为犄角，由进攻转为防御。

这时，节令已届隆冬，南方将士不习惯于万里冰封的北国气候，粮食衣着都遇到极大困难。在外无援兵，内缺粮草火药的艰苦条件下，北伐军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他们屡次出击，重创敌军。后来，为了收缩战线，主动退出杨柳青，林凤祥固守静海，李开芳固守独流。1854年2月5日，因粮食极度短缺，他们又从静海、独流突围，步步为营，逐步撤退，历经大城、束城镇、辛庄等地，于3月7日攻克献县，3月9日抵达阜城。在阜城，北伐军攻占附近村庄，密布鹿角、树栅五六层，固守待援。北伐军统帅之一的吉文元在战斗中牺牲。

在天京，洪秀全得到北伐军被阻的消息后，很快组织了北伐援军。

当时，太平军西征也受到挫折，天京又因向荣江南大营的牵制，可以抽调的兵力不多。因此，太平军不得不放弃扬州，调守扬州之兵北上。

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从扬州撤退后，于1854年初受命北上援林凤祥、李开芳等。同行的有冬官又副丞相许宗扬、陈仕保、黄生才等。

北伐援军于1854年2月18日占领正阳关，24日占颍上，3月1日占蒙城，经亳州向西北进击。3月6日克复河南永城。复由永城夏邑进入砀山县境。3月14日至16日由萧县西北之包家楼、蔡家庄等处扎筏渡黄河。3月17日攻占丰县，随即进入山东省。山东敌军闻讯，被迫分兵南下，巡抚张亮基带德州兵趋兖州，将军善禄由阜城分兵趋曹州。

北伐援军入山东后，连克金乡、巨野、郓城、阳谷、莘县、冠县，3月31日到达临清。临清“州为漕运咽喉，漳河载河南粮西南来，会通河载南数省粮东南来，至州城西南与漳合。每漕艘往来两河，帆樯络绎，货贿盈街衢。州城南稍西偏为土城，仅有城垣形迹，夹会通河至漳河西，居民市肆，栉比鳞次”。4月12日，太平军传令土营在南门外挖地道，次日丑刻，大军自西门外将城攻开。

北伐援军如果继续前进，很快就可以与北伐军会师。敌人惊慌失措，说太平军“锋焰逼人，势难制其北上”。咸丰帝也惊呼：“将毙之虎，又添双翼。”

正当北伐援军胜利前进的时候，情况发生了突变。

4月23日，临清太平军竟全部南撤，退入李官庄。北伐援军为什么南撤，使与北伐军会师的希望毁于垂成？目前还没有确切可靠的资料说明。一种说法是，清临清知州在太平军进入临清前夕，把粮食烧了，因此北伐援军缺乏粮食，难以“久据”，同时，北伐援军进入山东境后，吸收了大量捻军、幅军和“各路土匪”，造成部队组织极为不纯。其中一些人“腰缠金银”，不愿继续战斗，不听指挥了，这一小撮坏人鼓噪部队南撤，造成失败。北伐援军领导人曾立昌于1854年5月6日在丰县附近被敌人杀害。陈仕保于5月14日在安徽凤台之展沟集附近阵亡。许宗扬于1854年8月败回天京，“收入东牢”。

坚守阜城的万余北伐军英勇抵抗僧格林沁的围攻。5月2日夜半，守军填壕纵火，突围南下，想接应援军。6日夜五鼓，进入吴桥境，克东、西连镇，分守灶户、陈庄等八处。5月10日，僧格林沁追到连镇河东，5月19日，胜保南下之军也回到连镇，在东南扎营。双方相持到5月28日，李开芳率马队2000多人，分兵经宁津、吴桥、德州、陵县，克恩县，5月30日再克高唐州。大概在这个时候，李开芳知道北伐援军已经失败，遂守高唐州，不再南下。胜保、善禄等移临清之军攻高唐。僧格林沁则围攻连镇林凤祥部。

林凤祥在连镇，一直坚持到1855年3月7日。敌人攻陷连镇后，林凤祥因重伤被俘。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连镇陷落后，僧格林沁移师高唐州。胜保因久攻高唐不下，被清廷撤职，押往北京问罪。1855年3月17日，高唐守将李开芳突围进至茌平冯官屯。5月底，僧格林沁放水淹冯官屯，守军不敌失败，李开芳被俘。林凤祥与李开芳先后在北京就义。

北伐军时历2年，地经6省，行程5000多里，在外无援兵，内缺粮草弹药的艰苦条件下，活跃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他们在北方广大原野，散布革命火种，启发各族人民的斗争觉悟。在山东，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长毛哥，长毛哥，一年来三遍也不多！”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镇江、天京城郊的战斗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敌人的江南大营扎在了孝陵卫一带。江南大营的任务，是进攻天京和镇江。

1855年2月，上海小刀会起义被中外反动派镇压下去以后，敌人从外部对天京、镇江的进攻加紧了。清政府命令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移师镇江。连同江南大营万余清军，进攻镇江的敌军达1万多人。

太平天国为解镇江之围，从西线抽调一部分兵力，由燕王秦日纲率领，包括冬官正丞相陈玉成、春官正丞相涂镇兴、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夏官副丞相陈仕章、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等将领在内，从天京出发东援镇江。1856年2月初，大军进至栖霞、龙潭一带。敌自东阳至下蜀连营30余里，企图抵挡。秦日纲与诸将会议，决定由冬官正丞相陈玉成乘一小船，冲过敌水师防线，直抵镇江，与镇江守将吴如孝会合。4月2日，燕王秦日纲大军与镇江城内吴如孝、陈玉成等东西夹击，大败敌军，焚毁敌营盘16座，援军东进到镇江城下，屯金山、金鸡岭、九华山脚。当日夜晚，太平军调齐船只，渡江到瓜洲，4月3日拂晓，向扬州土桥发动攻势，并摧毁敌虹桥、朴树湾、三岔河一带营盘120余座，托明阿败退秦家楼、蒋王庙。4月5日，太平军再度占领扬州，取得军粮运回镇江。5月27日，燕王秦日纲主力自瓜洲渡江进攻黄泥洲，29日克之，并猛攻高资清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自九华山带兵来援，“被天朝官兵四面围困，内外不通”，当场被击毙。同时毙命的还有京口副都统绷阔、知府刘有厚等。敌营盘七八十座被毁，残部逃回九华山。6月3日，秦日纲等率所部经下蜀、高资、东阳、石埠桥、甘家巷，扎营观音门、燕子矶一带。

这时，杨秀清决心割去江南大营这个毒瘤。他又从江西前线增调石达开东下。石达开率所部2万人经皖南芜湖、金柱关，于6月18日到达天京北郊，扎营姚坊门、仙鹤门、黄马群一带，与秦日纲大军会师。据向荣估计，当时石、秦两部太平军共有4万余人。6月19日，石达开、秦日纲分路猛攻仙鹤门、紫金山敌营。城内太平军也出通济门猛攻七瓮桥。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0日午后，一支太平军从灵谷寺后翻山直捣孝陵卫敌马队营盘，“四座营盘，均被焚毁”。洪武、朝阳等门亦有太平军分路出击，连破敌20余座营盘。接着，数万太平军，集中力量，攻击向荣大营，歼敌千余，向荣、福兴、张国梁等退至淳化镇，张国梁左脚被打伤。21日，向荣等复败退丹阳。江南大营第一次被打破。

杨秀清令石达开再度西上援武昌，秦日纲率太平军东进追击向荣残部。7月30日败张国梁于丹阳五里牌，8月9日向荣毙命。

天京巩固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六 天京事变与石达开的出走

1 天京事变的缘起

1856年，天京城内爆发了一场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互相残杀的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天京事变是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之间矛盾激化的产物。

首先，拜上帝的宗教宣传与传统皇权的矛盾潜伏着危机。

1848年，杨秀清、萧朝贵借冯云山被捕下狱，洪秀全又不能直接出面之机，取得了代天父天兄下凡的特殊身份。1852年9月，萧朝贵在进攻长沙时战死，天兄代言人一去不复返。天父代言人与天王冲突的可能性增大了。按照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宗教体系，上帝大家庭的尊卑高下依次为天父、天兄、天王以及杨秀清、萧朝贵等。天王洪秀全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是上帝派下凡掌管世间一切的真命天子。杨秀清是上帝的第四个儿子，当然地位低于洪秀全，应该听命于洪秀全。但是，杨秀清玩弄的天父下凡这套把戏，又可以在瞬间使杨秀清凌驾于洪秀全之上。东王以天父的身份出现时，当然是绝对的权威，至高无上的。这也就是，在太平天国，天父“托东王之口，教导兄弟姐妹”，“要知今日做事，皆听命于天父”，“故凡东王打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好；枷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好；杀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好”。生杀予夺的大权，又握在了东王的手里。天王与东王的关系在世间是君臣关系，这是很明确的。问题是东王具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殊身份，他一会儿为人，一会儿又为神，天王虽是一国之君主，但在宗教上却又是天父之子，当杨秀清为神（天父下凡）时，洪秀全得恭恭敬敬地跪在杨秀清面前，聆听福音、圣旨。宗教上的父子关系和世俗间的君臣关系发生矛盾冲突。这种体制给杨秀清以极大的方便，使他可以借天父之名为所欲为，而洪秀全只能隐忍退让。在建都天京前，为争取对敌斗争的胜利，杨秀清尚能收敛自己，顾全大局，假借天父的名义，维护洪秀全的地位和威望，神化洪秀全，支持洪秀全。建都天京后，天父下凡这种宗教形式，给杨秀清挑战洪秀全的君主地位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杨秀清权位欲望的恶性膨胀激化了矛盾。

洪秀全虽为太平天国公认的领袖，是“真主下凡”，主宰世间一切的。但在实际上永安建制后他已并不亲自掌管军国大事，杨秀清掌握了军政大权。洪秀全埋首于编纂颁刻官书，设计礼制，制订天王专制的运作体制，向臣民灌输天王是天下之主的观念，宣言自己的存在。他性格刚烈，传统皇权观念极强，但仍对杨秀清隐忍退让。以至当时的地主文人都有如下的看法：

“（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杨逆入奏，洪逆从无驳者。”

“洪秀全自入城后……以伪称天王，宜享天福，凡事皆不过问，权柄诿于军师便宜行事，殊不知洪实杨之傀儡也。”

“（杨秀清）自金田与天贼倡乱，渐揽天贼权，自广西至金陵，悉听其指挥，其伪谕皆署其伪号，天贼尸位而已。”

甚至有人怀疑洪秀全的存在，“或云系刻木偶为人，实无其人”。

虽然杨秀清完全掌握军政大权，宗教上又有天父代言人的特殊身份，但他仍不满足。他还破坏洪秀全仅有的一些权威，对君臣关系作进一步的调整。

以前说：“只有臣错，无主错”，后来改成“君有未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凡事尔想不到，宜与尔清弟（按指杨秀清）商酌可也”。实际上是要洪秀全听从他杨秀清。

以前说：“生杀由天子”，“臣不敬君失天偏”，后来改成“自今以后，兄每事必与胞商酌而后行”，意思是洪秀全每件事都要取得杨秀清的同意才可行。

以前规定：“内言内字不准出，敢传出外五马分；外言外字不准入，敢传入内罪同论。”但后来杨秀清经常以天父名义直接干预天王宫内事务，甚至把在天王府受到虐待的宫女调到东王府，完全不顾洪秀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的颜面。

最后，杨秀清对洪秀全的天子宝座也起了觊觎之心。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自己。1853年杨秀清在“东试”时出题：“四海之内有东王”。杨秀清还借出版《天父下凡诏书》、《天情道理书》、《行军总要》等官方文书的机会吹嘘自己。要人们相信从金田起义以来的全部胜利，“皆东王下凡教导”的结果，吹捧自己“功烈近乎前人，恩威超乎后世”。人们应该“各知感恩，力图报答”。其部属居然把“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的对联贴在护卫衙门的门上。杨秀清取洪秀全而代之的心情呼之若出，并且充满火药味。

再次，杨秀清对高级官员、诸王以至天王的欺压、侮辱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及李寿春听女官讲了“东王若升天，尔们为官的都难了”这句话，未予告发和驳斥，竟双双被处以斩首。黄仕珍、萧志胜，由于没有及时传东王宗亲带灵丹到府，以“怠慢东王罪”，黄竟被处以斩首，萧亦被锁押东牢。黄期陞“出言触怒东王”，被处以革职示儆。又如，有位参护李凤先，路遇东殿兵部尚书侯谦芳朝衣朝冠而来，李凤先没有让路，侯谦芳竟把他“带至东府，传鼓禀奏，东王闻奏，遂发义怒，令员将他杖责教导”。李凤先不服说：“打妖魔不是如此打法。”侯谦芳又将其情由复禀奏东王，“东王闻此禀奏，即令尚书将伊锁起”，以便明早让他自己亲自提审。第二天，杨秀清竟判李凤先为“死罪”。总之，一点小事，只要杨秀清看不顺眼，就要给予革职、杖责、锁押，甚至杀头的惩处。据记载，丞相以上的官员，因某种“罪行”而被杀、被关、被革职的有十多人，至于受杖责的那就更多了。

石达开每听到“天父下凡”都要“惶悚流汗”，害怕有灾祸临头。杨秀清滥施淫威，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凡东王驾出，如各官兵士回避不及，当跪于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斩首不留。”1854年5月，燕王秦日纲的牧马人某甲坐在门前，见杨秀清的“同庚叔”路过，没有起身行礼。杨秀清的这位“同庚叔”大怒，鞭某甲二百，并交送卫天侯黄玉崑，要他再打某甲若干棍。黄玉崑说“既鞭可勿杖”，转而劝慰。但这位“同庚叔”不服，居然向杨秀清控诉，杨秀清大怒，故意叫翼王石达开把其

岳丈黄玉崑逮捕，羞辱石达开。黄玉崑“闻而辞职”，秦日纲、陈承镕等听到这个消息也相继辞职。杨秀清更怒：“杖日纲一百，承镕二百，玉崑三百。某甲五马分尸。”刻意打压石达开、秦日纲、陈承镕。

杨秀清甚至对天王洪秀全也肆意欺压、侮辱。每当处理案件时，杨秀清故意和洪秀全作对。据记载：天王许可的事，东王必不可；天王欲杀的人，东王必不杀，“自示权由己出”；“自恃功高，朝见立而不跪，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冷不丁地，莫名其妙地发问“秀全，尔有过错，尔知么？”“尔知有错，即杖四十”，要杖责洪秀全。乙荣五年七月十九日深夜三更，杨秀清居然声称天父突然下凡，来到天王府，因朝门紧闭数重，洪秀全迎候来迟，天父于是就大发其怒，诏曰“咁久还不开朝门，真是该打！”这时，洪秀全刚到，见此情景跪奏道：“求天父恩赦小子迟延之罪！”杨秀清深更半夜急急来到天王府，仅仅是找洪秀全的妻子赖氏吩咐挑选娘娘、王娘之事。杨秀清竭尽打击洪秀全威信之能事。

杨秀清对其他势力的打压已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步，一有机会，将产生报复性反弹。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石达开出走

诛灭韦昌辉后，洪秀全把韦的首级送到石达开军营验视，以平其私怨。同时“收灭赏格，召之还”。11月下旬石达开回京。石达开在太平军将士中深得人心，“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石达开既执政，众心欢悦。当时外国观察家评论他说：“这一位青年领袖是英雄侠义，勇敢无畏，正直耿介的，正是全军的中坚人物，他的头衔称为电师，这真能表示他的军事行动。”1857年，在石达开执政下，太平天国扭转了由于天京事变军事上所处的逆势，取得了桐城大捷，在溧水也击败了清军的进攻。清朝安徽巡抚福济向咸丰皇帝奏称，石达开“为贼中主谋，本年围攻桐营，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虐焰复炽者，皆石逆之计”。

可是洪秀全错误解读了天京事变的教训。从此“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他提拔石达开为通军主将，主持军务，自己总揽军政大权。同时也封他的“又无才情，又无计算”的两个兄长为王，与石达开同理军政。朝中文武不满这样的做法，大家听翼王的，而对洪氏兄弟表示不满，这更激起洪秀全的猜忌和愤恨。他加剧对石的压制，以至“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石达开受制于平庸的洪氏兄弟，才智不得施展，又深受洪秀全的疑忌，大祸有随时临头的可能。自视甚高，抱负远大的石达开，选择了避祸出走，另创局面的道路。

1857年6月2日，石达开从天京出走，19日到达安庆。他发布文告，打出“出师再表真”的旗号，号召太平军将士随他“远征”。翼殿将士纷起追随，所守城池纷纷落入敌手。洪秀全面对急转直下的军事和朝内文武的压力，力图挽回分裂局面，下诏将洪氏兄弟王位去掉，并镌刻义王金牌一道，及朝内文武求救表章，送往安庆，但是石达开“并未受物，亦不允来”。以后洪秀全“百计迎回”，“其情词惨迫，反复不休”，但是，石达开义无反顾，“竟不复回”。石达开坚持分裂，既辜负了天国军民的期待，贻害天国，又最终葬送了自己。

石达开“将合朝好文武带去”，天京城内只剩下七八千精锐，“余皆老弱”。1857年10月，石达开进援江西，试图救出被围的临江、吉安翼

殿诸军。失利后，放弃江西基地，1858年春进军浙江，经略浙闽，后又转进江西，分兵经略广东、湖南。1859年5月，石达开部主力与湘军在湘西宝庆府激战两月余，“不能得手”，于是回师广西。石达开脱离中央后，一改常胜将军的形象，屡战屡败，部队给养困难，疾病流行，士气低落，而与此相反，1858年秋之后，洪秀全起用青年才俊，发愤图存，江北、江南大营相继被打破，天京政权有中兴之气。许多将领开始对石达开的分裂前景不表乐观。一些将士相继脱离。有的回朝扶主，有的流散。杨辅清等在福建时回归中央，1860年1月傅忠信、谭体元等率部回朝，3月余扶忠部下官兵也东归天朝，8月彭大顺、朱衣点、吉庆元等率部数万人东返，这是石达开部的最大一次分化，严重削弱了石达开的力量。

1861年10月，石达开出广西经两湖入川东，后辗转云贵，又入川西，1863年5月来到了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这里前有大渡河，左阻松林河，右临老鸦漩河，东南崇山峻岭，是个易于被围歼的险境。到达大渡河的当晚，“松林小河及大渡河水陡涨数丈，势难涉渡”。这时“达开妇诞一子”，石达开以为吉兆，下令庆贺三天，并休整补粮，这使敌方赢得时间，完成了包围。石达开以木船行筏抢渡，船筏或为对岸清军枪炮所毁，或为湍急的水流卷翻；又试着偷渡、抢渡松林河，未成，致书当地土司王应元许以重金，希望罢战、买路，不成，求其通商卖粮，又遭拒绝。6月9日最后一次强渡失败。土司军乘虚扑击，紫打地失守。石达开率残部奔至老鸦漩河，粮尽援绝，“进退守战俱穷”。

清军头目也看出石达开面临末路，“四面受敌，又困于雨，断桥不能渡”，于是参将杨应刚等在石达开驻营附近的洗马姑竖立起“投诚免死”的大旗，随即便“有李、刘二逆，奔附小河乞降”，又有“伪宰辅邹某先送家属为质，约为内应”。都司王松林等乘此亲赴石达开军营，直接出面诱降，借以动摇石达开及其部众之心。

这时，石达开的心情十分矛盾。开始，他立志“纵死湟江定不降”，誓与敌人决一死战；之后，又改变血战出险的初衷，企图诈降，谋求生路。但清将杨应刚自称奉四川总督骆秉章意旨招抚，并许诺，石达开放弃抵抗，即可退隐原籍，所部将士则遣散为民。石达开再次改变主意，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决定自投清营，以保全将士生命。当时，军师曹伟人就预料石达开上当受骗，即自刎而死。石达开致函骆秉章，提出“舍命以全三军”的建议，他“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翼王表示自己决不降清，不会做“求荣而事二主”的天国叛臣。但他不惜一死，请骆秉章转奏清廷，“宥我将士，赦免杀戮，禁止欺凌，按官授职，量才擢用”，并警告骆秉章，要“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诸约”。但他并没有等骆秉章复函表态，就于6月13日同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恩丞相韦普成并带其5岁儿子石定忠到了洗马姑清营。石达开一行到达清营，当即被羁。总兵唐友耕乘机捞功，从杨应刚手中截获石达开，所部2000余人也被押至大树堡，由唐部都司唐大有与副将张福胜等在四面驻军防守。6月17日，石达开父子和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等被押送过河，从而与2000多部众隔离开来。至此，石达开才恍然大悟，发现清将所谓的遣散、解甲归田的许诺全是谎言。6月18日，石达开父子及部将5人被押往四川省城成都。次日，知府蔡步钟等即密派各营过河，当即以火箭为号，会合夷兵，将石达开部将200余名，士卒2000余名围杀殆尽。偶有逃出者，也被夷兵追杀。

石达开在被押送成都途中，四川布政使刘蓉曾对其进行提审。石达开毫无乞活之意，历数太平天国的光辉历史，“其枭杰坚强之气，见于词色”。6月25日，石达开等人被押到成都。骆秉章问石达开：“尔欲降乎？”石达开毫不犹豫地答道：“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骆秉章又说：“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于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石达开听罢，哈哈大笑，毅然答曰：“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者为寇，今生汝杀我，安知来生我不杀汝耶？”骆秉章恼羞成怒，即令左右将石达开及其部将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以凌迟极刑处死。临刑之际，石达开神色泰然，从容就义。时年仅33岁。

天京事变中，韦昌辉的武装叛乱，石达开的分裂出走，严重地破坏和削弱了革命力量。李秀成形容那时的情形说：“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翼王将天王之兵尽行带去”，“军民之心散乱”。清政府乘机向太平天国进行反扑。韦昌辉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1856年12月19日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广提督杨载福、记名道李续宾等攻陷武昌，国宗洪仁政等

东退广济、黄梅；同时，汉阳守将秋官副丞相钟廷生亦退出汉阳城。12月26日，敌水师杨载福部驶至九江江面。在江西战场，湘军分路援救被围困在南昌的曾国藩。中路刘长佑、萧启江围攻袁州府，北路曾国华、普承尧、刘腾鸿等围攻瑞州，南路刘拨元、胡兼善等自桂东经崇义入赣南，与总兵寿山等据守赣州府。1857年12月27日，瓜洲、镇江同时失守。曾国藩得意地宣称“镇江、瓜洲，同日克复，金陵指日可克”。

[1] 关于洪秀全密诏韦昌辉回天京救驾一事，史学界有不同说法，本书采取其中的一种意见。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七 李秀成、陈玉成、林启荣等的苦战

1 为稳定江西、皖北战局而努力

天京事变以后，敌人趁势反攻，江西、皖北危急。太平天国通过种种努力，竭力挽回颓势。

在江西方面，洪秀全以九江守将贞天侯林启荣主持全省军务，林启荣“谨守江西”做出了艰巨的努力。“吉、袁、瑞、临、抚、建等府”的太平军“深壕密签，闭城坚守”；“近省之丰城、奉新、安义、靖安、建昌、德安等县”太平军据守城池，相互支援，一处有警，援兵四集。除袁州（今宜春）守将李能通于1856年11月叛变投敌外，直到1857年上半年，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守住了阵地。

在皖北战场，主持军务者为张潮爵、陈得才、梁立泰等。为了收缩兵力，太平军先后放弃三河、庐州、无为、和州、巢县等城市，坚守桐城、潜山，与安庆互为犄角。

洪秀全为了稳定皖北战局，派陈玉成从皖南宁国，经枞阳过江，1857年1月11日，攻破无为州。接着，他和从天京来援的迓天侯陈仕章会师，克复巢县。1月31日克庐江，并攻大关，抄过桐城，断绝围攻桐城的清军粮道。桐城守将李秀成乘机冲出，内外夹攻，大败清提督秦定三。陈玉成、李秀成等乘胜追击。2月27日克舒城，3月1日毙敌总兵郝光甲，3月3日克六安州。舒城、六安一带数万群众，参加了太平军。太平军还与皖北捻军张乐行、龚得树等取得联系。1857年2月，天王洪秀全封张乐行为征北主将。3月11日，陈玉成、张乐行等联合克复正阳关，18日克复霍邱。皖北形势复振。

1857年5月初，陈玉成率所部大军由英山攻入湖北，连败敌军。8月中旬，击毙敌总兵王国才于黄梅。12月底，陈玉成指挥大军分两路再度攻鄂，南路由受天福叶芸来和倚天侯陈仕荣率领，自宿松进攻蕲州；北路由陈玉成亲自指挥并联合捻军由霍山，经缘南商城进入鄂北，在德安、襄阳一带扩充部队，1858年4月底占领麻城、黄安。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向荣死后，清政府派和春为钦差大臣，张国梁为帮办大臣，重建江南大营。1857年六七月间，溧水、句容相继失守，敌人从淳化镇向天京进逼。同时，敌以主力攻天京东侧之重要据点镇江。1857年12月，坚守了四年零八个月的镇江失陷。对岸瓜洲同时为敌江北大营德兴阿攻陷。

镇江、瓜洲既陷，敌人以全力围天京。和春把江南大营扎在小水关，并于城西、城南、城东一带宽掘长壕，坚筑高垒。和春说：“此时金陵围攻，自城北之上元门至西路之三叉河、乐兴寺江干止，共长一百三四十里，大小营盘一百三十余座，兵勇约四万有奇。”德兴阿的江北大营也移到浦口，会同和春围攻天京。

为了解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决定先解决江北大营，然后再解决江南大营。1858年8月，在洪秀全同意下，李秀成召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镇举行军事会议。那时，陈玉成也由湖北罗田、麻城赶到，参加了会议。会上“各誓一心，订约会战”，攻打敌江北大营。

会后，陈玉成自舒城、三河发兵，8月23日攻克庐州，阵斩敌总兵肖开甲，安徽布政使李孟群溃退六安。9月，陈玉成除分兵一支北进占领店埠、梁园，攻定远外，亲自率领主力由界牌南下滁州、乌衣，占领东葛、西葛，与清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总兵鞠殿华等相遇。李秀成亦率所部自全椒到乌衣与陈玉成会合。9月26日，李秀成、陈玉成等大败德兴阿、鞠殿华等于滁州、乌衣，歼敌“三四千众”。次日，太平军挺进江浦县西北20里之小店，即古永宁镇，全歼敌援兵江南大营总兵冯子材所部5000人，李秀成、陈玉成复乘胜猛攻浦口德兴阿部，又歼敌1万余人，打死团练头子温绍源。德兴阿败逃扬州，被革职，敌江北大营被迫撤销。

陈玉成乘势收复江浦、六合，李秀成亦占天长，并再度攻克扬州，江北之敌望风披靡。

这时的江西战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敌人于1857年9月占瑞州，10月湖口也陷落，被阻隔三年的鄱阳湖内外湘军水师又合而为一。湘军矛头指向了九江府城。

太平军贞天侯林启荣坚守九江已有六年，他“以数千人，婴城种麦以为食，其守愈暇，频伤攻城军”。1858年3月湘军再度攻城，两次挖地道爆破轰城都被击退。1858年5月19日，湘军第三次从地道轰塌东南城墙一百余丈，守军在烈风雷雨中英勇巷战，贞天侯林启荣及元戎李兴隆等17000余将士壮烈牺牲。敌陷城后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彭玉麟招认：“直教殄灭无遗种，尸拥长江水不流。”

九江沦陷后不久，抚州、建昌相继失守，吉安府城亦于1858年9月21日被敌占领。1858年9月22日，湘军李续宾和江宁将军都兴阿部攻陷太湖，太平军守将受天福叶芸来退守安庆。

太湖陷后，敌分兵两路，企图攻打安庆。南路由水师提督杨载福、总兵鲍超等攻石牌、集贤关，从正面围困安庆，北路由李续宾带湘军主力袭庐州，企图切断安庆后路。11月3日，李续宾率领13营马、步兵，共5000多人，侵犯三河。三河守将吴定规坚守阵地并向天王告急。

三河镇在巢湖西岸，庐江之北，舒城西北，距庐州90里，为保护庐州之屏障。胡林翼称：“该处为水陆冲途，实扼庐州之总要，其屯聚米粮军火，即以接济庐州、金陵。”巢湖流域西部的物资，特别是稻米大部分先集中到三河，然后运往各地，因此，它是天京和庐州太平军粮食和军需物资的重要供给地。敌人叫嚷“非攻三河不可”。吴定规在三河筑城一座，砖垒九座，凭河设险。天王接到吴定规的告急报告，命令正在六合的前军主将陈玉成率师救援。陈玉成立即回兵西上，同时调驻守庐州的吴如孝、捻军张乐行率部南下接应，他还奏准天王调李秀成随后接应。

陈玉成自江浦、六合经巢县、庐江，直趋金牛岭，切断了李续宾后路。吴如孝、张乐行切断了舒城通三河的道路，李秀成进驻白石山，挡住东面去路。就这样设置了包围圈，李续宾成了瓮中之鳖。11月14日，陈玉成逼攻李续宾大营，次日李续宾试图进犯金牛镇。陈玉成率主力乘大雾弥天绕至清军之后，出敌不意，勇猛冲杀。三河守将吴定规也挥军冲出。敌人大败。李秀成在白石山听到金牛镇炮声不绝，亦带领所部向三河靠拢。陈玉成以优势兵力四面环攻，破敌军7营。是夜三更，击毙湘军统帅李续宾及曾国藩的胞弟曾国华等。据统计清军被打死6000余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人，湘军精锐，损失殆尽。湘军老巢湖南湘乡几乎是无处“不招魂”。曾国藩闻讯“哀恸填膺，减食数日”，他说：“敝邑（湘乡）弁勇，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虽多方抚慰，而较之昔日之锋锐，究为减色。”胡林翼也说：“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士，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

三河大捷以后，太平军分路挺进。陈玉成绕舒城，出大关，由孔城进攻桐城，11月24日大破湘军总兵赵克彰等，遂克桐城。太平军乘胜南进，清江宁将军都兴阿大惧，撤安庆围，由石牌败退宿松，陈玉成跟踪追击。李秀成也率领所部自三河到庐江、界河、桐城，并收复潜山、太湖。下载资料请关注我的博客https://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859年3月，陈玉成自安庆北进，占六安州，随即进攻庐州官亭署安徽巡抚李孟群大营。3月20日，活捉李孟群。3月底，陈玉成自庐州梁园攻护城，大败钦差大臣胜保，阵斩已革南阳镇总兵柏山。4月初，再败胜保，阵斩知府颜怀忠等，克护城镇。

陈玉成威镇淮北，使皖北战场出现了较好的形势。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攻占苏南、浙江地区

1860年5月11日，以天京解围，洪仁玕等登朝庆贺，并商量下一步的战略部署。

当时的形势是：在西线，从1859年开始，曾国藩和胡林翼就决定以主力进攻安庆。江南大营崩溃以后，清政府以全力支持湘军镇压太平天国。1860年6月8日，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署两江总督的兵部尚书衔，8月10日实授两江总督，并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长江南北两岸，水陆各军均归节制。当时，清政府的意图是叫他赶紧移师江苏，保卫苏、常，曾国藩则把安庆的得失，看做是“关系天下安危”的头等重要问题，他决心全力争取安庆，然后沿江而下攻取天京。

对太平天国来说，安庆在战略上是很重要的。保有安庆，天京就有了屏障，长江水路就可以畅通，巢湖平原的粮食也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天京，保证军需供应。安庆同时也是和皖北捻军联络的据点。当时，曾国藩已经成为太平天国的最主要的敌人，他又决心全力进攻安庆，围剿和反围剿的焦点就在安庆。因此，太平天国的战略中心应该移到西线。

英王陈玉成主张救安庆，攻打曾国藩的湘勇。洪仁玕、李秀成则认为江南大营既破，苏、常、上海一带敌防务空虚，“乘胜下取，其功易成”，然后回师安徽，“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

天王洪秀全赞同并批准洪仁玕、李秀成的意见，命令陈玉成、李秀成等率领大军东进，先锋为陈玉成部下骁将靖东主将刘玱琳。天王特别关照“限一月肃清回奏”。洪秀全的这个限期很重要，它的用意是在不要与敌纠缠，以致延误时间，速去速胜，然后回师西上。重点还是在西路。东进是为西上所做的准备工作之一。

太平军由天京经句容向丹阳进击。英王陈玉成称：“十年，攻破金陵长围，将张国梁追至丹阳，落水而死。”丹阳战斗发生在5月19日，敌

兵死者万人。除张国梁当场毙命外，和春、许乃钊，“以十二骑由小河奔常州”。5月26日，和春逃到浒墅关“悔恨交集”，“以烧酒吞服洋烟”而死。

丹阳大胜后，敌东路已无主力，陈玉成渡江攻扬州，东路最高指挥权交给了李秀成，但先锋仍然是刘玱琳。这时太平军势如破竹，席卷吴中，人民群众热烈响应，占领了江南广大土地。26日克常州，30日下无锡。6月1日，进抵苏州阊门。苏州城乡居民在门口张贴“同心杀尽张、和贼”的标语，热烈欢迎太平军。苏州郊区“由陈湖出塘浦至谢塘”，“乡人持械，夹岸斩杀”敌溃兵。6月2日克复苏州府城，江苏巡抚徐有壬毙命，清军投降者达五六万人。同日，克江阴。

这时，距从天京出师，还不到20天。可是，到了苏州，李秀成的军事行动停顿下来了。他没有能够乘胜快速推进。原因何在？很可能是李秀成忙于招兵买马。他说：其时“忽有两广、两湖、三江义士，在清朝为官者数百员，统带兵勇两三万前来投诚，当即留营效用”。因此，他延误了时间，直到6月15日才占领昆山。17日克太仓，22日克嘉定，30日攻青浦。青浦人民内应，“城上白旗一扬，四面火起”，顷刻攻克。7月1日克复松江，进抵上海城外。

1861年7月初，李秀成率大军回师江西、浙江。李秀成自称，在湖北招兵“大概三十万之数”，在江西又有和石达开决裂东返的太平军和广东北上的一部分天地会起义军共20余万人加入他的行列，如加上他原来统帅的部队，总数当在70万上下。

这70万大军，自西向东，横扫敌军如卷席。经衢州，过兰谿，入严州，克新城、临安、余杭，进攻杭州。12月29日克杭州城，31日破杭州满城，清巡抚王有龄，将军瑞昌均丧命。

克复杭州后，太平军分路进攻，连克各州县。1862年1月17日，曾国藩奏称：

“浙江之金华、严州、绍兴、宁波、台州、处州等府先后失守。温州被土匪窜陷，虽有收复之说，料终难保。惟湖郡和海宁州两城尚存，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然皆孤悬贼中，亦无幸全之理。综计全浙惟衢州一府，可以图存。”

太平军在进军浙江全省的过程中，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金钱会在周荣、潘英等的率领下，占领了温州府；天地会协助太平军攻克处州府；攻打诸暨时，莲蓬党积极响应。

李秀成留主将邓光明、天将童海容等守杭州城，自率慕王谭绍光等将领于1862年1月7日水陆并进，发动攻打上海的战斗。

苏南、浙江广大基地的形成有力地支援了天京。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八 改革内政的努力

1 李秀成的改革主张

天京事变以后，大约在1858年春，李秀全鉴于“国事纷纭”，向天王洪秀全上奏，提出改革内政的意见，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

第一，定制恤民，宽刑以待万方。在杨秀清主政时代，军民一旦触犯法律，非死即杖，毫无回旋余地。犯轻罪者虽治以枷杖之刑，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依主管官员的喜怒好恶而重轻不一。如系所恶，虽纤介小事，亦会“杖至血肉俱枯”而死。死刑也很残酷，有五马分尸、点天灯等。各种法律手续亦不完备。清朝方面亦认为“伪律为至酷”，“虐民无人理”。李秀成建议“定制恤民，宽刑以待万方”，正是针对这种情况的。

第二，肃正朝纲，明正赏罚，择才而用。这一条是针对亲贵弄权，朝纲败坏而提出的。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虽然开科取士，还在各地出榜招贤，但实际情况却是流于形式。要兴邦建国，亲贵弄权是不行的，没有贤才辅佐，也是不行的。因此，李秀成提出肃正朝纲，择才而用，明正赏罚。

第三，轻世人粮税，依古制而惠四方。这一条是针对当时民众负担太重而提出的。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对付清王朝。这是很重要的。明末农民战争时期，李岩曾向李自成建议：“一应银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附矣。”李自成接受李岩的建议，从此势力大增。

第四，重用翼王，不用安、福王。天京事变之后，洪秀全重用长兄安王洪仁发，次兄福王洪仁达，倚为心腹。但二王无能，朝纲紊乱。在当时，金田起义时期的功臣，仅存翼王石达开。石达开在军事上“谋略甚深”；在政治上，颇得众人敬服。要团结众人，对抗清廷，必须重用石达开。李秀成的这一条建议，也是正确的。

李秀成的这些改革建议，遭到洪秀全的拒绝，而且受到“革爵”处

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九 战略形势逆转

1 清王朝与外国侵略者勾结

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暂时满足了侵略者的欲望。这样，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与清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发生了变化，即“由敌国进而为条约国”。侵略者与太平天国之间的矛盾突出了。一位资产阶级作家说：“1858年……订的条约，他们（按指清政府——引者）把鸦片的贸易合法化了……太平天国却不是这样……明白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各通商口岸的领事及商人都反对太平天国。”

当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反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远不止是鸦片贸易一个问题。《天津条约》与太平天国有利害冲突的还有一个长江沿岸各城市的开放问题。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但是，当时长江中下游在太平军控制之中。这一款又说：“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长江在太平军掌握之中，外国侵略者不能立即实现条约权利。因此，“一切企图和扬子江上游进行贸易的欧洲人也都激烈反对太平军的存在”。

1860年10月底，《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的对华政策进一步转变。英国首相巴麦尊公开宣布：“现在事情已经改变了，从前中英如仇敌，今则我们与清政府已有极好的关系……如果借助我们友好的援助而能使中国内部进入正轨，商业前途将会有巨大的发展，这是可以预期的……中国的新政策是要与世界各国通商的。如果不援助这个开明的中国政府以成全其努力与改进，则在我们方面说，那真是自杀了。”卖国的清政府被侵略者誉为“开明”的政府。侵略者感到：援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就是保住和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否则就等于自杀。

外国侵略者蠢蠢欲动，但是武装干涉太平天国的客观条件仍然没有成熟。为什么呢？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首先，在1860～1861年间，太平军在东线胜利地攻克苏州、常州，在西线，两支大军分别由长江南北两岸进行第二次西征，直趋武昌。太平军的军事形势处在再度高涨时期。面对这样的形势，外国侵略者不能不有所考虑。1861年2月19日，密迪乐给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的一封信中说：“数年以前，以少数英国陆军和少数英国舰队，在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作战，也许就可以帮助清政府扑灭反对它的统治的太平天国。但是，现在进行这种援助则需要一支巨大的舰队在长江及其支流约1500～2000英里的地区内作战；需要约两万军队，分成三四个小兵团，在上述太平军占领的不同地区作战……这将是英国从未从事过的麻烦最大的、花费最多的战争。”接着在英国侵略者内部进行了一场关于“是否要攻击南京”的争论。1861年6月16日，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F.W.A.Bruce）致书英国侵略军头目何伯中将说：“成功地攻击南京和肃清扬子江”，对太平军“这样的打击能不能使力量对比中的有利一方转向清政府？……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是抱着很大怀疑的。因为，成功地夺取南京这件事，在我看来似乎不太可能结束”太平天国革命。他说：太平军“如果失去南京并被迫到别处避难，那么，他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王朝的抱负，无疑要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太平军“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将不是很大的”。普鲁斯在信中的结论是：“我不认为南京的失守”，将使太平天国“瓦解”，“夺取南京仅仅会驱使”太平军“退出他们占据的长江沿岸地区，清政府军队将无力跟踪追击，并把他们驱散。他们将占领我们无法攻击的其他地点”。同年7月11日，何伯在答复普鲁斯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关于南京，我必须告诉你，这个城市远离江边。要没有困难地取得这个城市，就需要有一支陆军，或一支海军陆战队。这支武装大约要有2000人。虽然如此，我认为攻打南京将是我们所犯过的一个最为失策的行动。设想南京的失守将在镇压太平军方面发生重大的影响，也是缺乏最起码的根据。”同年9月7日，英国外交大臣罗曼塞尔写信告诉普鲁斯：“女王政府同意何伯的关于进攻南京是一个很大的失策的意见。”

其次，清朝统治集团对“洋兵助剿”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少疑虑。奕䜣、桂良、文祥在1861年1月24日的会衔奏折中也表示这样的担心：如果洋兵来了，那么“经费任其开销，地方被其蹂躏”，太平军还没有打垮，城池还没有恢复，而“饷源已竭”，“要挟已深”。不顺从洋人

吧，“则势又难行”，顺从洋人吧，“则祸更不测”。如果洋人打不过太平军，结果就是：“以易竭之饷需而养无用之夷兵”，反而被太平军“所笑”；如果洋人克复城池，“希图占据，派兵据守”，结果官兵势必要把太平军抛在一边，而和“夷争”。这样，太平军没有打倒，和洋人的纠纷又发生了。倘若“隐忍听之”，让洋人占据城池，不闻不问，那么“该夷以小忠小信，要结民心，则人心渐去，返正无由”。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不可贪目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一句话，当时还不能实行“洋兵助剿”。

公开帮助清王朝对太平军进行武装干涉仍有困难，外国侵略者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手法通过所谓“和平谈判”，要太平军作出让步。

外国侵略者要太平军作出哪些让步呢？

1861年1月3日，普鲁斯从天津发出一封给罗塞尔的信说：“由于长江及北方港口的开放，不使上海变成内战地区，在我看来是更加有理由了。上海将要成为一个货物集散地。在那里，适宜于在多沙洲的河流中航行的船只将被换成大型货轮开往新开放的港口。”这就是说，外国侵略者要求太平军放弃进攻上海，把上海奉送给他们。这是第一个无理要求。

1861年1月20日，额尔金给何伯的一封信中说：“显然，在不列颠船只能安全地航行在长江以前，必须和太平军达成某些协议……我们需要从他们那里取得足够的保证，保证不列颠船舰为了商务目的来往于长江上下游，不致受到他们的命令下的恶意干涉。”这就是说，外国侵略者要求太平军出卖国家主权，让他们的商船兵舰自由来往于中国的内河——长江。这是第二个无理要求。

围绕这两个无理要求，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主要是英国侵略者，与太平天国在外交战线上的斗争再度激烈起来。1861年4月，太平天国曾应允在这一年内不进攻上海、吴淞两地四周百里以内地区。但是，1861年12月27日，英国方面又照会太平天国，要求太平天国继续保证不进驻上海，同时不进攻九江、汉口与镇江。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侵略者的无止境的贪欲保持了警惕。1862年1月1日，幼赞王蒙时雍等代表太平天国政府复照英国方面，痛斥其无理挑衅。照内称：“正当我们将派遣军队攻取汉口、九江、镇江、银山之际，贵国忽然在维护友好关系的谎言下，企图占据这几个重要据点，暗中帮助清妖，钳制我军行动，真是咄咄怪事！……我国要严厉镇压的仅止于清妖和盗贼，我们所要求取得的是全部中国。当前，清妖尚未殄除，全部国土尚未光复，我们不能同意贵国所提出的上述要求。”

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认识水平看，这个复照是个有水准的文件。太平天国领导人痛斥了侵略者的捏造，揭露了侵略者的阴谋，拒绝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表示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英雄气概。

外国侵略者除了在天京对太平天国施加外交讹诈外，在宁波前线也耍了类似的手法。

1861年12月，太平军胜利地攻克了浙江沿海重镇宁波。1862年1月，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Burlingame）匆匆忙忙地伙同英国驻华侵略军司令何伯来到宁波活动，共同策划对付太平军的办法。

4月26日，英国战斗号舰舰长刁乐德克（R.Dew）代表英法两国侵略军到了宁波，担任英法联军的总指挥，和太平军代表进行谈判。侵略者提出两项无理要求，一项是“立刻”将控制着侵略军阵地的一个太平军炮台上的全部大炮搬走，另一项是撤去面向租界区的城墙上的太平军的枪炮。双方开始了“长久而不愉快的公文交涉”，太平军严正地拒绝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宁波太平军向敌人表示：“租界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租界属天朝所有，所以，它应该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完全受我们的管辖。”“我们丝毫不怕你们，准备和你们做斗争，以决雌雄。”炮台是“我自卫所必需”，“断难拆毁”。你要攻击吗？来吧！我们准备对付你们，“欲攻城听之，欲轰击亦听之”。

清政府方面，恰好在这个时候，1861年11月发生了宫廷政变，政权由守旧派转入接近外国侵略者的慈禧、奕䜣等人手中。经过较长时期的接触，清朝统治集团中的这一派人物意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暂时还不想夺取他们的“宝座”，所谓“其真心和好，固已信而有征”。

恭亲王奕䜣上台以后，上海《北华捷报》发表社论，表示热烈的欢迎。它说：“有利于外国在华权益的恭亲王掌握权力，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不久，外国的代表将对北京政府发挥较大的影响。”

这样，外国侵略者与清王朝公开勾结镇压太平天国的内外条件都已成熟。1862年2月，由外国侵略者和清朝地方当局所组织的“中外会防局”正式在上海成立。2月8日，清朝同治皇帝发出一道“上谕”，说：“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所有借师助剿，即着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他还说：只要对镇压太平军“有裨，朕必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

外国侵略者决心动用武力了。可是，采取什么样的干涉中国革命的方式呢？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发动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清政府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不平等条约，奴役和宰割中国人民。清政府把主权出让给侵略者，太平天国不同意、不承认，因此，侵略者要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从而实现《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所规定的特权。巴夏礼公开宣称：“我们防卫上海不是为了清帝国的利益，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对我们来说，哪个朝廷统治中国是不重要的。”普鲁斯在给戈登的信中也说：“我们也曾支持清政府，这是出于利益的动机而非出于情感。”因此，采取什么样的干涉方式，就要根据侵略者自己的利益来考虑。

1862年4月23日，普鲁斯提出了选择干涉方式的具体意见。他在给士迪佛立（C.W.Staveley）的信中说：“我想，在陆地上对太平军的任何军事行动是否确当，将视下列两个问题是否得到回答为准：第一，这个军事行动是保证上海安全所必需，即将太平军从上海四周三十英里以内他们所占领的地点赶走；第二，在他们被赶走以后，清政府是否有能力驻守被肃清的地区，并且在不需要我们动员陆上武装支持清军的情况下，他们能保证这些地区不受太平军的袭击。如果这两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我认为女王政府将同意采取行动。”同年7月7日，罗塞尔在给普鲁斯的信中讲得更露骨。他说：“如果我们从事镇压太平军叛乱，我们很快就要陷入一场广泛的战争中去，而清政府将作壁上观，把一切负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担和消耗转嫁到我们身上。我们执行的合理方针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商务利益，保护条约规定开放的港口，以及鼓励清政府建立一支有效力的炮兵、步兵和骑兵部队以镇压太平军，使之就范。”可见，外国侵略者酝酿的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方式是：第一，以外国侵略军把太平军从通商口岸四周打出去，当太平军退出以后，这些地方仍然由清军驻守；第二，帮助清政府建立一支新式武装，以便镇压太平军。

帮助清政府建立一支什么样子的新式武装？侵略者表示：像美国流氓华尔所纠合的洋枪队那样的武装。1862年3月26日，普鲁斯上书罗塞尔，大肆吹捧洋枪队。他说：“从华尔所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军队（指洋枪队——引者），我看到一种军事组织的雏形。这种军事组织对于处在混乱中的中国可以证明是很有用的。如果清政府采取这种改革，它将得救；如果它不采取这种改革，我们在主要商港组织这种武装，将保持这些商港在任何情况下不致遭到破坏。”

这样，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首先加强了上海的军事力量。原来侵驻上海的英国侵略军有900人，法国侵略军近千人。1862年6月13日，英国迈克尔（J.Michel）将军及其随员又带着英国政府九十九联队的一个连以及一队炮兵乘船前往上海。这一支军队本来是驻扎在天津对付清政府的，这时移过来对付太平军了。沙皇也“特降谕旨，钦派总管东洋俄国兵船水师提督颇颇福带领兵船前赴中国”。沙俄驻清政府全权大使把留捷克为此于1862年9月29日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表示：如果太平军扰乱紧要海口，地方官独立难支，该提督将同中国官兵堵御击退，并且赠送清政府包括1万杆洋枪在内的一批武器。

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加强了华尔的洋枪队。早在1861年冬，何伯到松江洋枪队的营盘，“向华尔保证对于他的新计划做一切必要的支持”。1862年3月16日，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

外国侵略者直接的、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使战略形势逆转，太平军面临更多的困难。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太平天国政局紊乱

就在这个时候，太平天国政局出现紊乱。

任人唯亲　　李秀成在《自述》中批评洪秀全说：“误国不用贤才”；“误主不信外臣”；从而造成“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国破，实洪姓之自害也”。

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基本上能任人唯贤，因而革命事业日趋兴旺；内讧之后，洪秀全专用洪姓，不信外人，任人唯亲，太平天国也就走向败亡。那么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何在呢？在于洪秀全害怕重演天京事变，用李秀成的话来说就是：“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洪秀全消极地吸取杨、韦擅权的教训，害怕大权旁落，会再演“天京变乱”的悲剧。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封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为安王、福王，标志着其任人唯亲政策的开端，以后逐渐演变成洪氏家天下的局面。

据《李秀成自述》称，洪秀全第一重用的是他的外甥幼西王萧有和；第二重用的是他的长兄、次兄；第三重用的是族弟干王洪仁玕；第四重用的是女婿金王钟万信、凯王黄栋梁、捷王黄文胜。这班人都是他的至亲。1860年，当萧有和还是10岁小儿的时候，就兼任赍奏官的重职，三年后，发展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的地步。

洪秀全任人唯亲对太平天国的危害十分严重。由于庸才当道，贤能之士不被重用，因而在天王周围没有一个可供咨询顾问的智囊团，致使天王的决策与指挥频频失误。由于亲贵掌权，无功受禄，致使赏罚不明，人心不服，从而涣散了太平军众将士的斗志，所谓“互争雄长，败不相救”。洪姓亲贵，身居高位后，为了敛财，他们可以卖官鬻爵，从而助长了追逐官位、揽权营私腐朽风气的恶性蔓延。他们甚至在天京城内打家劫舍，严重败坏了太平天国的声誉。天京粮食严重匮乏时，李秀成曾嘱咐天京守军多买粮充贮，但洪姓“对买粮回者重税，是以各不肯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买粮入京”，以致粮荒更加恶化。

滥设官爵　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的官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在王爵之下逐渐形成了六等爵制。六爵即义、安、福、燕、豫、侯。侯爵从1853年秦日纲被封顶天侯时就已开始。燕爵、豫爵则自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晄两人被免去王爵，被改封为顶天燕、护天豫开始。安爵、福爵则是在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免去王爵改封天安、天福之后开始。至于义爵，则是由义王演变而来，1856年翼王石达开入京辅政时，被公推为义王，但石达开仍称翼王，而“义”则演变成为六等爵中最高的爵位。其后，又在王爵之下、六爵之上逐渐增设了天将、朝将、神将、主将、佐将等官阶。原来官阶颇高的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则已演变成卑微的官职了。

官阶的增多，造成了太平天国后期国家机器运转滞缓、行政效率低下的局面，也加重了太平天国后期的财政负担。

滥封诸王　太平天国在前期封有东、西、南、北、翼、燕、豫七王。内讧之后，仅剩翼王石达开一人，天王洪秀全却对石达开极为疑忌，封其长兄、次兄为安王、福王，以挟制石达开。石达开负气出走后，因朝中不服，改封为天安、天福。这时，天王洪秀全曾有永不封王之意。1859年4月，洪仁玕突然来到天京，天王大喜过望，不久即封洪仁玕为干王。洪仁玕被封王当政后，洪秀全看出许多战功卓著的将领心里不服而有“忿意”，自己也觉得愧对功臣，遂先后加封陈玉成为英王，蒙得恩为赞王，李秀成为忠王。1860年又封李世贤为侍王、杨辅清为辅王、林绍璋为章王。同时封其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为信王、勇王，已故的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胡以晄的后代也被封为幼东王、幼西王、幼南王、幼豫王。总的看来，天京事变后，安庆失守前，王爵尚未滥封，统军将领只有英、忠、侍、辅四王；干、赞、章三王居朝内理政；其余诸王以亲属关系膺爵，或因无能，或因年幼，他们在政治、军事方面不居重要地位。这时的封王制度基本上能以功行赏，尚能起到褒奖、旌扬功臣的作用，有利于太平军的指挥与协调。

滥封诸王开始于安庆失守后，1861年秋冬之间，陈玉成部下赖文光、陈得才、梁成富、蓝成春、陈仕荣、林大居、秦日南分别被封为遵

王、扶王、启王、祜王、导王、敬王、畏王。而与此同时，李秀成部下竟无一人被封王。天王洪秀全为什么一下子封这么多陈玉成的部将为王？原因可能有三：其一，安庆一战，陈玉成所部精锐死伤殆尽，余部士气严重低落，且“尔言我语，各又一心”。天王遂广施爵赏，以鼓舞士气，并安定众心。其二，由于安庆失守，天王洪秀全对陈玉成颇感失望，下诏严责他“前退太湖，后退安省，又失挂车河之约”。封众多将领为王，意在另选将才以取代陈玉成。其三，派赖文光等赴西北广招兵马，给予高爵，有利于招兵。

这次封王虽说出于客观需要，但失之过滥，特别是封赏战功并不卓著的林大居、秦日南为王更属失当。

1862年，李秀成拥有百万之众，天王怕其权势太重，会有“奸心”，遂采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手腕，分割李秀成的军权。先是封陈坤书为王，随即又先后封童容海、谭绍光、陈炳文、郜永宽、陆顺德、黄文金、胡鼎文、古隆贤、刘官芳等为王。对李侍贤、杨辅清所部重要将领也尽行加封王爵，盖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至1863年春，已封至90余王之多。此年以后，爵赏之滥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功偷闲之人只要贿赂有司，就能得到保举而获王爵，“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

一开始，所封诸王并无等级之分，但由于太平军作战频频失利，太平天国局势日渐困难，天王洪秀全也深感滥封诸王所带来的危害性，为减轻这一危害，遂于1863年夏将王分为五等：一等王加军师衔，总理朝政，精忠军师干王洪仁玕即是；二等王加军师衔，为方面军统帅，如真忠军师忠王李秀成，正忠军师侍王李世贤；三等王不加军师衔，只统帅一部将士，如堵王黄文金、听王陈炳文；四等王不加军师衔，亦不统兵权，如恤王洪仁政、昭王黄文英；五等王为没有王号的列王。天王将王分为五等，旨在加强统一指挥，但由于封赏过滥，很难起到实际作用。

滥封诸王，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衰亡。官以贿得，败坏了太平天国的政治，腐蚀了太平军将士的操守。无功者被封为王，使在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不服，离心力增强，导致太平军的指挥失灵。诸王各建王府，各设机构，在经济上也造成了大量浪费，加剧了太平天国的财政困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难。

诸将“画地为牢” 太平天国后期，天王洪秀全战略思想日趋保守，竟将所有疆域划成大小不等的地盘，付以方面军统帅镇守、统管，出现了“地盘”现象。

天京事变后，特别是1857年石达开率部离开天京出走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主要仰仗陈玉成和李秀成二人支撑危局。二人联合作战，转战大江南北。如果仔细观察李秀成和陈玉成的作战区域，就不难发现，他们两人实际上已有分工：陈玉成主要负责保卫安庆，而李秀成的任务主要是保卫天京与江北的通道。这种军事分工，就意味着洪秀全已将安徽省作为陈玉成的“地盘”。1860年，天王命李秀成挥兵东进，攻取了苏南，建立了苏福省，即以该省作为李秀成的“地盘”。1861～1862年春，李世贤克复浙江若干地区，随之将其作为自己的“地盘”，1862年春，洪秀全为解决李秀成和陈坤书之间的误会，封陈坤书为护王，并从原属李秀成的“地盘”的苏福省中割出常州郡作为陈坤书的“地盘”。

“地盘”现象形成以后，引起了高级将领之间的矛盾，滋长了“山头主义”思想，破坏了协同作战的原则。1860年，陈玉成同李秀成联合作战，打垮了清军江南大营，随后，陈玉成又派所部猛将刘玱琳、黄文金等协助李秀成东征苏南。黄文金先后攻克了江阴、常熟，遂暂驻常熟。当时皖北残破不堪，陈玉成部深感粮饷不足，遂让黄文金担任常熟守将，征粮收税，以接济皖北太平军。但李秀成却借故将黄文金赶走。在第二次西征中，李秀成在江西、湖北招得二三十万兵马后，竟无意进兵武昌，以解战略要地安庆之围，反而领兵东下，醉心于开辟浙江根据地。李世贤在江西乐平受挫后，理应绕道继续西征，或返赴皖北战场，参与安庆争夺战，但他却也东返，热衷于开辟浙江根据地，以便自己能获得一个“地盘”。在太平天国前期的军事活动中，虽然也分兵驻守所克城池，但太平天国领导层能掌握强大的机动兵力。太平天国后期，各方统帅派重兵驻守各地，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机动能力，中央难以集中优势兵力。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说，攻占苏南后，李秀成的错误“就是把军队的大部队分散作零星小队去驻防太平军所据有的无数筑有城垣的城市”。事实上，驻守苏福省各城的，并非“零星小队”，每城

都有二三万人之多。苏福省各城驻军总数当在30万上下。如果李秀成能抽出半数组成机动作战兵团，投入苏州保卫战，可以预见，战局将大为改观。然而，苏福省各城守将，株守畛域，李秀成却奈何不得。“地盘”现象也束缚了高级将领们的手脚。为了保全自己的“地盘”，他们过分注重于一城一池的得失。当曾国藩对安庆实行“围城打援”时，陈玉成本可以灵活选择战略战术，或者营救安庆守军出城，主动放弃安庆；或者挺进敌人薄弱的内线，运动发展；但他为了保住安庆，竟一再冲入敌人预置阵地，死打硬拼，导致兵团主力死伤殆尽，安庆也没能保住。

太平天国的政局紊乱，说明太平天国丧失了攻击对手的力量。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天京沦陷

安庆失陷后，1861年9月9日，湘军杨载福部水陆军攻陷池州城，9月16日，攻克铜陵。10月23日，湘军曾国荃部攻陷无为州，26日攻克无为州运漕镇。运漕在无为与含山之交，外濒大江，内通巢湖，自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为太平军江防锁钥，粮运中枢，向上接济安庆、庐州，向下接济天京。运漕镇陷落后，曾国荃回湖南添募湘军6000人。1862年3月24日，曾国荃率湘军再度由安庆沿江东下，4月18日攻陷巢县、含山县城，20日攻下和州，22日攻克西梁山。西梁山古称天险，为天京西侧门户。曾国荃会同彭玉麟水师于5月18日自西梁山越过芜湖，先攻金柱关，复由金柱关偷袭太平府城，并攻克之。次日，又攻陷金柱关、东梁山。

曾国荃的陆军于5月26日进至江宁镇之板桥。28日攻陷秣陵关，次日又攻陷大胜关、三汊河。彭玉麟的水师由金柱关东下，于5月30日，攻陷头关、江心洲、蒲包洲，停泊在天京洲城的护城河口。曾国荃的陆军倚仗水师，驱军直入，驻扎雨花台，距天京城不及四里之遥。

在天王再三催促下，李秀成率领10万左右大军由苏州西上，10月13日到达天京南郊，随即围攻雨花台附近的曾国荃营盘。太平军将士为了解救天京之围，勇敢地打击敌人，曾国荃的面颊被打伤，敌军死伤者达5000人之多。曾国藩自己承认：“心已用烂，胆已惊破”，“军兴以来未有如此之苦战也”。

但是，从10月13日到11月26日，大战45天，最后并没有攻破曾国荃的大营。李秀成停止了攻势，撤回到天京城内。

李秀成援解天京之围失败后，洪秀全命令他再进兵西北：“遵朕旨过北，接陈得才军，收平北岸，启奏朕闻。”这一军事行动，除了接陈得才部南下外，还有另一个用意，就是吸引围天京的敌军，北上援救皖北，以减轻天京的压力。曾国藩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太平军“由舒城、六安而上英、霍、麻城、宋埠，一出黄州，一出汉口，扰犯湖北，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意欲掣我南岸之兵以援北，掣我下游以援上，无非图解金陵之围”。

当时，敌军“自和州以至武汉，除庐州、安庆有兵外，千里空虚”。形势极有利于太平军进军皖北。但是，李秀成对这项战略并不赞同。他勉强接受命令。12月1日，他派章王林绍璋、对王洪春元等自天京下关渡江至九洑洲，12月8日突出浦口，15日过江浦陆续西上。12月18日对王洪春元占含山，21日占和洲，27日取铜城闸。

1863年2月底，李秀成集中大约30万人马，包括护王陈坤书、顾王吴如孝、爱王黄崇发在内，自天京下关、中关渡江北上。

“进北攻南”这一战略，实际上曾经取得效果。曾国藩曾经对皇帝说：李秀成“大股上窜，分枝牵制庐江，无为州之兵，而以全力猛扑石润埠毛有铭、刘连捷营盘，自初三至初七日，昼夜围攻，粮路断绝，文报不通。臣不得已又飞檄鲍超改旆渡江，以解石润埠之围。曾国荃亦自金陵分拨五营救援该处”。

但是，李秀成“行兵赶到六安，正逢青黄不接，那时想去会陈得才之军，此地无粮，不能速去，不得不回军返辔，由寿春边境而回”。半途折回，功亏一篑！

1863年6月20日，李秀成所部自江浦桥林、小店经九洑洲南渡。李秀成自己由于得到英国人呤唎的帮助，乘他的小轮船渡江。这一场战斗，李秀成损兵折将，他自己说：“此举前后失去战士十数万人。”

1863年6月13日，围城湘军攻陷了天京城南要塞雨花台和聚宝门外各石垒。6月30日，湘军杨岳斌等水师攻陷江浦九洑洲，击败守将贡王梁凤超。九洑洲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天京水运的要冲。九洑洲一失，天京水路粮食来源被切断了。7月3日，曾国荃湘军又破长干桥，逼近聚宝门。同时，湘军鲍超部亦由皖北渡江扎营神策门沿江一带。到9月中旬，围城湘军已增至4万人，先后占领了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等天京外廓重镇。11月25日，城东重镇孝陵卫亦陷落，敌人合围之势到1863年底已经十分清楚。

天京军民，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粉碎了占绝对优势的清军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打得敌人“损伤精锐，不可胜数”。曾国藩在1864年5月17日说：“金陵一军，在朝阳、神策、金川等门外开挖地道十数处。”太平军于附城一带筑月城以拒之。三月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等日攻破月城，湘军“前后伤亡近三千人”。他说：“当此之时，除却严围猛攻，力禁接济，更无他法。”

6月15日，曾国藩又对清朝皇帝说：“两月以来，百计环攻，逼城太近……我军伤亡至四千人之多。”

天京粮食来源断绝后，天京军民在城内动手耕种，增加生产。口粮不足了，他们以草充饥。天王洪秀全带头吃草。曾国藩也说：洪秀全“牢守老巢；并不恇惧，亦无粮尽确耗”。他又说：城大百余里，太平军“新种麦禾，青黄弥望，竟不知何日能了此一段”。

1864年2月28日，天京城外制高点天堡城（钟山第三峰）失陷，天京形势日益危急。

5月下旬，洪秀全因长期操劳，身患重病。6月3日（天历甲子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太平天国领袖天王洪秀全不治逝世，享年50岁。

天王洪秀全逝世以后，其子洪天贵福即位，称幼天王。当时洪仁玕远在江西。7月3日太平门外要塞地堡城失陷。19日，敌人在太平门东侧由地道轰塌城墙，天京沦陷。

这时，天京城中不过3万人，能战守者不过三四千人。但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仍然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

首批登城的400人全数被歼灭，先锋队3000人被打死一半。带领先锋队的朱洪章事后回忆这段历史时心有余悸地写道：“不易当年克此城，今朝却是倍伤神。精兵四百遭全没，壮士三千只半生！”曾国藩也说道：“肉薄相逼，损伤精锐，不可胜数！”

清军攻入天京，到处放火、抢劫，逢男人便杀，见妇女便掳。金陵城夜间，火光灼天，广大民居及天王府等建筑也被付之一炬。“十年壮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时隔30年，谭嗣同至金陵，仍然是“满地荒寒气象”。他说：“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幼天王突围后，经句容、东坝，遇由皖南广德前来迎接的干王洪仁玕，7月，干王等护送幼天王到广德。7月29日去浙江湖州，会合了堵王黄文金。8月4日幼天王复回广德。9月5日，太平军猛将堵王黄文金病死。10月9日干王在江西广昌被俘，25日，幼天王在江西石城被俘。11月，幼天王和洪仁玕先后在南昌被敌杀害。李秀成于破城当晚携幼天王逃出天京，并将自己的坐骑让与幼主，自己终因人马困乏在方山被俘，即被解送到曾国荃军营。为泄积愤，曾国荃竟“割其臂股”，但李秀成并未低头求饶。7月28日，曾国藩从安庆赶到南京，当晚即提审李秀成，假惺惺地对李秀成表示惋惜。随后，又让李秀成写了一份供词，前后共花九天时间。李秀成供词洋洋数万言，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追述了自己的家世及参加太平军的原委，回顾出生入死的戎马生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李秀成颇有追悔之意，说自己走错了路。第二，总结了“天朝十误”，为后人研究总结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留下了一份珍贵资料。第三，承认太平天国已经覆亡。为太平军余部将士性命，免遭杀戮，李秀成提出了“招降十要”，建议亲自出面解散太平军余部。这种想法是有害的，一旦付诸实施，将会瓦解太平军最后的反抗斗争。其实曾国藩之流是决不会轻易放下屠刀，赦免起义群众的，李秀成的想法不过是一相情愿的幻想。第四，提出了“防鬼反”的建议：“今天朝之事已定，不甚费力，要防鬼反为先。”李秀成幻想激起曾国藩的民族感情，抵御外侮。第五，李秀成建议曾国藩反清自代。关于这一点，在现存供词的原稿中已见不到，估计已被曾国藩撕毁，但在曾氏后人的口碑中可得到证实：1977年12月，北京大学教授俞大缜提供了书面材料，说她的母亲曾广珊（曾国藩孙女）早年说过“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第六，李秀成在供词中流露了“先秦后楚”的思想，他说：“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向敌人表示乞降，应该说晚节是有亏的。而且，供词中充满了谀词，以取悦于曾氏兄弟，这也是很不光彩的。曾国藩取得了李秀成的供状后，即删改了其中

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委人誊写上报清廷，同时在8月7日擅自将李秀成处死。曾国藩不将李秀成押解入京献俘，是有他的私心的：一方面担心，如果李秀成在京供出实际军情，那么曾氏兄弟历年虚报战绩的谎言将会被戳穿；另一方面曾国荃洗劫天京，所获资财尽入私囊，李秀成入京难免不和盘托出，那么曾氏兄弟必获欺君之罪，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曾国藩迫不及待地杀人灭口。而对于清廷“将李秀成……押解来京”的谕旨则托词说：上谕因驿站误投安庆，待转到金陵，李秀成已处死。清廷无可奈何，只得追认判决。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十 太平军余部的战斗

1 赣、闽、粤战场的战斗

天京失守以后，分布在大江南北的太平军余部继续坚持斗争。

在敌人向天京、杭州进逼时，大批太平军突围到敌人的后方江西。他们之中主要有两支：一支由康王汪海洋率领，4月25日自皖南婺源突进到江西德兴；另一支由侍王李世贤、来王陆顺德等率领，4月29日自浙江开化进入江西玉山。

8月12日，李世贤、陆顺德退出江西宜黄走南丰，8月19日围宁都，26日占雩都，29日走信丰。9月17日，李世贤率军自江西南安府（今大庾）越梅岭入广东进攻南雄，30日占广东平远。10月4日，南占镇平（焦岭），13日破广东大埔。10月14日，李世贤克福建漳州府，击毙清朝漳州镇总兵禄魁、汀漳龙道徐晓峰、漳州知府扎克丹布等。与此同时，来王陆顺德，10月9日也从广东大埔占福建永定，15日占领福建龙岩州。

另一路康王汪海洋部也进入福建。8月26日，康王汪海洋、祥王黄隆芸等占领江西新城县，旋经南丰、石城、瑞金等地，于10月15日进入福建汀州境内，占据濯田。

12月2日，李世贤在漳州万松关大败清军，战斗中击毙署福建陆路提督福宁镇总兵林文察。这一场战斗，“他们派出二千五百人进入清防线，清军人数为一万一千人……大约在半夜十一时左右，不动声色地突袭清军营垒……斩杀了清军一千人，俘获了四百五十人”。1865年1月16日，李世贤克复长泰。汪海洋也于1864年12月17日大败敌帮办军务刘典于汀州、上杭、连城之间的南阳、新泉等地，克复杨家坊。这样，以漳州为中心，在闽西南及粤东形成了一个新的基地。汪海洋驻汀州之南阳，“号称十六七万人”；李世贤驻漳州，“号称二十万人”。

太平军余部在福建的胜利发展，是与福建人民的支援、拥护分不开的。当时福建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有的当向导带路，有的接济粮食，有

的参加太平军，担任各种官职，有的帮助太平军打击恶霸豪绅。广东东部从来就是天地会活跃的地区，也为太平军余部的活动提供了条件。太平天国森王侯玉田于天京沦陷后，即由上海潜至香港上环地方开设金成泰店，假生意之名，私运军火粮食接济福建汀漳一带太平军。

清廷为镇压这一支太平军，派闽浙总督左宗棠从杭州出发来到福建。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也出场公开支持清政府。清朝官员雇用六七艘英国汽船从上海运兵到厦门，增加福建的兵力；英国侵略者还将各种军用物资供给清军；英国军官也被准许指挥清军和太平军作战。1865年4月11日，在漳州郊外的一次战斗中，法国侵略分子、福州税务司美里登竟携带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开花炮协助清军郭松林、高连陞等进攻太平军。5月15日，李世贤退出漳州。5月26日，清军刘典等再败太平军于永定。天将潘可祥，即1855年从上海突围参加太平天国的小刀会领袖潘启亮等阵亡。李世贤的余部归康王汪海洋指挥，李世贤本人亦死。

来王陆顺德守南靖，5月16日主动撤退，6月2日占广东镇平县，8月29日克长乐（五华）。9月18日天将林振扬绑押着陆顺德向敌人投降，来王及太平军其他将领和战士百余人遇害。

康王汪海洋率所部于1865年2月22日与清军大战于连城新泉，3月1日退走上杭、永定，以后，他活跃在福建、广东边界，5月16日，阵斩敌总兵丁长胜于永定；6月13日，又击败敌副将郑绍忠于广东镇平，15日克镇平。汪海洋得人民群众帮助，10月与敌战于广东兴宁之黄坡墟、罗浮司，诱杀敌参将邹朝瑞等，大败敌提督高连陞。12月8日，康王等攻克嘉应州城（今梅州）。1866年1月28日，康王因伤重而亡。偕王谭体元代之。2月7日，因敌人攻打甚急，偕王突围出走，在黄沙嶂一带全军覆没。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赖文光痛歼僧格林沁

陈得才死后，北方战场上只剩下赖文光率领的部分太平军和捻军。赖文光是这支联合部队的领袖。

当时，北方黄淮流域连年遭清朝兵勇骚扰，民间积怨很深，仇杀清军之举层见迭出。清方的记载说：“兵勇掳掠奸淫，村民恨忿。”又说：“马贼既起，从逆者数万人。”“直东从贼各村，妇女亦刁悍异常。每遇官兵列队而来，妇女悉持竹帚铁锹，从上风扬土，杀之不惧。”“军中文武委员往来，若仅四五人，村中即杀之，行李马匹并掘一坎，与尸同埋，无迹可寻，被害甚众。”恒龄“马队入直，有四十余骑入一村求食，村众醉以酒，掘大坑，人马全埋杀之”。

人民群众高昂的斗争精神，给联军的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赖文光，广西人，参加金田起义的老战士。1856年以后奉天王命令出师江西招兵，旋奉命协助陈玉成在皖北作战。后因功封为遵王。当时各地零散的太平军余部，包括淮王邱远才，以及陈得才和蓝成春的余部都投奔赖文光。首王范汝增也从皖南过江与赖文光会合。赖文光提出“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的口号，明确了斗争的政治目标。在军事上，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军事制度整编了捻军。当时，这支联军的主要敌人是僧格林沁的骑兵。为了对付这股凶恶的敌人，联军“易步为骑”，步兵减少，骑兵成为主力。赖文光鉴于死守硬拼之失计，遂抛弃太平军长期以来的战术，吸取并发展了捻军的流动战术。敌人方面有不少文字描述他领导的这支联军的战术作风。曾国藩说：他们的“长处，在专好避兵，不肯轻战，偶尔接战，亦复凶悍异常；好用马队四面包围，而正面则马步夹进”。左宗棠说：这支部队“惯技在飚忽驰骋，避实乘虚……其乘官兵也，每在出队、收队、行路未及成列之时。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引，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折回旋，亟肆以疲我。其欲东也，必先西趋，其欲北也，必先南下，多方以误我”。

概括起来说，这支联合部队的战术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一，避开敌人强大的攻势；第二，以“走”疲敌，使敌人疲于奔命，不得休息；第三，制造假象，蒙蔽敌人，寻找战机。战机成熟时，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反击，四面包围敌人，一举而歼灭之。正因为这种战术，取得了包括击毙僧格林沁在内的多次胜利。

1864年12月7日，遵王赖文光、淮王邱远才、鲁王任化邦等大败僧格林沁于襄阳，12日又败其于邓州唐陂。僧格林沁率数十骑逃入邓州。1865年1月29日，又败僧格林沁于鲁山。此后，赖文光等酝酿和准备全歼僧格林沁清军的伟大战役。

鲁山战斗胜利后，赖文光率所部急速行军，如暴风骤雨，历经襄城、新郑、尉氏，逼近开封，复南折西平、汝宁，3月12日，攻信阳州，又折向北进，经遂平、郾城、扶沟，3月29日至睢州。僧格林沁一路尾追。4月2日，联军进入山东曹县。

联军的急速行军，给僧格林沁造成假象。他以为联军“畏”他，又以为联军“粮匮”，流窜找粮食。因此，他命令士兵仅带干粮，日夜追击联军。

赖文光率领所部再次进入定陶、武城境内。4月5日，由汶上到宁阳，击败山东臬司丁宝桢、总兵范正坦。4月7日渡汶河，前锋直指济南。4月10日僧格林沁也跟着过了汶河。这时，他跟在赖文光后面尾追了3000多里，未得休息，官兵疲劳异常，大量死亡。联军复折回，过汶河南进。经邹县、峄县，入江苏境，经海州、沭阳，又向西北走，经邳县、郯城，于5月9日，由临城到达宁阳、汶上。这时敌人被拖得疲惫不堪，不仅步兵困顿已极，骑兵也是“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束腕系肩上驭马”。沿途累死的清军官兵无法计数。赖文光经范县、濮州，到达曹州，5月18日在曹州高楼寨（即高庄）集中精锐，布置包围圈。大军隐蔽在庄外柳林里面，以小部马步兵在庄外引诱敌军进入口袋。僧格林沁率军来战，联军诱敌部队，佯败退入柳林。敌军冒进，联军伏军尽出。步兵正前方冲锋，骑兵由两侧向前包抄。联军愈逼愈近，愈包愈紧，敌军溃败，无法突围，退守小庄。联军紧紧地包围了小庄。夜三更时，僧格林沁乘黑夜不辨东西之际，企图突围，又进入柳林。伏军四面合围，马步兵更番冲击，僧格林沁所部全被歼灭，马匹尽为联军所获。

僧格林沁以及内阁学士金顺、总兵何建鳌等均被打死。僧格林沁所部是当时清王朝仅存的一支嫡系精锐骑兵，它既被用来对付太平军和捻军，又是满洲贵族用来平衡汉族地主武装湘、淮军的重要砝码。僧格林沁覆灭，清廷如丧考妣，“远近人心，为之惶骇”。清政府怕联军乘势渡黄河北上，急急忙忙地命令神机营防卫北京，直隶总督刘长佑扼守大名府，崇厚统洋枪队防守景州，又令李鸿章海运淮军10营赴天津。清王朝一片慌乱。

清政府命令曾国藩来镇压赖文光的这支联军。曾国藩鉴于联军有“数十万，马数万匹，分合不常，往来飚忽，官军追逐，或求一战而不可得”，改变了僧格林沁跟在联军后面穷追不舍的战术，采取新的战术：重点设防四个据点，“安徽以临淮为老营，河南以周家口为老营，江苏以徐州为老营，山东以济宁为老营，各驻重兵，多储粮械，一处有急，三处往援，有首尾相应之象，无疲于奔命之虞”。与此同时，在联军活动之区，依靠地主阶级修筑圩寨，坚壁清野。他们说：“墙子要高，壕沟要深，此坚壁也，人丁与牲畜米粮柴草一一搬入圩内，贼来全无可掳，此清野也。”在圩寨内部，实行连坐制度，“五家具保结于圩长，有事则五家连坐，圩长具保结于州县，有事则圩长连坐”。他们企图隔断联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断绝联军的粮食来源。

但是，联军仍然识破了曾国藩的阴谋。1865年6月中旬，张宗禹与赖文光等会师回军围攻雉河集。7月下旬，分两路由雉河集西走，一路由遵王赖文光与任化邦、牛洛红、李允、陈大喜等由太和、沈丘、陈州（今淮阳县治）西去；一路由张宗禹及淮王邱远才等，由柘城、太康西去。这两支部队时分时合，活跃在山东、安徽、河南一带。

重点设防，不起作用。曾国藩不得不修改他的军事策略，令刘铭传率部尾追。1866年5月，曾国藩又加强运河防线，筑“高墙深壕”，并在“沙地及民圩不能掘壕者酌立木栅”，企图阻止联军越过运河东进，“以保齐、苏膏腴之地”。7月，又策划从东南沿淮河西至正阳关，从正阳关再沿沙河，经槐店到周家口，从周家口，沿贾鲁河到朱仙镇，朱仙镇以北40里至河南省城开封，30里至黄河南岸，挖壕沟筑堤墙守之。这样，从洪泽湖到开封黄河南岸构成一个弧形河防防线，试图把联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军挡在安徽、河南西南部多山多水田的地方。因联军骑兵多，在山地和水田地区活动比较困难，便于镇压。

但是，这一道防线，同样没有能阻止联军的活动。1866年9月18日，遵王赖文光和梁王张宗禹两支队伍，在河南中牟、尉氏会合，24日从汴梁附近，突破敌军防线，冲破堤墙，守军皆溃。联军乘势冲入山东境内，曾国藩的如意算盘被彻底打破。12月7日，清政府撤去曾国藩的钦差大臣职务，李鸿章继任钦差大臣，镇压联军。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5 历史的教训

太平天国革命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农民的革命传统，高举反封建反侵略的旗帜，把旧式农民战争推向新的高峰，从思想、政治、经济等方面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一个新的农民政权屹立在东南半壁，与腐朽的封建政权相对立，成为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中心。在太平天国占领地区内，维护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政权被摧毁了；封建生产关系受到沉重的冲击。

太平天国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这场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削弱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战后，尽管地主阶级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但是，它是十分虚弱的，这就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一定的地区，还能够为农民群众的斗争保留一定的有利条件。

第二，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埋下了一块重要的奠基石。

带有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性质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没有能够完成历史赋予它的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太平天国灭亡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对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依然存在。这就预示着中国还要爆发革命运动。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太平天国是作为中国人民为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块奠基石载入史册的。

历史证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总要经过反复和曲折。特别是在人类还没有达到自觉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革命的胜利、社会的进步总是要通过许多次人民群众的斗争才能取得。每一次

革命即使最后失败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同时革命人民从反面受到教育，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为革命的逐步胜利提供了精神条件。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积累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经验，锻炼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太平天国有过接触的容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太平天国革命使“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

太平天国灭亡后不到50年爆发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它的阶级的和时代的根本原因，但是，它和太平天国革命提供的精神条件是分不开的。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幼年最喜爱听太平天国革命故事，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孙中山曾不止一次地论述太平天国革命对他的思想影响。在孙中山最早成立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中就有太平天国的老战士参加领导。太平天国革命为其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何以最终失败？原因是很复杂的。长期以来，学者、政治家们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探讨。

太平天国虽然建立天京政权，但并没有夺得全国政权，它是在夺取全国政权过程中遭到失败的。用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句话：它并没有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我们认为在太平天国主观方面存在的下列几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第一，军事战略指挥的重大失误。

一次革命，首先是一次武装斗争，敌人要对革命进行“围剿”，革命武装要一次又一次打破敌人的“围剿”，从而逐步夺取全国政权。因此，战略方针就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太平天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重大失误。在前期，主要失误在采取了“流寇主义”。北伐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建都天京后，在战略上太平军应该以天京为基地集中力量打破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一次又一次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人变成弱小者，最后丧失进行“围剿”的能力，逐步把敌“围剿”我反“围剿”这一基本战略形势改变成我进攻敌防御，然后逐步扩大革命统治区，进而统一全国。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敌人很快在天京附近扎下两座大营围困天京。太平军首先应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这两座大营，敌人再来，再歼灭之，直到它丧失“围剿”的能力。

但是，太平天国军事总指挥部计不及此。身边的敌人不打，反而抽出两支主力进行北伐与西征。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英雄们不怕牺牲，英勇奋战，取得了许多次战役上的胜利，沉重地打击着敌人，但是，从战略失误上看，是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的。

首先，放掉重要的战略需要，让敌人围困天京达三年之久。天京不得巩固，兵力又被牵制，战略上陷入被动。最后，还得被迫从西线抽调大军打垮江南、江北大营。

其次，分散了兵力。由于没有抓住战略的主要需要，既要防守天京，又举行北伐和西征，太平军分散了兵力，采取了“应付主义”，北伐军是太平军的一支最精锐的部队，从金田起义到攻克南京，这支部队一直是打头阵的。北伐大军失利请求增援，太平军抽不出兵力，结果以放弃扬州的巨大代价组织了北伐援军。西征的反复，曾天养的牺牲，也主要是兵力不集中，战斗力不足的结果。1856年江西太平军克复樟树镇，曾国藩的湘军主力只剩下一个营，南昌指日可下，这时，杨秀清为了打江南大营，解天京之围，把江西太平军主力调回天京，失去了克复南昌的机会。

历史证明，“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只能带领革命走进死胡同。

把江南、江北两大营放在一边，分兵北伐和西征，实行这样一个战略部署，如果作战方式正确，也是可以取得胜利的。那就是说，北伐军应该沿途发动群众，联合捻军建立农民自己的地方政权。北伐军向前挺进了，有比较巩固的后方在人力、物力上给予支援。但是，他们却采取了“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糜时日”的方针，继续搞流动作战。北伐大军，孤军深入，克地不守，结果在距离敌巢穴二百余里的静海、独流一带停止进攻，困守一隅，内则距后方基地三千里之遥，粮食衣着弹药等给养断绝；外则敌人就近调动大军拼死围攻，如果没有援军开到，已注定了失败被歼的命运。这是战略指挥上的一个很大的教训。

在后期，主要失误在于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九江、安庆、天京三大保卫战，都由于“消极防御”而失败。以安庆战斗为例。

太平军撤出湖北，敌人已无后顾之忧。他们集中优势兵力，围攻安庆。1861年4月，敌方围城部队已陆续增加到4万人，而水师马队及分防南岸各营，尚不在此数内。

毛泽东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在当时的形势下，针对敌人的兵力布置，敌我力量的对比，正确的战略应该是主动撤出安庆，等待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当时太平军要组织一次有计划的撤退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太平军没有采取这个正确的战略措施，在优势的敌人面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兵力和敌人硬打硬拼，结果城外援军损失惨重，城内守军亦因“米粮尽绝”而全部壮烈牺牲。

天京保卫战的失误更明显了。

1863年底形势已经十分明朗，天京守不住了。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主动转移，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再图发展。敌人最怕的也是这一着。李秀成是主张从天京突围的。1863年12月12日无锡失陷，李鸿章向上报告说：根据被俘太平军供称，李秀成“随行仅两万余人，将赴金陵设法解围。倘无法解救，则挟伪天王洪秀全及其眷属由浙、皖交界上窜江西、福建以寻回粤之路”。曾国藩也奏称：“据鲍超来牍，探报侍逆（指李世贤）将亲率悍党，裹二十日粮，蓄意以长兴、广德、宁国一带上犯江西，先据产粮之区，以俟忠逆（指李秀成）续至等语。”得到李秀成要从天京突围的消息，清朝皇帝十分害怕。他在“上谕”中说：“断不可令李秀成溃围逃逸，务将此贼就地芟除，绝其根株，免致窜扰完善，办理更形费手。”12月20日，李秀成回到天京向天王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可是洪秀全拒绝了这个方案。

第二，对外政策的失误。

太平天国面对两个敌人：封建统治者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敌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是强大的，因此，它不能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但是，人们还必须看到以下情况：在当时，清王朝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矛盾的。1856～1860年间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直到1862年，亦即金田起义爆发后12年，两者才结合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军。

太平天国对外策略的出发点应该是尽可能地避免和西方列强发生正面冲突，不让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结合起来共同对付自己，以便集中力量打垮清王朝。

我们不同意把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归之为太平天国领导人没有办好外交，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太平天国在外交策略上的严重失误。他们是有可能利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清王朝尚未调和的严重矛盾，争取外国资本主义列强长期“中立”的，然而，这个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太平天国反对外来敌人的斗争是英勇的，但在斗争的策略上有严重的失误，这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后果。

第三，在最高领导层中没有出现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军事家。

拜上帝，是太平天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工具。在前期，它是太平天国成为一支严整的农民武装，战胜敌人的精神支柱。

但是在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强制推行拜上帝，违背于人民群众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祖宗、神祇的敬拜。再加上过激的城市政策，使广大居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保持距离。曾国藩正是利用了太平天国反孔反儒的过激行为展开蛊惑宣传，号召儒生们起来捍卫“名教”，反对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存在的十几年中，特别是进入江南以后，在最高领导层中，我们没有发现新面孔，像刘邦、朱元璋手下的萧何、张良、韩信、宋濂、刘基、李长善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洪秀全也没有物色像诸葛亮一类的军师。容闳到过天京，他对太平天国深感失望，他觉得除了洪仁玕是个具有近代知识的人才以外，他看不到太平天国有什么才智超卓的领袖。太平天国的这个严重弱点也值得深思。

第四，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引起严重的内耗。

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内讧、分裂和大量内耗。使太平天国的元气大伤。1856年的天京事变是第一次权力斗争的大爆发。但权力斗争并没从此结束。李秀成、陈玉成兵力相当。李秀成得到苏南地区以后，陈玉成要他援救安庆，李秀成却坐视不救。洪秀全一方面依靠李秀成，但又重用洪仁发、洪仁达，对李秀成不放心。李秀成自己就说过：“天王见我兵多将众，忌我私心，内有佞臣之弄，封陈坤书为王，分制我势。”除最高层以外，各地区、各层次权力斗争也屡见不鲜，陈玉成与林绍璋的矛盾，谭绍光与郜永宽的矛盾，都严重地影响了安庆和苏州的战局，甚至在天京沦陷以后，在南逃的过程中，1865年8月，汪海洋还杀害了李世贤。这些现象自然严重地损害了整个革命运动的进程。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中国史话》总目录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中国史话》编辑委员会

主任 陈奎元

副主任 武寅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巍 刘庆柱

步平 张顺洪 张海鹏

陈祖武 陈高华 林甘泉

耿云志 廖学盛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作者小传

闻少华

闻少华，湖北浠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专著有《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周佛海评传》（武汉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6年再版）、《陈公博传》（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等。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文章30余篇。参与编辑《近代史资料》及编纂《近代稗海》（合编）。参与编纂《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获科技进步奖及图书奖。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一 沉渣泛起

1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标志。这场战争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新的经济危机、国际局势风云突变、日本内外矛盾加深以及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也是日本传统的侵华政策的一次大暴露。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反观日本，与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日本自1868年改元明治以后，结束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实行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维新改革，逐步向欧美资本主义列强靠拢，并力图成为其中的一员。

日本的这种改革，就对外关系而论，一开始即具有强烈的扩张倾向，而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自然就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就帝国主义侵略而言，日本虽是后来者，但的的确确是一个最露骨最凶恶的敌人。

在中英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之际，日本本身亦面临民族危机的严酷课题，于是就有人鼓吹“向外宣传国威，攘除夷狄，开疆拓土”，进而“最终席卷五洲，统归皇朝，皇朝永为五洲之宗主”。日本政府还将对外扩张提到国策的高度，1868年天皇在其《宸翰》中公然宣布说：“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就有力地说明，日本的对外政策，从一开始就与“开疆拓土”的野心密切联系在一起。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其《兴中会章程》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孙中山以其审视的目光，既警惕欧美老牌帝国主义的“虎视鹰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瞵”，更没有忘记新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瓜分豆剖”。让我们循着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作一简要回顾。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古老的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政治野心家袁世凯篡夺，袁世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1915年日本利用袁氏的帝制复辟野心，妄图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通过袁世凯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

在北伐战争中，日本支持国民党右派绞杀大革命。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在加藤高明主持下，推行币原外交，它打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幌子，涂上“睦邻外交”的色彩，然而这些娓娓动听的词句，仅仅是策略上的变更，它的公开声明与军部实行干涉的隐蔽谋略配合得相当默契。当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时，币原派遣其心腹、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男前往南方，与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黄郛过从甚密。佐分以其敏感的政治嗅觉向币原报告说：目前蒋介石派与武汉共产派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当币原于1927年接获一系列外交情况之后，他断定蒋介石是“口头上的过激派，行动上的稳健派”。蒋介石到达上海不久，1927年3月底即向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表态：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希望上海商界“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蒋介石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上海大资产阶级乃至流氓帮会的支持，遂下定“清党”的决心，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遭屠杀者多达300多人，500多人被逮捕，5000多人下落不明。继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南京、杭州、福州相继发生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屠杀、镇压。同月18日，在南京宣布成立国民党蒋记“国民政府”，宁汉正式分裂。从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中不难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起了破坏中国革命、充当幕后操纵者的恶劣作用。

田中义一其人，是一个狂热的日本扩张主义分子，曾窜入中国东北进行窥探。田中在《滞满所感》一书中宣称：日本为了“南满”曾花费20亿元日币，有23万人付出鲜血。他声称：我们之所以在20年间赌国运打两次战争（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大陆扩张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惟一方法”，“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田中表示，要为把“满

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而斗争”。1927年田中担任日本首相兼外长，主持召开了由陆军首脑、驻华使领、关东军司令官等参加的“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积极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是：①日本将实行“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方针，将“满蒙”置于日本武力的“防护”之下。②日本将对中国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的政策。③确定对当前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方针。关于这一方针，甚至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也感到吃惊，武藤与田中曾就此事有一段露骨的对话：

武藤：……如此重大的方针，一旦付诸实施，必须估计到将会引起世界战争。至少，美国不会沉默，英国和其他列强会跟在美国后面大吵大闹。在引起世界战争的情况下，怎么办？阁下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吗？

田中：我有这样的决心！

武藤：以后不致发生动摇吧？

田中：没问题，我已经下了决心。

武藤：政府既然有足够的决心和准备，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什么时候命令一下，我执行政策就是。

田中义一又于同年7月25日向日本天皇呈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该奏折露骨地显示了日本对外扩张政策：“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语言，把日本妄图并吞“满蒙”、征服中国的狼子野心，和盘托出。

制造九一八事变，公然侵占东三省。1931年3月，日本法西斯分子大造舆论，板垣征四郎声称：只用外交手段“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惟一的方策”是把满蒙“变为我国的领土”。另一法西斯分子大川周明在军部的资助下，到处宣称中国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满蒙”是日本以“10万英灵、20亿国帑”换来的“圣域”，乃“明治遗业的象征”，“全民族感情的源泉”，维护“满蒙”是日本的“自己权利”，如此等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等。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谋制造柳条湖事件，进攻沈阳北大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推行“大陆政策”，变中国东北为其殖民地的严重步骤。当然，这次事变与当时中国当局奉行的不抵抗政策也不无关系。

制造伪满洲国。为此罪恶目的，日本侵略者转移人们视线，于1932年初一手策划了一·二八事件，虽经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国民党当局仍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上海战争的硝烟尚未消散，1932年3月初伪满洲国即宣告成立，侵略分子板垣征四郎给一·二八事件的点火者田中隆吉写信说：“幸亏你这样一来，满洲独立成功了！”

为了确保对“满洲国”的有效统治，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任驻伪满“大使”，并担任关东厅长官，武藤成为事实上“满洲国”的太上皇。武藤任命日本人驹井德三为总务厅长官，这一职务其实权相当于伪满的内阁总理大臣。1934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将“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即皇帝位，年号康德，标志着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定型。

占领热河，大搞华北特殊化。1933年日军轻易占领热河后，即逼迫何应钦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协定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这样冀东至北平20余县成为不设防地区，华北门户洞开，为日本的侵略敞开了大门。1935年6月，日本胁迫中国签订《何梅协定》（何应钦、梅津美治郎）、《秦土协定》（秦德纯、土肥原贤二），通过这两个协定，日本侵略者达到从军事、党务、政治等方面削弱中国政府在河北、察哈尔两省力量的目的。日本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进一步搞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的特殊化。同年11月，土肥原策动国民党河北省蓟密区督察专员兼滦榆区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日伪控制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全部地区，华北政治、经济危机空前严重。但是，1936年12月作为时局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发生，使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暂时受挫，华北局势相对平静。不过这种短暂的平静，只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1937年4月，日军在平、津近郊演习。6月，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一带频繁进行挑衅演习。与此同时，日本东京政界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的流言。果然在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打响了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群魔乱舞

日本侵略者悍然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它的“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也是它企图避免经济危机和转移国内视线的一种手段。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内阁会议作出出兵华北的决定。7月11日，又发表《派兵华北声明》，《声明》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法，诬称中国驻军“非法射击”，因而“发生冲突”，由此立即增兵华北。在短短的几天内，日本派往华北的军队达到20万人以上。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日方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驻北平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蛮横地限令中国第三十七师从北平市内及卢沟桥等驻地撤离。宋哲元对日军的大举进犯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抱着一种“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的侥幸心理，与日方周旋。当谈判无法进行时，他就任命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平津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市长。随后，宋哲元偕原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等人，秘密离开北平前往保定。这样，北平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

在北平沦陷的次日，即7月30日，天津市又陷于敌手。两市的沦陷，给一些毫无民族气节的汉奸们打开了叛国投敌之门，这些败类奴颜媚骨，有奶便是娘，纷纷从阴暗的角落爬出来，争先恐后地充当日寇卵翼下的傀儡。地方维持会之类的伪组织，不断出现。一时间，京、津地区沉渣泛起，群魔乱舞。让我们对这批丑类中的代表人物略作介绍，以见一斑。

王克敏，字叔鲁，原籍浙江杭县（今杭州余杭），1873年出生于广东，1903年中举人。1906年任驻日副监督，监督留日学生的进步活动。1910年任直隶交涉使。辛亥革命后，王克敏自觉宦途黯淡，于1913年留洋去法国。不久由法国回到北京，在袁世凯政府中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1917年任王士珍内阁的财政总长，成为北洋政府的要员。1923年，王克敏因致力于曹锟贿选，再次出任财政总长。1931年，任北平财政整理委员会副委员长。1935年一度担任代理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王任该会委员。该会设立经济委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员会，王则被任为经济委员会主席。1937年底南京陷落，王克敏在日本支持下，在华北拼凑伪“临时政府”。

王揖唐，字慎吾，号揖堂，别号逸塘。1877年生于安徽合肥，1904年考中甲辰科进士，同年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在东京时王揖唐参加了留日学生总会，还担任安徽省分会的职员长。1909年，王随戴鸿慈赴莫斯科，任赴俄答谢使头等参赞。不久，又赴欧美进行军政、铁路、交通及运输等项考察，历时两年。

辛亥革命后，王揖唐投入袁世凯幕下，历任总统秘书、参赞、顾问等职，深得袁的欢心。1912年，王先后加入“民社”、“共和促进会”、“统一党”。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共和党”成立后，王任干事。第一届国会成立，王被选为参议员。1913年5月，“进步党”成立，王为理事兼宪法起草委员。1914年袁世凯召集所谓“约法会议”，王被选为议员。参政院成立，他又被选为参政。1916年4月，王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内务总长。从此以后，他一直是皖系军阀的骨干。段祺瑞制造安福系国会，王揖唐成为该系干将，大搞选举丑剧，为人们所不齿。1919年南北议和，王又混上了北方议和总代表一职。1924年，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王被任为外交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委员。

1935年12月，王揖唐列名于冀察政务委员会，并和其他亲日分子把持外交、经济、交通等各特种委员会。他们放纵日本人与汉奸走私，帮助日本向平津运兵，网罗下台失意政客，协助日本开发华北军需物资。总之一句话，大搞卖国勾当。

梁鸿志，1882年出生于福建长乐，字仲毅，又改字众异。十余岁即考取秀才。1903年赴省城福州参加乡试中举人，1905年又入京师大学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梁见段祺瑞声势显赫，极力攀附。一次偶然的机会，梁与皖系要人王揖唐在火车上相遇，臭味相投，相见恨晚。当时王揖唐正在组织安福俱乐部，梁即加入该组织，并当上了参议院议员，梁还担任安福俱乐部掌管财务的会计副主任。1924年，段祺瑞再次上台，梁鸿志又当上段政府的秘书长。1926年，驻北京的国民军推翻段祺瑞政府，梁鸿志只好随段退避天津，再做寓公。1928年，梁在大连筑临时小楼一幢，起名“爱居阁”，作为韬晦隐居之所。

1937年，在日本先后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和八一三事件后，上述北洋余孽、无耻政客及无行文人等大肆蠢动，相继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

7月29日，当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人潜离北平去保定后，北平即为日军控制。这一天，北平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及使馆武官今井武夫等，当即指使江朝宗组织“北平市地方维持会”。江即纠合一批亲日分子，如原北平市政府秘书长周履安、北平市自治会监理处长吕均、北平市银行公会主席邹泉荪、北平市商会会长冷家骥、北平市社会局长周肇祥、保商银行行长王毓霖、朝鲜银行秘书梁亚平、东亚同盟会委员林文龙、北平市公安局长潘毓桂等人，在江朝宗住宅南湾子13号召集筹组维持会会议。次日该会议继续举行，并成立“北平市地方维持会”，以江朝宗为主席，周履安、吕均、邹泉荪、冷家骥、周肇祥、梁亚平、林文龙、王毓霖、朱而芩等为常务委员。

8月8日，日军进入北平并举行入城式。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张自忠出走，于是所有一切政务，概由常务委员齐燮元、贾德耀、李思浩、张璧、张允荣等负责处理。9日，江朝宗就任维持会主席。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则推出江朝宗为北平市市长。19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告“自动解散”。

几乎与北平陷落同时，天津市于7月30日亦被日军占领。北洋时期曾任内务总长的高凌霨（1923年一度摄行过总理职务）不甘寂寞，在日本主子授意下，出面组织维持会。“天津市地方维持会”于8月1日正式成立。高凌霨出任首任会长。

9月13日，北平、天津两市地方维持会进一步成立“平津治安维持会”，而以高凌霨为主席。10月12日，“北平市治安维持会”将北平改称“北京”。

“维持会”这一临时组织形式，显然不能满足日本侵华的政治、经济、军事需要，为了使华北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日本在这一地区筹建傀儡政权的工作很快提上了日程。

一开始，日本对建立华北的伪政权倾向于“联省政府”的模式，随着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日军侵占地区的不断扩大，其侵略胃口也越来越大。正如华北日军特务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北方应当树立的新政权，不是作为华北的地方政权，而是作为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使之在日本军势力范围内的全部地区普及其政令。”在日本看来，以地方政权作为招牌，名不正言不顺，缺乏号召力，一流人物不会参加；其次，地方政权消极退让，缺乏进取思想，容易为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所压倒。

同年的11月8日、12日，太原、上海相继失守，中国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华北日军特务部即策动在香港的王克敏，让他出面组织“政府”。王于12月初窜到北平，在日军特务部的导演下，与已在北平的汤尔和、王揖唐、齐燮元、董康、高凌霨等密谋进行。

这些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洋政府的余孽，又共同具有根深蒂固的亲日媚日的思想，因此在日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的策划下，他们很快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炮制出来。组织大纲标榜“三权分立”，实行“责任内阁”和“总统制”。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行政委员会总揽政务，下设行政、治安、文教、法制、灾区救济等部。全称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名称比起原来的“平津地区维持会”，当然显得有分量和排场多了。

12月14日，“临时政府”在北平中南海居仁堂宣告成立，委员有汤尔和、董康、王克敏、王揖唐、朱深、江朝宗、高凌霨、齐燮元等人。常务委员汤尔和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文教部长，常务委员董康任司法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部长，齐燮元任治安部长，朱深任法制部长，王揖唐任灾区救济部长。“临时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而以《卿云歌》为“国歌”。“临时政府”的辖区范围随着日本侵占区的扩大，逐步从北平、天津两市扩展到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四省和青岛市，并在这些地区建立起省、市级政府。

日本精心炮制成立“临时政府”，并不是为了摆摆样子，而是有其罪恶的政治、经济目的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军事占领区的扩大，从而对华北的经济肆意掠夺。首先是倾销日本商品。“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即改订海关税率，不再征收日本商品附加税，同时减免棉子、棉花、胡麻子、矿砂、生铁、废钢材等出口税。接着又降低所有日本商品的进口

税。这样，在华北地区就充斥了日本的棉布、人造丝、海产品、砂糖、机械及零件、建筑材料等商品。

为了统制华北经济，1938年3月26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与王克敏签订成立中日经济协议会的《觉书》。该会以王克敏为会长，日人平生

三郎为副会长，此人又是“临时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只有他才是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者。日本还规定，对交通、港湾及通讯等项问题的处理，须由日本控制，协议会不得加以讨论。事实上，1938年4月，日本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由这个公司统制、开发、经营华北所有的交通、通讯、矿业、盐业、电力等重要产业。

为了达到破坏中国华北的金融，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之目的，1938年2月，日本批准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伪财政部总长汪时璟任总裁，日人阪谷希一任顾问。3月该行正式营业，并在华北各地设立分行。6月该行将法币贬值10%。次年2月，更将法币贬值40%。这样做的目的是对法币从排挤直到实行全面禁止流通使用。

日本通过派遣顾问，对华北傀儡政权进行全面控制，使顾问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顾问对“临时政府”的一切决策进行指导，而且掌握了人事任免大权，从而使“临时政府”成为日本名副其实的工具。凡设有顾问的各委员会、各部、各省市的长官，所有重要事项，必须征得顾问同意后，方得办理。除派遣顾问及辅佐官外，“临时政府”各有关方面所需专家、教授、教官等，也都由日军司令官负责推荐日本人充任。

日本除在华北地区成立“临时政府”外，又在华中地区加紧扶植另一傀儡政权——“维新政府”。

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后，也在步华北方面军的后尘，日本华中派遣军网罗大小汉奸，成立地方性的伪组织。12月，上海浦东地区成立了所谓“大道市政府”，其旗帜为画有太极图的杏黄旗。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是年底，仅江苏、浙江地区，地方维持会陆续出现，其数目在20个以上。

1938年2月，日本华中派遣军为建立华中伪政权，属意于政界名流唐绍仪，唐心存犹豫，后又为国民党特务谋害，此事遂告终止。日方退而求其次，当即物色到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等人，作为组建伪政府的班底。这些人不是北洋余孽，就是反动官僚，一拍即合。

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3月28日成立于南京。辖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部分地区及上海、南京两特别市。梁鸿志、温宗尧、陈群分驻要津。梁鸿志为行政院院长，温宗尧为立法院院长，陈群为行政院下属的内政部部长。梁、温、陈同时又是议政委员会的成员。

同年9月，南京特别市政府成立，高冠吾任市长。10月，以傅宗耀为上海特别市市长。5月，在苏州组建了伪江苏省政府，陈则民为省长。6月，伪浙江省政府及杭州市政府成立，以老官僚汪瑞闿为省长，何瓒为市长。10月，伪安徽省政府于蚌埠成立，倪道烺任省长。

日军特务部长原田熊吉出任“维新政府”最高顾问，伪政府各部门顾问多达27人，形成严密的对“维新政府”的控制网。1938年5月，日方与“维新政府”改订税率，此后棉布、人造丝等日本商品不断进入上海等地区，而沦陷区的农产品、矿产资源不断被廉价转手运往日本。

上海在沦陷区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日本为了便于其经济掠夺，1937年10月在上海成立“华中振兴股份有限株式会社”。这个会社设有很多子公司，诸如交通运输、通讯、电气、瓦斯、水道、矿产、水产等等。该会社几乎操纵了一切经济部门。日本为了破坏中国的抗战金融，又极力支持“维新政府”建立银行，发行纸币，借以排挤、打击法币。1938年5月，“华兴商业银行”正式成立，并发行华兴券，强制在沦陷区使用流通。

华北的“临时政府”和华中的“维新政府”相继成立后，日本就大力推动南北两个伪组织的联合。日本为了加速摧毁中国的抗战营垒，打败国

民政府，动用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力量，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它迫切需要成立一个所谓的“新中央政府”，以促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或瓦解。为达到这个目的，1938年6月，以日本老牌特务土肥原贤二为头子的“对华委员会”成立，其成员有津田静枝、坂西利八郎等人，对外则称“土肥原机关”，地址在上海“六三花园”。

日本五相会议于1938年7月15日做出《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决议案，指出：首先使临时及维新两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其次使蒙疆联合委员会与之联合。以后上述各个政权，逐渐吸收各种势力，或与它们合作，使之形成真正的中央政府。到了8月下旬，在日本福冈又召开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有关人员会议，中心议题就是为成立“联合委员会”制订方案。9月9日，日本五相会议讨论通过了《联合委员会树立要纲》。同时，土肥原又在大连将南北两伪组织的代表人物及“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德王及三方面的日军代表拉在一起，商讨三方“合流”问题。由于关东军、华中方面军意见不统一，因此只能就南北两伪组织组成联合委员会。9月20日，在北平举行南北两伪组织会议，就交通、电信、邮务、金融、海关、统税、盐务、文教等达成一些协议。22日宣告“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成立，以王克敏为主席委员，朱深、温宗尧为常任委员，该组织所在地为北平。

内蒙古地区的伪组织，花样也在不断翻新。1937年8月，日军侵占张家口，9月成立“察南自治政府”，辖张北等10县，设政务委员若干人主持行政，以于品卿、杜运宇为最高委员，日人竹内元平为最高顾问。

9月，日军占领山西大同。10月即于大同设立“晋北自治政府”，辖晋北13县，以夏恭（70余岁，清末举人）为该政府主席，日人前岛昇为最高顾问。

10月，日军占领绥远省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即于归绥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云王（云端旺楚克）为主席，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副主席。下设政务院，院长由德王兼任。1938年4月，云王病逝，德王继任主席，李守信（伪蒙军总司令）任副主席，日人宇山兵士为最高顾问。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日人金井章次于1937年11月22日在张家口召集上述三个伪组织的头头会议，决定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该会下设总务、交通、金融、产业各种委员会。最高顾问为金井章次，他还代理总务委员会委员长。卓特巴扎布、陶克陶、金永昌、于品卿、杜运宇、夏恭、马永魁为总务委员兼各委员会委员。

关东军为了强化“蒙疆联合委员会”，1938年8月对该会进行改组，改组后专门委员会称“部”，增设民生、保安二部。9月，委员长由德王担任，卓特巴扎布任总务部长，金永昌任产业部长，杜运宇任交通兼民生部长，陶克陶任保安部长。

11月，日本将察哈尔地区与晋北13县并为“蒙疆地区”，由日本直接进行统治及管理资源的开发经营等等。

1939年9月，日本一手策划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改“察南自治政府”为“察南政厅”，改“晋北自治政府”为“晋北政厅”，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直属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并将年号改为“成吉思汗”，还以“黄蓝白赤白蓝黄”旗为旗帜，以1939年为成吉思汗734年。

这个政府以德王为主席，副主席为于品卿、夏恭，最高顾问为金井章次。下设政务院、参议院、最高法院。政务院设7个部，依次为总务、民政、保安、财政、产业、交通、司法，设1个局——牧业总局。日本派遣大量顾问，控制一切部门，还直接出任各级官吏。这个伪政府可说是第二个伪满洲国。

以上是汪伪政权出台前南北伪组织的演变概况。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二 叛国投敌

1 低调俱乐部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凭借其武力优势，特别在日军气势汹汹地占领南京、武汉后，妄图逼迫国民政府俯首称臣或沦为地方政权；但是敌人错打了算盘，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继续巩固和扩大，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信心不断加强。尽管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在其占领区扶植、制造傀儡组织，但也丝毫无济于事。日本当局对此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临时政府也好，维新政府也好，其成立并未以中国人士的政治热情为基础，其构成分子都是同床异梦，两个政府既缺权威，又没有气魄，不仅是对国民政府没有什么威胁，反而在我国内部形成了头痛的根源。"这种情况迫使日本当局千方百计在抗日阵营中寻找亲日派、代理人，用以反对抗日，反对国共合作，而这个人果然就被它找到了，此人就是汪精卫。

提起汪精卫，此人不是无名之辈。辛亥革命时，由于谋刺清摄政王载沣，他成为名噪一时的革命志士，留下"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动人诗句。大革命时期，他是国民党内的左派领袖，提出过"革命的向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的响当当口号。抗日战争初期，他身负国民党副总裁的重任，又是国民参政会议长，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

汪精卫何以从一个显赫的领袖人物堕落成头号汉奸？这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稍加分析。就客观方面说，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在汪精卫身上起了明显的作用，也可以说，汪精卫投敌是日本诱降政策的结果。从主观方面说，民族失败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在汪精卫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是汪精卫投敌的决定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事实就是如此。当然，汪精卫和蒋介石在政策路线上的分歧，也是导致他与蒋分道扬镳的因素。

对于这样一个资深望重、复杂多变的大人物，日本人是记忆犹新的，因为汪精卫在任行政院长时，亲手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定》、《塘沽停战协定》等有利于日方的条约。他是一位地道的亲日派首领，日本人对他寄予厚望，认为有充分利用的价值。

汪精卫果然不负日本人的厚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他肆无忌惮地发表大量反战求和言论，以取媚于敌人。1937年8月3日，汪精卫发表了《大家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这种做法，无他巧妙，只是说老实话而已。”按照汪精卫的选择，“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中国的抗战哪里还有胜利的希望。

不仅如此，汪精卫还与周佛海一伙，组织起与抗战唱反调的团体——“低调俱乐部”。说到“低调俱乐部”，不能不说说周佛海其人。周青年时期参加过中国共产党，脱党后以反共为己任，积极追随蒋介石，得到蒋的青睐，成为蒋氏的贴身机要，以后飞黄腾达，擢升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并先后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委员、江苏省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抗日战争开始后，周出任大本营第二部部长、宣传部代部长、侍从室副主任等要职。周佛海与汪精卫本无历史渊源，而且在大革命时期积有宿怨，骂过汪精卫，说汪“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这是抄袭汪精卫以前骂过他的话而回敬汪精卫的。他们可以说是积怨很深。但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汪、周共同具有反共媚日思想，一次偶然的机会，1937年1月汪精卫从欧洲返国，周佛海作为蒋介石派出的迎汪代表，竟然与汪精卫谈得甚为投机，相见恨晚。从此汪、周沆瀣一气，周成了日后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中坚人物。

周佛海于1932年在南京西流湾8号修建了一所漂亮的花园式洋房，同时修造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地下室。日本挑起八一三事件后，南京吃紧，为了躲避空袭，周佛海的一些亲朋好友陆续搬到周家暂住。住进来的文武大员颇多，诸如梅思平、罗君强、高宗武、陶希圣、胡适、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李明扬等，高宗武甚至每日必到。上述人士凑在

一起，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躲避空袭，他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主张在相当时期，结束中日事变”，就是说，要千方百计寻找一切机会，向日本求和，从而结束神圣的抗日战争。为什么要叫“低调俱乐部”这个怪里怪气的名称？高宗武解释说：“这是由于日中交战以来，对于战况，我们一次也没有兴奋过，于是，便以周佛海为核心，组成了一个名叫‘低调俱乐部’的组织。当然，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其名字是为直接讽刺那些高喊‘抗战，抗战’来哗众取宠的人而故意取的。”周佛海更毫不隐讳地说：“在当时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所以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周佛海们的主张具体内容是什么？简言之，就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求降主张。在抗战深入人心的形势下，这种投降言论是很不得人心的，是见不得人的。周佛海就伙同高宗武、陶希圣等人，鼠窃狗偷，悄悄躲到南京中山门外灵谷寺后面的一个高塔顶层进行密谈，并随时向汪精卫通风报信，分析形势。后来周供认不讳地说：“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指主和）写给蒋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如果说周佛海是“低调俱乐部”的主人，那么汪精卫则是“低调俱乐部”的灵魂，这个评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1937年底，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次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杀气腾腾地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声明强调说：“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声明的潜台词是决心推翻蒋介石，另觅新奴才。“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似乎从中得到鼓舞，看到“希望”，求和之心更切。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我们几个同志，虽然力薄势微，没有方法挽回劫运，但是我们不死心，不绝望，我们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全关，和平之线不要全断。”

当国民政府首都西迁武汉后，“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从排除求和的政治障碍出发，迎合蒋介石的反共心理，又大肆活动起来。周佛海、陶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希圣向蒋介石、汪精卫献计献策，成立一个与中共文化宣传对抗的文化团体——“艺术研究会”。该会由周佛海、陶希圣分别担任总务、研究总干事。陶希圣还兼任编审的主干，罗君强、叶溯中分任总务、出版主干。研究会的宗旨很明确：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为了拉拢文化界反共人物，大造对日妥协、求降的舆论，该会以付稿费的手法，对上述人士进行金钱收买。可以说，“艺术研究会”是“低调俱乐部”在新形势下的一个变种。

周佛海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不思鼓舞民气，同仇抗日，置身抗战阵营，却只能靠耍两面派混日子。周说：“我只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于是我便想尽办法，向蒋先生辞职，拖了三个星期不去接事。结果未承蒋先生允许，只好勉强担任，一天到晚的讲鬼话，瞎吹牛了。这是我对不起人民的大罪恶。”活生生一副政治流氓无赖嘴脸。

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汪精卫夫人的陈璧君，她的低调却是用第三者的姿态说三道四。她说：“其实能够从日本手里得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于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双方（指中国和日本）所提标准相差太远，结果就谈不来。越打时间越长，受苦的还不是老百姓？”在这里，陈璧君俨然一种悲天悯人的腔调。陈璧君又说：“其实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五省，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他们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陈璧君真够慷慨大方的，一句话就把中国的神圣领土——东北数省拱手让给侵略者，还承认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的合法性，真可谓“一言丧邦”。

汪精卫随着敌寇侵略的深入，声调更加低沉，他惊呼：“日本军的占领区域日益扩大，重要的海港和交通路线全部丧失，财政益形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四亿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看来汪精卫悲观绝望到极点，抗战无望，只有另辟求降途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重光堂密约

从1938年8月29日至9月4日，松本重治与梅思平共进行了5次会谈。他们讨论的中心议题，一是关于撤兵的声明，一是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通过5次会谈，梅思平实际上已提出了一个关于对日“和平”的方案，松本重治将此方案由香港带回上海，并告知在上海的西义显、伊藤芳男，二人又告知今井武夫中佐。今井将此方案向陆军中央部作了汇报，日方根据大致形成的日华关系方针对梅思平方案作了若干修改。这个方针后经1938年11月30日在日本御前会议作出决定，其主要条款即后来近卫对华三原则的蓝本。

按照日、汪双方约定，汪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于11月20日在上海东体育会路土肥原公馆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结日华防共协定。

第二条 中国承认满洲国。

第三条　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国内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承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日本在华租界。

第四条　在平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的优先权，以达到密切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向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第五条　中国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但日本不要求战费。

第六条　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

经过讨论还价，日、汪双方虽然达成了协议，但这个协议是完全有利于日本侵略图谋的，就缔结防共协定这一条而言，汪方尽管要求防共

驻军仅限于内蒙古，但事实上不得不承认驻兵区域扩大到北平、天津，至于驻军期限则以防共协定有效期间为规定期限，实际上，等于可以无限期延长下去。又如汪方认为“特殊利益”的字眼太露骨，日方仅同意改为“特殊方便”，反正实质都是一样。汪方连表面的遮羞布也顾不上要了。

由于密约的卖国性质太引人注目，因此梅思平的行踪非常隐蔽。梅思平于10月21日乘飞机从香港起程，22日抵重庆，11月2日又从重庆出发，7日返回香港。梅在重庆待了12天，与汪精卫、周佛海等密谋策划，终于使汪精卫下定当汉奸头子的决心，汪即命高宗武、梅思平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与日方洽商密约签订事宜。为避人耳目，梅思平于11月9日乘法国轮船，高宗武则于11日乘意大利轮船自香港出发，他们两人分别于12日夜和13日夜抵达上海。

会谈的地点选择坐落在上海新公司北侧东体育会路7号的一所空房子，日、汪利用它进行会谈之后，就作为日本大特务土肥原的公馆，命名为重光堂。此后，日、汪的会谈就称做重光堂会谈。日、汪签订的这份密约，即称做“重光堂密约”。

汪精卫等本来想将伪政权建立的地点设在云南、四川、两广地带，以便冲淡在日军刺刀庇护下的傀儡色彩；同时要求日军轰炸中国后方，并希望日军从背后切断抗日部队，但由于上述地区无人买汪精卫的账，他只好夹着尾巴投入敌人怀抱。

汪精卫一伙好不容易签订了这份密约，争取到与日方交涉的对手资格，日方才答应支持汪精卫建立反共产党反蒋介石的所谓“新政权”。11月26日，梅思平将重光堂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携回重庆，他先找到周佛海、陶希圣，然后与汪精卫、陈璧君等磋商。汪、陈在重庆上清寺汪公馆为梅思平设宴饯行，陈璧君为坚定汪精卫落水当汉奸的决心，当送梅思平出客厅门口时，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真可谓：“自作孽，不可活！”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三 河内枪声

1 《艳电》的出笼

就在汪精卫等抵达河内的第三天，1938年12月22日，日本发表《调整对华外交方针》，即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近卫伪善地说：“日本出兵之真意，绝无领土野心，并无军费赔偿之要求，日本之目的，仅要求中国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并对实际履行其任务，能作最小限度之保证。”这个宣言简言之，其内容为：①承认伪满洲国。②反共，并以反共的名义，侵华日军在内蒙古拥有驻军权。③在经济方面，实质上拥有垄断权。这是一项不折不扣的侵华宣言。

然而汪精卫、周佛海之流对此宣言如获至宝，奉若神明。他们于12月25日已将此宣言全文译出，并共同研究响应近卫声明的宣言内容，由汪精卫亲自起草后再进行讨论。26日，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的宣言（即后来的《艳电》）已起草完毕，经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参加讨论和修改。所谓修改，不过是在文字上做点粉饰工作，如增加“日本须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抗战在求民族之独立与生存，即抗战之目的已达”等词句，丝毫不涉及日本侵华的具体内容。

29日，周佛海、陈公博携汪精卫声明赴香港。在要不要抛出这项卖国声明的问题上，周佛海、林柏生与寓居香港的顾孟余（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发生了激烈争论。当顾孟余看到汪精卫给他的亲笔信及《艳电》电稿后，大吃一惊，表示坚决反对。顾说，此电稿“万万不能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我马上去电力争，未得他（指汪精卫）复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怕迟误，一切由我负责”。顾孟余在关键时刻，能以民族大义为重，不为私人感情左右，没有被汪精卫拖下水，是难能可贵的，但当时他对汪寄予幻想，希望汪能悬崖勒马，显然是书生之见。周佛海听了顾的一席话，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地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人的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打开天窗说亮话，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商量的，干就干，不干就拉倒。顾孟余不过是一个部长，我难道就没有当过部长

吗？怎么可以由他一个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呢？”林柏生为了表现他争当汉奸的积极性，也气鼓鼓地说：“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指周佛海）交给我的汪先生的信，就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29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否则我要执行命令，决定如期发表见报。”陈公博则写信告诉顾孟余：“时间太迫，现在无法来得及于29日以前收到河内复电，那么电报往返磋商就谈不上，因为林柏生坚持非依汪先生命令的日子发表不可，既然他明白表示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就等于无商量余地，只好让电报如期发出，这回只好由我负责了。”

臭名昭著、与近卫声明紧密呼应的《艳电》，就在这种紧锣密鼓地喧嚣声中出笼了。我们把近卫第三次声明和汪精卫的《艳电》稍加对照，就不难发现，汪精卫等不仅为近卫声明涂脂抹粉，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而且把近卫声明中并没有的东西一厢情愿地加以附会，又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意攻击，其残内媚敌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

如近卫声明中第一条，就是要求承认伪满洲国。而《艳电》却侈谈什么“善邻友好”，用和平方法保全北方各省，这就在实际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是合法的，东北大好河山就在“和平方法”的烟幕下给断送了。所谓“主权及行政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真不知从何谈起。

又如所谓共同防共，近卫声明强调要在“特定地区”有驻兵权，并明确以内蒙古为特殊防共地区。《艳电》却借机大肆反对中国共产党，无理要求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还要取消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其居心之险恶，昭然若揭。

所谓经济提携，近卫声明中强调说：“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艳电》却说什么“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原来在汪精卫看来，日本垄断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就是中日之间的平等原则，这是不折不扣的奴才哲学。

汪精卫在《艳电》中闭口不提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而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他更是讳莫如深，反而胡说什么“历年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似乎被侵略的中国，也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真是岂有此理。在这里，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被侵略的界限没有了，似乎应该各打五十大板，这就是汪精卫之流的汉奸逻辑。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高朗街的枪声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其同伙逃往河内，对重庆国民政府来说，当然是一次政治上不小的冲击波。为了修补裂痕，避免国民党分裂的危机，拉住汪精卫，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当时正在河内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纷纷前往做挽留汪精卫的工作，劝汪改变主意，就此止步，仍回渝供职，但均遭到汪精卫的断然拒绝。汪精卫刚逃离重庆时，重庆当局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报纸上仅出现“个人进止决不影响大局”的调子；而当汪精卫抛出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后，说明汪精卫等与日本早有勾结，绝不能等闲视之。1939年1月1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研究处理汪精卫一伙叛逃问题。在冯玉祥、张继等国民党元老坚决要求下，由吴稚晖起草决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但蒋对汪还留有转圜余地。2月15日，蒋介石派和汪精卫有历史渊源的谷正鼎（原改组派成员）赴河内，劝汪打消原意，仍回重庆任职。谷还带去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和巨额款项，并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精卫不仅听不进去，反而感情冲动地对谷正鼎说：“以前我因蒋介石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中伤我，下流到要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去来何尝要过他什么护照？”汪还要谷正鼎转告蒋介石说：“他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这是几句软中带硬的话，它的潜台词是，如果蒋介石不采纳他的主张，他还要走得更远。

谷正鼎使命失败，使蒋介石认定对汪精卫仅仅施行规劝、诱导是无济于事的，为了根除后患，蒋决定采用非常手段。于是他叫来了戴笠。戴笠，浙江江山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官至中将军衔，时任军统局局长，是蒋介石一手栽培起来的，绝对服从“校长”（蒋介石曾任黄埔军校校长）的命令。他掌握的蓝衣社是专门从事暗杀、绑架、审讯、关押和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处决任务的特务组织。活动范围和对象大致是：对付中共、指向敌伪，同时也用以对付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蒋介石既把制裁汪精卫的任务交给戴笠，戴就指定手下大将陈恭澍具体执行。陈恭澍，北京人，黄埔五期毕业。

1939年元月的一天，陈恭澍在天津接到戴笠从香港发来的急电：“克日来港”。次日，戴笠即偕陈从香港飞往越南河内，交代完监视、侦察汪精卫行踪的任务后，戴就走了。参与执行这一任务的还有下列诸人：

王鲁翘，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山东人。

余鉴声，杭州警校毕业。

张逢义，黄埔七期毕业生，山东人。

唐英杰，四川人，身材矮小，但练就一身“登房顶，倒卷帘”的本领。

陈邦国，安徽人，力大身粗，出身行伍。

陈步云，江苏徐州人。

这批人分别到了河内，由陈恭澍统一指挥，他们租旅馆，买汽车，设立电台，探明汪精卫的住处。

当时的河内，人口仅有15万左右，来了这批不速之客，活动近50天，竟然未引起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和汪精卫等人的注意。

汪精卫的住处在河内高朗街27号，这里是一片环境幽静的高级住宅区。27号汪寓是一幢三层的楼房，面临林荫大道，沿着巷道往后走，有一垛矮墙，墙内有一小方院落，也就是27号的后院。

3月19日，戴笠给陈恭澍发了个“亲译”字样的电报说：“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岂敢怠慢。正好次日上午，汪精卫、陈璧君

乘两辆黑色轿车外出，陈恭澍等认为机不可失，就乘自备福特小轿车尾随于后，黑色轿车过了红河大桥在一个场地稍停后又折回来。不巧，在折回大桥时，黑色轿车刚通过，红灯就亮了，这样就拉大了福特小轿车与黑色轿车之间的距离，陈恭澍等无功而返。但刺汪的行动并未因此中止。

3月21日深夜2时许，高朗街27号全宅的人均已入睡，一片沉寂。王鲁翘率领他的伙伴到汪宅执行制裁汪精卫的任务。当到达矮墙外时，唐英杰动作麻利，一抓墙头，翻身进入院内，原想从里面将后门打开，不想门已上了栓，而且加了锁，用力扭不动，他伸头向墙外示意，陈邦国毫不迟疑，踏着张逢义的肩膀翻墙入内，与此同时，王鲁翘、余鉴声也由陈步云一个一个托了上去。张逢义则留下防守于后门之外，陈步云则巡游于巷道与街道之间，互相呼应，以资联络。

唐英杰、王鲁翘、陈邦国、余鉴声四人来到院内，陈用斧头劈开了通楼梯的房门，王、唐、余三人迅速上楼，陈则留在楼下，以掩护上楼人的安全，同时也为了保住出去的通道。听到响声有人推开房门探视，陈立即对着房门开枪，人影又缩回去了。

王鲁翘大步流星地赶到二楼，正要转上三楼之时，有位年轻人空着手钻出来，王用枪口逼住对方，不许他喊叫。王又赶到三楼，靠近前面那间主房。这是他们事先侦察好的，又经唐英杰潜伏在房子上两次查勘，认定这间房就是汪精卫的卧室。

王鲁翘用力推门推不动，扭把手又扭不开，退后两步借助冲力踢门还是踢不开，就走到楼梯口，忙打手势让余鉴声赶快将斧头递上来，唐英杰见状飞快地将斧头带上了三楼，余让唐仍回二楼，代替他的警戒任务，余随后也上三楼协助王。

王鲁翘、余鉴声二人共同用力劈掉房门中的一块木板，并探手几次转动里边的门球，仍无法将门弄开，才知门已上锁。不过门板上已露出一尺见方的大洞。在灯光照射下，王鲁翘蹲下身子朝里头张望，就见床铺底下趴着一个男人，这人半个身子藏于床下，腰背双腿则全露在外面，王鲁翘根据身形推断，十有八九此人就是行刺目标汪精卫。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这时王鲁翘毫不犹豫，举枪就射，一连开了三枪，眼见枪枪都命中床下人的腰部。他们以为大功告成，相继退出汪宅。但到凌晨5时左右，先后接到两个电话："你们搞错了！那个人（指汪精卫）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另一电话则说："有三个人（指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被逮去了！"这次河内刺汪行动，由于误中副官，宣告破产。

为什么如此严密的计划最后还是错认了目标呢？这里面有很大的偶然性。其中有一种说法是："汪之不死，其原因亦甚偶然。寓河内时汪昼间在曾仲鸣房间看书写字（曾房内光线较佳），在外窥探者以为该房即汪卧室，殊不知昼间在该房，夜间不在也。"汪精卫就在这种偶然的情况下，暂时得以不死。另一说法则是：3月20晚上，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带着小孩从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大房间让给曾仲鸣夫妇，汪则搬到另一间房内住。显然刺客不知其中情况有了变化。以上两种说法均有可能或兼而有之，如果汪精卫被刺身亡，那么伪政权将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不过这已不属于本书探讨的范畴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四 所谓“还都”

1 儿皇帝的设想

汪精卫等叛逃出国后，曾有过这样的设想：“以前和平运动的展开，是根据这样的方案进行的，组织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和平团体，用言论指出重庆抗日理论错误的原因，宣传和平是拯救中国、拯救东亚的惟一方法，逐渐扩大和平阵营，而终于使重庆转变过来。”就是说，主要做舆论工作，使重庆国民政府转变联共抗日立场，从而达到对日求和的目的。

关于汪精卫口口声声所谓的“和平”、“和平运动”，到底是什么货色？我们还是借用汪精卫自己的话加以阐释，他说：“和平运动要使全国民众由抗日一变而为亲日，这不是泛泛然便可以做到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明白认识全国民众为国家民族求独立自由的意识，善为诱导，使之用于亲日，而不用于抗日。”可见汪精卫所谓的“和平”、“和平运动”云云，实际就是亲日、降日的代名词，在日本侵略者刺刀下的“和平”，就是甘心当亡国奴的“和平”，而鼓吹这种“和平运动”，就是宣扬卖国有理、卖国有功，即兜售汉奸理论，用以混淆视听，欺骗群众。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等乘日轮“北光丸”号抵上海虬江码头。8日，离船上岸，住进日本人为他们安排的上海江湾土肥原公馆。在这几天中，汪精卫与影佐、犬养举行了会谈。会谈中汪精卫表示：他经过认真考虑，单靠言论使重庆政府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强调，不如建立和平政府，用事实证明，日华（汪）提携可以改善到这种程度，那么抗战还有什么意义，这样就可使重庆政府转向和平。

汪精卫进一步提出要求说，如果日本政府同意他建立和平政府开展和平运动，他“切望近卫声明不仅仅是日本表面的宣言，而要如实地见诸实行。如果近卫声明不能如实实行时，我就难免受人讥笑，受了日本的欺骗”。汪精卫还忧心忡忡地说：“纵然建立和平政府，也不能简单地形成全面和平，其间必然要遇到许多波澜曲折，希望日本用共命运的眼

光期待和平政府的发展。”汪精卫有两个担心：一是怕受日本政府的骗，近卫声明兑现不了；二是担心日本对其傀儡政府期望过高，不合意时会一脚踢开。汪精卫还向影佐一再表白：“我从事这个运动的目的，除了导致和平而外，别无其他。只要达到和平，政权归谁掌握，此事不欲顾［过］问。我从事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使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会合时，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就断然下野，毫不踌躇。”看来，汪精卫还想重温蒋、汪合作的旧梦。但是且慢，蒋介石此时在抗日问题上，态度明朗，他是不会和这个在日本卵翼下的寄生虫搅在一起的。

汪精卫还发誓不惜一切代价充当汉奸头目。他诚惶诚恐地说：“在当前战争的形势下，抗日论一般容易听得进去。反之，和平论和卖国论很难分清，难以使一般［人］倾听……因此在展开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到非常的严厉批评，会［被］当作卖国奴、汉奸来批判。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仰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就是说，他决心一意孤行，蛮干到底。不过在这里汪精卫讲了一句实话，即中国人民看清了一个事实，“和平论”就是卖国论，推销“和平运动”，人民就要把他们当卖国贼、汉奸来批判。这是汉奸们的悲哀，同时又是中国人民的巨大觉醒。

5月25日，汪精卫向日本提出《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其内容是：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然后由大会授权他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并负责改组国民政府。在此基础上，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改组国民政府。然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维新”、“临时”两政府宣布撤销。

在日本政府的允许下，同月31日，汪精卫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11人，在矢野征记、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董三等陪同下，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飞抵东京。对于汪精卫的到来及其提出的具体方案，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联席会议于6月5日匆忙作出决定：要求汪精卫在建立中央政府时，与吴佩孚及临时、维新两政权合作。中央政府的组成及地方自治的程度，不得违反日本的既定方针，即不得侵犯日本侵略者的既得利益。其次，汪记国民党的大会不得在南京举行。至于采用国民政府名称及青天白日旗的问题，日方提出的附加条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件是在该旗的上方加上一个三角形黄布片，上书“反共救国”字样。这个政府应以日、“满”、华睦邻结合为最高指导方针，并与日本正式调整邦交，等等。

次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作出《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方针》规定：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和临时、维新两政权以及改组后的重庆政府等方面组成。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正式调整国交，其成员应接受上述原则，政府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关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共的原则下，可允许其存在。这些规定说明，日本对即将成立的伪中央政权及其他伪组织，就是要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另一方面，这个所谓的“中央政府”，从人员组成到指导方针乃至成立日期等，都要由日本点头认可才算数，表现了这个政权的十足奴性。

从6月10日起至15日止，汪精卫分头拜见了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麿等人，并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在这些会谈中，汪精卫极尽反共媚日之能事。

6月10日，汪精卫拜见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平沼向汪宣扬了一通日本皇室“仁爱”、“和平”的滥调。平沼还夸奖汪说：“我对于阁下在这次事变时为日、华两国而奋起表示敬意，希望继续努力。”汪精卫受宠若惊地回答：“日本皇室的精神，我是很谅解的。”汪为自己也为日本主子献计说；“以国民党（汪记）为中心联合各党各派，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建立国民政府，是适当的。”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保存国民政府的形式，可以避免使中国国民抱着受日本的压迫而亡国的念头，便于从重庆方面争取许多人过来。”汪精卫替日本主子的设想，多么周到。

6月11日，汪精卫与板垣会谈。一见面汪即丑表其反共之功说：“前一阵在河内的时候，接到贵大臣给我的信，其中有反共一语，至今印象极为深刻。”但板垣还是提出苛刻的条件说：“在这次事变中，随着军事的进展，在华北、蒙疆、华中等［地］建立了新政权，在这些地方也有很多日本人居住，形成种种关系，这是事实。对此事实，必须相当尊

重。”这是让汪精卫放明白点，要想建立“中央政府”，就得承认原有的“临时”、“维新”政府，就得承认日本在华北、蒙疆、华中各地的种种特权。

汪精卫与板垣于6月15日进行了第二次会谈。板垣就上述问题更进一步发挥说：“具体地说，华北可以说成日、中两国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特殊结合地区，蒙疆是国防上的特别为对苏联的防共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是日华经济提携的最密切地区。根据各地区的特征，并参照日华关系紧密的程度，有必要把以前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华南沿海，必须考虑对南方国防上的需要，主要是海军问题在两国国防上的特殊关系。”说得明白一点，板垣认为，华北、内蒙古和长江下游地区为日本陆军势力范围，而华南沿海则是日本海军的禁区，汪精卫也休想染指。汪听后神情沮丧地说：“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如果有把两个政府的实体保留的必要，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国民党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再进行中央政府的组织。”汪这番话不过是故意做出撒手不干的姿态，他本想，在汪记“国民政府”下，把“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接管过来，现在这一切都落了空，不免灰心丧气。但这是瞒不过老奸巨猾的板垣和盛气凌人的影佐的。影佐当即冲着汪精卫叫嚷：“以前协商时，您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国民党另换一个地盘进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汪只好忙不迭地解释说：“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急，是由于取消政府（指临时、维新两伪政府）有困难一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那末，除了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其实，汪精卫只是想找个立足之地，因此他又说，“华北由于它的特殊情况，不妨设置政务委员会那样的机构，给予比较大的自治权限，只是华中以何种形式处理现在的维新政府，是个大问题”。汪精卫是够现实的，他只要继承“维新政府”的一块地盘就满足了，华北他是不敢也不允许他有什么非分之想的。

6月12日、13日、14日，汪精卫分别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臣石渡庄太郎、外务大臣有田八郎进行会谈，内容不具述。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日本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麿会谈时，汪以怀旧的心情向近卫诉说：“幸而平沼首相基于道义，说明了中日关系，海军大臣阐述了日本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意见，大藏大臣说明了日本不希望垄断中国的经济，使我有了很大的希望，这也就使我明白了日本的真意，今后应致力于如何具体实现这一希望。”汪精卫这一番话，将日本侵略头目美化得近乎离奇，说什么“基于道义”、“不干涉中国内政”、“不希望垄断中国的经济”等等。试问，如果真是这样，日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岂非无的放矢？不过在这里汪精卫闭口不提和板垣会谈的情况，这是由于板垣所提条件太苛刻，使汪的面子太难堪。接着汪向近卫哀求，希望帮助他解脱困境。汪说：“中日两国，一方是强大的先进国家，另一方是极其脆弱的国家。而日本动辄指责中国之所不及，而中国则有感受日本压迫的危险，尤其中国国民，一般都抱有今后会不会亡于日本的疑惧。”汪精卫强调说：“我之所以主张政府的名称为国民政府，国旗为青天白日旗，决不是面子问题，这是为了扫除国民疑惧之念，使其安心地深入考虑问题的缘故。重复地说，中国在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采取与日本一致的方针，提携合作，这不成问题；但是过于限制中国的行动，中国恰像不成国家的状态……中国要以爱中国的心情提出具体方法，必须使中日两国都安心，两国政府都能对中国人民说得过去。”

原来如此，汪精卫慑于全中国不断高涨的民心士气，为了冲淡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因此他煞费苦心地要搞起“国民政府”，竖起青天白日旗，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民。

6月16日，日本五相会议作出决定：关于中央政府的名称和首都，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关于国旗，同意采用青天白日旗，但在旗的上角须附以三角形黄布一块，上书“反共和平”字样。关于废除临时和维新两政府的问题，只能理解为仅仅取消其名称，而对两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协定及其他有关决定，则由中央政府继承下来。对于建立中央政府，要特别考虑人的因素和基础实力。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中央政府应按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宣布予以废除和修改。

对于汪精卫一伙来说，要想成立伪政府，就必须满足日方的上述要

求，就是说，在日方既得权益寸步不让的条件下，才可允许汪方谈继承国民党“党统”和国民政府的“法统”的问题。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汪、王、梁会谈

汪精卫们日本之行，虽然就组织政府问题得到日本主子的认可，但是要顺利推进这项工作，如果得不到既成的“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的头头们的赞同，也是不可想象的。再说这两个伪政权的后面都有日军高级将领做后台，不做好他们的工作，就会枝节横生，一筹莫展。后来陶希圣和周佛海、梅思平等闲谈时，曾将他们背后的日本主子，即梁鸿志的后台原田机关、王克敏的后台喜多机关和汪精卫的后台影佐梅机关，做了个形象生动的比喻：好比四个人打麻将牌，每个人的背后有一参谋，打到两圈以后，四个参谋都伸出手来，直接打了起来，那座位上的四个打牌者反而无事可做。这个比喻生动地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都同样是日本侵略者手中的一具政治僵尸。

1939年6月24日，汪精卫一行风尘仆仆甫抵天津，即拜访日本华北派遣军联络部长喜多诚一。同月27日，汪精卫等人到北平，即首先会见华北日军司令官杉山元，接着与“临时政府”头面人物王克敏进行会谈。王表示，对汪记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他虽不是国民党员，但仍然表示欢迎。至于开会地址，以在北平为宜。其意图明显是要以北平为重心。王克敏也愿意参加汪精卫召集的“中央政治会议”，他本人则不愿担任委员名义，不过“临时政府”可以有三四名委员参加。至于新成立政府的名称和国旗等问题，可留待将来由“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决定。王还表示，他已风烛残年，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的前夕，拟告老退休。如要他参加中央政府，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平工作。王克敏倚老卖老，他的态度不冷不热，不即不离，似乎稳操胜券。这就为未来的“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设置，埋下了伏笔。

6月28日，汪精卫等由天津回到上海。次日，即与“维新政府”的首领梁鸿志举行会谈。由于梁对汪的到来没有思想准备，心存疑虑，因此他们都采取旁敲侧击的态度，避免谈实质性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反映了这种微妙关系：

梁：阁下在东京会谈时，没有排除中国特殊化的问题吗？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汪：所谓中国特殊化是什么意思？

梁：没有要求取消蒙疆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吗？……

汪：蒙疆作为防共地区，情况特殊；华北也作为特殊地区，因此，适应特殊情况，必须有特殊机构。

梁：要成立特殊机构，不是影响中国主权吗？

这一段对话，双方都不直接谈处理“维新政府”的问题，汪精卫只说蒙疆、华北的特殊性，言外之意是华中不存在特殊性的问题，因而没有必要成立特殊机构。梁鸿志则否认华北和蒙疆的特殊性，他认为如果存在特殊性的话，则华中、华北应一视同仁，同样处理，从而使汪精卫陷入两难境地。

梁鸿志还向汪精卫提出：否认重庆政府和第三国签订的条约是否适当？还问到与吴佩孚的会谈为什么进行不下去等问题，汪都作了回答。汪精卫为了安抚梁鸿志，充分肯定“维新”、“临时”两政府过去所作的努力，还要求与他们合作下去。

为了釜底抽薪，汪精卫与“维新政府”内务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分别进行了谈话。

汪精卫与梁鸿志于7月5日在南京进行第二轮会谈。由于“维新政府”内部出现离心倾向，汪利用了这个矛盾。汪指使周佛海、梅思平通过岑德广，拉拢“维新政府”内两个实力派人物陈群和任援道，使他们转而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向陈、任许诺，一俟将来“中央政府”成立，他们仍可官任原职。这样封官许愿的办法果然奏效，直接拆了梁鸿志的台。梁因此对“维新政府”的命运更为关切，他质问汪精卫是不是要取消“临时”、“维新”两个政府的名称，并直截了当地说：“新中央政府”是“合并”还是“改组”“维新政府”？“合并”则不同意，“改组”是可以的。汪精卫含糊敷衍说，打算使用“废除名称”的办法。

这次会谈中还出现了一点花絮：在聚餐厅，温宗尧附在汪精卫耳边悄悄说：“我个人毫无问题，无须考虑。”陈群则建议汪精卫在建立中央

政府时，要坚决主张采用青天白日旗。上述情况说明了温、陈对梁鸿志的不满和“维新政府”的离心倾向。

在日本政府的策动下，梁鸿志、王克敏不能不在表面上对汪精卫组织所谓中央政府表示支持。7月11日，梁、王在青岛大陆饭店正式接见新闻记者团，他们分别表示对汪精卫“全力协助之重大意志”。不过，王克敏、梁鸿志等真正与汪精卫叛国集团合流，则是半年以后的事。

1940年1月15日，汪精卫电邀王克敏、梁鸿志赴青岛会谈。参加会谈的人员除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外，作为汪记伪国民党代表的有褚民谊、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代表“临时政府”的则有王揖唐、朱深、齐燮元，代表“维新政府”的有温宗尧、陈群、任援道。李守信作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德王的代表，也列席了会议。

1月24日至26日，青岛会议共进行了三次会谈。24日在第一次会谈中，汪精卫侈谈“三民主义之真谛”。他胡说什么三民主义“与东亚主义、世界主义并不相违。盖其基本精神，以中国固有道德出发，以和平为信条，不以侵略为能事，故谓之王道，而非霸道。中国必得到自己之自由平等，乃能为东亚之一员，此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义也”。汪精卫把革命的三民主义等同于法西斯的东亚主义、世界主义，这是对三民主义的肆意糟蹋。

1月26日，临时、维新两伪政府联名发表声明说：“事变以来，临时、维新两政府先后成立，应时势之要望［求］，倡导和平，作战败之善后，图秩序之恢复，努力从焦土之间，拯救民众……去年夏秋之顷，汪精卫先生贲临北京、南京，互商时局，其勇敢赴难精神，令人钦佩，不胜铭感。今经青岛会议，进而将见中央政治会议之召集。关于内外政策，汪先生谈话所发表者，悉为吾人所冀求望其实现者，全国贤达之士，亦必深谅其苦心，而冀助成此大业也。复兴在望，不胜翘盼。”汪精卫在谈到青岛会议所要达到的目标时说：“吾人拟成立一名副其实之中央政府，俾得负担足以答复近卫声明之责任。此次吾人之所以前往青岛者，非为讨论和平之条件等，而系欲使国内一致团结耳。”汪精卫所谓“国内一致团结”，就是将王克敏、梁鸿志等民族败类拼凑在一起，为即将成立的伪中央政府装饰门面。王克敏、梁鸿志等公开宣布为汪精卫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捧场，青岛会议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76号特工魔窟

抗战时期，在沦陷区的上海，人们谈起76号魔窟，无不为之色变，这就是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魔窟所在地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这幢房子原为军阀陈调元的公馆，上海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就利用它作为特务活动场所。这是一个以破坏抗战为职志，残酷杀害民众的魔窟，是一个制造罪恶的渊薮。

汪精卫一伙逃到上海从事汉奸活动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他们知道仅依靠日本侵略军的刺刀保护，并非万全之策，他们迫切需要一支特务武装来为自己保镖，同时也为了打击抗日力量。

1937年11月，日军虽然占领上海，但在苏州河以南英、美、法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租界地区，日军还不能直接控制。一段时间内这个地区成为“孤岛”。中国共产党人利用上述条件对日本侵略者及汉奸的卖国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用恐怖手段处置了一批投敌汉奸。日本侵略者则力图扫清侵华的障碍，决心打破这种局面，因此扶植、筹组一支汉奸武装特工队伍，作为扼杀上海抗日力量的别动队，就成为必要的了。以李士群、丁默邨为头子的特工组织，就是适应日伪的政治、军事需要而产生的。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大革命时期在革命高潮的席卷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久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李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由季将他保释出来，于是向季投送了门生帖子，从此与上海流氓帮会拉上了关系。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逮捕，随即自首叛变，被委派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不久又与国民党特务丁默邨、唐惠民等编辑《社会新闻》，该刊物由“CC”特务直接控制，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大肆造谣诬蔑、挑拨离间，是个出了名的造谣刊物。直到1937年，李士群仍然是一默默无闻的国民党小特务。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南京沦陷后，李士群又与日本特务机关搭上关系，他逃到香港后，由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介绍给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为日本驻沪使馆搜集情报。李士群不甘心仅仅从事情报工作，为了扩大队伍，他采取拉人下水的办法，先后将唐惠民（“中统”上海区情报员）、章正范（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等人拉下水。李又通过章正范秘密会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汪、李一拍即合，互相利用。

李士群虽系国民党特工出身，但以其地位和声望，对“中统”和“军统”均不足以资号召。1938年国民党军统第三处撤销，丁默邨的处长职位也随之落空，仅在军委会挂了一个少将参议的空头衔，地位一落千丈。李士群获悉这一情况，即向日方推荐丁默邨，经日方同意后，便派丁的同乡翦建午（已投敌）窜到昆明向丁默邨说明李士群的相邀诚意，并表示李愿当丁的副手，丁欣然同意。丁默邨到上海后，李奉丁为“老大哥”，丁、李合伙，加快了特工组建的步伐，在日本军方同意下，又很快和汪精卫叛国集团勾结起来。丁与周佛海原为同乡旧友，又曾同隶“中统”系统，丁、李结合，周佛海认为这是一笔很好的政治资本，遂向汪精卫进言，要好好地利用这班人来搞“和运”。既然经过日本人的认可，汪即全盘接收丁、李的特务组织。

日本人既然对汪精卫、周佛海和丁默邨、李士群的合流那么感兴趣，就不遗余力地提供实际援助。1939年2月，丁默邨、李士群在清水董三引荐下，在上海重光堂拜会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丁、李谈了他们对特工行动的设想。第二天，丁、李向日方交上一份《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丁默邨神气活现地说：上海恐怖活动的元凶是重庆的特务工作队和蓝衣社的地下组织。日本军警可以逮捕现场的犯人，但是如果不破获蓝衣社的地下组织，那是没有用的。去年以来，日本军警抓了不少恐怖分子，可是恐怖活动仍然没有减少，就是这个原因。日方特务晴气庆胤听后，连连点头称是。

接着丁默邨、李士群又献出他们炮制的《上海特工计划》，该计划详细说明了特工组织的方针、工作要领、组织机构、工作据点的设置、行动队的组成、经费的使用、兵器的保管和修理、反谍报的方法，等

等。晴气、土肥原终于接受了丁、李的计划。晴气根据土肥原的命令回东京向大本营请示，引起日本陆军部军务课长影佐祯昭的极大重视，其时他正策划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于是就将丁、李的特工计划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为“汪工作”的一部分。2月10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向晴气发出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

训令规定：

（1）大本营确定，将援助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

（2）晴气在上海应与丁默邨联络，援助其特务工作，协助华中派遣军推行其对付租界的诸项政策，并须处理土肥原机关所遗留的各项工作，任命塚本诚宪兵大尉和中岛信一少尉，作为晴气的部属。

（3）在援助特务工作时，应对丁默邨提出以下要求：①制止在租界进行的反日活动，但注意不要和工部局发生摩擦；②不得逮捕和日方有关系的中国人；③和汪精卫和平运动合流；④ 3月份以后，每月给予经费30万日元，并给予手枪500支、子弹5万发及500公斤炸药。

这个训令的下达，标志着汪精卫与丁默邨、李士群特工组织的正式合流，也标志着日本侵华的工具——汪伪特务组织的正式建立。

在日本的支持下，丁默邨、李士群很快就组成了一支特工队伍，其重要成员除丁、李外，还有唐惠民、茅子明、李志云、杨杰、张鲁等人。其后陆续参加的有蔡洪田、黄香谷、顾继武、王天木、马啸天、林之江、袁君牧、田为霖、谢文达等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委员，因此使国民党“军统”在上海的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

为了壮大特务组织的声势，李士群从上海的流氓群中物色对象，青帮头子季云卿向李士群介绍了一批流氓如朱顺林、许福宝、吴四宝之辈。特别是吴四宝，此人是个凶神恶煞、满脸横肉、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他率领一批流氓如张国震、顾宝林、赵嘉猷、夏殿元等，率先组成一支30余人的警卫大队，也是最早的一支武装行动队。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汪伪政权的罪恶擢发难数，76号特工总部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但汪精卫之流也只能依靠这种组织及日本帝国主义者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76号特工组织对汪伪政权确实起到了保镖的作用。依靠76号的武装保护，汪精卫一伙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6 签订卖身契

汪伪“六全大会”虽然开过，王克敏、梁鸿志等伪政权头目也答应为其捧场，但日方对建立伪中央政权的具体要求尚未落实，为此，日、汪双方都认为有必要进行磋商，于是双方派出代表于1939年11月1日至11月12日召开了7次会议。日方代表为影佐少将、须贺大佐、犬养健、谷荻大佐、矢野书记官、清水书记官。汪方代表则为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周隆庠，后加派林柏生。稍后，须贺与陈公博又单独就厦门及海南岛问题举行了6次会谈。

通过上述会谈，双方签订了一份《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这份《要纲》及附件一、二，强烈地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妄图独占中国，使中国永远沦为殖民地，成为日本军事、政治、经济附庸的野心，从而陷中国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

用陶希圣的话说：这一《要纲》，无异于一个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说是五层。最深的一层是伪满洲国，第二层是伪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台湾一样的日本的军事基地。

实际上，这个《要纲》赋予日本以种种特权，例如所谓既成事实，蒙疆的“完全独立自治”，就是不能变更的特殊事实，“华北政务委员会”，也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又如所谓驻兵，防共的部队是永不撤退的，而撤兵的条件是“随治安之确立，两年之内撤兵”。但是判断治安的确立与否，日本人可以作随心所欲的解释，两年之内的时间限制，等于一纸空文。还有所谓治安驻兵，驻兵地域为华北及扬子江下游。此外，还有扬子江舰队、东南沿海及特定岛屿的海军驻兵，事实上都已成为永久性的驻兵。所谓“强度结合”或“紧密结合”地带，即陶希圣所称之小蓝图，日本在这些地带内，拥有驻兵权、资源开发权、通讯及成立特别行政机构等特权。所谓“特殊便利”，就是让日本不受任何约束，使伪政权的一切“政策法令”，都要依据日本的意向，完全适合日本军事上、政治

上、经济上的需要，日本不仅有优先权，而且凡是日方所需要的，汪伪就得协力完成。

难怪当日、汪密约的谈判刚一结束，周佛海等把《要纲》带给汪精卫，汪看过《要纲》后，流着泪对陈璧君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吧。”汪精卫总算有点自知之明，中国不是汪精卫之流所出卖得了的，日本也永远休想征服中国，但汪精卫等卖身投靠敌人的罪行，中国人民则一定要清算。

会谈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第一次会议纪要中，当梅思平提到“如能告知有关共同防卫项中的军队驻扎地，则不胜荣幸之至”时，影佐轻蔑地回答：“事关机密，暂时保密，请耐心等待公布时间的到来。”当梅思平提出今后讨论要以近卫第三次声明、重光堂会谈签订的《日华协议记录》和1939年6月在东京日、汪会谈的规定为基础，很难接受上述三个文件中所没有的东西时，影佐轻蔑地回答四个字“多蒙指教”，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当陶希圣提到“我们感谢日本方面援助中国，帮助成立新中央政府，但是希望能给新政府有充分活动余地，就是说，虽然承认小孩的生存，但依旧让他处于病状之中，这样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影佐反唇相讥：“陶先生仅仅把结束战争招致和平作为目的，但仅仅以此为目的，岂不是要恢复事变前状态吗？”影佐在这里自己揭开了“中日亲善”的面纱，毫不掩饰地说出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陶希圣的近乎哀求口吻和影佐的倨傲骄横神态，适成鲜明对照。

在11月4日第二次会议纪要中，周佛海谈道：“对我们来说，最为难的是把驻军作广范围的解释。这是掌握民心上的一个妨碍。”影佐直截了当地回答：“在这里所记载的，一切均属极密，可以不让人民知道。”这就等于说，这种鼠窃狗偷的事，本来是见不得人的。当梅思平提出“驻军如果涉及到内政，那就被认为是干涉内政”时，影佐训斥说：“贵方以避免干涉内政为理由而要求我们马上撤军，从原则上看，我们究竟为什么而流血呢？”当梅思平提到“中国（指汪伪）能依靠自己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的军队维持治安”时，影佐嘲讽说：“和平恢复后，汪先生手中能有多少军队，这是将来考虑的问题。”影佐的话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汪精卫现在根本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

顾问问题是日、汪双方争执较多的问题。周佛海直截了当地说：“顾问问题，坦率地说，一般人看见华北的喜多中将和华中的原田中将两人就感到头痛。”周佛海还谈到他讨厌顾问的原因：“在于临时、维新两政府中，顾问采取长官的态度，没有顾问签字，命令发不出去。”影佐针锋相对地教训周说：“日本方面也很重视顾问问题。这就是新中央政府用哪一国的顾问用到什么程度……而决不是贵方所担心的派遣顾问是有意胡闹。”影佐还补充说：“捉住个别坏例子，破坏一般的感情，我认为是可以避免的。”影佐最后就顾问问题强调说：“总之，是既成事实，不应把它当作无理看待。这只是说初生婴儿不能脱离奶水。”这简直是把汪伪当做“不能脱离奶水”的婴儿看待了。

当谈到把晋北十三县划归“蒙疆”问题时，周佛海向影佐诉苦说：“如果把它划给蒙古，河北门户洞开，这样，就没有任何理由向中国民众解释。只有以长城线为汉人所有为理由，聊以保持体面，以示苦衷。”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汪方与日方谈判，讨价还价，无非是为了“保持体面”，以便欺骗中国人民。看来日、汪双方的谈判，从汪方的动机和企图达到的效果来看，就是这么一回事。

日、汪双方经过7次会议，虽然还有些枝节问题尚待解决，作为汪方的首席代表周佛海即表示：“可以作为同意而签字，当然作为未定稿，仍然要经过会议后，再汇集于会谈记录中，写成主文、谅解事项等议事录，作为将来签订条约的资料，从而可以在此签字。”周佛海还以急迫的心情央求日方说：“我们是根据中央政治会议探讨今后的问题。所以，如果现在不能解决各个问题，便无法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例如，联合银行的问题，华兴商业银行及军需的问题等，都必须一下子加以解决。”看来，周佛海的着眼点放在急于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为了解决筹组伪中央政府的财政问题而急于表态。但影佐却不紧不慢地回答：“我们尽可能致力于问题的决定。但是，对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也无可奈何。如果认为由于急于建立政府，不确定细目，就

无法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建立将发生障碍，就会造成了为了使孩子活着，结果母亲死了。”影佐对汪方的曲意讨好并不完全满意，他仅表示：“凡是确定的，双方可以签字，我们保留的提案尚有十七件。”不言而喻，日、汪密约以汪方几乎全盘接受日方条件而告结束。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8 伪政权一波三折

汪伪登台，日方迟迟不予正式承认，究其原因，一是日本不想一下子切断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系，即不愿中断对重庆方面的诱降工作。另一方面，日、汪双方的《基本关系条约》还在谈判过程中，就是说日方不满足于双方的密约形式，必须将汪方的卖身契——密约公之于世，以便于日方更能放手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掠夺和奴役。因此这两方面的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1940年4月22日，日方派出“特别大使”——前首相阿部信行及日本国民庆祝国民政府成立使节团到达南京，参加汪伪的“还都典礼”。使节团的另一些成员如影佐祯昭、须贺彦次郎、犬养健及日高信六郎、松本俊一等人，则主要是协助阿部与汪方进行正式“国交谈判”。与此同时，日方以蒋、汪合流为目标的“桐工作”也在积极进行。日方由铃木、臼井、今井武夫与重庆的“宋子良”（实即军统情报人员曾广）等人保持密切联系。4月“宋子良”由重庆回香港，亲向铃木卓尔表示，重庆政府已有决定方案，要求举行预备会议。6月上旬在澳门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议。澳门会谈决定蒋介石、汪精卫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举行“长沙会谈”。但是，“长沙会谈”因中日双方对会谈的地点、时间、手续等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而难以定案。其时法西斯德国在欧洲战场节节得手，日本政府亦急于结束中日战争，对“长沙会谈”寄予希望。6月23日，它派铃木中佐下达训令，指示日方代表就和谈条件对中国让步，撤销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和驻兵两个苛刻条件。7月22日“宋子良”与铃木在香港再次会谈，决定8月初举行“长沙板垣—蒋介石的停战会谈”。日方亟谋停战，重庆方面则若即若离，要求日方再作让步。这种情况表明中方无意和谈。铃木中佐于7月31日宣告和谈失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海军分别于8月10日、9月10日相继确认“桐工作”失败。9月19日，经过御前会议讨论，日本政府决定暂时中止“桐工作”。10月8日，日本陆军根据指示，正式结束“桐工作”。

7月5日，日、汪双方“国交谈判”在南京进行。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作出《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的决定，在决定的附件中，日本提出以

下苛刻条件：

一、中国承认满洲国。

二、中国放弃抗日政策，建立日华善邻友好关系，为适应世界的新形势，与日本共同担任保卫东亚之责。

三、在蒙疆及华北三省驻扎军队。在海南岛及华南沿海特定地点驻扎舰艇部队。

四、中国承认日本在上述地区开发和利用国防上必要的资源。

五、中国承认日本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于一定期间内进行保障性的驻兵。

大概由于上述条款过于露骨，所以改成正式文本时语气有所缓和，而性质则不变。关于反共方面，规定得尤其具体。例如：

第三条　两国政府相约，对于足以危害两国安宁及福利的一切共产主义的破坏活动，共同负防卫之责。

两国政府为完成前项目的起见，应各在其领域内，铲除共产分子及其组织，并对防共有关的情报、宣传等紧密配合。

日本国为实行两国共同防共起见，在必要期间内，根据两国另行协议决定，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

第四条　　两国政府相约，派遣于中华民国的日本国军依据另项规定，在撤兵尚未完了之前，对共同的治安维持予以紧密协作。

第五条　中华民国政府承认日本国基于以往的惯例，或为确保两国的共同利益，在必要期间内，依据两国间另行协议决定，得驻泊其舰艇部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特定地区。

第六条　两国政府基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原则，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应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关于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国紧密合作，加以开发；关于其他地区内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国及日本国居民应提供必要的便利。

关于前项资源的利用，应考虑中华民国的需要，而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国及日本国居民应积极提供充分的便利。

两国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为发展一般通商，以及便利而合理地供给两国间的物资。两国政府对于增进长江下游地区的通商贸易，及日本国与华北及蒙疆地区间合理供给物资方面，尤应紧密合作。

日本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的产业、金融、交通、通讯等的复兴与发展，应依据两国间的协议，对中华民国作必要的援助甚至共同协作。

第七条　随本条约所规定的日华新关系的发展，日本国政府应撤销其在中华民国所有的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而中华民国政府为日本国臣民的居住和营业，应开放其本国领土。

第八条　两国政府关于为完成本条约的目的所必要的具体事项，另行订约。

第九条 本条约自签字之日起实施之。

日本政府与汪伪政权签订协定，其目的是为了配合希特勒德国的所谓世界战略，急于把中国变成它实行南进政策的大陆基地。以上条款说明，日方对汪伪除了一点不兑现的诺言如撤销治外法权和交还租界外，在“紧密协力”、“共同防卫”、“紧密配合　”、“紧密的经济合作”、“提供必要的便利”、“提供充分的便利”、“共同协力合作”的美妙的词句下，其中无一不是对汪伪及广大沦陷区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控制，对某些地区甚至实行赤裸裸的军事占领。为实行此条约而签订防务议定书及谅解事项，其条件之苛刻，令人触目惊心。汪精卫一伙，对这样的亡国条约，竟俯首帖耳，甘心听人摆布，签订卖身卖国契约，其卖国求荣的罪行，真是令人发指。

汪精卫与日本在签订了《基本关系条约》后，同日又签订《日满华共同宣言》。这项宣言共三条，内容如下：

一、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互相尊重其主权和领土。

二、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为了实现三国间以互惠为基础的一般合作，尤其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在各方面采取必要的一切手段。

三、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根据本宣言的宗旨，迅速签订协定。

就这样，汪伪就以所谓“合法”的形式，承认了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对东三省的殖民统治。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五 横征暴敛

1 税卡林立

汪伪政权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关税、盐税和统税三项，这三项税收均由日本控制。所谓关余，即中国对八国联军各国的“庚子赔款”历年由海关在税收内尽先支付，如有多余，称为“关余”，一直存于英国汇丰银行。自北京、上海、广州相继沦陷后，这笔关余被强迫存于日本的正金银行，数目相当可观。汪伪政权成立后，日方表示，愿将此项关余交给汪方使用，其条件是，在伪政府成立前，由汪方暂向正金银行按月照实际需要借用，作为记账，以后由伪政府与正金银行结算。

1940年2月，日本兴亚院会议作出决定，同意借款4000万元（法币），作为汪伪政府的开办费，但必须分几次提取，规定3月30日拨出1500万元，4月30日、5月30日分别提取1000万元，6月30日再提取500万元。另外还规定提款时须将法币换成军票或华兴券（伪维新政府发行的纸币）。3月29日，作为伪财政部长的周佛海与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岸浪义质签订借款协定于南京，伪中央政府才得以宣布登场。为了便于收税，伪财政部下设关务署、盐务署、税务署，还设有苏浙皖税务总局及盐务总局。汪伪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便是依靠关税、盐税和统税。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的1940年7、8、9三个月的预算案表明，关税、盐税、统税占其收入的大部：在其全部收入的62892300元中，计关税3000万元，盐税300万元，统税1500万元，特税270万元，所得税300万元，蚕丝建设特捐150万元，行政收入192300元，借款750万元。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关税、盐税、统税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1941年底，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上海进出口贸易几濒断绝，关税锐减。而盐税方面由于盐场划归华中盐业公司（日本振兴公司的子公司）直接经营，盐税减少，伪财政部不得不于1942年停征盐税，由裕华公司承包食盐专卖。关税、盐税收入无着，伪财政部只得加重征收统税，为此从1943年起，设立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税务局和印花烟酒税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局。

汪伪政权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有所谓中央税、地方税之分。中央税除前述关、盐、统税外，另有所得税、通行税、箔类税、粟类税、化妆品临时特税和桐油、茶叶、猪鬃、禽毛临时特税等。至于地方税，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以苏北地区为例，除6项专税外，另有大车税、民生税、县税、团税、枪杆税、复兴税、补助税、扬子税、附属行营军事补助税等。地方税捐中还有衣服捐、人头税、娼妓捐、鸦片烟税。鸦片烟税又名特税，其中除戒烟税外，还巧立正捐、附捐、花捐等。

除上述数不清的苛捐杂税外，汪伪政权还经常发行多种债券，如1942年5月在苏浙皖地区发行15亿元的金融公债，强令各银行认购，30年内还清。12月又发行甲种、乙种粮食库券，达5亿元；同时又发行甲、乙米粮库券，总额达15亿元。1944年1月，还发行6亿元的所谓建设公债。

税收也好，债券也罢，仍然解决不了汪伪财政的需求，为此，它亟须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银行，发行纸币，控制沦陷区的金融，以便于从事对沦陷区人民敲骨吸髓的搜刮和进一步开辟伪政权的财源。汪伪的“中央储备银行”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台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六“清乡”罪恶

1 卑鄙的目的，险恶的用心

汪伪政权成立后，积极配合日寇的“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侵略方针，推行反共“清乡”就是其中颇为重要的一项政策。

日本侵略者把“清乡”重点放在华中占领区，因为这一地区战略地位重要，日本企图通过“清乡”将此地区建成其推进“太平洋战争”的稳固后方战略基地。

另一方面，日本当时需要强化汪伪政权，而伪政权辖区即在华中占领区，不搞“清乡”，无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图谋。

日伪“清乡”的又一目的，在于直接掠夺这一地区富庶的战略物资和经济资源，满足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

1938年以来，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游击队的健儿们在江南沦陷区非常活跃，给敌伪军以有力打击，因此日伪军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上述抗日队伍。

1940年11月，日本御前会议作出《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的决定，强调要在华中、华南和华北占领区“彻底整顿治安状况”。所谓整顿治安，其目的在于“彻底开发并获取国防资源”。1941年11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了《昭和十六年以后长期战政治策略指导方针概要》，首次提出以长江下游地区为起点，逐次进行“清乡”的险恶方案。汪伪的军事顾问晴气庆胤，据上述方针具体策划了“清乡”计划。随后晴气与汪伪警政部长、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正式提出“清乡”建议，汪精卫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批准了这个计划。

汪精卫、周佛海原来准备让罗君强任清乡督办，设署办公。但是某一天，汪伪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突然向汪精卫提出：“清乡是一件

重大工作，必须设置一个较大的委员会，请汪阁下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两阁下兼任副委员长，各有关部、会长官兼任委员；在苏州设立办事处，由一位秘书长代行会务，我们日本军将把第一期清乡的江苏数县包围起来，清乡委员会即在此范围内工作，需要政治与军事齐头并进，特工力量尤应全部利用。所以委员兼秘书长兼苏州办事处长一席，似以由李士群阁下担任为适宜。”原来李士群与晴气早拟订好一整套方案，由影佐出面交汪认可，汪只能点头称是，陈、周更无可奈何。

日伪对“清乡”寄予厚望，其具体办法是：“军事清剿，继以政治，辅以党务，以矫正其观念，了解和运之真谛，整理之，建设之，以健全之行政机构恢复乡村程序，则地方之治安庶可确定。”

日伪的如意算盘是：以“军事清乡”开路，扼杀、消灭抗日武装力量和一切抗日活动。接着的是“政治清乡”、“思想清乡”，与此同时，建立以保甲制度为主要形式的基层组织，企图以此来控制清乡地区的人口、物资、赋税，进而确立日伪统治下的社会治安，这就是日伪搞“清乡”的险恶用心。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清乡”种种

“军事清乡”是“政治清乡”、“经济清乡”的先决条件，它本身就是对抗日军民进行血腥的军事镇压。其具体做法是先划定清乡区，然后在清乡区周围设置若干据点，以河流、公路、铁道、湖面为依托，形成包围态势。“除原有碉堡之外，在交通要道及各市镇增筑堡垒，加设营棚。水陆要道口，扩张铁丝网、电网。除用堡垒及营棚驻兵困围之外，用兵车、兵船、快速部队，加紧铁路、公路和水道的巡逻”。日伪认定包围圈形成后，即调动部队进入清乡区，寻找新四军及其他抗日部队实行扫荡。敌伪军在包围圈内增设据点，不分昼夜地四出“搜剿”，挨户清查，搜捕中共党员、干部及民兵。据曾任清乡政治工作团副团长的沈千里交代：1941年7月初，他与工作团团长带领一帮人，“在伪清乡警察第二中队配合下，进入常熟支塘镇解放区时，一条长达二里的街道，看不到一个老百姓；沿街店铺房屋，多数门窗洞开，里面无人，有些房屋被烧得只剩下断垣残壁，摇摇欲坠。事后，我们和当地日寇驻军西屋部队接触以后，才知道原来是一个有七千居民的大镇，由于日伪军的兽蹄践踏，老百姓走散了一大半，剩下的一半，都是老弱病残，行动不便的居民，也因缺吃缺喝，处于绝境”。由此可见，敌伪的“军事清乡”，给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

日伪进行军事扫荡后，就用竹篱笆、铁丝网设置封锁线，成立大小检问所，对人民实行军事法西斯统治。凡通过封锁线者，须领有各种证明书，凡运输物资，“须申请发给搬出入证”。这样一来，就使沦陷区人民的人身自由丧失殆尽。

继“军事清乡”而来的，就是所谓“政治清乡”。“政治清乡”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编组保甲，它强迫居民实行“连坐切结”，规定“每若干户为连坐连保，订立连坐切结”，“如该保内藏有要匪及匪物，先未报告，后经军队、团体或（清乡区公署）署长查出者，同结者与匪同罪。与匪暗通消息后，一经查实，即应处以极刑”。这种编保甲、贴门牌、搞身份证明、建户口制度的办法，其险恶目的就在于妄图切断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破坏一切抗日组织。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政治清乡”的另一目的，则在于强化伪政权。为此大力组建伪警察保安系统。“清乡委员会”原设有清乡警察总队，江苏省在各地区又增设警察大队。1943年3月，该省就增加警察3000名。在清乡地区的省和专区，分别设保安司令部和保安处。此外，还招收大量土匪和地痞流氓，收编蒋介石派驻在苏南的“忠义救国军”。在苏南清乡的一年中，由招抚整编委员会收编的杂牌部队号称24支，人数达16300人。于是组成了以日本侵略军为主、汉奸仆从军为辅的军事网，对清乡地区抗日军民施加强大压力，使斗争更为艰苦。

日伪的“经济清乡”，照汪精卫的说法，是为了“改善经济”。在汪精卫看来，清乡地区人口增加和赋税增多，就是“治安确立”、“民生改善”的标志。具体地说，清乡地区扩大了，被统治被剥削的对象增多了，随之而来的赋税增加，汪伪的经济情况也就得到“改善”了。

日伪“经济清乡”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搞经济封锁。从第一期清乡开始（日伪共搞了三期清乡），“清乡委员会”就宣布对苏州、常熟、昆山、太仓清乡区实行“物资统制”及“运销管理”。即日伪认定的“绝对禁运品”，概行禁止“在境内运输或运出运入”。又规定粮食作物如大米、小麦、面粉、豆类等，以及棉花、丝、皮革、金属矿石等14类物资，运出封锁线时，要得到“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七号出张所”的批准。同样，对物资入境也要实行封锁。此外，由上海等地运进封锁线内的13类物资，如石油、汽油、机器、棉纱、布品、棉织品、盐、糖、医药用品，也要经过第七号出张所和当地清乡公署的同意，才能运进。日伪的罪恶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封锁，从经济上使抗日军民陷入困境。

在“军事清乡”阶段，日伪是赤裸裸地采取杀人越货、武力抢劫、公开没收与霸占等手段；而在“政治清乡”、“经济清乡”时，则更多地采取征发赋税、统制物资的手段。

实际上“经济清乡”所使用的手段，仍然是野蛮残酷的，抢劫、搜刮和敲诈勒索，应有尽有。清乡部队借故搜查“坏人”，下乡骚扰，翻箱倒柜，为所欲为，把老百姓的东西不问青红皂白，拿了就走。检问所的勒索更是无所不至。老百姓通过检问所时，往往遭到检问人员的横加勒索，如不上缴钱物，就休想通过。检问人员对流通物资，随时可以“非

法”名义予以没收。据汉奸张修明（镇江清乡公署副主任）供称：“汉奸头目在鬼门关（指检问所）上，得到大量赃款。在镇江地区时，每月从三个县近四十个大小检问所上，得到的赃款就有四十多万元（合大米一千三百石）；至于上了二百多个检问员、检问所主任腰包的财钱，更是无法统计了。”

汪伪把增收田赋认定为“最大之税源”，下令“督征旧欠”，限期交清。汪伪于1942年在太仓县强迫缴纳1938年至1940年的3年田赋，实行“租赋并征”，地租、田赋一般各占产量30%左右，农民这一年辛苦所得，清乡机关轻易就拿走了60%。

“改订赋章”是汪伪的另一掠夺办法。例如常熟县每亩征税战前1元稍多，而到1941年10月，赋税加并征税每亩高达9元。到1942年，江苏被清乡的各县，每亩增加到20元。就是说，是战前的10倍至20倍。在部分地区，汪伪又实行田赋征实办法，而实物折价率则不到一半，有时甚至只有1/3。据不完全统计，吴县、昆山、太仓、常熟、无锡、江阴、武进等县，1941年1月到5月，清乡前共收田赋58万余元，但在1942年同一时间内则收田赋232万元，清乡前后相较，收入增加了3倍。如就江苏全省而言，1942年田赋收入就比1941年的收入增多十几倍。汪伪“经济清乡”对人民来说，意味着敲骨吸髓的盘剥和无穷无尽的灾难。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七 汉奸理论

1 “和平建国”论剖析

汪精卫集团在降日过程中，把他们的卖国活动美化为“和平运动”，并先后提出过“和平救国”、“和平反共建国”、“复兴中国复兴东亚”、“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口号。这些反动谬论究其实质，一言以蔽之，曰“反共反蒋卖国”。关于这一点，汪精卫本人亦不讳言，他对作为时局转折点的“西安事变”深恶痛绝，对于作为抗日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极端仇视；他肆意攻击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党是只知有第三国际，不知有中国的，他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牌收起，将抗日的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对于共产党的阴谋，也没有一刻不想着抵制他，揭破他”。汪精卫所说的“转圜”，其实就是投降的同义语。

汪精卫由恨共产党转而迁怒于蒋介石说：“不幸蒋不出此，反而用深闭固拒的态度，对于日本的提议（指近卫声明），更用极端压迫摧残的手段，对付国内党内的一切和平提议。以此之故，蹉跎半年，大局日深败坏，不可收拾，这是真可痛惜的！”在汪精卫等看来，当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跟着蒋高调继续抗战，以蒋现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并且不足以控制共产党，以蒋现有的环境，虽欲不跟着共产党而不能，这样下去，只有以整个国家民族跟着蒋为共产党的牺牲。另一条就是把总理孙先生的遗志重新的阐明起来（指歪曲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一文），重新的实行起来，对于日本，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努力于转敌为友。第一步恢复中日和平，第二步确立东亚和平。这两条路前一条是亡国灭种的路，后一条是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路。”

这篇广播稿，被日、汪双方视为开始实际“和运”工作的宣言，它清楚地表明“和平建国”论的反动实质。汪精卫所谓的“和平”，就是要求重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停止抗战，接受日本政府的亡华条件，向日本屈膝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投降；而他所鼓吹的“和平建国”，则是要求蒋介石和他一样，在日本刺刀保护下，反共卖国，建立傀儡政权，如此而已。

在伪政权登场前夕，以汪精卫名义发表的所谓《和平宣言》，把汉奸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宣言声称：“自今以后，易抗战建国之口号为和平建国，并郑重宣布以反共为和平建国之必要工作。”汪精卫进一步为其投降活动涂脂抹粉说：“苟危亡犹有可救，则挺身任过，与日本停战言和，接受可忍受之条件，以保存尚未耗尽之国力，收拾败残，重谋兴复，实为国民政府及中国国民党同人应有之责任。”他攻击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把持权势，胁迫民意，日日以抗战到底，最后胜利自欺欺人，使国土愈蹙，国力愈耗，终至于不可救药也。”汪精卫奉行的是丧失国格、人格的偷生哲学。汪为他们的“和平运动”大唱赞歌说：“此次和平运动，不徒欲消弭目前之战争而已，必深求战争之原因，解除过去之症结，重新建立将来之正鹄，使中日两国得向于共存共荣之大道而携手前进。中日两国为东亚之柱石，两国相安，则东亚和平得所保障，而世界和平亦于此奠定基础。”尽管此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但汪精卫有其敏感的政治嗅觉，在他笔下，“东亚共荣圈”的口号，似乎已呼之欲出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新国民”——顺民

汪伪政权推行的“新国民运动”，是1941年至1945年在华中、华南占领区进行的一次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活动，也是与“清乡”互为表里的一次奴化中国人民的运动。汪精卫一再叫嚷“清乡必先清心”。周佛海也说：“清乡工作之根本，不仅为军事上之扫荡，抑且为思想上的斗争，不仅在治安上的确立，抑且在心理上的建设。”日伪的罪恶目的在于从精神上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意识，因此汪伪大力宣传法西斯主义和卖国主义。汪伪在“清乡委员会”下设置了宣传委员会、宣传队和政治工作团，又在各级政府中设置了相应的宣传机构，强迫居民接受清乡宣传，勒令居民参加集会，举行清乡演讲，印刷、散发清乡报刊，《清乡新报》、《清乡日报》、《清乡旬报》、《清乡前线》、《清乡画报》、《清乡实验特刊》等6种报刊，均在苏州出笼。汪伪又举办清乡展览、清乡征文，张贴清乡标语，炮制清乡口号、漫画，散发传单，放映清乡幻灯片，上演清乡戏剧电影。宣传的中心无非是反共、卖国，对日本法西斯顶礼膜拜，向沦陷区人民不断灌输“大东亚精神”、“中日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东方固有道德文化”，如此等等。

汪伪深知仅凭上述宣传，人们不会相信他们的鬼话，就强制实行“清乡特种教育”。其手法是：“训练一般成人及儿童，使能彻底了解无底抗战的谬妄及共产党的罪恶，并深切了解国策及世界大势，以期确立和平反共建国的信念，努力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工作。”这种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媚日、反共、反民族，因此编选这种教材的要求是：“以国民政治常识为中心，对国家意义、国际地位及领袖（指汪精卫）言论，有基本的了解。以东方固有文化道德为中心，期使确立和平反共建国的信念，进而认识大亚洲主义。”教材以下列内容为中心进行编纂，即三民主义、领袖言论、大亚洲主义、清乡要义、地方自治、生产技能、史地大要、卫生常识、反共材料、农业副业、自卫常识、乡土教材等12项。

对沦陷区儿童，汪伪也不放过，千方百计腐蚀毒化他们纯洁的心灵，其险恶目的在于驱使无知青年甘心充当日本侵略者的炮灰。汪伪印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行《儿童清乡特刊》，鼓吹现代儿童的新使命是：参加大东亚战争，建设东亚新秩序；参加清乡运动，清乡运动是实现国策的原动力，目的是确立治安，改善民生，矫正思想；参加新国民运动，新国民运动是大东亚解放运动和清乡运动的基干，强调“清乡即是清心，清心就是新国民运动”。

这个所谓的“新国民运动”，发端于1941年11月，1942年元旦，汪伪颁布了《新国民运动纲目》，同年7月，在南京成立新国民运动指导委员会，并在各行各业、各阶层建立起新国民运动促进团。汪精卫对此运动寄予厚望，他得意忘形地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理，新国民运动便是病治好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汪精卫挖空心思要造成什么样的“新国民”呢？那就是要“把爱中国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换句话说，就是要中国人民认敌为友，把日本侵略者视为亲如手足的兄弟。还有所谓“团体要组织化，行动要纪律化”，就是要求各伪组织团体除了接受汪伪的控制以外，还得听命于日本所规定的“纪律”。另外还有所谓“要以铢积寸累的精神，发达国家资本”，说到底，就是要把中国人的一切财物，全盘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汪伪，使得日本财阀的垄断资本和汪伪头目的买办官僚资本“发达”起来。所谓“个人对于国家贡献要多，享受要少”，事实上是不顾沦陷区人民的死活，将其创造的全部劳动果实无偿地交给日本强盗及汉奸走狗。所谓“节约消耗，增进生产”，其着眼点在于加紧生产军用物资，最大限度地满足日本法西斯不断扩大的侵略战争的需要。由此可见，所谓“新国民运动”，就是汪精卫汉奸集团在日本侵略者指挥棒下搞的一整套奴化中国人民的运动，让广大沦陷区人民服服帖帖地做日伪统治下的顺民，这种险恶居心及狂妄图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八 机关算尽

1 伪政权要求参战

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气势汹汹地向英、美等国宣战，对此重大决策，汪伪事前一无所知，当日本通知汪伪后，汪精卫受宠若惊，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进一步坚定决心，要求国民努力，中日两国“团结迈进”。汪精卫还根据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发表声明说：“根据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的，国民政府决定与友邦同甘共苦，临此难局。”伪外交部亦宣布，对与日本国发生战争关系的各国外交官、领事官，今后概不承认其职务之执行。汪伪又召集军政长官会议，会上汪精卫大放厥词，说什么：“与会人员务须与中央同心协力，加强地方治安，加强军队力量，与日本同甘共苦。”汪伪军事委员会为此下达命令说：“凡部队长官，非经呈奉核准，不得擅离防地，其军事机关各级职员，一概不准请假或擅离职守。”很有点进入战争状态的气氛。

汪伪如此卖力地自告奋勇硬要挤入向英、美宣战的行列，是有其如意算盘的，这就是如果直接向英、美宣战，就可成为大东亚战争中的一员，事实上就成为日本的“同盟国”，从而改善其附庸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参战，可提高其政治地位，这就可以增加对重庆国民政府劝降的砝码，进而实现宁、渝合流，达到汪伪梦寐以求的“全面和平”。他们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活动密切注意，周佛海有一番话，颇能说明汪伪在这场战争赌博中，总想与重庆平起平坐。周佛海向影佐祯昭诉说：“如渝方不对日宣战，余主张我政府不必对英美宣战，以免将来统一及全面和平又多一障碍，但渝方如对日宣战，我必对英美宣战。今渝已参战，我方不宜不宣战也。”但日本对汪伪的要求反应冷淡：“中国（指汪伪）参战是否必要？是否得策？须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及如何与帝国（日本）战争配合。”干脆拒绝了汪伪的参战要求。

为什么日本对汪伪采取如此态度？首先是汪伪本身毫无参战力量，在日本眼里只是听人摆布的一具傀儡僵尸。另外，日、汪之间还有利害冲突。日本担心汪伪参战后可以捞取英、美等敌国在中国的部分权益。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日本的顾虑是多方面的，例如：汪伪参战后，对渝方作战将有何影响？在作战资材与战费方面所需日本支援的程度如何？既然宣战，随之而来的就有日、汪双方间的共同防卫乃至攻守同盟问题，也亟待处理。还有由于汪伪参战，反而给人一种印象，即日本力量是否已经削弱。

日本后来为什么又同意汪伪参战呢？那是在太平洋战争进行一年以后的事，因为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日本极为不利，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失败得很惨，并从此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接着又在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遭到更严重的挫败。由于连吃败仗，日本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作出同意汪伪向英、美等国宣战的决定。

1942年12月，日本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作出处理对华问题根本方针的具体策略的决定，接着由御前会议提出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其着眼点在于把汪伪的参战作为打开日中局面的一大转机。其具体设想是：日本“专门致力于加强国民政府之政治力量的同时，还要力图消灭重庆借口抗日之根据，使日本真正与新中国（即汪伪）成为一体，向完成战争迈进”。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日本在加强汪伪政治力量的同时，更要求汪伪为其侵略战争卖命效力。为此，日本认为在下列问题上必须与汪伪达成共识，即日本政府与汪伪之间签订关于战争协力、日华共同宣言问题、有关汪伪的宣战布告内容、归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的形式内容等等。

为完成既定方针，1942年12月19日，汪精卫一行奉命赴日，与汪同行的有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萧叔萱等。离上海抵东京时，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通告日本的决定。原定汪伪宣战时间为1943年1月中旬以后，但日本突然于1月7日由日本驻汪伪“大使”重光葵通知汪精卫：“东京对于国府（汪伪）有关参战的各项措施，8日枢密院咨询完毕，希在9日内双方签署，须火速在现地实行。”这早已是汪精卫求之不得的事，他拿着鸡毛当令箭，答应在9日发表宣战公告。日本为什么从不同意汪伪宣战到要求汪伪提前宣战呢？据说在1月6日大本营破译了美国特密第7号电报，得知美国通过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签订中美平等新约，将于近日经参议院审议生效。与此同时，在重庆，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亦将签订《中英条约》及《附件》。中美、中英新关

系条约的签订，将对日本与汪伪鼓噪签订《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的骗局以有力的揭破和沉重的打击。因此，日迫不及待地要求汪抢在中美、中英新条约签字之前正式向英、美宣战。

1月9日，汪伪在《宣战布告》中叫嚷："英美等国勾引渝方，分别参加所谓英美战线，出兵缅印，且嫉视国民政府统治区域（指华中、华南沦陷区）之和平发展，唆使渝方分子不断侵扰，以阻挠种种建设之进行。国民政府为此宣言：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

仅仅宣战还不够，汪精卫又与重光葵签署所谓《中日共同宣言》，声称："双方将紧密协力，以谋完遂对英美两国之共同战争，而于大东亚建设以道义为基础之新秩序……并期进而贡献于实现世界全体公正之新秩序，为此，双方兹以不动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及经济上，作完全协力。"隔了10天，伪国民政府发表告将士书，说什么："国民政府为根据中日基本［关系］条约的一贯之精神已经正式宣布参加大东亚战争，与友邦日本签订共同宣言，表明为完遂对英美共同战争，打倒共同敌人，两国政府，当以不动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作完全之协力。从今以后，中国将以独立自主完全自由之立场，与东亚诸邻邦，及世界之友邦，同心协力，步入保卫大东亚战争之联合战线。"汪精卫集团就是这样鹦鹉学舌般跟着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敌，并心甘情愿充当侵略者的帮凶和炮灰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九 群奸下场

1 汪精卫客死东瀛

1944年正当日本法西斯摇摇欲坠之时，汉奸头子汪精卫也病入膏肓。关于汪精卫的死因，雷鸣在《汪精卫先生传》一书中说：“语云：忧能伤身，先生（指汪精卫）为救国族于泥淖，从破碎中踏上复兴之路，在过去数年中，确可谓已至心力交瘁之境。加以先生因青年时代即奔走革命，患有宿疾（糖尿病），尤其自民国廿四年（1935年）十一月一日在国民党六中全会会场为仇者暗算，身受三枪之后，因当时未能将子弹全部取出，所以近十年以来，外创内伤，时常并发，而影响于先生健康者至巨……至民国卅二年（1943年）八月，因连续数月间往返京沪，东渡日本参加会议演讲，并视察清乡，治军勤政，其积年宿病，竟至并发。”

金雄白亦认为：“汪精卫终于受不了旧创所导致的绝症，影响到身体上的痛苦，更受不住对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悲伤（这显然在美化汪精卫），使其精神上受到更大的痛苦……汪精卫患此绝症的导因，完全是为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遇刺后，子弹留在体内的关系。当时他被送往鼓楼医院，由沈鹏飞外科医生开刀，仅将左颞部之碎骨与弹片取出，颊部与背部的子弹，因流血过多，身体虚弱，未敢再动大手术。颞部开刀以后，眼旁红肿极烈。向为汪精卫好友而兼医学顾问的德籍诺尔医生于出事时，方去西安打猎，等到得讯赶回，已在一周之后，经其施行手术，先将颞部子弹重为开刀取出外，认为伤势仍极严重，力主移沪治疗，于是注射了破伤风预防针后，即匆匆易地赴沪……汪精卫于受伤前本患有糖尿症，自赴青岛疗养后，渐次恢复，已可吃少许巧克力糖。自经这次手术，发现时有脉搏间歇现象……直至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未及彻底治疗，又为国事以跳火坑的精神兼程赶回。到1943年8月间，胸背以留存在体内子弹的影响，突然又感疼痛，于是在同年12月19日，在南京由日本陆军医院将子弹取出，一时经过良好。”

这就是说，汪精卫当上汉奸头目后，内外交困，度日维艰，长期糖尿病的折磨，是致死原因之一。最要命的是1935年遇刺后，体内犹有未取出的子弹，这是致其死命的原因之二。所谓“外创内伤，时常并发”，事实上他是死于“旧创诱致多发性骨肿症”。

关于汪精卫病情恶化并濒临死亡的情况是这样的：

1944年元旦，汪精卫在南京私宅忽感身体不适，4日傍晚，其私人医生诺尔为他诊断，感到情况严重，诺尔观察汪的行动，认为有癌症现象。汪精卫的腰部以下渐感麻痹，并不时发高烧，病源不明，遂至卧床不起。同年2月，汪精卫病情渐趋恶化，适陈璧君以胃病延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教授黑川利雄赴南京为她治病，顺便为汪精卫诊断。诊断结果，黑川认为汪的病情已到危险阶段，非动大手术不可。经黑川与日本政府商洽，决定将汪精卫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同年3月3日，汪精卫偕陈璧君及其子女汪文惺、汪文彬、汪文悌，女婿何文杰及周隆庠等人乘专机赴日，其时名古屋为日本工业基地，经常遭到盟军空袭，日本政府只好采取紧急措施，在汪精卫到达前，命令名古屋师团司令部在预定汪的病室外南侧旷地上，建筑防空壕，并限于一夜之内完成。还动员了日本全国的外科、整形外科、内科、放射线科等第一流权威医生组成会诊团，为汪精卫作出治疗方案。当地的军警机关还为此实施全面警戒。

汪精卫的病房，位于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四楼的最后一套特别室，相当宽敞，有卧室、日式起居室、厨房、浴室、日光室、厕所等。四楼全部房间，都供汪精卫家属及其随员居住。此外三楼有三个房间供陈璧君会客及日方有关人员之用。日方将汪精卫来日治病这件事搞得非常诡秘，汪精卫的病房，冠以“梅号”相称。

日本各科专家医生经会诊，一致确认汪精卫因过去所中子弹留存体内过久，诱发而形成多发性骨髓肿症，胸骨自第四至第七节间，因肿胀而自背部向前胸发展，以致压迫脊髓神经，必须割除向前压迫的肿胀骨殖，以减轻压力。3月4日傍晚，由斋藤教授主持进行手术，用局部麻醉，由背部开刀深入前胸，切除胸骨三四片，经过一小时左右，手术完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毕。汪精卫当时感觉腿部能有些微活动，其后三四日内情形良好，汪的家属以为情况好转，暗自庆幸。不过好景不长，病情又转呈恶化。

同年八九月间，汪精卫病情更加沉重，而且极度贫血，先后由他的两个儿子汪孟晋、汪文悌为其输血，终无起色。至11月9日，由于美机轰炸名古屋，日方将汪精卫移至室外防空洞，因没有暖气设备而受寒，当晚回到病房后又发高烧，引起并发的肺炎症，延至夜间呼吸渐感困难，拖到10日下午4时20分停止了呼吸。

11月12日，汪伪宣传部为此事发表公告说：“国民政府汪主席，痛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逝世……享寿六十有二，谨于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饰终典礼，由国民政府会同中央党部组织哀典委员会敬谨办理。”同日，陈璧君及其子女等乘汪精卫生前专用“海鹅”号飞机将汪精卫的尸体由名古屋护送至南京，下午5时在南京机场降落。伪代主席陈公博及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伪府各院、部、会文武长官，以及所谓外交使节等护送至伪国民政府大礼堂，伪国府还下令下半旗一月，停止娱乐宴会，明令国葬。汪精卫的汉奸生涯，至此全部结束。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的前夕，汪精卫一死，伪廷更是呈现日落西山、气息奄奄的征兆，即将树倒猢狲散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陈公博袍笏登场

汪精卫一命呜呼，陈公博以伪行政院院长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成为汪精卫的继承人，伪府的头号汉奸。为什么陈公博能登上伪府第一把手的宝座而不是手握实权的周佛海呢？这得从日本方面和陈、周与汪精卫的历史渊源两方面进行分析："日本方面认为：周佛海最驯服，最可靠，一向听话，不给他当主席不会有反感。况且他那些部下借着财政部的名义处处搜刮民财，早已搞得鸡犬不宁，人心已失。陈公博是汪精卫的继承人，可惜他实力不足，给他当主席恐怕起不了大作用，不给他又恐怕汪伪分子灰心。考虑结果，认为还是给陈公博比较顺当些。日本的主张一经决定，所谓汪伪政府的末台戏，正式开场了。"

再从陈公博与汪精卫的历史渊源乃至伪政府建立后汪、陈关系的亲密来看，也远非周佛海可比。抗战前陈公博是汪手下数一数二的改组派大将，而周佛海则是蒋介石智囊团人物之一，是蒋的贴身机要。抗战后尽管周佛海为汪出谋划策，一时有"和运总军师"之称，但汪对周还是不那么放心。所以汪精卫赴日治疗的方案决定之后，汪精卫自知此去恐难生还，他在飞日前的两三日，召陈公博到他病榻前作了一番叮咛，他告诉陈说："你与我共事最久，你应该最能了解我的心境，我病况至此，恐怕已无力再为国尽瘁了。今后，我们的成败不可知，而责任不容放弃。一切，我付托在你的身上了！对这东南几省孑遗，要你挑起这副重担了。世界无不和之战，国家也不容许长期地分裂下去。今后怎样使国家再归于统一，使党再能团结，不必斤斤为我毁誉辩护，尽我们的心力吧！我出国以后，职务由你代理，重要的事，可与佛海和思平共同商量。"这恐怕是汪氏对汪政权中人的最后遗言了。陈公博流着泪向汪氏说："我不会有负先生；也不会有负于先生的付托之重。请先生自己为国珍重！"汪、陈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这是周佛海所望尘莫及的。

陈公博在就职时大肆叫嚷：要以汪精卫"手定之政策"为他"奉行之政策"，"无论战争如何推移，时间如何迫切"，"决不动摇"云云，表明他是个死硬的汉奸顽固派。同年12月，陈公博又亲自跑到日本活动，会见日首相小矶国昭、陆相杉山元、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等人，陈向这些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侵略头目虔诚地发誓：“今日、中两国之利害安危已不可分，我们惟有本于汪主席昭示我们的同甘共苦以至同生共死之决心，勇往前进。”

汉奸们在陈公博就职时的“正名”问题上发生了一场可笑的争论：“当初汪精卫组织伪政府时，自称代主席，说是代理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执行职务；后来为和日本侵略者订约，遂去掉‘代’字，自封为‘主席’。汪精卫病危时，陈公博以行政院长代行‘国府主席’职务，称‘代主席’是可以的，一些旧式官僚说，按照封建的官场定例，凡代理活人的职务可以称‘代’，现在汪精卫已死，只能称主席，不能再称‘代主席’。但陈公博标榜自己继汪遗志，和汪在世一样，仍称自己是‘代主席’，引起不少人反对。这些人认为，代理死人而行职权，从来未有，仍称‘代主席’，既不符合‘国家体制’，又不合历史传统，势必贻笑中外，人家一定笑我们毕竟是一个‘小朝廷’，连名义都不定。但是陈公博固执己见，不肯取掉那个‘代’字。一场‘正名’闹剧，毫无结果。”

陈公博是在凄凉的气氛中就任“代主席”的。据目击者回忆：“典礼开始后，陈身穿所谓吉服（汪伪政府规定的一种礼服），胸前佩了一朵大红花，他走到汪精卫棺材前，两眼红肿，向大家读了一篇‘就职词’。然后，抬起头来，欲向大家讲话，但语音未起，两泪已滚而下。其他伪官们，虽然也穿着吉服，挂上红花，站得也整整齐齐，但在这口棺材前，个个面如土色，场上呈现一派阴惨惨的气氛。司仪倒还灵活，遂见机行事，高喊一声‘礼毕’，大家也就灰溜溜地各自散去。”陈公博真可谓“痛不欲生”，“如丧考妣”。

但是陈公博为什么非要坚持“代主席”这个看来是个细枝末节的名称？从陈对其亲信说的一席私房话可以得到解释。陈说：“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我对重庆方面所表示的姿态。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继承这个烂摊子，是办理收场，而不是继续演出的。这一项结束工作，我已考虑到一个办法，所以要你们去搞一些新的工作。”关于陈公博所谓的“办法”和“新工作”，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就是他后来不遗余力兜售的“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口号，实质上就是想继续玩弄“宁、渝合流”的把戏。

下面谈谈“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陈公博曾

与其亲信巫兰溪（伪行政院副秘书长）多次密谈，其内容包括国际方面的变化，重庆方面的消息，还谈到南京方面有哪些人与重庆有联系，或可能有私人往来，以及南京方面的局面将如何发展等等。一次陈公博很认真地对巫兰溪说：“你过去在中央党部搞了很久，在党务方面应该有些经验。我现在要重整党务，决定自兼组织部部长，你去当副部长，代理全权。另一名副部长，准备以周学昌（伪南京市长，属周佛海一派）兼任。这是顾全周派的关系，但他市长本身兼职较繁，事实上是不要他来参加工作的。你可把所有的兼职统统辞掉，专心搞这一工作……你辞掉兼职后，家庭方面所需，无论多少，都由我负责（因为党部的待遇是很低的）。”巫听了陈这番莫测高深的话后顿感突然。因为巫以前只听说汪精卫组织伪政府，曾称召开什么全国代表大会（指1939年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不知道出席全国党代表大会的那些各省市代表是从哪里来的。1943年巫参加伪政府后，虽知道南京方面有一个汪记国民党，但从上海到南京城，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块党部的牌子。伪党部机构早已名存实亡。巫兰溪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叫他去办党，能有什么工作可干呢？就是硬着头皮干，又能干出什么名堂呢？

陈公博看出巫兰溪犹豫不决的神态，遂向巫交底说：“我参加汪先生这个政府的经过，虽然没有对你谈过，但你来了一两年，也该知道了。老实说，我从‘组府还都’的那一天起，就缺乏信心，而且国际形势又如此急剧变化，前途很难想象，我下决心结束这个烂摊子。但汪先生当时是在全党大会中产生政府的（按：汪精卫系盗用国民党的名义），‘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结束这个政府，还得要开一次全党代表大会。派你到中央组织部去，希望你从整理党员党籍起，到全党代表大会的产生、大会的开成为止，要在6个月内完成这项任务。还要做到各省市党部、各特别党部所产生的代表都忠实可靠，能听话，免得开起大会来不听指挥，别生枝节。”

陈公博最后强调说：“我们为了一新群众耳目，造成社会舆论，已决定发表一项宣言，提出两个新口号，即‘党不可分，国必统一’。这两句口号在此时此地提出，是震动人心的。这就是政治上的新目标、新路线，要督同各级党部，大力宣传。这两句口号，凡是中国人都能一目了然，而且心中有数；对重庆方面来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政治影响，也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可以说是两枚有力的政治炸弹。”陈自信这是他的得意之作。此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两句口号，就在沦陷区内通过不同渠道大肆宣扬。

巫兰溪明白陈公博要召开伪党代大会的用意，首先在于要用这个口号，向重庆国民党政府暗送秋波，承认重庆方面是主流，南京则是国民党的一部分，希望渝方不要踢开他们，从而减轻他们落水当汉奸的罪责，当然最好是上演宁、渝合流的把戏，使汉奸们逃脱人民对他们的审判。再则就是要借这个大会的招牌拿掉那些与重庆唱对台戏的双料牌子，如什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央党部”之类，而代之以“特别委员会”、“东南办事处”等临时名称。这样巫兰溪就放手大干起来。其进行步骤是：第一，查明凡过去成立过汪记党部的，派专人去恢复名义和开展活动。不到两个月，八省五市以及军队、铁路、航运业，都先后挂出了党部牌子。第二，发出指示，叫他们切实整理党籍，核实人数，剔去虚假，重新登记，然后再按国民党党章，从区分部自下而上，逐级成立新党部，规定每一级都要有专人负责。第三，发布有关选举的各项章程条例，让选区遵照选举出席人数的标准，在规定日期内，慎重地选出应有名额的代表。为要使所选出的代表都符合要求（即能听从陈公博的指挥），对情况比较复杂的地区，都派忠实的爪牙去监选，巫兰溪有时还得亲自出马。

“党不可分，国必统一”一经陈公博提出，表明这是汪精卫死后的一个政治新动向，汉奸们都想看看它的苗头。后来各级伪党部都纷纷挂出旧招牌，一批党棍又很起劲地回去活动，选举所谓代表，足足折腾了一阵子。汉奸们猜想既然要开党代表大会，对于伪府的体制和组织，自然有一番变动，尽管这个口号系陈公博提出，而事前是得到周佛海同意的，然因利害攸关，陈、周之间还是矛盾重重。巫兰溪回忆说：

周佛海这一派人，都是从国民党CC团分化而来的，都是些无风还要掀起三尺浪的“摩擦专家”，现在他们看到我（巫兰溪）代表陈公博包办党务，十分不安。因此，在周佛海势力范围内，如上海、南京两市（周佛海以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任上海市长，周系分子周学昌任伪南京市市长）和江苏、浙江两省（伪江苏省长虽由陈群担任，但实权都握在任援道手里，任是与周佛海合作的。伪浙江省长，则由周佛海嫡系丁默邨

担任），对于代表人选，周佛海非常注意，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决不会产生出来。——是年7月，各地出席代表，已选出了百分之九十，我正忙于向各方联系、同各代表谈话，希望能完成陈公博交给我的任务。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陈公博精心炮制的“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口号也随之烟消云散，他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群奸被押上审判台

前面提到，陈公博、周佛海在伪政权覆灭前提出“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口号，妄图搞“宁、渝合流”的把戏，从而逃脱人民对这伙卖国贼的审判。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和日寇的败亡，这一阴谋只能以破产而告终。与此同时，伪政权的政要们还从组织上、军事上作了相应的部署，这些部署都是围绕为行将覆灭的汪伪政权注射强心针的，也是为他们自己寻找出路。首先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人事调动，汪精卫死后，陈公博继承汪精卫的衣钵，任伪行政院院长，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并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于是由梁鸿志继任立法院长，而顾志琛则接手梁鸿志原任之监察院院长职，伪国民政府文官长由周隆庠担任。随着中央机构的人事调动，各省、市行政机构也作了相应调动。1945年1月，周佛海就任伪上海市市长，周的亲信罗君强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兼财政局长，高冠吾则接替罗君强任伪安徽省省长兼保安司令及蚌埠绥靖公署主任，不久高调任伪江西省省长，此职又由林柏生继任。随后伪政权相继任命丁默邨为伪浙江省省长、保安司令兼杭州绥靖公署主任，叶蓬则继任伪湖北省省长、保安司令兼武汉绥靖公署主任，黄自强任伪江西省省长、保安司令兼九江绥靖公署主任。1945年4月，一直任伪外交部长的褚民谊，也对外调产生了兴趣（由陈璧君推荐），改任伪广东省省长、保安司令兼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一向是独立王国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亦进行了改组，由王荫泰任委员长，苏体仁、汪时璟、文元谟、余晋和、杜锡钧、陈曾栻、唐仰社、喻熙杰等任常务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一经改组，人事亦更迭频繁，伪北平市长、天津市长分别由许修直、关迪平担任，而河北、山东两省省长则由荣臻、杨毓珣接任。

上述情况表明，伪政权在末日来临时，其政要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朝不保夕，正因为如此，他们更是急于抢地盘抓实力，要求外调为自己留条后路。以褚民谊为例，尽管他去广东有不满陈公博的因素，但他也说过：“当时国军反攻，美军登陆的消息，早已传遍国门”，“和平政府（即汪伪）之不足有为，已为不可讳言之事实”。褚认为“南京众目睽睽，殊难有所表现，倒不如在地迥天遥之粤，或可以实现个人之主

张”。他的主张是什么？说好听一点叫做“协助国军，完成救国之业”，或者干脆叫做“保全广东”，也就是保全他自己。林柏生一当上伪安徽省省长，即派人与李品仙、韦永成接洽，并向李、韦表白，如渝方“准其悔悟”，则当派专人进行“洽商”。丁默邨到浙江，更是有意识地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套近乎，他的如意算盘是配合蒋介石打回苏、浙，将“功”折罪。汉奸们的普遍心理是“南京不能久呆了，到时候鸡飞蛋破，悔之不及”。人员走马灯似的不断更调，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在伪官员频繁调动的同时，伪政权还把注意力投向军事方面，加强调整军力部署。陈公博以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兼任中央陆军军校校长、中央将校训练团团长。他多次发表讲话，风尘仆仆于杭州、苏州、蚌埠、徐州、商丘、扬州、泰州等地对伪军进行“检阅”，要求伪军官兵“不管时局如何紧迫，‘和平反共’的方针一定要执行”。鉴于伪军兵力分散，陈公博采取“北以陇海路为限，南以钱塘江为限，先作一个防共区域的准备”的措施，即以宁沪杭三角地域为重点配置守备力量。为此，吴化文部由济南调到安徽，设司令部于蚌埠；孙良诚部由开封调往江苏泰州、扬州一带，设司令部于扬州；项致庄部由苏北调至杭州，伪第一方面军（任援道部）由南京迁往苏州。又加强伪都南京的警备力量。周佛海为扩充其私人武装伪税警团的力量，要求副总团长罗君强、参谋长熊剑东“拟订充实兵员办法”，其活动范围拟以上海之奉贤、南汇为根据地而东连浙东，还要求“自行准备粮食，以备非常时期之需”。

陈公博、周佛海的这些军事部署，其罪恶矛头是指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千方百计不让新四军进入南京、上海、杭州地域，同时便于策应蒋介石返回苏浙，以反共的实际行动向重庆“输诚”，陈公博、周佛海之流可谓用心良苦，居心叵测。

然而形势的发展，使陈、周等人不可能实现其罪恶图谋，在庆祝抗日胜利和严惩汉奸的声浪中，伪廷的显要们一个个被押上了历史审判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7年底，惩治汉奸案经侦查起诉者计30828人，不起诉者计20718人，起诉之后宣告无罪者6152人，科刑者15391人，仍在通缉者有数千人。现将汪伪政权首要判罪服刑情况简述于下。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汪伪末代汉奸头子陈公博坐困南京城，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他既担心新四军随时会打进金陵，此前又发生周镐事件，他担心步萧叔萱的后尘，死得不明不白。而且作为先遣军的任援道，一再暗示让陈速离南京。陈公博走投无路，只好求助于日本侵华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今井立即找到小笠原中校，小笠原又推荐小川哲雄中尉。在小川陪同下，陈公博偕周隆庠、陈君慧、林柏生、何炳贤及其妻李励庄、私人秘书莫国康等，搭乘中华航空公司的MC型飞机起飞，抵达日本九州的米子机场。日本外务省为陈公博等到来已作出安排，指派冈部长二为联络此事的负责人，将此项工作定名为“东山工作”。陈公博等分别化名如下：陈公博——东山公一、李励庄——东山文子、莫国康——青木贞子、林柏生——林博、陈君慧——西村君雄、周隆庠——中山周、何炳贤——河田贤二。日本外务省有关人员前往米子，将陈公博一行转移到京都，陈公博夫妇、莫国康、周隆庠住进一所别墅，而林柏生、陈君慧、何炳贤住进京都旅馆，后又搬入对文庄。几天后几经迁徙，最后住进了京都名胜古刹——金阁寺，这时已是9月8日了。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一个备忘录送给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出陈公博一行私自逃日，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引渡回国。9月30日，日本外务省驻京都的办事人山本往见陈公博，告知中国派来的飞机已飞抵米子市，陈表示稍作收拾，即于次日前往米子乘机返国。10月1日，日本前首相近卫祭扫其母的坟墓，特从京都赶往金阁寺与陈公博密谈两小时，“两人相对欷歔之状，自可想见”。

与近卫密谈后，除李励庄暂留日本外（何应钦备忘录中无她的名字），当晚陈公博、林柏生等6人搭乘火车赴米子，因风雨所阻，在福冈又住了一晚，10月3日乘机被押送回国。计从8月25日赴日，至10月3日回国，陈公博亡命日本时间长达一个月又8天。国民党政府派往日本的是一架运输机，除驾驶人员外，另派宪兵连长1人，士兵8人，以资押送。

陈公博先被关押于南京城南的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后又转移到宁海路25号军统看守所。该所在每个囚室中放置便桶一个。每天下午放风时，允许犯人外出倒便桶，厕所洗刷台一时拥挤不堪。陈公博为此事请求卫兵司令章绵湘，说自己曾任伪国府代主席，希望准许他于每日放风时提前或错后单独干刷洗便桶之事，给自己留点面子。经批准允许他这

一要求。陈又说看守所的饭菜难以下咽，希望让他吃得好一些，“到绑赴刑场枪毙时，肥肥胖胖像个样子”，却未获批准。

1946年3月，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一起被转解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径付司法审判。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处由首席检察长韩焘亲自承办侦讯手续，起诉书提出：被告陈公博“二十七年（1938）秋间……忽与已故之汪逆兆铭，通谋敌国，勾结日酋近卫文麿，秘密言和……复于二十九年三月间，与汪逆共同组织伪南京政府，汪任伪主席，被告任伪立法院院长，公然

颜事敌，反抗中央。是年五月间，被告复以伪专使职衔，率领使节团赴日答谢，低首虏廷，歌功颂德……嗣复兼任伪上海市市长，至三十三年三月间汪逆赴日就医，被告遂以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行伪主席职权，到汪逆死后，即正式代理伪政府主席。去年八月间，日寇投降，被告虽自动取消伪政府，然犹秘密赴日，托庇敌人，一面散布自杀消息，以冀幸免，经我国民政府电命引渡回国，予以羁押，至本年二月十七日解送侦查到院”。起诉书列举陈公博十大罪状：①缔结密约，丧权辱国；②搜索物资，供给敌人；③发行伪币，扰乱金融；④认贼作父，宣言参战；⑤抽集壮丁，为敌服役；⑥公卖鸦片，毒化人民；⑦改编教材，实施奴化；⑧托辞清乡，残害志士；⑨官吏贪污，政以贿成；⑩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陈公博对起诉书各点逐一辩驳，还指责起诉书“很多是臆测之辞，许多不是我的事，或者知都不知的事，或者绝无其事，也罗织起来。起诉书中，不是割裂事实，就是摭拾谣言，而且文字间很多是徒快口舌的文章，而不是根据事实的起诉”。陈尽管百般抵赖，但对自己犯下的汉奸罪行心里是有数的，他说：“在今日众议沸腾，真相不明，尤其是政治那样困难而波折，承办本案的检察官，即使他心里很明白而又肯负责任，哪一个敢挑起千钧重担说陈公博可以功罪相抵，哪一个敢说陈公博无罪呢？”陈公博在掂量自己头号汉奸的分量后说：“汪先生在生时，我是辅佐汪先生的一个人，在汪先生死后，我名义上总是负军事政治的全责，那就够判重罪，其实不必苦苦要罗织成齐齐整整的十大罪状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也。”最后，陈转而向蒋介石乞怜说：“在日本投降以后，我的心情绝不愿损害蒋先生的尊严，蒋先生要求离就离，要我回就回，要判罪就判罪，束身以为服法的范例，使蒋先生更容易统一。本案说复杂是太复杂了，说简单也太简单了。因此，请法庭随便怎么判，我决定不再申辩，不再上诉了。”

陈公博答辩后，又将其长达47页的自白书念了一遍，耗时两小时多，又由指定的义务辩护人高溶律师进行辩护，后由审判长宣告审讯终结，并定于12日开庭宣判。宣判之日，由审判长孙鸿霖宣读判决主文：“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但陈妻李励庄不服判决，她于4月20日写了《申请复判状》，请江苏高等法院呈最高法院。5月16日，最高法院特别刑事法庭驳回了李励庄的上诉，并核准了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的判决。6月1日司法行政部将核准陈公博执行死刑的公文送达江苏高等法院。6月2日，江苏高等法院将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三犯由高院看守所移送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

1946年6月3日，陈公博的末日到了。清晨8时半，第三监狱的囚房开封了。许多囚徒都在外面散步或谈话。陈正在书写一副对联：

大海有真能容之量，

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写到还剩下三个字时，陈公博发现有几个法警站在身后，他回头问法警：“是不是来提我执行了？”得到证实后，陈接着把“满为心”三字写完，还加上了上下款。陈回到监房，把东西稍加整理，换上衣服，外罩蓝布大褂，又双手捧着一把小茶壶，直接来到陈璧君的囚室，并向她鞠了一躬说：“夫人！请恕我先去了，今后，请夫人保重！我此去，可以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牢中别无长物，一把常用的茶壶，就留给夫人做个纪念吧！”一向桀骜不驯的陈璧君，面对此情此景，不禁失声痛哭。陈又与褚民谊道别说：“重行（褚民谊字），我先走了，保重保重！”于是由法警押送走向法庭，监刑检察官告知陈公博：“你的案子经最高法院复判维持原判后，又将全案移送司法行政部核准。今天已接到

部令执行，你还有什么遗言？”陈公博要求写几封遗书，一封给家属，另一封写给蒋介石，给蒋氏的信只写了一半他就停下不写了，于是历史上留下了这封半拉子信。陈公博搁笔起身向法官说：“快要到中午了，我不再耽搁你们用膳的时间。我死后，遗书请代交家属，现在就去吧！让法官也好早些了却一桩公案。”说完竟伸手与监刑官、书记官握手道别，法官们也情不自禁地与陈相握。死囚临刑，竟与监斩官相互握别，这要算陈公博上演较精彩的最后一幕了。

刑场设在第三监狱内，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法警。陈公博走到刑场之前，回过头来向执行的法警要求：“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一些。”就是说，希望一枪了事，别让他多受罪。陈刚走到刑场的一半，法警就从他身后开枪，子弹从前面穿出，陈公博被击倒地上，鲜血不断流出，经过几分钟的抽搐，才气绝身亡，经过法医检验后，移送于狱内的停尸间，由法院通知陈在苏州的亲属，次日由其表妹赴监狱将尸体领去，尸体已有些发臭，当即移往娄门苏州殡仪馆匆匆入殓。后由其家属将棺木运往上海，悄悄埋在一处公墓中，连墓碑都未敢竖立。一代巨奸，从此销声匿迹。

周佛海从1945年9月由戴笠陪同回渝后，住在嘉陵江畔的白公馆。在戴笠安排下，过着特殊犯人的生活。据其子周幼海回忆：“我们在白公馆的生活是很优裕的，也很自由。可以下棋、打牌、唱戏，可以看重庆出版的所有报纸，包括《新华日报》。每天吃的是八菜一汤，大鱼大肉。过阴历年时，还准备了整桌酒席让我们过年。”但这种特殊犯人的优裕生活，因戴笠飞机失事而发生了变化。一天，周佛海等聚在一起，就戴笠之死互相谈论着：“丁默邨这时带头开了腔：‘你们看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问题的解决，究竟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大家都默不作声。丁默邨歇了会又说：‘我看这样一来，对我们的问题解决非常不利。因为戴笠的继任者，必然是毛人凤。毛是一个庸才，没有魄力，胆小怕事，希望他像现在这样把我们保护在白公馆，承担外界舆论的压力，我看是不可能的。’马骥良接过话头问：‘那么，我们怎么办呢？’罗君强苦笑一声说：‘只好听天由命了。’周佛海忽然站起来说：‘我们不能这样消极等待，我们已经等了七个月了，好像蒙在鼓里，不上不下，很不是滋味。我们应该主动请求军统把我们移交到法院。这样，索性下个决心去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打官司，反而可以求得一个心安……’罗君强开了腔：‘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办了。’丁默邨也低声说：‘那就这样办吧！’周看他们二人都表了态，便再没有问其他的人，说：‘好，那就决定了。等他们（指毛人凤等）再来时，我就口头提出来，假定他们不来，我们就写书面报告。’”

周佛海一案几经周折，在全国要求严惩大汉奸舆论的压力下，1946年7月19日，他终于被移解到南京高等检察院，准备接受审判。同年10月21日开庭审讯。这一天南京朝天宫大殿上，挤满了旁听的群众，他们是来听大汉奸周佛海是怎样接受审判，又是如何为其叛国罪行辩解的。上午检察官宣读起诉书，下午周佛海为自己辩护。周面对起诉书中认定他犯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汉奸罪行，无理搅三分地说：“这一点的起诉与我的情节，太不相符。我参加南京政府的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抗战形势极度危险，我希望能与日本直接谈和，以挽救危亡。我参加南京政府后半段的情节，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在与日本直接谈判之后，我发觉日本并无诚意，我更通谋了本国，希望做些不利于敌国之事。我与中枢数年之中，既已取得直接联系，我的一切工作，也大都奉中央之命而行，假如不是原子弹提早结束了战争，在中美联合反攻时，或许我会能有更多的表现。”

周佛海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果说他所谓“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显然是政治投机，为自己留条后路的话，那么“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则纯粹是自欺欺人。谁都知道，周佛海卖国投敌，和汪精卫一样，其思想根源是民族失败主义、民族投降主义。关于这一点，其在《日记》中是供认不讳的，一是对中国人民抗战力量估计过低，而对日本侵略者的力量则又估计过高。在他看来，日军攻占南京、武汉后，一定会溯江而上，轻取陪都重庆，使全国失去抗战重心。但是英勇的抗战军民，粉碎了周佛海的迷梦。

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根据周佛海大量叛国事实，判处他以死刑。周不服判决，多次申请复判。他的妻子杨淑慧，又为其多方奔走，并托请国民党有关高级人士为周说项，终于使蒋介石于1947年2月1日亲自写信给司法院院长居正等人，提出“该犯似可免于一死，可否改判，即希司法院核办可也”。就凭蒋介石这一句话，周佛海竟从判处死刑改判无期

徒刑，实行特赦。他得知此讯，喜出望外，于狱中吟诗一首曰：

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

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途。

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怀仍故吾。

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

似乎他还要东山再起了。但周佛海出狱无望，精神濒临崩溃边缘，他终于绝望了，病倒了，他患的是心脏病，转成慢性的其他疾病的并发症，而且是致命的绝症。经过一年多的垂死挣扎，周佛海已是形销骨立，接近生命的尽头。

“在他死前的一两个月，变得既不能睡，亦不能坐。他把被褥叠高起来，就日夜俯伏在这上面，喘息着，呻吟着。最后周身痛楚，经过了二十八昼夜不停地惨呼号叫，至死前六七日，因为全身的肌肉已经销尽……以臀部只剩得一层宽弛的皮，不得不改在大腿的后肉为他勉强注射。甚至已经为他注射过了，而佛海竟茫然不觉，还连问医生打过了没有。到了此时，佛海身体上的感觉也已完全丧失，病入膏肓”。延至1948年2月14日，周佛海一命呜呼，瘐毙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周死后，他的尸体停放在南京新街口万国殡仪馆，其后放入由杨淑慧珍藏多年的一口贵重的棺木里，并运到南京汤山附近的永安公墓，草草埋葬在荒烟蔓草丛中。

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褚民谊、陈璧君等人被捕伏法情况，以见一斑。

1945年10月14日，褚民谊、陈璧君等人被军统局诱捕由广州飞抵南京，囚禁于宁海路25号军统看守所。随后于次年2月18日，被移送苏州，羁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狮子口第三监狱。由该院检察处进行侦审，3月21日提起公诉，褚的主要罪状是：追随汪逆，出任伪职；参与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实行对英美宣战；在伪行政院外交部长任内，允许日本在其占领区内设立华北振兴公司，并下设分公司15处，以统制该区域内的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行政、交通、粮食、矿产，以提供军用；在任伪广东省长时，与日本联络部长松井勾结，擅自增加8万万元的海关税，以此款的一半支助日本军用。起诉书认定褚民谊犯有“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无可宽恕”。

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庭于4月15日开庭审讯，宣读对褚民谊的起诉书。褚在答辩书中大肆吹捧汪精卫，同时也为自己开脱。他胡说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而发艳电，始而复党，继而组府”，不仅不是汉奸罪行，反而是什么“仁人君子”。他还把汪伪政权的建立说成是“和平抗日”，是保持了国家的“元气”，继续贩卖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褚在答辩书中妄图赖掉他的所有汉奸罪行，说他掌握的外交部，“不过一应酬机关，只可称为一交际部耳”。关于与日本签订条约及对英美宣战等众所周知的事实，褚矢口否认，说他什么都没有参加，说这一切都是汪精卫做主，与他无关。

褚民谊的狡辩是徒劳的。江苏高等法院于4月22日判处褚死刑。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故作镇静地说：“本人以今日得死刑之判处，真所谓皆大欢喜，但是大家要晓得，虽则本人自请处以死刑，但决不是自己自认有罪，不过是我求仁得仁而已。”另一方面褚又与其妻一再上诉，申请复判。江苏高等法院裁定维持原判，驳回褚的申诉。1946年8月23日，褚民谊被处决于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第三监狱刑场。

陈璧君。1945年与褚民谊在广州被国民党军统诱捕。1946年2月军统局将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三犯由南京押送苏州看守所。在狱中陈璧君依然盛气凌人，对汪精卫及自己的汉奸罪行毫无认识，甚至还要摆国民党元老的臭架子。一次在南京监狱，狱卒循例直呼其名，陈璧君瞋目怒叱：“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先生不曾这样叫过的，你们委员长不敢这样叫我，你是国民党下面雇用的人，你配这样叫我？”狱卒从此不是称她为“汪夫人”，就是叫她“陈先生”了。

1946年3月27日，检察官对陈璧君起诉，在起诉书中列举她的罪状是：惨害地下同志；取决粤政，目的在断绝政府物资来源；与汪精卫同恶相济，返粤主政达四月之久；主持特务，用人行政，一切仰敌鼻息。江苏高等法院于4月16日对陈璧君开庭审判。陈璧君在被告席上居然“为

汪氏（精卫）辩白，为汪政权辩护，为从汪诸人开脱……对当局抨击，对法官讥嘲，有时且近乎申斥，常使检察官韦维清为之狼狈不堪”。

4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其主文是：“陈璧君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陈璧君当即表示：“我对判决绝对不服，但也绝对不要上诉。因为上诉结果，必然还是与初审一样。”但其女汪文恂还是请律师向最高法院申请复判。南京最高法院于5月21日驳回汪文恂的申请，同时核准江苏高等法院所作出的判决，维持原判。

南京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春南迁广州，对在押汉奸作出决定：凡处无期徒刑者继续关押，其余一律释放。因此，陈璧君仍羁押在狱。同年5月上海解放，陈璧君从苏州监狱被移送上海提篮桥监狱拘押。

罗君强。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20日，他又追随周佛海任行动总队副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局长。9月下旬，戴笠到上海进行肃奸工作，与周佛海进行多次密谈，然后周佛海决定辞去上海行动总队司令职务，罗君强亦辞去副职，并同周佛海、丁默邨、杨惺华等随戴笠同机飞渝，“自行投案”。他们被安置在嘉陵江畔的白公馆，过着高等囚徒生活。

1946年春，罗君强被押解回南京，囚禁于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老虎桥监狱。高等法院检察官复于同年10月对罗进行起诉。起诉书认定：罗君强“确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行为，已属信而有征。至其……秉承敌伪意旨，执行伪府政令，如征集物资，公卖鸦片，奴化青年，清乡封锁，搜捕地下抗战工作人员，摧毁陷区中央行政军事机构。此其最显著者，无一非遂敌寇东亚共荣、军事合作、经济提携、文化沟通之诡计，而达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早日灭亡我国之目的”。

1947年3月6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决主文如下：“罗君强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君强仍被羁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梅思平。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于1946年4月27日提起公诉，5月3日公开审讯，5月9日宣判处梅思平以死刑。梅一再申请复判，最高法院于7月6日判决“原判决核准”，维持原判。梅思平知死期不远，就托狱中看守员带些“白干”（白酒）进来，每晚喝得半醉，借酒消愁，然后就睡，打发未了时光。梅思平于1946年9月14日被枪决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刑场。

林柏生。1945年9月与陈公博同时被引渡回国后，即被囚禁于南京宁海路25号军统看守所，其后转移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于1946年5月12日提起公诉，并于5月31日判林死刑，林提出申诉，妄图减刑，最高法院驳回其申请，维持原判决。1946年10月8日，林柏生被枪决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刑场。

丁默邨。1946年由重庆与周佛海等同时被押解回南京后，羁押于老虎桥监狱。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于1946年11月11日提起公诉，1947年2月8日判处丁以死刑。这个汪伪特工头子、杀人魔王，临到毙命时丑态百出。7月5日，丁被枪决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刑场。

王克敏。军统局局长戴笠于1945年10月6日奉命逮捕华北汉奸首要。这一天戴笠以“宴客”方式通知在北平特任级汉奸到东城兵马司汪时璟家中赴宴。但群奸齐聚后，见到警察林立，知道宴无好宴。戴笠当即宣布名单，并交代说：“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的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戴笠还关照王克敏说，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可在家听候传呼。王克敏自知罪孽深重，说：这场祸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王克敏等华北巨奸被拘押于北平炮局监狱。1945年12月25日，王克敏畏罪服毒自杀，死于狱中。

王揖唐。1945年10月戴笠在北平肃奸时，王揖唐因病住进医院，其后在医院被逮捕归案。王获悉主审官是其原下属何承焯，因此开庭受审时，王大声呵斥说：何承焯，你不配审我。华北沦陷时期，你在我的手下任过事，你是我的部下，就是小汉奸，哪有小汉奸审大汉奸的道理？何承焯审不下去，随后被给以停职处分。但这也救不了王揖唐，河北高等法院改派关盛涵为主审王案的法官。王揖唐汉奸罪行累累，河北高等

法院判处他以死刑，王两次上诉，要求减缓。南京最高法院于1948年9月复判，维持王揖唐的死刑判决。9月10日，王揖唐在北平姚家井第一监狱被执行枪决，身中7枪毙命。

梁鸿志。1945年日本投降后即隐匿于苏州，军统局于10月将其逮捕。1946年4月3日转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于6月5日开庭审判，6月21日判处梁死刑，梁声称对判决不服，要求上诉。梁在入狱期间，吟诗以寄哀思，囚室内无床、无灯、无笔、无砚、无茶具、无酒、无书，这些都成了他吟咏的题材。

国民党最高法院于10月作出终审判决，“原判决核准”。上海高等法院于11月13日接到判决书和密令，即派检察官戴荣锋去监狱负责行刑。由法警带梁鸿志出监狱大门，他情知不妙，到了“忠”字监狱前面，设有临时法庭，梁当庭写了遗嘱，还给蒋介石写信，然后步入刑场，嘴里还哼着“行年六十四，行步移法场”的诗句。法警开枪，弹中后脑，又从口腔中穿出，梁鸿志一枪毙命，不足两分钟气绝身亡。

汪伪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群奸相继受到审判并伏法，伸张了民族正气，荡涤了妖雾阴霾。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中国史话》总目录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中国史话》编辑委员会

主任 陈奎元

副主任 武寅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巍 刘庆柱

步平 张顺洪 张海鹏

陈祖武 陈高华 林甘泉

耿云志 廖学盛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作者小传

刘悦斌

刘悦斌，曾用名刘岳斌，1962年生，河北省辛集人，1986年在河北师范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3年3月至2004年2月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做访问学者。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历史室主任、教授。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中国社会福利史》（合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辩》（合著）、《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合译）等著作。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引言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保守的国度，她悠久的历史和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文化积淀，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使她在前进的路途上越来越步履维艰。此说自然不无道理。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缺乏敢于冲破先王法度、试图进行因时损益的改革之士。一个世纪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即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他们发动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

农历戊戌年达到高潮的这次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以致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下爆发的，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产物，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自谋独立富强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尽管它无可挽回的失败了，但毫无疑问它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并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 瓜分豆剖的危机

资本输出给中国带来的更大的灾难，是它引发了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一个争相夺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

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争夺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狂潮的前奏曲是所谓的“三国干涉还辽”。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辽东半岛是要与台湾岛等一起割让给日本的。一直企图独霸中国东北地区的俄国首先反对，法、德两国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也附和俄国，要求日本退回辽东半岛，并陈兵日本海面，以武力相要挟。日本无力与三国抗争，只得借机向清政府敲诈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俄国带头“干涉还辽”成功，遂借机向清政府索要“报酬”。清政府出于“以夷制夷”的幻想，对俄国也颇有好感。1896年，俄国趁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之机，诱迫清政府派重臣李鸿章为专使赴俄庆贺，经过秘密谈判，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主要内容为：日本如侵占俄国的远东领土或中国以及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两省修造一条通达海参崴的铁路（即中东铁路），无论平时或战时，俄国均可通过该铁路运送军队和军需品。表面看来，《中俄密约》是中、俄两国共同防御日本的军事盟约，实际上，俄国是借“共同防日”的幌子把侵略势力渗透到中国东北地区。之后，中俄又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规定俄国在铁路沿线有派驻警察、开采煤矿和兴办其他工矿企业的权利，把这一地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正式拉开夺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狂潮帷幕的是德国。1897年11月中旬，德国以两个德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为借口，派军舰占领了胶州湾。不久，俄国即在12月中旬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1898年3月6日，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了《胶澳租界条约》，规定胶州湾成为德国的租借地，租期99年，山东全省则成为其势力范围。同年3月27日和5月7日，俄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规定旅顺口、大连湾以及附近海面成为俄国的租借地，租期25

年，辽东半岛和东北全境则成为其势力范围。

继俄、德之后，1898年4月，法国胁迫清政府同意租让广州湾，并于1899年11月6日正式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成为法国的租借地，租期99年，而云南、广西和广东三省则成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则要求租让九龙半岛，并于1898年6月9日强迫清政府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以及附近岛屿，即所谓“新界”，成为英国的租借地，租期99年。英国又于1898年7月1日强迫清政府订立《订租威海卫专条》，取得了威海卫海湾连同刘公岛和威海卫沿岸10里宽的地段的租借权。此前不久，英国已迫使清政府允诺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整个长江流域成为其势力范围。日本在割占台湾后，继续趁火打劫，于1898年4月22日强迫清政府允诺不把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使福建成为其势力范围。

《中俄密约》签订后，李鸿章很是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地对人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矣。”然而，现实却无情地打碎了他的美梦，证明那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包藏祸心的俄国，很快就在瓜分狂潮中露出了它的狐狸尾巴。《中俄密约》的签订，不但没有保证“二十年无事”，连两年无事都没有保证。转瞬之间，祖国的大好河山即横遭肢解，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危机。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古老的“以夷制夷”法宝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要想在列强环伺、合而侵华的险恶环境中生存下去，只有变法维新，改弦易辙，发愤自强，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二“圣人为”异军突起

——早期维新思想和康有为的崛起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创立“托古改制”理论

1890年春，康有为移居广州云衢书屋。这时，一个叫陈千秋的学海堂学生慕名来访，相见之后，对康有为大为钦仰。这年秋天，陈千秋告诉同学梁启超，说康有为的学说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梦见过的，这回可算遇上真正的老师了。梁启超比康有为小15岁，但因是举人，很有些自命不凡，而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但是，一经交谈，梁启超大受震动。多年以后梁启超回忆初次见到康有为的情形时说，他们辰时（上午7～9点）入见康有为，到戌时（晚上7～9点）才告退，康有为的理论对他来说就好像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使他顿时“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以至“竟夕不能寐”。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把他“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一条条予以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第二天梁启超再去拜访康有为，康有为“乃教以陆（九渊）王（守仁）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梁启超自此“决然舍去旧学”，从学海堂退了学，转而拜康有为为师。梁启超坦承“生平知有学自兹始”。在梁启超、陈千秋的请求下，康有为乃于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设立“万木草堂”，开始执鞭教学，梁启超、陈千秋则成了他最早的学生。

从1891年到1894年这4年间，康有为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聚徒讲学，二是著书立说，二者同时进行，相辅相成，既培养了维新人才，又建立了他的维新思想体系。

聚徒讲学。康有为开办学堂，追求新知的青年学子闻风而来，联翩不断，次年即达40多人。康有为招收弟子，并无正式的考试，而是与想来就学的人面谈，专门吸收那些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又能接受他的学说的人。康有为为学堂制订《长兴学记》以为学规。在授课内容上，康有为贯彻的是以孔学、佛学、宋学（即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的原则，宗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授课形式除了讲授外，主要是让学生自学。据他的学生回忆说：在万木草堂，我们除听讲外，主要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分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汉代董仲舒著的《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

很多西洋的书，如江南制造总局关于声、光、化、电等科学译述达百数十种。他还设立了“功课簿”制度，就是给学生们每人一本功课簿，学生凡读书过程中产生的疑问或心得都写在功课簿上，每半月呈缴一次，康有为亲自批答。他把这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对学生一条简短的疑问，往往写出长篇的批答。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4年多时间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敞开思想，无所顾忌，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启发学生们同他本人一道探求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开创了一派新的学风，使原来埋头于八股制艺的青年学子，变成了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热血青年。数年间，康有为培育了很多维新人才，如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徐勤、韩文举等，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是梁启超，他在后来的维新运动中成为康有为最得力的助手，发挥了很大作用，以致人们往往将“康梁”并称。维新运动活跃的地区，如北京、上海、湖南、广东等地，都有万木草堂的学生。

著书立说。即构筑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理论根据来源于今文经学。所谓“今文经”，是指西汉初年由一些儒生所传授、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定本的儒家典籍，而后来发现的一些用先秦六国文字写成定本的儒家典籍则被称为“古文经”。今、古文经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对经书的解释不同：古文经学侧重于名物训诂，比较朴实；今文经学则主张探索经书的所谓“微言大义”，思想比较活跃。1889年，康有为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廖平，读了廖平的《今古学考》一书后，深受启发。今文经学阐发圣人“微言大义”的主张的灵活性和神秘性不正可用来为维新变法张本吗？他心胸顿时豁然开朗，一头扎进今文经学，为维新变法寻找理论根据，很快便硕果累累，这就是他在弟子们协助下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

《新学伪经考》是1891年刊行的，由陈千秋、梁启超协助完成。这儿的“新学”，是指古文经学，“新”是王莽的国号。魏源曾经贬斥汉学（古文经）是伪汉学，而康有为根本就不承认它是汉学。他认为，古文经根本就不存在，今文经就是孔子留传下来的真经，所谓“古文经”，是汉代的刘歆伪造的，刘歆伪造古文经的目的是为王莽篡夺汉位制造舆论，湮乱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因而，古文经学不应被称为汉学而应被称为“新学”，它不是“真经”而是“伪经”，他作《新学伪经考》，就是要彻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底推翻、批判旧古文经学的伪说，发扬今文经学阐释孔子之道的微言大义，保卫孔学。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考证辨伪的学术著作，其中并未涉及政治问题，而且书中也一再声明是为了维护“孔子之道”，实际上，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政治著作。从学术上看，书中有不少臆想、武断之处，如说后世出土的钟鼎彝器都是“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连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但是，从政治意义上说，他这部著作却是振聋发聩的。首先，他把自东汉以来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古文经，统统说成是“伪经”，这对清代正统的官学（汉学和宋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的绝对权威和由它造成的“万马齐喑”的思想界死气沉沉的局面，而且从根本上对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其次，他在该书中否定了古文经学“述而不作”（重在“记事”）的主张，主张探索孔子的微言大义，这是对当时保守知识分子的挑战，给知识界以思想上的极大震动。用梁启超的话说，这实在是“思想界之一大飓风”。实际上，这是一部披着学术外衣、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的著作。正因为如此，守旧派大哗，对其予以猛烈抨击，清政府也先后三次下令将该书毁版。

如果说《新学伪经考》的目的在于否定历代统治者崇奉的儒家经典，作用在于破旧，那么，《孔子改制考》的目的则在于正面创立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作用在于立新。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指责刘歆湮乱了孔子的微言大义，那么，孔子的微言大义到底是什么呢？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宣称：孔子的微言大义就是“托古改制”！按照儒家传统的说法，《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孔子删改之作，孔子是“述而不作”，是“信而好古”的古代文化保存者。在他们看来，“世愈远而治愈甚”，唐虞三代是黄金时代，对于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他们不是用积极的态度去正视、解决，而是往往神往于“三千余年古国古”的所谓“三代盛世”。这样一来，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就成了顽固守旧势力阻挠改革的理论依据。康有为一反传统观点，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是茫昧无稽的，先秦诸子提出伏羲以至尧舜等人物都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假托自己的主张古代曾经实施过，借以树立自己的权威。与诸子一样，孔子也是“托古改制”，他创立儒教，编撰六经，

提出一套由他自己创立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作为“托古改制”的根据，这就彻底否定了顽固守旧的理论依据。他认为孔子创立的儒教教义最完善，制度最完备，徒众最多，因而到汉武帝时就取得了独尊的统治地位，孔子也成了“万世救主”。在这里，那个述而不作的保守的封建圣人戏剧性地一变而成为了“托古改制”的“素王”（指孔子虽未居帝王之位，而有帝王之德，故称之为“素王”），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的祖师。

康有为“托古改制”理论的核心是“通三统”、“张三世”的学说。“三统”说和“三世”说都是今文经学家的主张。所谓“三统”，是指“黑统（人统）”、“白统（地统）”和“赤统（天统）”。“三统”（也叫“三正”）说在汉代由董仲舒加以系统化，成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统”，这个“统”受之于天，旧王朝违背了天命，便由另外一个“承应天命”的新王朝来代替，旧王朝的“统”便让位于新王朝的“统”，朝代更替，就是这三统的循环往复。举例来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周以后又是黑、白、赤三统依次更替，可见“三统”说实质上是一种历史循环论。但是，这种理论承认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有所损益，正是这种“变”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根据。在康有为这里，“三统”说反映的是进化论的历史观。

“三世”说也是由董仲舒理论化的。《春秋公羊传》有言：“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不记死亡日期）？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董仲舒据以发挥，将春秋时代的史事，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等，认为孔子“笔削”《春秋》，或者“微其辞”，或者“痛其祸”，或者“杀其恩”，是以时代的远近而异其笔法的。东汉何休又予以推阐，以“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此即所谓“三世”。这三世一世比一世进步，说明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这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康有为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附会“三世”说，使“三世”说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政治内容。他把“三世”解释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认为“据乱世”是君主时代，“升平世”是君主立宪时代，而“太平世”则是民主共和时代，人类社会必须按照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即由君主专制而君主立宪而民主共和的顺序向前发展，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由此他得出结论：君主专制制度的中国必须实行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康有为就是这样用旧瓶装新酒的手法，变戏法般地向以封建学术面貌出现的外壳中，灌输进了充满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的维新变法主张，论述了维新变法的必然性，使维新变法主张有了理论基础。范文澜曾说他是在“利用孔子进行政治斗争”。

《孔子改制考》一书，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荡，被称为“火山大喷火”。在以后的维新变法活动中，康有为继续牢牢抱住孔子改制说不放。但是，由于他塑造的孔子和历代统治者所崇奉的孔子截然不同，因而遭到了守旧势力的嫉恨和抨击，孔子改制学说被指责为“离经叛道，惑世乱民”，康有为被视为“辩言乱政之人”，《孔子改制考》也被作为“悖书”，同《新学伪经考》一样遭到清政府的严禁。

在为维新变法构筑理论根据的同时，康有为也在构筑他的理想国，这就是酝酿于中法战争前后，而于1902年最后完成的《大同书》。该书初名《人类公理》。《大同书》共十部分，第一部分是“入世界观众苦”，列举了人类社会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和人们所受的种种苦难，以此来说明这个世界一定要变。后九部分则具体描述了他所企盼的那个理想国的情景，描绘了一幅大同世界的美景：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军队，也没有帝王将相，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康有为大同思想的来源很驳杂，既有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礼运》所描绘的那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社会），也有佛教的慈悲思想，既有今文经学派的“三世”说，也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他把这些学说糅合在一起，幻想出了一个“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表明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当然，他的大同世界只是一种美妙的幻想，所以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三 洪波涌起

——汹涌澎湃的维新宣传活动

任何一场大的社会运动都是以舆论宣传为先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也不例外。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等人发动的公车上书为标志，面对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的严峻形势，维新志士们纷纷举起维新变法的旗帜，倡言变更旧法，师法西方以图自强而御外侮。这期间，维新派在宣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详细阐述了变法维新的紧迫性、必要性和他们的思想主张，驳斥了顽固守旧势力“恪守祖宗成法”、反对任何变革的保守主张，不少外国人士也为了各自的利益站在维新派一边推波助澜。维新派的宣传活动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进行的，一是创立学会，二是出版报刊，三是开办学堂。一时间，宣传维新思想的学会、报刊、学堂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声势之浩大前所未有，新旧之间的斗争也空前激烈起来。下面以有代表性的维新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为主要线索，介绍一下维新派的宣传活动及新旧之间的斗争。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梁启超是仅次于康有为的维新领袖，又是康有为最为得力的助手。他以“常带感情”的笔触，呼吁变法，是当时著名的政论家和宣传鼓动家。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少年聪慧，才思敏捷，9岁即能缀文千言；10岁时出口成诗，一座皆惊，得“神童”之誉；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少年得志。他经常为此而“沾沾自喜”。他自幼醉心于训诂辞章之学，接受的是传统的封建教育，直到1890年他阅读了徐继畬著的《瀛环志略》之后，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各国”。这年秋天，正在广州学海堂的梁启超应同学陈千秋之邀，慕名往访康有为，对康有为的学说大为“感服”，“乃北面执弟子礼”，与陈千秋一起成了康有为的开门弟子。当时，梁启超已是举人，而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按照习惯，康有为应该称梁启超为“先生”。梁启超却一反旧俗，拜康有为为师，即此也反映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气。在万木草堂就读期间，他协助康有为完成了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并阅读了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的西学书籍和英国人傅兰雅编辑的《格致汇编》等，对西方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1895年，梁启超随康有为赴北京参加会试，正值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梁启超愤激不已，发动广东、湖南两省举人上书都察院，拒绝和议，接着又全力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维新派创办《万国公报》，梁启超成为主要编辑人之一。北京强学会成立后，梁启超又被任命为书记员。维新变法运动之初，梁启超就以其热情和才华而崭露头角，这时他才22岁。

这期间，梁启超阅读了大量西学书籍，愈益感到更张旧法、师法西方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并以宣传维新变法为己任，“斐然有著作之志”。在强学会及其机关报被禁封后，曾参加上海强学会的黄遵宪和汪康年谋议另办一份报纸，黄遵宪力邀“旷世奇才”的梁启超担任主笔。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是著名的资产阶

级维新政治家。他曾多年担任清政府的外交官，致力于介绍西学，主张“中国必变从西法”。他所著《日本国志》，除全面介绍日本国情外，着重研究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改革措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分析，阐述自己的变法思想，是维新变法的重要启蒙读物之一。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是张之洞的幕僚，也具有维新思想，但主要是依张之洞的意旨行事。

新办的报纸叫《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到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册。该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梁启超充分利用主持笔政的便利，倡言变法，一篇又一篇议论新颖、精彩有力而又通俗易懂的文章在《时务报》上与读者见面，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他的长篇政论《变法通议》。

在这些政论文章中，梁启超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抨击了“泥祖宗之法”的顽固守旧思想，阐述了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的规律，推论人类社会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反复说明变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非可阙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变而变”指主动实行变法，“不变而变”指被迫由他人代行变法。他举了四个例子说明变法的必要和不变法的危害。其一是日本，它也曾遭受西方国家的欺凌，但是在强敌面前，日本自己主动进行变法，向西方学习，“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致富强，并进而向外扩张，“夺我琉球，割我台湾”，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其二是突厥（指土耳其帝国），尽管它“地跨（欧亚非）三洲，立国历千年”，然而却“守旧不变”，致使“他人执其权而代变之”，国土被其他国家肢解分割；其三是印度，本是“大地最古之国”，因为“守旧不变”，已经“夷为英籍”，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了，这是被一个国家吞并而代其变法；其四是波兰，本为“欧西名国”，由于“政事不修，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之矣”，这是被几个国家瓜分后替它变法。那么，在“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在“变”与“不变”、“自变”和他人“代变”之间，应该作出怎样的选择呢？答案是再明确不过了：“自变”可以保持国家民族的独立，而他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人“代变”则是亡国。梁启超的这种警告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对人们起到了极大的警醒作用。

那么，该如何变呢？梁启超的回答是学习西方，以强敌为师。他说：“古人所患者，离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国；今之所患者，离乎中国而未合乎夷狄。”指出今昔异势，过去的“夷狄”不能不“合乎中国”，而现在的中国却不能不“合乎夷狄”了，因为现在的“夷狄”是远比中国进步、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梁启超为此专门著《西学书目表》，辑录中外西学译著300余种，内容涉及时政及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并附有《读西学书法》。在学习西方方面，梁启超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抑君权、兴民权的政治主张。他认为，自秦以至当时，中国历史绵延两千多年，政治制度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实行的一直是君主专制制度，而“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要想使中国转弱为强，就要仿效西方，大兴民权。他认为，学习西方，主要的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这才是根本，至于坚船利炮、制造技术等都是皮相之学。他总结说：“一言以蔽之：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即改革政治制度。他强调这是“立国之元气，致强之本原”，并引证大量中外事实，摆事实，讲道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由于梁启超中学根底深厚，西学也颇有造诣，才思敏捷，笔锋犀利，文采飞扬，讲理透彻，而且“笔锋常带感情”，因之他的宣传很能打动人心，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也因此享誉中外，声名大著。当时的“新学士子”看到梁启超“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时务报》也因此大为畅销，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一时洛阳纸贵，“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湖南维新人士邹代钧致函经理汪康年说：“昨日俞恪士送到报百份，阅之令人狂喜，谓识文兼具，而采择之精，雕印之雅，犹为余事，足洗吾华历来各报馆之陋习。三代以下，赖有此举，为吾党幸，为天下幸。”他又说：“此报名贵已极，读书人无不喜阅”，要求“补寄二百份”。张之洞对《时务报》和梁启超也另眼相看，认为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下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俱

行按期寄送一份，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共计二百八十八份”。张之洞写信给梁启超，向《时务报》“捐助银元五百元”，“其盼卓老中秋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其实，张之洞当时已是花甲老翁，而梁启超才不过24岁，竟称梁启超“卓老”，的确说明了梁启超和《时务报》在当时的影响。

但是，梁启超和张之洞毕竟分属不同的政治派别，尽管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方面有不少共同点，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却有着根本的区别：梁启超以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学说为理论武器，不但主张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而且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造；张之洞只是想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机器生产，用以巩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理论基础纲常名教，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抱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西用”卫“中体”的态度。因而，随着梁启超对洋务派批评日趋激烈、对“托古改制”理论和抑君权兴民权的主张不断进行积极宣传，张之洞越来越不能容忍。他曾一度想把梁启超聘往湖北，予以官禄，借以笼络，但却遭到梁启超的拒绝。于是，他开始对《时务报》横加干涉。洋务思想本来就多于维新思想的汪康年秉承张之洞的意旨，一步步控制了《时务报》，终于迫使梁启超在1898年3月辞去了《时务报》主笔的职务，《时务报》从此脱离了维新派，改弦易辙了。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活动，除主笔《时务报》外，还曾主持创立澳门《知新报》、上海大同译书局、上海不缠足会，编辑出版大型丛书《西政丛书》，而最重要的是担任湖南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在宣讲维新变法思想，培养维新人才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4 以“天演”警醒国人的严复

严复（1853～1921），初名体乾、传初，曾改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晚号瘉懋老人，福建侯官人，是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严复少年时代，正值洋务运动初期。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创立福州船政局，局中附设求是堂艺局，又叫福州船政学堂，招收16岁以下聪颖少年。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学堂分前、后两部分，前学堂学造船，后学堂学驾驶，教学体制取法于英、法两国海军学校。在当时，科举考试才是“正途”，这种不能提供升官发财机会的学堂为一般读书子弟所不取。为了吸引人来投考，学堂规定：凡录取的学生，伙食费全免，另外还每月给银4两，贴补家庭费用；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一等的，赏银10元；5年毕业后，不仅可以得到一份差使，还可以给薪水。这样的条件，对家境贫寒的严复来说，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于是，这年冬天，14岁的严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福州船政学堂，被分到后学堂学习轮船驾驶。

5年后，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随后上舰实习，到过新加坡、槟榔屿及日本等地。1877年，作为福州船政学堂首批派赴欧洲的留学生之一，严复赴英国留学，入皇家格林尼茨海军学院（The Royal Navy College，Greenwich）。留学期间，除学习专业课程外，严复还深入了解英国社会，考察英国的政情民俗，研读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说，并多有心得，颇具见地，成为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清政府首任驻英公使、早期维新思想家郭嵩焘对严复极为赏识，把严复当作自己的忘年之交，常邀严复到公使馆，与之“论析中西学术异同，穷日夕勿休”，并写信给友人说：“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自称）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以当此。”对严复给予很高的评价。

1879年6月，严复学成回国，先后担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随着置身

于洋务运动之中和在清政府官僚集团中地位的上升，深受西方文化耳濡目染的严复越来越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和洋务运动的局限性。甲午战争更使严复深受刺激，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他和其他维新志士一样感到了在中国实行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而，他积极投身到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中，为维新变法摇旗呐喊。

严复的宣传活动，首先是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5篇重要的政论文章，它们是：《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原强续篇》、《救亡决论》。在《论世变之亟》中，严复指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用他的话说就是：“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他认为，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中国两千年历史上的旷世巨变，在这个“世变”面前，中国应当实行改革，自强救国。他批评那些“不睹西洋富强之效”的守旧士大夫是“无目者也”，那些说“不讲富强而中国可以自安”、“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可以自致”、“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的人都是“狂易失心之人”，对顽固守旧分子予以猛烈的抨击。

在《原强》一文中，严复全面阐述了他的救国理论。首先，他根据英国资产阶级学者斯宾塞的社会学说，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该国国民在力、智、德三方面的高下，用他的话说就是“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和“德行仁义之强”。斯宾塞是庸俗进化论者，达尔文的进化论创立后，他把达尔文在生物科学中发现的进化论原理，推之于万事万物，特别是应用于人类社会之中，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宣传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原则。严复吸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吸收了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从道义的立场来看，庸俗进化论无疑是一种十分反动的理论，是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吞并落后国家和民族服务的理论。19世纪的中国面对的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已经把许多国家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严复接受这种学说时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客观现实。但是严复接受这种学说，与斯宾塞的用意却正相反。首先，严复接受这种学说是出于对自己祖国命运的深深忧虑，他把这种学说介绍到中国来，向国人指出祖国面临的险恶处境，加深对祖国危险前途的认识，有助于维新变法活动的开展。其次，在《原强》中，严复用力、智、德三个标准考察了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揭露了清王朝的腐败：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力，力弱；论智，智低；论德，德衰。军队中“将不素学，士不素练，器不素储”，一旦面临强敌，则“曳兵而走，转以奉敌”。政府的官吏，“人各顾私”，对于时事大势“懵未有知”，其中的败类甚至乘乱取利。他认为，中国若长此以往，则“岁月悠悠，四邻眈眈，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最后，严复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使中国由贫弱转为富强的根本办法，这也是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从具体内容看，“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和禁止缠足；“开民智”最主要的是废除八股，提倡西学；“新民德”则是于京师设立议院，各级官吏由选举产生。总而言之，是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来代替中国封建的宗法制度和道德观念，以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求生存。

《救亡决论》和《辟韩》可以看做是《原强》一文的补充。《救亡决论》集中阐述了他的“开民智”思想，更加痛快淋漓地指斥了中学和八股取士的危害性，论述了提倡西学的必要性，提出变法最急切的是要废除八股取士的办法。《辟韩》一文则专就“新民德”方面予以补充发挥。所谓“辟韩”，就是批驳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韩愈在其《原道》一文中反映的尊君专制思想。韩愈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意思是说，“君”是专门下命令的，“臣”是专门负责把“君”的命令传达给“民”的，而“民”的义务是奉养统治者。严复认为韩愈的这一理论是极端错误的，他是只“知有一人（君），而不知有亿兆（民）”。严复指斥历代的国君都是“窃国大盗”。在抨击了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上，严复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他说，国君还是需要的，但不是要他来高高在上统治人民，而是要他来保卫人民，因为人民各有其生业，不能同时自己管理、保卫自己，于是才需要有个国君，而这个国君是由人民公举出来的。严复曾留学欧洲，他的这种观点显然来源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当时无疑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和启蒙意义。在1895年维新变法运动初揭帷幕之际，《辟韩》是当时中国抨击专制、提倡民主的最有力的一篇论文，一年多以后，梁启超在上海主持《时务报》时，还将该文予以转载。

在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中，严复是独具特色的一个，他的特色就在于他接受过正规的西学教育。其他维新派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之辈，自幼受的全部是封建教育，在百日维新以前，他们都没有到过西方，没有亲眼目睹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情民风，而且，他们都不懂外文，不能直接阅读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的著作。他们的西学知识，大多来源于西方传教士的译著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有关西学的著作；他们看到的只是香港、上海某些带有西方色彩的事物，因而他们的西学知识是零碎的、不完整的；他们对西方的认识是肤浅的、片面的。用梁启超的话说，他们生活在“学问饥饿”的环境中。他们的维新理论是把他们所接受的中学中的某些思想和不完整的西学知识加以糅合、改造而形成的，因而往往有牵强附会之处，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说服力，容易招致守旧势力的反击。这一点，连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严复与康、梁等人不同，他受的教育和经历使他对西方国家的了解之深、对西学的造诣之高，远非康、梁等人所能望其项背。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严复的文章理智多于义气，他的宣传也就更具有说服力。

作为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最大的贡献在于通过翻译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比较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理论。他的第一部译著，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是在甲午战争刺激下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Thomas H. 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直译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翻译了其中的前两篇）。

赫胥黎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天演论》原书出版于1894年，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严复的注意，很快把它翻译了出来，接着就有人将他的译稿传抄印行，1897年严复创办《国闻报》后，又曾在该报连载（未完），1898年4月正式出版。严复之所以选择翻译《天演论》，是因为它讲的是进化论。但是他翻译时并不只是忠实地翻译原文，还在里面加了许多案语，加进了不少斯宾塞的观点和他自己的见解，他的案语往往比原文还要长。

在《天演论》里，严复要宣扬的中心思想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谓“物竞”，就是“生存竞争”，“物争自存”；所谓“天择”，就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是“自然淘汰”，“以一物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这样，“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赫胥黎的原意，在于阐述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而严复却按照斯宾塞的观点，把这一原理推广应用于人类社会，认为这一原理对人类社会也是适用的。严复的目的，在于借用进化论警醒国人，阐明中国应该顺应“天演”的规律，实行变法，学习西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由弱变强，才能免于被列强瓜分的惨祸而保持民族独立，才能在这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上生存下来，否则的话，就会亡国灭种，被“天演”所淘汰。

《天演论》译出后，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是最早读到《天演论》译稿的人之一，一读之下，钦仰备至。《天演论》还没有出版，他就加以宣传，并据以写作宣传维新变法的文章了。康有为看到《天演论》译稿后，也惊叹“眼中未见此等人”，推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甚至连名重一时的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也对严复和他译的《天演论》击节叹赏，给严复写信说：“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刘备）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亦缘自来译手无此高文雄笔也。”《天演论》正式出版时，吴汝纶又特为之作序，称“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

严复译的《天演论》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不少小学教师拿《天演论》作教材，中学教师也往往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作文题目。青年学子们更是不顾守旧长辈们的反对，醉心于阅读《天演论》。鲁迅后来回忆他在南京上学时初读《天演论》时的情景说：“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不仅觉得书中有“写得很好的文字”，并且“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所以，尽管一位本家的老前辈严肃地反对，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胡适也在多年以后回忆道：“《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

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多少年轻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话，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曾拥护过孙中山后来又反对孙中山的广东军事领导人——引者）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做孙竞存，一个叫做梅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由此可见，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具有何等广泛深远的影响，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起了何等大的作用。

严复译的《天演论》之所以会有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严峻的民族危机和深重的民族灾难使人们普遍感到祖国前途堪忧，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在扪心自问：中国究竟应当怎么办？《天演论》向人们发出了警告：如果依旧因循守旧，不思变革，中国在这个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就将无以自存；如果奋发图强，“与天争胜”，中国就可以度过危机，柳暗花明，国家就可以永存，种族就可以延续。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其权操之在我。这种思想不仅警醒了迷惘的国人，而且为维新变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武器。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天演论》得到广泛传播和信仰就是很自然的了。

这里还要提一下的是，严复不仅是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近代翻译史上他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奠定他在翻译史上的地位的，除了他众多的译著外，主要的是他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翻译的标准，即“信”、“达”、“雅”三字标准。“信”就是忠实于原文，这是翻译的基本要求；“达”就是译文要通顺，符合所要译成的语言的特点，语法正确，选词恰当；“雅”就是文雅，指译文要有文采。这三字标准是严复通过艰苦的翻译实践提炼出来的，是他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尽管后来又有不少翻译家对翻译的标准进行过讨论，但是都没有超出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的范围。时至今日，这三字标准仍被翻译工作者奉为圭臬。作为译文的最高境界，要完全达到这个标准是难乎其难的。至于严复本人，他是比较偏重于“雅”的。我们已经知道，严复从小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又去英国留学，在传统的“中学”方面没有受过严格正规的教育，这在当时就使他很难跻身于所谓士大夫阶层。为了能够跻身于士大夫阶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层，取得令人承认的社会地位，严复回国后在“中学”方面痛下过一番工夫，“中学”素养大大提高，能够写一手好文章。在翻译上，严复也特别注重遣词造句，这样，他的“雅”有时就成了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文雅。他甚至认为译文只有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才能登大雅之堂。因而在翻译实践中，他是“与其伤雅，毋宁失真”，译文往往就成了改编。严复追求雅的结果，是使他的译文文采斐然，读起来朗朗上口，铿锵有力，所以他的译著能够风行传播，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维新变法宣传活动中，严复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国闻报》创刊于1897年11月，属日报，除登载国内外时事外，还经常发表社论，讥评时政，臧否封建文化，主张“通上下之情”——实行民主政治、“通中外之情”——学习西方。《国闻报》与梁启超主持的上海《时务报》南北呼应，在维新变法的宣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6 洋人的鼓噪

外国人士在中国鼓吹变法，始于19世纪60年代。1865年11月6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向清政府呈递《局外旁观论》，以“旁观”者的身份向清政府提出改革建议，可算是外国人在中国鼓吹变法的嚆矢。次年3月5日，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Francis Thomas Wade）在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授意下，向清政府呈递《新议略论》。赫德与威妥玛二人均对清政府的内政提出批评，涉及吏治、军队、科举考试等方面，建议清政府对内进行改革，兴办新政，如修筑铁路、开采矿产、编练新式海陆军等；对外遵守不平等条约，保护列强在华利益，并对清政府进行恫吓，却又申明列强对中国并未包藏祸心，说什么他们所提各项建议“不惟于中国无损，实于中国更有大益”。

赫德与威妥玛的意见，可以说代表英国官方的态度，自然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清政府虽然也看出其中有挟制恫吓之意，但同时也认为他们的建议“于中外情形深有关系”，“不无谈言微中”，下令有关督抚讨论，对推进洋务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鼓吹变法持久且影响广泛的是英美传教士。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68年在上海创办《教会新闻》，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初时主要登载有关宗教的内容，兼及自然科学知识和中外新闻，以后介绍自然科学知识和鼓吹变法的内容逐渐增多。1875年，林乐知在该报发表《中西关系论略》一文，批评中国人的守旧思想，说“外国视古昔如孩提，视今时如成人，中国以古初为无加，以今时为不及”，这是中国落后衰弱、西方先进富强的原因所在。他建议中国实行变革，改革兵制，修筑铁路，架设电线，制造船炮，广通商，善理财，而根本的问题是加强教育。此文发表后，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少读者写信给《万国公报》，阐述自己的看法。接着，《万国公报》又登载了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从此，批评中国时政和提出改革建议成为该报的重要特色，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康有为创办的第一份维新报纸取名《万国公

报》，就是为了借助其影响。

1887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在上海发起成立同文书会（1892年改名广学会），以赫德为董事长，韦廉臣为总干事，主要成员有林乐知、丁韪良（W.A.P.Martin，美国长老会教士，长期担任同文馆总教习）、李佳白（美国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英国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英国教士）等。该会以“广西国之学于中国”相标榜，主要业务为用汉文撰译出版西方宗教书籍和政治书籍，是清末主要的翻译出版机构之一。李提摩太接任总干事后，拟定了包括出版、征文、演说等内容的工作计划，会务发展更为迅速，尤以出版方面成绩最大。此外，广学会还于1889年复刊已于1883年停刊的《万国公报》作为自己的机关报。通过出版书籍和发行报刊，广学会大量介绍西方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科技知识、历史、教育、法律等，鼓吹变法改良，因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1894年以后，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和《万国公报》登载的文章中有关时政和鼓吹变法的文章都大大增加，对方兴未艾的维新变法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广学会出版由李提摩太翻译的英国人麦恳西著的《泰西新史揽要》（Robert Mackenzie，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介绍19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风行一时，被多次翻印，光是1894年四川一省就翻印19次，广学会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编辑撰译书报的同时，一些英美传教士还频频与清政府大臣接触，兜售他们的变法主张和改革建议。例如，1895年初，正当中国战败于日本之际，李提摩太三次到南京面见张之洞，劝说清政府迅速与日本言和，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西学内容，广筑铁路，创立邮政局，遍兴各种新工艺并与绅商合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各聘一声望素著的西方人士为顾问，甚至提出中国授全权于某外国（实即英国），在一定期限内代理中国的内政外交。此一建议意变中国为英国的保护国，从而进一步攫夺在华利益。故此建议张之洞并未采纳，而李提摩太本人亦受到张之洞的冷遇。李提摩太又先后拜访李鸿章、张荫桓、孙家鼐、翁同龢等大臣，宣扬他的计划。李佳白也积极活动，除拜访翁同龢、恭亲王奕䜣等“当轴巨公”外，还刻意与翰、詹、科、道等京官交游，宣传他的主张。此外，他还将自己的建议写成《上中朝政府书》、《探本穷源论》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等文章进呈总理衙门，并不时将他发表的文章和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分送清政府官员。

英美传教士的宣传对维新分子的思想影响不可估计。在维新思想形成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或多或少受到传教士宣传的影响，如谭嗣同在《报贝元徵书》中专门转述李提摩太关于中国失地、失人、失财的看法，说：西北边地，为俄国陆续侵占者“可方六千（英）里”，是为失地；中国50年前人口已达“四百二十兆口”，如果“以西法养民之政计之”，每年人口可以净增1%，而中国人口却没有这样增加，是为失人；如果用西法理财，5口之家每年“可共生利一铤”，可是中国却“日贫一日”，是为失财。而对于失人、失财，中国“知之者千无一人”，甚或“知之者竟无其人”，“中国尚得谓之有士乎”？谭嗣同“深有痛于此，常耿耿不能下脐”，这是他走上维新变法道路的原因之一。再如，梁启超的西学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广学会的出版物。他在《西学书目表》中选录了广学会出版的书刊22种，认为其中最好的是《泰西新史揽要》和《万国公报》，此外，还有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李提摩太的《列国变通兴盛记》、《西国学校》，花之安（德国教士）的《自西徂东》以及《文学兴国策》、《七国新学备要》、《治国要务》、《新政策》等。至于康有为，他受广学会书报的影响程度，限于史料，很难断定，但是，自从李提摩太加入强学会两人结识后，即往来较密切。1898年夏，康有为致函李提摩太商请变法计划，又将《泰西新史揽要》和《列国变通兴盛记》诸书进呈光绪帝，甚且推荐李提摩太作光绪帝的顾问。李提摩太看到康有为的变法奏折后，在给他妻子的信中说：“余甚惊异，凡余从前所有之建议，几尽归纳结晶，若惊奇之小指南针焉。”可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美传教士的影响。

但是，英美传教士鼓吹的变法及其变法主张，与维新派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英美教士在鼓吹变法时摆出的是一副“关爱中华”的菩萨面孔，但是，除个别人外，他们鼓吹中国变法的目的是对他们的国家有利的。因此，在具体的建议上，他们只是主张中国引进西方的物质技术和宗教，例如，开矿筑路，扩大通商，传播所谓基督文明，而对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并不热心劝导中国仿行。李提摩太等对此根本未曾提及，

而林乐知甚至力陈中国不可仿行。他们希望中国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化，以便利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但是他们决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有力量摆脱列强侵略并进而与之抗衡的资本主义强国。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作为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传教士，其所作所为本质上同他们国家的政府是一致的。

维新志士们尽管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尚无清醒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对列强还抱有幻想，但是对英美教士的鼓吹变法，也并非衷心赞同。梁启超就比较清醒地指出：“练兵而将帅之才必取于彼焉，置械而船舰枪炮之值必归于彼焉，通轮船铁路而内地之商务彼得流通焉，开矿而地中之蓄藏彼得染指焉。且有一兴作，而一切工料，一切匠作，无不仰给之于彼，彼之士民，得以养焉。以故铁路开矿诸事，其在中国不得谓非急务也，然自西人言之，则其为中国谋者十之一，自为谋者十之九。”表现出他对西人在华活动的警惕，难能可贵。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1 “颇想有所作为”的青年皇帝

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坐在大清朝皇帝宝座上的是光绪帝。

在晚清历史上，光绪一般被人们看做是一个不幸的软弱的皇帝。光绪帝名爱新觉罗·载湉，生于1871年，是道光帝的孙子，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奕

之子。醇亲王福晋（满语，“夫人”之意）为慈禧胞妹，慈禧又是咸丰帝的贵妃。因此，慈禧既是光绪的姨母，又是他的伯母。

慈禧是同治帝生母，具有极强的权力欲，1861年，她与恭亲王奕䜣等联合发动宫廷政变，诛戮贬斥了咸丰临死前任命的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诰命大臣，实行太后垂帘听政。1875年，同治帝病死。同治没有子嗣，按理说新皇帝应该比同治低一个辈分，但是那样慈禧就成了皇太后，按规定就不能再执掌实权。慈禧为了牢牢将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策立与同治帝同辈的年仅4岁的载湉为帝，年号光绪，仍旧垂帘听政。下载资料请关注我的博客https://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光绪于1875年即皇帝位，到1908年去世，在位共34年，其中头15年是慈禧垂帘听政，光绪读书受教育。1898年9月戊戌政变后的9年间，光绪被慈禧囚禁。作为皇帝，他真正可以有所作为的只是从1889年3月亲政开始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为止的不到10年的时间，而且在这亲政的10年间，他也还是受着慈禧的牵制，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自作主张。他之所以还被后人记着，是因为他在甲午战争特别是维新变法运动中有过重要的表现。

光绪亲政后，慈禧名义上退居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了，但实际上，她是身在颐和园，心在紫禁城，仍旧把持和操纵着朝政。光绪每月至少要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两次，有时甚至多达六七次，臣工的重要奏折也必须送呈慈禧过目后才能由光绪颁行谕旨。实际上，光绪只是一

个傀儡皇帝。这种状况使光绪很不满意，也使一些近臣愤愤不平，于是逐渐形成了支持光绪掌握实权的“帝党”，而那些支持慈禧掌握实权的官僚则形成“后党”。

帝党的中坚人物是翁同龢。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江苏常熟人。他的父亲翁心存官至大学士，二兄翁同爵官至总督，长兄翁同书官至巡抚，一门均为大官。翁同龢本人于1856年中状元，同治年间已官至内阁学士。光绪即位后，翁同龢被任为光绪的师傅，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他于1894年入值军机，成为参与清政府决策的军机大臣，是光绪最亲信的大臣。凡遇军国大政，光绪“必问同龢”，倚畀甚重。此外，帝党人物还有军机大臣李鸿藻、工部尚书孙家鼐、工部侍郎汪鸣銮、长麟以及光绪之妃珍妃的堂兄礼部侍郎志锐、珍妃的师傅侍讲学士文廷式、工部主事沈曾植、户部郎中陈炽等人。这些人成为光绪的近臣，或为翁同龢的门生故旧，但除翁同龢本人在清廷中有相当的权势外，其余多为文职官员，虽然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社会舆论，但是无权无勇，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力量。

与帝党相比，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势力则要大得多。到甲午战争时，后党的中坚人物为军机大臣孙毓汶和徐用仪。孙毓汶（？～1899），字莱山，山东济宁人，1885年入值军机，并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1861年设，负责外交事务的机构）大臣。他先是追随醇亲王奕

，奕

1891年去世后，他唯慈禧之言是听，成为慈禧的心腹大臣。徐用仪（1826～1900），字小云，浙江海盐人，同治初年充军机章京，1884年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1894年，经孙毓汶援引进入军机处。孙毓汶对内结交总管太监李莲英，对外笼络权势最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巩固和抬高了自己的地位，很快就成为一个声势赫赫、不可一世的枢机要员，控制了军机处的大权。此外，京内部院王大臣文武百官和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京外督抚藩（布政使）臬（按察使）等，或慑于慈禧的淫威，或诱于权势利禄，大多追随后党。

帝后两党形成于光绪亲政后的数年间，两党斗争的表面化则开始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最终的决战是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帝后党争是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争夺清政府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但是，在甲午战争及随后的维新变法运动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帝后党争带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具有了“爱国”与“卖国”、“维新”与“守旧”之争的性质。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所著《中国近代史》（上册）中评价光绪帝时说道：“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严格地说，光绪开始“接受新思想”、“颇想有所作为”，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

1894年6月，日本侵略者在朝鲜制造事端，战争一触即发。光绪反对妥协，主张抵抗。光绪对于李鸿章迎合慈禧的避战心理，幻想通过俄、英等第三国的调停和平解决争端的行为，深感不满。他向李鸿章指出：“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要求李鸿章加强战备。当李鸿章调派叶志超、聂士成统兵前往朝鲜应敌时，光绪深虑“兵力不足”，谕令“尚须增调续发”；为了加紧战备，又急令战将刘永福、刘铭传、刘锦棠等或到台湾布防，或来京待命；并且第一次公开冒犯慈禧的旨意，“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引得慈禧勃然大怒。但是，这场战争是一场注定打不赢的战争。战败的消息传来，光绪痛心疾首。中日议和时，他反对割地，认为“割台（湾）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迟迟不肯在《马关条约》文本上“用宝”（加盖皇帝印玺）。他犹豫不能决，面容为之憔悴，“如在沸釜中”，拖了10天，才在后党与列强压力下，怀着不甘心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批准了这个屈辱的条约，随即与翁同龢“相顾挥涕”，紧接着又亲自书写朱谕，颁示天下，以明心迹，表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鹜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这表露了他不甘屈辱失败、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

《马关条约》签订时，康有为等来京应试的举子们发动了“公车上

书”，拉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帷幕。由于守旧大臣的封锁，光绪没有看到康有为的上书。但是，20多天后，康有为又写了一篇13000余字的上皇帝书，即《上清帝第三书》，被送到了光绪面前。光绪阅后，深受启发，对康有为提出的“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等自强雪耻之策和为实现这些目标提出的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建议深为赞赏；对康有为质问他“下僚庶士，怀才效忠者甚众，皇上所深知简任者有几人？所不次拔擢者有几人？所议论咨询者有几人？所日夜钩访者有几人？”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和批评他“皇上鼓舞拔擢之道有未尽也”的激烈言词，毫不怪罪。光绪令军机处将康有为的上书抄三份，一份存紫禁城皇帝召见臣工处理政务的乾清宫，一份存西苑（中南海）皇帝办公的勤政殿，以备随时阅览，一份存军机处，旋即抄发各省督抚将军议奏，而把原书送颐和园呈慈禧，不久发下军机处封存。康有为的第三书成了推动光绪帝打算变法实行新政的重要因素。

光绪看到康有为的第三书后，又接连看了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的《条陈变法自强事宜折》、南书房翰林张百熙的《急图自强敬陈管见折》等要求变法自强的奏折，大受鼓舞，于1895年7月19日发布上谕，从康有为、胡燏棻等人的奏折中，提取了他认为当前切实可行的14项新政，包括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整厘金、核关税、稽荒田、汰冗员等，指出前10项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劝工惠工为本原，应该立即举办，后4项只要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于国计民生必定大有好处。他要求各督抚将军各就本地情形会同各地方官悉心筹划，讨论复奏。虽然这个一揽子的新政计划并没有多少新东西，都可以从当时议论时务的书中找到，但是，这么多的东西一下子汇集到了光绪的脑袋里，并变为他积极催办的要政，充分表明了光绪锐意变革的雄心和自强雪耻的急迫心情，这也可以从他要求督抚将军们议复时不得“畏难苟安，空言塞责”的严肃态度中看出来。同时，光绪还和翁同龢一起拟定了12道诏旨，准备陆续颁行，大干一场。

14项新政由于势力庞大的守旧督抚将军的反对被扼杀在摇篮里，12道变法诏书也在慈禧的阻挠下胎死腹中，但是，这些却表明光绪向维新变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3 继续联络同志

康有为在“上书求变法于上”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当然，这里所说的“群众”并不是指广大的劳动人民，而是康有为所属的知识界和京官阶层。

这一时期他在这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开会振士气于下”，即继续组织各类学会，开通风气，倡导变法，联络维新同志，发动社会舆论，为变法维新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大气候；二是积极策动了第二次公车上书，广泛发动知识分子投身于政治活动，这同样也是“振士气于下”的工作。这时的康有为已是朝廷命官，不能再以公车身份公开出面领导上书活动，而是退居幕后，由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无官职）、麦孟华和林旭等人出面进行。

1898年1月5日，康有为率先联合广东籍在京人士在南海会馆成立了粤学会，入会者有20余人。该会成立后，名动京师，其他省籍的旅京人士受到鼓舞。康有为又积极鼓动，于是以省籍为单位的学会纷纷成立：1月31日，康有为的学生林旭联合福建籍人士在福建会馆成立了闽学会；2月8日，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御史陕西宋伯鲁、山西杨深秀等联合陕西、山西籍人士成立关学会；3月间，与康有为过从甚密、曾参加过强学会的内阁侍读杨锐联合四川籍人士在四川会馆成立蜀学会。这些学会与康有为领导的粤学会“同声相应”，联为一气。同时，康有为还分别鼓动直隶、湖南、浙江、江西、云南、贵州等省旅京人士组织学会。其后，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等纷纷成立。

在这些学会的基础上，康有为与热心于开学会的御史李盛铎商议，决定“成一大会”，取名“保国会”。经筹备，4月17日在北京粤东新馆召开了隆重的保国会成立大会，大门上用大字写着“保国会”字样。到会成员上至二三品朝廷大员和翰詹科道、各部员郎主事，下及在京的行商坐贾，外及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200余人。在大会上，康有为登台作了演讲，说明建立保国会的必要性和它的目的。康有为慷慨陈词，指出四万万中国人民就像是“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使，听人宰割”，真是“奇惨大痛”。他回顾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的事实，尤其是列举了最近以来列强瓜分中国的20条罪状，说明中国的生死存亡已迫在眉睫，中国的圣教种族也即将沦亡，若再不自强，亡国灭种就在眼前。他进而指出，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发愤变法自强，只要全中国四万万人“人人热愤”，那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建立保国会，正是为了保国、保种、保教。康有为讲到悲愤处，“泪随声下”，动人心魄，听众为之动容，为之泣下。

在这次成立大会上，议定了康有为起草的《保国会章程》。章程共30条，主要内容为：申明保国会的宗旨是“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和“保圣教（指孔教）之不失”，同时讲求变法、研究外交、谋求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说明保国会的组织形式：在京师和上海设立保国会总会，各省设立分会，公推总理、值理、常议员、备议员和董事各若干人；制定了保国会的纪律、入会手续及总理以至会员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保国会的主要活动是讲演，然而连同成立大会一起总共只开了三次会，它便在顽固派的攻击下不再活动了，设立总会、分会的计划没能实现，入会手续也没有严格执行。但是，它是在中国面临瓜分危机形势下成立的，高举的是爱国的旗帜，宣传的是维新变法，因此，在当时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家报纸载文评论说，本朝建立250多年来，士大夫没有奉朝廷的命令即毅然以国家大事为“己任”，而且搞得“如是其盛”，轰轰烈烈，是“未之前闻”的。

保国会的活动使顽固派大为恼怒。在保国会召开成立大会前夕，徐桐就把发起人之一的李盛铎召到家中训斥了一通，随后李盛铎又“受荣禄之戒，乃除名不与会”，脱离了保国会。荣禄还放出风来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相识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脑袋）可也。”杀气腾腾，可见一斑。其他守旧分子也纷纷跳出来上奏弹劾保国会，吏部主事洪嘉与指使浙江举人孙灏出面攻击保国会，并替他拟《驳保国会章程》，对30条章程逐条批驳，说康有为和保国会“厚集党徒”，“形同叛逆”，“莠言乱政”，甚至大骂康有为是“地方大光棍”，极尽

诬蔑谩骂之能事。5月2日，御史潘庆澜也上书弹劾康有为“聚众不道”，军机大臣刚毅根据潘庆澜的弹折打算查究保国会，这时光绪出面护持，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又查禁耶？”才把这事压了下来。但是参加保国会的大部分成员却动摇妥协了，保国会虽未遭封禁，却在无形中解散了。虽然如此，正如梁启超所说：“各省志士纷纷继起，自是风气益大开，士心益加振厉，不可遏抑矣。”

1898年1月22日（农历戊戌年正月初一日），占领胶州湾后又侵入山东即墨县的德国侵略军多人闯入即墨县文庙，将庙中的孔子像损坏，并将子路像的双眼挖去。众所周知，孔子及其门徒在那时候的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心目中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非议孔子都被视为大逆不道，何况损毁孔子的塑像。因此，消息传开，远近士庶无不义愤填膺，驻即墨的清军士兵也想要去找德军拼命。但是，地方官畏洋兵如虎狼，没敢将此事报告清政府。直到4月22日，赴京参加会试的山东举人、孔子后裔孔广謇等10余人将此事上书都察院，同时由黄象毅领衔的另100多名山东举人也上书告发，此事才被披露出来，朝野上下闻知后大为震动，来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更是怒不可遏，甚至有人打算到德国驻京使馆去“声罪报复”。

康有为、梁启超闻讯后，立即决定抓住这一机会，鼓动各省举人上书都察院。在康有为幕后策划下，4月29日，麦孟华、林旭、梁启超等12人联名向各省举人发出了《请联名上书查办圣象被毁公启》，指出文庙孔子像被德国人毁坏绝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它关系到“吾教之盛衰”和“国之存亡”，号召各省公车具呈都察院代奏，请政府与德国理论，查办毁像之人，并措词严厉地说，谁若不在上书上签名，谁便是“自外衣冠之种族”，即不是人，因而这份公启很有感召力。此后，各省举人乃至京官纷纷上书，都察院门前又像三年前公车上书时那样出现了车马塞途、人情汹汹的请愿浪潮。根据清宫档案记载，规模比较大的有：

5月2日，福建举人林旭等369人联名呈递《圣像被毁，圣教可忧，请饬总理衙门责问德人，令其速行赔办呈》；

同日，湖北举人李家群等165人、湖南举人易顺豫等43人及安徽、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广西举人若干人联名呈递《东省公车群诉，未奉纶音，乞饬查办呈》；

5月4日，江苏松江府举人庄人泳等31人联名呈递《即墨圣庙一案关系重大，请严旨诘德人交犯惩办，以伸公愤呈》；

同日，江苏举人汪曾武等204人联名呈递《至圣像毁，乞饬总理衙门责问德驻京公使迅行惩办，以安人心而弭衅端呈》；

5月6日，广东举人麦孟华、梁启超等831人联名呈递《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而安人心公呈》；

5月12日，翰林院编修李桂林、徐仁镜等直隶省京官、举人、拔贡、附贡生等154人联名呈递《德人残毁文庙圣像，请旨严行责问，以保圣教而弭隐患折》。

在这为数众多的上书中，代表康有为意见的是他的学生麦孟华、梁启超领衔的广东831人联名呈递的公呈。公呈中称颂孔子“道参天地，德在生民”，他使天下“人知君臣父子之纲，家知孝悌忠信之义”，皇上以幼年登基，只靠二三大臣辅助于下，而能做到“天下晏然，四海静谧”，正是因为孔子的“君臣之义”已经“深入人心”。如今德国人竟公然毁坏先圣先贤之像，是为了试验我中国的人心，如果我中国人“士气不扬，人心已死”，他们就会遍毁各地的文庙，进而焚毁四书五经，再进而强迫我中国人入彼之教，孔子之教既亡，则“国亦从之（而亡）”；而且德国人敢肆行妄为，实际上是藐视我全中国之人。天下士人都为之震动，同仇敌忾。若朝廷对德国人的暴行听之任之，就会“人心从此尽失”。因此，德国割据胶州不过是“失一方之土地”，而毁像则会导致“失天下之人心，失天下之圣教”，“事之重大，未有过此”，要求清政府与德国交涉，查办毁像之人并勒令赔偿。这里，反映的是康有为振兴孔教以之挽救危局的思想。

这次上书，比之1895年的公车上书，规模更加宏大，参加人数更为广泛。这一事件本身，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觉醒，他们开始走出自己的象牙塔，勇敢地面对现实，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政见。这其中不仅有对德国侵略者横肆欺凌的满腔义愤，也有对中国积弱不振、清

政府软弱无能的痛心疾首，从而对祖国前途充满了危机感，对变法维新产生了紧迫感，这对方兴未艾的维新变法运动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5 “一朝天子”想有“一朝臣”的努力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意思是说，皇帝为了使自己的意志得到贯彻执行，就必须有一批一心一意听从自己命令、忠心辅佐自己的臣子，皇帝换了，臣子也往往跟着换。但是，光绪帝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他是被慈禧太后扶植起来的傀儡皇帝，起初手下没有一兵一卒，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亲政以后，才在周围聚集了一些支持他的台谏词馆之官，但势力远没有后党庞大，这对他推行新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诏定国是后，光绪的当务之急便是选用合适的人才，建立变法的权力机构。

《明定国是诏》颁布两天后，徐致靖上书保荐“行新政而图自强”的人才，建议光绪将康有为、黄遵宪（时任湖南盐法长宝道）、谭嗣同（时为江苏补用知府）、张元济（时为刑部主事）、梁启超（无官职）五人“召置左右”以“筹画新政”。光绪当天即看到此折，当即下旨：康有为、张元济预备于6月16日召见；黄遵宪、谭嗣同送部引见；梁启超由总理衙门考察具奏。

6月16日，屡次想见到康有为的光绪帝终于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也是冤家路窄，康有为在朝房候旨召见时，与前来谢恩的荣禄（前一日授署直隶总督）不期而遇。荣禄冷嘲热讽地问康有为：“以子之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回答说：“非变法不可。”荣禄又咄咄逼人地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愤然回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是欠考虑的冲动的回答，毫无疑问地加重了荣禄对他的仇恨，因而，荣禄对他的“狂悖”既恨且怒，谢恩后就对光绪说，康有为“辩言乱政”，企图使光绪疏远康有为，接着又到慈禧面前大骂康有为，说皇上如果听信康有为，“必害大事”。当然，光绪是不会听信荣禄的谗言的。

光绪见康有为的心情十分急切，竟然走到了门边去迎接。康有为进来叩见后，光绪循例问了康有为的年岁和出身，紧接着，这对神交已久但从未曾谋面的君臣便开始了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对话。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康有为迫不及待地陈奏：“现在列强交迫，分割狂潮又起，中国已经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光绪说：“这都是那班守旧的人造成的。”

康有为说：“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就可对症下药了。既然知道是守旧不变导致了现在的惨祸，那就非尽变旧法实行维新不能自强。”

光绪十分赞同，说：“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接着说：“近年来并不是不讲求变法，但都是少变而不是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所以没有成效，就好比一座已经破败的宫殿，如果只是小修小补，暴风雨一来，还是要塌倒的，必须将它拆掉，重新设计、重新建造才行。数十年来群臣所说的变法，都是略变其一端，而未曾筹及全体，而且，所谓‘变法’，必须是自制度法律改起，否则，只能算是‘变事’，不是‘变法’。臣请皇上变法，一定要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其中尤其应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康有为还告诉光绪，他曾考察了各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并编辑成书，皇上若决意变法，可从中采择。

为了使光绪树立起信心，康有为还乐观地表示，西方讲求300年，日本施行30年，都达到富强，以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就可以自立，以后更可以蒸蒸日上，“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

对于康有为的看法和建议，光绪表示同意，称赞他“条理甚详”。

这时，康有为似乎不解地问光绪：“皇上既然知道这些，为什么却迟迟不大举变法而眼看着国家危亡呢？”

光绪警觉地用眼斜扫了一下帘外的动静，然后深深叹了一口气，说：“无奈有人掣肘，叫我怎么办呀？”

康有为知道，光绪是受制于慈禧太后，无能为力，只好说：“皇上可以就现有的权力做能做到的事，虽然不能尽变，但能抓住重要的事做成几件，也足以救中国。只是现今的大臣都老迈守旧，不明世界大势，

皇上要想靠他们变法，犹如缘木求鱼。”

光绪插话说：“他们都不用心办事。”

康有为倒替他们开脱说：“他们不是不想用心，而是他们年轻时没有学过这些东西，现在年迈又没有精力再学，不知道如何去办。”他建议光绪：“皇上要变法，只有提拔重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之召对，视其才否，皇上亲自拔擢，不吝爵赏，破格重用。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已各有专差，只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各事，足以无事不办。至于原有旧人，且姑听之，只是他们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在于变法，凡变法之事，都另外特下诏书，使他们无从议驳。”

光绪对此表示同意。

康有为又转变话题说：“今日之患，在我民智不开，而民智不开之故，皆由八股取士造成。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求地球各国之事，却可以位至高官。现在群臣济济，却没有能担当大事者，都是八股取士造成的。所以说，台湾、辽东被日本割占，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对日赔款二万万两，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被列国割据，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光绪深以为然，说：“你说得很对，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我们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所以导致了今天这种局面。”

康有为问：“皇上既然已经知道八股有这么大的危害，把它废除可以吗？”

光绪回答：“可以。”

康有为建议道：“皇上既以为可以废除，请颁下明诏，不要交下面讨论，如果交下面讨论，他们肯定不同意。”

光绪说：“可以。”

接着光绪又问：“现在愁的是没有钱，应如何筹款？”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康有为大略介绍了日本银行发行纸币和印度征收田税的情况。他又说：“中国地大物博，遍地是财，发愁的不是贫穷，而是民智不开。”于是，康有为又向光绪谈了翻译西书、派遣留学、出洋游历等事。

这时，康有为觉得谈话时间已经不短了，不时停下来观察光绪的反应，但见他听得津津有味，并没有要结束谈话的意思，于是又谈了用人行政以及各种学会、开发民智激励民气、招抚会党等事，介绍了他编著各书的情况。过了许久，光绪才点点头说：“你下去歇歇吧。”又要求康有为：“你还有什么建议，可以写成奏折递上来。”康有为告辞离开时，光绪犹恋恋不舍地目送他出去。

这次召对时间长达两个半小时，用康有为的话说，是“从来所少有也”。

这次谈话不但使康有为激动万分，也使光绪兴奋不已。“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康有为的一番宏论，使光绪提高了对变法的认识，同时也使他觉得如有康有为这样的人才在身边来辅佐自己，君臣就会如鱼得水，因此，想给康有为一个较高的官职。但他也深知慈禧太后和守旧大臣对康有为十分嫉恨，如果骤予提拔，上怕慈禧太后不容，下恐群臣猜忌，所以，召见结束后，他马上召集军机大臣会议，商议如何安置康有为，其用意显然是要重用康有为。廖寿恒本来想请求赏给康有为五品卿衔，但是荣禄已先告诉刚毅不要同意赏给康有为官职，应该给他一个“微差”以折侮他。因此，当光绪问该如何安置康有为时，位置排在前面的刚毅抢先提出让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光绪无奈，只好同意。当天即传旨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章京”为满语译音，这里指总理衙门内一个相当于今日科处级的普通官员，虽有一定的地位，但是离光绪和康有为的期望相差甚远。这样一来，康有为还是六品芝麻官，这样的官当然没有资格常见皇帝，况且光绪和他中间隔的是满朝的后党干将和守旧大臣。

康有为本来对被重用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即使不给高官，总可以被召进宫给皇帝当顾问，没想到却是这样一个结果，他大失所望，觉得慈禧把持大权，变法希望渺茫，准备束装南下，一走了之。正在这时，6月21日，光绪下旨准许康有为专折奏事，这又使康有为重新燃起了希

望。想到自己“以主事召见，已为咸丰以来四十余年未有之创举，若以主事专折奏事，尤为国朝旷典所无”。他深知光绪的难处，更深知光绪对他殷切的期望，于是决定留下来帮助光绪筹划变法大计。自此，康有为利用专折奏事的权力，频频上书，向光绪奏陈他的各项新政建议，积极为光绪推行新法出谋献策。同时，他还先后编纂进呈了《突厥消弱记》、《波兰分灭记》、《列国政要比较表》等书，并把早年著的《孔子改制考》修改呈上，供光绪借鉴各国的经验教训，指导自己的变法行动。

光绪想重用康有为没有办到，而他倚为左膀右臂的师傅翁同龢，已迫于慈禧之命于光绪召见康有为的前一日被革职驱逐回江苏常熟原籍。光绪环顾左右，顿感形单影只。但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毕竟有慈禧太后不禁他办事的许诺，毕竟有康有为给他出谋划策，毕竟还有一些支持维新的帝党官僚，况且已经颁布了《明定国是诏》，现在已经是有进无退了。于是，他鼓起勇气，接连发布维新诏旨。同时，他并没有放弃选拔任用自己“一朝臣”的努力。8月间，发生了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被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阻挠一事，光绪借机于9月4日把守旧的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各部长官通称“堂官”，包括管部的大学士、尚书、侍郎，其属官则称为“司官”，如郎中、主事等）全部革职，而派支持维新变法的李端棻（梁启超的妻兄）、徐致靖、阔普通武、王锡藩等分别为礼部尚书和侍郎。

9月5日，光绪又下令当时任内阁侍读学士的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四人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被称为“军机四卿”或“四小军机”。这四人中，谭嗣同是众所周知的维新志士，林旭是康有为的学生，也是维新派人士。杨锐是张之洞的门生，曾参加强学会和蜀学会，他参与新政是出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推荐，但他是张之洞的代表。刘光第亦为陈宝箴所荐，曾参加保国会，自称无新旧畛域之见。军机四卿虽然职位不高，但是他们所处的地位重要，“所有新政奏折，皆令阅看，谕旨皆特令撰拟”，取得了阅看内外臣工奏折和为光绪起草谕旨的权力，“此后新政，皆四人行之”，那班守旧大臣的权力被夺，横在光绪和康有为之间的壁垒被推倒，“皇上有所询问于康，则命四卿传旨，康有为所陈奏，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亦由四卿密陈，不复有总署大臣矣”。由于军机四卿架空了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因而被时人目为“宰相”。

军机四卿的擢用，标志着变法权力机构的形成，这也就是光绪帝这“一朝天子”的“一朝臣”了。可惜的是，半个月后就发生了政变，在整个百日维新期间，军机四卿事实上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五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戊戌政变，变法失败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秀才们想动武

百日维新期间，虽然慈禧名义上“不禁皇上办事”，但实际上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虽人在颐和园，而心时时在朝中也。”时刻没有放松对光绪的监督和控制，光绪不过是由一个完全的傀儡变成半傀儡，即有了单独召见臣工、名义上单独发布上谕等权力，但是一切重大问题仍必须先请命慈禧而后行。因此，光绪每隔几天就到颐和园去请安，少则住两三天，多则住四五天，慈禧也偶而回宫住几天。据统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共到颐和园“请安”12次，共住43天，慈禧还宫3次，住16天，母子二人在一起的时间超过50天。慈禧控制光绪干涉变法的情况，档案中虽然没有丝毫记载，但是却可以从光绪发布重要上谕和他赴园“请安”的时间之间的“巧合”看出来：光绪6月9日赴园，11日发布《明定国是诏》；14日第二次赴园，15日发布荣禄署直隶总督、新授职二品以上大员恭诣慈禧面前谢恩、翁同龢开缺回籍等上谕；22日第三次赴园，同日发布废八股改策论上谕；7月2日第四次赴园，3日发布成立京师大学堂上谕……

康有为等维新派心里十分明白，新政之所以不能顺利推行，关键是慈禧在挡道，而慈禧的下面是众多的守旧大臣和后党官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掌握着军权的荣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不铲除荣禄并使光绪摆脱慈禧的控制，维新变法就没有成功的希望，因而萌生了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念头，这一念头最终成为他们的决策则由天津阅兵风闻引起。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与慈禧有去天津阅兵的计划。关于阅兵的上谕有两次，一次发布于6月15日，即发布荣禄署直隶总督、翁同龢开缺回籍等上谕的同一天，另一次发布于8月24日，对阅兵计划作出了具体的安排。从这两道上谕看，看不出阅兵之外的图谋。但是，由于这一计划颁布于百日维新期间，正是帝后两党、新旧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因而引起后党要以天津阅兵为机，发动政变，废掉光绪帝的传闻，一时谣言四起，康有为、梁启超等更是信以为真，深以为忧。为了保护光绪帝，他们认为必须在京津一带掌握一部分军队。当时，京津一带驻扎有聂士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都归荣禄节制。康有为等人环顾北洋三军，经过比较，认为只有曾参加过强学会的袁世凯可以争取，“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因而决定争取袁世凯举兵勤王，发动政变，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锢杀慈禧，使光绪掌握全权。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少年时读书不成，乃投入淮军将领吴长庆军中。袁世凯办事干练，深受吴长庆赏识，1882年，吴长庆奉调率军进驻朝鲜，袁世凯负责前敌营务处。在朝鲜期间，因协助朝鲜国王李熙镇压汉城兵变有功，被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1885年，因李鸿章举荐而迁升三品道员，被任命为“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请调回国。1895年以浙江温处道的身份开始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按照西方的军制和战术原则编练军队，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新式陆军。就在这一年，他认识了正在北京开始维新变法活动的康有为，并与康有为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强学会，还捐助白银500两，被康有为等视为“维新同志”。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康有为等极力争取的对象。

9月11日，康有为代徐致靖草拟《边患日亟，宜练重兵，密保统兵大员折》。康有为以“边患日亟”作掩护，保荐袁世凯，以免后党疑心，并请光绪召见袁世凯，“隆其位任，重其事权”。光绪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电谕袁世凯速行来京陛见。9月16日，光绪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了袁世凯，详细询问了有关军事方面的情况。当天，光绪谕令袁世凯以侍郎候补，责成其专办练兵事务，将应办事宜随时专折具奏。第二天，袁世凯谢恩时，光绪又当面告诉他：“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是明确告诉他可以不再受荣禄的节制，可以独立行事，直接向皇帝负责，目的是剥夺荣禄的部分兵权。康有为听到袁世凯被破格重用的消息后，不禁拍案叫绝：“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

但是，康有为们太天真了。具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袁世凯，从突然地被召进京觐见皇帝，又莫明其妙地被破格提拔重用中，马上嗅出了其中的味道，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卷进了帝后党争的漩涡，吓得“汗流浃背”。他反复权衡了帝后两党的实力，觉得还是投靠后党保险，下定了

投靠后党的决心。

富有多年政治斗争经验的慈禧毕竟是靠政变起家的。百日维新甫经开始，她就通过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新任职大员恭诣谢恩和令翁同龢开缺回籍等措施，控制了军权和用人权，大大削弱了帝党力量，然后即静坐观变。百日维新初期，光绪的维新上谕主要限于文教和经济改革，因而她一般不加拦阻。随着变法的进行，新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一些守旧大臣要求慈禧出面干涉，尤其是满族大臣中有许多官员跪请慈禧，恳求她禁止光绪推行新法，但是她只是“笑而不言”。有的官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一再乞求，她却笑着骂他们说：“你们管这些闲事干什么？难道我见事还不如你们吗？”

随着变法的深化，光绪的维新上谕渐渐触及到了政治方面的改革，光绪争取一个皇帝的实际权力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了。从8月底开始，光绪“办理新政益振厉”。从8月30日到9月5日，6天时间内发布了裁撤机构裁汰冗员、罢斥礼部六堂官和擢用军机四卿等重要上谕，尤其是罢斥礼部六堂官一事事前未“请示”慈禧，这就超出了慈禧所能容忍的限度。但是慈禧仍然不动声色，只是在光绪赴颐和园“请安”时指责他说：“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谓我何？”清制，大臣没有重大的过失，不可予以严惩；各部尚书、侍郎满汉各半，且礼部六堂官均是旧臣，而王照是汉人、是新进小臣，光绪这样做是“以远间亲、新间旧”，即俗语所谓“胳膊肘向外拐”，因而慈禧抬出祖宗来指责光绪。

军机四卿的擢用是维新派和帝党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毕竟离变法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康有为等人积极鼓动开懋勤殿。军机四卿的任用已经使军机大臣失去了部分权力，若再开懋勤殿聘请康有为等人作皇帝的顾问，势必将取代军机处，帝党和维新派将执掌大权，后党的权力将大大削弱乃至全部丧失，这是慈禧绝对不能容忍的。在光绪赴颐和园请求慈禧同意开懋勤殿的同一天，又发生了光绪召袁世凯进京和日本明治维新名臣、前内阁总理伊藤博文应康有为等之邀来京两件事。光绪召袁世凯进京陛见是要拉拢他，狡猾的慈禧一望就知。康有为等邀请伊藤博文来京是为了向他请教变法事宜，并准备请他作“客卿”，协助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光绪进行变法。许多官员纷纷奏请将伊藤博文留在北京，聘为“顾问官”。一时间，京师到处流传伊藤博文将入军机处，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士庶百姓“皆言之凿凿”。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很痛切地对慈禧说：“伊藤已定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一语道破慈禧的心病。这连续发生的几件事，使慈禧大为恐慌，她感到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于是下定决心发动政变。

因此，当光绪向慈禧提出开懋勤殿的问题时，慈禧不但“不答”，而且“神色异常”。这回轮到光绪恐慌了，他“见太后神色迥异寻常，自知有变”，于是第二天回宫后便召见了杨锐，交给杨锐一道密诏，称时局危迫，让杨锐找谭嗣同等想办法挽救危局，诏云：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指罢斥礼部六堂官一事——作者），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由密诏中可以看出，光绪是十分希望将那些守旧大臣尽行罢黜，而开制度局或懋勤殿以擢用维新人士的，无奈慈禧不准，他自己又“权力实有未足”，倘若置慈禧的意见于不顾，那么他自己的皇位都不能保，又遑论其他？光绪的难言苦衷跃然纸上，表露无遗。他希望维新诸人能筹一良策，既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又不违背慈禧的意旨，可惜这样的良策是没有的，但这说明光绪还在作最后的努力。

但是，还没等杨锐找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筹商“良策”，17日光绪又公开发布上谕一道，命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督办官报，“毋得迁延观

望”。这时，康有为认为要想变法成功，首先必须铲除变法的最大障碍慈禧太后，于是找来梁启超、谭嗣同等商量办法，决定由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举兵勤王。

18日深夜，谭嗣同来到袁世凯在北京下榻的法华寺。谭嗣同的突然夜访，使袁世凯暗吃一惊，知道事关机密，于是屏去从人，只留心腹幕僚徐世昌陪伴，将谭嗣同延入内室，略经寒暄，谭嗣同即劈头问袁世凯：“你以为皇上是什么样的人？”

袁世凯不明所以，只好回答说：“是旷代圣主。”

谭嗣同又问：“天津阅兵的阴谋你知道吗？”

袁世凯说：“知道，我已听说。”

这时，谭嗣同拿出光绪密诏的抄件，说：“今日可以救我圣主的，只有足下一人，你要想救就救”，说着把手放在自己的脖子上，“你要不想救，就请到颐和园向太后告发我、杀我，这样你就可以得富贵了”。

袁世凯似乎觉得受了侮辱，正色厉声说：“你把我袁某看成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共同的圣主，我和足下都受到皇上非同一般的重用，救护皇上的责任不只是你一个人的，需要我做什么只管吩咐。”

于是，谭嗣同把早已商定的计划和盘托了出来：“荣禄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和董福祥、聂士成三支军队都受荣禄节制。三军之中，足下的军队是最强大的，如果事变突起，足下以一军抗击那两军，保护圣主，恢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这是举世无双的勋业呀。”具体要求是：先在天津诛杀荣禄，然后率兵进京，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

袁世凯闻听此言，魂飞天外，因为当天他已经得到消息，荣禄已调聂军驻守天津陈家沟，董军已经进京，知道荣禄已有准备，并且荣禄还直接指挥他的军队，下令袁军各营整备听调。现在谭嗣同让他举兵勤王，无异以卵击石。但袁世凯狡猾多端，马上镇静下来，说：“如果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我军营，传号令以诛除奸贼，我必能从诸君子之后，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竭死力以挽危局。”

谭嗣同仍不放心，问袁世凯：“荣禄待足下一直很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世凯笑而不语，在一旁的幕僚徐世昌插话说：“荣贼并不是推心置腹地待慰帅（袁字慰亭），过去曾有人提出扩大慰帅的军队，荣禄却说：‘汉人不可以给大兵权。’他对慰帅不过是笼络而已。”他并举荣禄唆使手下人弹劾袁世凯而他却出面替袁昭雪一事予以说明。

谭嗣同便说：“荣禄乃是操莽（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对付他恐怕不太容易。”

袁世凯听谭嗣同这么说，感觉受了极大的侮辱，怒目圆睁，说：“如果皇上在我的军营，杀荣禄就跟杀一条狗一样。”

谭嗣同见袁世凯态度明朗坚决，便与他详细商量具体行动方案。袁世凯本已决心投靠后党，所以便找理由申述自己的难处，说在天津住有很多外国人，杀总督会引起列强瓜分；又说北洋有宋庆、聂士成、董福祥军各四五万人，淮军、练军又有70多营，京内旗兵也不下数万，而自己只有7000人，如何能办此事？还说他的军队的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荣禄手中，必须先将粮弹领足才能用兵。他请谭嗣同先回，容他熟思细想，布置半月二十天才能答复具体办法。

谭嗣同说：“皇上很急，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我才可复命。”再三催促袁世凯立即拿出具体的办法。

袁世凯见谭嗣同声色俱厉，而且腰间衣襟高起，好像藏有凶器，知道他今夜肯定不会空回，便保证“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但他并没有答应立即起兵勤王。谭嗣同无奈，只得告辞。

同样令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这班没有一兵一卒的秀才们心急火燎地筹商营救光绪、欲挽狂澜于既倒的计划的时候，宫廷政变已在慈禧的一手主持下，悄悄地在颐和园发生了。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六 丰厚的遗产

——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原因及其意义

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了。慈禧一伙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倒行逆施，成了民族的千古罪人。而维新志士们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为了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富强，登高疾呼，身体力行，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将流芳百世。

百日维新是维新变法运动的最高潮，它虽是昙花一现，却如一道耀眼的流星划破漆黑的夜空，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灭的光辉。它不仅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也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2 不灭的功绩

维新变法运动首先是一场不彻底的，仅由部分上层人士参与的爱国救亡运动。我们已经知道，这次运动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资本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直接刺激下出现的。它肇始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之际，在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一步步走向高潮，有力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挽救民族危亡，是救亡图存。在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们奔走呼号，向国人指出中国面临的危险，号召变法维新以图自强，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维新变法的实践，乃至为此捐躯殉难，表现出了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

维新变法运动又是一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此，范文澜先生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沿几千年，流毒无限。清朝统治者，选择一整套封建毒品来麻痹知识分子，务使失去头脑的作用，驯服在腐朽统治之下。这些毒品是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八股文章、古文经学（训诂考据）等等，所有保护封建制度的东西，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不许有人摇一摇头，其为害之广之深，与象征帝国主义的鸦片（当然不只是鸦片），可称中外二竖，里应外合，要中国的命。以康有为为首的思想家们，公然对清朝用惯了的毒品大摇其头，拿陆王来对抗程朱，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所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也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变成托古改制，拿孔子来对抗孔子，因此，减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当时一整套毒品，受到了巨大的冲荡，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了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虽然仅仅走了第一步，却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步。”

在这场运动中，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一方面猛烈抨击了顽固守旧思想，阐述了在中国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揭露了传统学术文化的空疏无用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和八股取士的弊端，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学术思想，并广泛采用了开学会、办报刊的方式宣传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和广泛的影响。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反省、思考、探索其他更好的强国富民之路，这就给死气沉沉的中国思想界打开了一个大缺口，给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内容，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要变法，要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来改造中国的君主制度，成为一股强劲的时代思潮。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历程时曾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这四个人中，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占了两个（洪秀全是否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史学界有争议）。可以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派人物奠定了中国近代文明的基础，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民族觉醒的一座里程碑。

维新变法运动以自己的失败证明，企图依靠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的道路走不通。康有为们只知道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实行自上而下的变革取得了成功，企图在中国照搬俄国和日本的经验，殊不知中国有着与俄、日不同的国情，光绪帝也不是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积淀的大国，要想在一朝一夕改变她太困难了。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青年皇帝，光绪帝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他无力担负起改变中国的重任。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和顽固派，紧紧掌握着清政府的大权不放，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作后盾，不容许丝毫有损其利益的改革。曾几何时，康有为们还东奔西走，为光绪帝的采纳新法、重用维新人士而欢呼雀跃、踌躇满志，好像依靠光绪帝的“雷霆万钧之力”，不用多久就可尽变旧法，中国就会成为他们希望中的崭新世界。然而，转瞬间即风云变色，光绪帝被囚瀛台，康梁逃亡海外，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慈禧再度垂帘，新政尽被废除，百日维新只是昙花一现。于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生分化，越来越多的人丢掉了幻想，由寄希望于清政府的改革转向推翻清政府的革命，为此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准备。

毫无疑问，一百多年前的这场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壮举，虽然它无可挽回的失败了，但它将永远彪炳史册，维新志士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来人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文明富强而奋斗。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中国史话》总目录

更多资料下载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